

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

第八部

1966—1976

苍天飚风 上卷

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

第八部 1966—1976

苍天飓风

上卷

谢远学 主编

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编纂委员会 编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

编纂委员会

总编审 石仲泉

总策划 黄书元 谢远学

主 编 谢远学

副主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 俊 李永娥 余雪梅 张 照 金勇剑

岳玉成 胡 娟 谢远保 程常霞 魏海波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 彦 万松涛 王小鸿 王英才 王金华

王树芬 王海平 文莲秀 方声平 邓廷民

冯云飞 卢 俊 史建斌 石奇丰 石志馨

田婷婷 叶扬帆 江 涛 江雪松 刘 浩

刘 铭 刘 辉 刘亚友 刘华伟 刘延金

孙美玲 李 明 李 勇 李小红 李正艳

李其金 李娴丽 师 伟 吴 亮 吴峥嵘

严 实 杨 帆 杨 清 杨冬玲 杨丽芳

杨毅然 张 峰 张 琳 张广笛 张和平

张翔宇 陈欣欣 陈光辉 陈焕光 苏拥军

陆寒静 罗 光 罗家辉 林 海 郑立成

郑复春 周齐力 周宝瑞 周华东 钟 月

赵 志 赵方红 赵剑波 赵翠竹 侯 勇

胡 萧 胡云霞 胡冬青 姚方明 贺雨生

柳青萍 姜雪梅 段德存 徐 兴 徐文畅

袁 冰 袁仲才 贾 刚 贾折桂 高 强

高京京 唐启燕 郭钦辉 郭景龙 萧 龙

萧朝东 黄 石 黄西兵 黄宗宾 黄竟然

曹 霞 曹学范 崔云飞 章兴超 康志强

阎思成 梁思浩 梁桂华 梁鸿儒 董 云

董振军 韩 荣 韩 露 韩千钧 彭 涛

彭晓春 傅 臻 雷经纬 蔡博识 谭仲谋

目 录

第一章 风暴骤起 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 …………… 1

刘少奇主持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康生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会议定下基调 《五·七指示》出台 《五·一六通知》反映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林彪“五·一八”讲话之实质 “彭、罗、陆、杨”受批判 刘少奇、周恩来在会上作检讨 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毛泽东同意派工作组 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社 中共中央大量派出工作组 毛泽东没有在杭州会议上表态 工作组事件始末 行政教育机构率先瘫痪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受到批判 《十六条》获得通过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造

第二章 狂澜不羁 大规模内乱开始全面掀起…………… 111

毛泽东默认“红司令”的称号 声势浩大的红卫

兵运动 红卫兵“破四旧” 宗教设施受到冲击 抄家风初起时 “西纠”的起落 打、砸、抢之风愈演愈烈 抄家的狂飙席卷全国 工作组组长被揪斗 大串连加快了全国动乱的节奏 “首都三司”的成立使红卫兵运动走向分裂 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各级党政部门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 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 上海“安亭事件”开始了工矿企业的“停产闹革命” “《解放日报》事件”始末 全国出现一股“经济主义歪风” “康平路武斗事件”真相 党史专家谈全面内乱的由来

第三章 横槊浪头 对全面内乱制止的努力…………… 189

“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 陈毅拒绝当“红卫兵司令” 周恩来组织成立“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 《工厂六条》和《农村五条》出台 《人民日报》发表“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各方面的抵制 陈毅准备挥戈上阵 《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周恩来策划筹备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 两个“十万人大会”召开 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叶剑英等力保稳住军队 《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出台 毛泽东想把红卫兵从社会拉回学校 中共中央要

求“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 军队奉命实行
“三军两支”

第四章 一月风暴 上海造反派大肆夺权…………… 281

搞乱上海、乱中夺权的“前奏曲”已谱完 “上海的桃子熟了” 《解放日报》已不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 “一月风暴”的标志:“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召开 “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成立 毛泽东支持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运动 《人民日报》肯定上海“夺权”运动 中共中央给上海造反派发出“贺电” “两报一刊”为“夺权”运动大造舆论 张春桥等第一次尝到了被批斗的滋味 张春桥等人的4次“夺权”之争 张春桥等人“创造”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 张春桥、姚文元提心吊胆地进京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替了“上海人民公社”

第五章 拍案而起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 …… 321

“全面夺权”引起灾难性后果 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忧心如焚 中央军委碰头会上的争论 所谓“大闹京西宾馆” 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激烈斗争 毛泽东:“总是红卫兵、工会、造反司令部不行” “大闹怀仁堂”的前前后后 谭震林写信痛揭江青

“比武则天还凶” 康生决定把“最高统帅”请出来 林彪:这回又有好戏看 周恩来劝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主动“找主席检讨” 毛泽东: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 怀仁堂的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 正义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 全国性反击“二月逆流”高潮 毛泽东在家里开了一个“团结会”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为“二月逆流”定性 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 邓小平: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

第六章 风靡雨急 武斗夺权升级和稳定形势推动…… 417

“一月风暴”的“夺权”之风潜袭全国各地 4省1市的“夺权”得到批准和支持 红卫兵卷入“全面夺权”运动 《军委十条》使两派斗争加剧 全国性的武斗规模越来越大 武汉的“百万雄师”与“七·二〇”事件始末 江青肯定“文攻武卫”的口号 “工总司”血流联司 谢富治关于“砸烂公、检、法”机关的荒谬主张 “王八七”讲话引起的风波 中国不断出现涉外事件 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陈毅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 毛泽东批了5个大字:“大、大、大毒草” 打倒“王、关、戚”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 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 毛泽东派出工宣队 红卫兵从革命狂热的云端回到

现实土地上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和思考
各地“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

第七章 岁月蒙尘 一大批冤假错案酿成(上) …… 585

“三家村反革命集团”成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桩冤案 邓拓、吴晗受害 惟一的幸存者 廖沫沙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震惊国内外 “新疆叛徒集团”冤案的来龙去脉 冀东冤案发生的前前后后 深挖“内人党”背后 所谓“伍豪事件”实际上是对准周恩来的 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 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等被打成“七·二〇”事件的“黑后台” “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内幕 公、检、法部门受到突然袭击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 陶铸冤案始末 彭德怀冤案经过

第八章 岁月蒙尘 一大批冤假错案酿成(下) …… 739

全国各地出现了批斗“右倾翻案风”迹象 林彪、江青策划“杨、余、傅事件” 杨成武所犯的5条“错误” 杨成武被批斗的经过 傅崇碧离开北京,被调沈阳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以上干部大会 “杨、余、傅事件”包含的政治背景 “大树特树”成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 杨成武搞过江青的“黑材料” 余立金有点“迂腐” 傅崇碧被称为“不识抬举” “派性”又成了“好东

西” 所谓“‘杨、余、傅’的‘黑后台’是‘二月逆流’的人” 艺术家严凤英被迫害致死真相 “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幕后 “乒乓三杰”被打击迫害致死背后 共和国元帅贺龙冤案始末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平反的决定》

第九章 人民写史 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冤案始末…………… 841

毛泽东对刘少奇等派工作组的事情不满意 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迫作检讨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的位次排列发生了变化 林彪跳出来整刘少奇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清华大学造反派向刘少奇“开炮” 刘少奇准备辞去国家主席 刘少奇陪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张春桥直接部署“打倒刘邓”的行动 在“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 刘少奇被错误批斗的经过 中共中央决定“审查”刘少奇的问题 “打倒刘少奇”的声音越来越高 刘少奇的精神和身体濒于崩溃 刘少奇被隔离审查前后 林彪、江青等人给刘少奇罗织的“罪名” 共和国主席的最后日子 刘少奇：历史是人民写的

第十章 苍茫大地 中共九大召开的前前后后…………… 907

疯狂的个人崇拜难以遏止 “忠字化运动”时髦

一时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吸收无产阶级的新
鲜血”变调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权之争
毛泽东：“我不是天才” 毛泽东已被“神化”
周恩来积极筹备中共九大 中共九大预备会议
秘密进行的中共九大开幕式 毛泽东的开幕词被
掌声打断了6次 中共九大主席团成员被选出
林彪宣读中共九大政治报告 删繁就简的中共九
大通过的党章 自称得了“5个鸡蛋”的徐向前
林彪、江青集团的势力在扩大 毛泽东在中共九
大闭幕式上讲话 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新闻公
报》 不同寻常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 九
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
的

主要参考书目 1015

第一章 风暴骤起

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主持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康生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会议定下基调 《五·七指示》出台 《五·一六通知》反映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林彪“五·一八”讲话之实质 “彭、罗、陆、杨”受批判 刘少奇、周恩来在会上作检讨 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毛泽东同意派工作组 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社 中共中央大量派出工作组 毛泽东没有在杭州会议上表态 工作组事件始末 行政教育机构率先瘫痪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刘少奇受到批判 《十六条》获得通过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造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一块“误区”,是中国人民在探索自己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一段曲折而复杂的艰难历程。

1966年初夏,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在中国大地酝酿。为了把批判《海瑞罢官》而点燃的“文化大革命”之火,由意识形态领域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和各级党政机关,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时,毛泽东在外地休假,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年4月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有关部署进行。毛泽东的有关部署是由康生负责传达的。

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70多人,其中包括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等8人。但是,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没有参加。按照惯例,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当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室里,与会人员都已到齐。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经在主席台坐定。刘少奇宣布开会。他首先介绍

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日程安排作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因为多数与会人员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要发这样一个《通知》，更不了解这个《通知》的产生过程，于是决定先开几天“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传达毛泽东的一系列近期指示，介绍《通知》的起草修改情况。

座谈会从5月5日至7日共开了5次，实际上并没有座谈，而是听取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讲话。

在座谈会期间，康生一个人用了两个半天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讲了8个小时，传达了毛泽东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关于中央“出不出修正主义”、开展“文化革命”以及批判彭真、陆定一等的多次谈话。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难辨。

康生嘶哑着嗓音说，他个人体会毛泽东这3个方面的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第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其中贯穿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康生传达完关于中共中央《通知》起草情况的介绍之后，

又对彭真进行了“揭发”。在康生讲话的过程中，铅印好的中共中央《通知》草案稿就给每个与会者发下去了。这个《通知》稿是在开会的前一天，康生派人印刷的。康生还让王力负责校对。

彭真一边听着康生的讲话，一面飞快地看了这份材料。看着这份材料，彭真气愤得整个身体都颤抖了。

康生在座谈会上的这些谈话奠定了会议的基调。会上，不少人对康生的谈话内容感到意外和不解。

康生讲话后，会议转入讨论和揭发彭真的问题。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人上下呼应，发言揭发、批判、论证，成了会议上最活跃的几个个人物。

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时候，毛泽东看了林彪转送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

《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它包括恢复了军队的老传统；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投入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

《报告》还提出，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粮食。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毛泽东看了这个《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回答了“砸烂

旧世界”之后如何建设以及怎样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问题。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

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①

毛泽东给林彪所去的这封信后来就被党内外称为《五·七指示》。

中共中央于5月15日转发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和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报告,并加批语指出,中央认为,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我

^① 毛泽东:《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3—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发到全党之后，于1966年8月1日又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向全国作了公布。

这个社论中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①

《五·七指示》实际上勾画了毛泽东此时所向往和憧憬的社会理想。

《五·七指示》的核心内容是兼管他业。就行业来说，每个单位(行业)都要有工、有农、有学、有兵，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变成不依赖外界的“小社会”。

实际上，这种消灭分工的思想与做法，只能造成工不工、农不农、学不学、兵不兵的状况，导致对社会生产力的大破坏。但此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把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作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的新发展”，“作为我们的

^① 《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

纲领”，大加宣传和贯彻。

《五·七指示》发布后，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一般人大多卷入狂热的“造反”浪潮，无暇顾及贯彻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尽管此时报刊也对《五·七指示》的“伟大意义”作过大量的宣传。

与此同时，陈伯达、康生指挥新闻舆论界与他们紧锣密鼓地配合起来，在全国掀起了一派声讨“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鼓噪声。

5月8日，江青、康生支持一些人，化名“高炬”，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彭真的所谓“错误”。关锋则化名“何明”，把《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这篇文章又在全国各报刊转载。

5月1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七期，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材料、讲话、报刊文章连篇累牍地出现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面前。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已经控制不住这个局面，只得按照毛泽东的事先布置，一步一步地完成着会议的预定程序。

5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华北局派宣传部长黄志刚带领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接替了北京市委的领导工作。

座谈会之后，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了解了《通知》产生的来龙

去脉。大家都知道这是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月14日至30日的17天中先后8次审阅修改之后才定稿的，并且已经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基本通过。所以，与会各小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摩着它的含意。

在分组讨论的过程当中，有人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是，陈伯达、康生对这样的建议都给予否定。因此，在讨论之后，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都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首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的情况。

看到整个《通知》稿一字未改，连一个标点也没有动，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觉得不大好。他勉强地解释说，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是独断专行，不符合民主集中制。他原来考虑过改一点，而大家的意见是不改的好，改了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了。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彭真对此有没有意见。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觉得彭真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充了一句，问彭真对《通知》有什么意见。彭真说，“没有意见”。

刘少奇进一步问彭真对《通知》是赞成还是反对。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大家都举起了右手。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在会上一致通过。因为它是在5月16日通过的，人们通常称它为《五·一六通知》。文件中的一些段落是毛泽东加写的，其中最重要的有：

“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

充分注意这一点。”^①

这些内容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

毛泽东认为,党的领导阶层“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发出党内出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严重警告。但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点出党内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用意,还可以从他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不久与时任越南国家主席的胡志明的谈话中看出。毛泽东在谈话中对胡志明说,他们都是70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然而,周恩来并没有理解《五·一六通知》中这段话的真正含义。用周恩来后来的话说,他虽然已有些猜测,却没曾想到毛泽东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是指刘少奇。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更没有想到这一点。后来在《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三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会见胡志明时,都表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

^① 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问题的紧急报告〉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40页、43页、43—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五·一六通知》中说,中共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编者注),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文化革命小组”。

《五·一六通知》认为,《二月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

除了扣上这顶帽子,《五·一六通知》还把《二月提纲》说成是对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1965年9月至10月间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为了陷害彭真,《五·一六通知》说《二月提纲》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

《五·一六通知》还诬蔑彭真在对待《二月提纲》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上,“根本没有”在“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同意。

《五·一六通知》中说,彭真“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从而给彭真扣上了“反党集团成员”的罪名。

《五·一六通知》更是十分武断地列举了《二月提纲》的所谓“十大罪状”。

《五·一六通知》说,《二月提纲》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五·一六通知》认为,在中国正面临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有力地冲击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时,《二月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向右转”。因而,《五·一六通知》诬蔑《二月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五·一六通知》还认为,中共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二月提纲》不提毛泽东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了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五·一六通知》诬蔑《二月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说报刊在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二月提纲》的作者们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涉及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五·一六通知》说彭真等人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1959年庐山会议对“右倾

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

《五·一六通知》利用毛泽东的“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这句话，诬称彭真等人这样做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并且说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五·一六通知》诬蔑《二月提纲》特别强调的“放”，是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歪曲”了毛泽东 1957 年 3 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其实，毛泽东在 1957 年 3 月的讲话中谈到“放”与“收”这个问题时指出：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

服，以理服人。”^①

《五·一六通知》对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断章取义，甚至诬蔑《二月提纲》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了，诬蔑《二月提纲》中所谓的“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五·一六通知》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真理的阶级性，把《二月提纲》中提出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诬为“资产阶级的口号”，说彭真等人用这个口号去“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

接着，《五·一六通知》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对此，在陈伯达、康生起草的稿子上，毛泽东又加了这样一段话：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125页、122—1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

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①

^① 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0—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二月提纲》中还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超过和压倒对方”。对此，《五·一六通知》说，“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

《五·一六通知》并且强调，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

《五·一六通知》还诬称《二月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五·一六通知》把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都当作“反动学术权威”。

《五·一六通知》中说：“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立，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①而《二月提纲》中特别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

据此，《五·一六通知》诬蔑《二月提纲》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人民日报》，1967年5月17日。

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①

《五·一六通知》中说:“提纲提出的‘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②

接着,《五·一六通知》诬蔑《二月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

与此同时,《五·一六通知》还错误地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视为“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说他们“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这样,斗争矛头就直接指向了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

《五·一六通知》说《二月提纲》的作者“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的目标”,说《二月提纲》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人民日报》,1967年5月17日。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人民日报》,1967年5月17日。

中提出的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的主要目的,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

《五·一六通知》还说,《二月提纲》的作者“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

《五·一六通知》说《二月提纲》的作者是利用整风,“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

《五·一六通知》把《二月提纲》中提出的有益于学术批判和文化运动的“斗争中要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的政策,说成是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

《五·一六通知》说《二月提纲》的作者“压制”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草稿的这段内容后又加了这样几句话:“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

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艺术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①

《五·一六通知》把《二月提纲》中说的通过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问题的道路予以诬陷与曲解，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开辟了无产阶级道路，而《二月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

因此，《五·一六通知》硬说这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的旗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最后，《五·一六通知》还将《二月提纲》冠以“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大帽子，使《二月提纲》蒙上了不白

^① 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之冤。

《五·一六通知》错误地指出,《二月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并说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做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五·一六通知》还把“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错误地说成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五·一六通知》一笔抹杀了建国后 17 年思想、文化、艺术领域的成就和主流,认为在这些领域内已经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中共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了党、政府和军队里,说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而且,《五·一六通知》毫无根据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异常的危险”。后来有关专家学者对《五·一六通知》作了这样的评价:

《通知》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主观臆断,使“文化大革命”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围。《通知》严重混淆了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学术观点的矛盾同敌我矛盾之间的界限,提出要用彻底揭露、彻底批判、打倒、清洗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通知》主张在上层

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通知》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真理的阶级性;割裂“破”与“立”的辩证关系,主张以“破”代“立”。理论和政策上,《通知》混淆是非,错误地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视为“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号召对他们“彻底揭露”、“彻底批判”,直至夺取他们的“领导权”,“清洗这些人。”

这个《通知》是1957年以后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想发展的集中表现,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是“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的一个标志。《通知》发动亿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基本思想,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型(形)。^①

实际上,批判《海瑞罢官》之后,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如恶风卷地,说假话、搞迷信、打砸抢愈演愈烈,“黑线专政论”肆虐横行,“文化专制主义”毒雾滚滚。如果说批《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和“试验田”的话,那么《五·一六通知》则是对这个“突破”的肯定,对这个“试验”的总结

^① 罗正楷:《中国共产党大典》,第920页,红旗出版社1996年6月版。

升华,对这个“先例”加以推广普及的号角。

《五·一六通知》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由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上升为“文革”中普遍适用的模式,使“文化大革命”有了正式的开端。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和根据会上的所谓“揭发材料”整理的6个附件。

《五·一六通知》下达后,邓拓明白了他挨整的真正目的是有人企图整彭真。5月16日,邓拓拒绝了工作组让他“揭发”彭真的要求。1966年5月17日夜,邓拓自杀。

而被诬蔑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的原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在看到《五·一六通知》后,忍不住泪如雨下。接着,他被宣布停职反省。当在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再次听到自己的“罪名”时,田家英的精神支柱彻底垮了。田家英于5月23日在他和毛泽东曾一起挑书的书房里自尽。

在批判田家英的同时,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主任、副主任也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而且,1959年经刘少奇处理过的“非法录音”问题变成“窃听事件”重新抖出来。杨尚昆因而被扣了一大堆帽子。

5月18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第三次会议。林彪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即“五·一八讲话”——编者注)。林彪从上午10点讲到午后13点。

在讲话中,林彪大谈古今中外的各种政变,制造中共中央内部有人搞“反革命政变”、“颠覆政权”的恐怖气氛。他将彭

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4 个人的事硬扯在一起，说他们“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诬蔑他们“搞反革命政变”。林彪在会上信口雌黄地说：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们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①

林彪还在讲话中别有用心地大肆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①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 449 页、449—450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

林彪还说：“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岁。”“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①

林彪还提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我们一万句”和“四个念念不忘”，即“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林彪的这些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广泛传播，起了极坏的作用。

在党内生活已很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的这篇讲话被称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成了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题报告。林彪的这篇讲话，不仅给会议以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整个“文化大革命”都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可以说，由于它的煽动，会议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了疯狂的程度。同时，林彪个人也乘机而达到了树立自己威信的目的。

从以后的事实来看，林彪的这篇讲话，正是他乘“文化大革命”之机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份反革命纲领。但是，在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却将林彪的这个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到了全党，要求“全党全军都应当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

^①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449页、45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从5月19日开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续举行全体会议。后来,会场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议根据林彪讲话中定下的口径,以“反党集团”的罪名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一些人在会上的发言越来越不可思议,刚开始批彭真,批陆定一、罗瑞卿,后来竟批起了朱德。内容却多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或者纠缠细枝末节。在这些批判发言中,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可谓出足了风头。

5月23日上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张春桥在这天的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张春桥在发言中系统介绍了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同时对人事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对于人事变动问题,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这个《决定》中说:

“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

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①

5月24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的问题。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逐渐进入尾声。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先后在会上讲了话。他们的讲话同林彪盛气凌人的讲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在讲话中除了谈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外，就是检讨自己“跟不上毛泽东思想”，并对多年来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5月26日上午10点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天的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刘少奇也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刘少奇的讲话谦逊而平和。他首先对会议专门安排他在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讲话表示感谢。接着，他讲了根据毛泽东一系列最近指示、开展“文化大革命”、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意义和他自己的认识。刘少奇整个讲话的精神是表示要努力跟上形势，保持晚节，革命到底。

对于“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是缺乏思想准备的。他在谈到自己的认识时说，这次讨论发言对“文化大革命”问题讲得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节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452—453页、45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比较少。对这个问题，“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刘少奇说他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因为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同周恩来等人一样，刘少奇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检讨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缺点错误。刘少奇把自己参加革命几十年间的缺点错误从头到尾数落了一遍，检查回顾了自己1927年大革命时期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1947年指导全国土地改革、1949年在天津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讲话、1951年关于山西互助组织的批示、1956年反冒进、1962年对经济困难的估计和制定《二十三条》过程中不主张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问题上的“错误”。

刘少奇检讨的这些“错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检验，其中很多实际上并没有错，有些还是可贵的真知灼见。其所以认为“错误”，只是由于把党内长期形成的“左”的一套当作“正确”，有的则是因为与毛泽东的意见相悖。

同一天下午1点30分，刘少奇讲话结束，周恩来宣布散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即闭幕。历时20多天的会议终于结束了，可人们的脑子里仍充满困惑。

后来，有关专家学者在谈到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指出，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发动的阶段。但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共中央的绝大多数人，对此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不少人是不赞成的，或是很不理解的。

由于党内长期民主生活不正常，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

领导原则被破坏。在毛泽东个人威望的影响下,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集中反映了“左”的理论、方针、政策,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正是这篇《五·一六通知》,以不实之词,恶毒攻击了中央一线领导同志。它诬蔑《二月提纲》“偷天换日”、“别有用心”、“把水搅浑”等等,而事实上真正“偷天换日”,无限上纲上线,曲解、歪曲和东摘西凑扣帽子的正是它自身;真正“别有用心”,企图打倒大批革命老干部,篡党夺权的正是它的制定者;真正“把水搅浑”想搞乱党和国家借机捞一把的也正是那些人。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在5月28日发出文件,正式宣布“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成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此时名列副组长的还有王任重、刘志坚,但他们和其他几个成员很快就受到诬陷迫害,被排除出这个机构。

20世纪60年代初,对于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来说,是面临困难和考验的时候。

在中共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引下,国家胜利地度过了3年严重困难时期,又出现了新的生机。亿万人民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1965年11

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带头发难。“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对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解释的情况下,以姚文元这篇反动文章为开端,逐渐展开着、进行着。这是一场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都不能称为“革命”的运动的开始。

1966年,北京大学校园的春天是那样的清新而迷人。未名湖上,碧波荡漾;博雅塔下,草长莺飞,一派祥和气象。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这所神圣的高等学府,有人在酝酿着卑鄙的勾当。

5月14日,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的宋硕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华北局指示,强调各级领导要坚守岗位,加强对运动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积极投入斗争。

这一天的中午,康生以中央理论组的名义,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带7个人的“调查组”到北京大学,声称要了解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

对此,时任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的陆平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一天中午,他下班刚回到家里,校党委办公室来电话,说曹轶欧带工作组来了。陆平放下饭碗,赶到办公室。只见曹轶欧和一个人坐在那里。

陆平说:“调查组需要了解什么情况,我们准备一下,作个汇报。”

曹轶欧说:“不必了,我们是来了解学术批判情况的。”

陆平问:“你们住下吗?”

曹轶欧说:“住下。”

接着，陆平要办公室的同志准备房子，好好接待。

这一天晚饭过后，按照往常的惯例，陆平前去住处看望“调查组”，结果发现室内空无一人。陆平心一沉，感到很纳闷。陆平心想，曹轶欧不是说要住下吗？到哪里去了呢？陆平沿着未名湖畔，缓步走着。湖面微波翻动，他的心也像这湖水一样，泛起了涟漪。曹轶欧一伙行止的蹊跷诡秘，引起了陆平的疑虑。

陆平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愤慨地说，十几年后，他才清楚，原来他们秘密地住到西颐宾馆，秘密地找北大一些人到那里策划。陆平根本没有想到。

的确，曹轶欧的“调查组”是住在离北大有5里之遥的僻静的西颐宾馆。

调查北大的情况，不住在北大校内，搬到离校这么远的地方秘密住下，这种做法显然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原来康生早就揣摸透了毛泽东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康生为迎合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奇想，决定从北京大学点火，往上攻。于是，康生决定派曹轶欧到北大进行密谋活动。从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开始，进而搞垮北京市委，直到向“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开火。

曹轶欧临行之前，康生面授机宜，明确要求调查组在“北大点火，往上搞”，并且点了宋硕的名。

在康生的指使下，曹轶欧到北大后，名义上是为了了解北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但她却完全撇开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干尽了阴谋勾当。他们声言

“要参加会议”，可是北大邀请他们又拒不出席；他们说“要了解北大‘文化大革命’情况”，可是陆平找曹轶欧汇报，又被断然拒绝。但是，人们发现，曹轶欧从早到晚频繁地找学校的一些人到宾馆密谈，有的人甚至谈了两三次。

北京的5月下旬，天气还不那么热。可是，一个被指名调到“康办”的哲学系教员的聂元梓，却每天挥汗如雨，得意地穿梭于燕南园一带，奔走于北大和北大在北太平庄、十三陵水库的分校之间，忙得不可开交。

聂元梓，河南滑县人，1921年生，1938年入党，1963年调进北京大学，1964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曹轶欧等鬼鬼祟祟，想方设法搜集北大的情况，扬言要揭开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盖子”，把矛头直指中央。

由谁来带头“点火”、“揭盖子”的问题，康生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们知道聂元梓在北大名声不好，没有什么号召力，就没有对他寄什么希望。他们想到了陈守一，因为陈守一是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有威信。所以，曹轶欧准备首先去找陈守一。

1966年5月的一天，曹轶欧打电话给陈守一，作了自我介绍之后，表示要到陈家谈谈。接着，曹轶欧就到了陈守一一家。她简单询问了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后，阴险地说：“北大的学术批判方向错了，陆平要负责。”

陈守一辩驳说：“学术批判，党委常委分工由我负责，有错误，首先是我的责任，希望具体指出。”

曹轶欧碰了一鼻子的灰，没有再说什么。临走时，曹轶欧对陈守一说：“我和你谈话的事，应该保守秘密。”但是，曹轶

欧一伙仍贼心不死，还试图将陈守一拉拢过去。

过了几天，曹轶欧又私下约陈守一到西颐宾馆见面，并且一再叮咛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陈守一赶到宾馆后，曹轶欧劈头就问：“你对聂元梓的印象如何？”

陈守一感到问题提得很突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略作沉思，回答说：“聂元梓在社教中闹得太不像话。”

曹轶欧这时亮了底，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应该揭发陆平、宋硕，最好你领头，和聂元梓一起搞。”

陈守一对这种阴谋鬼祟的活动非常反感。他迟疑了一下，估计聂元梓就在隔壁的房间里等候着，非常清楚拒绝曹轶欧的请求将意味着什么，但仍然果断坚定地回答：“北大学术批判有错误，是我的责任。我不能委之于人。”

曹轶欧挑拨说：“你没有责任，是陆平、宋硕搞的鬼。”

陈守一说：“别人可以这样说，我却不能这样看。”

曹轶欧见陈守一态度坚决，大失所望，不敢提出让其与正在隔壁的聂元梓见面的事。

一计未成，再生一计。在策动陈守一“点火”失败之后，康生和曹轶欧便破釜沉舟，选中了权欲熏心、野心勃勃、臭名昭著的聂元梓。他们多次与聂元梓进行密谈。

聂元梓在北大名声很臭，尤其是她在“四清”运动中的过“左”做法，受到了陆平的强烈批评，彭真支持了陆平。在北京市委主持召开的传达中央解决北大社教问题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上，聂元梓受到了批评。虽然迫于形势，聂元梓不得不作了一点检查，但是聂元梓心怀不满，伺机反扑。

聂元梓同康生在密谋过程中各怀鬼胎，很快达成了一笔

“反革命政治交易”，并立即行动起来。

5月下旬，“调查组”亲自出马，召集北大一些人开会，直接授意他们写“往上搞”的大字报。

对于大字报写些什么内容，聂元梓等人煞费了一番苦心。开始的时候，他们准备翻北大社教的案，但感到马上把锋芒指向中央，时机还不成熟，不如先从北京市委下手更容易得逞。这样，聂元梓等人别有用心地抓住宋硕1966年5月14日传达华北局指示的那个讲话，杀气腾腾地叫嚷这个讲话是“捂盖子”，要揭发批判宋硕、陆平、彭珮云。

一连几天，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聂元梓根据曹轶欧的所谓“指示”，同其他几个人一起密商、起草大字报，忙得不亦乐乎。聂元梓联合哲学系的一些人经过反复斟酌，两易其稿，终于大功告成，炮制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恶毒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

于是，一张轰动全国的“第一张大字报”就这样在密谋中出世了。

5月25日下午，北大的一个饭厅东墙上突然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反动的大字报用歪曲事实、截头去尾、诬陷栽赃的卑劣手法，诬陷宋硕5月14日讲话中提出的“现在要急切加强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大字报对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党委副书记彭珮云进行指责，诬陷“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批判

上来”；号召“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攻击中央规定的“内外有别”等纪律是“清规戒律”、“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等等。

显然，大字报已经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这份大字报还气势汹汹地说：

“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①

这张大字报的出笼，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造成中国长达10年大动乱的一个祸根；开了一个肆意颠倒是非、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利用“四大”进行政治诬陷和人身迫害的极为恶劣的先例。

^① 《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出现后,立即引起全校师生员工的极大愤慨。北大广大师生纷纷批评聂元梓。化学系分析教研室和法律系的许多同志首先贴出反驳的大字报,指出这张大字报违反中央“内外有别”的精神,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在大字报贴出的短短半天时间内,全校自发地贴出了1500余张大字报,其中绝大多数对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加以驳斥和揭露。除“笔伐”外,还有“口诛”,1000余人围着聂元梓辩论。

刘少奇、周恩来得知后,分别派人到北京大学了解情况,重申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遵守纪律,使校园秩序稍稍稳定下来。周恩来和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也批评了聂元梓。聂元梓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

在大字报贴出的前一天,即1966年5月24日,北大党委传达了中央、国务院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的5点指示,强调要内外有别。此时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明知中央指示精神,却公然无视党纪国法,就是因为她有恃无恐,自以为有康生为她撑腰。

5月25日深夜12时许,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又派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张贴大字报的有关指示,并传达了周恩来4点补充指示。

周恩来特别指出,作为党和国家的纪律,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聂元梓受到严肃批评,并被指责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

康生得知周恩来的批评后,惟恐揭破其反革命面目,急急

忙忙让曹轶欧要走了大字报的底稿。当“调查组”的人反映大字报贴出后因为聂元梓政治上、生活上有不少问题，太臭，北大反对激烈，当初不应该选她带头时，康生恶狠狠地狂叫：“是王八蛋也要支持。”这露出了康生一副赌棍凶相。

要走了大字报的底稿以后，康生背着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私自将其送给了毛泽东。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本来应该按照党的一贯做法，有步骤地逐级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但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反常事态，使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3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关部门开会，研究加强宣传舆论管理和处理北大出现的新动态。

鉴于宣传舆论工作和北京大学急需加强领导这一具体情况，会议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领临时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版面，并指导新华通讯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由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承先带领华北局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一决定当场由周恩来到隔壁房间打电话请示了在杭州的毛泽东，取得了毛泽东的同意。

5月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名向毛泽东正式发出请示电报说：

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每天的版面，同时指

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五月三十一日即进报馆工作。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内部整风学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但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这种措施是否恰当请速复示。^①

毛泽东当夜批示同意这样作。

毛泽东批准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后,陈伯达即与康生等商定名单,指定《光明日报》的穆欣也随陈伯达前去。后来,穆欣只去了一周多时间,因有其他事情,就不去了。这个工作组成员共定8名,除陈伯达和穆欣之外,还有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钱抵千,《解放军报》的尚力科、朱悦鹏,《红旗》杂志的杨丁和尚未选定的上海两人(其后张春桥由上海派来的是鲁瑛、邵以华——编者注)。

5月31日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国宾馆八号楼召集工作组成员开会。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一部分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只有陈伯达一个人作了讲话。陈伯达在会上讲了中共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的原由,进而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大谈“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下卷,第1016—10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要“夺回被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陈伯达说,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陈伯达在讲话中鼓吹,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陈伯达主张彻底破除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

最后,陈伯达说,工作组要于当天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中共中央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的决定。当晚,工作组即进驻人民日报社。陈伯达说,办报要抓旗帜,社论就是旗帜。

陈伯达在会上讲了很多。在会议结束时,陈伯达说,第二天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他要钱抵千、尚力科、朱悦鹏3人起草。同时,陈伯达确定,就把他当天的讲话整理出来,作为社论的内容,当晚改定,次日见报。

当天下午,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局及首都各主要报纸负责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成员到会。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会上宣布:“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邓小平还当场宣布了工作组成员的名单。

在讲话中,邓小平要吴冷西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最后,邓小平要求,首都各新闻单位都要支持工作组把《人民日

报》办好,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支援给《人民日报》。邓小平说,中央工作组的任务是领导《人民日报》的宣传工作,工作组要把报纸宣传管好。

邓小平讲话结束后,康生接着讲了将近一个钟头。除了关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关于阶级斗争方面的问题以外,康生对《人民日报》大张挞伐,并继续严厉追问删19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社论是何居心,把会场的气氛搅得异常紧张,全场鸦雀无声。大家只得耐着性子听完他的“训斥”。《人民日报》的同志感到特别不是滋味。

陈伯达在会上一句话没有说。会议在下午五时左右结束后,陈伯达即带领工作组前往人民日报社,完全不理睬邓小平在怀仁堂“要吴冷西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勉励报社同志办好报纸的话。

陈伯达等人公然违背邓小平关于“中央工作组的任务是领导《人民日报》的宣传工作”的指示,立即夺了吴冷西和报社编辑委员会的权。

后来,陈伯达还得意地说:“我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

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人民日报社是全国第一个被夺权的单位。这对于人民日报社的同志,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有的同志说:“对《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记沉重的闷棍。”

5月31日当天晚上,陈伯达带领王力、关锋前往人民日报社上班。到达报社后,陈伯达让穆欣专就版面编排问题,根据他的安排跟报社夜班编辑部联系。而陈伯达本人和王力、

关锋以及其他一些人关起门来，修改钱抵千等人根据他在钓鱼台国宾馆讲话整理的社论稿。

社论初稿的题目原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审定时改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伯达并且规定社论标题要通栏，字要用楷体，这篇社论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标题。

陈伯达在进驻人民日报社之后，连夜主持起草并且亲自拟定标题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没有报告中共中央，擅自将其发表在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社论中宣称：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1/4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

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①

社论说:“中国解放 16 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最顽强的反抗。

社论按照林彪 5 月 18 日讲话的调子,竭力鼓吹“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的夺权主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社论说: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

^①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报》,1966 年 6 月 1 日。

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晌，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①

社论还煞有介事地分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区别。

社论说，在资产阶级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是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准备的，搞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尚且要

^①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

经过多次的反复,经过多次的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从思想准备到夺取政权,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结束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可能幻想资产阶级会乖乖地听任无产阶级剥夺他们的一切特权,而不妄想恢复他们的统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必然还要像列宁所说的那样,“以十倍的疯狂,来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

社论还说,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所作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他们所谓的“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争夺群众,争夺年轻一代和将来一代。

社论说,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到夺得政权的时候就结束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条件,才能为这种“文化革命”开辟最广阔的道路。

社论进一步说,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

另外,社论还说,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消除旧社会的恶习,这些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后的实践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么,见效就有可能快起来。

社论认为,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少数剥削阶级服务的,它只能由少数人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是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一致的。所以,它能吸引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参加。资产阶级的启蒙人物,总是鄙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社论说,资产阶级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也还是这样。

社论鼓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像”。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

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社论煽动说,中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惊慌和混乱”。他们一会儿想入非非,说“文化大革命”表明了中国一代“和平演变”已经有了希望;他们一会儿又悲观失望,说一切消息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还是十分巩固”的;他们一会儿又表现出无限迷茫,说要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随时作出准确判断的真正的“中国通”是永远不可能有的。

社论还说,这些胡思乱想总是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他们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

社论最后发出号召:“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场文化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在各个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①

事实上,这篇社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也可以看做“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

在中央派出工作组到达人民日报社的第二天,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的当天,在杭州的毛泽东看了康生送给他的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底稿。毛泽东看后在批语中写道:“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

^①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

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①

下午4时，康生、陈伯达急忙下达命令，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全文播放这张大字报。后来，毛泽东在1967年2月3日同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客人会谈中谈到这张大字报时说，“到6月1日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播发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大字报责难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说“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

大字报播出后，康生如释重负。他在北大三十楼和三十二楼之间的空场上，眉飞色舞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一种“胜利的喜悦”溢于言表。聂元梓等人“弹冠相庆”，“沉浸在胜利之中”。聂元梓终于向陆平报了一箭之仇。

北京大学的广大师生从广播里听到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后，感到非常意外，更理解不透聂元梓等人为什么敢不顾中共中央“内外有别”的指示。他们因为不知内情而愤愤不平。

有些师生喊出“不要盲从”、“在三小时内把中央广播电

^① 毛泽东：《关于播发〈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大字报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台的气焰压下去”的呼声，校园里马上又贴出了许多驳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其他一些高等院校的人也到北大去观看。

在一天内突然向全国发表这样两篇东西，不但一般干部和群众感到惊讶，也出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料之外。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听到电台广播后，打电话询问周恩来，为什么这么大的举动事先不给个通知。周恩来说他也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

6月1日晚上，陈伯达和工作组研究《人民日报》6月2日的社论和主要版面安排。陈伯达听说北大秩序很乱时，决定亲自去看看。王力、关锋劝陈伯达不要去，由他们去看看再说。

王力、关锋从北大回到报社以后，就开始宣扬北大的形势“好得很”，“哪有什么乱，完全是一派革命大好形势”。他们和陈伯达一起连夜炮制了一篇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与《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一并准备刊登在6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

这篇文章把陆平、彭珮云等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文章诬陷陆平等人所代表的组织是“反党集团”。这篇评论员文章以造谣诬陷、无限上纲的手段煽动全国动乱。

文章说，凡是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

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的,不论打着什么旗号,不管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

其后,毛泽东于8月5日在刊载这篇评论员文章的《人民日报》上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①

在得知北大秩序混乱的消息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3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有关负责人商量决定,并报毛泽东批准同意,派张承先率领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领导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张承先此时准备调任国务院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因为还没有到职,正好就先去了北大。6月1日晚上十点多,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派出的第二个工作组进驻北大。

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的通栏大标题,《〈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为副标题,在第一版发表了大字报,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陈伯达还同时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

^① 毛泽东:《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加写的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鼓吹中国正“处于触到人们灵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之中”，“这是触到人们灵魂的问题，也是触到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

社论告诫人们要抓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论号召人们“要作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受其影响，“狠触灵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类的新鲜词，成了这一时期的口头禅。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运动轰然而起。千千万万封用以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似地从中国四面八方飞进北大。全国各地报刊连连登载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在全国燃烧起来。

北京大学顿时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圣地”。首都各学校、各机关、工、矿企业单位成千上万群众涌向北大，声援聂元梓。北大校园人山人海。于是，聂元梓也成了显要的“文革”明星。她每到一处，总是被数以千计的追星者簇拥着，渴望听到聂元梓对“文化大革命”的高见，一睹这位“传奇式人物”的风采。

狂热的人们使北大鼎沸了。继北大“踢开党委闹革命”之后，全国各地的高校也学习北大的“榜样”，“踢开党委闹革命”，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迅速泛滥，使学校陷入瘫痪。局势呈现无法控制的势头，天下终于大乱。

对此,毛泽东颇为满意。毛泽东说:“六一公布大字报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大革命就非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只有靠革命师生。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

毛泽东青年时期也曾带领青年学生造了校长的反,看来他也想让年轻人重温他那时候的生活,以此作为“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

后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到京串连的学生时不打自招地说:“这张大字报揭开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且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种”。这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说,“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6月2日,毛泽东还改组了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这样,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就成为第一个被“文化大革命”冲垮的党组织。

陈伯达自从进驻《人民日报》后,将鼓动“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文章在头版上一篇接一篇地发表。此后,《人民日报》于6月4日发表了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和《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公开点出“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是“修正主义者”,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不指名地公开批判了《二月提纲》。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公布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

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①

同时,《人民日报》还发表毛泽东批准的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②

6月2日下午和3日晚上,陈伯达两次到北大看大字报。这个自诩为“小小老百姓”、实则是“大大野心家”的陈伯达,对于北大革命师生不怕高压、反对聂元梓大字报、支持校党委的正义行动,极为仇视。

陈伯达看完大字报回到报社后,立即“指示”工作组写了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发表在6月5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

这篇反动的社论,大翻北大社教运动的案,把贯彻中央指示、纠正北大社教运动错误的国际饭店会议打成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将攻击矛头指向了中共中央和邓小平。这就使全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愿起来造所谓“走资派”反的群众,顶着“保皇派”、“保皇党”的帽

^① 《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人民日报》,1966年6月4日。

^② 《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人民日报》,1966年6月4日。

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摧残,造成了群众之间严重的对立和分裂。

大字报广播后,特别是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康生一伙更是“欣喜若狂,弹冠相庆”。康生在一次会上说:“大字报广播后,我感到解放了。”聂元梓从这张大字报中捞到了不少政治资本,因此,她对“顾问”康生感恩戴德,急忙给康生写了一封“感谢信”,肉麻地吹捧康生,而且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为康生同志争气”,不打自招地供认了他们的反革命勾结。

由于学校混乱局面的出现,为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文化大革命”运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6月3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会议在福禄居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人不很多,除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3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外,就是各方面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工交口薄一波,财贸口李先念,农林口陶鲁笳,军队方面叶剑英,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办公厅汪东兴,北京市委李雪峰、郭影秋,还有刚从中南局第一书记岗位上调到北京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陶铸,以及一些有关负责人。

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首先由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代表新市委汇报。李雪峰在谈了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的情况之后,讲了准备向学校布置的8条要求:大字报要贴在校园内;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游行不要上街;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不准到被

揪斗的人家里闹；不准打人、污蔑人；注意保密；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李雪峰在会上提议，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他的这一提议被认同。

经过一番讨论，会议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即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到各学校贯彻这8条要求。大学工作组成员由中央组织部抽调，中学工作组成员由团中央抽调，然后由北京市委统一介绍到各学校。

会议决定，哪里出事，就派人到哪里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的快。邓小平在会上说，8条要求传达要快，开个10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

刘少奇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把学校很快地组织起来，走上正轨。

会议结束后，会议精神迅速传达下去。北京市委开始向各学校派出工作组。在此期间，刘少奇、邓小平多次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因此，这8条要求没有形成成文的指示，只是被口头传达下去。

根据这次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周恩来起草了关于毛泽东批准的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电讯稿。毛泽东看后表示同意。电讯稿于当天由新华通讯社播发。

6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等人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关问题。

陈伯达在会上提出，撤销《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的领导职务。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同意。

自从报纸公布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的消息后，北京市大多数学校的青年学生一面把本校领导当做“黑帮”来攻击以致批斗，一面成群结队地涌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所在地，强烈要求派工作组进校。

从6月4日起，北京新市委仿效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经验，向部分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

刘少奇和邓小平想通过派工作组进驻，达到保持党对运动领导的目的，同时制止混乱，恢复秩序。他们对工作组的工作既支持又关心，还分别直接接见工作组人员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

在6月4日接见驻北京师大附中工作组的谈话当中，针对一些学生批判老师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问题，邓小平这样说：

如果（老师）真有学问，还要团结他们。女附中数学、物理都不错。好的学校热火朝天，名气大，有一套。如果没有好教师，也就教不出好学生。要善于分析。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人没有？打人是没本事的，是没理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帮，有些不是黑帮。讲错了话都

是坏人,那就没有好人了。材料不够,不要轻易开斗争会。不要搞变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有些搞错了,将来赔礼都赔不完。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党的)总支中总有些好的嘛,校长、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把党都搞垮了怎么行?把团搞垮了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嘛。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①

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思想上和原则上都不认同“造反”的理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意图依然毫无领会。作为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邓小平和刘少奇不自觉间在运动问题上“已经落伍”,已经跟不上甚至已经远远脱离了毛泽东的“步伐”。

许多大学、中学的领导班子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在青年学生的狂热冲击面前已难以再行使领导职能。鉴于无政府状态迅速蔓延,混乱局面日趋严重,为了使局面不致失控,北京市委在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后,从6月5日起加快派遣工作组的进度。

到6月中旬,北京地区的大多数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先后有工作组进驻。中共中央在刘少奇主持下并没有作出过普遍派工作组的决定,更没有发出这方面的文件。但迫于面临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失控的局势,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中央部、委,纷纷效仿北京市的做法,陆续向本地区、本系统的一些单位派出了工作组。

宣传、文化系统在被看成有一条“黑线”在那里“专政”,所以中央书记处6月6日决定向中央宣传部派出工作组。新调任的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萧望东(原南京军区第二政委——编者注),主持向国务院文化系统各单位派出由军队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其中,从解放军总政治部抽调的300多名干部参加工作组是经林彪同意的。

工作组开进学校,竭力组织学生有秩序地参加运动。但被《人民日报》自6月1日开始的一篇篇社论、文章、报道煽动起来的青年学生,头脑已极不冷静,总想挖出一批“黑帮”斗争一番。没有多久,学校的正常秩序已完全被打乱,学生不上课,教师不授课,党团组织生活已无形中停止了。混乱局面迅速向社会扩散。

局面混乱,难以驾驭。这种状况当然不能让它长此下去。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差不多一两天就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研究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在这次会上,刘少奇提出,这次“文化大革命”要善于领导,敢于领导。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要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避免被动领导而落后于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清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要放在这上面,不要转移目标、视线,不要分散目标,要划清界线,明

确政策。知识分子中有“左”有右，因此要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但是，毛泽东不在北京，许多重大政策确定不下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3位常委经过商量，决定去杭州毛泽东那里开一个会，研究一下运动的指导方针。

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3位常委乘专机飞抵上海，从上海乘车到杭州。

当天下午，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毛泽东住的刘庄宾馆向毛泽东作了简单汇报。当刘少奇等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时，毛泽东要刘少奇等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同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的，还有陶铸、陈伯达、康生等人。

6月10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陶铸，还有根据毛泽东意见增加的陈伯达、汪东兴和6个大区的书记李雪峰、宋任穷、刘澜涛、魏文伯、王任重、李大章。陪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到杭州的康生也参加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朱德、陈云没有被通知到会，林彪请假。

这两次会议，完全是务虚性质的漫谈，议论的内容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方方面面，话题换了一个又一个：运动情况，教学改革，提拔年轻人，报纸版面，点名批判程序，工作组，农村生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等。

在谈及公开在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时，周恩来提出，专政机关只通报，不登报，改组的选几个登，不然一下子外国就

知道了。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文化革命是政治斗争”等原则性看法,谈到运动可能要进行半年时间,但对当前运动应该怎样进行没有提出具体意见。

刘少奇也谈了他的设想。刘少奇说:“学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连串的问题;城市工厂和农村的文化革命运动,是不是同‘四清’结合起来搞。”^①

会议对运动的计划、安排等等没有展开具体讨论,因而也没有形成明确的结论。

对于工作组的问题,会议没有专门讨论。只是毛泽东在议论中讲到,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但这时北京各学校的工作组基本上已经派出。

在此期间,局势再次告急。所有学校的领导人都受到了冲击,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学校还设立了“斗鬼台”。校领导和一些教师、学生被打伤、打死和自杀的事件不断发生。许多受害者家属纷纷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赶快派人下去调查。有的人在信中表示受到了不能忍受的人格侮辱,这种事在封建社会也属罕见,并强烈呼吁:“士可杀不可辱。”有的人在自杀前留下条子说,“这是多么痛苦的时刻”。有的人问“这是文化革命,还是革文化的命?”打击知识分子,“国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

不会得到好处的,但愿这不是中共中央的政策”。

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回到北京,开始贯彻杭州会议精神。因为周恩来按照已一再推迟的计划,要在6月15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指导运动的责任就落在刘少奇、邓小平两人身上。

此时,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同大多数干部群众一样,仍怀有许多美好的期望,希望通过这场运动能够消除党内存在的阴暗面,改革不合理的体制。刘少奇曾对家里人说:

“过去中央千方百计想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杜绝各级干部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化革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个全人类当然包括地、富、反、坏。无产阶级毫无自私之心,所以胸怀最宽广。不解放别人,不把一切坏人改造成好人,不把一切消极因素改变为积极因素,无产阶级自己也得不到解放。”^①

不久,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还说,这次“大革命”

^①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缅怀刘少奇》,第4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版。

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有了这个“大革命”运动,可以来个突变,来个大变化。

肩负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责任的刘少奇、邓小平首先是把杭州会议上比较确定的几件事贯彻下去。一是大学、高中停课半年,集中精力搞“文化革命”。这是会上定了的。二是关于“文化革命”的大体安排,这是各级组织都关心的问题。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曾说过:“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6月13日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说,以前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

《通知》中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联合通知,宣布1966年高等学校推迟半年招生,实际上是让大、中学生停课半年搞运动。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人民日报》,1966年6月18日。

同一天,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的文件,以便各地对运动的大体安排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材料。

6月14日,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的精神。在会议上,刘少奇紧跟毛泽东“越乱越好”的想法,说中学工作组是团中央的,有的是好的,能与学生“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应该撤回。刘少奇甚至说:“工作组派下去被人赶回,证明他不行么!乱就好么!”^①

在刘少奇看来,比较好的工作组,就是能够有效地对运动实施领导的工作组,对这样的工作组,他是坚决支持的。他认为,像“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想像的。既然那些学校的领导瘫痪了,那么,就只有派工作组去接替,维持正常秩序。

此后,刘少奇、邓小平等又多次在福禄居会议室或怀仁堂后厅召集会议,听取“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尽力按照杭州会议上毛泽东的一些讲话精神,既引导群众参加运动,又不使社会陷于混乱。

为了增加感性的知识,刘少奇还在深夜先后到北京大学校园看了看张贴的大字报。隔了一天,他又到清华大学看了一次。两个学校的大字报真可称得上是铺天盖地,不但专门

^① 黄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卷,第136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搭起来的一排排芦席棚上贴得满满的，就连那些位置稍为适宜的楼墙外面，也横七竖八地刷上了大标语。在苍白的灯光下，各种红的、黄的、白的、文字的、漫画的大字报连成一片，被风吹得簌簌作响，形成一种独特的景观。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如其来的运动狂潮，刘少奇、邓小平的做法，是正常的决定，也是正确的决定。他们和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希望学校早点恢复正常，希望学生早点儿回去上课，希望首都早点儿恢复平静。

然而，刘少奇等人没有想到，他们的做法，根本就是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的。而且在暗处，“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马抓住工作组在工作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正在策动和支持学生的“造反”运动。对于江青等人来说，只有动乱的局面，才是他们显示身手的大好舞台。

工作组进校后，受到了大多数师生员工的欢迎。但是，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也与一部分响应《五·一六通知》的号召、起来向党委“造反”的群众和基层组织之间发生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并由此引出了一系列事件。

北京大学发生了“关门”事件。

从6月1日以后，北大校园就熙熙攘攘，一片混乱。早在6月7日，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就规定，校外人员不得自由出入北大校门。北大校门口也贴出公告，大意是：凡校外单位声援的代表或队伍，一律在学校门口接待室接待，请不要进入学校内部。校内大字报正在整理，暂停开放。造反者对此大为不满。后来，毛泽东对此作了严厉批评。

同时，清华大学也发生了“六·七”事件。6月7日，清华

造反派在这天贴出大字报,反对时任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蒋南翔和校党委。绝大多数党员和党外群众约一万人气愤地与六七百名造反者辩论。北大造反者不顾工作组的劝阻,到清华支持造反者“揭露”蒋南翔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班开学典礼上颂扬邓拓的“罪行”。这又引起清华学生与他们的辩论。清华大学派人把北大造反者护“送”出校,又被说成“押送”出校。

几天后,中央书记处决定蒋南翔停职反省。清华造反者欢呼雀跃。广大党员和党外群众大惑不解。

6月8日,北京邮电学院赶跑了第一个工作组之后,各校几乎都出现了反工作组的的大字报。

6月12日,南京大学造反派组织万人大会,批判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污蔑他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

对此,工作组、广大党员和党外群众表示不满。根据康生的意见,《新华日报》在6月13日对这次大会作了肯定的报道。广大群众包围了《新华日报》社,并且加以斥责。南京大学校内开展了关于《新华日报》报道的大辩论。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意见,江苏省委作出了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高度赞扬“罢了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官”,并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切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社论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

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①

6月18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一些学生乘工作组正在集中开会时,擅自设立“斗鬼台”、“斩妖台”,把40多名所谓“黑帮”、“反动学生”揪到校园批斗。学生们强迫这些人站到所谓“斗鬼台”、“斩妖台”上,给他们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脸上涂上墨汁,并对他们施以罚跪、扭打、揪头发、撕衣服等种种人格污辱。

工作组组长张承先闻讯急忙赶到现场,严肃批评了这种目无法纪的乱批乱斗行为,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蔓延。张承先并明确指出,这种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的。

当天下午,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将这一事件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编印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呈报给北京市委。张承先亲自向北京市委作了汇报。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雪峰立刻将《简报》转呈给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常委。

当天晚上,张承先在全校广播大会上讲话,指出上午发生的事件“有害革命”。他呼吁“北大师生擦亮眼睛,不要上敌人的当”。驻北大工作组又规定,不许进行校内外串连。刘少奇对北大工作组的做法极为赞赏。

继北京大学这次事件后,清华大学也出现公开鼓动驱赶工作组的情况。种种迹象表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学生反工作组。这部分学生又在互相串连,酝酿采取更激烈的

^① 《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人民日报》,1966年6月16日。

行动。许多学校出现尖锐对立的两派，局面似有进一步失控之势。

事态越来越严重，局势面临失控的危险。刘少奇对家里人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显然，如果听任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6月1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工交党委第一书记、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去清华大学，耐心地帮助清华大学20岁的学生、造反派代表蒯大富。蒯大富与薄一波进行了辩论。

同一天，刘少奇派王光美作为校工作组顾问，去清华大学观察动态，及时反映学校运动的情况。

严峻局势在继续。6月20日凌晨，北京地质学院党委和一些干部、教师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指责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提出“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口号。党委站出来公开指责工作组，为造反者所欢迎。造反者举行了支持他们的示威游行，多数党员和党外群众不以为然。陶鲁笳、何长工（时任地质部部长兼党委书记——编者注）指示工作组“要沉着顶住”。

同一天，北京师范大学也发生了“六·二〇”事件。这天清晨，谭厚兰等17人贴出大字报《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反对工作组组长孙友余。之后又有3人贴出大字报《郭影秋你是什么人？》，就北京卫戍部队准备在暑假中暂住人民大学一事质问郭影秋：“此举是否彭真的阴谋？”

孙友余作广播讲话，澄清了事实，批评了错误意见，认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也就是反对中共中央，提出了

“反对干扰”的意见。中午，又有人贴出了《孙友余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

有鉴于此，刘少奇于6月20日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及其批语转发全国各地，肯定了驻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①

这时，乱斗乱打等违反法纪的行为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文件的发出，使这种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工作组得到支持。但工作组与造反派之间的对立由此变得更加尖锐。

当天下午，刘少奇把驻北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成员找来，要求他们组织师生讨论学校里出现的反工作组大字报，发动群众回击反工作组势力。

刘少奇对工作组负责人说：“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说你是黑帮，给你贴了十几张大字报。不要紧。大字报出来，证明内部意见不一致嘛，证明他们对运动不满，学生之间不团结嘛。”“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②

刘少奇还说：“当前主要问题，是不知怎么搞，你们和大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下卷，第1024—10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家一起搞、一起学嘛，大家讨论，走群众路线。”^①

当天晚上，武振声、袁智平代表新市委接见北师大师生，作了3点指示，即要求“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此后，有少数反工作组的学生受到批评，有的甚至受到批判斗争。

6月21日，何长工、胥光义（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编者注）、李人林（时任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编者注）到地质学院讲话，批评少数人闹事和围攻工作组，指出工作组是革命的。拥护党委和工作组的一派也示威游行。这被造反者叫作“六·二一反扑”。

同一天，刘少奇、邓小平再一次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讨论后，刘少奇对几个问题作了指示。刘少奇提出：

要划一个界限，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六月三日公布北京市委改组以前听市委话的，都一律不追究，这个问题由北京市委起草一个文件报中央批转全国；在运动中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党委烂掉的，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有的学校出现赶工作组、向工作组夺权，要夺档案、枪支、广播这些权，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好的工作组也可以撤走，但是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大部分党委是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2—6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

好人嘛，以文化革命为纲，但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要注意反革命分子有的用“左”的面貌出现，有的用右的面貌出现，我们利用大字报，反革命也会利用大字报；我们要用《二十三条》的精神，禁止打人、污辱人和变相的体罚。^①

邓小平也在会上就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会议精神逐级贯彻下去，学校中一些基本的教学和工作秩序开始恢复，无政府主义现象得到较为有力的遏制，社会治安开始好转。

但是，头脑狂热的蒯大富仍然在6月21日的一张大字报上写下批语说，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对此，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王光美明确指出来“蒯大富要夺权”。薄一波打电话给工作组，指示反击。之后，清华造反者又在工作组召开的声讨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组长叶林讲话，给以批驳。叶林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会场秩序一片混乱。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下卷，第10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为了打击蒯大富的嚣张气焰,在王光美的建议下,6月26日,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在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游行,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等口号。

6月28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定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后来,刘少奇在7月5日的会议上又提出要制定“文化革命”的规划,中学的由团中央起草,大学的由北京市委起草,一周内起草出来,提交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邓小平还提议8月份完成计划进度的三分之一。

“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对全国的工业、交通影响很大。运动开始后,生产形势不好,事故增多。钢、钢材、木材、煤的产量下降,质量下降相当突出。基本建设在上半年只完成全年任务的36.5%,大大低于原订计划。

刘少奇、邓小平把薄一波、陶鲁笏等主管工业交通生产的负责人找来,讨论如何解决这一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问題。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把“文化革命”的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和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运动的部署,分期分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并由上级派工作组领导。

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联名向毛泽东请示,要求发出根据这一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刘少奇、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一齐动

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

刘少奇和邓小平还在信中说,近期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好,钢、钢材、煤的产量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完不成。

刘少奇、邓小平在信中建议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教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交、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即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编者注)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

刘少奇、邓小平送审的《通知(草稿)》指出,各地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作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草稿要求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单位,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建设工作。

7月2日,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通知》。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运动开始向有领导有计划的方向发展。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极力反对。他们一面挑动学生同工作组对立,一面在一些场合对工作组提出种种非议,实际上是要取消工作组,制造更大的社会混乱。

早在6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建议提出,让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的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在最必要的地方、最必要的时候,工作组可以由上级指派。“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一建议间接地表达了他们取消工作组的意见。

而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却不同意这样做。因而，对于工作组的问题，双方存在分歧，继而产生矛盾，并且在逐渐加深。

7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派曹轶欧等人到北师大调查“六·二〇”等事件。次日，“中央文革小组”严厉指责孙友余，要求他向北师大全体师生员工做深刻检查。孙友余拒绝了检查。

几天后，“中央文革小组”撤销了孙友余工作组组长的职务。

与此同时，康生等人还要为蒯大富翻案。7月中旬，康生找到正在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大闹。刘少奇斥责康生不了解情况。

康生却把收集的材料往桌子上一摔，大声叫道，“不许蒯大富上告中央，起码是不符合国法，违反宪法的。”而江青又派王力、关锋去看望蒯大富，向工作组示威。

同时，陈伯达在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汇报会上，几次对工作组问题提出非议，但遭到大多数参加会议的领导人的反对。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多数人的意见，“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被否决。

这样，刘少奇、邓小平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同“中央文革小组”围绕工作组等问题，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加深。不少学校内，在拥护工作组还是反对工作组问题上分成两派，尖锐对立，驱赶工作组的现象也愈来愈多了。

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提出撤回工作组的建议被刘少奇等人否定后，江青等人一面继续煽动学生反工作组，将矛

头指向刘少奇等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一面收集材料，准备上告毛泽东。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在听取汇报并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一些材料后，毛泽东对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发展情况表示不满。毛泽东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压制。但是，毛泽东最初没有在工作组问题上表态，也没有提出要撤出工作组。

7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其中提出“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此仍然表示同意。

这时，刘少奇仍然继续坚持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和各项日常工作。

从毛泽东7月19日（即回京的第二天）至7月23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汇报会”。7月19日，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提出工作组问题。陈伯达说，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组“整学生”。

然而与会多数人仍表示不能撤出工作组。

刘少奇指出，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对他们要求不能高；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要总结工作经验；学生中间认识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可以再辩论一个时候，取得经验再向“黑帮”进攻。

邓小平说，有的机关和学校，不派工作组可以；有的要夺权的，就要派工作组。工作组主要是起行政和党委的领导作

用,因此是否统筹考虑,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中央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留下来代理党委工作。

7月22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

会议对高等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指示。关于斗争方向问题,会议指示主攻方向是“当权派”;斗争方法有“文斗”和“武斗”,会议主张“文斗”,斗争之前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关于组织队伍问题,会议指示,队伍首先要统一思想。会议还指示,在运动过程中,不要“戴帽子”,不要限制人家的自由。

在会上,大家对工作组问题又发生争论。刘少奇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学校斗争的方向有3种:一种是斗“当权派”,一种是斗工作组,一种是斗群众、学生。

有鉴于此,刘少奇说,各个学校特点不同,不要采取和北大一样的办法,要区别对待。刘少奇还建议北京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班、系、校),北京市召开代表大会,中学召开师生代表大会。

邓小平在会上说,要教会工作组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组恐怕不行。

后来,江青讲到这次会议的情况时说:“二十二号晚上胡克实同志汇报说‘已经走上正轨了’。这次汇报会雪峰同志参加了。我们的组长、顾问没有发言权,讲一句话就被打断。这次汇报会共用了五个多小时,薄一波、陶鲁笳却讲了三个多

小时,他们的锋芒完全针对学生的,他们有充分的发言权。”^①

江青的说法从反面印证了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的批评和抵制。刘少奇、邓小平在这次会上仍坚持“多数工作组是好的、工作组不能不要”这一意见。

周恩来针对工作组问题,于7月24日晨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信中说:

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

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的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

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

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下卷,第10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② 周恩来:《关于派工作组——致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书信选集》,第5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

但是,这种意见同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大相径庭,加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片面汇报,终于使毛泽东得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的结论。

7月24日、25日,毛泽东先后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正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区中央局书记谈话,再次对前一段的运动情况提出批评,提出要撤出工作组。

毛泽东说,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搞得快一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日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包括张承先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

7月24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在次日接见中央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起坏作用”,并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毛泽东还说,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群众革命”。毛泽东批评中央个别领导人说,“天天忙于日常事务,不下去跑,没有感性知识,怎么指导运动?”

在毛泽东已经作出决断的情况下,刘少奇等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服从了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为工作组定了性后,此前决定派工作组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此问题上理所当然地“犯了错误”。

7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陶铸传达了

毛泽东两次谈话的内容。会议最后决定撤销工作组。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7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中说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7月29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1万人参加的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在大会上，李雪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这次万人大会上以中共中央名义宣布撤销派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讲话。周恩来、刘少奇也先后发表了讲话。他们在讲话中都说明派工作组是中共中央决定的，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

邓小平说：“必须说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有的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①

继邓小平讲话之后，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

运动之所以出现由开始时的轰轰烈烈转为中间的冷冷清清的曲折，一是因为我们做领导的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有时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估计不足，就是怕乱，因为青年人批评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起来,辩论和斗争的界线就很难定。二是因为对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仓促地就决定了到处派工作组。但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主观愿望上是要搞好的。就是因为工作方法老一套,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嘛!不是主观上一定要做得不好。^①

周恩来还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中要“一斗二批三改”3大任务的指示。他还就工作组撤出后学校中的“文化大革命”的机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接着,刘少奇在会上讲话。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②

刘少奇还说,工作队员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学校里面作的,他们“犯了错误”或者作了好事,是在学校里面作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大家都清楚。当然,各学校工作组的工作,不会是一样的,或不完全一样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或“犯有严重错误的”。

刘少奇还在讲话中建议:“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因为相互间有各种问题要讨论,有的时候要辩论。对牛鬼蛇神用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3—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

论的办法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在同学中间有不同的意见也要贴大字报,也要放手发表意见,对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要发表意见,也要讨论。讨论起来就要辩论”。^①

刘少奇认为,辩论会和斗争会很难分开。为此,刘少奇提出,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刘少奇说:“辩论中间发生不同的意见,发生各种事件也是完全可能的。你今天是多数,经过辩论之后,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在另外的问题上你又是少数。不只是错误的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②

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时,刘少奇根据个人的认识指出: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主要的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际中间来学会革命。”

“怎样革命,现在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更具体的方法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

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两个月,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又不上课,党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不上课干什么?干革命,专门干革命。在这半年中间你们可能取得很大的进步。我们也可以跟着你们学习一些。”^①

当大会快结束时,毛泽东亲临会场,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

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与会代表。会场立时沸腾。经久不息的掌声和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使会议开始时那种极端压抑、沉闷的气氛一下子变了,大会气氛骤然生辉。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浑歌声中,毛泽东率先迈开大步离开会场。

在这次大会以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相继撤销了工作组。

由于北京和全国一些大中城市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纷纷仿效北京大学的做法,开展“文化大革命”,贴大字报,揪斗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所以许多学校的党政干部被诬为“黑帮”、“三反分子”,一批教授专家、教师被诬为“牛鬼蛇神”,遭到批斗和迫害。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彭康,浙江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刘丹,重庆大学党委书记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下卷,第1029—10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思群,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郑州大学副校长郭晓棠和各地一批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中等学校的支部书记,相继以“镇压革命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罪名,被撤销党内外职务,或被停职反省。

随后,中小城镇和农村的各级学校,也停课搞运动。此后,各学校行政领导及党、团组织陷于瘫痪,多数由上级派来的工作组领导运动,有的由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编者注)领导运动。

接着,高等教育部部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被批斗,教育部部长何伟也被批斗。一些副部长和司、局长陆续被批斗,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及其所属单位的业务工作陷于停顿。各地教育行政机关也出现类似情况,全国教育行政机构首先瘫痪。

由于各学校的党委已经瘫痪,工作组撤走,原先设想“文化革命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也因为群众分裂成两派而成立不起来,或不能发挥多大作用。这些使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学校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并迅速蔓延到社会。

然而,这在毛泽东看来,还“没有乱起来”或者说还“不够乱”。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仍不满意。他认为前一段运动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走了弯路”,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把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压了下去”。因此,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使“文化大革命”更加合法化,以便排

除“阻力”，重新把运动“全面发动起来”。

毛泽东深切感到运动有阻力，他自己的一套举措不能畅通，“文化大革命”有可能被人为地压下去，这就促使这位有着巨大意志力和富于迎接挑战精神的伟人下定决心，非作进一步的解决不可。

为了使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至“夭折”，毛泽东决定采取更为有效的大动作，最终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扫清”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障碍”。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决意通过召开党的全会使“文化大革命”更加合法化。

为了确保这次仓促召开的中央全会能够实现毛泽东预想的意图和效果，从7月27日开始，中共中央先举行了几天的预备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毛泽东7月24日、25日的讲话，以期从思想上为大会统一认识。

预备会议开得并不轻松。不出毛泽东意料，会议代表的意见并不像以往历次党的会议那样统一集中，中央领导层内对毛泽东规定的大会事项依然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的礼炮声中正式开幕。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到会。“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首都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包括聂元梓等——编者注）47人列席了会议。这是以往中央全会没有过的事情。

除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与会人员被编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小组。

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在开幕会上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开五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三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①

毛泽东讲完开场白后，邓小平宣布会议议程，即：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讨论和批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央政治局在国际国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通过会议公报；追认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任命的決定，即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和政府职务，增补陶铸和叶剑英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決定，补行党章规定的手续。

随后，刘少奇作为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一线领导人，向全会作报告。在报告的前半部分，刘少奇简要叙述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央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在国内国际问题上所采取的重大措施。报告的后半部分，刘少奇着重谈了一下“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工作。

在谈到工作组问题时，刘少奇叙述了陈伯达提出意见、但多数人不同意他的意见的经过。刘少奇说：

陈伯达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下卷，第103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①

毛泽东在刘少奇讲工作组问题的过程中频频插话,严厉批评工作组,说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

会议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接着,刘少奇检讨了派工作组的问题。刘少奇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②

^① 黄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卷,第1370—137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② 谢忱:《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回顾与思考》,上卷,第452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9月版。

毛泽东还在插话中指责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陈伯达也在开幕会上讲话。陈伯达主要讲了两点：一是工作组“做了坏事”；二是“官做大了不要脱离群众”。

这就是会上第一天的事情。

然而，由会下的事情辗转而至的一系列事件，在这一天以及随后的几天内突如其来地冲击着全会。面对着这些独具特色的“神兵天降”，与会的大多数同志纷纷感到困惑不解，无所适从，从而导致了会议在一种诚惶诚恐似的气氛中开始了。终于，中共中央的全会出现了异常。

就在大会开幕的当天，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附上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

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成立于1966年5月29日，据发起者事后回忆，这个组织的成立纯属偶然。

在国内一派炽热的政治气氛当中，5月29日晚，十几个来自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在北京西郊圆明园旧址的废墟上举行集会，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政权”。在确定小组的名称时，有人建议叫“向日葵”，还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是大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取意为“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6月1日，在毛泽东批准广播北大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同一天，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大字报表示“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3个字后面有100多人签了名，名列其首

的是清华附中高年级学生卜大华。“红卫兵”的名字反映了这一时期青年学生的狂热而又纯洁的心态。尔后,北京各中学纷纷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7月4日,清华附中又贴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其中引用毛泽东早在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无论怎么说,工作组是反对这两张大字报的。

7月2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请江青把两张大字报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这样写道: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

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①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就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组织回了这封寓意深刻的信,并在大会上印发,显然有他战略上的考虑。

鉴于预备会议上的种种“阻力”,毛泽东决意通过“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推动运动朝他所预想的方向发展。此时,全国各学校已普遍出现揪斗工作组的现象,并开始冲击派出工作组的各党政机关。这封信对红卫兵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和支持”。

^① 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87—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王任重于8月3日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到钓鱼台国宾馆,让他们看了这封信。红卫兵们顿感热血沸腾,惊喜万分。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也由此扩展到全国各地。

8月2日和3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大会发言。在发言过程中,有的同志就工作组问题勉强地作了自我批评;更多的同志在发言当中谈了对工作组的认识,实际上表示对撤出工作组并且为此大动干戈想不通。

8月2日下午,周恩来、陈毅、李雪峰等人讲了话。周恩来在6月中旬至7月初因出访欧洲而不在国内,对工作组问题参与比较少。但一开始决定派工作组和后来讨论撤不撤工作组,他是参加了研究的。

所以,周恩来也在会上主动承担了责任。周恩来说,对于工作组问题,常委,特别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几个人都要对派遣工作组负责任。

周恩来还说,直到毛泽东回京,常委们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这就是更大的错误”。周恩来指出,工作组里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常委们没有很好地给他们交待政策。因而,主持工作的常委们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组负起更多的责任来。

周恩来还在会上的发言中谈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周恩来说:“从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决定撤消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京后亲自

决策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①

虽然对撤销工作组没有想通，但大家仍想努力跟上形势。毛泽东此前几天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中央和各省市的领导人都应该亲自参加一所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以取得感性知识。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周恩来在撤销工作组后负责处理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刘少奇在同李雪峰商量后，选择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去。邓小平、陶铸去了中国人民大学。此时，许多大学的师生在工作组等问题上也分成两派，严重对立。

8月2日晚上，刘少奇来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该校归口属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领导。时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谷牧，还有李雪峰，也来到这所学校。“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去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外地到北京开会的刘澜涛等几位领导也去学校参观。

这些领导人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出席了两派学生的“辩论会”。刘少奇耐心地听取了几种不同观点的发言，最后讲了话。

刘少奇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嘛！”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①

同一天,邓小平、陶铸去作人民大学学生的工作,希望能保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过关。

周恩来也于两天后参加了李雪峰在清华大学主持的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说,他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身分来参加会议的,是来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

周恩来在会上批评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等平反后指出,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是老革命。周恩来还指出,学校组织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的做法不对。周恩来要求,广大师生员工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中央的政策办事,要团结90%的群众和95%的干部。

8月3日,刘少奇再次来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他把“八一团”、“革命团”这两个派别群众组织的头头找来,分别听取他们的意见,同他们谈话,作他们的思想工作。刘少奇要求两派学生团结起来,讲究政策,共同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好。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于会内会外的气氛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全会对《决定》本身没有切实展开讨论。大多数与会人员在大会小会的发言中总是检查自己“跟不上形势”,对“文化大革命”“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而没有对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下卷,第10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进行提出意见。虽然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就对工作组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没有人主动出来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情况出现了重要变化。

按照原定日程,全体会议于8月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代表们到会后,再改为小组讨论会。全会定于8月5日通过《十六条》后宣告会议结束。但是,毛泽东临时决定在8月4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于当天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毛泽东作主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前一阶段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并严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毛泽东说: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

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肃处理。^①

毛泽东的讲话使与会大多数人感到震惊。

主动出来承担责任的刘少奇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接口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顿时,整个会场一片愕然。

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这次会议的情况表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已不能平等地集体讨论工作了。

第二天,毛泽东采取严厉的措施,写了一篇异乎寻常的文字,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说: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下卷,第1035—10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省)的吗?①

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8月5日写的,贴在中南海大院里。毛泽东把这张大字报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下有“1966年8月5日”字样,无标题。毛泽东的秘书徐亚夫重抄了一遍,毛泽东在抄稿上加了标题,把“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改为“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在“左”字的前后加上引号。

8月7日,毛泽东向全会印发了这张大字报,并附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铅印件上,毛泽东又作了修改和补充:“是何等写得好啊”改为“写得何等好啊”,“可是在五十多天

①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里,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改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并加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和“压制不同意见”的话。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虽然不过 200 多字,却真是字字千钧,从现实到历史,句句打在刘少奇的身上。毛泽东将矛头直指刘少奇。

早在 1962 年 8 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实际上是对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编者注)的否定。北戴河会议批判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投降风”等右倾表现,其本质是针对刘少奇的。1964 年底至 1965 年初,为纠正“四清”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所谓形“左”实右路线而制定的《二十三条》,又是指向王光美 1964 年参加“四清”的“桃园经验”的。

在工作组问题上,虽然中共中央有许多人赞同刘少奇的做法,但是大字报中不指名地点出了“新账、老账一起算”。这无疑是对刘少奇的,而且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内部有个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

毛泽东这篇极不寻常的“大字报”,第一次在党内高层中公开了他长期以来对中共中央“一线”工作的不满,标志着毛泽东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第一线在政治上的分歧。按说周恩来也摆脱不掉“干系”,但毛泽东并没有把周恩来列入“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内。

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才明白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所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的是谁。

刘少奇对这张大字报持“保留意见”。刘少奇认为,自己

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无意的，是认识问题，自己并没有在“背后活动”。

8月5日下午，刘少奇按原订计划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率领的友好代表团。回京后，周恩来给刘少奇打电话，建议他近期不要公开露面，不要会见外宾。

8月6日，毛泽东要秘书徐亚夫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的林彪到会。在此之前的8月4日，林彪曾连夜从大连打电话给中共中央，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看法和方针。

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样一来，大会的气氛又进一步骤然升温。从此，“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毛泽东亲自写大字报批判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这是绝大多数与会者根本没有料到的。

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接过了大字报的解释权。阴谋家们一看时机成熟，便猖狂发挥大字报的火力，把斗争矛头迅速指向刘少奇。

毛泽东的大字报刚一发出，“中央文革小组”的“大秀才”陈伯达就写了《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并作为大会文件下发。

陈伯达写道：“毛主席把党的领导从最近一两个月的错误路线引回到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上来，这是党的伟大的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

这位所谓的“大理论家”说，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法国首先发动，而由德国来完成，但也没有实现。“现在历史是否可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由俄国首先发动，而由中国来实现呢？难道这不像人们所说的国际的希望在中国吗？”

康生说话并不多，但他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高深莫测，点中“要害”。康生说，在5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曾经说过，毛泽东思想，准确地说，应当是毛泽东主义。康生表示，毛泽东思想“已经超过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康生还说，他对有的常委不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久有感觉”。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异常活跃。张春桥说：“他（指刘少奇——编者注）讲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了。我在1964年看了记录”，“完全是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口吻，作秘密报告的口吻”。

江青紧随其后。当有的人发言说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那些“犯了错误”的高级干部时，江青说，她反对这种“混淆是非”的意见，认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同时，江青还要求人们注意一些用词：“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发人深醒（省）”。江青说，毛泽东一般不用这样的措辞。

关锋在发言中对江青的话进一步发挥说，在党内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个是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的“司令部”。后一个“司令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司令部”，“修正主义的司令部”。“现在要打的”就是这个

“司令部”，必须把这个“司令部”打垮。

与此同时，姚文元也在他《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中模仿江青的口吻说，《炮打司令部》打的是什么？是用“马列主义的炮弹”，打掉“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在毛泽东的大字报印发的当天，周恩来叮嘱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要他抓紧做好群众来访、接待人员的教育工作，让大家端正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解决头脑中怕“乱”的思想。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拟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编者注）。“文化大革命”终于取得了中央全会的正式承认，更加合法化了。

《十六条》的起草工作从1966年7月初就开始了。在毛泽东主持下，最初参加起草的有陈伯达、王力等人。初稿先后经过多次修改，毛泽东又委托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加以审订。陶铸等人与周恩来商量，删去了初定稿中的“黑帮”、“黑线”等提法和若干内容，增加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最后报送毛泽东。8月7日，毛泽东同意了经修改后的最终文本，决定第二天在大会上讨论通过。

这《十六条》内容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主流和曲折；“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干部问题；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教学改革；报刊上点名批

判的问题；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部队；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与会者对于上述《十六条》的通过很难说有几种心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尽管大多数同志思想不通，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但是由于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积习已深，由于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和个人威望达到了高峰，全会已无力挽回“左”倾错误继续发展的趋势，而只有接受和照办。

《十六条》充分肯定了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确定了让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方针。《十六条》对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作了这样的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十六条》没有对“走资派”订出明确的判别标准。

《十六条》规定，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左”派。对什么是“左”派，《十六条》也没有订出明确的判别标准。《十六条》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十六条》强调，要“敢字当头”，“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十六条》并且提出，“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

让”。

《十六条》虽然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等字句，但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实现党的领导，没有具体的条文规定。尽管这个决定对于某些破坏活动也作了一些预防性的政策规定，例如，“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以及保护科技人员等，但这些规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发展并没有产生多少约束力。《十六条》还明确规定，“文化革命小组”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

《十六条》是按照“左”倾错误的指导方针来制定“文化大革命”的具体章程的。它的根本错误就是：将广大党员和国家干部当作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敌我，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人为地制造了分裂；为乱打乱斗的违法行为提供了合法依据，实际上取消了党的领导。事实上，《十六条》是《五·一六通知》的继续和发展，从而使“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十六条》的通过，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

毛泽东的大字报改变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议程和方向。原订计划5天开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不可能如期结束了。

从8月8日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在讨论刘少奇、邓小平“错误”时，表示同情者有之，沉默不语者有之，亦赞亦批者有之。自然，也有一些人一反常态，狠揭猛批，用词刻毒。

刘少奇在会议期间所写的检讨发言提纲中说：“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他还请求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职务。

这天晚上，林彪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讲话中，林彪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林彪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运动开始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现在重整旗鼓再进攻”。

林彪还说，毛泽东把“文化革命”作为专题，作为大事，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是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要在运动中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使他们威风扫地，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林彪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说，“毛主席是统帅，你们作战斗员，进行全国的大战斗，任务很大”。

林彪还借机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声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些人不重视毛泽东思想，犯了“很大的错误”。

林彪的讲话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作了传达。之后，林彪的讲话又以文件的形式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

由于野心家们的推波助澜，会议形势为之大变。

毛泽东的大字报发出后，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所说的“炮打”只是对准“司令部”里面“犯错误的同志”，并且多是批评

刘少奇所谓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有抵触、不服气、自以为是”等等。

然而，在林彪、江青等人发言之后，大会便接受了这种提法，即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既是“司令部”，就不只一个“司令”。于是，大会一度开始再现不正常的个人攻击。邓小平、朱德、陈云、邓子恢、薄一波及其他许多高级干部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

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搞得人人自危，狂热纷乱。后来，甚至有人建议中共中央组织专门小组审查刘少奇的所谓“问题”。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分组讨论的同时，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江青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却成了生活会外的活跃角色。江青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然而，江青并未完全如愿，陶铸就第一个拒绝了她。结果，谢富治放了头炮。

通过《十六条》的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纸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十六条》。

在各种宣传工具的鼓动下，欢呼的人群，报喜的人流，纷纷涌向各省市机关所在地。北京有组织的群众队伍川流不息地到设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庆贺。锣鼓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响成一片。激情的场面显示出了群众对毛泽东的敬仰。居住在中南海里的人也为之震动。

8月10日晚上7点15分，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亲自接见前来庆贺的群众。激情满怀的群众，看见毛泽

东神话般地出现在眼前,又听见毛泽东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当毛泽东被群众簇拥着登上接待站讲台,连声说“同志们好,同志们好”时,全场的情景就是用“鼎沸”这个词也难以形容。直到警卫人员赶到接待站将毛泽东请回中南海之后,人群仍在继续翻滚,闻讯赶来的大批群众更增加了这里的温度。

第二天,《人民日报》用套红标题和激动人心的言词报道了毛泽东会见群众的场面。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任何力量都动摇不了的。

从8月10日下午,在继续批判刘少奇的同时,会议就开始讨论全会公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似乎就要最后落下帷幕。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虽然心事重重,但也准备收拾行装,回去慢慢消化会议精神。

出乎中共中央第一线领导人和到会的绝大多数人的意料,在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并且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这是把全会的“胜利成果”在组织上予以最后落实。

与此同时,会议对林彪的褒扬也不断升温。在大会举行选举前,林彪将“取代”刘少奇已是“昭然若揭”了。

8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改选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们在事先印好的名单选票上划了圈,投了票。

大会首先通过了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6名候补中央委员依次递补为中央委员,以取代中共

八届五中全会以后陆续病故的中央委员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罗荣桓、柯庆施、刘亚楼6人。

接着,大会通过了撤销“彭、罗、陆、杨”职务和补选陶铸和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的决定,为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事变动决定补办了法定手续。大会决定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最后,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1人,次序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两人:谢富治和刘宁一。

重新选出的11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显著的变化有两个:一是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二是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对此,刘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

这次会议并未重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后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4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被提起,林彪却仍被称为副主席。这样,林彪实际上成为惟一的副主席。显而易见,林彪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接班人”。

这次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实质,是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不满,否定和取消了中央第一线。这也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不可收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这次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固然是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毛泽东的本意来说,并没有将刘少奇置之死地而

后快的打算。所以，在1966年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这件事表态时只是说：“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位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至于到后来毛泽东同意刘少奇是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结论，则完全是江青、康生等人极力蒙骗的结果。林彪、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造成了两位战友之间的历史悲剧。

在群众情绪的支持下，在林彪的胁迫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2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会议公报》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①

大会在通过了《会议公报》后举行闭幕式，由林彪主持。毛泽东在闭幕式上作了这样的讲话：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

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①

历史是需要沉淀的，是需要检验的。多年后，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的实际情况说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及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在这次全会上爬升到“第二位”的林彪在闭幕式上作了总结讲话。林彪说：

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

^①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100—1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①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以后，按说这次“重大政治斗争”算是告一段落。但是，在毛泽东看来，通过的只是形式上的东西，实际上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思想上仍然不通。思想不通，实际行动中就很难主动积极地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这是毛泽东所不愿看到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8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找一些人谈话，打通思想。

林彪则在会议的第一天讲话。他讲了两大问题：“文化大革命问题”和“干部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林彪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党政军、工农商学兵，三里五界都是我们斗争的领域”，“不要走过场，干脆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这是破旧立新的重大的战略措施。”^②

关于军队的干部问题，林彪说，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

① 《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50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50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全面排队,全面调整。军队根据毛泽东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了3条办法,毛泽东也同意了。这3条办法是:一是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二是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三是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林彪还说,这3条办法,同毛泽东的“五条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军队要按这五条和三条,特别是第一条,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的重要标准。林彪还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仍然没有忘记搞个人崇拜那一套。林彪说: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

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是朝令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距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①

对于林彪 1966 年 8 月 8 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时的讲话、8 月 12 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和 8 月 13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都表示赞成，并且在其讲话稿上批示了“三件都看了，都赞成”。

尽管林彪善于见风使舵，但是历史和人民最终还是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也就在 10 年之后，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疯狂攻击刘少奇的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紧随林彪之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①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 504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历史也作出了勇敢科学的分析。对此,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清楚地指出:“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①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第81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

第二章 狂瀾不羈

大规模内乱开始全面掀起

毛泽东默许“红司令”的称号 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破四旧” 宗教设施受到冲击 抄家风初起时 “西纠”的起落 打、砸、抢之风愈演愈烈 抄家的狂飙席卷全国 工作组组长被揪斗 大串连加快了全国动乱的节奏 “首都三司”的成立使红卫兵运动走向分裂 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各级党政部门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 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 上海“安亭事件”开始了工矿企业的“停产闹革命” “《解放日报》事件”始末 全国出现一股“经济主义歪风” “康平路武斗事件”真相 党史专家谈全面内乱的由来

1966年8月18日,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安排,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代表。

从8月18日凌晨一时开始,上百万全国各界代表陆续奔向天安门广场。北京大学师生在广场正中的前方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模型。红卫兵代表站在天安门城楼两旁的观礼台上。

早晨5点钟,身着人民解放军军服、头戴军帽的毛泽东来到天安门城楼。事先除周恩来知道外,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一个也没有通知。

当毛泽东站在观礼台上时,台下“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响彻云霄。

7点30分,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开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陈伯达在开幕词中给毛泽东敬奉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3个头衔。林彪在发言中又加了一个“毛主席是统帅”的称号。

林彪在讲话中引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的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号召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林彪说：“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①

周恩来也在这次大会上讲了话。周恩来这样说：“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②

周恩来曾在会前就“红卫兵”的名字提出异议。他认为“红卫兵”是外国的名字。因此，在讲话中，周恩来也没有一处提到“红卫兵”。周恩来在发表讲话时说“革命要靠自己”，号召人们学习、熟悉、掌握、运用不久前通过的、他自己也很不清楚的《十六条》。

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稿都是经过毛泽东审阅过的。

在检阅庆祝游行队伍时，毛泽东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

^① 《林彪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很大的意义。”^①

上午11时,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分批接见红卫兵代表,并与他们一起合影留念。1500名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清华附中等校的红卫兵代表,接受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宋彬彬为之佩戴的红卫兵袖章,默认了红卫兵在天安门上向大会讲演时给予他的“红司令”的称号。

参加大会的贺龙、徐向前等元帅(除林彪外——编者注)当天都没穿军装。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临时得到通知:接见完红卫兵后,毛泽东要和元帅们照相。元帅们的工作人员,都急忙返回住处取军装。贺龙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帽子又太小,搞得很局促。那张照片是毛泽东和元帅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历史照片。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举动,通过新闻媒介的渲染,把红卫兵运动推向全国性的高潮,正式形成了浩大的红卫兵运动。

新华社当天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为题,报道了大会的情况。报道首次披露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情况,即按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排列的中共中央常委的名次。

“八·一八”大会给予红卫兵的“造反”活动以极大的鼓励。第二天,北京首先发起“破四旧”运动。红卫兵被号召行

^① 毛泽东:《在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同林彪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10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动起来,彻底破除几千年的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从8月20日开始,北京二中、十五中、六十三中的红卫兵最先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传单和大字报,举行集会演说,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这种“破四旧”的行动首先是以“改旧名”为突破口的。

红卫兵把原校名、店名、地名都改成极为“革命”的名称。顷刻间,北京市公共汽车站的站牌都涂写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红卫兵每到一地,几个人一商量,大笔一挥,名字就改了过来。

协和医学院,原名协和医学校。最初由美、英两国的5个教会团体和伦敦医学会在北京合办。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医社接办时改为协和医科大学,1929年改为北平协和医学院,是一所称誉中外的医学圣殿。“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摘下协和医学院的院牌,在上门框上贴了一张大字横幅,上书“反帝医院”。红卫兵“嫌不过瘾”,还在医院大门口张贴了醒目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

坐落在前门大街的“全聚德”烤鸭店被红卫兵更名为“北京烤鸭店”。8月19日夜,北京市第二、六十三、二十五等中学的红卫兵三五成群,吆喝着来到“全聚德”烤鸭店,厉声斥责该店职工。在红卫兵的督促和煽动下,职工们忍痛用一块书有“北京烤鸭店”的长条油漆木牌换下了“全聚德”的招牌。

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首先从自家门口扫起了

“四旧”。他们憎恨专门展售中国字画的“荣宝斋”，将已写好的“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的条幅盖在“荣宝斋”门匾上。他们还张贴了一张大字报，说“荣宝斋”是个“黑画店”，几十年来“盘剥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资本主义小姐、少爷、太太、老爷服务，为封建地主阔佬阔少服务，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服务”。

其实，红卫兵们所要说的就是一句话，即“荣宝斋”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不是为工农兵服务。大字报并指责这里已成了“黑帮画家的交易所”了。红卫兵还扬言要把“荣宝斋”打个身败名裂。

红卫兵还举行数十万人的大会，在“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怒吼声中，将苏联驻华使馆前的扬威路更名为“反修路”，坐落在同一条马路上的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则改名为“反修路中学”。

被红卫兵更名的地方很多，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被改为“红卫兵战校”；“北京崇文织布厂”被改为“北京东方红兴无织布厂”；“西交民巷”被改为“反修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被改为“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地处大栅栏的“瑞蚨祥绸布店”被更名为“立新绸布店”。“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亨德利钟表店”改为“首都钟表店”；“蓝天时装店”改为“卫东服装店”等等。

有些服装店的门上，还贴上了充满革命激情的对联：“革

命服装大做特做快做，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横批是：“兴无灭资”。

接着，这种“破四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人们正常的生活习惯横加指责。有些红卫兵组织到处贴出警告、通牒一类的大小字报，规定妇女一律剪成三八式齐耳短发，不许穿高跟鞋，不许穿裙子；男人不许留“飞机头”，不许穿牛仔裤。

红卫兵还在许多机关、学校门口和主要街道的路口，设置用桌椅摆成的“破旧立新”站，检查过路的行人有无“奇装异服”，并为行人剪剃“革命”发式。人们的个人生活习惯、街道、单位、物品的名称，都被当做“旧风俗、旧习惯”加以干涉和改变，甚至有的红卫兵还倡议修改宪法，废除国歌。

这时的理论权威刊物《红旗》杂志在评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时说，8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首都检阅了红卫兵。“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直接鼓舞下”，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革命组织一起，掀起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红旗》杂志还说，千百万红卫兵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们荡涤着旧社会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扫着堆积了几千年来的“垃圾脏物”。红卫兵干了大量“好事”。红卫兵是“革命的急先锋”，是“新生事物”。

《红旗》杂志号召人们要“擂鼓助威，鸣锣开道，高举双手，欢迎新生事物”。

8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同一天，新华

社播发了北京红卫兵大“破四旧”的消息，并对红卫兵的行动给予高度赞扬。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以“新华社二十二日讯”的形式在头版登载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报告。《人民日报》还在同一版刊登了《好得很》和《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两篇社论。

社论说，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

社论还说，革命学生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直接违背”了毛泽东的教导，“违背”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破四旧”运动迅速推向了全国。北京的红卫兵得到鼓励，采取了更加激烈的行动，从而使北京的“破四旧”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

为此，8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向旧世界宣战》的红卫兵“破四旧”的文章。文章写道，“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

文章说，为什么要砸理发馆呢？因为理发馆理出了大量的“港式头”。什么“飞机头”、“无缝青年式”等等稀奇古怪的发型，还喷上香水，抹上油，使那些“流氓们”摇头晃脑，得意忘形。“这不是复辟资本主义是什么？”

文章说,同样,裁缝铺也做出大量“港式衣裙”,什么牛仔裤、牛仔衫,“令人作呕”。照相馆是照出许多“下流低级”的照片,把“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电影明星们捧上了天”,“可恶,可憎,可气!”

文章还指责书摊“赎买了大量古今中外低级黄色冒险小说”,商店“摆了那么多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及港式衣裙、火箭鞋等等是给谁预备的?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

文章最后说,对于此种“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世界革命的大事”的问题不能小看,对于“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要坚决砸碎。

从8月23日清晨开始,上海成千上万支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组成的宣传小分队,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举着“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的大型横幅标语牌,走上街头。宣传小分队的成员到处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还在大型剧院召集群众大会,进行宣讲。

其中,上海商店林立的南京路,成了红卫兵关注的重点。红卫兵不停地高喊:“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彻底闹革命”,用“我们的铁扫帚彻底扫除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各店铺的橱窗都被大字报封住,红卫兵开始了更名活动。

天津也在同一天开始了“破四旧”活动。1966年8月23日这一天,天津的商业中心区滨江道一带,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中原公司的职工贴出决心书,在店前设立了接待站,征求红卫兵和过路人对更改店名的意见,最后决定改为“工农兵商场”。全市最大的商场——劝业场,改名为“人民商场”。

与此同时,全国各大、中城市,如郑州、杭州、成都、广州、武汉、长沙、南昌、济南、合肥、南京、福州、哈尔滨、长春、沈阳、南宁、贵阳等地无不受到红卫兵“破四旧”行动的冲击,街名、店名、商标名、茶名、房名,都被改为“革命化”的名字。

与此同时,人名也纷纷改了,为了显示“革命”,有的改为“东彪”,有的改为“李东”、“李彪”、“卫东”、“卫彪”、“卫红”、“继红”等等。

此时,“革命”的标志就是对“敌人”要恨,要恨得把他们打倒,再打烂,另一个就是“对毛主席要忠,绝对的忠”。这就是此时的一“恨”一“爱”,故而演成两大悲剧。

“破四旧”是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林彪发出的“号召”,可谓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红卫兵当然要“立竿见影”。

“破四旧”给人们留下了启示,首先要从此时所理解的“四旧”出发,去考查一下他们所破的“四旧”为何物?

“四旧”之一是“旧思想”。对于“旧思想”,林彪是这样解释的:“旧思想”的本质就是旧在一个“私”字上,因此要天天“斗私批修”。以“私”为“旧”,凡是“私心杂念”都属“破”的范围。

对于“旧文化”,此时的报纸杂志根本没有明确的说明。红卫兵破“旧文化”的事实,说明人们所理解的“旧文化”,实际上是从形式上理解这个“旧”字,凡是解放前出版的均属“旧文化”之列,国外的东西也属“旧”的范围。总之,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和江青排演的几个“样板戏”以外,其他统统属“旧”的范围。

正是因为这种“旧”的概念，演变成把许多中国古代文化优秀的遗产当做“糟粕”给破掉了，把外国先进的技术经验也当作“旧的东西”加以扔掉了，为此就出现了把许多珍贵的古文化遗址给破坏掉的事情；以几千年古文明遗产为“耻”，以自己生产所依赖的土地为“耻”。这就是“左”倾思潮脱离实际的本质特征。为此，“破四旧”演变成为破坏中国文化的所谓“革命”。

所谓“旧风俗、旧习惯”，虽然被列入了打倒的名单，但是哪些是“旧风俗、旧习惯”，此时的“破四旧”指挥者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界限，以致于过年过节之类的民间习惯都被列为打破的范围，过春节改名为“过革命化”春节，怎么“革命化”法？就是在农村去劳动，在工厂去上班，不休息就名之为“革命”了。

至于人留长头发，穿牛仔裤，高跟鞋，可能也与什么习俗有关，凡见留长头发者，念上一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便上前强行把别人的长发给剪掉；视人们正常的爱好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在思想理论上后来就更加陷入自相矛盾的混乱之中。它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坚持的基本原理当成“修正主义”批；把社会主义许多基本原理当成“资本主义”批，一见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就给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把实行经济核算叫做“利润挂帅”；把按劳分配叫做“物质刺激”；把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叫做“崇洋媚外”；把农民自留地，自养家禽和农村集市叫做“资本主义尾巴”；把学生认真学习叫做“白专道

路”；把学校搞好教学叫做“智育第一”。

随着运动的发展，“破四旧”运动不断升级。红卫兵认为“更名”仅是形式上的“破四旧”，没有涉及实质。

于是，红卫兵运动从形式上的“更名”发展到破坏名胜古迹。北京的旅游胜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八大处等公园成了红卫兵“破四旧”的重点对象。红卫兵们把山间亭阁里的小尊佛爷像和亭匾、字画，统统换成毛泽东画像。古刹戒台寺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戒坛上的大佛和周围数以千计的小佛，全部被红卫兵砸光。白塔寺、潭柘寺、团城、圆明园遗迹等也遭到破坏。

除此之外，杭州西湖受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平湖秋月碑、虎跑泉陵墓，河南洛阳价值连城的龙门石窟的无数小佛的头被砸掉，海南岛海瑞墓及附近的石器都被砸毁。无数被报纸点了名的古人，都因此遭受了鞭尸之苦。许多名胜古迹被毁、被砸。

据统计，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竟有4922处被毁掉，其中大多数被毁于1966年八九月间。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仅从各个炼铜厂就抢救出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要打浆的废纸堆中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多万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18.5万件，古旧图书235.7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

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还从干涉人们正常的生活习惯发展到人身迫害。最悲惨的莫过于红卫兵受到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怂恿，搞打、杀活动。

毛泽东是不赞成搞打、杀的,但是囿于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的想法,不便于下令制止他所不赞成的一些行动。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加上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从中作祟,红卫兵丧失理智,一些人甚至变成打人和杀人的“恶魔”。

8月23日下午,红卫兵将北京市文化局负责人赵鼎新、张梦庚以及著名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著名艺术家荀慧生、白芸生等30余人,分别在其脖子上挂着“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对他们进行批斗。

这些被批斗的人,当场全部被剃成“阴阳头”。一些人的头上还被倒上了墨汁。他们被红卫兵勒令围跪在火堆周围。红卫兵一面用火烤,一面用演出道具和带铜头的皮带抽打他们。极少数红卫兵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残致死。

同时,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还从干涉平民的言行发展到干涉外国人和涉外单位及民主党派的正常工作。就连宗教界,红卫兵也没有放过。

8月24日,十几个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和公安机

关的直接支持下,冲进设立在东单三条的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提出驱逐“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罗马修女。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在群众集会上宣布取缔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并宣布接管这个修女会所办的圣心学校。

之后,北京市公安局当众宣布驱逐令,立即执行。当夜,有组织的群众聚集在修女会院内外开会,控诉并声讨这个修女会的罪行,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反革命外国修女滚蛋”等口号。8月31日,北京市公安人员和红卫兵押送8名外国修女出境。

与此同时,北京的各种宗教设施也受到冲击,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的浪潮一个接一个。

8月23日夜到8月24日晨,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竟然散发《最后通牒》,并登报声明,勒令政协和民主党派72小时内解散。8月24日下午,全国工商联有13人被揪斗。除民主建国会外,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约有一百人先后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其总数的36.5%。其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有31人,中国民主同盟有36人,中国民主促进会有8人,中国农工民主党有8人,九三学社有15人。

从8月25日起,各民主党派机关停止办公,贴出《通知》。《通知》内容大意是,表示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中共中央处理。

8月24日,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学者李达含冤而死。

同一天,老舍在备受凌辱之后,投入北京城北的太平湖自尽。这件事给了视老舍为知己的周恩来极大的震动。

周恩来满腔悲愤地联想到其他人，特别是那些对“文化大革命”难于理解而且性情刚直的党外民主人士。周恩来立刻采取措施，尽力对他们实行保护。据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后来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张老正在北戴河。周总理考虑到张老个性刚强，回北京后恐怕会出事，便通知统战部派专人赶往北戴河向张老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让张老他们这些人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八月底回到北京，刚到家红卫兵就来了。幸好周总理早已采取了措施，卫戍区派了一个连和一个营部驻扎在张老家附近（东城区西总布胡同）担任警卫任务。当时住在这一带的还有李宗仁、马寅初、刘文辉、章士钊等高级民主人士。这些警卫战士身穿便服，佩戴红卫兵袖章，遇到外面来的红卫兵，就主动跟他们交涉，不让他们在张老家里胡作非为。“破四旧”期间，共有五批红卫兵找到张老家，由于事先有了准备，外来的红卫兵始终没能动张老一下。^①

“破四旧”造成了社会的严重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一些红卫兵“领袖”的不安。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9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为了维持起码的社会秩序,8月25日,北京西城区31所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在北京师大附中召开会议,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编者注)。红卫兵成立纠察队的目的,就是干预红卫兵运动,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它的成立和活动,为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所支持。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

8月27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要求红卫兵在“破四旧”中按《十六条》办事,不要武斗。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等也成立了纠察队。

“西纠”先后颁布了13条通令,反对揪斗老干部、抄老干部的家,反对武斗和打人。“西纠”也曾阻止一些大学生冲击国家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但是,他们把自己当做凌驾于其他红卫兵组织之上的特殊组织,引起与其他组织的矛盾。他们以暴易暴的打抢行动和私设公堂滥施酷刑,也引起广大群众的恶感。仅仅两个月时间,“西纠”就被解散了。

1966年6月至8月中旬北京大学被抄家者达536户,50%的教授和80%的校系领导的家被抄,200多人被打成“黑帮”。北大教授翦伯赞夫妇因不堪凌辱服毒自杀。时任教务长的崔某某跳湖自杀。时任北大中文系总书记的程贤策服毒身亡。

8月27日,山东寇县的红卫兵怀着对毛泽东的“无限情感”,对毛泽东批过的武训先挖坟,后抬尸游行,再接着开审判大会,最后判决,对武训尸体执行焚烧。

红卫兵把服装“革命”引申到警察制服上。《人民日报》在8月28日以《中国人民警察服装实行改革》为标题,发表

了新华社8月27日电讯。其中说,中国人民警察的服装,经国务院批准改革,于9月1日在全国开始执行。新的民警服装式样,上衣为草绿色,裤子为藏蓝色,戴解放军帽、国旗帽徽、全红领章。自实行之日起,旧的民警服予以废除。

从此,中国人的穿着一律变成藏青、青灰、草绿、藏蓝等灰暗的颜色,再也看不见穿红、白、黄等色彩鲜艳的衣服。

有一个所谓“造反组织”竟然勒令国家副主席宋庆龄改变发髻。后经周恩来出面劝解,这场闹剧才草草收场。

有一拨红卫兵竟然勒令改变交通的红绿灯,认为“红”是“革命”,只准“红”的通行,“绿”的是“反革命”,因而是“不准通行”。

图书馆、新华书店、出版社的图书通通被查封,只有小红书能摆出来。因为红卫兵认为,其他的书不是为“叛徒翻案”,就是为“资产阶级传宗接代”,有的还要焚烧。

随着北京“破四旧”的深入,打、砸、抢之风愈吹愈烈,抄家的级别也越来越高,从原来只抄一般的“牛鬼蛇神”的家,最后竟然抄到了朱德的家和叶剑英、徐向前的家。有的多次被抄,甚至一夜竟有8批抄家者登门。

红卫兵抄家活动完全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支持。并且,江青、林彪等人借着红卫兵的外壳,打击、报复一些知名人士。1966年10月9日,上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顾而已、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等人的家,几乎同时被一批神秘的“红卫兵”抄了。

这些人抄家时,只搜文件、字画,不要其他东西。

10多个“红卫兵”窜进了黄宗英、赵丹的家。他们先是对

黄宗英、赵丹两人搜身，接着翻箱倒柜，搜寻家中的每一个角落，最后拿走了解放前的旧电影画报、手稿、书信、日记、照片、底片等。

到顾而已家搜查的“红卫兵”，个个戴着大口罩和军帽。“红卫兵”在窗口门的地方派人守卫，拉紧窗帘，叫出卧室内的顾而已夫妇后，开始搜查卧室、亭子间和会客室。

进入郑君里家的“红卫兵”进入武康大楼后，首先在大楼内加强警戒，控制电话，软禁电梯司机，锁住大门，然后钻进郑君里的家。“红卫兵”告诉郑君里，要搜查文件和机密文件，接着动手翻抄每一处的角落，连同郑君里的鞋和衣服都抄了一遍。临走时，他们告诉郑君里，不要把抄家的情况泄露出去，否则要他的脑袋。

经过4个多小时的“艰苦作战”，“红卫兵”抄来了一麻袋一麻袋的材料，并且运到他们的头头江腾蛟处。江腾蛟立即命人着手翻查、整顿，并且从中抄出了“非常重要”的一包。然后，江腾蛟带着这包材料迅速飞往北京，向他的“主子”叶群请功去了。

江青对江腾蛟的行动表示赞赏。江青来到毛家湾叶群的住处，叫林彪的办公室秘书赵根生捅开后院炉子，将这份“非常重要”的材料投进熊熊大火中，化作一缕青烟。

这就是江青等人打着红卫兵的幌子，以抄家为名，搜查毁掉江青以前干的不可告人的勾当。

北京市郊县的红卫兵，由一般批斗“牛鬼蛇神”发展到乱打乱杀。

北京市大兴县公安局于8月26日召开局务会议。会议

传达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谢富治在甘肃、陕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说：“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谢富治还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

此外，谢富治在讲话中表示，群众打死人，他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谢富治要求民警站在红卫兵一边，跟红卫兵取得联系，建立感情，供给红卫兵情况，把“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编者注）介绍给红卫兵。谢富治讲话之后，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介绍了“四类分子”（即“地、富、反、右”——编者注）的情况。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社论说：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

这些吸血鬼，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

兵的功勋。^①

这篇赞扬乱揪乱斗、赞扬抄家和“扫地出门”的社论，使抄家的狂风在8月底至9月初席卷全国。

8月29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一群红卫兵闯入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肆意进行查抄。事后，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红卫兵的无理行径，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次日，毛泽东在来信上批“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接到批件，马上采取措施，对章宅实行保护。

同一天，周恩来亲自写下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劭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十几位高级民主人士，还有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所属各部委、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负责人。这份名单虽然只有几十个字，却包含了几百名保护对象。

8月31日，周恩来下令三〇一医院准备接受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入院，对他们加以保护。对名单上的每个人，周恩来几乎都费了一番心思，寻求稳妥的保护办法。

为了教育年轻而缺乏知识的红卫兵，周恩来有时还要耐心地给红卫兵讲一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常识，来劝说他们不要做违反科学常识的事情。

^① 《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人民日报》，1966年8月29日。

周恩来还利用和红卫兵谈话的机会，多次向红卫兵介绍自己的家庭、个人经历、工作经验教训等，以切身体会来告诉青少年们，革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年轻人犯错误是难免的，粉饰和掩盖错误是不对的，要勇于正视它，改正它。周恩来在各种场合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就这样，身为几亿人口国家的总理，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卫兵打交道，做工作。

此间，8月31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第二次在天安门接见来京师生和红卫兵代表。林彪在接见大会上讲话时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林彪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政治，触及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已经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

林彪在讲话中说，群众的革命洪流，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整个社会面貌。林彪还在讲话中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坚决反对”压制红卫兵。林彪还煽动红卫兵说，他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周恩来在接见大会上的讲话与林彪大相径庭。周恩来说，红卫兵要像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执行群众路线，永远作人民忠实的勤务员。周恩来还要求红卫兵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的新风气。

上海红卫兵从8月23日至9月8日抄了各类“牛鬼蛇神”的家共8万多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教师1200多户。苏州市的红卫兵也“战绩累累”,抄家6万多户,抄得各类图书、字画、文物17万余件。很多图书被大火化为灰烬。

9月12日,黑龙江红卫兵在万人批判会上给省委书记、省长剃“鬼头”。这些“先进经验”都是从北京红卫兵给他们的老师剃“阴阳头”学来的。

根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在1个月左右时间抄走黄金达10.31万两,现金5545.99万元,白银34.52万两,文物和玉器61.36万件。8月、9月抄家3.3万多户。

各地抄来的财物,很多是生活用品,有钢笔、衣服、毛巾、家具、电视机、手风琴、收音机、化妆品等。这些东西一般存在公共场所,无人管理,很多不是被虫啮,就是被鼠咬。一堆堆图书,不管是司马光的传世之作,还是高尔基的名著,均被投进熊熊烈火之中。

此时正值夏末初秋,时间一晃进入深秋初冬之季,很多人家被抄走如棉衣、毛衣、棉被褥等御寒物品及布票、棉花票。也许是有人良心发现,抄查物资库开始办理退还生活必需品的程序。但因红卫兵抄家时,根本没有办理清账手续,所以,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衣物比登天还难。

整个北京市从8月19日至9月底,不到40天时间,共打死1700多人,把“四类分子”驱赶出北京市达8.5万多人。有的红卫兵还轮番到火车站殴打被遣送外地的“黑五类”,当场把人打死,还真的在尸体上踏上不知多少只脚。

“破四旧”运动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引起了广大

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感。

早在8月6日,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就联合发出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呼吁书》中说,他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呼吁书》还说,要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左”派的组织,要解散一切假“左”派组织。《呼吁书》还表示,绝不饶恕破坏党的政策的人。

“破四旧”运动还不同程度地遭到了人民群众的抵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红卫兵抄家的狂飙进行了坚决抵制。

早在8月30日,北京外语学院就传达了陈毅的讲话。陈毅说,北京“抄”的风气很浓,不能提倡。红卫兵中有些东西如骂人狗崽子等“是封建的东西”。陈毅接着说,抄家没收一定要经过手续。红卫兵在运动过程中无论如何不能排外,运动愈是搞得深入愈是要讲政策。

9月1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座谈会上讲话时说,要讲政策,要团结大多数。凡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打击,那就广了。右派分子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了。

周恩来对红卫兵说,对“资产阶级”,主要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违法行为。如果一般资产阶级分子老老实实,

奉公守法,有选举权的,不一定马上打倒他,因为他没有做破坏工作。搜查、抄家就是打倒了。红卫兵建议定息取消,很好,这“应当由中央、主席提出,人大通过”。

鉴于“破四旧”运动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相应制止了一些极端的行爲。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在8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过的两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①

这篇社论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一些打人抄家的做法。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指出红卫兵不许冲击要害保密部门。

同时,舆论导向也朝着降温的方向转变。9月21日,《人民日报》开设“和红卫兵谈心专栏”,发表邱少云的弟弟邱少全的题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文章,告诫红卫兵要学习解放军,加强纪律性,听从指挥。这些对制止红卫兵的极端行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首都各高校造反派几乎都掀

^① 毛泽东:《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1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斗了工作组组长。然而，学校内部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多数人依然持保护工作组的态度。

1966年反对揪斗工作组的，有各校的多数派，有清华附中红卫兵，有“西纠”，还有谭力夫。

早在红卫兵运动刚兴起时，社会上就逐渐出现了“唯成分论”的风潮。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到北大、清华、人大等校贴了一副名之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说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影响了一些青年。他们把“唯成分论”看作“阶级路线”。因自己家庭出身好而抱有“自来红”的优越感。这副对联说明这些青年学生赞成造“牛鬼蛇神”（他们认为“牛鬼蛇神”就是“资本家、地、富、反、坏、右”——编者注）的反，反对造革命老干部的反。

青年学生既“无限崇敬毛主席”，又保党委和工作组。他们认为这是一致的。由于家庭出身、革命教养的缘故，这部分青年尊重革命前辈，信任党委和工作组。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知甚少，保党委和工作组没有别的武器，就搬出了“唯成分论”。

同时，这副对联导致了子女之间高低贵贱的区分，使工农子弟和干部子弟之间产生了矛盾。一些干部子弟把父母的旧绿军装与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通过各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出身“高贵”，而一些农民子弟在某些地方酝酿成立“贫协”的风潮，以抗击一些干部子弟的“高贵”言行。

这样，围绕着这副对联，北京的学生进行了激烈的争辩。8月12日，在北京工业大学就读的谭力夫写了《从对联谈起》

的大字报。

谭力夫在“必须坚持阶级路线”的前提下，提出了这副对联立论的偏颇，建议补充一副“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的对联。谭力夫认为，前一联说明了过去，是“唯成分论”。后一联指明了未来，不“唯成分论”，两联加在一起就比较全面了。这种折中的意见为许多青年接受。

8月20日，北京工业大学一些与谭力夫观点不同的人点将，要谭力夫在关于工作组和阶级路线的辩论会上表态。

谭力夫作了发言，这就是《在工大一次辩论会上的发言》。谭力夫认为，绝大多数老干部和工农、干部子弟是好的，即使有一点缺点错误，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小革命遇到大问题”，绝不能把他们打成“老反革命”和“小反革命”。

同时，谭力夫表示，他不同意不加分析地冲击、批斗、污辱党的积极干部，把攻击工作组和粗暴批斗党的干部说成“右派翻天”；他不能容忍一些人的幸灾乐祸。

谭力夫在辩论中不住地质问：“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公开申明拥护工大的工作组。

谭力夫说，时任总参谋部防化兵部副政委的杜万荣，在进校任工作组组长的第一天，就给他留下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谭力夫声明说，杜万荣一进校，“党的阳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从此照进了工大”；别人就是说得天花乱坠，他也还是喜欢杜万荣。

谭力夫还公开表明了他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谭力夫说，有人老习惯于翻本本，找条条。什么事都等中央指示，

“还要你‘首创’什么？世界上哪有完善无缺的东西？”世界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东西，就是毛泽东思想也还要不断发展。

谭力夫的发言，明显地流露出“自来红”的情绪。这位只有24岁的大学三年级的年轻共产党员，讲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谭力夫的《在工大一次辩论会上的发言》流传很广。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它受到许多人的欢迎。不必说，它也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反对。不久，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歪曲谭力夫的观点，对谭力夫横加挞伐。王力在作报告时也说，《十六条》批判工作组执行的是“反动路线”，而谭力夫公开地宣传工作组好。

与此同时，周恩来、陈毅等竭力为工作组开脱，保工作组过关。

陈毅在8月16日接见外语学院等3校代表时说，看待工作组要一分为二。工作组是他派的。陈毅说，中央外办副主任张彦率领的工作组也是他派的，工作组的“错误”由他承担。

陈毅还在讲话中表示，他的后台是毛泽东。各人有各人的账，他有他的账。陈毅要求学生们不要用大帽子压人，压也是压不住的。

陈毅指出，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不是“黑帮”，工作组也不是“黑帮”。工作组有错误，应检讨，但工作组没有“黑帮”，也不能说有。陈毅表示，他不损害少数派，不损害多数派，也不损害工作组。

8月22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群众大会上说，派工作组

的责任应该归北京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共中央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他应该向学生们说明,这是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因此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

尽管各高校内部多数派保护工作组,中共中央也有部分领导人保工作组过关。但是,各学校的工作组组长仍然遭到各校少数造反派的揪斗。

8月23日,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组织的“东方红公社”1000多人步行到地质部,坚决要求批斗曾在地质学院工作组任过组长的邹家尤(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编者注)。批斗是戴高帽、挂牌子、搞“喷气式”的残酷斗争。地质部党委为保护干部的人身安全,没有交出邹家尤。于是,学生们在地质部静坐绝食。

这时,“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支持学生们的行动。邹家尤只好答应第二天到校听取批判。这就是所谓的“一进地质部,炮打‘何家店’”。

不久,地质学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再揪邹家尤。这时,邹家尤已经去了地质学院。而一些人仍留在地质部为所欲为,并强行翻阅、取走机密档案。

9月7日,“西纠”要“东方红”撤回。“东方红”不同意,双方发生了武斗。“东方红”在地质部造反15天,于9月19日撤离。9月28日,关锋在地质学院座谈会上讲话,点名指责邹家尤。

10月8日,“东方红”三进地质部,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天深夜,造反派绑架了何长工。

10月27日，“东方红”四进地质部，“扩大战果”。

于是，地质学院“东方红”成了全国有名的造反派。它的头头王大宾成了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

在地质学院的造反派揪斗何长工、邹家尤的同时，北京航空学院造反组织“红旗战斗队”的学生于8月25日在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组长的赵如璋（时任国防科委的局长——编者注）。

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罗舜初报告林彪，说明赵如璋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将不堪设想。罗舜初又多次向林彪报告学生情况，请求指示，均得不到答复。

“中央文革小组”则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支持北航“红旗”的要求。

9月21日晚，陈伯达接见了北航“红旗”学生，并赞扬他们。第二天，陈伯达亲笔写下了“军令状”。陈伯达写道，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罗舜初、赵如璋——编者注），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陈伯达耍了个手腕，解决了难题。既然陈伯达已经立了字据，赵如璋再也没有理由躲藏，北航的学生也决不敢把他打伤、打死。

9月23日，国防科委交出了赵如璋。学生撤走。

北航“红旗”为揪斗工作组组长，用了28个昼夜，因而一举成名，成了北京响当当的“左”派。它的头头韩爱晶成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解放军报社一位年轻的记者写诗颂之。其中有这样几句：“北航旗如血，风雨满京城。二十八昼夜，牛鬼吓断魂！”

这时,工作组长的检讨是很难作的。这不仅因为工作组组长自己思想没有搞通,很难上纲到“实行白色恐怖”,与造反派的要求距离很大;更因为绝大多数学校都存在一个保工作组的多数派,与反工作组的少数派对立。工作组长一言不慎就会得罪多数派,引起少数派与多数派之间的争斗,落得个挑动学生斗学生的罪名。

造反派之所以迫令工作组组长作检讨,其主要目的就是证明多数派的“不正确”,压制多数派。工作组长非常清楚这一点,因而左右为难,检讨总是不过关。许多工作组组长饱受皮肉之苦。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内部在工作组问题上也出现了微妙的斗争。8月30日,陈毅在红卫兵大会上说,工作组检查一次两次就行了,通不过也不要再回去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9月7日在北京外贸学院群众大会上说,工作组是中央领导派的,可以说“错误”他应该首先负责任。李先念表示,他可以向学生们道歉,向学生们检讨。

然而,9月13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的20名红卫兵时,表示支持少数造反派。谢富治说,好多学校至少有两派:一派是揪工作组的,一派是保工作组的。大部分是多数派,对工作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少数派方向是对的。不仅北京政法学院如此,其他学院也是一样。

谢富治说,保工作组没有多大责任,说保工作组是“保皇派”,这个说法不好。谢富治表示,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他支持少数派。他要求学生赞成少数派的大方向。

9月17日,李先念对粮食部24位同志说,工作组即使犯

了“方向、路线错误”，也不能说是“牛鬼蛇神”，还是人民的内部矛盾。然而，毛泽东支持北航“红旗”揪工作组，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中央文革小组”也到处支持揪工作组。

9月2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群众大会上，周恩来在谈到工作组问题时，又重新申明工作组问题解决了，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解决了。类似的话，他在许多公众场合都讲过。

后来，直到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组问题的通知》，工作组问题才算舒了一口气。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说，考虑到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主要锋芒应当针对着这条“错误路线”的提出者，而不应当长期揪住工作组不放。各学校、各工厂、各机关、各单位，以后不要再揪工作组去斗争。

这样，揪斗工作组的风波从此才算结束。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出现的全国性的大串连高潮，加快了全国动乱的节奏。

早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同年六七月份，各校青年学生的串连就开始出现了。

红卫兵运动在刚刚兴起时，外地的红卫兵仿照北京各校的做法，层层揪斗各级领导。当其行动遭到了部分领导和群众的反对时，这些红卫兵为了寻求支持，四处活动，各方联络。

在“停课闹革命”后，各大中城市里学校之间的串连已十分活跃。到8月份，天津、太原、长春、西安等地学生纷纷赴京上访、告状。

8月4日，汪东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说，近期每天都有上千学生、上百批到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其中有一些是外来的。这实际上已形成了串连。

到北京串连的外地学生逐渐增多。在“中央文革小组”策划下，“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于8月16日召开。陈伯达在会上表示“热烈地支持”师生的串连活动。

陈伯达对师生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陈伯达并要求他们依靠自己，推进运动。

频频与外地师生接触的北京师生，听到了上访人员愤怒的控诉和声泪俱下的求援后，纷纷走出北京，传授造反经验，支持和扶助各地造反力量，进行“革命大串连”。各地师生也络绎不绝地成批到北京寻求支持，学习造反经验。跨地区、跨省区的大串连开始初具规模。特别是“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这种串连又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7月29日到8月28日的一个月当中，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就有212.4万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达17.9万人次。8月28日，外地到京学生已达14万人。

8月31日,在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和北京的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次接见会正式肯定了全国大串连,使大串连得到了有限度的支持。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编者注)“革命学生”,除了有病的、已经到过的或有其他原因不能去的以外,都可以组织去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

《通知》规定,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编者注)按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10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

《通知》还规定,从9月6日起,外地高等学校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到北京参观、学习、相互交流“革命经验”时,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从国家财政中开支。全国大串连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越来越多。

从9月5日起,全国大、中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串连。

到北京的红卫兵,住进了外出闹“革命”的红卫兵的校舍。他们把桌椅集拢起来,堆放在一角,腾出空间,然后在地上铺上篾席,连成一个通铺。对红卫兵来讲,他们一心只想获取“文化大革命”的“经”,并不在乎生活多么艰苦。

随着到北京的红卫兵人流越聚越浓,北京市许多机关、单位纷纷腾出地方接待红卫兵。北京市各街道也积极行动起来,纷纷设立接待站。广州市在公园里搭起了临时性大棚子,作为红卫兵的栖身之地。

串连的红卫兵每人都得到一张通行证。他们可以免费乘坐各类交通工具,免费进入公园等游乐园,在全国畅通无阻。

然而,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无限的人员流动需要,中国出现了交通运输史上罕见的载运量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特别是火车的超载都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满载100余人的一节火车车厢,竟然乘坐到两三百人。在茶几上、椅背上、行李架上、过道上、椅子底下、厕所里,到处都是人。

同时,由于上下车的人多,特别是在车站上等车的红卫兵,为了参加串连,破窗而入;由于交通工具的超负荷长时间运行,大大缩短了各种交通工具的使用寿命。特别是火车,车厢行李架普遍断裂,车箱内的设备也被毁坏。这种交通线上的混乱情况在全国十分普遍。

红卫兵串连行动规模浩大。周恩来在得知各地串连学生在京人数已达34万人、总趋势仍在增多、接待部门应接不暇时,于9月7日在致江青、“中央文革小组”并报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中说:“上次天安门大会(八月三十一日)后,从九月一日到五日止,经过铁路运输,离京学生(包括北京外出学生在内)共约四十二万人;来京学生(包括回京学生在内)共约三十九万多人,其中当天未得安置,留在车站等待安排的五天总数约八万八千人,以九月五日最多,达到四万

多人。”^①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信中建议由中央领导出面，动员在京学生早日回去。

在学生大串连如火如荼之时，各地群众也纷纷到北京，到各地城市串连。造反串连活动很快突破了学校范围，扩展到工厂、农村。生产秩序开始混乱。

早在8月中旬，天津大学等院校的师生开始了徒步“长征”的先例。他们觉得在“文化大革命”过程当中受到了“压抑”，遂决定徒步到北京取“文化大革命”的“经”。他们一路上凭着朗读《毛主席语录》所获得的力量，克服重重困难，一往无前。

8月25日，大连海运学院的15名学生，举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兵”的红旗，开始了自己的步行旅程。历经近1个月的艰辛，行程2000余里，他们终于到达了北京。

8月26日，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和保护红卫兵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周恩来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建议各区应该成立联络分站。

两天后，毛泽东在接见人民日报社和解放军报社代总编辑唐平铸和胡痴时说，学生的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毛泽东要求，报纸宣传不能违反学生的潮流。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9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当陶铸谈到外地学生已有14万人到了北京,各地学生还在到处跑时,毛泽东说,让他们统统来北京。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毛泽东还把原定到年底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延长到“春节再说”。

在这之后,中南海开始安置红卫兵。

9月中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全体“出征战士”准备前往各地串连。周恩来向这些准备离京奔赴各地的首都红卫兵提出,红卫兵应是一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战斗”指的是进行文斗,而不是武斗;“学习”就是要作调查研究,要进行科学分析,要有冷静的头脑;“宣传”就是讲政策、讲实际、讲界限,不盲目行动,不强加于人。周恩来说:

“因为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知识毕竟有限,你们知道的各方面的情况和党的政策是很不完全的。”“你们会遇到许多不熟悉的事情,因此要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对毛主席著作)单单学语录是不够的,还要看全文才能懂得毛主席如何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才能看到文章的时代背景和伟大的前途,否则决不是真正学懂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机关,而工厂、农村、服务性的行业应由那里的干部群众自己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去进行必要的革命串连,但不能像在学校里一样,冲进去,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有革命的秩序、建设的秩序。”“边疆的省份,

靠边境的城市、集镇和边防点你们不要去。这些地方的每一个行动都关系到很多政策,如对外的政策、民族的政策等。那里宗教信仰常常和民族问题结合在一起,人们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即使改变也需要时间。”“总之,你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包括爱国的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他人士,甚至剥削阶级分子本身。”^①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

林彪在这次接见会上讲话时表示,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坚决支持的。

同时,林彪还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很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②

周恩来在讲话时说,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必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串连,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闹革命”。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912—9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② 《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9月16日。

对于红卫兵串连运动的情景,串连到北京并受到毛泽东接见的一名红卫兵后来回忆道:

“1966年9月,我怀揣战友们拼凑的百余元钱,瞒着父母赴京串联(连)。火车挤得象沙丁鱼罐头,我好不容易在座位底下占得一席之地。”“我在北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参加了关锋接见,又经人大附中、清华大学几名高干子弟疏通登上城楼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检阅。当‘东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总理陪同下向我们步步走近时,我的每根神经都在纤颤,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滚下来”。“接见完已是黄昏,我以百米冲刺的高速冲进电报大楼。楼厅里正播送‘凡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的通知。”“我一口气连写四份,每份电文都长达四百多字。我要让复旦、定海、妈妈和兄嫂及宝山的贫下中农分享我的幸福!”^①

国内的交通因为串连已拥挤不堪。为了减轻运输压力,9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保障铁路运输的电报。电报指出:“目前全国铁路运输十分紧张,为不影响工农业生产,各地革命师生暂不要

^① 安文江:《我不忏悔》,《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五卷,第30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4月版。

到其他省市去串连”。^①

不久，中共中央碰头会决定电告华东局并各中央局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卫生部，中央同意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已成立红卫兵组织的医院，要自动取消。

10月1日，是国庆节，毛泽东第四次接见到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本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10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连一个月。同时，中共中央要求铁路部门，按进出北京各150万至170万的学生人数安排运力。

由于频繁的串连活动，交通部门承受不了如此重负。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后，向红卫兵号召，发扬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精神进行徒步串连。

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大串连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而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社论号召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此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积极响应步行串连的红卫兵。一支支被命名为“孺子牛长征队”、“延安长征队”、“井冈山长征队”、“女子长征队”的红卫兵串连队伍开始在各地出现。

这些“长征队伍”主要的行进目标是北京，也有相当多的“长征队伍”前往井冈山、延安等地。红卫兵“长征队伍”在行进过程中，经常组织召开各种群众大会，进行讲演，对扩大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卫兵的影响起了极大的作用。

尽管徒步串连的规模有所扩大,但是乘车串连造成的交通紧张状态仍然毫无缓和的趋势,引起了各方面的重重矛盾。特别是事故频繁,严重地影响了各地的社会治安。有的学生几天几夜挤不上火车,就砸碎车窗跳进车厢,有的便用车站上的水龙头往车里滋水,更有甚者坐卧在铁轨上面不让列车启动。还有的扒车,露宿在车顶而翻滚到车下,人身事故多次出现。

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0月29日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

然而,此时已有4万多人挤到大寨,又有10万多人挤到井冈山,还有上万人挤到韶山。时届严冬,天冷路塞粮缺。井冈山200多名红卫兵染上了脑膜炎,有6人死去。井冈山的山上还发现了5具饿死的尸体。井冈山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告急,大寨也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告急。国务院、中央军委动员了一部分部队连夜赶制大饼,并派直升飞机到大寨、井冈山空投大饼、衣服、毯子。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大串连的兴趣依然浓厚。毛泽东曾提出在全国各地设立兵站接待串连者的主张,终因难以实行而告吹。

“中央文革小组”为了达到其目的,认为动员各处串连的红卫兵返校搞运动是当务之急。为此,11月10日,在北京体育馆,由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兵”和北京红卫兵联合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誓师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倡议书》。

本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通知》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到北京和各地进行串连。《通知》说,毛泽东支持步行串连。《通知》中还说,先由试点取得串连经验,以便为来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

12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补充通知,重申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进行串连,在外地串连的师生12月20日前必须返回原地。12月21日起到年底,大部分串连红卫兵返回原校,但仍有少数串连学生用互换车票的方法,继续串连。

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的通知》。《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人员应当回到本地本校去。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全国长途步行大串连。

不久后的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通知》指出,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此后,全国大串连逐渐停止。直到1968年,仍有少数红卫兵游荡在全国各地。

这种大串连,不仅使国家花掉了数以亿计的金钱,而且造成了全国性的动乱。而在后来经毛泽东批准、大量印发的陈伯达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串连、红卫兵,这些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一直是毛泽东极力支持的,并且主张把这种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大推广。

陈伯达的讲话中说,这种串连,将使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得以互相交流,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时,

可以使人们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还可以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由此可见，毛泽东支持大串连，是为了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7年2月27日，陈伯达对红卫兵代表说，红卫兵运动初期搞串连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有“功绩”。但后来各地造反派起来了，红卫兵继续留在那里可能起不好的作用，外地联络站要一律撤回。由此可见，“中央文革小组”所鼓吹的串连所起的作用至此已经完成。

经过“破四旧”和大串连，红卫兵运动形成了高潮。在范围上，它从学校冲向了社会，从北京发展到全国；在内容上，它从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发展到破坏社会上一切文化的现象；从批斗“牛鬼蛇神”发展到揪斗工作组，揪斗“走资派”；在方式上，它从“文斗”发展到“武斗”，更加凶暴；在组织上，它从单一的队伍发展成为表现不同思想倾向的组织林立、山头对峙的局面。

总之，红卫兵运动造成的狂风暴雨的声势，使广大干部群众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仍然受到很大阻力。在社会上，红卫兵的造反行动遭到各级党政领导和工农群众的抵制，有的地方还发生了激烈冲突。在学校中，多数派红卫兵和少数派红卫兵出现了斗争。

那些各校工作组帮助建立起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

最早组织起来的红卫兵,多数是党团员,思想素质好。他们赞成斗“黑帮”,不赞成全盘否定工作组;赞成批斗个别干部,不赞成普遍冲击党委。总的政治倾向是不赞成笼统地提斗争矛头朝上。由于过去运动“跟队”的传统影响,而且有反右派“引蛇出洞”的殷鉴在先,多数群众都站在这一派。

1966年8月27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首都第一司令部”,简称“首都一司”——编者注)和9月5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首都第二司令部”,简称“首都二司”——编者注)都属于这一派。

然而,要求彻底批判工作组,把斗争矛头朝上,揪党内“走资派”的,则需要一定的“勇气”,所以处于少数派的地位。9月6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第三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编者注)就属于这一派。

“首都三司”的成立,是红卫兵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红卫兵运动走向分裂的开始。因为这一派红卫兵组织大多数都是1966年8月18日以后陆续成立的。人们常称之为“新红卫兵”。而在此之前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人们常称做“老红卫兵”。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老红卫兵”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他们认为革命的目的是“反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具体来说,是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教育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奉行“在中央、市委的统一具体领导下再动手”;红卫兵组织基本上是以教学班或学校为单位组建的;组织成员以中学生为主,其中相当一部分组织者为高级干部子弟。

而“新红卫兵”组织的基本特点是：造反的矛头指向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具体来说，党的内部领导人；造反的形式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红卫兵的组织形式是跨教学班，甚至是跨学校的；组织成员中大多是高等学校的学生。

显然，“新红卫兵”的斗争方向是受“中央文革小组”操纵逐步形成的。因而，这些红卫兵也完全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控制的造反工具。

从1966年10月起，“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被引向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数派与少数派斗争的优劣态势发生了变化。

9月17日至20日，“中央文革小组”连续4次召集北京大专院校少数派代表，座谈汇报“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暗示“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清华、北师大、地质学院等高等学校的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座谈。

在会上，蒯大富、王大宾等人攻击“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污蔑周恩来“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一下”；还提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没有领导解决这个问题”，“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

张春桥把这类发言都印成材料。江青则把材料上送毛泽东。

红卫兵少数派受到鼓励后，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冲击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北京敢于冲击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少数派都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都成了闻名全国的“左”派。这对各地造反派来说“太具有魅力了”。

于是，“造反就是大方向”、“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成为一时全国造反派的口号。湖南的造反派并且喊出了“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口号。

9月9日，长沙高等院校和部分厂矿企业的造反派在东风广场召开了“全市革命大军炮轰省、市司令部大会”，会上提出了“炮打九级司令部”的口号（“九级”即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编者注）。后来，张春桥在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说，到9月，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委、市委都被包围了”。

10月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多万革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空前盛大的集会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参加了庆祝大会，检阅了游行大军。3000多名工农兵、少数民族和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来自各大洲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参加了庆祝大会。参加庆祝大会的国际朋友盛赞“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威力无穷”。

集会游行结束时，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过金水桥，一直走到群众队伍中，亲切地向大家祝贺节日。“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许多人激动地说：“我们太幸福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非常健康，精力非常旺盛，这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幸福！”

林彪在国庆讲话时首先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同一天,《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发出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号召。社论称,“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后来,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党内历次提路线错误都是“左”倾或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毛泽东回答说,原来用“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反动路线”。

在天安门城楼上,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负责人向毛泽东、林彪反映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出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照地方的方向搞。

于是,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提议,向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总参谋部、总后党委、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提出,军队院校是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之一,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军队院校的特殊性,“压制民主”、不许串连、打击“左”派等,严重违背了《十六条》。

《紧急指示》提出,根据林彪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必须把“束缚群众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

样,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要充分发扬民主,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要做出“榜样”。

《紧急指示》还提出,以前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政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不在军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院校串连的规定等——编者注)应当宣布取消。

《紧急指示》说,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一律无效。对这些人“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黑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

实际上,这个《紧急指示》是为适应所谓“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求而产生的。

中共中央在有关批示中指出,《紧急指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中共中央并且转发了这个文件。

10月5日,中央军委召开大会;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大会,公布了《紧急指示》。会议还说明这个《紧急指示》适用于一切单位。

10月6日,代表少数派的“首都三司”发起了“全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到会人数有10万之众。随后,大、中学校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掀起高潮。

正当在全国展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时,10月

9日到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会上,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集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在讲话中说,“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问题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陈伯达的报告把要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解释为“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陈伯达的报告指责广大干部对社会动乱的担心和防范是“怕字派”。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发言中作了自我检查。周恩来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是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中虽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只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教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

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①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于10月18日第五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代表。同时,随着正进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断升温,对刘少奇的攻击已被捅到社会上去了。

就在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当天,一些外地红卫兵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天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的大字报。

周恩来得知红卫兵贴了刘少奇的大字报后,立即派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童小鹏前往天安门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向红卫兵作说服工作。终于,红卫兵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从观礼台上撕了下来。

根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安排,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作检讨。刘少奇、邓小平分别在全体会上读了经过毛泽东审阅的检讨稿。

刘少奇的检讨讲了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犯了“路线错误”;二是历史上“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其中比较具体地讲了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提示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三是“犯错误的原因”。刘少奇在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922页、922—9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讨时,尽力按照毛泽东的批评,“对照检查自己的错误”,并为此承担了一切责任。

邓小平也作了违心的检查。邓小平在检讨自己“错误”的同时,为了不想让这场批判祸及他人,极力担当“错误”的责任。邓小平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刘少奇和他两个人。邓小平说,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工作组人员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负担,而应由他和刘少奇负担。

第二天,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听取各小组召集人的汇报后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①

当康生插话说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共八大所作的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思想时,毛泽东说,“我们都看了的嘛,大会通过了的,不能单由刘、邓负责。”^②

毛泽东此时仍没有同意对刘少奇、邓小平采取贴大字报等做法。毛泽东还鼓励到会的各地负责人,要振作精神。毛泽东还表示,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下卷,第10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1966年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全体会议,由毛泽东、林彪讲话。

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时“高度评价”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在讲话中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搞臭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还挖出了很多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确实是触及到了人们的灵魂。

林彪在讲话中还多次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林彪说,刘少奇、邓小平“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泽东的路线“相反”。“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由刘少奇、邓小平发起的”。

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时,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即聂元梓等人写的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编者注);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①

毛泽东在讲话时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给予了肯定和支持,但他没有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认为“路线错误”改了就好,中央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毛泽东说:

“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

^①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1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上海发表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①

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周恩来、陶铸等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后，多次出面制止红卫兵对刘少奇、邓小平采取过火行为。

10月13日，周恩来坚决拒绝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到该校接受批判的要求。之后，周恩来接见在天安门张贴标语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派。

周恩来在回答造反派提问时说：“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没有权利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你们把标语贴到天安门，外国人就会怀疑我们是发动群

^①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144页、147页、1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众,制造舆论。少奇同志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去发动群众。”^①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得知中央组织部机关内贴出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后,立即赶去制止,要求把这些大字报取下来。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在全体大会上讲话时,对有关具体政策规定作了解释。

周恩来说,北京师生近期不能外出串连,以腾出运输力量让在北京的外地学生回去,红卫兵一般限制在学校中30岁以下的革命青少年,农村、城市、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不发展,不组织,不对外串连。军队、公安、法院、监狱、新华社、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必须高度集中,要控制在党的手上,不能让红卫兵去占领。对党政各级领导,红卫兵有权要他们到现场解释问题,检讨承认错误,但无权决定停职反省或罢官,也不应该扣人、抄家,也不要打人、体罚。

周恩来还要求与会者要向红卫兵把政策讲清楚。

周恩来指出,不能把“四清”工作队和派驻的工作组统一看待;要赶快从工作组的问题中解脱,搞好自己的工作。

10月29日,国家经委一些人贴出了题为《薄一波究竟是什么人?陶鲁笳为什么要包庇他》的大字报。

11月3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六次接见全国各地到北京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代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9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在这次接见前,周恩来曾召集北京市各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开会,要求北京师生和红卫兵不参加天安门检阅;要帮助解放军和其他组织作好宣传,要做好工作,维护好秩序;外地师生受检阅后,要劝他们回本地去,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邓小平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参加了接见。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动同刘少奇交谈,问候了刘少奇家人的情况。

在交谈中,刘少奇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

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了。”

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对刘少奇、邓小平不能否定一切,他们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另一方面,毛泽东仍旧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同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把“文化大革命”深入下去。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在会上的讲话被“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林彪的讲话也大量印发。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原本不向群众传达,由于陈伯达在讲话中已全文引用而等于公开发表。这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迅速在全国掀起。

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发到县团级,下发时却略去了毛泽东的批语。两人的检讨很快被扩散到社会上,成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靶子”。此后,刘少奇、邓小平不再参与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

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发《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如火上加油，使造反行动更为激烈。

红卫兵运动兴起的造反浪潮，被引向各级领导机关。他们顺藤摸瓜，沿着派工作组的线索冲击上级领导机关，对阻止他们过激行为的各级领导，都统统视为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与此同时，红卫兵还把追查“黑材料”、要求领导干部认错和检讨，作为冲击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内容。各省区的领导机关先后被冲击。各部委机关也被所属院校的红卫兵冲击。“火烧”、“炮打”、“罢官”之风遍及全国。各级领导部门先后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开展，档案制度暂停，“文化大革命”初期所整的材料作废，使广大群众解除了对记下材料、“秋后算账”的担心。原来对“文化大革命”顾虑重重，因家庭出身被排斥的大批学生也都投入了运动。

人们按照观点的异同，自主地参加和组织红卫兵，出现了山头林立的局面。原来由工作组扶植起来的，有保工作组和领导干部倾向的红卫兵组织，作为“资产阶级保皇派”而被冲垮；有“血统论”倾向的红卫兵也为群众反感；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也被批判为执行了“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而相继结束使命。

与原多数派红卫兵陷入瓦解的情况相对照，原少数派红卫兵因“大方向正确”，没有浓厚的血缘色彩，坚持“矛头向

上”和批判“特权阶层”，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队伍发展得快。最早投入“文化大革命”的“老红卫兵”，则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冷落。

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澜向各个角落铺天盖地地涌起。凡是对“文化大革命”持怀疑或消极态度的干部，曾经挺身而出保卫过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大都受到批判或揪斗。没有参加造反派的党团员也都受到鄙视，被造反派称为“修”字号的党团员。

还没等到中央工作会议结束，10月19日，东北三省造反派就在北京举行了“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10月20日，长春市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在长春市体育馆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这个大会，矛头指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吉林一大学的造反派，为了“彻底揭开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公然进驻省委机关；另一派300多人也乘汽车赶到省委机关。两派因观点不同，争抢广播喇叭，破坏广播线路。10月29日，为了“揪出省委内的走资派”，吉林师大的造反派又派出两个“战斗队”，分别进驻省委和长春市委机关，同那里的造反派“并肩战斗”。

10月30日，长春某学院200多名学生冲进省委机关主楼，砸了省委“文革”办公室，抢走一些材料，强行带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省委机关被搞得一片混乱，再没有一间平静的办公室，再没有一张安稳的办公桌。

这样，省委书记处的书记们和他们的办事机构——常委

办公室从10月30日起不得不转入“地下”。(至1967年1月25日被造反派“一网打尽”为止,办公地点,就转移了7次——编者注)

吉林省委于1966年11月5日至21日召开了3级干部会,传达中共中央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还讨论了《中共吉林省委员会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讨论稿)》。吉林省委准备在会议结束后,向全省人民公开作“自我批评”。

吉林省委力图委曲求全,稳定局势。但这次会议本身实际上就是向省委进行冲击的动员令,因而受到部分与会者的抵制。小组会上,常常无人发言。有人吟诗一首“满怀心腹事,竟在无言中”,表达了此时的情景。

会议期间,吉林省委书记处的领导不断被人揪走,长时间地挨批斗。有一次,半天之内竟有3位书记被揪走。

11月17日,代理第一书记赵林正在讲话时就被人揪走。这一天,又发生了震动全省的“一一·一七”事件。冲进吉林省委的造反派不听劝阻,以向省委索取“黑材料”为名,冲入省委办公大楼,严密封锁入口和通道,强行打开档案库房,夺走党和国家机要文件278份。

3级干部会后,吉林省委召开群众大会,向全省人民检讨“错误”——实际上就是在运动初期执行了“中央八条”规定。原定代表省委作检讨的、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阮泊生,一入场就被学生架走。会议不得不临时指定别人代读省委的“检查”材料。

在群众大会上,吉林省委不得不承认贯彻执行了“实行

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同年12月，吉林省委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市、地、县委书记和主管农业的书记，共100人左右。会议地点定在长春站前国际旅行社（今春宜宾馆——编者注）。

由于吉林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的消息和开会地点被泄露，当参加会议的人员报到以后，会议即将召开时，造反派们要冲击会议。与会人员不得不在数九寒天的冬夜转移。吉林省委于当天半夜12点多用两辆大客车，将参加会议的同志全部转移到德惠。

会议开了两天。在这期间，不仅城市，就是农村，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地、县委书记们感到工作很难开展，会议精神一经传达，局面将不堪设想。

12月20日，吉林省某“造反军”的一些人和长春市一个工厂的“战斗兵团”，公然闯入赵林的家，把赵林从家中揪走。次日，造反派查抄了赵林的家，并且搞了一个“反修展览馆”。

12月26日，造反派在长春市体育馆召开大会，批斗了赵林，还搞了“喷气式”、挂了大牌子。

两天后，长春市的一部分工人、学生和来自吉林、四平、辽源、延吉、德惠、农安等地区100多个单位1200多个造反组织，动用了200多辆汽车，在全市游斗了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

12月29日，造反派将赵林和他的秘书陈启弟揪到吉林市。3天后，造反派又将赵林等揪到桦甸县，后又辗转经哈尔滨、白城等地，将赵林押往北京。

在造反派的冲击和纠缠下，吉林省委难以招架，就这样被

造反派搞垮了。

同时,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党委也相继被冲击而瘫痪。

《快报》说,1966年12月4日,天津市委书记、市长胡昭衡对记者说:“现在书记处领导很困难,谈不上核心不核心的问题,只是唱‘空城计’,都是‘老弱残兵’,勉强守摊子。”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天津市委领导干部根本没有坐下来很好学习。领导层的思想很乱,有许多工作推不动,是处于应付状态。胡昭衡表示,他打算坚持一月半月,等中央派人去加强领导。他只是尽量维持现状,不再“犯错误”。这还是天津12月初的情况。不久,《工业十条》、《农村十条》下达后,天津市委完全瘫痪。

黑龙江省仅半年时间,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构全部陷于瘫痪,大、中、小学全部停课,一部分工矿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不久,时任华东局书记的魏文伯向周恩来汇报时说,华东各省、市的造反派在上海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到会的有三四万人。上海“工总司”的潘国平主持了会议。

潘国平在大会上的发言中说,福建对准叶飞,江苏对准江渭清,山东对准谭启龙,安徽对准李葆华,浙江对准江华、陈冰,江西对准方志纯、黄知真。潘国平还在会上表示,请张春桥回上海代理陈丕显的工作。

陈丕显请魏文伯转报周恩来,上海“革命群众”的口号是:“炮轰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还要求把石西民抓回去。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结果，就是各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瘫痪或濒于瘫痪。

与此同时，军队院校和某些机关中的一些造反派相互串连、勾结，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在北京，军事领导机关连续遭到冲击，军队领导干部不断地被揪斗。军事院校的学生纷纷到北京串连，多的时候将近20万人。有些人到北京就是为了造反，为了揪人。被揪的人职务越高，揪人的造反派名声越大。

10月下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些学生到北京三座门，冲国防科委，揪斗曾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过工作组组长的、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路扬。学生们在陈伯达的支持下，冲进国防科委大楼，一直冲到大楼顶层。

11月，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的一些学生，因反对总参的李天佑、王新亭曾在该院的讲话，特地赶到北京，在国防部大楼前面静坐，多次劝说无效。11月3日，600多人冲向国防部办公大楼。两个营的战士在那里警戒。国防部里面、外面都有战士手牵手阻挡学生。而学生打破玻璃，搭上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头上，踩着“人桥”冲进了大楼。

这类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11月间在北京发生了多起。

由于军队受到了很大冲击，战备训练受到了影响。11月6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根据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的指示，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用以制止学生冲击军事机关。这个《通

知》要求军队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

《通知》指出,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在完成战备任务中担负着重要责任,因而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指挥必须得到保证,不能中断。未经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对于军事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

林彪看后,把这个《通知》转送“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将其扣压。

为了控制由于林彪下令炮制的《紧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先后起草过5份电报,但都被陈伯达扣压了。

11月7日,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谭厚兰等200余人,在戚本禹的唆使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誓师捣毁“孔家店”。

11月9日,200余人到达山东曲阜。他们以“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名义,冲破山东省委、曲阜县委和孔庙管理处的阻拦,串连当地一些学校的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并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的万人大会,砸毁国务院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发出了给国务院的“抗议信”。

从11月9日到12月7日,谭厚兰等人捣庙、砸碑、挖坟、烧像、毁书,共破坏文物6618件。同时,谭厚兰多次围攻和揪斗省、地、县委领导干部,押他们陪孔子塑像游街,“为孔老二送丧”。

与此同时,11月8日,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贴出了题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大字报颠倒是非地说,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

大字报还说,早在1956年,邓小平在他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大反所谓“个人崇拜”。大字报指责说,邓小平在团中央的一次会上,“公开鼓吹”在农村恢复单干,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老鼠的就是好猫。”

大字报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曾对“文化大革命”作了这样的描绘:“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演戏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

大字报还说,彭真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罪魁祸首”。彭真只是“一帅”,“帅上还有一帅”。这就是“彭真后台之一邓小平”。

11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第七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代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参加接见的一些中央和其他方面负责人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第二天,毛泽东又接见这些“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代表。这一次,毛泽东共接见了“革命师生”和红卫兵200多万人。半个月之后,毛泽东等第八次接见了外地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代表。

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里,

毛泽东先后 8 次接见了外地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代表共达 1100 多万人。这极大地推动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也是“红卫兵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标志。

随着各级干部被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不断升级,造反内容不断深化,《十六条》关于工矿、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限制也被突破。“中央文革小组”私下支持学生到工厂、农村串连、造反。

到 1966 年 11 月上旬,从中央到地方,生产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被卷入运动,部分企业领导班子瘫痪,厂矿停工、停产时有发生。在学生运动的带动下,一些城市和工厂出现了“战斗队”组织。

11 月 9 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市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在首都红卫兵的帮助下,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

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的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对“工总司”没有给予支持和承认。上海市委的态度,被王洪文等人诬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

11 月 10 日凌晨,王洪文带领 2000 多人聚集到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准备强行登车,赴京“请愿”。当上海市委派人劝阻时,王洪文便煽动工人卧轨断路,列车行至安亭站被阻留,致使沪宁线交通中断 30 多个小时。上海站 36 趟列车不能发出,近百趟客货列车不能进站而被迫停留在沿线各站。

王洪文等人的行动严重影响了铁路运输和生产。

后来,这一事件被称为“安亭事件”。

周恩来获悉后,要陈伯达电告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的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同时,周恩来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的行动不但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周恩来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有问题回去后解决。

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派时任副组长的张春桥赴上海解决“安亭事件”。

张春桥背着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擅自签字承认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是“革命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活动是“革命行动”,让上海市委向群众公开检查“错误”。事后,“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批准了张春桥的处理和表态。

“工总司”的成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此,江青等人更加放肆地煽动工人“造反”。“安亭事件”开始了在全国由产业工人组织“造反”和“串连”、工矿企业“停产闹革命”,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混乱进一步升级的运动。全国局势进一步恶化。

这时,早就对周恩来、陶铸等心存不满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开始动作。11月13日,陈伯达拿出一份由“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白写有“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这就等于规定工交企业也像学校一样闹“革命”,大大小小的“安亭事件”将层出不穷。

不久,中共中央召开了冬季工交座谈会。周恩来等人在会上竭力阻止把工交企业全盘搞乱,但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江青、张春桥等人支持和煽动下,“工总司”和上海红卫兵组织于11月27日成立“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编者注)。

“红革会”要求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代为发行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九期《红卫战报》(红卫兵报刊的一种——编者注),而且要与《解放日报》一道发行,以便“消毒”。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根据上海市委的指示,拒绝了“红革会”的这一要求。

11月30日,红卫兵进驻解放日报社,不准《解放日报》发行。12月2日,“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派进驻解放日报社,成为造反的主力。解放日报社门口和周围被围得水泄不通。

上海人民反对这种做法,约50万人去解放日报社附近,呼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

迫于形势,上海市委签字同意了“红革会”和“工总司”的要求。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解放日报》事件”。这个事件是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人率造反派组织制造的,围攻时间持续了9天9夜。

12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林彪主持。会上,林彪、康生、陈伯达、王力等在听完工交座谈会的情况汇报后,对根据周恩来指示写的《关于工矿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进行指责和批判,说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地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林彪在会上说,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林彪还说,刘少奇、邓小平“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且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

林彪并在会上宣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林彪表示,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为的是要“改变社会面貌”。

会议最后一天,林彪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同意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林彪说,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陶铸被迫在会上作“检查”。刘少奇也在发言中被迫作了检讨。

12月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其主要内容是:

一、坚持实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

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三、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有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

四、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

产定额。

五、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

六、由工人群众认真讨论,健全或者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这个班子,对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担负责任。

七、有问题,要在本单位协商解决。必要的时候,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到上级机关(包括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中央局)反映,特别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派少数代表来京反映,不要大批离开厂矿。

八、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许厂矿领导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准因此克扣工资,不许开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工人,必须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进行威胁迫害。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大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

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

本单位或本地方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

一切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劳动朴素

的本色，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十、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

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交流革命经验，还可以有计划地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

一切革命串连，都不要包办代替，强行干涉其他单位的文化革命。^①

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个部门的基层单位。

12月15日，经毛泽东批准，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林彪指责主张农村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派工作组是“同一个精神，都是不相信群众”。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这个《指示（草案）》。

^① 《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376—37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指示(草案)》中说,坚决执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狠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按照《十六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指示(草案)》强调,必须是群众当家作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一般不派工作队。

《指示(草案)》中说,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同时,“四清”运动也被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四清”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点是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的问题。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文化大革命”也要纠正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贯彻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

《指示(草案)》中强调,在农村“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逐步做到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

《指示(草案)》中规定,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如不称职,可以随时改选或撤换。经过群众讨论,健全或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负责生产分配、收购、供应工作。

《指示(草案)》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在农村中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

职务。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连。要像土改那样,采取回避政策。

《指示(草案)》还指出,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空闲时间,进行串连”。同时,这些单位之间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但不要包办代替。在斗争中,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还要防止坏人挑起宗派斗争。

《指示(草案)》规定,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扣工分。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等的“革命群众”,应当平反。“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的对象”,绝不允许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绝不允许他们“造贫下中农的反”。

《指示(草案)》还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次年暑假。半农半读大中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应当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安排。农村小学的“文化大革命”和所在社、队一起搞,由所在社、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

《指示(草案)》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这个文件的下达,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扩大到广大农村。

中共中央先后下发陈伯达等起草的在工矿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使“文化大革命”合法地进入工交、财贸、农业、科研等领域，“停产闹革命”一时风行全国。

在上海，“《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与“工总司”对立的另一个造反派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编者注）因反对“工总司”进驻解放日报社而被骂为“保皇派”。“赤卫队”万余人于12月28日开进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处静坐，要求陈丕显、曹荻秋出面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大方向是对的”。

张春桥密令“工总司”与以徐景贤等人为头头的“上海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采取行动，瓦解“赤卫队”。

根据徐景贤和“工总司”头头耿金章等人的决定，宣传车到处散布“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的谣言，蛊惑群众。

尔后，根据耿金章与聂元梓的“代表”孙蓬一等人的决定，“工总司”工人造反队员于12月30日凌晨两时开始向“赤卫队”冲击，大打出手，打伤91人，在全国开了大规模武斗的先例。“工总司”将“赤卫队”打垮后，又于12月31日抓了“赤卫队”的全部负责人。

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康平路武斗事件”。这一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工厂、农村掀起，全国一部分合同

工、临时工最先“造反”，刮起了一股“经济主义歪风”。

1966年11月8日，由极少数合同工、临时工凑合起来的全国性工人造反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编者注）在北京成立，以王振海为头头。从12月1日起，“全红总”纠集数百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造反，提出很多不合理的经济要求。

12月18日，江青在接见北京院校造反派代表时说，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江青说，全总干部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们到全国总工会大楼里去住，将全总干部赶出去。江青还煽动说，合同工这个东西，随时可以解雇，是“资本主义的一套”。

与此同时，林彪12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使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大大升级。江青公开鼓动打倒刘少奇。张春桥把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叫到中南海密谈，布置进一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具体措施。

张春桥对蒯大富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始终“没有投降”，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12月25日，清华大学5000多名师生，示威游行到天安门，召开了一场“彻底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誓师大会。蒯大富等人以两辆广播车为先导，高音喇叭一路狂叫“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并把同类内容的“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以及“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大字报贴在天安门城楼及西单、王府井、北京站等主要街道的建筑物上。

蒯大富等人的这一煽动活动持续多日。“打倒国家主席”，就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这个“一二·二五大行动”，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的运动推向了社会。

两天后，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等造反派头头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诬蔑和攻击刘少奇、邓小平。从此，各地造反派纷纷呼应。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狂潮。

12月26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红总”代表。江青对“全红总”的造反派表示支持。江青说，合同工制度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封建主义也不能比这个制度残酷”。江青煽动合同工“要革命”。

姚文元在这次接见会上说，“非造这个反不可”。康生也说，制定合同工制度的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要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个夺权的大问题”。

“全红总”的造反派代表声称，他们全部查封了劳动部及其所属单位，已向全国各地分团发电，全部查封劳动调配部门，并决定第二天查封全国总工会。

对此，江青表示赞成。江青对造反派代表说：“封得好，我赞扬你们。”江青并且当场口授了一个支持合同工、临时工造反的通知。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的社论。社论称在工矿企业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搞不可，非大搞特搞不

可”。社论还说,工人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阶级应该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串连。

1967年1月2日,“全红总”、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联合通告》,作出以下紧急决定:第一,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第二,1966年6月1日起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劳动,参加生产,并补发其解雇期间的工资。第三,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

这3条基本上就是江青1966年12月26日接见“全红总”代表时口授的3条。

江青支持“全红总”造反派占领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命令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把“全红总”成员当做“毛主席的客人”。《联合通告》发出后,“经济主义歪风”愈演愈烈。

对在许多地方刮起了以闹转正、闹晋级、闹福利待遇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主义歪风”,中共中央于1967年1月11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立即制止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通知》提出:

一、一切革命群众都要提高警惕,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说服少数被蒙蔽的群众,揭露一小撮党内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阴谋诡计,保护国家财产、保护集体财产,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遵循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前进。

二、在经济问题上,过去有些不合理的东西,中央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调查研究,吸收群众的合理意见,提出解决的办法。在中央没有提出新的办法以前,暂不变动。

三、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四、中央责成各级银行,不论是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是集体经济单位,所有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支出,都要一律拒绝支付。

五、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合作商店等等,现在都不要改变为国家所有制。^①

这个《通知》的发出,基本上刹住了“经济主义歪风”。同时,中共中央还下发了《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和《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

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宣布,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

^①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38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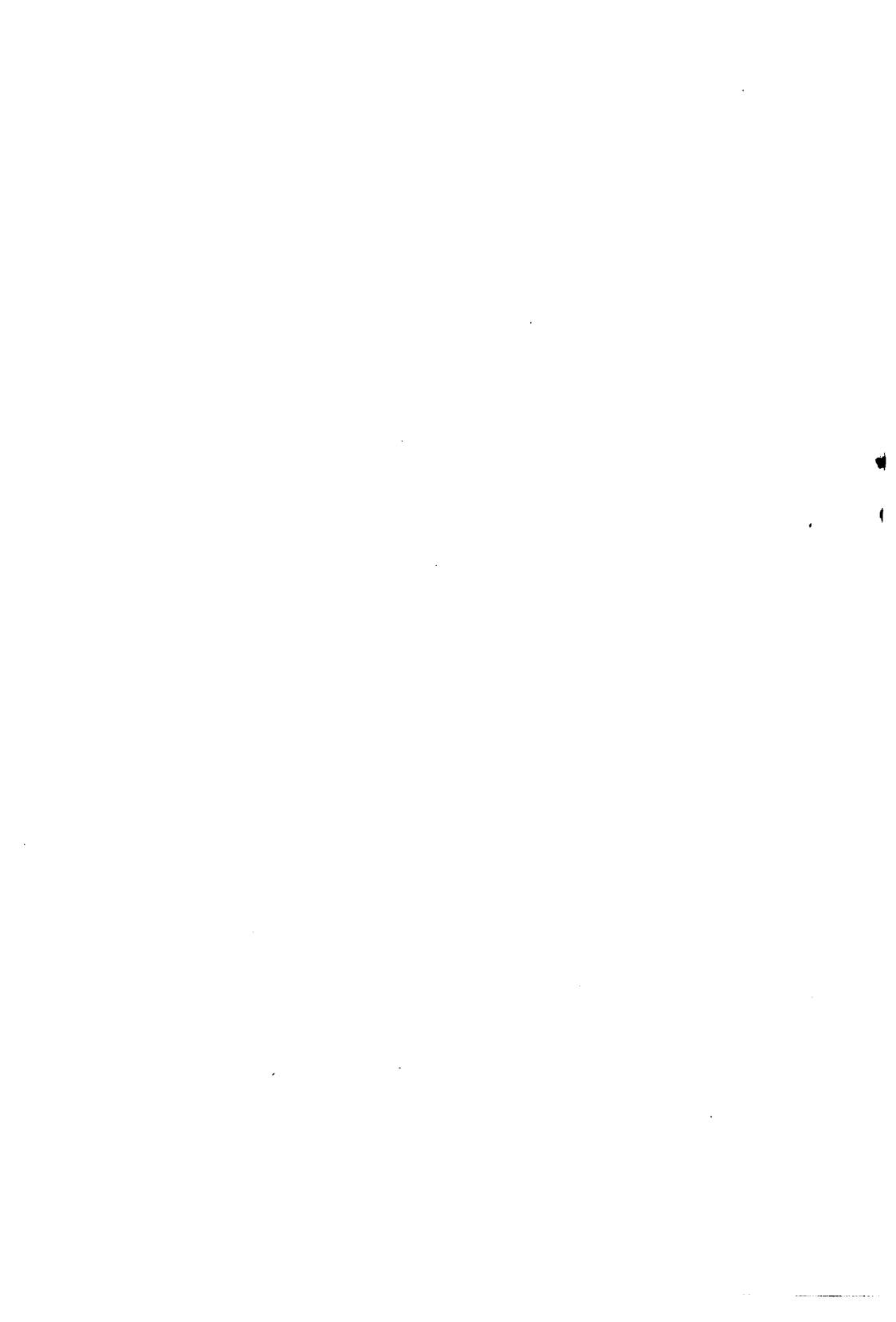
消。此前,即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宣布,“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1967年1月2日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当予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

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也是值得后人认真总结的,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后来,党史专家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指出: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这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地兴起。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代表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1966年10月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便在全国掀起”,“社会因而不断陷于动乱之中。10月初中央转发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更加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狂潮的泛滥。”“用中央名义发出在工业交通系统和在农村进行‘文化大革

命’的两个文件(简称工业十条和农业十条),改变了运动只限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原定部署,要求把它扩展到工厂农村,这是造成全国大动乱的又一个严重步骤。”^①

^①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29页、429—430页、430页、43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



第三章 横槊浪头

对全面内乱制止的努力

“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 陈毅拒绝当“红卫兵司令” 周恩来组织成立“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 《工厂六条》和《农村五条》出台 《人民日报》发表“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各方面的抵制 陈毅准备挥戈上阵 《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周恩来策划筹备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 两个“十万人大会”召开 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叶剑英等力保稳住军队 《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出台 毛泽东想把红卫兵从社会拉回学校 中共中央要求“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 军队奉命实行“三军两支”

“红卫兵运动”的掀起、大串连的开始，给工农业生产很大的冲击。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这时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力图在一定范围内限制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

此时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和陈毅、贺龙、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一致认为“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他们认为，只要军队不乱，就能保住天下。为此，他们采取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措施和规定。

1966年5月25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军队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对于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要着重进行正面教育。《通知》还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应由各大单位党委批准。

6月14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的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请示报告》规定，各大单位党委要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大革命”，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

《请示报告》还规定，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声讨大会。《请示报告》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同一天，叶剑英

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委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中央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中央军委的集体领导。

第二天,中共中央在《请示报告》上批示说,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高度的戒备和集中统一。中共中央并于当天转发了这个《请示报告》。

6月21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要求各军事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也就是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不久,解放军总政治部还将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制在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

中央军委还不断地召开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会议强调指出,军队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要等到运动后期处理。不允许军队任何人员不经过批准查阅中央军委和总部机关的档案。中央军委特别强调,对此要严格控制。

9月1日,在叶剑英主持、徐向前和聂荣臻等人参加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在汇报驻京部队各大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时,说部队中不准组织红卫兵,师以上部队及军以上机关的警卫、通信部队统统搞正面教育,不准地方到部队串连,也不准部队到地方串连,更不让地方群众和红卫兵到部队营房搜查。

萧华强调,如果发现有人企图煽动部队搞武斗,各级党委

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并立即上报。

萧华讲话的总的精神是要保持部队的稳定。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表示完全同意。

9月3日,经叶剑英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9月23日,中央军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会议提出,各大军区的工作重点应转向抓好部队工作,保证部队正常秩序。

由于及时采取了以上这些措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军队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党委又领导设立了“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具体掌管“文化大革命”运动。并且,军队的“四大”被限定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和单位开展。因而,军队基本上保持了总体局面的稳定。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还派出联系小组出席海军、空军党委扩大会议,并交代联络员“只带耳朵,不带嘴巴”,进行大量调查。当联络员发现林彪暗中指使时任海军副司令的李作鹏等人搞派性,制造混乱,妄图夺取海军领导权时,叶剑英立即报告刘少奇、邓小平。

随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召开常务联席会议,对海军问题作了专题研究。叶剑英根据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的指示,亲自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针对李作鹏等人诬蔑时任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等人是“黑帮分子”的做法,明确指出,萧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

搞“地下活动”，要分清是非，搞好团结。

叶剑英并且在讲话中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对于这件事情，萧劲光后来这样回忆：

“在军队内部，总政治部的《关于军队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通知》已经下发。尽管我们当时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究竟怎样搞并不明确，但这时召开的海军党委‘三·三’会议（即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体会议——编者注），却已经不能不受到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影响了。”“六月六日（即1966年6月6日——编者注），全会传达了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精神，根据中央和军委的部署，中央领导在预备会上所讲的海军问题和空军问题就没有传达。”“事后我才知道，早在‘三·二’会议（即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编者注）尚未结束，李作鹏参加上海会议回京以后，已经召集了党委部分常委和各舰队的主要负责同志，就上海会议批罗瑞卿的主要内容和李作鹏等联名写信给林彪的问题吹了风。而且，在这一段会议期间，张秀川（时任海军政治部主任——编者注）背着多数常委，会外开会，找了若干同志谈话，散布肖（即萧劲光——编者注）、苏（即苏振华——编者注）问题严重，跟罗（即罗瑞卿——编者注）跟得紧，海军争论问题是路线问题，甚至违反会前党委不扯团结问题的决议，说‘团结问题一定要扯，杀头也要扯。’”“他们搞地下活动，操纵着

会议,却借下边的同志之口,给中央和军委写报告,要求扩大传达范围。”“李作鹏等的这些活动受到一定的节制,但他们并不死心,仍四处收集材料,散布‘这次会议最主要、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是肖、苏与罗瑞卿的关系问题’,‘要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解决问题’,引导会议搞海军中的‘罗瑞卿分子’。”“在这种有意识的引导下,会议便以重炮对着我和苏振华,批判我们在海军执行罗瑞卿路线。以后批判的热度越来越高”。“七月二日,有三个小组提出肖、苏是批判重点,要王宏坤出来领导会议。这个情况也被登在了简报上。”^①

叶剑英还亲自打电话给时任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的何廷一,告诉他“不要卷进去”,要站稳立场。叶剑英等人及时采取了相应措施,从而有效地抵制了林彪等人夺取海军、空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比起军队相对稳定的情况来说,地方情况就十分混乱了。

早在1966年六七月间,全国开始大乱,各级党委受到冲击,大半冲垮或处于瘫痪状况。此时的外交部党委却始终行使着领导权。机关坚持工作岗位,业余时间搞运动,保证了国家外事活动的顺利进行。

然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外事口所辖大专院

^① 《萧劲光回忆录(续集)》,第256—257页、257页、257—258页、258页、2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2月版。

校的学生冲垮校党委,哄赶工作组,并计划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揪走资派”,以造成国际影响。

对“中央文革小组”幕后挑唆学生、企图制造国际事端的阴谋活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非常恼火。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陈毅义正辞严地说,既然中央把召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任务交给他,他就不怕负这个责,谁要是冲击大会,就是“现行反革命”,他绝不会客气的。随即,陈毅在周恩来的布置下,采取了有力的预防措施,保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京顺利举行。

此时,包头钢铁厂从苏联进口了一批机器,拆箱时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坏的,中方要求退换。苏方决定派出4名专家到包头作技术鉴定,然后再作定论。苏联专家一到包头钢铁厂,就被造反派包围。造反派们还精制了高帽子,准备拉“苏修”专家在全厂批判游斗。一个普通的外贸交涉随时可能变成加剧中苏两国紧张关系的导火索。

这一情况迅速被报告到外交部办公室,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亲自给包头钢铁厂挂电话。钢铁厂厂长去贯彻外交部“不准许把国内斗争方式用以对外”的指示。不料,造反派不但不听,反把厂长也“架了飞机”批斗。最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整整花了一个下午,才说服造反派。

8月24日,在外交部红卫兵成立大会上,造反派提议要陈毅当“红卫兵司令”。陈毅表示他不搞个人迷信,并提醒造反派,学习毛泽东著作不要空喊口号。陈毅还派人赶到干部宿舍,制止外交部造反派的抄家行动。事后,陈毅本人又亲自找造反派谈话,对他们进行劝导,使造反派又“恢复了对陈毅

的信任”。

在9月下旬召开的国务院总结会上,外事口汇报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陈毅亲自动员群众给领导,首先给他自己贴大字报,帮助领导“洗澡下楼”。外事口各部门党组成员,包括陈毅,都在一定范围内以不泄露外事机密为原则作了自我批评,进行了一次“思想革命”。经过群众运动“洗澡下楼”,外事系统各级领导全部“过关”,真正被打倒的一个也没有。

与此同时,国务院也不同程度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抵制和制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等,根据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的指示精神,于1966年8月份拟定了国务院8个口(外交、文教、科学3个口除外——编者注)机关“文化大革命”的10条意见稿。

这10条意见的主要精神是: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要保护国家机密;对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既要放手让群众敢于革命,又要让群众学会善于革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等。

周恩来认为这10条意见很好。周恩来在意见稿一旁批注,这10条意见同样适用于外事、文教、科学3个口,并批转陈伯达送林彪、毛泽东核阅,建议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但毛泽东不同意批发这10条意见。毛泽东在8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一条也不要,何必10条,有《十六条》嘛。”

从8月下旬起,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国大大小小的城

市街巷里，到处出现一队队“破旧立新”的红卫兵。与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相伴而行的是无政府主义泛滥造成的恶果。多处名胜古迹被捣毁或破坏；许多中国文化遗产被洗劫或废弃；肆意冲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人士住宅，没收和毁坏私人财物的情况比比皆是；对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乃至基层领导干部、普通教师进行人格侮辱、任意打骂或绑架关押的行为随处可见。甚至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因不堪受辱而选择了绝路，许多被称为“黑五类”的人员或被打致死，或被强迫遣送回乡。

针对“破四旧”当中接连发生的一些影响面大、严重违反党和国家政策、法律、制度方面的问题，国务院领导人深感有必要就这些问题对红卫兵的运动进行正确引导。8月下旬，周恩来曾两次主持审定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但由于受到种种限制，这些规定没有能够下发。

鉴于红卫兵的活动有着很大的自发性、分散性和随意性，周恩来考虑，需要先把各种红卫兵组织起来，才便于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引导的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北京新市委决定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内成立“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总站工作由时任北京新市委书记的雍文涛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联络总站设有办公室，由时任国务院办公室主任的周荣鑫负总责。

8月26日，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时对红卫兵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关心你们，党和国家有责任帮助你们，应该为你们创造条件，让你们组织起来，有事好和你们商量。”

周恩来还说,通过联络站,可以把红卫兵的意见收集起来,将马上能办的以及以后要办的事情作个统计,商定好后再送给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周恩来还建议在各区成立分设的联络站。周恩来指出,联络站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和保护红卫兵,宣传、解释党的政策。

两天后,周恩来通过联络渠道得知,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倡议,要将苏联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并准备在8月29日举行20万人的命名大会和大规模的庆祝游行。

为了避免发生涉外纠纷,周恩来在8月29日凌晨召集紧急会议,劝说红卫兵。周恩来向红卫兵说明,“反修”斗争是靠文斗不是武斗。周恩来指出,可以将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但不能把“反修”的大字报贴到苏联大使馆或大使馆的墙上,不能闯进苏联大使馆。

经过反复说明,大会组织者终于同意按照周恩来提出的意见办。会后,周恩来又吩咐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派出700名徒手解放军战士到大会现场值勤,防止红卫兵冲砸苏联大使馆。

从8月29日起,群众游行举行了两天,共达40万人次,没有发生意外事件。

从8月下旬起,红卫兵以首都北京为中心进行全国性的大串连,一步步把“红卫兵运动”推向新的高潮。鉴于北京红卫兵“破四旧”中已经发生的种种情况,国务院考虑到全国各地在“造反”中将要发生的严重问题,于是决定由中共中央下达一份文件,对全国红卫兵的行动加以指导和约束。

8月底9月初,周恩来亲自起草《关于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包括10条内容。《意见(未定稿)》强调,最急迫的任务是将红卫兵组织起来,学习和掌握政策。不能让红卫兵各自为战,违反纪律。

《意见(未定稿)》要求在全国各地串连的红卫兵实行“革命串连”时,要保障党和国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和宣传工具等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危害,机密不致外泄,档案不致遗失,财产不受损失;要保证国家的专政工具正常行使职能;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要保证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活动不受影响。

《意见(未定稿)》还提醒红卫兵在同厂矿、科研机关和服务性行业实行“革命串连”时,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的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事业不致中断。

《意见(未定稿)》还就红卫兵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等作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

周恩来在对《意见(未定稿)》作了最后修改后,召集陶铸、康生、李富春、谢富治、陈毅、杨成武、吴德、江青、王任重、张春桥、刘志坚、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开会讨论。会上,陶铸、陈毅、王任重等明确表示赞成。康生、姚文元等持否定态度。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反对,这个《意见》最终没有发出。

尽管周恩来起草的《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没被通过,但公安部党组织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制定的《关于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和群众关系的四个问题》，却被中共中央转发。

这个文件强调：“（一）学生和群众不要进入公安机关揪斗黑帮，不要冲击派出所。（二）公安机关的机密不能向群众公布。（三）革命群众不要到监狱、看守所去惩罚犯人。（四）公安机关的一些不合理规章制度要改革，但涉及全国范围的，需要统筹研究。”^①

为了保障边境安全，周恩来、陶铸、李富春、叶剑英、陈毅等人在中央碰头会（即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编者注）上，研究决定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并告西北局发特急电。电报指出，中央决定伊犁、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不要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

电报还指出，党委要劝阻外地学生进入边境地区串连；对已去的学生应动员他们离开。新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加强维吾尔族、汉族等民族的团结。会后，电报被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批准照发。

为了制止造反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关于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被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

这个《规定》提出，中央局书记，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省长、中央各部部长、第一副部长或常务副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长,国务院办公室主任或第一副主任,委员会主任、部长或第一副部长,党组(委)书记或副书记的任免,由中央常委会直接审定,或由常委碰头会提出,报毛泽东、林彪审批;党和政府系统的司局级干部,由常委碰头会提出,指定常委中由陶铸审批;大军区、军兵种和3个总部军政一二把手的任免,都要呈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由北京发起的“红卫兵运动”,把“革命”迅速推向社会,以千万人计的大串连造成全国铁路运输紧张,生产秩序被严重打乱,营业生产开始受到冲击。为此,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起草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

这篇社论发表在9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社论提出革命和生产要两不误。社论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要加强领导,广大工人、社员和科技人员及其他劳动者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学生不要到农村和工厂去干预那里的革命和生产。

这个社论的主要精神就是,在进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要推动其他两大革命,即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社论号召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应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从9月10日起,派人民解放军不带武器,协助铁路维护联运列车、联运车厢和停车站的秩序。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辩论大会上,亲自宣讲了这篇社论中的观点。周恩来提出,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要实验放在一边。周恩来说,“凭我自己的

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不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重要的业务受到影响。”

于是,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即《工厂六条》——编者)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即《农村五条》——编者注)。这两个文件要求各个生产地区和业务部门,应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坚守岗位,保证本单位革命和生产的正常进行,学生、红卫兵不要进入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去串连。

当周恩来将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文件及附件报送毛泽东,建议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一次、议定政策时,毛泽东考虑到事情很急,于是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9月14日,这两个文件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并受到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中提出的5条包括:

一、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

二、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

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城市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也应动员下乡,有组织地到农村参加劳动,帮助秋收。

三、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时专门安排一段时间把它搞好。这件事,也应当依靠本县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的力量去进行,必要时可由省、地委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学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下乡帮助宣传和协助行动。

四、县以下各级干部,应在本地革命群众和本单位干部的帮助下,揭发错误,批评错误,改正错误。对问题特别严重、不能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由上级党委作出决定,调动或撤销其工作。属于现行反革命分子,则依法处理。对由上级党委和政府任命的干部,均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作法。

五、县以下各级领导,有些已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恢复和加强其领导力量,把县的各项工工作全面抓起来。必须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教育,突出政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觉悟,改善领导作风,对工作要勇于负责,坚决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①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37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说,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有力地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意义极为深远。全国人民应当乘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照耀下”,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全面地、迅速地向前发展;“我们必须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

《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规定各地方、各部门,各厂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和服务行业,必须将《人民日报》9月7日《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写成大字报,在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内外张贴,并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学习讨论。

《通知》要求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和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

《通知》指出,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

《通知》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项目、国防工业项目和新

工矿区,无论已建成的或正在建设的,都是国家的机密,本单位职工更应说服其他单位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员,不能随便进入。

《通知》中说,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等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

《通知》指出,职工的“文化大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的,应由上级党委指派或商同该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责成有关人员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可以推迟进行,但必须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以利以后开展“文化大革命”。

《通知》规定,具体搞法,除派工作队已不适用外,仍按照中共中央7月2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和7月22日发出的《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中的有关措施进行安排。

《通知》强调指出,不论是中共中央直属的还是地方的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该单位领导干部需要撤换的,应由上级党委主动加以调整,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

《通知》还强调,各级生产、建设的指挥机构,必须认真负责,在抓生产、建设的同时,必须抓好质量、节约、安全等工作。特别是要抓紧原料、材料的生产、供应工作,注意做好防

火、防爆、防寒和维修等工作,保证重要设备、交通枢纽和仓库等要害部位的安全。

中共中央要求将这个文件迅速传达到中央直属和各地的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研、设计单位,并督促他们安排落实。

根据这两个文件的指示精神,9月15日,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周恩来讲课时突出地讲了生产问题。周恩来说,搞好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还说,“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

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指出,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革命学生”要尊重工农群众,信赖工农群众,相信工农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

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勤劳的品质。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是经过毛泽东审阅批注的。

同一天,《人民日报》为了配合宣传《农村五条》和《工厂六条》的精神,再发社论《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紧急呼吁:“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应当按原来的‘四清’运动部署结合进行。农村在秋收大忙的时候,可以把运动暂时停一下。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必要到工厂、农村去进行革命串联,干预那里的部署。”^①

社论还强调指出:“工人,公社社员,机关企业干部不能象大、中学校的学生那样放假,也不要到外地去进行革命串连。”^②

以上经毛泽东批准同意的社论、文件、讲话,都有正确的方面。这正确的方面,正说明毛泽东还有把运动引到正确轨道上来的思想。然而,既要“天下大乱”,既要支持造反,就不可能正确对待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问题。正是因为这样,在9月15日以后,毛泽东肯定了北航“红旗”在国防科委的造反。

因此,尽管聂荣臻早在8月23日的第五十五次中央军委常委会上指出,导弹和原子弹试验基地的任务很重,要求科研

① 《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人民日报》,1966年9月15日。

② 《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人民日报》,1966年9月15日。

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推迟进行，像师以下部队那样，只进行正面教育，但是由于江青等人不断插手科研部门，特别是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国防科委的反后，红卫兵对科研机关及机关领导干部的冲击，一直没有停止过。

9月24日，在国防科委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聂荣臻说，科委所属几所院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要多作团结工作。聂荣臻在会上讲话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机关的运动会很快告一段落，之后就会转向组织革命化，改革机关体制。因此，国防科委要作好准备，要抓革命，促生产，业务工作不能放松。同时，聂荣臻还要求科委抓好导弹工业部很多停下了的工作，保证“两弹”结合试验的顺利进行。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文，同意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建议，在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中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主要还是搞好民兵工作。

第二天，中共中央发文，同意华东局9月25日来电中所说的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能到医院进行串连、医院“文化大革命”按“四清”运动部署进行的意见。

在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领导下进行的上述各项工作，迅速缓解了从8月份支持“红卫兵运动”以后对经济生活带来的破坏性大冲击，及时地保证了农村三秋（即秋收、秋种、秋购）任务的完成。但是，三秋尚未完全完成，形势又急转直下。

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给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帽子。

本来，对于这种政治定性，中共中央内部一直有争论，一

直没有通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说法。在此之前，周恩来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召集了国务院各部、委、办党组成员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即运动已经搞得差不多了，不能老搞下去，要转入抓生产。可林彪却突然公开宣称“斗争还在继续”。言下之意，“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能结束，还要继续开展下去。

两天后，《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了《红旗》杂志第十三期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打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旗号。首当其冲遭受灭顶之灾的，是各省市市委、各部局党组的“第一”书记们。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造反派的“热烈拥护”，同时也受到各方面的抵制。只是这种抵制主要是反对斗争中的某些错误做法。这种抵制，不是以激烈的形式而是以委婉的形式出现，更多地表现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提法，根据周恩来派往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后来回忆说：“总理起初不赞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曾对刘西尧说，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开始思想是不通的，康老是赞成的，陈伯达没有经过讨论就抛出了这篇社论。”^①

10月3日，周恩来对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说：“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呢？我们、你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看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920—9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的。”

周恩来强调,对于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一分为二。犯了“路线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对兄弟民族领导干部要抱爱护态度,要体现党的民族政策。

10月6日,谢富治对北航“红旗”的红卫兵说:“你们坚持在国防科委斗争28天作得对,干得好。”

第二天,张春桥在接见福建一些学生时说:“北航要求工作组赵如璋谈谈话,到国防科委等了28天28夜,他们不谈。我们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要谈。”

对于谢富治、张春桥等人的煽动,周恩来后来在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时则说,北航“红旗”冲进了国防科委,方法不可效仿。周恩来强调,为了防止敌人乘虚而入,国防科委不能随便进入。周恩来还说,前段“错误路线”并不长,也只是在某些问题上。不能认为那一段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就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口上,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十月工作会议”。在工作会议上,一些老干部得知原以为马上要刹车的“文化大革命”又要开始大搞,特别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将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后,他们似乎觉得原以为搞一段时间就完了的“文化大革命”只是刚刚开始。为此,这些老干部在会上表明了他们反对“打倒刘少奇”的态度。

参加会议的许多老干部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毛泽东在会上批评的12个字“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造成了他们的许多被动。他们惟一的安慰和寄托,也是毛泽东的一段

话：“你们不要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是三反分子，我这个党的主席是什么呀！”

然而，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已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炮制者”，作为“黑司令部的总头目”批判了。以此画线，人人检讨，根本没有辩解的机会。在这种高压之下，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又谈何容易？各地“父母官”的心情都非常压抑。他们都感到处境危殆。

从来不“拉”华东“山头”的陈毅，这次应华东的省市第一书记们的请求宴请他们。这些人是一连串被造反派打叉叉的名字：陈丕显、江渭清、叶飞、李葆华、谭启龙等。

陈毅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伸过酒杯的老部下斟满一杯，最后为自己面前的小酒杯倒满酒，举起来同大家干杯。陈毅在这次“家宴”上的某些话是不寻常的。陈毅说：

“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那边风大，就往那边跑！”

“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施)坦。伯恩斯(施)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施)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

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见面！”^①

陈毅最后说的这番话，分明是与即将出征恶战的将军们诀别。而他自己，忧党忧国，忍无可忍，也准备挥戈上阵了。

在严重的形势下，周恩来焦虑万分，谷牧、余秋里、刘西尧都清楚地记得，周恩来曾多次讲过：“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

谷牧后来回忆说，如果说，1966年8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把“文革”推向高潮的第二个大动作（第一个是《五·一六通知》的发出——编者注），那么，这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则是第三个大动作。

谷牧回忆说，在“四月工作会议”上，所谓“刘、邓司令部”的问题提出来了，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作检查，失去了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实际权力。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经过几个月的经营，此时攫取了实际领导权。“文化大革命”

^①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陈毅传》，第600—60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

运动的底牌到此揭开了,周恩来的处境益发困难了。

余秋里后来也回忆说,周恩来一向对他们讲,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经济建设一定要尽可能设法进行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反复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8小时工作制,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

10月30日,就工人离厂外出串连问题,中共中央答复安徽省委并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各地按照《十六条》中第十四条和中共中央9月14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的精神,对工人群众进行正面教育,“坚持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

第二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目前铁路运输秩序比较混乱,为保证革命师生、旅客和国家物资的正常运输,中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要认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九月五日通知精神,有计划地组织学生来京串连,适当控制人数。”^①

《通知》还规定:“革命师生要遵守铁路规章制度,维护铁路运输秩序,严禁拦截和阻止列车运行。铁路部门要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保证客货运输畅通无阻。”^②但是,当时已经是令行不止的形势。

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社论。

在起草这篇社论的过程中,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陶铸一再坚持要以“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前提,将工交企业与文教单位区别对待的精神。社论发表前,周恩来亲自主持讨论,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的重要性,严肃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并坚持按此意见定稿,决定于11月10日见报。

《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重申:“城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积极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在城乡生产单位搞文化革命,同学校搞文化革命,条件是不完全一样的。”“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却绝对不能停止生产。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个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①

这篇社论强调指出,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大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要自觉的遵守劳动纪律。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社论指出,工农群众可以向上级和中央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但绝不应该到外地去串连。社论要求“革命学生”应当坚信工农群众是“能够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谁也不能包办代替。还要特别注意,不要从外头去干预工

^① 《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0日。

农业的生产活动和生产部署。

为了保证实现上述各项要求,社论指出,加强领导是极为重要的,“一定要学会领导,加强领导。一刻也不能中断对生产的领导。凡是开展文化革命的单位,都要按照中央的规定,在统一领导下,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领导文化革命,一个班子领导生产,既分工,又合作,不要各自为政。”^①

正是周恩来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力排除干扰,始终抓经济建设,中国在一片混乱中保持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基本保证了人民生活的供给。

在这期间,周恩来还克服重重阻力,策划筹备了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

11月12日,北京1万多名群众举行了盛大集会,隆重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陶铸、邓小平、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出席了大会。一些国外来宾、华侨代表和港澳人士也参加了大会。

会议由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主持。董必武在开幕词中扼要介绍了孙中山在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建立的不朽功勋。

董必武在纪念大会上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孙中山先生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②

① 《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0日。

② 《董必武年谱》编纂组:《董必武年谱》,第5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版。

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时说：“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伟大革命家”，“领导的辛亥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场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但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个革命中所起的作用”。^①

周恩来除了赞扬孙中山的伟大革命业绩外，还指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孙中山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把它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周恩来说，中国无产阶级不仅能够做到资产阶级革命家不能做到的事，而且一定能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孙中山的夫人、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长篇讲话，详细介绍了孙中山的生平和革命活动。这篇文章发表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

同时，为了纪念孙中山诞辰 100 周年，《孙中山选集》、《宋庆龄选集》正式出版发行。邮电部发行了有孙中山像的纪念邮票。

与此同时，随着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发出，各军队院校和机关开始大乱起来。随后不久，在林彪的坚持下，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的通知。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89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

徐向前向林彪提出,各大军区开展“四大”不要全面铺开,可分批进行。徐向前说,军队肩负着战备任务,特别是地处沿海、边防的军队;即使内地军区,也要区别情况,如武汉军区地处水陆交通枢纽,搞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徐向前还建议在一两个军区作为试点搞“四大”。但是,徐向前的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

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为了防止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负责人经过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

经报毛泽东批准,11月1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一次“十万人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以及各总部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大会由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主持。

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等在工人体育场内绕了一周,同8万多名军队院校学员见面。顿时,整个会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周恩来、陶铸接见完毕后提前退场。会议由几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们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更多的是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他们在讲话中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极端错误的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并动员串连的红卫兵离京,回到各自的学校。

在这次大会上,陈毅第一个走上讲台讲话。陈毅说:

我今天在这里讲话,我就不是我字当头,如果我字当头,最好我不要来讲。我来讲,讲得不好,惹起麻烦,马上就要跑到外交部来揪你、找你、抓出来,要澄清问题,那怎么得了啊……今天,你们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是勇敢地来讲……大家不是要作路线斗争吗?我们完全欢迎大家来作路线斗争,但要学会来搞,不要乱搞……如果没有学会,这个损失很大。啊,你这个陈老总,今天在体育场,就是给我们泼冷水,唉,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我说其它的恐怕不能讲,没有什么资格可以讲话,但是在你们青年人面前,我犯错误比你们多,我这一点有资格讲话,你们没犯过我这么大的错误。①

陈毅还在讲话中表示,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针对学生冲击中南海、占领国防部的举动,陈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陈毅说,解放军打解放军,他在此之前是没有见过。陈毅说,他是1927年参军,当解放军39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

陈毅要求广大红卫兵要顾大局、识大体。他还对红卫兵

①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陈毅传》,第601—60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

说,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冲进国防部,占领大楼,剪断电话线。你们有委曲可以申述。

陈毅强调说,有些做法是不行的,揪住工作组不放,揪住一个人不放,揪住一个人的一句话不放,而把根本的目的忘了。陈毅告诫红卫兵,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正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

陈毅还旗帜鲜明地反对逐步升级、无限上纲、口号越“左”越好的做法。他说,开展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好大错误,做好大的估计,不要一味扩大。

陈毅的这个讲话,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学生们首次听到的系统的、严厉的、毫不拐弯的批评。

在这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只讲“群众运动一切合理”。对此,造反派更肆无忌惮,而广大干部和群众愤愤不平。

陈毅的这个讲话,使台下议论纷纷,掌声阵阵。台上的老干部不断以掌声感谢陈毅,感谢他讲出了自己想讲又不敢讲的话。

在陈毅讲话之后,贺龙讲了话。贺龙特地讲了军队院校师生在大串连中要做好样子的问题。贺龙说,应当发扬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的作用,在串连途中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群众做好事。

贺龙在讲话中强调,应着军装,发扬“三八作风”,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铺张浪费,不搞特殊化;不泄露军事机密,不携带机密文件,不携带武器,不个人单独行动。

贺龙还特别要求军队院校师生不介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炮打司令部”、上街游行和吵架之类的活动。

徐向前在大会上也说，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徐向前强调，一刻也不要忘记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

叶剑英在讲话中首先“检讨”了上一年院校整风问题，然后谈到军队院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务和政策。叶剑英说，同志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不仅同情，还支持”。但是真理是有限度的，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了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会发生质变。

叶剑英批评了一些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外出串连，大搞打、砸、抢，败坏军队的名声等错误行为。叶剑英说：“我们是睁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放手，睁着一个眼睛看情况。毛主席说过，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个人，是不准别人改正错误、不准别人革命的。不要不准人家革命。毛主席讲过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

叶剑英在讲话中引证毛泽东的话说，过去旧戏是《三娘教子》，“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

叶剑英说：“我们要向青年学习，但是我们奉劝青年同志们，不要把毛主席著作当圣经念，不要再犯教条主义错误。”

叶剑英劝大家要有阶级感情。他对有些造反派不顾老干部心脏病发作，甚至不管人家死活，硬要把人家抓去批斗的一

套惨无人道的做法,表示十分愤慨。他严厉地批评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叶剑英提醒大家警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要被坏分子利用。

叶剑英在讲话时,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一名学员递条子给会议主持人萧华,责问“这个大会林彪批准没有?”4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

叶剑英看了条子很气愤。他在主席台上当众宣读了这张条子,气愤地问大家:“同志们,他怀疑我们大会是偷偷开的,同学们相信不相信我们?”

台下回答:“相信军委。”

叶剑英接着说:“我代表军委的全体同志感谢同志们信任我们,请同志们信任我们。”

接着,叶剑英告诉大家,4个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是军委集体讨论过的。叶剑英重复说,“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儿子教育老子,教育爷爷”。叶剑英提出,希望递条子的那个学员也要接受教育帮助。

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北京引起了巨大影响。陈毅、叶剑英等老师的讲话迅速传播四方。受迫害的老干部和一切正直的或是稍微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无不表示赞同。

但是,林彪、江青及其追随者们则认为陈毅、叶剑英的讲话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是“镇压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特别是此时已受诬陷的贺龙出席了大会,更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的嫉恨。江青气急败坏地说:“把贺龙拉出来亮相,是向中央示威。”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怂恿、支持下,造反派将矛头指向几

位老师的讲话。有几个院校成立了“批资筹备处”，准备批斗讲话的这4位元帅。旋即“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出现在街头。军队内的造反派开始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斗军队的领导干部。

与此同时，张春桥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时承认了“工总司”的组建及其卧轨拦车的恶性事件是“革命行动”。张春桥此行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采用了先斩后奏的手法，事后才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张春桥这样做就相当于在事实上完全推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自7月以来连续发出的关于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从而为合法地搞乱工交企业开了先例。

哈尔滨等城市也相继成立了全市性跨行业的工人群众的造反组织。究竟在工交企业还要不要坚持原来的部署，执行分期分批和“业余闹革命”等规定，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在险恶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和地方主管经济工作的一批领导人，以周恩来、陶铸、谷牧、余秋里为代表，又进行了一次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的斗争。

11月中旬，周恩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让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让谷牧组织几个人研究在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尽可能使工业生产减少损失。

11月15日，余秋里正式写了一个报告给分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提出拟在全国计划会议开始的时候，先用5天时间座谈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当天，李富春批示：“拟予同意。送主席、林总、总理、陶铸、任重同志。”李富春还指出，“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分别座谈，由谷牧、余秋里分别负责。

11月16日，工交企业座谈会开始，参加会议的有5部（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编者注）7市（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编者注）以及各大区有关负责人。

会议座谈讨论是围绕“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展开的。这次座谈会原定的5天会期被大大超过，实际开了近20天。

《十二条（草案）》是陈伯达等人得知要讨论这个问题时抢先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起草的。早在11月13日，陈伯达通知余秋里和谷牧到他那里，将《十二条（草案）》交给余秋里和谷牧，并要求他在一周之内提出意见，将《十二条（草案）》退给他。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召开各口碰头会时，谷牧就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起草的《十二条（草案）》提出意见一事，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并指示当即把“中央文革小组”的文稿拿到11月17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听取大家的意见。

但是，11月17日，在该稿尚未拿到工交座谈会上讨论之前，陈伯达、王力等人又抢先定调，召集了职工代表会，宣读了该稿，煽动群众闹事。

王力在会上说，工人阶级“负有特大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

“不可阻挡的”。

陈伯达说,这个文件讨论通过后,加上《十六条》、《紧急指示》等中央文件,就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文件。

然而,在工交座谈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十二条(草案)》却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并且提出了许多针锋相对的意见。

与会者认为,工厂搞大民主、大串连势必影响生产。国家计委的李人俊说,“文化大革命”如果全面铺开,时间集中,问题集中,生产肯定要受到影响,影响的程度很难预料。李人俊还说,生产已有停顿趋势,科研、尖端项目、协作项目已基本上停止,基本建设也开始受到影响。

其他代表就此问题作了补充插话,认为此时生产主要靠吃老本,库存材料已经很少,问题越来越多,马钢(即马鞍山钢铁厂)、武钢(即武汉钢铁厂)都有停产危险。经过讨论,会议认为,工交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只能分批分期地进行。

在讨论时,与会者还一致提出对工交系统要区别对待。西南地区的同志说,工交战线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并要求《十二条》对这一点要作出明确的估计。谷牧提出对工交系统的干部状况也要估计一下,这样写文件时才好提出问题。

与会者强调,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并一致认为建国十几年的工交系统的各级党委还是好的。东北地区的同志说,工厂里无论如何要由党委领导,下边再分两摊,非受影响不可。大家指出,《十二条》只提了统一领导,连党的领导都没有提,许多人对此不理解。

在讨论时,与会者认为,工人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建立联合组织。各大区负责人表示,这是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担心各种组织中会出现两派对立的现象。东北地区的与会人员说,如果各种组织都建立起来,麻烦就更多了,不是打架就是停产。

还有的说:“现在工厂里的组织已经不少了,有工会、职代会、民兵,还有党、团,还建立那么多群众组织干啥?”他们要求,对于建立全市性工人联合造反组织问题不要松口。哈尔滨和上海的同志都主张取消已经建立起来的全市性的工人组织。

在讨论时,与会者不同意把学校搞“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搬进工厂。他们担心学生进工厂串连会搞包办代替,搞乱工厂。

有的部长非常义愤地说,问题是学生到工厂去,是向工人学习,还是“领导工人搞革命”。这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核心。他们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不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

关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到,是各大区和各部门领导人极为关注的问题。与会者讨论时气愤地说,如果允许生产受影响,哪怕是允许有个“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闹革命”。

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刘澜波说,如果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那么,方针就得好好研究了。“现在弄得人心不舒服”,人家积极搞生产,说人家是“保皇”。

事后,周恩来在谈到这次会议的情况时说,会议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也反映出

满的情绪。周恩来说，他们这种思想也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客观上的思想动态。

当林彪问周恩来会上“有几个通的”时，周恩来回答说，他所接触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很不理解。

事实确是如此，这些同志身处逆风恶浪，仍然忧国忧民，以完成国家的生产建设计划为己任，在最严峻的考验时刻，他们仍然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敢于说真话，报实情，竭尽全力，试图扭转已经相当混乱的形势，防止工农业生产建设遭受更大的破坏。

随后，谷牧等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搞了一个修改稿。对此事，谷牧后来回忆说，修改稿明确写上了“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总精神。除此之外，谷牧等人还对原稿作了一些增删合并，增加了3条实质性的内容。

这3条内容包括：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8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

修改后的稿子，原来《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第十五条就是一句话：“此件精神也适用于财贸系统。”这一条是按照主管财贸口工作的姚依林的意见加上的。姚依林一再对谷牧说：“你的列车上一定要多挂一个车皮，把财贸捎上。”

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主持座谈会的谷牧整理出一份《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这个文件刚定稿，

11月21日下午5时,陈伯达打电话要谷牧和余秋里立即去他那儿。一见面,陈伯达就发火说自己是“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责怪谷牧和余秋里等改了他搞的《十二条》。

谷牧、余秋里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吧!明天午间,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汇报。”^①

11月22日中午,在周恩来、陶铸、李富春参加的碰头会上,谷牧等汇报了几日来座谈会的情况和陈伯达的态度。毛泽东表示文件可以在听取工人意见后继续修改,争取在12月份发出。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

有鉴于此,周恩来在11月22日向毛泽东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后,判明了形势发展的趋势,只好努力把这场斗争引向妥协。

11月24日,周恩来到京西宾馆工交座谈会讨论会场听取与会领导干部们的意见。在周恩来面前,这些积压了几个月不满情绪的领导干部将久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发泄出来。会上,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说到最后都激动地站起来。

周恩来在工交座谈会上讲话时语重心长地说,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方兴未艾、大势所趋、势不可当的形势下,作为领导干部,就要在“怕革命、怕群众、怕生产搞坏”这方面来认真考虑问题,检查认识自己。工厂的“文化大革命”首先要从内因来找,而找内因尤其要从积极因素来想,要

^① 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的周总理》,第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

善于因势利导。

周恩来说,当年跟敌人打仗,大家深入虎穴,不怕牺牲;今天更应该有“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革命精神,敢于赴汤蹈火,敢于站到潮流里面去。只有这样,才不致被潮流所淹没,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周恩来说,没有一点精神准备不行,作好思想准备,领导好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

周恩来这番话,中心是谈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他常常冷静地从比较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面前的问题。周恩来觉得不能听任老同志们的情绪发展下去,否则,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他历来主张,当看清事情已处于势不可当的情况,那就只有敢于赴汤蹈火,因势利导。

在毛泽东表态以后,陈伯达也摸到了底数。陈伯达把修改任务揽了过去,搞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草案)》——编者注),并提交会议讨论。

毛泽东的表态虽然对于陈伯达的《十二条》和谷牧的《十五条》各有取舍,但基本精神是坚持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又要保证生产。这使来自经济工作第一线的工交座谈会的与会者不可能从思想上认同。但与会者听了周恩来11月24日的讲话后,知道周恩来已无力回天,对陈伯达拿出来的《工业十条(草案)》才不得已表示接受,同意上报。

同时,与会者们仍然表明了保留看法,认为既然允许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群众组织,允许工人业余时间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串连,包括允许学生在工人业余时间到工厂串连,那么其他诸如坚持8小时工作制、“业余闹革命”、保证

产品质量、完成生产定额等就难以保证。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造反派的主要目标转向党政领导干部，造反派红卫兵迅速发展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以坚持“矛头向上”的造反行动而闻名全国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成为受“中央文革小组”青睐的“革命左派”，声名赫赫。

造反派红卫兵的骨干多是受过党委和工作组“压制”、一般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但社会参与欲强烈、对“血统论”之类的特权思想不满的学生。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信奉“走资派是修正主义复辟的最大危险”，痛恨官僚主义。

因此，在冲击各级领导机关和揪斗干部的造反行动中，造反派表现得“坚决而彻底”。这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符合“中央文革小组”的运动要求。造反派红卫兵从受压到成为“响当当”的“左”派，主要仰仗“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随着运动目标的转向，大批干部被打倒，引起了早期红卫兵强烈的抵触情绪。这些率先投入“文化大革命”的青年造反者，感到运动的发展和他们的造反初衷不大一致。他们过去敬仰的中央领导受到了冲击，许多熟悉的老一辈被打成了“走资派”，引以自豪的荣耀转瞬成了过眼云烟，而过去不屑为伍的造反派却成为运动中红极一时的主力。抚今追昔，他们百感交集，激发了强烈的造反心理。

从1966年11月下旬起到12月中旬，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反“中央文革小组”的潮流。以此时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时传祥为领导人的群众组织“捍卫团”，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判刘少

奇。全国到处开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首都三司”。北京 100 多名老红卫兵 4 次冲击“首都三司”。

北京农学院附中两名高三学生在清华大学贴出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公开信》，批评了林彪 9 月 18 日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谈话中的两个观点：一个是“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明得多”，另一个是“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 99% 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公开信》的批评引经据典，说理充分，难于反驳。

北京矿院红卫兵总部等十几个院校的同类组织，组成“批判戚本禹联络站”，批判戚本禹 11 月 12 日的讲话，反对戚本禹把他们作为“保皇派”。

北京航空学院群众组织“八一纵队”贴出《一问中央文革》、《二问中央文革》、《三问中央文革》、《四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抨击“中央文革小组”。他们提出的有些问题，如“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只支持“首都三司”？为什么宠爱北航“红旗”？为什么支持揪着工作组不放等？发人深思。北航的另一个群众组织“八一野战团”贴出题为《也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纵容少数派压多数派。

北京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李洪山等人贴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大字报，抨击“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清华大学红卫兵也贴出大字报，批判“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清华大学工字厅和北京林学院一僻静处出现过“刘少奇万岁”的大标语。

以上事件,在北京和全国都相继出现过。造反派将其贬之为“11月黑风”。所谓“11月黑风”的实质,正是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制。

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学老红卫兵的动向。11月27日,北京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的老红卫兵负责人在北大附中开会,决定成立和“三司”对立的红卫兵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编者注)。

12月5日,中学老红卫兵发布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的宣言。“联动”正式成立。“联动”拥护4位元帅11月13日的讲话,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造反派红卫兵特别是其代表“首都三司”,公开表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

这时,有的老红卫兵思想极度苦闷,表现反常,也出现残酷殴打、虐待“牛鬼蛇神”的情况。

11月29日,全军“文革小组”再次安排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几位老师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即第二次“十万人大会”。

这次10万人大会比上次10万人大会气氛更为紧张。造反派们在会场贴满了批判几位老师11月13日讲话的大字标语,声言陈毅、叶剑英上次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还有“炮轰”、“火烧”之类的话。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大会非常关心,亲自到会场看望大家,随后绕场一周后离去。

陈毅又开始讲话。他在讲话中,满腔热忱地鼓励和教育青年军人,要他们学会正确对待路线斗争,要提高到毛泽东思

想的新的更高的水平。

陈毅在大会上说：“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这说明陈老总不老实，见到问题不讲，看到有同志犯错误也不帮助，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陈毅还说，对斗争，他感到非常担心。有些人不是斗争真正的“黑帮”，不是斗争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在那里扭着自己的同志在斗。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每个单位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

针对这种“斗、批、改”中的简单化、扩大化现象，陈毅说，他年轻的时候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就是路线斗争扩大化、简单化，认为斗争非常简单，用简单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

在讲话中，陈毅还说，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去斗，要区别，不同对待。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的批判，也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和程度。不按这种科学的分析，就扩大化、简单化，就打不中目标。

陈毅在讲话时强调说：“我们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

陈毅指出，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这样不会伤好人，不会伤可以改正错误的人。

在陈毅讲话之后，叶剑英再次作长篇发言。叶剑英首先念了几张台下部分与会者递来的条子，回答了所提的问题。

对于有人提出要为上次递条子的学生“恢复名誉”的问题，叶剑英耐心地对这部分人讲明道理，明确表示了否定的态度。

然后，叶剑英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以及军队院校培养学生的重要意义。叶剑英肯定了绝大多数师生是“革命”的，是好的；同时对少数不守纪律的人，如“住大房子”、“坐小汽车”，讲排场、摆阔气等破坏解放军优良传统的不良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

叶剑英指出：“一些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么？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还有比这严重的错误么？”^①

最后，叶剑英又苦口婆心地劝说同学们回校“闹革命”，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也就在这次大会的同一天，叶剑英针对一些“造反派”提出怀疑中共中央某些领导人的问题，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照片。

11月下旬，涌到北京“上访”的工人急剧增多。为说服来京串连的工人迅速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决定

^① 叶剑英：《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的讲话》，《叶剑英选集》，第408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版。

召开一次工人大会。海报贴出,入场券发尽,大会讲稿却被陈伯达、江青否定了。

已布置的工人大会无人讲话,大会临时要请“救兵”。周恩来找陈毅去给工人讲讲国际形势。时间是11月30日下午7时,地点是工人体育馆,陈毅深知周恩来的苦衷,欣然前往。

周恩来走上主席台与全场工人见了面,随即由陈毅讲国际形势。

陈毅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向听众们展示了一张世界形势图,一张中国逐步登上世界舞台,逐渐在国际事务中起到举足轻重地位的形势图。在全场工人振奋、自豪的欢笑声中,陈毅话锋一转,讲国民经济是外交的基础,号召工人们尽快回到原地“狠狠抓革命,狠狠促生产”。

第二天,造反派工人到外交部,要找陈毅当面责问。北京街头贴满了“打倒陈毅”的大字报。

几位军委领导人两次参加“十万人大会”并发表讲话,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公开对抗,也是对解放军院校师生进行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的教育。大会上几位老师理直气壮的讲话,使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也促使一些狂热的青年学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部分青年学生开始重新思考问题。有相当一部分院校师生接受了劝说,离京返校,甚至宣布退出“造反”队伍。

这一切对林彪、江青等人来说,是一次“反冲击”,同时也给林彪、江青等人的嚣张气焰泼了一盆冷水。正因为这样,林彪、江青等人掀起了疯狂的反扑狂潮,诬蔑叶剑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是“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

为刘少奇、邓小平“树碑立传”等等，挑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对叶剑英进行“火烧”、“炮轰”。江青和康生等秘密策划，煽动“造反派”再开一个“十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和陈毅。

叶剑英等毫无畏惧，泰然处之。面对满墙遍地“大字报”的包围和造反派指责为“老机”、“老右”的一片叫嚣声浪，叶剑英等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仍然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

叶剑英说：“大字报尽管贴，该讲的我还是要讲。”他排除一切纠缠和干扰，埋头攻读马列经典著作，希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新的启示和改变中国命运的法宝与武器。

此外，针对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叶剑英特意从书架上取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重新研读，并要秘书帮助摘编有关论述，“温故知新”。

叶剑英联想俄国当年的情形，越来越感到这场运动的确太像列宁说的那样，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

叶剑英从马列著作中吸取了巨大的力量，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智慧。

由于陈毅受到批判，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群众组织成员要冲到外交部去“摸黑线”。周恩来不同意他们那样做。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12个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毛泽东不赞成用“保皇派”的名称，因为伤人太多。“黑帮”、“黑线”也是如此。

有的人说,曾参加过亚非作家会议、时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冯至是“黑帮”。对此,周恩来指出,亚非作家会议是“左”派的会议,会议选出的代表是“左”派,会上他们起了作用。

有的人说陈毅“和稀泥”,并且因此一再纠缠。有鉴于此,周恩来质问代表们,为什么说陈毅是“和稀泥”?周恩来说陈毅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大家。陈毅多年来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周恩来指责一些人对陈毅怀有偏见,专抓小辫子。

同时,周恩来表示,如果外国语学院的学生组织去冲外交部,他势必出面劝阻。周恩来还提出,不只是外交部,外办、公安部、国防部、中南海、钓鱼台、人民大会堂都不能冲。

12月4日凌晨,江青、戚本禹等策动一些人揪走了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立群等。周恩来得知此情况后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公安部立即把人找回,又派周荣鑫向有关红卫兵组织打探被抓人的下落。

事后,周恩来批评有关学生组织的绑架行动,并要求卫戍区制定保护方案,将这些人保护起来。

周恩来等坚持全国工农业生产不能被破坏的努力,是林彪、江青等人所不能容忍的。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让谷牧汇报工交座谈会情况。

谷牧、余秋里等在周恩来、陶铸的支持下,根据通知要求,认真准备了一份《汇报提纲》。12月4日,谷牧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口头汇报。他系统地提出了与企图搞乱工交企

业的指导思想完全对立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

谷牧首先汇报了会议简况,然后就工交系统搞“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作了汇报。谷牧说,对于在工交系统搞“文化大革命”,应当承认干部当中的抵触情绪是存在的。大家议论到在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做法上究竟怎么做,才能实现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做到“革命生产双丰收”,这是不是应该从工交系统的实际情况出发。

谷牧说,经研究,大家认为,工交企业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工业建设方面基本上执行了毛泽东制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特别是从1965年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这个号召以后,三线建设的许多项目都上得比较快。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了毛泽东制定的总路线。

第二个特点是,工人阶级队伍虽然也有政治不纯、组织不纯的状况,但基本上是个好队伍。党的事业基本上依靠工人阶级这个队伍。这个队伍是参加劳动的,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主力军。谷牧说,一般的厂长、副厂长、工程师、车间主任这样的干部大量的都是从老工人里面提拔起来的,都是前一个时期的劳模、生产积极分子,同职工有密切联系。这个队伍是不是可以讲基本上是个好队伍。

第三个特点是,工厂同学校不一样,它不能停产,不能“放假闹革命”。同时,工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特别是重工业,一环扣一环,一个地方出毛病,常常影响全局。有些行业,像铁路、电讯、航运、电力等,有高度的集中性,要有集中统一的指挥。

谷牧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办企业千万人的行动要服从一个统一的意志。一个近代化的企业不保持一个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成的。所以说,近代企业连续性、集中性很强,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指挥。生产不能中断。所以,谷牧提出,是不是考虑应该照顾到这些特点的问题。

谷牧说,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工交队伍基本上是个好队伍、工交生产不能中断的连续性这3个特点同学校、文教系统以及同高级领导机关、各部委、各省委的情况不一样。对此,谷牧提议,是不是考虑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应当有所不同。

谷牧指出,从工交企业的这些特点出发,《工业十条》照顾了这些特点,如坚持8小时工作制;“文化大革命”的活动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质量;健全领导生产的班子;工人群众不能到外地串连等。因此,谷牧表示,拥护《工业十条》。

此外,谷牧在汇报中还提出了3方面的问题。

首先就是分期分批问题。谷牧说,从一个城市来看,“文化大革命”已经全面展开了,不存在分期分批问题。比如三线重点项目成昆铁路,铁道兵师以下正面教育没有展开。要保证1968年7月1日通车,这项任务不能受影响。二机部、七机部的尖端项目也必须有计划。

其次就是工矿企业规章制度的破立问题。谷牧说,规章制度的破立,同思维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破立问题还有区别。有关生产的管理、操作的管理、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些规程,要革命的干劲和科学的态度相结合。有些东西

还不能一个厂说要破就破了。谷牧说,要接受1959年、1960年那次的经验教训,那次有的单位把所有的规章制度付之一炬,就造成了一个短时间内比较被动的局面。

再次就是群众起来闹革命。谷牧认为,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这些性质的问题。如想改成全民所有制;临时工、合同工想当正式工;艺徒制度的改革;前几年精简下乡的人员要回来等等。

谷牧说,有许多问题牵涉到国家制度,今天很难得到全部解决,各地分别解答说不清楚,是不是中央能够统一发一个通知,这个工作就好办了。

紧接着,谷牧还汇报了一些具体问题,如厂矿里的平反问题,“文化大革命”与“四清”怎样结合。谷牧说,经过讨论,会议要求中央对此另外要有所指示。

谷牧还谈到,大家担心的就是厂矿里面的派别组织。相当多的厂都有两派以上组织,比如,北京绝大多数厂矿、哈尔滨80%的厂矿、上海1200多个厂矿、天津300多个工矿,都有不同的派别组织。此外,好多大城市已有三四个、五六个组织的,上海已有十几个组织。

有鉴于此,谷牧指出,形成这种状况,有内因,也有外因。外因就是串连的学生。学生到厂里支持厂里少数派。凡有派别组织的,发展结果都很难解决;有的发展成打群架,影响生产,少数得不到支持,就派代表到北京请愿告状。

在谈到关于“领导问题”的情况时,谷牧说,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从部到省没有完全落实。生产指挥系统,两个班子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落实。基层企业有相当数量

干部精神状态不太好,思想相当混乱。到会同志都反映,大家都有点怕。谷牧指出,哈尔滨被斗干部占49%。

说到这里,徐向前插话说,“有这么多坏人?二分之一、两个人就有一个人,这真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谷牧还汇报说,到会同志反映,各级领导讲话不灵的情况相当普遍。从工业系统的情况来看,恐怕还要认真宣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恐怕大量的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

同时,谷牧还说,干部的劲要鼓起来,要求干部挺身而出,敢于坚持党的方针、政策,敢于进行批评自我批评,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斗争。

最后,谷牧强调说,如果上述工矿企业三个特点站得住脚的话,他有这么个考虑,对于运动中犯错误的干部恐怕不能全部采取停职。只要不是反党反中央,不是“黑帮”、“黑线”,不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到适当的时候,要做一些工作,保他们一下。

谷牧说,厂矿企业不同于学校,学校里半年内没有党的组织没有什么了不起。工厂里面党的组织恐怕不能中断。谷牧强调,还能领导的党组织要继续实行领导。

至此,谷牧请中央批准,各中央局、各省市、工交各部进一步把抓生产的班子落实一下,反正各个主管部门从上到下的领导指挥系统要建立起来,不能中断。

谷牧在汇报中强调指出,中共中央发出的《七·二通知》、《七·二二通知》及《农村五条》、《工厂六条》等,凡与《工业十条(草案)》不相抵触的仍然有效。否则,以《工业十

条(草案)》为准。

谷牧的汇报有理有据,切中要害。它不仅反映了工交座谈会参加者们的呼声,也表达了所有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干部群众的意志。谷牧的汇报是“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党内健康力量与林彪、江青等人进行斗争的一篇代表作。

这个汇报也反映了工交座谈会旗帜鲜明地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虽然“抵触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表现还有怀疑情绪”,但在此时的情况下,是“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会议在充满政治高压和不得已而为之的气氛下,正式通过了《工业十条(草案)》。

12月8日,叶剑英冒着挨批斗的风险,照常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13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会上,叶剑英针对有人攻击他和陈毅在“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严正地提出“反批评”说,“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

叶剑英驳斥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攻击军事首脑机关的流言蜚语时说,军委、总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且始终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1966年冬季,叶剑英和聂荣臻住在西山,常和陈毅、刘志坚等在山上会晤,有时徐向前、刘伯承也前往叶剑英住处。几个人谈论形势,商议稳定军队的大计。

一天,陈毅气愤地说:“把老干部都打倒了,军队和国家能保住吗?”

叶剑英深有同感地说:“这样搞,把我们的老传统都搞乱

了。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

他们还在一起商谈了继续稳定军队的办法。陈毅听了，举起双手说：“我到阴曹地府也举双手赞成。”

形势愈来愈恶劣。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的张霖之被造反派鞭打致死；分管经济等几个重要部门工作的谷牧、余秋里被造反派抓走以后，周恩来派人去要，造反派顶住不给；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遭到越来越猛烈的围攻，但是叶剑英一直保持坚定乐观的情绪，天天爬山不已，锻炼体魄。

在陈毅遭到造反派连日批斗、处境最困难的时刻，叶剑英特书《虞美人》一词相赠。叶剑英在诗词中写道：

串连炮轰何时了，
官罢知多少？
赫赫沙场旧威风，
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
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①

这首词深刻表达了身处逆境中的两位老战友肝胆相照、

^① 叶剑英：《虞美人》，《叶剑英诗词选集》，第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

热情关注的真挚友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篇讨伐檄文,也是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一曲赞歌。

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这首诗词却不脛而走,流传各地。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拜读”。

在政治上,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和它支持的“首都三司”、主张保护老干部的“联动”,于12月26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一些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非常做法提出了异议,喊出了“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小组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

会后,“联动”成员在全市各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提出“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

12月28日、31日,“联动”又两次组织力量冲击谢富治任部长的公安部。

1967年1月初,“联动”的一些骨干分子臂戴袖章,骑着自行车疾驰在大街小巷,高喊“打倒三司”,“油煎江青”等口号。个别成员也搞了打、砸、抢。

不久,以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的一〇一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也先后被镇压。“联动”的头头遭到逮捕。

老红卫兵从此一蹶不振,被排斥出运动。老红卫兵激烈

地反抗举动,尽管有许多问题,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一片盲从的空气里,大胆提出了反“中央文革”的口号。

1967年1月31日出版发行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说“联动”是“反革命组织”,对“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从而掀起了整个社会对“联动”进行“大围剿”的浪潮。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下的“首都三司”却越来越得势,并成为“揪党内走资派”的急先锋。

此后,各地跨行业的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全国几个比较著名的红卫兵组织有:“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三司”)、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上海第一医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上海交通大学“革命造反指挥部”、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北京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新北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等。

与此同时,林彪、江青等人对几位元帅的迫害有增无减。林彪、江青等人指使造反派纠缠陈毅、叶剑英在两次“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硬逼他们继续检查。他们还将此事上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想为陈毅和叶剑英开脱,说“检讨一下,了此一案”。

1966年12月31日,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被迫到

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即所谓“师生代表”会议上违心地进行“检讨”,算是“送旧迎新”。

但是,此事并未如毛泽东所说的“简单了此一案”。军队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一些野心家的策动下,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确定1967年1月5日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检讨。开会的“通知”有两种颜色,两种写法,发给陈毅、叶剑英的是“到会接受再教育”,给其他人写的是“到会指导”。

叶剑英接到通知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当即质问:“是谁同意他们开这个大会的?为什么不报告?”周恩来果断地说,不能叫他们开这个批判大会,即使开,老师也不能参加。

然后,周恩来亲自出面,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两个晚上接见群众组织代表说,陈毅、叶剑英几位元帅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把他们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明天的会,我们不赞成”。

周恩来经过耐心说服,制止了这次批判大会的召开,又一次保护了陈毅、叶剑英等元帅。

1967年元旦一过,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队一小撮”的口号。1月4日,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被打倒。

1月6日,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1月10日,

江青派人给徐向前送去了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名单以及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通知。

徐向前明白“中央文革”已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于是看了一下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通知，当即表示了3条意见。

第一条意见就是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先与各派群众座谈一下，交代一下政策。

第二条意见就是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委领导不行。有的机关干部有起来要求成立“革命战斗组织”的苗头。尤其是空、海军，担负着保卫空海防的任务，战备任务比较频繁，指挥失灵了不好。机关干部成立“战斗组织”，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

第三条意见就是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讲一讲。北京军区抓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军队又把王辉球、成钧和常乾坤带走了，这个问题要研究解决一下，否则大家没有底。

徐向前所提的这3条意见，意思很明确，要稳定军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乱揪乱斗。

同一天，江青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进一步抛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纲领和措施。林彪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于是，林彪、江青等人明目张胆地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和军队各级领导干部。接着，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大军区领导人的事件不断发生。有的军区作战室被封，

一些领导人被挂黑牌,画“鬼脸”。一些军队造反派组织的人员,开车直接到徐向前驻地,要求他回答问题,无理取闹。

1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就这样,徐向前被迫仓促上阵,担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命令还未公布,消息已经传了出去。许许多多的电话,各种各样的问题,蜂拥而来。

新的全军“文革小组”1月12日正式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峰、张涛、谷岩。

1月14日,全军“文革小组”建立办公机构,开始在三座门办公。徐向前眼看军队各机关、院校一天比一天混乱,上任后,决定狠抓一下军队的稳定。他每天在电话机旁,像战争年代指挥作战一样,下达命令,回答各方面提出的种种问题。原有的两部电话机不够用了,又新增加两部。

徐向前在电话里不止一次作出这样的回答:“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军队不准大串连!”“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打砸抢,不准乱抓人!”

时任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被北海舰队的造反派抓到天津。徐向前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海军“文革”办公室,命令那里的造反派立即把萧劲光送回去。徐向前语气坚定,态度明确,造反派不得不照办。后来徐向前说话也不灵了,有些造反派公然在电话里和他争辩起来。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军队院校、文化单位以及工厂和机关的师生员工、干部大批涌到北京,要求澄清和解决问

题。大批群众的大量问题都压到全军“文革小组”这里。

全军“文革小组”18名成员，有些人在“中央文革小组”，有些人只是挂名兼职。有的成员刚开始工作，就被揪去“澄清问题”了。办公室经常没有人主持日常工作，最后只剩下徐立清1个人左右招架。每天来访人员多至200多批。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的头头，整天包围着三座门全军“文革小组”办公机关。静坐、绝食、哄叫，有时连电话机都被占领着，搅得办公机关无法工作。

一些“文革小组”成员陆续被揪斗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的叶群，隐藏在幕后，连电话都不接。“中央文革小组”还经常下达一些与军队要求相反的指示。

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几乎每天要接见造反派头头，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者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而被纠缠不休。徐向前常常恼怒发火，头疼症频繁发作。周恩来关怀地对徐向前说，和造反派打交道，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徐向前难以制止事态的发展。在一次军委碰头会上，他根据《十六条》精神和一些人的建议，断然提出5个“不准”，即“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戴高帽，不准挂黑牌，不准游街”。

在会上，周恩来对此表示赞同，但陈伯达、江青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

1月中旬，陈伯达、江青蓄意整萧华。陈伯达在接见群众组织时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在陈伯达的煽动

下,总政机关大楼里贴满了“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周恩来得知后,很生气,站出来辟谣。消息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江青很紧张,赶快令人覆盖大字报。

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革命小组”,不再隶属于总政治部。同时,江青、叶群等凭借自己攫取的干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在全国煽风点火,刮起了一股反军乱军歪风。

在这样的混乱局势下,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新疆等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人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奔赴异地。

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剑英给以保护。有些无路可走的,如刘志坚、刘震、成钧、苏振华、赵永夫、王恩茂、赵尔陆、许世友、李达、杜义德、王诤等,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躲进大别山的许世友打电话呼救,叶剑英设法把他接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保护起来。

受叶剑英保护的,也有过去伤害过他的整过他的人。叶剑英不计旧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革命者要学会容忍。一个人能容忍别人所不能容忍的事,就是英雄。

主管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经过请示周恩来,列出要保护的老干部名单,竭尽最大努力,采取紧急措施加以保护。

凡来者不拒,既来之则保之。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和西山驻地,一时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床上、地板上都住满了,轮番睡觉,分批开饭。这里住不下就送到京西宾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还特意关照要做好他们

的医疗保健工作,护理好每一个老同志。

与此同时,叶剑英还同地方有关部门打招呼,想方设法保护钟惠澜、薛愚、柯麟、谢铁骊、华君武、袁世海、谢芳、李维康等知名人士。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揪斗之风越刮越烈。

面对军队混乱的严峻形势,中央军委从1967年1月8日起,连续召开中央军委碰头会、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继续同林彪、江青等人进行激烈的斗争。

针对林彪、江青等人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叶剑英等力争主动出击。在周恩来支持下,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这个《通知》中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

《通知》还写道,有一些地方党委,借保证党和国家机密安全及全党内文电正常传递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塞进军事机关,甚至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党纪国法绝不允许的。这个《通知》对稳定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1月18日,叶剑英又主持制定了《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继续强调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各大军区、省军区机关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不要与地方同时展开;规定济南、南京、福州、武汉、广州、新疆、昆明7个军

区推迟或暂停“文化大革命”。

据当时在总参作战部工作的王宪志等部分同志回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叶剑英经常听取总参谋部作战、情报等部门的汇报，掌握部队动态，加强战备，保证部队的稳定。叶剑英还抽空视察部队，主持军委常委会，听取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以及军工生产等情况的汇报，并作了大量的指示。

眼看着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瘫痪了，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心急如焚。徐向前认为，军队不能再乱下去了。他多次叫人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却得不到回音。在全军“文革小组”刚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文革小组”属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小组”，然后再报告他。

但实际情况是，陈伯达、江青都很难找到。徐向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他既不能眼看着军队乱下去，又不能按自己的见解行事。几次叫秘书打电话给林彪的办公室，要求见林彪。但林彪不肯见。

1月24日晚上，徐向前毅然决定要直闯林彪的住地。他坐上汽车时才告诉秘书给“林办”电话通报一下。

在西城区一个名叫毛家湾的深宅中，住着林彪和叶群。外装不起眼的大门和普通建筑，掩盖着住宅内部的奢侈豪华。林彪忌风又怕见水，后院内却专修了一座庞大的室内游泳池，四季温水不断。林彪为了坐在室内晒太阳，用进口的石英玻璃，安装了一个晒口。

徐向前的突然到来，打断了林彪和陈伯达的密谋交谈，使他们有些不悦。不过，林彪还是以“元帅对元帅”的礼貌，接

待了徐向前。徐向前开门见山地向林彪讲了全军混乱的情况,提出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

林彪听了,“连连点头”。林彪此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于是当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见。林彪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并请叶剑英、聂荣臻到毛家湾去研究。陈伯达见势当即告退。

上述“九条”,经中央军委讨论通过后,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去钓鱼台,请“中央文革小组”再加讨论。去钓鱼台讨论前,徐向前特意打电话给陈毅,让他也到会助阵。

因为陈伯达知道“九条”的内容,所以,老师们到钓鱼台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在,还把周恩来也请来了。经过讨论,“九条”被改为“七条”。

这时,陈伯达与林彪关系十分密切。陈伯达边把“七条”稿子装到徐向前口袋里,边说:“已经通过了,你赶快回去吧。”徐向前即刻把通过的稿子送到“林办”,回到家已是早晨4点钟。

后来,林彪把“七条”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毛泽东又指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修改后的“八条”被交给住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毛泽东住处请示,毛泽东同意照发。于是,文件以《中央军委命令》下达。其具体内容包括8条,又称《军委八条命令》: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①

这8条命令的中心思想是军队要稳定。由于它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颁布后对稳定军队局势起了很大作用。

广大指战员对这8条命令热烈拥护，坚决执行这一命令。有些军区派飞机广为散发。许多地区根据命令制止了一些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福州军区请示中央军委，要求把一些经常冲击军事机关的打、砸、抢分子集中管制。中央军委考虑到福州地处前线，从战备需要出发，批准了他们的请示。

《军委八条命令》起到了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然而，在《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不久，由于江青等人捣乱破坏，军队混乱的局势仍然不能阻止，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连续发生。

^① 《中央军委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38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为了进一步解决稳定军队局势问题,叶剑英、徐向前等分析一些地区军队混乱局势的原因,感到《军委八条命令》还不够,也未完全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

叶剑英说,军委命令本来9条,拿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就等于是“允许夺权”。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

在叶剑英、徐向前等几位老帅努力下,2月8日,中央军委又发布了通知,明令外出串连的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明令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各单位接待站,从2月21日起,一律停止接待。

2月21日,中央军委又发出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强调军队肩负着加强战备,保卫国防的任务,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

同时,《七项规定》还要求,军(含军)以下单位及北京卫戍区、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律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到这些地方串连;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上而下地夺权,不允许冲击;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要分清“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对干部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

《七项规定》还要求13个大军区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由党委领导,分期分批进行“四大”。《七项规定》进一

步规定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

《军委八条命令》和《七条规定》的相继颁布，逐步地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乱军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根据这些《命令》和《规定》，先后解决了成都、青海、新疆、南京、内蒙、甘肃、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接着，中央军委又发出了一些指示和规定。但是，对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战斗组织”的指示，许多地方很有抵触。各大军区开会宣传《军委八条命令》的时候，造反派冲击会场，说这是“镇压群众”，是“又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毛泽东和老师们一样，都在维护《军委八条命令》。后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讲到这8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红卫兵运动”对各级领导机关的冲击，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使原来积压下的旧矛盾和运动带来的新矛盾一起爆发了，局面更加错综复杂。

在造反过程中，红卫兵中“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和“老子天下第一”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腐蚀了青年学生。个人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恶性膨胀，成为红卫兵组织的流行病。

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对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并且传达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说派军队训练“革命师生”的办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军训是为了加强红卫兵的组织纪律性。

此后,军队开始执行军训任务。但是,从1967年1月起,“红卫兵运动”进入了全面夺权阶段。夺权运动的开展使红卫兵自行其是的情况更加严重。

毛泽东看出了学生运动的局限性,对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深为忧虑,不希望运动在完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当运动进入夺权阶段后,毛泽东就想把红卫兵活动的舞台从社会拉回学校。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和外宾谈话中,批判了这时流行的“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毛泽东并说,“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靠得住靠不住,还要看”。不久,毛泽东又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反动的。

2月13日,《内部参考》特刊《文化革命动向》上登载了一篇题为《北京两个中学进行军训的情况》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文章说,驻京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进行集训“革命师生”的试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文章中说,这两个学校的军训都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以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主要教材,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友,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

志这样两个目的,消除各群众组织之间的隔阂。第二阶段以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为主要教材,引导师生深入批判阻碍“革命派”大联合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挖私心,大破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实行“革命组织大联合、大夺权”。

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在文章旁边写道:“请派人去调查一下,这两校军训的经验是否属实?核实后,可以写1000字左右的总结,发到全国参考。又大专学校也要作一个总结,发往全国。”^①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北京卫戍区于2月18日写出了关于在北大、清华等5所高等院校和北京二中、二十五中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政训练试点工作的两份总结报告。

报告由林彪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立即批发全国,并指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时间四小时。”“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二十天。”^②

毛泽东批示了这两个总结报告后,指示交周恩来阅后送

① 毛泽东:《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两所中学军训经验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2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② 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大、中学开展军训的两个总结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2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林彪处。

几天后,陈伯达、王力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大中学的军政训练,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主张在报上发表。毛泽东所批示的两个关于北京的军政训练的文件,他们也主张修改后发表。

对此,毛泽东批示说,“都不要发表”。

后来,北京卫戍区的这两个总结报告,既没有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也没有在报刊上发表。

但是,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试行用)》。其中规定: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连,一律返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分期分批进行军政训练。上课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批判旧教材和教学制度,复习数、理、化、外语和各种必要的常识。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和革命领导干部”民主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具体安排上课。

3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连(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编者注)的“革命师生”,一律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

《规定》还要求,大专院校的“革命红卫兵”应该在运动中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应该以劳动人民家庭(包括工农兵和革命干部以及其他劳动者——编者注)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

感情,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指出:“中小学的革命师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有了很多的贡献。目前,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在这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摆在中小学革命师生面前的光荣任务,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复课闹革命”。^①

3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批示。

《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是天津警备区司令部郑三生等于1967年3月6日给北京军区和全军“文革小组”的关于天津市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报告。

报告中说,天津市延安初级中学在部队进校前,到校人数很少,组织多而乱,有武斗现象。经过一个月的军政训练,改变了面貌,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

报告中说,3月1日复课后,学校掀起了“抓革命、促生

^① 《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人民日报》,1967年3月7日。

产”的高潮。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

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①

3月17日，中共中央通知取消原订在春暖后再进行大串连的计划，停止全国大串连。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的这些措施，是为了控制学生造反力量的盲动性，力图在有所规范的情况下完成“夺权”的目标。

在中共中央三令五申之下，大批学生陆续回到了学校。各地大、中、小学普遍开展了军训。许多地方中学的运动受军训团控制。各校的红卫兵组织开始了以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大批判为主的“复课闹革命”，“中央文革小组”还把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芳草地中学等学校作为教育改革的试点单位，许多红卫兵组织还进行了开门整风。

^① 毛泽东：《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2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一些单位解散了为数众多的跨班级、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红卫兵组织,实行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并仿效部队的班、排、营建制建立红卫兵组织。

毛泽东在发出“全面夺权”的号召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夺权斗争”的进行。经毛泽东批准,有关文件陆续发出。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的通知》,规定“革命群众”同那些控制广播电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从此,军队开始执行军管任务。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批准了《公安六条》和《军委八条》,作出了军队“支左”的决定。

《公安六条》是中共中央、国务院1月13日下发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的简称。它原是在1966年11月、12月出现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思潮的背景下起草的。

要搞《公安六条》,是陈伯达、江青提出的。早在1966年12月7日,谢富治在给张春桥的信中说,“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陈伯达、江青是那樣的“关心和重视公安机关文化革命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主动地提出要给公安机关提出几条”。

这时,谢富治已经搞了个“八条”送张春桥。12月16日,谢富治又把由“八条”改成的“六条”送关锋、张春桥、王力、戚本禹。谢富治在给他们的信上说:“只能供你们写时参考用,千万请你们几位同志帮助写一下。”

12月20日,谢富治写信给关锋,认为他“改得好”,请他

“转给中央文革小组其他同志一阅”。

1967年1月9日下午,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公安、检查、法院系统来京串连的代表。谢富治向他们宣读了《公安六条》的草稿,并说明要“由中央决定”。

周恩来在会上说,谢富治讲的“六条”,还未经过毛泽东批准,相信中央会很快通过,发下去。

最后,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批准,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公安六条》。

《公安六条》指出,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中央决定,作出依法惩办现行反革命分子等6项具体规定:

(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三)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或拘留革

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批判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四)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一般的,有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六)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①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38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中共中央要求将这些规定向广大群众宣传,号召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维护革命秩序,保证公安机关人员能正常执行职务。《公安六条》的实质,就是要保卫“文化大革命”。

由于军队按中共中央规定代为保管省委重要档案材料,而造反派怀疑“其中有整群众的材料”,也由于军队有些单位确实提供秘密处所让所谓地方“走资派”藏匿,还由于其他纠纷,军队在1966年9月以后常常受到地方造反派的冲击。这种冲击在进入1967年后愈演愈烈。

中共中央于1967年1月14日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这时军队仍然恪守规定,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直到1月21日,南京军区党委接到安徽省军区的报告中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省军区提出,1月22日至23日,他们要在合肥召开15万到20万人大会,要求安徽省军区派出300名到500名部队警卫会场。造反派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省军区1月21日14时前答复。

为此,南京军区党委立即向中央军委和林彪“请示”。林彪立即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指出,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

毛泽东并且告诉林彪:“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

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

显然,这是为了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而提出的。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精神,作出了5条指示。其内容包括:

“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②

^① 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1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38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为了执行“支左”任务，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布了一系列指示。

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命令》。

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中央军委1967年1月28日的8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为此，通知还作了5点具体说明，并要求各地将此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8条命令，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军委八条命令》发布后，军队开始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开始“支左”。一般来说，军队干部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感情上，对造反派都没有什么好感，中央对谁为“左”派又没有具体指示。因此，军队几乎都是首先支持了党团员、老工人，而且支持冲击党政领导机关不太激烈，批斗干部不太凶狠的一派。而另一派则认为，军队支持了“保守派”，因而对军队领导机关进行了冲击。

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后，军队在执行“八条”时，“镇压”了冲击军队的一派，宣布其为反动组织，抓了不少成员。因而，部队介入地方后，与激进派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出现了一系列事件。

早在1967年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造反派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发生了流血事件。

石河子是解放后新建城市。此时，那里驻有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工二师、独立团（兵团武装部队——编者注）、汽车二团、毛纺厂、农学院等17个单位，近30万人。

从1967年1月17日到1月27日,石河子市先后有7个“造反团”冲击了武装部门,有8个单位的“造反团”强行接管了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

1月25日下午,毛纺厂等8个单位的造反派约2000人,进入汽车二团,配合该团造反派“夺权”,汽车二团请求独立团支援。

当独立团的92名指战员赶到汽车二团时,汽车二团造反派抢夺枪枝,夺去步枪19支、冲锋枪7支、手榴弹64枚、子弹1307发。

1月25日下午7时,造反派增至4000余名。1月26日零点,在夺枪与反夺枪中,双方开枪,11人伤亡(5死6伤——编者注)。

当日,农八师武装处将一部分部队调进师部,对师机关进行保护。造反派要进入师部,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死两人,伤27人。

与此同时,在公共汽车站等处,双方也进行了枪战。这一天,双方共打死24人,打伤74人。

事件发生后,双方滥抓对方的人,抓到后施加种种酷刑。

关于这一事件,新疆军区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说法完全相反。军区认为,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中央文革小组”认为,这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鉴于于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2月11日发出文件,作出对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军事管制等12项规定。

与此同时,由于北京市公安局的1693名干警被指控为“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于2月11日奉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并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

军管会还发布《布告》宣布,任命牟立善为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代表,实行军事管制。《布告》指出,军管会的任务是维护革命秩序,保卫“文化大革命”。北京市全体人民警察应在军管会领导下,坚守岗位,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同时,青海省西宁市的群众组织“八·一八”,在北京去串连的一些学生的支持下,借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报社内大搞打、砸、抢、抄、抓,对报社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几个人被活活打死。非法强占报社的个别人,还呼喊反革命口号。他们拥有一批从别处抢来的枪枝、弹药,对向他们做工作的解放军战士进行武力威胁。

对此,西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认为,如果任其胡作非为,后果不堪设想。该领导小组遂派部队对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立即退出报社,交出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自己负责。

占据报社的人向部队开枪寻衅,部队被迫进行反击,一些人被当场击毙,其余的人被驱出报社。

这些情况,青海省军区都向林彪和中央军委作了报告。2月23日,叶剑英听了时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的电话报告后,对他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在西宁的街头，很快出现了大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叶”被误作“林”——编者注）

“中央文革小组”对青海事件最初保持沉默，几天后就利用《简报》刊登红卫兵来信，信中哭诉他们被赵永夫“武装镇压”的经过。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新审查“青海事件”。

毛泽东3月11日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3月间，“调查”进行了两次。所谓“调查”，就是只听取由“中央文革小组”挑选出来的“受害者”的控诉，是非曲直完全颠倒，“罪魁祸首”是赵永夫。“中央文革小组”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3月24日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决定》宣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时任解放军二〇五部队副主任——编者注）、王昭（时任青海省委书记——编者注）隔离反省。《决定》说，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决定》并且指出，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对青海实行军事管制。

在宣布这个《决定》的会上，赵永夫当场被捕。

与此同时，武汉也发生了抓人事件。

在1967年2月以前，武汉地区的造反派主要有“三钢”和“三新”。“三钢”是“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即“钢工总”；“武汉市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即“钢二司”；“钢九一三”。“三新”是“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

这时，“保守派”是“大派”，人数很多，势力很大，主要是

“武汉市革命职工联合会”，它的保护对象许多被称做是“走资派”。

2月初，造反派强行占领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的办公楼。2月8日，他们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声称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

第二天，造反派又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人民解放军“支援下”接管的，造成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

2月8日以后，造反派到处冲杀，甚至把不同观点的群众游街示众。2月11日，他们竟冲击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武汉军区党委听取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二·八声明》中的错误观点，表明不支持《二·八声明》。《严正声明》发表前报告了全军“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同意军区的表态。

造反派却我行我素，武汉军民愤然不满。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抓了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头头和骨干分子。

不久，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钢工总”及其所属组织。武汉军区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人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这些做法，受到武汉军民的拥护，而为“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所不满。

类似的事件在广东、内蒙、安徽、河南、湖南、福建、西藏等

省、自治区都先后发生过。

毛泽东除了要求军队“支左”外，还先后下发了“支农”、“支工”的指示。

2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要求人民解放军驻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工作。

2月26日至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召开的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军队要协同地方管工业的重要指示。毛泽东指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①

3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卫戍区对工厂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布告中说：

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要从政治思想上支持。也就是要帮助他们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依靠革命群众自己的力量，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二、厂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产和业务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

^① 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2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下进行,应当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批转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的通知》和中央有关的政策规定。三、厂矿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岗位,积极生产,努力工作,遵守劳动纪律,服从上级指挥。建立革命秩序,严格出入制度。四、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强调摆事实,讲道理,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五、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减少脱产人员,反对铺张浪费。坚决同经济主义进行斗争,坚决同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进行斗争。六、为了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提倡厂矿内革命群众组织,逐步做到按生产系统和行政单位编组。七、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在本单位或本市内进行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任何革命组织联合厂矿外革命组织召开大会,必须经过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八、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成立筹备组织,推动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九、厂矿一切外出长期不归的人员,限一个月内回到本单位,如在规定时间内仍不回厂矿者,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十、厂矿全体革命同志必须提高警惕,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加强

安全保卫工作,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破坏国家财产、破坏生产的人,要依法惩处。十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人员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从事生产,从事群众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发扬民主作风,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并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十二、厂矿全体革命同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厂矿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①

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破坏国家财产、私分集体经济的生产资料和砸毁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的设备和物资等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3月16日发布了《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规定:

一、必须提高警惕性,教育、团结群众同一切破坏国家资财的行为作斗争。二、不准私分生产队的公积金、集体储备粮和种子,不准随便动用农业生产

^① 毛泽东:《对中央转发北京卫戍区布告的指示稿的批语(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262—2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的专用款项,不准破坏农具和机器。必须认真保护耕牛和其他牲畜。三、杜绝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节约使用交通工具,不准随意强占公房公物。应主动退回在经济主义泛滥期间领取的各种交通工具、物质装备和公款等。四、对文物、图书要加强管理和保护工作。五、如有盗窃或破坏国家资财者,必须按情节轻重给予必要的教育和处分,并要酌情赔偿;对于其中情节严重的,必须坚决镇压。^①

面对群众组织斗争日益尖锐,擅离职守,不搞生产,干扰和破坏建设的现象,中共中央于3月18日给全国工厂企业职工、干部发出了一封信。

中共中央在信中要求,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应该巩固劳动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良好秩序;应该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坚持8小时工作制,在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坚持“文化大革命”,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现象作斗争;应该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产品的高质量,要同一些不顾质量、浪费国家资材的不现象作斗争。

中共中央在信中指出,一切厂矿职工,都必须在“无产阶

^① 丁惠永:《中国百年大写真》,第84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

级文化大革命”中，研究精兵简政的经验；既要大大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又要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要注意“节约闹革命”；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这封信强调，一切厂矿职工，都必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高国家主人翁的伟大责任感，好好保护国家财产。如有破坏国家财产的人，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严格惩办。

中共中央还在信中号召，一切在厂矿中工作的革命干部，应该带头做好各项工作，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和国家建设计划，尽最大的努力。一切厂矿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这封信还说，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严格进行自我批评，应该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努力当好群众的小学生，在工作中改造自己，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工人群众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对他们的批评，要采取毛泽东历来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

中共中央还在信中指出，混进厂矿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绝对不许“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职工之间的团结，制造和挑动派别纠纷。中央要求，对他们的处理，可以根据他们的政治立场、劳动态度和厂矿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这封信还强调，中共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各厂矿企业的干部、职工应该很好地同人民解放军合作。

中共中央要求将这封信在一切厂矿和基本建设单位中宣

读和张贴。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方针,加上林彪、江青等人的疯狂破坏,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国内战”的混乱状态,地方党政组织陷于瘫痪和半瘫痪之中,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武斗成风,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

有鉴于此,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在混乱的情况下,实行“三支两军”是必要的。这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三支两军”都要“支左”,都要贯彻“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因而也有一定的消极后果存在。

毛泽东虽然表示支持“天下大乱”,但是对于“夺权”运动造成的严重的混乱状况,他还是设法加以约束。毛泽东主张“夺权”运动以“大联合”、“三结合”作为指导方针。

为了实现这种“大联合”和“三结合”,毛泽东要求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各造反派组织,各造反派组织要进行整顿,要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

为了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还发布一系列的通知、指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要求厂矿企业、农村生产队坚持“业余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要求维护铁路、港口、交通运输秩序,保护电台、银行、仓库、监狱,等等。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毛泽东决定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以后,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有280多万名解放军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人员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缓和了紧张局面,维护了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保护了一批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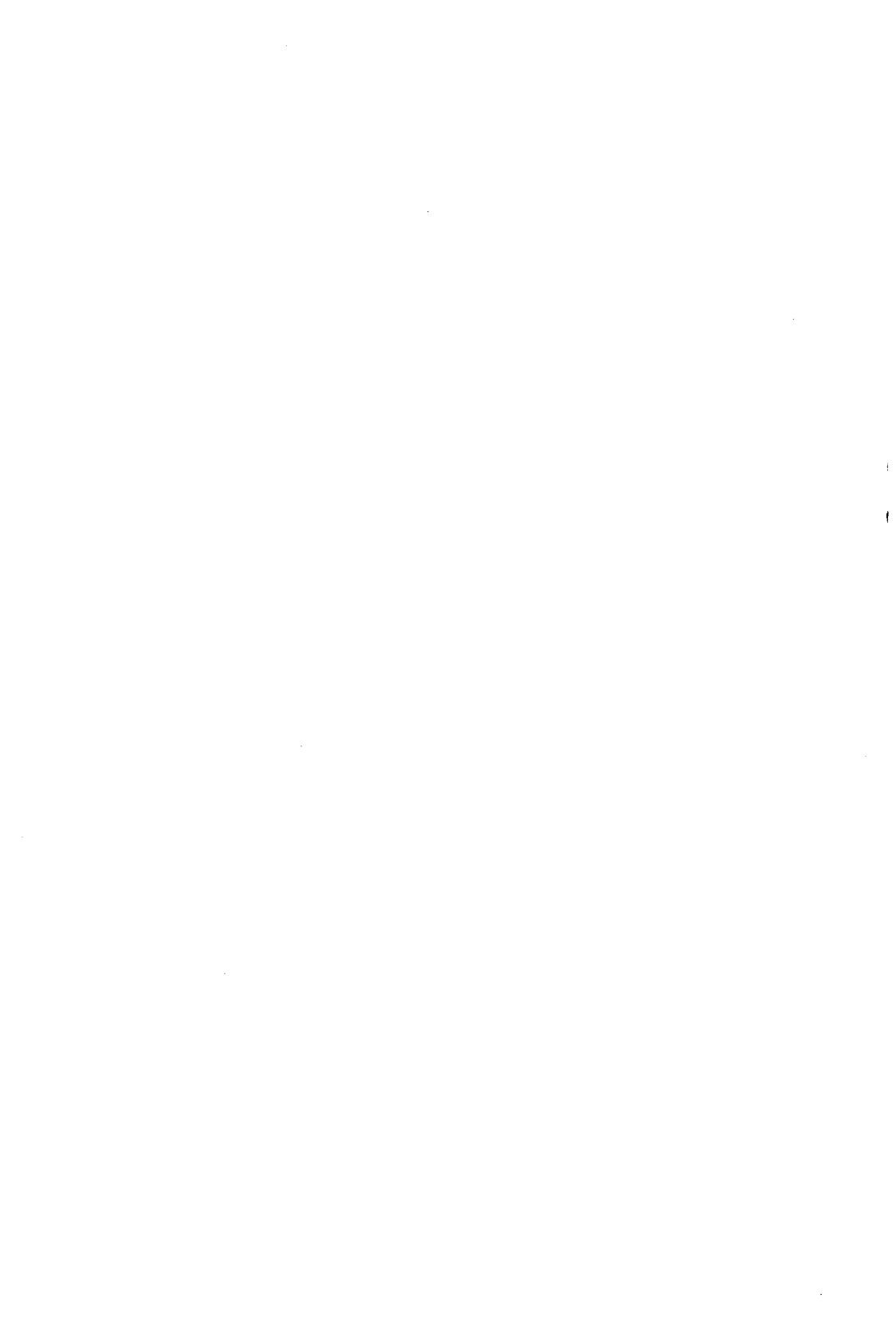
同时,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广大解放军指战员的努力外,也由于长期形成的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威信以及人民群众对军队的爱护和支持。

当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混淆了是非和敌我矛盾;由于“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和战士思想上缺乏准备,又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的经验;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了许多缺点错误,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造成了军队和地方、军队内部的一些隔阂,影响了部队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损害了人民军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声誉。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并附上《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中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此后,“三支两军”的人员陆续撤回到军队。

后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消除

“三支两军”造成的消极后果十分重视。军队和地方经过努力,妥善地解决了许多遗留的问题,消除了隔阂,增强了团结,拥军爱民、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出现了新的面貌。



第四章 一月风暴 上海造反派大肆夺权

搞乱上海、乱中夺权的“前奏曲”已谱完 “上海的桃子熟了” 《解放日报》已不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 “一月风暴”的标志：“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召开 “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成立 毛泽东支持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运动 《人民日报》肯定上海“夺权”运动 中共中央给上海造反派发出“贺电” “两报一刊”为“夺权”运动大造舆论 张春桥等第一次尝到了被批斗的滋味 张春桥等人的4次“夺权”之争 张春桥等人“创造”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 张春桥、姚文元提心吊胆地进京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替了“上海人民公社”

狂热到极点的造反派在经过几个月的“炮打司令部”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使国务院的各部委和省、市、县各级党政机关普遍陷于瘫痪状态。各级党委领导人大多被揪斗关押,机关工作无人办理。各级机关的正常工作和各企业的生产秩序已濒于崩溃状态。这种无政府主义使“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严重的混乱状态。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社论提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

社论还说,1967年,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这篇号召展开“总攻击”的社论,意味着全国“全面夺权”

^①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67年1月1日。

将要开始了。

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第一个被夺权的是人民日报社。被派往人民日报社的工作组组长是陈伯达。陈伯达在“文革”初期到人民日报社“夺权”的事并未公布。但是，从1965年6月1日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社起，《人民日报》已经完全改观了。

陈伯达一到人民日报社就当众宣布：“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报社领导不得插手，各部门立即进行调整，推选新的部门负责人报工作组批准。”

从此，《人民日报》的面貌被彻底改变，并且被拖进“文化大革命”的轨道。

陈伯达到人民日报社“夺权”开了头后，许多野心勃勃的造反派都把眼睛盯上了报社。各地报社被包围、被夺权的事情屡有发生。西安、南京和上海等地，都曾发生过造反派包围报社的事件。

其中，上海“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社的事件持续的时间较长，情节比较严重。“《解放日报》事件”严重损害了上海市委的威望和《解放日报》的声誉。

“《解放日报》事件”和在此前后发生的上海“安亭事件”、“康平路武斗事件”，使上海市委濒临瘫痪，使上海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陷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为张春桥、王洪文等以后搞乱上海、乱中“夺权”谱完了“前奏曲”。

陷于极度混乱的上海，给上海人民送来了一个黯淡萧索的新年。除夕前后，上海市一片告急声：从1966年12月30日凌晨到12月31日的26个小时中，26列客车停开，5万多

名旅客不能乘车,5万多名旅客中途受阻;黄浦江上有100多艘轮船停靠码头,由于无人装卸,货物积压达40多万吨;到元旦前夕,整个上海市的存粮仅能维持一个星期左右。

面对“十万火急”的局面,周恩来亲自给陈丕显打电话,要求陈丕显主持上海工作,贯彻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周恩来告诉陈丕显,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断。

陈丕显受命后,立即召集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在东湖招待所召开了紧急会议。

陈丕显在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经过商讨,会议最后决定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之后,在征求了一些群众组织负责人的意见并作了修改后,由12个群众组织签名同意,《文汇报》于1月5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传单。

这份传单,明确提出了要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对稳定上海的局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表后,上海的交通运输情况有了一定的好转。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周恩来刚给陈丕显打完电话,张春桥便在电话里对王洪文等人面授机宜,说“曹荻秋已经被你们搞臭、打倒了,不能再出来了”。所以,周恩来只能让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其实,“陈丕显的账,你们以后照样要和他清算”。陈丕显主持上海工作只是“临时性的、过渡性的”。

张春桥还授意王洪文等人不要参与解决铁路交通中断问题的事情。

王洪文有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撑腰,显得更加肆无忌惮了。就在东湖招待所的紧急会议上,王洪文狠狠地将陈丕显“批判了一顿”后离开了会场。

1月2日,张春桥电召王洪文进京。第二天,张春桥、姚文元听取了王洪文关于上海近况的“汇报”后,认为“上海的桃子熟了”。张春桥并授意王洪文把《文汇报》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

1月4日,上海文汇报社被造反派“夺权”。《文汇报》将毛泽东早在1957年7月1日为《人民日报》所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刊登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文汇报》在发表的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告读者书》中,宣布“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站在了“革命造反派”一边。

同一天,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从北京回到上海,抓紧策划“夺权”。

张春桥、姚文元一到上海,赶紧分别找徐景贤、王承龙和“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密谈。

张春桥在谈话中说,眼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1月5日,进驻上海解放日报社的“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告读者书》,宣布“夺了权”,并声明《解放日报》不再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

第二天,以上海市“工总司”为首的32个造反派组织在

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策划这次大会的张春桥、姚文元，对大会的发言稿和口号都仔细审阅过。

在会上，每个发言者都按“标准程序”进行发言。发言者先念几条“最高指示”，接着念稿子，最后高呼几句口号。这次会议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领导干部，并把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的高级干部揪到会场陪斗。

会议还宣读了3个由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炮制的“通令”。

《第一号通令》宣布：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在曹荻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第二号通令》宣布：陈丕显必须在7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

“革命造反派”进行“坦白交代”；“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作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以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第三号通令》提出，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为此，《第三号通令》宣布：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候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代，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也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代，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这次大会实况通过电视向全上海市进行了转播，张春桥、姚文元没有出席会议。他们在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电视。而在前台慷慨激昂讲话的是徐景贤、王洪文。他们都作了长篇讲话。

会议结束后，上海外滩的一幢十几层大楼上，出现4条从顶到底的红色巨幅标语。这4幅标语是：“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这4幅标语是“工总司”挂的，而标语字句都是徐景贤拟的。4条大标语一下子传遍了上海滩。

上海，一下子为之轰动。

这次大会以后，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大权落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手中。这次“打倒市委”的大会，成为上海“一月风暴”开始的标志。

有“破”就有“立”。上海市各级党政机构全被摧垮后，张春桥一伙开始筹建他们权力机构的工作。

1月8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挥下成立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夺取了上海铁路、海港、长江航运、邮电等单位的领导权，成为全市生产的实际领导机构。张春桥称之为“经济苏维埃”。紧接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代替了上海市公安局；“造反组织联络站”代替了上海市委。

对于上海的“夺权”，毛泽东持支持态度。毛泽东把上海的“夺权”行动看做是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而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

1月8日晚上，毛泽东专门召开会议谈论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两报“夺权”的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文汇报》由“左”派夺了权，《解放日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对的”。

毛泽东还表示，《文汇报》1月5日的《告上海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

毛泽东说，“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毛泽东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文汇报》和《解

放日报》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在转载时，将毛泽东的话写进了《编者按》中。

《编者按》中说：“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①

同一天，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紧急通告》。《紧急通告》说：

目前，正当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条路线决战的时候，正当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被打倒的时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玩弄新的阴谋。他们与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以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

^① 《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1967年1月9日。

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工人停止生产,影响港口工作,破坏我国国际威望。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补助费,煽动群众强占公房。这是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①

《紧急通告》中还说,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采取这种“卑鄙阴险的手段”,无非就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

这两个目的包括:“一、以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危害国计民生来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施加压力,以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二、利用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斗争的邪路上去,同时以物质利益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推行和平演变,使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成灾。”^②

为此,《紧急通告》提出,“我们严正警告上海市委,任何妄图用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和增加工资福利来转移斗争视线的阴谋,都是绝对不能得逞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揭露这个阴谋”,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进攻。

《紧急通告》还说,一定要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① 《紧急通告》,《文汇报》,1967年1月9日。

② 《紧急通告》,《文汇报》,1967年1月9日。

命”，一方面坚守生产和建设岗位，坚持8小时工作制，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并且力争产品的高质量。《紧急通告》还说：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连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工作人员、艺徒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生产计划。

三、凡过去由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即日起一律作废，各单位发出的大量串连费（车费除外），一律由当权派签发者负责追回（可分期退还）。

四、除必要的生产经营费、工资开支、文化革命经费、办公经费及其他正当经费外，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联合组织监督市级和各级财务机关执行，以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群众在银行的存款除外）。

五、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特殊情况请示中央另作处理）。

六、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是学生改造世界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有些当权派为了挑起工人对学生的不满，破坏工学结合，对学生进行“和平演变”，竟发放较高的劳动工资，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套，即日起，一律不准发放。

七、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个人强占公房，违者由公安局查处。凡怂恿居民抢占公房者，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凡已住入抢占来的房屋者，限一周内搬回原处。

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在运动中破坏社会治安、打人行凶、抢劫和偷盗别人财物者，应立即交回赃物，并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以后重犯或屡教不改者必从严惩处。

九、上述各条，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和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贯彻执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宣传教育。

十、上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①

对于这个《紧急通告》，毛泽东认为“很好”，并指示“中央

^① 《紧急通告》，《文汇报》，1967年1月9日。

文革小组”写一篇解释文章。1月12日的《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经毛泽东批准的、题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社论,并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稿《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知〉》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文汇报〉〈上海日报〉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1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①

社论还提出了新阶段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包括: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盘踞的顽固堡垒,一个一个地被夺取过来。

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联合起来,汇成一股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全面的总攻击。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他

^① 《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人民日报》,1967年1月12日。

们在斗争中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断提高斗争的艺术,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力量。

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为核心,正在把群众的大多数团结起来。革命群众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在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自己掌握斗批改的命运,自己掌握生产和工作的命运,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①

社论引用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中的话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②

社论还引用了毛泽东于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讲的一段话,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③社论说:

① 《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人民日报》,1967年1月12日。

②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7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③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起来,用经济主义来欺骗群众,煽动群众,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①

社论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生动地、深刻地揭露了上海地区“反动分子的大阴谋”。这个“大阴谋”就是用经济福利的“糖衣炮弹”来“诱惑”一部分群众。社论指责道:

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经费、物资,煽动群众强占公房,据为私有。他们挑动武斗,制造事件,唆使一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造成一部分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人员停止生产活动。铁道部门的某些负责人也在这样干,妄图用中断铁路运输的手段,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人自以为得计,其实恰恰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表演得愈充分,就

^① 《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人民日报》,1967年1月12日。

愈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为自己的彻底垮台制造条件。^①

社论还说,上海市“革命群众组织”发出的《紧急通告》,高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为同“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社论说,为了彻底粉碎“经济主义”,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应当像上海市的“革命造反派”那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对那些暂时受蒙蔽的群众,我们应耐心地进行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相信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1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贺电》中说:

^① 《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人民日报》,1967年1月12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①

这份《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也发表在1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

《贺电》以中共中央名义给上海造反派正式作出的这种“肯定和赞扬”，大大提高了上海“一月风暴”的地位，扩大了这场“夺权”风暴的影响。同时，造反派也抓紧宣扬他们“夺权”取得的“功绩”。

1月13日，《文汇报》发表了题为《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的社论。社论说，由上海和外地驻沪的各“革命造反团体”派出联络员，组成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站”，这个“革命倡议”很好。这个倡议的实现，将“促进革命力量的大团结”，将大大地推动上海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社论说，革命需要联合。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造反派”面临着“艰巨复杂的斗争”，经历着“千难万险的考验”，更加需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援，紧密合作，共同战斗，并且以“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为核心，把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家伙”猛烈开火。社论还说：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人民日报》，1967年1月12日。

“联合就有力量,联合就能胜利。”“正是由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革会等几十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起来,相继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等重要文件,进行了全面的阶级斗争,很快就把上海市委一小撮人的新反扑狠狠地打回去。”“上海市委的一小撮老爷们不行了,他们马上要彻底完蛋了。在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的关键时刻,我们全市革命造反派必须挺身而出,迅速地行动起来,更好地联合起来,进行一场夺权的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必须立即建立全市革命造反派的联合组织,提出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采取果断的措施,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新的革命的秩序,随时打退敌人的猖狂反扑。我们坚信,踢开了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人,上海地区的革命和生产事业就会在革命造反派的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①

社论还说,联合决不是“搞折中”,联合绝不是“和稀泥”,而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的“大团结、大联合”。一切“革命造反派”都应“以革命的全局利益为重”,彻底抛弃“任何私心杂念”,在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上携

^① 《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文汇报》,1967年1月13日。

起手来,并肩战斗。因此,“大团结、大联合”的过程,也必然是“灭资兴无、破私立公”的斗争过程。

整个社论还在最后宣称,“喜看今日之上海,已是革命造反派的天下”。

第二天,《文汇报》又发表了题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的社论。

社论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出了一个新事物:许多单位内的革命造反派起来夺了权。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的一个标志,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面临死亡的一个标志。上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①

社论说,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革命就是要夺权”。社论说:

“我们就是要挺身而出,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权,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把报纸和一切舆论工具的领导权,把经济命脉的领导权,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统统从那班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手中夺过来。”“革命造反派把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真正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一直教导我们,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我们最最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首创精神。我们坚定地相信,革命造反派夺了权,只要高举

^① 《沉舟侧畔千帆过》,《文汇报》,1967年1月14日。

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把一切支持革命造反派的群众团结起来，逐步建立新的秩序，一定能抓好革命，促好生产。”“革命造反派将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学会夺权，学会掌权。”“只要他们努力去掌握毛泽东思想，善于在斗争中团结大多数，及时总结经验，有错就改，坚持斗争，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革命造反派。”^①

一向见风使舵的陈伯达也不失时机。1月14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将王力和关锋（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编者注）给《红旗》杂志写的一篇评论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呈送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于是，这篇文章以《红旗》杂志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1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上。文章说：

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势如破竹，锐不可当，他们正在乘胜追击，扫荡

^① 《沉舟侧畔千帆过》，《文汇报》，1967年1月14日。

抗拒历史车轮前进的垃圾。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提出的革命方针和采取的革命行动，给全国树立了榜样，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经验。^①

这篇评论员文章对所谓“上海经验”加以集中提炼。文章说，上海造反派的“经验”是多方面的，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文章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到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这是此阶段中国“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文章说：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市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

^①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红旗》杂志，1967年第二期。

告》，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在一个市的范围内，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①

文章宣称，上海工人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伟大贡献，就是他们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无所畏惧”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举行大反击，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这正是值得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学习”，值得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的最主要的东西。

文章说，上海的“大革命”，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首创精神，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

文章进一步说，上海的“经验”证明，必须紧紧把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必须向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化等等，进行坚定的、不调和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维护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

^①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红旗》杂志，1967年第二期。

大民主”。

文章宣称,上海“革命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目的是很鲜明的。这就是发动广大群众打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

这篇文章还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是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崇高评价”,也是向全国革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

1月1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说,“革命的、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在以上海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各种“革命力量”大发展、大联合的形势下,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杀”出来了。

社论中说,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资产阶级右派”手里夺回了报纸的领导权,把人民喉舌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创举”。对此,社论中说:

“我们党的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它最能够影响广大群众的灵魂,影响群众脉搏的跳动,影响群众的思想情绪和政治方向。”“《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毅然决然起来造反,联合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夺回了领导权,扭转了

报纸的资产阶级方向,使这两张报纸真正成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喉舌,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武器,成为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有力武器。这些革命同志,做得是何等对,何等好啊!”“看看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吧!”“一扫过去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立场鲜明,尖锐泼辣,充满了战斗的气息。”“在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中,《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们,为全国革命的新闻工作者作出了好榜样。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无产阶级的革命报纸都要有崭新的战斗风格,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爽爽快快,毫不含糊。”^①

虽然舆论造了一大堆,然而张春桥、王洪文等在上海的“夺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上海市的广大群众对张春桥一伙胡作非为颇为不满。其他群众组织也不满意“工总司”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独掌大权的局面。有些群众组织甚至还试图干脆夺取上海市的政权,以掌握主动权。因此,在1月6日召开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后的一个月时间里,上海“夺权”斗争中出现了你争我夺的局面。

^① 《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人民日报》,1967年1月19日。

1月15日凌晨3点多钟,上海“工总司二兵团”和“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即“上三司”)等11个造反派组织进驻上海康平路市委机关大楼,宣布“夺权成功”。

此时的“工总司二兵团”司令耿金章在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室正襟危坐,一口气发出3项通令: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任命张春桥为上海市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勒令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关干部,回原岗位办公。

得知耿金章擅自夺权,身为“工总司”司令的王洪文非常恼怒。而城府较深的张春桥,虽然受不了“耿司令”那副俨然一派“上级”的神态,但他不像王洪文那么鲁莽。张春桥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将“耿司令”说服了。上海的第一次“夺权”宣告破产。

“上三司”的头头赵全国等人,对张春桥一伙压制他们“一·一五”“夺权”深为不满。于是,1月23日,赵全国等人率领手下造反派再次进驻康平路,宣告“夺取上海市委一切权力”。

张春桥获悉后,立即召集紧急会议,下达命令,对“上三司”采取“革命行动”。

于是,王洪文出动他手下的“铁拳头”,只用了半天功夫就将进驻市委机关大楼的“上三司”红卫兵打得逃之夭夭。赵全国被张春桥扣上“伪造周总理指示”的罪名,蹲了7年监狱。上海的第二次“夺权”也以失败而告终。

“上海市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编者

注)的红卫兵们眼看上海大权就要落到张春桥、姚文元之手,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1月24日晚,“红革会”的红卫兵们骑着摩托,坐上汽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冲到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办公大楼,夺走了象征权力的23颗印章。他们认为,有了这23颗印章,上海“夺权”便宣告成功。

于是,这些红卫兵们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夺权通告》。

张春桥得知“红革会”的行动后,立即派徐景贤处理此事。

徐景贤自恃“后台硬”,并不把“红革会”放在眼里,一见到“红革会”的头头就威胁他们交出那些大印,否则,就会对他们采取“革命行动”。

本来在“一月风暴”之后,上海的一些红卫兵和群众,就对张春桥的一系列言行产生了怀疑。以“红革会”为首的几个红卫兵组织在调查搜集张春桥材料的基础上,察觉到张春桥历史上的问题和疑点,认识到张春桥是个“两面派”。并且,红卫兵组织在上海外滩、南京路上贴出了《一问张春桥》、《为什么?——20个问张春桥》等大字报,贴出“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等大标语。

而此时徐景贤的话,更是惹怒了年轻气盛的红卫兵头头。张春桥一伙对“红革会”的斥责和威逼,使“红革会”更恨透了张春桥。

1月26日,“红革会”“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一致决议,通过采取迂回战术,先干掉“徐景贤徐老三”,抓住“材料袋”,再干掉“张春桥张老大”,“姚文元姚老二”。

1月27日夜,复旦大学“红革会”40余人在上海市委党校,突然把前来谈判的徐景贤劫持到复旦大学一个秘密处所,要他坦白交代张春桥的问题。

“红革会”的这一举动,使张春桥极为恐慌。张春桥立即命令上海警备区调部队对“红革会”进行镇压。

张春桥的心腹,时任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徐海涛,奉命带领全副武装的4个摩托车排和一个步兵连,包围了复旦大学“红革会”总部,强迫“红革会”交出徐景贤。一贯自称“支持学生运动”的张春桥,竟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先用武力镇压学生的人。

面对重兵压境的形势,红卫兵们毫无惧色,当场揪住徐海涛,质问他到底是什么人派的部队,为何要派部队镇压红卫兵。

经过一番折腾,徐海涛并没有抢回徐景贤,只好率领部队退出复旦大学。

这件事更激起了红卫兵们的极大愤怒。1月28日,拥有6万之众的“红革会”小将们在上海街头刷出排炮般的大字标语:“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张春桥算老几”、“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警惕反革命两面派”、“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等。

“工总司二兵团”因为“夺权”失败,因而与“红革会”的关系变得日渐亲密,对张春桥的恨也与日俱增。当红卫兵掀起“炮打张春桥”高潮时,“工总司二兵团”立即出动人马,在南京路上刷出了轰动一时的大标语“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

台”。

一条条大标语，如同一发发炮弹，把张春桥、姚文元炸得胆战心惊，如坐针毡。但是，张春桥毕竟有“政治斗争”经验。镇静下来后，张春桥决定与姚文元一起，入“红革会”的“虎穴”，以“中央首长”的牌子威吓一下反对他们的红卫兵。

1月28日下午，“红革会”的头头云集上海市的“中苏友好大厦”，准备召开全市性的“炮打张春桥大会”，组织10万人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气氛热烈的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当众人正准备离开时，张春桥、姚文元各带一名秘书到了会场。

顿时，“红革会”小将们有的打开《毛主席语录》，有的直呼“张春桥”其名，向他发出一个又一个“炮弹”，质问张春桥“为什么派军队镇压红卫兵”、“你说，旧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你也是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你难道不是修正主义吗？”

有的红卫兵当场指出“张春桥是两面派”。

张春桥、姚文元二人本想以“中央首长”的牌子威吓一下反对他们的“红革会”小将们，结果却弄巧成拙，陷入红卫兵的重围，难以脱身。

红卫兵与张春桥、姚文元这种面对面的斗争，从1月28日晚上7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长达6个小时之久。红卫兵让张春桥、姚文元站在那里，叫他们低头认罪。张春桥、姚文元第一次尝到了被批斗的滋味。

1月29日，从“红革会”溜走的张春桥、姚文元为了摆脱险境，扫除障碍，使出了浑身解数。张春桥先是想调解放军镇

压学生,但解放军了解真相后很快撤走了。张春桥又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歪曲事实真相,向陈伯达、江青求援。同时,张春桥又告诫徐海涛要随时准备镇压游行队伍,告诉王洪文怎样让“工总司”对付“红革会”。

“中央文革小组”深知对张春桥的任何一点动摇,都会导致上海的整个局势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而最终会“殃”及自己。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立即向上海发出“特急电报”,要求红卫兵不应把斗争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张春桥;不能组织10万人的游行;要放回徐景贤。

张春桥收到“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后,立即下令印成8开,印刷20万份,印完后立即出动广播车,宣传散发。

当天晚上,“红革会”联合其他组织,在复旦大学礼堂召开了“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决定第二天在上海市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并定于上午8时开始示威游行。

1月30日清晨6点,几十辆“工总司”宣传车驶上街头,几万名“工总司”造反队员走上街道。王洪文一面紧急出动数万名造反队员控制交通要道,封锁人民广场,阻止“炮打张春桥”的大游行,一面派人将“炮打张春桥”的标语、大字报用“中央文革小组紧急电报”覆盖上。

“红革会”准备“炮打张春桥”的游行流产了。

“红革会”看到“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得知“工总司”已在调动人马,除了取消全市大会和游行示威外,又不得不在强大的压力下于当天上午释放了徐景贤。

至此,上海的第三次“夺权”也昙花一现,宣告失败。

这样，张春桥趁机利用“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给这次斗争扣上“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的罪名，在全市发动起“反逆流”活动。参加“炮打张春桥”的人因此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据初步统计，全市因参加“炮打张春桥”而遭受迫害的（不包括一般请罪、检查——编者注）达到2500人，其中隔离审查两百余人，被办学习班的440人。后来在审查中被逼死5人，逼疯6人，被打成残废和造成终生疾病者为数更多。

“一月风暴”的“黑旋风”摧垮原上海市委、市领导机构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就开始筹备自己的“政权”。

早在1月19日拼凑班子的会议上，张春桥狂妄地将“一月风暴”称为“一月革命”，想把“一月风暴”同巴黎公社和苏联十月革命相提并论。张春桥还提出，全市政权机构可以称做“新上海公社”，成立宣言以《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为题。

由于造反派组织接二连三地进驻康平路市委机关大楼宣告“夺权”，特别是“红革会”的“炮打张春桥”运动，弄得张春桥焦头烂额。等张春桥一伙击败对手的“夺权”从“炮打”旋风中挣脱出来，其他一些省市的造反派已经成立了权力机构，作为“一月革命”发源地的上海反而显得落后了。急于在全国树立夺权“典范”的张春桥，赶忙拧紧了“夺权”这根弦。

张春桥准备用一个崭新的权力名称来维护上海的领先地位。张春桥觉得“新上海公社”缺乏关键的“人民”二字，没有体现“大联合”的精神。于是，张春桥与姚文元商量了一下，立即召集十几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座谈，提议将“新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在张春桥一伙看来，“上海人民公

社”这个名字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精神。

毛泽东1958年8月视察河南、山东时曾说过“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虽然毛泽东当时指的是农村人民公社，但张春桥一伙认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上海市的权力机构称做“上海人民公社”也应该很好；而且，毛泽东曾称赞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说明毛泽东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既然北京可以称做“北京人民公社”，那么上海也可以称做“上海人民公社”。

确定了以“上海人民公社”为上海权力机构的名称后，张春桥立即给在北京的陈伯达打电话，将其想法告诉了这位“理论权威”。

张春桥没想到陈“老夫子”的想法跟他不谋而合。陈伯达还特意向张春桥透露，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成员名单。张春桥听后更为自己取了这样好的一个名称而骄傲。

正当张春桥一伙精心筹组“上海人民公社”之际，以“工总司二兵团”为首的32个造反派组织成立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编者注），也在秘密筹组“新上海人民公社”，声称要“夺取上海一切权力”，与张春桥一伙唱对台戏。

张春桥、王洪文探明消息后，咬牙切齿。这一次，张春桥又亲自出马，以软硬兼施的方法“降服”了耿金章。耿金章当即表示要加入“上海人民公社”。“大联委”和“新上海人民公社”随即宣告垮台。上海的第四次“夺权”还未出笼，就被张

春桥“防患于未然”了。

在上海“一月风暴”后的一个月时间里,4次全市性的“夺权”斗争,都被张春桥等人搞垮。打垮这些组织后,张春桥等人创造出符合“文化大革命”要求的权力机构。

2月5日,《文汇报》在头版刊登了题为《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诞生》的长篇新闻。

《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诞生》一文中说:“20世纪60年代的新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热烈支持下,今天宣告诞生了。从此,上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①

当天下午,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汇集了上百万群众,举行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等登上主席台。这次大会堂而皇之地宣告旧的上海市委、市人委已经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了,上海的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会议宣布,张春桥任“上海人民公社”主任,姚文元、王洪文担任“上海人民公社”副主任。

张春桥在会上发言时“谦虚”地说,姚文元和他两个人从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他们宣称要“下定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

^① 《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诞生》,《文汇报》,1967年2月5日。

起,作上海人民的‘勤务员’。”

张春桥还在会上发布了“上海人民公社”的“第一号通令”,凡是反对“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上海人民公社”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立即逮捕法办”。

姚文元在会上发言时,则站在“理论”的高度分析说,“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新形式”。“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上而下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

最后,“上海人民公社”发出宣言说,他们一切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

成立大会结束后,百万群众举行了空前的大游行,长长的队伍涌向上海外滩市委大厦。当天下午5时30分,长达数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下来浇上汽油,一把火烧了。“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被挂上。“上海人民公社”就这样诞生了。

2月7日,张春桥、姚文元炮制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被刊登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题目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同一天,《文汇报》还发表了题为《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的社论。社论中称“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重新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

式”。

社论说，“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提供了“无产阶级重新夺权重要经验”。“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崭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丰富”和“发展”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苏维埃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社论说，“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具有无比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必将以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

同时，为了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认可，“上海人民公社”一成立，张春桥就立即将这个�息报告了毛泽东。张春桥在《给毛主席致敬电》中说，“我们捧着红彤彤的语录，向您老人家报喜了。我们把旧上海市委、市人委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了。”

张春桥在致敬电中还说，“是您，亲自支持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首创精神”。

张春桥、姚文元希望“上海人民公社”能获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在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天天为之赞美称呼的同时，他们一起将目光聚焦于《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只有《人民日报》的报道才意味着中央对地方新政权的承认。

但是，《人民日报》连续几天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只字不提。中央电台对“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也未予广播。

那些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组织看到

“上海人民公社”没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赞同，再度活跃起来。上海的街头巷尾贴满了醒目的大字报：《一问上海人民公社》、《二问上海人民公社》、《三问上海人民公社》。

随着《人民日报》天天的沉默，“问号”也相继增加到《八问》、《九问》、《十问》。因“炮打张春桥”而濒于覆灭的“红革会”也再次活跃起来，通过各种渠道在群众中散布，“上海人民公社”没有请“红革会”参加，所以《人民日报》不登。

被张春桥“降服”的耿金章，也立即与“大联委”的有关人员秘密商议组建“第二上海人民公社”，再度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抗争。

与张春桥一伙对立的造反派们越来越起劲，后来干脆组成“进京代表团”，到国务院接待站告张春桥、王洪文一伙的状。有的造反派甚至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上海人民公社是非法的、单方面的夺权，上海人民不承认，党中央不承认”等大标语。

直到2月12日，毛泽东才为“上海人民公社”的事找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惶惶不可终日的张春桥、姚文元又提心吊胆地赶到北京。

从2月12日到18日，毛泽东先后找张春桥、姚文元谈了3次话。毛泽东说，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后来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问题很复杂，因此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一些。

对“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提出了质疑。

毛泽东问张春桥、姚文元是否考虑过“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的一系列问题。如果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

院该怎么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叫。毛泽东认为,这样岂不就要改变政体问题、国号问题。

毛泽东问张春桥、姚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社长。毛泽东说,如果改变了国号,外国的大使都要作废,要重换大使,重新承认,这会影晌国际关系。

毛泽东又说,如果叫“公社”,党怎么办,党委放在哪里。公社里有党员,有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面有党员,有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终究还是有个党嘛”。

张春桥原以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会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成为全国的“楷模”,没想到反挨了毛泽东一顿不重不轻的批评。

叶剑英后来也在怀仁堂碰头会上严正批评了这种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就擅自改变名称的做法。

2月19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规定各地建立新政权时不要使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张春桥回沪后,只好无可奈何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通知精神。

2月23日,上海又召开了一次百万人集会,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刚刚成立十几天的“上海人民公社”消失了。

后来,有关党史专家学者在研究“文化大革命”时,不能不研究上海的“一月风暴”。他们在评价“一月风暴”时说,如果把“文化大革命”比做一只已经滚动的巨型轮子,那么“一

月风暴”确实给这只“轮子”施加了强大的推动力,促使它飞速向前滚动下去。

上海的“一月风暴”是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利用急剧升级的“左”倾错误而一手制造的事件,但它一直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与支持。正如杨秀峰曾经指出的那样,还有一些问题,林彪、江青等人的罪责和领导上的错误交叉、纠缠在一起,不能分清。“一月风暴”就是一例。

由“一月风暴”引发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否定了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人委,造成了全国“全面夺权”、“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使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了9.6%,成为10年“文化大革命”中工农业产值最低的一年。“一片红”并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而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在中国共产党光荣而伟大的历程中留下了一小段黯淡的足迹。

为此,中共上海市委于1978年12月4日上呈中共中央《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从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窜回上海,到2月5日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一段时间内,他们从上海打开缺口,进行“全面夺权”的阴谋活动。“一月革命”完全是一场“反革命风暴”,一股“反革命逆流”,是林彪、江青等人搞乱全国,进行全面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

《报告》认为,“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市的17年,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上海市委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广大工人阶级是做出

了卓越贡献的。在这 17 年中,上海市委带领全市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把一个半殖民地的旧上海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城市,把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

然而,张春桥一伙夺权后,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政治纲领,大量制造假案、错案、冤案,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地进行迫害,逐步把上海变为搞乱全国、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基地。上海市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早已十分痛恨,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直到“四人帮”彻底垮台。

《报告》最后庄严宣告,在所谓“一月革命”中被公开点名批判的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杨西光等,所有受迫害的“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和干部、群众,以及一切假案、错案、冤案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予以统统推倒。

《报告》宣布对参与策划所谓“一月革命”,并在以后继续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主要骨干分子逮捕法办,以平民忿。

同时,《报告》向干部和群众宣布,策划这一反革命阴谋的,只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余党,各群众组织和群众是受蒙蔽的,是没有责任的。

后来,中共中央于 1979 年 1 月 4 日将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转发至全国县、团级党委,将上海“一月风暴”的真相昭示于众。



第五章 拍案而起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

“全面夺权”引起灾难性后果 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忧心如焚 中央军委碰头会上的争论 所谓“大闹京西宾馆” 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激烈斗争 毛泽东：“总是红卫兵、工会、造反司令部不行” “大闹怀仁堂”的前前后后 谭震林写信痛揭江青“比武则天还凶” 康生决定把“最高统帅”请出来 林彪：这回又有好戏看 周恩来劝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主动“找主席检讨” 毛泽东：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 怀仁堂的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 正义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 全国性反击“二月逆流”高潮 毛泽东在家里开了一个“团结会”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为“二月逆流”定性 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

人“不一定恨得起来” 邓小平：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1月4日和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被上海的造反派“夺权”。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轮番接见造反派，集中宣传“夺权”。

此后，“夺权”之风迅速蔓延到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都被打倒。

在很短时间内，全国形成“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大动乱局面。各省、市主要领导人纷纷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被剥夺全部权力，原有的党政机构陷于瘫痪。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煽动和支持造反派诬陷迫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张春桥的授意下，造反派组织游行示威，在社会上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1967年1月，戚本禹又在中南海内煽动围攻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1月4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因抵制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保护一些领导干部,被江青、陈伯达、康生诬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在这天,陈伯达在接见“赴武汉、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成员时,突然发表猛烈攻击陶铸的言论。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后,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于是,一夜之间,“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标语贴满京城。

原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未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的情况下,就宣布“打倒”了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打倒后,江青、陈伯达、康生控制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权,进一步攫取了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1月6日,在江青等人的怂恿下,清华大学红卫兵以极不正当的手段将刘少奇夫妇骗出中南海,并把王光美带到清华大学批斗。

1月6日这天,刘少奇突然接到女儿刘婷婷的电话,说姐姐刘平平因车祸把腿摔断,必须家长签字才能办住院手续。刘少奇夫妇不知有诈,王光美急忙登车赶往医院,半路就被造反派劫持到批斗会场。

一时间,“夺权的黑风”扫荡了中国大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安徽省委书记的李葆华、福建省委书记的叶飞被打倒后,人在何处,是生是死,周恩来多方查问,均无消息。

更为严重的是,“中央文革小组”通过造反派散布“新文

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造反组织多次包围中南海，要揪斗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

偌大的北京城，惟一尚未被造反派染指的中南海，其西门、东门，也先后被造反派冲开5次，均是周恩来亲自出面，好一番苦劝，才得以维持起码的秩序。

名义上还在主持工作的谷牧、余秋里也遭到围攻、批斗。北京街头连续出现“打倒周恩来”的标语。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煽动打倒朱德。朱德的家被抄，诬陷攻击朱德的大标语在北京街头广为张贴。江青还向造反组织公开宣布“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社会上很快掀起反对贺龙的浪潮，贺龙的家也很快被抄。

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行动，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致使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首遭其难。

1月10日，江青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进一步抛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纲领和措施。林彪阅批“完全同意”之后，《解放军报》社论公开了这个口号。次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流传全国。

随着“全面夺权”的迅速蔓延，其灾难性的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本地区、本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停职、“罢官”；各路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纷纷拉帮结派、自立山头乃至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大

量流血事件；无政府主义浪潮恶性泛滥，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由于各级党政机构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业务指挥系统失灵，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交通损失加剧，面临停顿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局势，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5个月前开始的“红卫兵运动”，难以为大多数领导所理解和接受，那么，这时从上海开始的“全面夺权”，更不能不遇到各种抗争。

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到在全国造成极大混乱的上海“一月夺权”，林彪、江青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策动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篡夺领导权，别有用心地搞乱党、搞乱国家、搞乱军队的做法，使老一辈革命家忧心如焚，引起他们极大的愤懑。而由此导致工农业生产进一步被破坏、社会秩序进一步混乱、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生活供应陷入困境的严重局面，则引起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更加担心和忧虑。

这种忧国忧民之心和对林彪、江青等人倒行逆施的无比愤怒之情，终于导致了1967年1月下旬和2月中旬的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和军队的高层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对抗。

在周恩来主持的2月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老一辈革命家，同林彪、江青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月间，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就军队是否搞“四大”、军队要不要稳定等问题同林彪、江青等人展开了斗争。

1月初，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决定从1月8日起连续在北京召开军委碰头会、军委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讨论处理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

在会上，林彪主张军队要搞“大民主”。林彪说，“机关要彻底搞”。对老干部，“有的要烧，不但烧，有的还要烧焦”；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的贴大字报；有的进行开会批评。

刚被任命为全军“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与陈伯达和康生等一起也在会上推波助澜，攻击人民解放军“滑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江青等人并且说，军队不是“世外桃源”，不能搞特殊，要立即开展“四大”。

林彪、江青等人的意见，遭到中央军委其他几位领导人和大多数与会者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军队战备任务很重，必须保持稳定，不应开展“四大”，并对随意揪斗军队领导干部、随意抓人、抄家、戴高帽子等做法表示强烈愤慨。经过争论，会议决定野战部队不搞“大民主”，军事院校可以搞，但不准串连。

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针对全国、全军混乱不堪的局势，气愤地说：“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①

这时，有的与会者当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

由此可见，会场上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但是，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叶剑英，还是开导大家冷静下来，要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搞好战备。

1月11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为了插手军队，特地跑到钓鱼台十五号楼，要陈伯达去向林彪说情，把她安排到全军“文革小组”当顾问。陈伯达欣然领命，马上通过叶群跟林彪“通融”此事。林彪一直想拉拢江青为己所用，一拍即合，当即宣布任命江青为全军“文革小组”顾问。

江青大权到手，心花怒放，自觉身价顿涨。一次，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群众代表的会上洋洋得意地吹嘘说，她可不像陈伯达“夫子长夫子短”，她是当兵出身的。此后，从没有在军队中担任过职务的江青明目张胆地干预起军队事务。

对于这位炙手可热、红得发紫的“革命旗手”，叶剑英一向是嗤之以鼻的。只要有机会，他就要同江青一伙进行面对面的交锋。

就在江青“荣任”全军“文革小组”顾问的当天，叶剑英出

^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叶剑英传》，第58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月版。

席了由毛泽东提议召开、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丝毫不理会江青提出的“揪军队一小撮”的问题，针锋相对地作了一个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叶剑英说：

“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全国13个军区，有7个军区在搞运动。全军157所院校都在搞运动。到处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目标就是抓各个军区、军种兵种的领导人。三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凡瘫痪了的单位，所有的办事机构、会议室、招待所全部被占领。领导人来一个抓一个。”“现在空军指挥部只好转移到战备工事中去。如果全国空中有什么事，指挥中断了，事情谁去办！”^①

叶剑英讲到激动处，把一张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推到江青面前，指给她看，并严肃地说，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一点，“江青同志不会不清楚吧”。

叶剑英的发言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引起了在座其他人的强烈共鸣。向来伶牙俐齿、巧言善辩的江青一时竟哑口无言，只得咽下了这口气。但江青、陈伯达继续煽动军队开展“四

^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叶剑英传》，第58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月版。

大”。

经过叶剑英等人的据理力争，在周恩来支持下，1月14日，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但是，同一天，林彪却授意《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社论提出，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摇。

第二天，林彪又授意军委发出《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林彪的这些举动，完全与中央通知精神相悖，进一步导致了許多造反派组织冲击军队，其矛头直接指向叶剑英、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德高望重的元帅们。

在“全面夺权”中发生的一个新情况是，由于军队介入地方运动，使各级军事机关也受到了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最严重的冲击。尽管中央明令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但由于种种原因，军队中被认为偏向“保守派”的居多，引起地方上造反派的不满。在军队内部，也开始产生派性，并出现分化。

1月19日下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召开了一次扩大的军委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军委领导以及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共40余人。

这次军委碰头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本来，召开中央军委碰头会的事情应该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提出。然而，在那种毫无组织原则可言的环境中，召开中央军委碰头会却成了江青、叶群等人一手

策划并把持、对叶剑英等人搞突然袭击的工具。

会议开始前，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送了一幅《井冈山会师》的油面，挂在叶剑英等元帅们面前。绷得很紧的亚麻画布上，井冈山峰峦叠嶂。青山翠岭间，5大哨口隐约可见。毛泽东双手插腰，举目远眺，林彪则甩手迈步，一副“紧跟”的模样。

陈毅看着油画大笑道：“这叫啥子井冈山会师么？”

其他元帅和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也跟着大笑起来。

会议召开前的座位排次也令江青无比的恼火。参加会议的4位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台正中，而江青、陈伯达等人却被安排在两边，王力、戚本禹根本没有位置，只好退下主席台，在第一排边上找了两个空位置。

江青显然对这种“屈尊而坐”很不满意，脸色阴沉地望着天花板。

主持会议的徐向前轻轻敲了敲面前的话筒说：“大家静一静，现在开会。”

未等徐向前宣布会议议题，江青突然尖着嗓子喊道：“大会主席，我有个问题要问一下！”

徐向前扭头望着江青：“什么事？”

江青拖长声调问：“是谁下的命令，不许蒯大富进京西宾馆？”

陈毅目不斜视，高声答道：“是我。”

江青面含冷笑地问：“请问陈老总，你为什么不让他进来？”

陈毅也冲江青微微一笑说：“我也请问江青同志，蒯大富是什么人？他有什么资格参加军委会议？”

江青如鲠在喉，无言以答。

陈伯达急忙接话道：“蒯大富是江青同志特意请来，给会议介绍红卫兵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的，我们应该欢迎嘛。”

叶剑英爽朗地笑道：“今天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在座的有军区司令、炮兵司令、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可没有学生司令啊！”

会议还未开始，老师们同“文革派”的交锋就已经开始。这足见会议之紧张气氛。

会议一开始，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人就与江青等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两军对垒之势。

江青、康生、姚文元等人一唱一和地表示军队不能搞特殊，应该和地方“文化大革命”一样开展“四大”。叶剑英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则不同意在军队开展“四大”，坚持要维护军队的稳定。有人采取折中的态度，主张军队要搞“四大”，但又要保持稳定。

叶剑英态度非常鲜明，坚决反对搞“四大”。

叶剑英严厉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略任务很重，如果稳不住，敌人入侵时将无法应付。”

“军队是军队，不能搞‘四大’！”聂荣臻语气坚定地说。

叶剑英板着面孔继续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三大纪律第一条，就是一

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接着，叶剑英质问江青道：“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成了一句空话。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怎么能保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怎么能打仗？不服从命令，打起仗来‘放羊’，军队还成其为军队吗？”

双方针锋相对，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时，坐在一旁的叶群突然借萧华两次接见军事院校来京师生的事情，捏造种种罪名攻击萧华。

叶群说：“现在，地方上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越来越好！可是军队，问题很大！总政主任萧华，公然反对林副统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接着，叶群列举了几条所谓萧华反对林彪的“罪状”，并要他当晚在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作检查。

叶群突然挑起的这一事端，如同给江青一伙打上了一针兴奋剂。他们顿时来了精神。

叶群的话音刚落，陈伯达便接腔：“萧华是一个绅士，不是战士；是洋学生，不是红小鬼。他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江青说：“萧华，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接见红卫兵，你敢不敢去？萧华，你要向群众交待问题。”

萧华站起来反驳说：“我12岁参加革命，我参加革命还是毛主席带出来的，我自认为几十年从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如果说我在工作中有错误可以，但是硬说我是‘三反分子’不行。”

因中央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萧华的问题。中央军委几位副主席对批判萧华持保留意见。

很明显，“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陈伯达一伙围攻萧华的险恶用心是妄图从总政治部打开缺口，搞乱军队，以便他们打倒叶剑英等元帅，夺取军权。叶剑英、聂荣臻对此看得非常明白，极为愤慨，未等会议结束，就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

正在江青一伙胡搅蛮缠、放肆围攻萧华时，周恩来打电话说：“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检查。”

江青等人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当天的会议也就此告一段落。徐向前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纪律。”

但是，会后，北京军区一位领导人在传达会议精神时不慎失密，走漏了消息，总政一位副主任的笔记本也被造反派劫走。造反派组织当晚就知道“中央文革小组”要批判萧华。于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跑到景山东街，抄了萧华的家。

萧华听到风声，立即从后门跑到隔壁的傅钟家，然后坐车去了西山，在叶剑英住所躲了起来，才免遭揪斗。

1月19日夜，周恩来听了叶剑英、聂荣臻关于江青要开万人大会批斗萧华的情况报告后，立即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告诉他们，这个会不要开了。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指示告诉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陈伯达慌乱地说：“总理，昨天我在京西宾馆里讲错了话，请你向主席解释一下。”

江青得知此事，气得直摔文件，不满地说：“都是总理多事，捅到主席那儿，让我们怎么收场？”

康生则说：“萧华躲得了今天，还能逃得了明天？！”

当叶群知道毛泽东的指示后，也急忙打电话，布置京西宾馆收回1月19日会议记录和录音，并让其全部销毁。毛泽东、周恩来保护了萧华。

1月20日，中央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举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公开表示了对“中央文革小组”1月19日批判萧华的不满。

在会上，主持会议的徐向前知道了前一天夜里发生的情况泄密后首先追问：“昨天会议的内容，谁向外透露了？”然而，没有得出结果。

有人看到萧华没有到会，便问：“萧华怎么没来开会？”

叶剑英抱臂端坐，冷眼旁观。这些天来许多被造反派逼得无路可走的军队高级干部们，纷纷躲入了叶剑英的住地。这些情况，“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当然早有耳闻。

只听坐在叶剑英身旁的江青阴阳怪气地问：“堂堂的总政主任失踪了，到哪里去了？”

叶剑英正襟危坐，不予理睬。

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

萧华赶到会场后，气愤地讲述了前一天晚上家被抄的经过。

徐向前听了这些情况后，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我们搞了

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了吗？”徐向前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震落于地。

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也忍无可忍，霍地站起身来，用灼人的目光瞪着江青等人，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担！”

接着，叶剑英痛斥道：“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下场。”叶剑英怒火中烧，边说边用右手猛击桌面。由于过于气愤，叶剑英拍桌子时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折了。可见，叶剑英气恼之极，用力之猛。

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萧华了。

陈伯达相当狡猾。他曾对人说：“经过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编者注）就头疼”。陈伯达这天感到事情不大对头，随后便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电话传给叶剑英，解释说，1月19号下午开会，因为“安眠药吃多了”，讲“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他“否定”，“要收回来”。

萧华在会上说：“总政组织接见来京学生都是经过军委办公会议讨论过的，都是公开的。”

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事件。这件事，后来成了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一条主要“罪行”。

“中央文革小组”在军委碰头会上批判萧华，不过是他们搞乱军队、煽动揪斗军队领导干部许多事情中的一件。这时，军队已陷于混乱，许多军队和驻京部队的领导干部被揪斗，各地频繁发生冲击军事机关的事情，军队指挥系统已经很难正常运转。

在以后几天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叶剑英、聂荣臻等几位老师坚决不同意江青等人要在军队搞“大民主”的主张，列举了大量的军队被冲击的事实，提出“稳定军队迫在眉睫”。

军队的情况越来越紧张。整了萧华，江青等人又整杨勇等高级领导干部。各地军队高级干部纷纷告急。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中央军委扩大的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干部。毛泽东在听取了一些领导干部关于形势的汇报和出现的一些问题后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并且指出，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在主持以后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人一起，反复商量，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

叶剑英说：“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部队搞乱了。”

这时，聂荣臻也毫不犹豫地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后，军委碰头会就军以上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以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的名义向毛泽东提出建议。

建议的主要内容有：大军区、省军区的“文化大革命”要分期分批进行，要同地方“文化大革命”错开，何时开始，要经

中央军委批准；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不许抓人，不许动手打人，不许戴高帽子，不许游街，不许抄家；军队不许夺权；在外地串连的军队人员一律返回本单位；运动一定要坚持党委领导的原则；不许冲击和占领军队领导机关。

此后，经过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努力和争取，《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命令》得到毛泽东批示“照发”。随后，中央军委又连续发布一系列的指示和规定。这些指示和规定对稳定军队起了积极的作用。

《军委八条命令》，反映了中央军委碰头会大多数人员稳定军队的意愿。这个《命令》的颁布是中央军委领导集体同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在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后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在军委碰头会上，中央军委领导集体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斗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二月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军委颁发《军委八条命令》后，周恩来于1月31日向军队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代表阐述了《军委八条命令》。

“大闹京西宾馆”，成为“一月夺权”以后在党内高层领导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抗争的序幕。

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的历史氛围下，不赞成“左”的一套做法的抵抗方式不少是悲剧性的。

1966年底，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因为抗议江青一伙的迫害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67年1月，在“造反”、“夺权”的狂潮中，党、政、军高层领导人的

“非正常死亡”竟连续发生。

他们中属于“非正常死亡”的包括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的阎红彦(1月8日——编者注)、时任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1月22日——编者注)、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的张霖之(1月22日——编者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的卫恒(1月29日——编者注)等。

当周恩来得知张霖之惨死于造反派凌辱和毒打之下时,陷于极度悲愤之中。

周恩来异常激动地质问造反派:“这么一位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

此时在场的谷牧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清醒地看到周恩来是眼含泪水,手持张霖之遍体伤痕的照片讲这番话的。谷牧说,看着他那亲切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有鉴于此,1月下旬,周恩来在许多场合严厉地批评造反派“打倒一切”的行径,并指出,不能认为带“长”字的一概不要。周恩来对造反派说,那么多部长、副部长都统统不要了吗?不能,局长也不能。这样下去会走到反面。

周恩来说,上海“一月夺权”消息公布后,估计10天左右会出现连锁反应。“夺权”不能看成到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结果统统都是,哪还有“一小撮”?还有什么“区别对待”?

周恩来说，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长”字号都是铁板一块的“黑帮”？！

1月31日，在华北局机关面临“夺权”威胁时，周恩来明确宣布，华北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关，造反派夺他们的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周恩来并且当场质问造反派：“你们谁想当华北局第一书记？”

周恩来还批评铁道部的造反派说，为什么就联合不起来？再这样下去，要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理。周恩来强调，对老干部不要笼而统之一概打倒，将“大民主”与“个人独断”结合在一起，这样脱离群众会走向反面的。

2月2日，周恩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

“（一）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即中央文革小组——编者注）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

“（二）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谢）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周恩来之所以要提出第二项决议(即召开怀仁堂碰头会——编者注),是因为从1月中旬起,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等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资格。周恩来力图在这种非常状态下继续保持一种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以便决定党和国家经常工作中的大事。

然而,“中央文革小组”的钓鱼台碰头会,主要是商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在周恩来看来,把“文化大革命”和党政的经常工作分开,可以避免各项业务工作受到干扰。

在“全面夺权”的形势下,许多被“夺权”的地区和部门出现了空前混乱的局面,各项业务工作已不可能再正常地进行下去。2月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给陈伯达等人及“中央文革小组”的这封信上批示:“此件不用,退周。”

此时,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夺权”,使大批老干部被打倒,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已处于瘫痪状态。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全国夺权”形势的发展。

毛泽东发现在全国“全面夺权”中,普遍存在着“夺权”的组织中领导干部很少,有“打倒一切”的问题。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甚至有的地方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

毛泽东意识到,没有有经验的领导干部站出来支持“夺权”和掌权,“文化大革命”无法继续进行。为此,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打倒一切”的谈话,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党的领导还是要的”,批驳了“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并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独断专行提出

了严厉的批评。

2月3日,毛泽东同外宾谈话时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

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指出:过去中国共产党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些话表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惟一能解决所谓“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问题的一种形式。

同一天,《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毛泽东对这篇社论的第三部分作了修改和增添。

在这篇社论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始创造并将继续创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①

不久,当张春桥把筹建上海领导机构的情况报告给陈伯达时,陈伯达便将社论中的这段话告诉上海的张春桥。陈伯

^① 《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

达并转告张春桥，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张春桥得知这一消息，马上提议把“新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陈伯达还试着为“上海人民公社”起草了章程。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严厉地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说，像这样大的问题，不请示就擅自作主，发号施令，“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搞独立王国!?”

同一天，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出席外，叶剑英、江青、王力也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反映，由于一些人被打倒，书记处负责的日常工作没有人抓。周恩来说，邓小平不能工作以后，书记处就名存实亡了；陶铸被打倒以后，书记处就不存在了。

对此，毛泽东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因为早在中央1967年1月11日致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中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署名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就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拿出2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2月3日关于“湘江风雷”的情况报告所作的批示。这个批示的主要内容是，认为“湘江风雷”是“反革命组织”，对这个组织要采取“专政措施”。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康生说：“为什么匆忙发出这个指示？也不送给我看。”

毛泽东进一步批评说，“文革小组”没有民主集中制，这怎么行？直到现在还没建立起制度。不只是“文革小组”内

部没有民主集中制,而且“对我也不报告”,“文革小组”没有经过正式会议作出过决定,各人说各人的,康生说一套,陈伯达说一套,江青说一套,对上面没有报告。

对于这件事,毛泽东很生气,先后两次调阅原件,指示“中央文革小组”要彻底纠正,公开检讨。后来在8月10日的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中,“中央文革小组”受到公开批评,中共中央为此事承担了责任。

2月6日,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再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严厉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

毛泽东在会议上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运动发动起来了,你们有功,你们现在骄傲。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毫无经验,没有领导过罢工,没有指挥过打仗和群众运动,只是做了些调查研究工作。陈伯达对我从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

在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毛泽东还下了保证说:“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吧!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向干部、群众商量。你们不也是十一中全会选举的吗?抓人只能抓反革命,不能抓犯错误的人,陶铸、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贺龙、朱德等等。”

接着,毛泽东说,以后,在座的,再加上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关锋、戚本禹,每周到他那里谈一次。不要另外搞三四个常委的小组。平常他要多看些材料,一周一次会。日常工作问题由周恩来多作一些。

毛泽东在对“中央文革小组”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擅自作主、不请示和肆意打倒老干部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曾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并叫王力马上打电话叫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立刻引起了老同志们的共鸣。

2月7日,是星期二。从这天开始,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会议由主管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

这次碰头会议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但在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会议按照规定每两三天开一次,时间定在下午。

2月9日,在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上,徐向前和陈伯达为刘志坚的问题争论起来。陈伯达诬陷被撤职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是“叛徒”,指责刘志坚对抗“中央

文革小组”、破坏“文化大革命”。

刘志坚，湖南平江人，1912年出生，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长、宣传部长。1934年，刘志坚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东进纵队政委、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十纵队政委、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副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刘志坚先后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1955年，刘志坚被授予中将军衔。

对于刘志坚的情况，徐向前是了解的。刘志坚是放牛娃出身，很小就当红军。红军长征路上，在川西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徐向前就认识刘志坚。抗日战争中，徐向前和刘志坚又在冀南共过事。在冀南的一次战斗中，刘志坚受伤被俘。冀南部队负责人接到地下党的情报，立即组织部队，在敌军押送刘志坚的途中进行伏击，把刘志坚抢了出来。

因而，徐向前语气肯定地说：“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跟我们打过仗的人，难道还不了解吗？他不是叛徒！”

陈伯达竟不顾事实，蛮横无理地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

徐向前气愤地质问陈伯达：“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

徐向前还针对陈伯达在三座门接见包围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地的群众组织时假惺惺地说的“我不光保你们，也得保徐向前”的话，拍着桌子问他：“谁要你保？我有什么要你

保的？”徐向前并且表示，对于不执行1月28日《中央军委命令》的做法，要采取措施。

2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继续在怀仁堂召开。叶剑英在发言中强调军队不能乱，成立“战斗组织”不好。上述意见，叶剑英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也说过。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叶剑英还质问陈伯达、康生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在针对地方院校支持军事院校学生冲击军事机关的做法提出批评后，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还质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陈伯达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断然说：“这种国家体制的改革是符合马克思创建的巴黎公社的原则的。”

叶剑英讽刺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第二天，因徐向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关锋先给叶群打电话，说徐向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责问他们“还要不要解放军”。他听了“感到不对头”。随后，关锋又与王力、戚本禹联名给陈伯达、江

青写信说，他们参加了最近两次碰头会，感到徐向前的一些讲话和态度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央文革小组”施加压力。

同一天，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上海飞到北京。毛泽东约张春桥、姚文元到中南海谈话，同时要王力通知戚本禹参加（原定戚本禹参加筹建“北京人民公社”——编者注）。

毛泽东首先问王力是否和张春桥、姚文元谈过他2月初批评陈伯达、江青的事。当得知还没有谈过时，毛泽东对王力说：“这里谈完了，你就跟他们谈。”毛泽东并且决定当天下午就开“中央文革小组”会，批评陈伯达、江青。

毛泽东又说：“‘文革小组’成立以后，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讨论重大问题。你们骂别人独立王国，独断专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目无政治局、目无常委。现在你们独立王国起来了。”

接着，毛泽东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戚本禹谈了话。毛泽东在肯定了上海的工作后，要求将“上海人民公社”改过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在谈到党的领导问题时，毛泽东说：“党还要不要？我看应当要，要建立一个改造了的党。不管怎样，总要有一个核心组织。总是红卫兵、工会、造反司令部不行。”

在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闹一两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副科长以上一个不要，那样能掌权吗？”

毛泽东逐一问了一下曹荻秋、陈丕显、魏文伯的情况。随

后,毛泽东说:“没有中级干部,没有有名的干部,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不了权嘛。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

毛泽东并且要张春桥、姚文元回去后作一些老干部的工作,并结合进领导班子。

在谈到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时,毛泽东指出“这是错误的”。毛泽东说,部分改善,可以。但彻底改善,就要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我们发动的。”

对此,毛泽东还要王力写一篇题为《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文章,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回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为什么还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这是个最重大的理论问题,他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与毛泽东的谈话结束后,王力就向张春桥、姚文元传达了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的批评,并通知“中央文革小组”各成员当天下午开会。

在每隔两三天连续召开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2月14日和16日,发生了激烈斗争。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继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这一天碰头会的原定议程是:一、国务院各口“抓革命、

促生产”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提——编者注);二、讨论文件(包括运动中的政策性规定等共6件——编者注)。

到会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谢富治、余秋里、谷牧、王力。此时,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因讨论经济问题同上海有关,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的斗争,是谭震林因上海打倒陈丕显和汛期渔船“停产闹革命”对张春桥、姚文元不满而引起的。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次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面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胡作非为,谭震林早已忍无可忍。

早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谭震林在与陈正人、江一真等农口的同志一起参加分组讨论时,就对林彪在讲话中指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执行了“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和陈伯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了不同意见。

谭震林在发言中认为,刘少奇、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能随意点名批判。谭震林更反对扣“反动路线”的帽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搞“文化大革命”光有群众,没有党的领导不行。

从那以后,一件件,一桩桩事情,不断地在谭震林脑海里翻腾。那么多老干部,一个个、一批批地被揪斗。这究竟是毛泽东的意见,还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主意,谭震林迷惑不解。

像贺龙这样威名赫赫的开国元勋，被造反派冲得有家不能归。周恩来迫不得已将他接进中南海自己家里，造反派还要冲进中南海揪斗，把老师冲得东躲西藏，究竟是谁指使干的？对此，谭震林不但在李富春家里多次讨论，还愤慨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太不像话了”。

更令谭震林感到气愤的是江青这个人。谭震林认为，江青原来在党内除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外，没有其他职务，凭什么在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颐指气使，信口雌黄？！还扬言要“造毛主席的反”。

谭震林十分感慨地对李富春等人说：“我们革命几十年，见过谁这样对待毛主席的？江青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她有什么资格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吵吵嚷嚷？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她凭什么敢用泼妇骂街的语言，这样肆无忌惮？！”

谭震林与江青、陈伯达一伙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原因，是在“一月风暴”以后越来越乱的形势下，发生的所谓“渔轮停港事件”。

国务院水产部所属各渔业公司，在“必须大乱”的口号煽动下拉起了造反队，搞起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在公海渔场捕鱼的船队能不能大乱，渔船上能不能搞“四大”，是主持水产部工作的负责人感到左右为难的一件事。

这些负责人分析认为，如果不同意开展“四大”，就被认为是“用生产压革命”；如果同意搞“四大”，则很容易出乱子。两派冲突，发生武斗，会在国际上造成恶劣影响，这个乱子谁也承担不起。

问题被汇报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那里。谭震林

认真听取了有关部门的汇报,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弊,从具体情况出发,同大家进行了商量,并把商量的意见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指出,鱼汛期间要集中力量捕鱼,鱼汛过后渔船集中一段时间搞运动,还特别叮嘱,要注意安全,不出乱子。

按照这个指示精神,谭震林与水产部负责人肖鹏等共商后决定,在非鱼汛期,各港渔船的武器全部移交海军,暂停一段时间出海,集中搞“文化大革命”;然后集中力量“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出海捕鱼;并由水产部向所属渔业公司正式发出通知,要求各渔港均照此精神办理。

在这个极为混乱的非常时期,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江青、陈伯达却借此大作文章,捏造了耸人听闻的“渔轮停港”事件,诬陷谭震林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魁祸首”。

对此,谭震林当然只能嗤之以鼻。江青、陈伯达还接连4次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打电话给谭震林,查问水产部发那个通知是谁决定的。其中有一次是陈伯达打的电话。陈伯达说,这样的大事,为什么事先不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致使“政治上、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等等。

陈伯达扣的这个大帽子更激起了谭震林的义愤。谭震林回答说:“这样的事,我们完全有权决定,并不是啥子事情都必须经过中央文革的。”

谭震林反问陈伯达对造反派是怎么讲的,谁“破坏抓生产”了,不就是那么几吨鱼吗?

陈伯达知道谭震林的脾气,支支吾吾,挂上了电话。但

是，在背地里，陈伯达却要两面派手法，煽动“批谭”。

谭震林心里明白，有些群众不明真相，不应责怪，实际是江青他们暗中捣乱，想逼他说出周恩来。所以，谈到“渔船暂停出港”这件事情时，谭震林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字涉及周恩来，一切由他个人包揽了下来。只是他更加憎恨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

在极不正常的环境下，对党赤胆忠诚和坚持真理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陈毅、李先念、李富春等老同志只能在家里进行议论。

恰在这时，谭震林从李富春那里得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接见红卫兵时宣布“打倒陶铸”几天以后，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批评了陈伯达。

谭震林并得知毛泽东在会上说，“打倒陶铸”，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毛泽东同时批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眼里只有她自己一个人”。毛泽东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不过，毛泽东规定对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

谭震林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等在一起商议，一致认为，“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的言行，并不代表毛泽东。许多事情是“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背着毛泽东干的罪恶勾当，应该同他们进行斗争。

陈毅对谭震林说：“谭老板，你没有包袱，非你说话不可了。”

这段时间里，谭震林也曾对身边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地讲，他要同“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斗。谭震林还表示，该他“放

炮”了，非把江青等人“轰倒”不可。

但是，斗争情况是微妙复杂、尖锐激烈的。

一方面，谭震林想到，从上井冈山算起，自己跟随毛泽东已有40年了，一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作。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谭震林都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和真理一边。对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他总是坚决地维护和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也确实对他信任的。就在不久之前，毛泽东为了稳住上海局面，考虑到谭震林曾主持过华东局全面工作，熟悉那里的情况，还准备把他派去上海主持工作，“坐镇华东”。

另一方面，谭震林非常清楚，“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是保护的。因此，一旦自己挺身而出，就要同把持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斗，要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出批评。他所面临的，将是一次失败的挑战。

谭震林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不稀罕江青等人的好话，我要是听从江青的那一套，官比谁都大。”谭震林认为自己要“反其道而行之”，坚决站起来同江青等人斗，是因为他要对党、对革命事业负责。

最后，谭震林决定，同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就算斗翻了车，个人的荣辱得失算得了什么？无私，才能无畏！谭震林明知将会失败，将会带来个人丢官、祸及全家的严重后果，还是要带头“开炮”，就是坐牢、杀头，也要斗争到底。

在谭震林下定斗争决心的几天之后，即2月16日，按照周恩来签署的开会通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成员，集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

委员碰头会,主要议题是讨论研究国务院各口的“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谭震林在考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被层层批斗、打倒,“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把党政机关都搞瘫痪了,怎么“抓生产”?这个“炮”,今天一定要放!

会议还没有开始,谭震林见张春桥挟了个皮包,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走了过来。他早就想找个机会,责问这伙人為何任意揪斗老干部?

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经周恩来具体组织和安排,陈丕显、江渭清等一批省、市主要负责人被批准接到北京。谭震林以前曾与陈丕显在一起工作过,并得知毛泽东已批准陈丕显进京。但陈丕显却被扣在上海。

所以,谭震林站起身,对走近眼前的张春桥劈头就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对张春桥其人,本来没有什么好感。20世纪50年代初,谭震林在担任华东局领导工作时,已经就《解放日报》上有关“新三反”揭露所谓“官僚主义”的文章,对时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张春桥作过批评。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在“文化大革命”中青云直上的张春桥,还真没有想到会有人敢当众向他提出责问。张春桥怔了一下,打着官腔回答说:“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一听,反驳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吗?”

张春桥冷笑一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听了十分生气,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就这样，会议还未开始，斗争就已经开始了。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宣布会议开始后，谭震林第一个发言。他严肃地提出陈丕显回京的问题。谭震林说：“张春桥同志说，上海科长以上干部全部被打倒了。我不知他们犯了什么罪。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说话时，目光直逼张春桥。

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他来不来北京，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张春桥的回答愈加激怒了谭震林。谭震林再也忍不住，用拳头擂打着桌面，厉声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气愤地指着张春桥的鼻子说：“你们的目的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要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把老干部搞掉！”

谭震林越说越激动，手指在座的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说道：“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针对“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的倒行逆施，谭震林横眉怒目，仗义执言。谭震林斥责说：“你们批什么‘反动血统论’，结果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谭震林又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丑化我们党。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谭震林把半年多憋在肚子里的话，像排炮一样射出来。他严正地说，他经历了多次党内斗争，这一次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

谭震林洪亮的话音响彻了会场。义正辞严的斥责，使张春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感到突如其来，霎时间都张口结舌，惊呆了。

谭震林当着这伙人的面又提出了所谓“渔轮停港事件”，并指名道姓地直斥江青。

谭震林说：“渔船的事情，连着逼了我4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

会场的气氛愈加紧张了起来。

这时，谢富治插上了话，讨好地说：“谭老板，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多次保过你，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对谭震林来说，这无异于火上加油。谭震林想，他同许多老同志一样，在党的领导下，九死一生打江山。那时，江青这伙人还不知在哪里，今天用得着他们来“保”？谭震林怒不可遏地拍着座椅的靠手，大声说：“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说着，谭震林站起来撩起大衣，拎起公文包便走，打算离开会场，干脆不参加碰头会了。谭震林愤慨地对张春桥等人

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谭震林为了表示自己对党负责，表明一个老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无所畏惧的斗争决心，还当众宣布：“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完，谭震林就往外走。

见盛怒的谭震林准备中途离开会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连忙劝阻，要他回来。

陈毅也帮着说：“谭老板，不要走，要留在里面斗争！”

谭震林走了几步，转回身子，面对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儿也不去了。”

李先念提醒道：“你要是走了才有人高兴呢。”

谭震林没有走。他和参加碰头会的老同志一道，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继续唇枪舌剑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陈毅怒火中烧，大声说道：“这些家伙上台，才是真的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有人背着主席和中央大搞抢救运动，结果搞错了许多人，最后还得向人家认错。在座的有整人的，也有挨整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吗？”

陈毅说话时，目光直视着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康生。因为在延安整风时，康生一手导演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使许多干部蒙受了不白之冤。康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叶剑英瞥了康生一眼，慢悠悠地说：“如今有些人养成一种很不好的习惯，不管干什么事，都爱打主席的旗号，好像这样一来就能把别人的嘴巴封住。这叫什么？这叫政治诈骗！有好多东西，我原来以为是主席的，后来才慢慢明白，其实不

是。”

叶剑英还说：“毛主席一再强调，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随随便便一棍子就打倒。可这些人就是不听，不仅批斗、关押，还在全国范围内大搞逼供信，恨不得把老干部全整死。”

聂荣臻插话说：“整死了他们好上台。”

余秋里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说道：“现在有些人就是借文化大革命来整老干部，你们文革小组可以看看嘛，全国打死多少，打残多少，被关起来多少，被逼得自杀多少，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专案组，简直像法西斯、宪兵队。我对造反派讲了，你们这样对待老干部，我就不检讨，连你们的会也不去参加！”

谢富治说：“你们不要这样讲，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经常讲谭老板的好话，这我们都是听到的。但主流还是好的。”

李先念还没等谢富治把话讲完，就打断谢富治的话，一改平时讲话不紧不慢的节奏，语言显得急促。李先念说：“你不要在这里和稀泥！什么主流？难道斗争老干部讲主流，对待老干部就不讲主流吗？就该统统打倒吗？你们不要以为靠某些人撑腰就可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老干部还没有全被隔离审查。我们还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还有讲话的权力。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中学生组织的‘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娃娃嘛！”

李富春站起身，把一摞刘少奇、陶铸、彭德怀等人被揪斗的照片和材料扔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面前，威严地说：“你们看看吧，这是所谓的批判。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哪！”

被折磨成什么样子？”

张春桥、姚文元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组员们缄口无言，目不正视。

谭震林又忍不住了。他激动地说：“我从来没哭过，现在哭了3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我只能偷偷地背地里流眼泪。”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指着康生等人说：“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我哪一点反对毛主席？！”

谢富治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我们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当即把谢富治的话顶了回去。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我们整个党！”

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被打掉了！”

提到1966年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康生掩盖说他“没看到”。

周恩来又问在座的其他“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请示谁没有”。陈伯达连连搪塞说，“可能是秘书处理的，并表示回去查查”。

周恩来严厉地说：“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现在政治局还没解散么！陈伯达说是疏忽了，以后一定要注意。”

徐向前生气地补充说：“今天在座的除了你们这一批人，

哪一位没被炮轰过，没被批斗过？有的还被抄家，被盯梢，连孩子都被抓起来了。”

李富春平和而严肃地说：“如果我们不讲话，违背良心讲时髦话，就不会得罪人，就平安无事。可我们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要敢讲真话，就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希望文革小组的同志认真地听取老同志的意见，把运动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陈伯达低头哈腰地连说：“我们回去一定研究。”

谭震林说：“10月5日的《紧急指示》（即《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编者注），你们总是知道、看过的吧！提出取消党委领导，我看消极面是主要的！”

就在会上舌枪唇剑地辩论时，张春桥的脸像冻住了一般，毫无表情，惟有眼珠子在转动。谁“放炮”，他的眼珠子就朝谁瞪。他竭力用脑子记住对方的每一句话。张春桥并不马上“回击”，他向来的策略是“后发制人”。

坐在张春桥一侧的姚文元、王力，则仿佛成了记录员似的，两支笔在本子上刷刷地记着，记下对面射来的每一发“炮弹”。

会议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周恩来问康生：“你还有什么要讲的话？”

康生摆摆手说：“没有，没有，我有点头痛。”

于是，几位老师和副总理簇拥着周恩来走出怀仁堂。

这次著名的“大闹怀仁堂”，曾被党内外广为传颂。这次会议与此前召开的京西宾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论争，集中到一点，就是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中央文革小组”一伙

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以所谓“群众”的名义取代党的领导，这是“文化大革命”造成“打倒一切”动乱局面的一个重要方面。

谭震林在怀仁堂当众斥责张春桥以拉“群众”当幌子，正是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所以，张春桥在以后接见红卫兵时，曾恶狠狠地说，“二月逆流”是什么？一句话，“二月逆流”就是“谭震林炮打中央文革”。

但是，斗争并没有到此为止。“大闹怀仁堂”之际，林彪尚未暴露，仍是“副统帅”。

所以，这次会议结束后，谭震林就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不限于“抓革命、促生产”，主要是揭露和批判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罪行。谭震林于第二天将信发给了林彪。

谭震林这封信，以他惯有的风格，不转弯，不粉饰，单刀直入，大义凛然，开宗明义地说：“本来，我在今天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把原该说的话已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如算斗争，这是第三次反击。”

谭震林说，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指陈伯达打电话追查“渔轮停港事件”时，冲陈伯达发脾气的事。第二次是在2月16日的会上。他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

谭震林在信中指出，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人”，但他们根本不听毛泽东的指示。他们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

谭震林指责江青等人，一句话就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真比武则天还凶”，其“手段之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

谭震林还在信中历数江青等人煽动揪斗老干部的罪行。

谭震林在信中写道，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和倾家荡产的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群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

谭震林在信中指责江青等人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谭震林说，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谭震林在信的末尾，再次表达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赤胆忠诚。谭震林说，他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他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胸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从电话斥责陈伯达、会上怒斥张春桥到这封信里痛揭江青“比武则天还凶”，谭震林的“反击”，确是一次比一次猛烈。

2月16日晚上9时许，陈毅在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时，带着怀仁堂斗争的激情，讲话长达7个小时。陈毅说：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现在把刘少奇的100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5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①

^①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陈毅传》，第61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

同时,在“大闹怀仁堂”的当晚,周恩来在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军区负责人及内蒙古造反派代表时,强调军队要稳定,批评冲击解放军是“没有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

关于稳定军队,周恩来指出:“现在到处都在发生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干部的事件,全国形成了冲击解放军的一股风;这不是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是对解放军的不信任、不爱惜,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①

周恩来强调说,军区不能冲,军事工厂不能串连,军队不能夺权,要信任、爱护解放军。

本来,在党内的会议上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的做法,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林彪、江青等人利用他们取得的地位和权力,一手遮天,对“大闹怀仁堂”的老干部们大兴问罪之师。

在2月16日的怀仁堂碰头会议散会后,参加会议的三老四帅和周恩来等人都已离开了怀仁堂,康生却仍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会议桌左边的一排“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没有离开,都用目光默默地望着康生。康生对他们说:“看到了吧,这就是斗争,这就是一场重大的路线斗争。”

康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说:“有人动摇了,有人害怕了,你们要站稳立场,现在都到钓鱼台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9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康生点上一支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踱着方步，回想着几天发生的事情，心里不寒而栗。在康生看来，那些“自负”的老师们，居然敢向他们这些大权在握的人发起进攻，蔑视他们的权威，实在是“太猖狂了”。康生决定想个办法好好整整那些“自负”的老干部们。

康生望了望站在一旁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突然眼前一亮，终于想出一个收拾老师们的“良策”。康生决定用“激将法”把“最高统帅”毛泽东请出来。

康生拿定主意后，坐在大写字台前，审阅姚文元、王力下午在怀仁堂里记的《会议记录》，并不时在上面修改几笔。

康生看完了《会议记录》后，将其递给张春桥，对姚文元、王力说：“你们马上把这份《会议记录》给江青同志送去，请她赶快报告主席，越快越好。”

本来，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这样的场合，江青是一定要参与的。但是，在前一段时间批陶铸时，江青讲了一些出格的话，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江青一生气，说自己“病”了。所以，江青没有参加“怀仁堂碰头会”。

江青接到康生的《会议记录》后说，他们（指三老四帅）果然又跳出来了，“好哇，那咱们这回就把‘京西’和‘怀仁堂’的账加在一起算。”

张春桥看到江青对老师们如此不满，指着《会议记录》对江青说：“康老请你马上向主席报告。”

江青想了想，认为还是让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当面去向毛泽东汇报比较好。因为这3个人都参加了会议，有发言权。但是，江青认为这份《会议记录》调子定得太低。

于是，江青对他们说，要打就要打得狠，再重新整理一份材料。江青让姚文元执笔，自己便一边在屋里来回踱步，一边拿腔作调地说，这是“继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在我们党内又出现的一场新的、重大的路线斗争”。“谭震林、陈毅是这次错误路线的总代表”。

这时，王力插话说：“还有徐向前。”

江青点点头表示同意。接着，江青又说，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余秋里是“积极追随者”；“总理、陈伯达在斗争中动摇”；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只有康生、谢富治“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新形势下，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所进行的一次垂死挣扎”。这是“一小撮走资派”有组织、有预谋、有纲领的“疯狂反扑”。

整理好后，江青又为张春桥和姚文元写了一个给毛泽东的条子说“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要速见毛泽东。

旋即，张春桥、姚文元拿着江青写的条子，前往中南海，等待毛泽东的接见。

与此同时，江青打电话要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报告毛泽东，说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有重要问题要报告，务必请连夜接见。

不久，毛泽东处通知，叫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立即到人民大会堂。2月16日晚10点时左右，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到了人民大会堂。

毛泽东在接见他们3个人时，先问张春桥什么时候回上海。张春桥说“2月17日走”。张春桥又问毛泽东还有什么

指示。毛泽东说“没有了，都说过了”。

接着，张春桥按照3个人整理出的要点，向毛泽东汇报了当天下午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的情况。

在张春桥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抽着烟，皱着眉头听，插话不多，只是微笑着。当张春桥汇报说谭震林愤然离席要退出会场时，毛泽东站起来说：“他不愿干，就让他走嘛。”

停了一会儿，张春桥开始汇报陈毅的讲话。对于这个讲话，张春桥等人下了很大功夫。经康生亲自修改。这个讲话让人一听就感到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当张春桥说到陈毅的发言内容时，毛泽东脸色突变，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延安整风是有很大成绩的。但康生在整风期间大搞逼供信，伤害了许多好同志。陈毅在碰头会上根据“文革”中大多数干部惨遭迫害的事实，联系历史的教训，提醒不要重复过去“左”的错误，是完全合理的。但陈毅的这个讲话无疑刺中了康生的痛处。因此，康生立即要张春桥等人连夜向毛泽东汇报，歪曲陈毅的讲话，挑拨毛泽东与“三老四帅”的关系。

张春桥在揣出毛泽东的态度倾向后，便不失时机地故弄玄虚，有意渲染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如何非议“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激怒毛泽东。

当张春桥汇报说周恩来指责1966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的社论没让中央政治局讨论一下，而且连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让看时，毛泽东厉声喝道：“发篇社论为什么非要让政治局常委审查？我们党历来没有这种先例，党章上也没有这个规定。”

张春桥将《会议记录》轻轻地放在茶几上，有些疲倦地暗自吁了口气。毛泽东望着张春桥、姚文元、王力3人，问“还有什么情况”。

姚文元说：“江青同志说怀仁堂会议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反扑，目的是为被打倒的刘少奇一伙翻案，这是一股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逆流。”

毛泽东望着张春桥、姚文元、王力问：“你们说，究竟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

张春桥说：“有。”

毛泽东接着问：“当一股逆流气势汹汹扑来了，该怎么办？”

张春桥说：“发动群众，坚决痛击！”

毛泽东赞许地说：“是呵！我们还得依靠群众呵！你们还不能回上海，北京城要刮大风。”

毛泽东沉默了很久，最后表示，怀仁堂会上的发言，总的倾向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性质是“维护刘、邓路线”。

关于具体工作，毛泽东说：“现在是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煤炭和铁路。”

几天前，王力和关锋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写了一篇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是经陈伯达送毛泽东审阅的。王力问毛泽东“看过没有”。毛泽东叫王力不要经过陈伯达，直接送一份给他。王力回去后立即用王力、关锋的名义把社论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当晚就退还给王力和关锋，并给王力、关锋写了一封信，嘱其将社论提交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

会议讨论。

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从毛泽东处回到钓鱼台后，3人又一同去见江青。

张春桥向江青转述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并说他和姚文元准备2月17日回上海。

江青对张春桥说：“你晚一天回去，明天你同总理谈一次话，主席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你要总理把文革小组当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当天晚上，王力即向关锋、戚本禹讲了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议的情况，还讲了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以及江青对此次怀仁堂会议的议论。

就在怀仁堂会议的第二天，即2月17日，叶剑英亲自修改批发了中央军委致“成都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派组织的公开信。叶剑英在信中说，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叶剑英的这封信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国用飞机散发开来。同一天，叶剑英还批准发出了《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电报，严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要求各单位限期把他们押回北京。

与此同时，周恩来接见了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在接见时，周恩来当场下令逮捕拒不执行命令、操纵造反派叫党委“靠边站”、抢夺财政部业务权、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杜向光。

周恩来说：“我在几次座谈会上都说过财政大权不能夺，

财政部是代表中央执行财政的，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我申明，凡是没有经过中央承认的夺权都不算数，要一个一个地审查。财政部、商业部的党组要恢复，党组还要行使职权，还是由先念、吴波（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编者注）、姚依林（时任商业部部长——编者注）负责。”

关于党的领导，周恩来曾一再强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周恩来并且提出，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各部党组、党委要恢复，还要行使职权，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政治部工作也要恢复起来。

在接见造反派时，周恩来要求造反派取消对姚依林的“通缉令”，而且还要求造反派交出时任一机部部长的段君毅和时任商业部副部长的王磊。

周恩来说，老干部是党的财富，不能以敌对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对他们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甚至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照相、登报，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对严肃的政治斗争的丑化。

接着，周恩来说：“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①

2月17日下午，在钓鱼台十六楼会议室，张春桥根据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9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青的旨意找周恩来谈了话。和周恩来谈完后，张春桥在同姚文元、王力、戚本禹一起吃晚饭时说：“刚和总理谈了话，告诉总理昨天的怀仁堂会议是一场新的‘大路线斗争’，已报告主席以及主席作了指示。”

2月18日上午，江青要王力跟她一起去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

在汇报的过程中，当王力说到周恩来对《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时，江青插话说：“总理在路线斗争中动摇。”

对此，林彪点头表示同意江青的意见。

当王力说到陈伯达时，林彪说：“陈伯达是好人，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局面不容易。”

当王力说到叶剑英、徐向前对1966年10月5日的《紧急指示》有意见时，林彪说：“《紧急指示》没有问题。”

随后，当王力说到徐向前质问“中央文革小组”还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人民解放军时，林彪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

最后，林彪说：“照主席的4点指示去办。”

随后，林彪立即召集了“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开会。

黄永胜，湖北省咸宁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永胜一直从事军事工作，历任师长，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热辽纵队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十三兵团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等。1967年1月，广州军区的广大干

部、群众起来揭发黄永胜的思想错误和作风问题。1月28日,黄永胜亲自打电话向林彪“告急”,林彪立即叫叶群把黄永胜招到北京,保护起来。以后,林彪和黄永胜开始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害大批干部及群众。从此,黄永胜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许多罪恶活动,是林彪“四大金刚”之首。

吴法宪原是空军政治委员。林彪为了完全控制中央军委的领导权,早在1965年就有计划有目的地诬陷、迫害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叶群亲自出马,歪曲事实,捏造说刘亚楼病危时曾向她检举揭发罗瑞卿有“野心”的所谓“四条”。当有的同志指出“死无对证,难以置信”时,身为主谋的叶群慌了手脚,怕阴谋败露,就指使吴法宪制造伪证,印证叶群捏造的材料,以达到陷害罗瑞卿的目的。吴法宪当然受宠若惊,迅速照叶群旨意办了假证明。

除此之外,林彪、叶群还指使吴法宪于1965年12月25日用给林彪写信的手法,诬陷罗瑞卿有“篡夺军权的野心”,致使罗瑞卿遭到残酷批斗。后来,吴法宪又伙同黄永胜控制专案组,继续迫害罗瑞卿,诬陷其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使罗瑞卿蒙冤多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林彪、叶群为了把空军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力量和基地,排除反对他们控制空军的阻力,指使吴法宪趁着混乱之机,利用“文化大革命”把反对他的人搞掉。吴法宪根据林彪、叶群的这一旨意,在空军制造了3次所谓“罢官夺权”事件,打击迫害了大批空军领导干部,给空军的部队建设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1966年,吴法宪第一次诬陷空军党委常委的一些同志和军区空军的一些领导同志搞“地下活动”,意欲罢他们的官职。例如诬陷张廷发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罗瑞卿分子”。1967年,吴法宪二次向林彪、江青诬告刘震、成钧、何廷一等“要夺权”,“要搞政变”。不久,经林彪出谋划策,当年1月13日由江青出面向空军讲话,指名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等,并把他们投入监狱或关押审查。

此后,吴法宪追随林彪,又在空军第三次打倒一大批忠心为党、为空军建设做出贡献的干部。吴法宪还以举办“学习班”为名,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军区空军和军的领导干部,把对许多同志的批判定为敌我矛盾性质,反复批斗。吴法宪并且伙同梁璞、王飞迫害了大批干部、群众。

此外,吴法宪还指使周宇驰、王飞等人编写所谓《空军两条路线斗争史》,蓄意捏造空军有5股反动势力:第一股是以成钧为首的,是“贺龙的死党”;第二股是以刘震为首的,是“彭德怀、黄克诚集团漏网分子”;第三股是聂凤智、吴富善一伙,地方实力派,是“空军的张国焘”;第四股是张廷发,是罗瑞卿安插在空军的“定时炸弹”;第五股是黄玉昆、何廷一,是“附属势力”等等。

以此为借口,林彪、吴法宪一伙密谋打倒老干部,篡夺空军各级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李作鹏是“四大金刚”里林彪最器重的一个。早在1962年,林彪就以加强海军领导为名,派李作鹏到海军任常务副司令。1966年5月,海军党委召开三届三次扩大会议,李作鹏利用这次会议大搞罢官夺权的阴谋活动。中共中央批评和制

止了李作鹏的阴谋活动。正当海军党委根据中央精神揭发李作鹏的阴谋活动的时候,林彪利用职权强令海军会议“立即收兵停战”。这一做法使对李作鹏的进一步调查不了了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得知李作鹏的电话“告急”,又出面保李作鹏。说李作鹏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政治的”、“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1966年6月,林彪又积极活动,直接插手,任命李作鹏为海军第一政委。

“四大金刚”中的邱会作则是林彪的得力干将。早在1959年,林彪一上台时就提名任命邱会作为总后勤部部长,并不顾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党委的反对,强行指定邱会作为总后党委第一书记。1965年,总后勤部党委批评邱会作道德败坏的错误时,林彪对邱会作说:“他们要开会还是要他们开,方针由我来掌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又给邱会作定了调子,说邱会作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有干劲”、“信得过”的干部。但是,由于邱会作的品德太坏,总后勤部的广大干部、群众还是愤怒揭发揪斗了他。1967年1月24日,邱会作向叶群写求救信,林彪立即派叶群持林彪、陈伯达的“保邱手令”,从总后把邱会作保出来。

当吴法宪和叶群走进林彪的客厅时,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已就坐。林彪打了个手势,让吴法宪在靠近自己身边的沙发上坐下,然后阴冷地说:“你当空军司令是我向主席争来的,你现在却跟他们跑。”吴法宪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叶群含笑解释道:“几个老师和副总理在怀仁堂围攻了中央文革小组。主席发怒了,要反击这股逆流。林总把你们

找来打个招呼,免得你们跟着他们跑,犯错误。”

吴法宪当即表态说:“我一定和他们划清界线。好家伙,敢反对中央文革,这不就是反对毛主席吗?我永远忠于林副主席,要和他们作斗争!”

邱会作也说:“我今后仍和过去一样,只要有一口气,一切听林总的,坚定不移地跟着林总走。”

林彪说:“我对有些大军区总不放心,他们不听我的话,那个陈再道就跟徐向前、罗瑞卿跑。要用文化大革命解决这个问题。要让这些坏人暴露出来,四方面军的人不跟我,要把他们都揪出来烧烧。你们都是我几十年的老部下,我信得过你们,千万不要辜负了我的期望。”

林彪还把谭震林的信向他们扬了扬,说:“你们看这信,不要向他学。”几个人神情庄重地连连点头。

林彪正在和黄永胜等人谈论“大闹怀仁堂”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叶群去接电话。电话是周恩来打的。周恩来通知林彪当天晚上夜里两点,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叶群放下电话,将周恩来的通知内容转告林彪。林彪说:“我身体不好,你代我向主席请个假。”

叶群急忙劝林彪,说别的会可以不去,这个会“一定要参加”。林彪非常信赖地表示“叶群可以替代参加会议”。然后,林彪望着黄永胜等人说:“又是围绕怀仁堂那件事,看来,这回又有好戏看喽。”

与此同时,几位老师和副总理也聚在李富春家里。他们也在谈论“怀仁堂大论战”会带来的后果。

谭震林还是那副老样子，怒气犹在地说：“他们欺人太甚，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国家被折腾成这个样子，我们要再不讲话，他们就更加无法无天了。我又给主席和中央写了封揭发信。这回我是提脑袋、冒着风险来干的，准备着让他们把我整掉。”

陈毅也说：“怕什么，大不了罢官，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我还可以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还会做担担面么。没什么可以怕的。”

“怕什么，无非被打倒么！”老师们有点义愤填膺地嚷着。这时，摆在墙角的电话铃响了。

李富春走过去抓起话筒，原来是周恩来打来的。屋里顿时静了下来，几双眼睛都盯着那部红色的电话机。

李富春在电话里得知江青等人已恶人先告状。为此，毛泽东发了脾气，而且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周恩来还在电话里要求李富春劝说几位老师和副总理主动“找主席检讨”。

李富春放下电话，神情严肃地说，当晚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周恩来要求他们主动找毛泽东检讨。大家都惊愕地喊道，他们没有什么可检讨的，应该让“中央文革小组”检讨。

李富春看看大家，把手往下轻轻一压，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总理考虑的是对的，为了整个国家，他不希望我们中间再有人被打倒。”大家听后全都沉默了。

2月18日深夜至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

——编者注)、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

毛泽东在会上对谭震林等老战友们作了严肃的且毫不留情地指责。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

接着，毛泽东又对叶群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越说语气越重：“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

毛泽东说：“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这次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并由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去找谭震林、陈毅、徐向前3个人谈话，传达毛泽东肯定“中央革命小组”的作用，对“文化大革命”不能否定的讲话。

老一辈革命家2月16日在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之所以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是因为毛泽东主观上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错误做法及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批评，势必都要涉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些当然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

2月19日,在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谭震林等人之后,林彪在谭震林2月17日给他的痛斥江青的信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之后,林彪把信转送毛泽东。毛泽东只批了“已阅”两个字。

2月19日凌晨,康生在钓鱼台向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的情况时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康生又说,“这场路线斗争胜利了”。

随后,康生又将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的情况告诉了江青。江青授意康生,要在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作主要发言。

周恩来又一次面临困境。一边是在指导思想坚持“文化大革命”并在盛怒中的毛泽东,另一边是在思想感情上同“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的老同志。周恩来已没有回旋余地。

周恩来深深了解毛泽东的性格。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已经把话说绝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周恩来只剩下这一种选择,并且他还必须说服其他人做出同样的选择。

尽管如此,周恩来仍继续以其他方式表明他对“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问题的原则立场。2月20日下午,就在老同志受到严厉指责的第二天,周恩来在介绍山西“夺权”情况的会议上,继续阐述他对“夺权”问题的一贯看法。

周恩来指出:“自从一月份夺权以来,不管这个部门有没

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派都要夺权。有些地方对带长字的、第一书记就要夺权，这样一解释，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不能这样，逻辑上站不住嘛！”^①

当谈到中央国家机关出现的“夺权”问题时，周恩来说：

不是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还有好的；造反派有的权掌多了，要加以限制。现在有人要夺中央的大权，外交大权也要夺，财政大权也要夺，还要夺军事大权。这些部门的权力属中央，谁也不能夺！不仅各部委党委、党组领导要抓日常工作，就是司局一级干部也不能统统“靠边站”，整个业务系统还是要由这两层领导来抓。^②

当谈到冲击军事机关的问题的时候，周恩来说：“前一时期各地冲击军事机关这股风是错误的，要赶快扭转过来；军队内部搞‘造反’、‘夺权’，完全是大方向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9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9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会上,周恩来还表示不赞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这个提法。周恩来说,如果这一条存在的话,任何人只要检讨不够,就可以说他是“顽固分子”。

与此同时,周恩来连续约几位老同志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他们准备检讨错误,接受批评。

2月23日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毛泽东2月16日的意见召开的。会议讨论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

这篇社论,周恩来曾在2月18日审阅过。周恩来在阅后送毛泽东审批时注明,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他看写的还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革小组”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周恩来并在社论稿第二部分的3段文字旁,批示“在这一部分,可以把地方上的三结合和机关内部三结合加以解释和阐明”。

毛泽东在周恩来2月18日送审的社论稿上写道:“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再则,以后重要社论都应这样做。”^①

在会上,周恩来将毛泽东给王力、关锋的信和社论一并印发到会人员。这篇社论在会上通读定稿,并于当天呈送毛泽东审批。在这次送审的社论稿上,周恩来在第二部分加了两

^① 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2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段文字。一段文字是：

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①

周恩来加的另一段文字是：“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

这篇社论发表在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四期上，《人民日报》于2月23日提前转载。

《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在开头这样写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

^① 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批语（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234—2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关键问题。

与此同时,这篇社论还特别强调,必须按照毛泽东思想,按照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党的干部政策,正确地对待干部,建立“夺权”斗争的领导核心,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成立一个真正有领导能力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建立或健全领导“文化革命”和领导生产、业务工作的班子,把各项工作抓起来,把权真正掌起来。

社论的第一部分是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文章写道,经过半年多以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

社论还引用《红旗》杂志1966年第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中的一段话。《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中这样指出: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来,当权的是无产阶级。在党、政、军各部门,在工、农、商、学、兵各界里负责各级领导工作的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的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巩固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我们国家里,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取得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极其光辉的胜利。”^①

《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社论中还说，事实已经证明，这个基本估计是“正确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当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必须从这个基本估计出发。社论强调：

必须清醒地看到，确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部门，篡夺了党政的领导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我们无产阶级当前的主要敌人。不把他们打倒，我们国家就会变颜色，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从他们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决战。谁要否认这一点，就是敌我不分，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大多数干部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犯有错误的干部，甚至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我们绝不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钻进干部队伍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估计得过多。如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把

^① 《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红旗》杂志，1966年第十二期。

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的干部,也是敌我不分,那是很危险的。^①

社论指出,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猛烈的反击的半年多时间里,有一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是“不好的”,“不能信赖的”,应当“一律打倒”。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事实的。

社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告诉人们,对于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都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对于“当权派”,当然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求人们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革命群众对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坚决打倒”,而对于无产阶级当权派,则应当坚决支持。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社论接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7 年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17 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社论说,“要把干部一概打倒”的观点,就是抹煞 17 年来的基本事实,就是否认 17 年来的伟大成就。

对于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社论还说:

^① 《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红旗》杂志,1967 年第四期。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故意混淆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界限，故意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团员，妄图达到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一切革命同志，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高度警惕，千万不要上当。^①

这篇社论的第二部分是“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在这一部分，社论首先解释了地方的“三结合”和机关内部的“三结合”。

社论说，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们不仅可以，而且能够成为“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领导力量。这些领导干部应该密切联系群众，集中广大群众的智慧，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应当支持他们。

社论还引用了毛泽东早在1938年关于干部政策时说的一段话。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

^① 《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红旗》杂志，1967年第四期。

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①

社论中说,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是一个伟大的真理。过去,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也必须有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领导,才能完成摆在面前的新的战斗任务。

社论中说,革命领导干部,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组织能力较强,斗争经验比较丰富,他们有为无产阶级国家掌权和管理业务的能力。经验证明,这些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了领导核心,他们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起来,就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夺权”斗争,就能较快地把权真正掌起来,把革命和生产真正抓起来,按照党的政策办事。

社论认为,如果排斥革命领导干部,就不能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就不能把广大“革命群众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有集中领导的、有统一指挥的革命队伍,而形成“群龙无首”,各自为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趁机“捣乱”。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夺不了权,也掌不了权。

社论认为,党政机关的广大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广大干部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本单位“夺权”斗争的主要力量。他们最清楚本单位是不是应该“夺权”,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向谁“夺权”。他们熟悉本单位的各项工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熟悉干部和群众的情况。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情况。

因而，社论强调，需要“夺权”的单位，必须依靠广大干部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团结和帮助那些觉悟还不高的干部，争取大多数。这样，才能真正把权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过来，才能把工作作好。外单位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应当相信他们，支持他们，给他们以必要的援助，而不应当排斥他们，到那里去包办代替。

社论指出，党政机关的“夺权”斗争，排斥本单位的革命干部，由外单位的群众组织去包办代替，是“极端错误的”，行不通的。本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不分青红皂白，排斥带“长”字的干部，也是“极端错误”的，行不通的。社论还说：

有的地方，少数人提出，“带‘长’字的靠边站”。这种提法，毫无阶级分析，它把群众和一切干部对立起来，不是把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广大干部。这就背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基本精神，背离了斗争的大方向，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样做，在客观上是帮助阶级敌人的。不自觉地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迅速改正。如果固执己见，那是很危险的。革命干部，对于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改正，就应当欢迎，而绝不能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①

^① 《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红旗》杂志，1967年第四期。

社论还引用了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所讲的话。毛泽东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①

社论中说，毛泽东的这个论点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也必须实行革命干部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这篇社论的第三部分是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社论说，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毛泽东制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这是惟一正确的政策。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干部犯了错误，就一脚踢开，一棍子打死，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

社论引用了毛泽东早在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的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毛泽东指出：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

^①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①

社论说,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所以才能够正确地开展思想斗争,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所以才能够贯彻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宝贵的历史经验。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决战中,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的斗争中,广大革命群众一定要牢记这个经验。

社论指出,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毫不动摇地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要鼓励他们放下包袱,解除各种

^①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7—82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思想顾虑,站出来造反,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才能把无产阶级的敌人孤立起来,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否则,就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无产阶级革命就有失败的危险。

社论指出,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要看到他们的错误,也要看到他们的成绩;既要看到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也要看他们长期的一贯的表现,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社论还说,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错误的一面,任意夸大,轻率地扣大帽子,这是一种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一切革命的同志,应当避免这种错误,改正这种错误。

社论强调,对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志,也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社论引用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的话说: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以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

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①

社论认为,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对于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对待干部问题,仍然是适用的。

社论指出,一般的“犯路线错误”的干部,同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这种矛盾,必须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对于这些干部,不能当作敌人,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社论指出,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应该给以检讨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只要他们作了检讨,改正了错误,站到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仍然可以担任适当的领导工作。许多干部,还可以吸收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临时权力机构。

就是那些已经犯了很严重错误的干部,社论认为,只要经过合理的批判和斗争,在处理上也要宽大。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

^①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

社论认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对于犯错误的各级干部和党团员,都是适用的,“对于年轻的小将们,也是适用的”。

社论进一步指出,必须看到,“革命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谁要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小将”中,有些人犯了某些错误,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社论要求革命干部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革命小将”,满怀热情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改正错误,发扬他们的长处,保护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快地、更健康地成长,而不应该单纯指责他们。如果有人借口党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而抓“革命小将”的小辫子,打击“革命小将”,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社论说,必须警惕“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趁机进行反扑,进行阶级报复。必须保护“革命小将”,否则,就会犯绝大的错误。

社论在第三部分的最后强调,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党的传统政策,才能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团结95%以上的群众,使自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社论的第四部分主要谈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彻底改造世界观的问题。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各级干部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各级干部都要在眼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中,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自觉地、认真地、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与此同时，社论还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不克服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绝不可能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错道路。

社论认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最根本的区别，集中地表现在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上。

社论说，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问题，就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有的同志看不清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以及它的深远意义，看不清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对新起的“革命小将”，对广大的革命群众，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种错误，必须彻底地予以纠正。

社论认为，在干部队伍中，有一批人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摆在这些干部面前的一个不能回避的根本问题，就是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社论指出：

“一切过去为人民立过功劳的同志，绝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面睡觉，不能吃老本，而应当采取正确的态度，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运动的洪流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才能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劳。”“犯错误的干部，绝不能因为党对他们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而拒绝改造自己的世界

观,拒绝接受群众对自己的批评,甚至掉转头来打击革命群众。”“犯错误的干部,应该提高警惕,彻底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广大革命群众一边,坚决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干部应该看到革命小将的长处,不应该看轻他们。”“年青的革命小将,也必须认真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斗争的痛苦过程。必须坚持不懈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这样才能逐渐地成熟起来,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不被历史的发展所淘汰。”^①

社论最后号召“一切革命干部,一切要革命的、犯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干部,一切革命小将,广大的党团员,广大的革命群众,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奋斗!”^②

2月23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的问题。会议确定了参加批评会的人员名单: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萧华、

^① 《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红旗》杂志,1967年第四期。

^② 《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红旗》杂志,1967年第四期。

杨成武、叶群、谷牧、汪东兴，被批评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也参加。名单由周恩来报毛泽东和林彪批准。会议决定，开会时间由周恩来决定和通知。

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议印发了会议文件《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议》。

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围攻和批斗，猛烈地攻击在2月16日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给他们扣了一大堆帽子，说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否定延安整风”、“要复辟资本主义”。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还说2月16日怀仁堂会议上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继续”，并且同社会上的“反革命复辟”有联系。

在批评会上，李富春主动承担责任，说副总理们的意见在他家里议论过，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的指示是他给副总理们传达的。康生即指责他是“俱乐部主任”。

在会上，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被迫作了检讨。周恩来也被迫作了检讨。

汪东兴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

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期间，江青对会议的兴趣不大。江青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继续攫取更大的权力。2月17日，江青通过张春桥向周恩来施加压力，要周恩来把“中央文革小组”

当书记处看待后，又谋划扩大“中央文革小组”，建立一个比较固定的班子。

2月25日前后，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增加谢富治、叶群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毛泽东说，成员不要扩大，可以叫“中央文革小组”的列席成员，一切同正式成员一样。除上述3人外，再加一个汪东兴。不久，江青再一次提出，说“当成员好”。毛泽东仍说叫“列席成员”。

后来，江青又在3月初召开的“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进一步提出，以后各省到北京来汇报，“总理太忙，不要总理组织了”，由“中央文革小组”组织，王力、关锋、戚本禹作具体工作，“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列席成员参加接见。

周恩来对江青说，“你们也要通知我参加”。

本来这项工作是由周恩来负责，各位副总理参加。此后，这项工作改由“中央文革小组”组织，周恩来参加。除谢富治外，“中央文革小组”决定不通知其他副总理参加。

这个时候，叶剑英并没有被压倒，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想尽办法，稳定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经过酝酿，2月26日，叶剑英就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作了专题报告。

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

部 100 余人。

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題,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

叶剑英了解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包括“革委会”和“造反派”——编者注)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确指示。叶剑英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的多数同志心里有了底。

后来,徐向前对 1967 年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以后的叶剑英曾作过这样的记述:

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住。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1967 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捣乱,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 40 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住处,要我先理个发,作好出席招待

会的准备。当时他的意思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①

2月27日，陈伯达给毛泽东报送了《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支持了谁》的材料。材料中说，1月26日，北京“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天津小站公社坨子地大队，支持以“四清”运动中下台干部为背景的“燎原红色战斗队”抢走大队的大印，从此“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实行“反攻倒算”。

陈伯达报送时，在材料上批示，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革命群众要记者给主席反映情况。现把材料送上，请顺便一阅。”

毛泽东于2月28日写了批语：“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陈伯达把这个批语和材料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看。同时，陈伯达提出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口号。江青、陈伯达等人借机把老一辈革命家的正义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

借批判“二月逆流”，江青、陈伯达等人于二三月间开始

^① 徐向前：《功勋卓著，光辉一生——悼叶剑英元帅》，《紫思录——怀念叶剑英》，第3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复辟逆流”的浪潮。

3月6日，江青找戚本禹和北师大造反派头头谭厚兰密谋，认为“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第二天，北京街上就出现了“打倒谭震林”、“彻底击溃反革命复辟逆流”等标语口号。

3月8日，北京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北京街头四处出现了“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

当天下午，谭厚兰带着受蒙蔽的1000余名北师大学生，冲进北京农业展览馆，制造了“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的事件。

3月8日下午，北京农业展览馆大厅正中悬挂着一幅“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开幕式”的大红横标。在欢快的音乐伴奏下，谭震林在几位部长和有关负责人的陪同下，为开幕式剪彩。

突然，一群红卫兵冲进大厅，强行扯下横标，换上一条“反击二月逆流批判大会”的会标。有几个红卫兵涌上前推搡着谭震林和在场的干部，要给他们挂牌子。参加开幕式的群众愤怒地抗议着。顿时，整个大厅一片混乱。

红卫兵们还喊出了“打倒谭震林”、“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等一系列的反动口号。

3月10日下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带着王力、关锋等人专程到北京农业展览馆参观大寨展览，

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竟也振臂高喊“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等口号。

3月11日，以首都“红代会”及农林口机关造反派为主体的近百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首都彻底击溃谭震林自上而下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联络站”（简称“首都批谭联络站”——编者注）。

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的声势一浪接一浪，而且越造越大。

3月14日，首都“红卫兵代表会”组织学生10万人举行集会和游行，声称“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同时，他们还要打倒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从而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3月18日，天上下着滂沱大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10万人的批斗大会。

彭德怀、罗瑞卿、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贺龙等47人站在批斗台上。他们被作为“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头面人物，作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遭到集体揪斗。

陈毅挨斗后回到家里，仰头长叹道，真是巧合，41年前的1926年3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和李大钊的领导下，他们组织四千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当时，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时说，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41年后的这天，他陈毅因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而受到批判。

3月18日以后，由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无法举行，“中

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实际上成为党内最高决策会议。由于老一辈革命家被排斥在党的领导核心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掌握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挥机构。

在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期间，林彪认为，原来的中央军委常委“不行了”，要扩大。林彪向毛泽东提出增加谢富治为中央军委常委。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提议再增加一个粟裕。

在3月间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4月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继续把矛头指向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说他们是“刘、邓路线的代表”，攻击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

3月间，陈伯达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他写了个材料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批示，从上到下，各级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夺权”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陈伯达说，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在“夺权”的斗争中，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现象。

会议期间，江青提议，在军以上干部会上印发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文件。但是，江青提了几次，毛泽东没有同意。最后，毛泽东明白地说：“因为牵涉到总理，所以不发。”

3月20日，林彪突然到叶剑英主持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林彪在会上以“最终胜利者”的姿态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的胜败，是“决定中国向何处去，决定中国的命运”。同时，这一斗争的胜败也“决定和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

“大胜利”。

紧接着,林彪又说,“文化大革命”这次斗争所付的损失,少数人觉得很大,其实,比起世界各国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拟,也比不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比不上一次小的战役,一场“不大的流行病”。当然,“毛主席从头到尾强调文斗,不要武斗”。所以说“损失是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

林彪说,有些老干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没有跟得上”,“没有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而是停留在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有些老干部“蜕化变质”,变成“资产阶级分子”。因此,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10级、11级、12级台风”,以冲击“资产阶级”旧的、腐朽的东西。

林彪的这番话一下子传遍到全国,全国性反击“二月逆流”活动随即达到了高潮。“批判余秋里联络站”、“批判陈毅联络站”、“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联委会”等造反派组织相继成立。冲击军队干部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军内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文件被抢走。

从此,反击“二月逆流”的活动也就更加猛烈了,已经混乱的局面变得更加混乱了。

后来,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组在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时,对“二月抗争”的问题,引用了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上所作的描述。其中说:

我们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捍卫马列

主义原则和坚持党的领导,于二月前后,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在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的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碰头会上,以及其他一些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愤怒斥责操纵“中央文革”的一伙野心家、阴谋家把党、政府、工厂、农村搞乱了,还要搞乱军队,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揭露他们煽动极左思潮,制造“一月风暴”,妄图统打倒老干部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利用他们窃取的地位和权力,诬陷谭震林等同志是“二月逆流”,炮制了一个震撼全国的大冤案,并在全国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恶浪,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夺权,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①

3月21日,在毛泽东、林彪接见军以上干部会议的参加者以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向毛泽东、林彪汇报了中央政治局生活会的情况。会后,江青、康生、陈伯达都声称这次“路线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4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授意王力在小组会上讲怀仁堂会议的精神。江青也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

^① 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第131页,新华出版社1982年6月版。

说,本来主席团经同意在这个会上发怀仁堂会议文件,后来考虑国务院那个文件“涉及总理”,才决定不发,这件事是要“叫这个会上的人知道的”。

王力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王力说,“二月逆流”从上到下都有。“二月逆流”反映在中央就是有人直接“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

王力接着说,《十六条》也反了,群众教育自己也反了,说是形而上学。“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们“自封”代表老干部,说老干部统统被打倒了。

王力在小组会上说,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1月,是“革命形势的大发展”,叫作“一月革命”,这时的形势“好得很”。“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批评“左”派组织的一些毛病。“中央文革小组”也在“检查”自己工作中的一些缺点。“三老四帅”们利用这个机会,“以为抓到了一根稻草”,就进行了“反攻”。

王力的这次讲话上了会议简报。江青把简报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对王力说:“你放了炮,要注意不要伤害总理。”

“二月抗争”虽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老同志们提出的有些意见和毛泽东一二月间几次谈话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还是采纳了。例如那些老同志们“在‘二月抗争’中规定‘夺权’后要成立党组织;没有党的组织的要成立核心小组;要稳定军队;要保护老干部等。”

毛泽东同意过“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提法,但时间不长。1967年4月初,毛泽东提出了“究竟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反革

命复辟逆流”的问题。4月中旬,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究竟有没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问题,不仅又压下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一篇题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红旗》杂志社论,而且在批示中说,“这篇社论不发了,以后的重要社论,经过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讨论”。

经过周恩来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极力斡旋,毛泽东的态度逐渐温和了起来,并且谅解了几位老干部。毛泽东不满意老师和副总理们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激烈批评,但是只是想借此机会“教育”一下老干部们,绝不是想将他们一个个打倒。

因此,在4月30日晚上,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请到自己家里,开了一个“团结会”,并且还批准这些老同志五一节上天安门看焰火。

1968年3月25日,中央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组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

3月28日,毛泽东、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军委就是办事组。4月6日,黄永胜在一次谈话中说,“以后打电话找办事组和林副主席,军委常委不执行权力,办事组代替军委。”

这样,林彪、江青等人在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后,在夺取党政大权以后,又篡夺了军权。

在周恩来主持下,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

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场斗争涉及3个原则问题: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

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又一次对“二月逆流”进行了批判。

在全会的分组会讨论开始前,江青、康生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首先提出要批判“二月逆流”的参加者,然后确定将这些人编到各个小组中去,布置了各组向这些老同志追问的问题。江青每天晚上在碰头会上都要听取汇报,然后布置各组第二天批判的内容。

在分组讨论一开始,林彪、江青等人就组织围攻批斗参加“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编者注)。

对此,聂荣臻后来这样回忆说:“经过精心安排,老同志被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林彪的一伙,‘四人帮’和陈伯达、康生等一齐出动,在各个组煽风点火,出点子定调子,对老同志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大搞逼供信。他们造谣诬蔑,

无中生有，捏造出了许多所谓‘事实’，硬是把我们往‘反党集团’纲上拉。”^①

10月17日，江青等人在全会第一小组会上，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一辈革命家进行围攻和诬陷。他们说，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人“一个在京西宾馆、一个在国务院”，“二者合流”，是一个“集团”，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保护“刘、邓、陶”，保护“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为“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翻案”。

江青等人还诬陷叶剑英、徐向前“在京西宾馆煽动干部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乱党乱军”、“要夺军权”。他们还诬陷谭震林是“叛徒”。

10月26日，林彪在全会上讲了话。

林彪说，“二月逆流”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

在这次讲话当中，林彪还信口雌黄地说，那些“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连队也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小组”。

对于林彪对“二月逆流”的定性问题，后来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① 《聂荣臻回忆录》，第85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十月二十六日的全体会议上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说:“在运动过程中,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干扰这条路线的‘左’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林彪接着就反咬一口说:“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连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林彪还说:“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

林彪的这次讲话很长,上面这几段是它的核心。他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是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政治动员令,也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以后大会小会

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他的这个基调进行的。^①

此后，康生则在全会小组会上说，“二月逆流”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还有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

康生说，1956年2月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那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成功的“二月逆流”。在中国，有“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坚强领导”，中国的“二月逆流的干将们要像赫鲁晓夫那样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绝对办不到的”。

其实，说“不教而诛”的不是叶剑英，而是聂荣臻。

对此，聂荣臻后来这样回忆说：“有一次康生在会上讲到‘二月逆流’时说，‘二月逆流’打急先锋的，现在讲是谭震林，实际上不是谭震林，是叶剑英。叶剑英讲‘不教而诛’，直接拉开了斗争的序幕。叶剑英同志听了感到奇怪，他对我讲，我没有讲过‘不教而诛’呀。我说，‘不教而诛’是我讲的嘛，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去了。以后我向中央写信，作了澄清。”^②

批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些人提出来没有什么好批的了，说

① 《聂荣臻回忆录》，第858—8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② 《聂荣臻回忆录》，第8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来说去还是那几句话。江青知道后说，“不行，要批深批透，要批到他们都认错为止”。

周恩来将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再批了”。

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毛泽东说，对于“二月逆流”这件事，经过差不多半个月的生活会，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全会上，由他们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又再说明他们的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大家就比较清楚了。

毛泽东说，“二月逆流”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就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们这个大闹就证明他们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乎多过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目要紧。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会上说，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毛泽东强调，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

同一天，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公报》说：“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

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①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文件,强调应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及时解放犯过错误的人。

周恩来也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把犯有敌我矛盾错误的人,争取到革命行列里来。对犯错误的好人更应该教育他,只要承认错误就解放他们。

随后,周恩来又说,“二月逆流”是有范围的,老同志们有许多话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政策讲的,不能把他们每句话都看做是“二月逆流”,不能认为“二月逆流”的人所作所为都要否定。

然而,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以后,林彪、江青等人为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把老一辈革命家排除出党的领导核心,一方面利用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情况的机会,把“二月逆流”的问题扩散到社会上;另一方面以为中共九大准备材料为名,收集攻击、诬陷老一辈革命家的材料。

1968年12月间,黄永胜主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将一份反映徐向前最近思想状况的材料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主张进一步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家人。

12月29日,周恩来在这份材料上批示,建议军委办事组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日。

派人找有关同志谈谈，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这个意见。几天后，毛泽东批道：“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①

鉴于陈毅、聂荣臻、李富春、余秋里等所在单位和系统都发生了要求批判“二月逆流”的情况，周恩来批准将毛泽东对徐向前问题的指示内容迅速下达，制止了对“二月逆流”批判的再度扩大和升级。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林彪、江青等人在起草政治报告时，仍坚持要写上批判“二月逆流”的内容。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听取汇报时说，“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那个时候，一时打倒这个，一时打倒那个，可多了，无非说错了话嘛。”

对此，毛泽东强调说，九大报告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会。毛泽东还说，他们（即被诬为“二月逆流”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等——编者注）一肚子气，也是可以原谅的，要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

后来，毛泽东主持起草并修改定稿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没有出现“二月逆流”的提法，

^① 毛泽东：《关于不要批判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家属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仅笼统地指责了“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夺取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参加者。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指着叶剑英对到会人员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

接着，毛泽东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老师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力）、关（锋）、戚（本禹），“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平了反。

1972年1月初，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1月6日，陈毅逝世。1月10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

毛泽东还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

老人都搞掉的”。

1972年12月间,毛泽东又问及了谭震林的近况。周恩来立即写信给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大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应该让他回来”。

在周恩来的督促下,谭震林不久回到北京,之后又恢复了工作。

然而,彻底为“二月逆流”平反,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8年11月间,中共中央为准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得到与会者的拥护。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郑重宣布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同志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宣布为“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了名誉,对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正地评价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斗争,彻底否定“二月逆流”的诬称。

中共中央在《决议》中在谈到“二月逆流”时这样指出:“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

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①

邓小平在评价“二月逆流”时指出:“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②

历史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二月逆流’不是反党的逆流,而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在这个抗争过程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同林彪、江青等人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体现了他们对党和国家一片坦荡无私的赤诚之心。

“二月抗争”无疑是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的艰难曲折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将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捍卫党的原则的正义斗争而载入史册。被颠倒了的历史终于被颠倒过来,这说明了党和人民力量的强大,正义力量的强大。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一个光辉缩影。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第81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

②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第六章 风靡雨急

武斗夺权升级和稳定形势推动

“一月风暴”的“夺权”之风潜袭全国各地 4省1市的“夺权”得到批准和支持 红卫兵卷入“全面夺权”运动 《军委十条》使两派斗争加剧 全国性的武斗规模越来越大 武汉的“百万雄师”与“七·二〇”事件始末 江青肯定“文攻武卫”的口号 “工总司”血流联司 谢富治关于“砸烂公、检、法”机关的荒谬主张 “王八七”讲话引起的风波 中国不断出现涉外事件 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陈毅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 毛泽东批了5个大字：“大、大、大毒草” 打倒“王、关、戚”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 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 毛泽东派出工宣队 红卫兵从革命狂热的云端回到现实土地上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和思

考 各地“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

1967年元旦前后,在一次会上谈到报纸问题时,毛泽东在讲话中抬起右手伸出手指说,报纸不必要这么多,过去影响大的是申、新两报(即全国解放前在上海出版的《申报》和《新闻报》,这两家报纸在当时是历史悠久、影响较大、销路较多的全国性报纸——编者注)。

陈伯达接过毛泽东的话茬说,北京就留一个《人民日报》、一个《光明日报》,除军报外,其他报纸可以停刊。

此时,毛泽东等还议论到,由于各地造反派群众组织“争夺”,占领省、市出版的报纸,影响到《人民日报》等报航空版的印刷、发行。

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保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正常印刷、发行。《通知》还说,最近,有些省市的报纸,“停刊闹革命”,这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报纸停刊以后,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航空版也停止代印,这就不对了。

《通知》认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机关报。《光明日报》也是中央批准发行的报纸。如果这些报纸不能正常发行,必然会使中共中央的精神不能及时同广大群众见面。这对全国“文化大革命”和各方面的工作都是不利的。

因此,《通知》要求各地在遇到这种情况时,要对红卫兵、

工厂工人和机关干部很好地进行思想工作,说服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保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正常印刷和发行。同时,《通知》还要求,已停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代印厂,接到这个《通知》后,请把它印出来张贴在工厂内。

然而,这个“停刊闹革命”的指示很快便被“夺权”斗争所打破。在中共中央发出这个《通知》的当天,张春桥、姚文元便在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报社召见了从上海前来的造反派头头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在座的还有聂元梓。

经过张春桥等人的密谋,1月4日,上海《文汇报》宣布“夺权”。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被宣布“夺权”。同时,《文汇报》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毛泽东对《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给予了充分肯定。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发表的《告上海人民书》,并将毛泽东的态度写进《编者按》中。

此后,一场全国范围的“夺权”风暴开始了(江青等将其称作“一月革命”——编者注)。而这场“夺权”风暴,首先从报界开始并不是偶然的。

早在“文化大革命”伊始,怀着篡党夺权野心的林彪,就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作思想工作的;另一个东西就是搞军队,抓枪杆子。

在林彪看来,文武相配合,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

命政变。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就是首先抢占舆论阵地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舆论的重要作用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野心勃勃的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都把夺取舆论工具视为“夺权”的首要目标和“夺权”的主要标志。随着运动深入发展，各地区各单位群众组织联合，其口号都是所谓“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就有3个“造反司令部”，他们的“五大领袖”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王大宾、谭厚兰等无不覬覦各大新闻机构的权力。

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最先派他的“井冈山兵团”数百人进驻《光明日报》；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都瞄准了《北京日报》，两员“女将”派出的人马相互争斗得难解难分；以“天派”领袖自诩的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则对《人民日报》垂涎欲滴。

这些红卫兵头头同各新闻机构内部的“造反”群众组织的头头互相串连，沆瀣一气，极力制造混乱，致使直属中央的各新闻机构受到很大程度上的骚扰。首都“红卫兵监督组”，竟然进驻人民日报社“监督”；北京广播学院等院校一批造反派组织也涌进了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电台；新华社也被造反派夺了权，总社领导和各级领导干部被抄了家。各省、市报社和广播电台“夺权”的事件更是接连不断。

广播事业局、新华社被“夺权”以后，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中央文革小组”被迫宣布，广播事业局、新华社这些单位都是中央直属的宣传机构，不得“夺权”和接管；同时，中共中央

派解放军对这些单位实行军事管制,以防止这些宣传工具脱离中共中央的轨道。

1967年1月11日及1月23日,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电台问题的通知》和《补充通知》,宣布各地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已经进入广播电台的革命群众,应当立即退出”。

“夺权”风暴也刮进了解放军报社。1月13日,解放军报社8人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硬说“几个月来《解放军报》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一直脱离文化大革命与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些人还发布了《革命造反派宣言》和《告全军书》。

第二天,这8人又发表题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主张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和地方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搞彻底”这一点是共同的,“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有所动摇”。这8人在“夺权”后即上书林彪,请求批准和支持。

1月17日,林彪复信说,由8人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解放军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林彪在信中对这些人的行动表示充分肯定。

林彪在复信中说,“你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

林彪并在复信中写道,“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了照顾

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于《解放军报》要采取“内批外帮”的方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但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做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派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

林彪把这封复信送给了毛泽东,并在上面写道:“解放军报社的问题是否如此答复,请批示。”毛泽东当即批准同意。

与此同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北京大学“红旗兵团”等单位于1月16日进驻北京日报社并“夺权”。他们成立了“彻底摧毁北京日报、促进北京日报新生革命造反联络站”,还发表了“革命派联合起来”的《呼吁书》。他们要“全面夺权”,“取而代之”,强调“外面接管”,排斥报社一切编辑人员。

因此,这些造反派组织与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等造反派组织发生分歧,引起了一些冲突。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干预,决定《北京日报》停刊,才使进驻报社的大学生红卫兵撤离报社。从此,围绕《北京日报》的争夺,各造反派组织之间形成了长期的拉锯战。

1月18日下午3时,延边自治州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系统同延边自治州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这两个造反派组织因为《延边日报》的接管问题发生武斗,并造成伤亡。为防止武斗规模进一步扩大,延边自治州党委3次派人到双方作工作,要求他们派出代表协商解决,均未成功。因为造反派已不信任州委,州委无法进行工作。

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延边自治州党委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去电制止冲突。

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的社论。社论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这篇社论还极力鼓吹“革命造反派是吓唬不了的”。社论说,“那些资产阶级权威”认为“造反派不行”,但是,不要以为,没有这些“资产阶级老爷”,造反派就办不了事,过不了日子。相反,搬掉了这些“绊脚石”,造反派的路子会“越走越宽”,工作会“越做越好”。

至此,这篇社论认为,在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和“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中,《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们,为全国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做出了“好榜样”。

社论还说:“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我们的一切报纸阵地!胜利是属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①

1月21日晚11时,广州几个红卫兵组织成立的“省革联”到广州日报社“夺权”,将报纸改为“省革联”的机关报《新广州日报》。但是,“省革联”的“夺权”因最终没有得到中央承认而垮台,《广州日报》被军管。不久,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驻广州联络站出版的《新北大》广州版发表文章《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重新掀起轩然大波。

4月10日晚,广州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再次冲击广州日报社,要求转载《新北大》的文章。这些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一直闹到5月11日,广州一个学院的红卫兵强行封闭了《广州日

^① 《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人民日报》,1967年1月19日。

报》。此后直到1972年,《广州日报》才以小报的形式复刊出版。

在这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机关报都陷入“夺权”、“新生”的混乱状态中,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机关报的争夺都形成了这种长期的拉锯战。其他如《云南日报》、《长江日报》、《广西日报》、《福建日报》、《北京日报》等,也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1月30日,毛泽东在谈话中针对广播事业局“夺权”所引起的相互争夺情况说,中央广播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又要分裂,内部争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

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也要善于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工作,“我就不赞成”。

2月5日,毛泽东针对由于外单位造反派插手,“内战”打得厉害的工人日报社的“夺权”问题发表谈话说,《工人日报》的问题,外单位的人不要在那里辩论。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

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失控。毛泽东的话已经不能制止住这种混乱现象。

于是,中共中央发出了一系列制止混乱的通知。2月21日,中共中央根据同年1月28日《军委八条命令》,发出《关于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补充说明的通知》,重申《红旗》杂志社、解放军报社、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各地广播局和各地广播电台等,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经进驻这些机关的外单位人

员,要立即退出。

《通知》中还有两条重要规定:一条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要求,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大中学校师生、工厂职工、农民、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都应当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本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一条是,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应以本机关、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进行“夺权”斗争,外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必要时可以协助,但不得包办代替。

此时,林彪、江青等人煽动起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全国泛滥。因而,这些以中共中央名义接连发出的《通知》和《补充通知》,以及有关的“最高指示”,并不能抑制造反派行动。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机关报在你争我夺的过程中,造反派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武斗流血事件。

毛泽东不能容忍这样的混战,便指示由军队暂时控制报社,发出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命令。但是,这个命令在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的大环境下,已不能约束造反派的行为。武汉、青海接连出现本地和外地造反派联合占领报馆,并与当地军区部队争斗的事件。

1967年2月初,武汉发生了造反派占领武汉市长江日报社事件。2月23日,围绕对《青海日报》的争夺,西宁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结果造成群众死亡169人,伤178人,部队死亡4人、伤26人,在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

在这时,各红卫兵组织和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一

面抢夺党报,造成混乱局面,迫使许多报刊停刊;一面利用这些报社的物质技术条件,大量出版各种造反小报。蜂拥出现的各种小报,造成新闻界的畸形现象。

1967年,全国出版的报纸由1966年初的343种猛降为43种,期刊由191种降为27种;其中还包括各省、市、自治区被“夺权”后在混乱中断断续续出版的机关报。而以“红卫兵”、“东方红”、“造反者”等命名的群众组织报刊,铺天盖地而来。据初步估计,在1966年夏季至1969年春季,全国这类报纸大约有近5000种之多。

红卫兵报刊是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喉舌,是那个“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狂热时代的变态文化现象。它在短暂的3年中,走过了初起、发展、鼎盛、衰亡的4个阶段。

早在1966年初夏的5月底,中国的政治空气比自然气候提前进入了燥热期。秘密聚集在北京圆明园遗址的一群青年学生兴奋地议论着从父母那里听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内容,以红卫兵的名义呼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

同年8月1日,毛泽东写出了致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热烈支持这些青年学生的行动。从此,红卫兵的名声迅速在北京各大中学校传播。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有关红卫兵的报道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如同一场狂飙,席卷全国。

在随后的“破四旧”和“大串连”运动中,红卫兵的传单、通令像雪片般地撒向街头。这些红卫兵迫切地需要代表自己心声的更强有力的宣传工具。于是,第一张《红卫兵报》应运

而生。

后来的人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红卫兵报》，是1966年9月1日北京六中红卫兵创办的《红卫兵报》及同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创办的《红卫兵》，均为8开4版。

北京六中红卫兵，是北京第一批红卫兵组织之一。他们积极参加了“破四旧”运动。由于在运动过程中采取了严重的打砸抢行动及所谓维护“走资派”的政治倾向。一个多月后，这个红卫兵组织便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刽子手”，遭到批判而解体，《红卫兵报》也只出了十几期便告夭亡。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又称“首都一司”，成立于1966年8月27日，主要负责人由高级干部子女组成，政治态度与中学的“老红卫兵”相似，因而不久也被斥为“保皇司令部”。报纸只出了二十几期。

9月中旬以后，随着对工作组和“反动路线”的批判，一批造反派红卫兵起而代之。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东方红报》，北航“红旗”的《红旗》，北师大“井冈山”、清华大学“井冈山”的《井冈山》报等相继诞生。由于其组织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首肯，这些报纸成为众多红卫兵报刊中的强有力者。

北京大学的《新北大》虽然在8月22日即已创刊，但初期还是以校刊的形式出现。之后因得到毛泽东的亲笔题词，《新北大》声名显赫一时，后来便成为“新北大公社”和聂元梓的独家代言人。

通过这些红卫兵小报，人们认识了造反的北京红卫兵的

“五大领袖”，领略了他们声嘶力竭的狂吼。

12月初，林彪、陈伯达通过下发关于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把动乱之火吹向了经济建设战线。红卫兵的含义急剧膨胀，不再是青年学生的专利。

红卫兵报刊队伍中，也涌进了大批工人、农民甚至军人主力的行业造反报纸。这些未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人办的业余报纸，虽然内容贫乏空虚，“最最最”一类语言充斥于字里行间，但就整体来说，错别字极少。

在这个绝对政治化的时代，任何版面上的错别字都有可能招致落个“反动”的罪名，使本派陷于灭顶之灾。所以，办报者一面怀着极大的狂热搜索歌颂或咒骂的词汇，一面又战战兢兢地校对着每个字词，尤其是领袖人物的引文。

此时，一家造反名气颇大的《东方红报》在漏排了毛泽东语录中的一个“的”字时，屡次三番声明检查，“从灵魂深处狠挖根源”，同时又板起脸来，呵斥对立一派不得“捞稻草”。诚惶诚恐之态，令人哭笑不得。为此，有的老编辑至今感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校对质量，盖出于此。

后来，有关专家、学者，经研究认为，1966年的红卫兵报刊的产生，带有浓烈的自发性质。自筹经费、纸张，自行联系印刷、发行。尽管在“自筹”中免不了要威逼、勒索，但毕竟还没有夺党和政府权的胆量。

1967年1月的上海“一月风暴”之后，红卫兵报刊由各群众造反组织通过“夺权”，抢占省、地、县及本单位的机关报而产生。其实在“全面内战”的局势下，能够控制省报为一派私有的情况并不多。多数被造反派红卫兵改造为红卫兵小报

的,是省以下的地、市及单位的机关报。但这些报纸因为占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在印刷发行方面得天独厚,往往在红卫兵报刊中影响很大。

这些红卫兵报纸,特别是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组成的几个“司令部”出版的报纸,大都被权欲强烈的野心分子操纵。他们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步调,照着林彪、江青等人的指挥棒行事,根据林彪、江青等人的意图任意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文章铺天盖地而来。

同时,这些报刊还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争相表示“拥护伟大领袖”的忠心。红卫兵们往往以此作为“唯我独革”的标志,去赢得林彪、江青等人的赏识,也是为了适应其与持不同观点群众组织较量的需要,以求在与对手打派仗中占上风。

为了打倒一个人,红卫兵往往采取造谣诽谤手段,栽赃诬陷,连篇累牍地刊登中共中央或本地的“走资派”的“罪行录”,上纲上线。尤其是1967年8月,康生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之后,各红卫兵报刊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各级领导人点名攻击。当然,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是决不触犯的。

这些小报还刊登内部讲话和文件。各家报纸为了显示自己能够“通天”,不断刊登通过抄家或接收得来的中央文件和党的领导人讲话。各报几乎都设有“动态组”,派出记者尾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活动,抢先发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接见群众组织时的讲话。以至于“中央文革小组”有些新的行动,往往有意通过红卫兵报刊散布出去。

红卫兵报刊还刊登其在打、砸、抢行动中的武斗消息。由

于各省都分裂成对立的几大派,各派报纸便不断地报道在“全国内战”中耸人听闻的“血案”、“惨案”。有些报刊固然也真实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但也有不少是捕风捉影,添油加醋,制造火药味,不负责任地传播各种道听途说的、无中生有的“小道消息”,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

这些红卫兵报刊还刊登本派红卫兵学习毛泽东著作、各首长的讲话、中央文件的心得体会。这些报刊常常豪言壮语满篇,又大又空。其实,他们的目的在于标榜自己。

1967年夏季,全国红卫兵报刊的种数达到了顶峰。其中最多的地区,据后来的不完全统计,北京有200多种,江苏、辽宁、四川等省都在300多种以上。周恩来曾询问四川重庆的“支左”负责人,重庆市仅“反到底”派有多少种报纸。回答是30多种。而且每个专区、县市几派都有自己的报纸。

全国红卫兵报刊种数最少的地区是西藏,仅有十几种。但是西藏的红卫兵却出有藏文红卫兵小报《红色造反报》,在此时堪称全国一绝。

从办报人的职业来看,学生、干部、工人最多,农民其次。甚至有些地区还出现了聋哑人造反组织办的《聋人风暴》,从监狱中平反出来的囚犯办的《红囚徒》报。人们将其称之为“乱世奇观”当不虚妄。

5月14日,中共中央针对红卫兵报刊中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曾经发出《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宣传的意见》。《意见》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组织编印的各种报刊、传单,在宣传战线上起了重要作用。

《意见》还说,根据这类报刊宣传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

题,中共中央提出了7条意见。这7条意见包括:

一、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应“严格遵守”毛泽东、林彪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并参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

二、毛泽东、林彪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一律不许擅自刊登和印发。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会议记录和负责同志的内部谈话,一律不要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册子和其他形式编印流传。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非常战斗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的军队”。报刊上不得公开发表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对于他们的支援工作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也可以当面批评。有的报刊,在中央作出明确规定之后,还发表公开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这是完全错误的。

四、必须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群众组织的报刊泄密现象相当严重,在一些文章、报道中,透露了国防工程、设施、部队调动情况、备战计划、措施,以及经济建设、外交斗争、机要事务等等重要机密。这种现象必须迅速制止。

五、宣传要“突出政治”。对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着重从政治上、思想上揭深批透。不要搞“黄色新闻”以及其他庸俗、低级的东西。

六、对国际问题的发言权集中于中共中央。对于国际上重大问题的宣传,要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

七、在宣传报道中,不要传播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马

路新闻”，尤其不要轻信和传播政治谣言。

从上述提出的问题看，红卫兵报刊产生的后果已经十分严重。但是，《意见》既然在开头便肯定红卫兵报刊“起了重要作用”，提出的又是“改进意见”，也就无法制止这种现象蔓延下去。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内乱。

由于局面已经逐渐失控，随后就是7月至9月的更大混乱，这一《意见》也同其他有关《通知》、《决定》一样，难以产生应有的抑制作用。

红卫兵报刊的编辑出版，始终是各派组织内少数人的事。以影响最大的“三司”的《首都红卫兵》为例。报纸创办之初，编辑部只有三四个人。从收集稿件、编改文章、报社校对到采购运纸、分发报纸几乎都是这几个人干。第一期没人给印，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家报社，跑了6个印刷厂，最后才在《前进报》排版，在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出。当然，当“三司”后来声名鼎赫之时，情况顿有改观。

最初兴办的红卫兵报刊的发行，一部分自行发售，一部分也通过邮局订阅。但后来随着红卫兵报刊的种类骤增，邮局也分裂为几大派，通过邮局的便只剩下影响大的几家。多数都改为上街叫卖。

在发行中，影响最大的是上海《红卫战报》。早在1966年底，上海发生了“《解放日报》事件”之后，便出现了每一份《解放日报》伴随一份红卫兵《红卫战报》“押解”而出售的奇闻。

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则直接驱赶“走资派”上街卖报。

1967年夏,北京外语学院等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勒令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姬鹏飞等人到王府井街头叫卖红卫兵小报。一时间,“乔老爷卖报”的消息风闻全国,外国报刊还刊登了乔冠华等人卖报的照片,给中国的外事工作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6月30日,北京市革委会曾作出规定,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出版的报纸一律实行自费,亏损不补。但红卫兵们总还能以各种办法搞到经费,继续出版报刊。

随着内乱的加剧,毛泽东开始采取措施纠正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毛泽东在南巡途中指示,各派要“斗私批修”,实现“大联合”。毛泽东严厉地指出:“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9月8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发出布告,要求外地来京人员不许在北京各学校、各机关、各单位设立联络站,不许在北京出版报纸。同时,布告还特别强调,违者,要由革命委员会进行取缔。

但是,红卫兵仍然继续出版报刊。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0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这两个通知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多如牛毛的红卫兵群众组织有的合并,有的解体,红卫兵报刊的数量、种类开始减少。

在这两个中央通知之后,红卫兵们才回到了各自的学校、单位。但在蒯大富、聂元梓等“五大领袖”控制的单位,情况并没有好转,武斗仍在继续,煽动武斗的红卫兵报刊仍在出

版。

1968年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他们在宣传毛泽东的指示、制止武斗、促进联合时，遭到该校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的武装围攻，死5人，伤多人。

毛泽东被这一事件震怒了。次日，毛泽东同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北京高等院校“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毛泽东严厉批评聂元梓、蒯大富等人“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并严厉告诫他们要听从指挥，停止战斗，欢迎和支持工宣队进驻学校。

当天，工、军宣传队进驻各大学。造反派红卫兵横行的时代结束了，红卫兵报刊“指点江山”的状况也结束了。此后，随着“清理阶级队伍”和毕业分配、上山下乡，红卫兵们离开了学校。大学“红代会”停止活动，《首都红卫兵》也理所当然停刊。

全国大多数红卫兵报刊都在1968年底至1969年初停止出版，只有少数改为革命委员会机关报，更改名称后出版。这时的红卫兵报刊的内容与出版方式都与前期不可同日而语。

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共中央对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的错误言行采取严厉措施之后，情况才变得好一些。

张春桥等人一手操纵的上海“夺权”和“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是“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和实践的产物。

当然，毛泽东对上海“夺权”是特别关注的。毛泽东在发

动“文化大革命”时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情况”，有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而许多领导干部又都是所谓“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刘少奇的“代理人”。毛泽东寄希望于上海的造反派。

然而，张春桥等人也正是摸清了毛泽东的这一点，投其所好。而毛泽东则认为上海的作法证实了自己的预想。所以，毛泽东赞扬上海的工人阶级左右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和误会。正是这种假象和误会，使毛泽东积极支持造反派的“夺权”。

在上海市委的党政大权被造反派夺走后的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在谈到上海“夺权”时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1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对上海“夺权”大加赞扬，称为“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

各新闻媒体也对“夺权”大加宣传。为了更好地宣传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精神，1月2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革命的夺权好得很》的社论。

社论说，随着《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新生”，像连锁反应一样，一大批崭新的、革命的工厂、机关、学校也紧跟着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掌握

自己命运的一个“伟大创举”。社论大肆鼓吹“革命的权夺得好”。社论进一步表明：

革命的夺权好得很！这是一场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革命的夺权好得很！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它一出现，就得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坚决、最及时、最有力的支持。

革命的夺权好得很！它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革命的夺权好得很！它大长无产阶级的革命志气，使资产阶级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这个革命行动，引起了上海地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极大的仇恨。他们使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它，嘲笑它。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革命的夺权，越是遭到一小撮反动分子的起劲反对，就越是说明它好得很！

“你们太过分了！”对！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要“过分”。你们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你们盘踞的地方和单位，利用被你们掌握着的党权、政权、财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蒙骗群众，腐蚀群众，打击群众，镇压群众，

玩阴谋，闹反扑，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保住自己既得权力。我们革命造反派“敢”字当头，把你们篡夺去的权力夺回来，并且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这种所谓“过分”的举动，正是革命的需要。难道要我们革命造反派在你们这班资产阶级老爷们的统治下“安分守己”吗？不行，一万个不行！^①

社论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归根结底，就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至此，社论极富鼓动性地说：

“我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权，把报纸和一切舆论工具的领导权，把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权，统统地从你们手中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们耍阴谋，搞诡计，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破坏市场，破坏文化大革命，制造种种反革命混乱。我们夺权，就是打击你们的捣乱活动。你们把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污蔑为‘制造混乱’，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搅动了你们这班老爷们的酣梦，打乱了你们的阵脚，所以你们要大叫‘混乱’。可怜的先生们，我们夺权，就是要把你们的旧秩序搞得乱乱的。”

^① 《革命的夺权好得很》，《解放日报》，1967年1月20日。

这种破坏旧秩序的‘乱’，你们叫嚷：‘糟得很！’而革命人民都齐声欢呼：‘好得很！’”^①

社论还引用毛泽东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这句话说，“无产阶级革命人民”从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这些“反动分子”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进行“垂死挣扎”，掀起“新的反扑”。社论说：

他们利用革命群众缺乏经验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设圈套，钻空子，妄图挑起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矛盾，挑起一部分群众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在革命群众夺权过程中，他们又会暗中捣鬼，用许多烦琐的事务来束缚革命群众，分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精力，保存自己的实力，伺机东山再起；他们甚至还会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也打着“夺权”的旗号，组织保守派搞假“夺权”。一切革命群众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及时识破、揭露和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②

^① 《革命的夺权好得很》，《解放日报》，1967年1月20日。

^② 《革命的夺权好得很》，《解放日报》，1967年1月20日。

最后，社论蛊惑人心地说：“革命的夺权好得很！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领导下，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看吧！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照耀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上海，即将随着春天的骄阳出现在东海之滨。”^①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十分明确地指出：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

^① 《革命的夺权好得很》，《解放日报》，1967年1月20日。

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亿万革命群众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为核心,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①

社论强调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出现了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夺权”。但是,被打倒了的阶级敌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在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队伍里也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一直在激烈地继续进行着。

社论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亿万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只有展开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全面夺权”斗争,才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夺权”问题,彻底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社论极其明了地表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的各种权力,非夺不可”。这是广大革命群众,通过几个月的艰苦斗

^①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人民日报》,1967年1月22日。

争,掌握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社论写道:

为什么当革命的左派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满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瞄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出第一炮的时候,就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

为什么当“工作组”来了以后,革命左派不仅没有翻身,反而更变本加厉地遭到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

为什么当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却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事件,甚至武斗流血,多少革命的闯将受打击,遭迫害,被开除,被镇压,直到最近,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大反扑,出现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大泛滥?

几个月的反复和曲折,一场场惊涛骇浪的阶级斗争暴风雨,深刻地教育了广大革命造反派。他们越来越明白了:革命之所以受挫折,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印把子没有攥在自己手里。那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所以如此猖狂,之所以敢于这样欺负人,就是因为他们还有权!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

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各种大权，统统要夺回来！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说得好：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这不是什么“个人野心”，而是为无产阶级夺权，为共产主义夺权，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①

这篇社论还说，翻天覆地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群众运动，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决战”。它必然带来阶级矛盾的集中爆发，带来一场空前规模的急风暴雨。

社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展开“夺权”斗争，就必须实行大联合。没有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就只是一句空话。

社论指出，在“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下，亿万“革命群众”正在毛泽东的新的伟大号召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伟大口号”下动员起

^①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人民日报》，1967年1月22日。

来,投入战斗,这就预示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末日,已经来到了”。

社论要求干部和学生,一定要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使社会上的斗争同本单位的斗争结合起来,内外联合,两面夹攻,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

社论认为,大联合,要在“夺权”的斗争中形成。大联合,必须旗帜鲜明。它是“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而不是乱七八糟的大杂烩。那些折衷主义、改良主义的东西,以及那些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分裂主义的东西,必须统统打死。

社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联合“夺权”时,要“分清敌我”,坚定“必胜”的信心。社论说: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高潮中,极少数资产阶级顽固分子总会乔装打扮一番,削尖了脑袋,力图钻进革命派大联合的队伍中来。他们虚伪地打着“革命造反”旗号,向无产阶级夺权。他们惯于制造谣言,挑拨离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革命派,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分清敌我,辨明大是大非,戳穿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回击!

阶级敌人空前强烈的抵抗是必然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和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勾结起来,拼凑起反革命的联合,来对抗革命的大联合。但是,无论遇到多少曲折和反复,我们上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革命群众,我们必将战胜一切困难,把那些在背后煽阴风、点邪火,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家伙,一个个地揭露出来,把他们打倒。革命的大联合终将战胜反革命的小联合。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的战友们,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动员起来,实现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①

“全面的夺权斗争”很快在全国掀起。这篇社论确实确实给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一个不小的震动。

就是在这样一片“夺权”的呼声中,在由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迅速潜袭全国各地的時候,林彪、张春桥等

^①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人民日报》,1967年1月22日。

人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推波助澜。

1月23日,林彪在确定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方针时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张春桥也说,“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一场从上海开始的迅速扩及全国的“全面夺权”逆流,已经不可避免了。

继上海“夺权”之后,迅速起来响应的是山西省。

早在1966年12月,江青发现1936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当时叫“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编者注)只有刘格平一人不执行中央关于履行手续出狱的指示。江青认为此人了不起,就调他到北京谈话。

刘格平到北京后,江青一直没有找他谈话。直到上海“夺权”后,江青嘱咐关锋同刘格平谈话,要刘格平立即回山西去领导“夺权”。

刘格平回到太原后于1月9日组织人贴出“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

1月12日夜间,在刘格平的组织下,各造反派采取联合行动,向“以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占领省、市委,省、市人委,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

1月13日晚,刘格平等3名领导干部公开站出来,向造反派的代表两千余人表态,“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群众站在一起,进行夺权”。

1月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

告》。《通告》说，总指挥部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总指挥部于1月12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以及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1月19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格平任革委会主任。

1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通告》，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实际上是在向公众表明，中共中央批准了山西和太原市的“夺权”。

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自1月12日夜起，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看管。卫恒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迫害，于1月29日夜间自杀身亡。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继原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之后第二个被迫害致死的省委第一书记。

1月25日，贵州省委被“夺权”。在贵州省被“夺权”之前，原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连续向中共中央发了许多电报，反映当地“文化大革命”情况。王力对此人颇为欣赏，同时也认为李再含是部队中不多见的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并向毛泽东作了推荐。

1月20日，李再含在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并“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中反映了贵州某造反派负责人及其总部的若干问题，请求对他们实行专政。

对此，毛泽东建议周恩来将李再含、贵州省军区司令员、贵州省委个别干部及群众造反派的“可靠领袖”，找到北京，共同研究和确定政策。

1月下旬,李再含到了北京后,江青对他说,差不多的地方都要“夺权”。李再含因有人支持就起来造反,组织人夺了贵州省委、省人委和贵阳市委、市人委的权。

1月25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发布《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通告》。《通告》说,“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向全省人民“庄严宣告”,“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工人战斗团”等40个造反组织,以“贵州无产阶级造反派总指挥部”名义,于1月25日接管贵州省委、省人委和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1月26日,这个《通告》登载在《新贵州报》上。之后,李再含等人又发布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十项通令》。

1月31日,毛泽东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通告》上批示时,认为这个《通告》可以发表,并建议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十项通令》修改后发表。

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祝贺贵州省的“夺权”。《人民日报》还于当天转载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通告》。

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十项通令》。2月14日,“毛泽东思想贵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任主任。

2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将关于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4篇新闻稿《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

立》、《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告全省人民书〉》、《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经验》等呈送毛泽东。

陈伯达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贵州省材料4份,内容较丰富,关于“三结合”的经验也说得“好”。陈伯达还请示毛泽东,若新闻稿可以发表,是否将“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名称简称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批示“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他要求陈伯达、王力将4份新闻稿上的名称一律改过来,然后分两天发表。第一天发前3件,后一件在第二天发表。

于是,《人民日报》于2月22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前3篇新闻稿。即《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委临时权力机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告全省人民书〉》、《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第四篇新闻稿,即《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的经验》。这4份新闻稿中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一词,在发表时均被改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东北的黑龙江省“夺权”进程更为迅速。从1月10日开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等院校的造反派,联合接管了《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日报》、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广播电台、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省委机关“红色造反

团”等7个单位联合组成省委机关接管委员会，夺了黑龙江省委机关的权。

在此期间，“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在一些已“夺权”的单位进行“夺权”，被镇压。所谓“保字号”的工人组织“赤卫队”、学生组织“八八团”，被迫解散。

1月16日，在潘复生（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全国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的省委第一书记，早在1966年8月间就把省委其他领导人置于对立面——编者注）、汪家道（时任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编者注）的支持下，23个单位的造反团体组成联合总部，发出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

1月31日，潘复生在得到以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时任“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编者注）为骨干的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支持后，主持召开“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这个革委会1月31日在《第一号通知》中郑重宣告：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自即日起，归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范正美（时任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派头头——编者注）担任这个革委会的“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为顾问。

2月1日，《人民日报》以《东北的新曙光》为题发表社论，对黑龙江省的“夺权”表示祝贺。“中央文革小组”在2月7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上，登载了黑龙江省造反派“夺权”斗争的经验。这篇文章认为，黑龙江省造反派在“夺权”

斗争中的经验包括以下4点：

一、根据当地的具体斗争情况，鲜明地体现党的方针政策，团结省委内部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和军队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

二、在夺取省委的领导大权之前，首先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喉舌报社、电台和专政机关公安局掌握在“左”派手中，为最后夺取省委大权作好舆论准备，坚决针对“反革命”，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

三、坚决地依靠被“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力量，团结中间力量，打击反动力量，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四、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左”派队伍，“左”派队伍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夺权”斗争。

毛泽东看了这个材料后，建议陈伯达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修改后公开发表并予广播。

2月10日，这篇材料发表在《人民日报》上。3月，中共中央批准潘复生、汪家道为黑龙江省革委会正、副主任，范正美为常委。

山东省的“夺权”则一直受到康生的支持。1月17日，王效禹（时任山东省青岛市副市长——编者注）让张子石（康生前妻生的儿子——编者注）等人到北京找陈伯达、康生和王力，汇报运动情况，并请示以后的工作。

1月19日，王力对张子石等人说，“大方向就是夺权”，有了权就等于有了一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旗帜不要让人家抢去。

当天夜里，康生、王力、关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张子石等人。康生说，运动已经到了“左”派要团结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一个关键时刻。

康生谈了3个多小时，再三表示“坚决支持”在青岛、山东“夺权”。

王效禹得到康生的旨意后，于1月22日组织青岛23个造反团体夺了青岛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

接着，王效禹又率众夺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权。1月30日，《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并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社论说：

凯歌阵阵，喜讯频传。青岛市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起来了，他们把青岛市的党、政、财、文大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过来了！这是继上海、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功地夺权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取得这次重大胜利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

只有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才能胜利地展开夺权斗争。没有这种大联合，匆匆忙忙地跑去夺权，那不是空话，便是妄动。那一定是搞不好的。所以，关键在于大联合。上海革命造

反派的革命实践证实了这一点,山西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实践证实了这一点,现在青岛市革命造反派夺权的成功经验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①

社论还明确地说,有些地区,有些单位,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在表现形式上,就是妨碍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

社论认为,造反派内部由于受到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些组织当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在有些造反者身上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这些都妨碍和影响了“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妨碍和影响了“我们去进行胜利的夺权斗争”。

社论要求造反派努力学习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著作,联系实际斗争,纠正错误倾向,加强组织纪律性。社论认为,这样“对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具有重要的意义”。社论说:

阶级敌人对我们的大联合怕得要死,恨之入骨。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这种大联合。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他们暂时还窃居的各种职

^① 《关键在于大联合》,《人民日报》,1967年1月30日。

权,利用革命造反派内部的缺点和部分人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分化瓦解,妄图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制造反对派,破坏革命造反派的大团结、大联合,从而达到保他们自己权力地位的目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这是多么值得我们警惕的啊!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害怕我们联合,破坏我们联合,我们就一定要联合。青岛市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遵循了毛主席的教导,对于阶级敌人破坏联合的种种阴谋诡计和罪恶活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打击。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共同原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大联合为基础的革命造反委员会。这种组织形式,成为统一领导夺权斗争的权力机构。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中,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起着重要的作用。青岛市的夺权斗争,在革命造反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们为全国革命造反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①

社论最后极力地煽动说:“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

① 《关键在于大联合》,《人民日报》,1967年1月30日。

反派,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实现最广泛最紧密的大联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①

2月3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3月2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的社论。

以上这些夺权,都是中共中央批准了的。从根本上说来,这是江青、康生利用了“左”倾错误,将“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行动推向全国的直接结果。

以上山西、贵州、黑龙江和山东4个省的“夺权”加上上海市的“夺权”,构成了1967年全国“夺权”的第一个大浪潮,在全国形成了“全面夺权”的形势,掀起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

同时,在“夺权”过程中,“夺权者”同倾向于支持原来的党政领导的群众之间、这一派“夺权者”同那一派“夺权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此引发的“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一发不可收拾,使整个神州大地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

由于4省1市的“夺权”均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和支持,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随即纷纷仿行。这时,几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进行了“夺权”。有些地方没有夺成,有些中共中央没有给予批准,有的已批准尚待组成革命委员会。如广东1月22日“夺权”,安徽1月26日“夺权”,北京市1月28

^① 《关键在于大联合》,《人民日报》,1967年1月30日。

日“夺权”等等。

有些地方没有夺成,是因为有“更大的力量”以种种名义在阻挠“夺权”,或两大派争权。有些“夺权”不为中共中央所批准,主要是因为没有“大联合”和“三结合”。有的已批准而不公布则是因为组成革委会、准备文件等等尚需时日,如北京市的“夺权”就是这样。

此时,不仅几乎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进行了“夺权”,不仅几乎中央各部委都在“夺权”,而且下面千千万万个单位都在“夺权”。人人谈论“夺权”,处处争论“夺权”。

其实,毛泽东早在1919年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说过:“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①毛泽东这几句话在1967年2月5日《光明日报》上重新发表以后,为人们争相引用。

虽然表示支持“天下大乱”但又想设法约束严重混乱状况的毛泽东,通过一系列重要社论指导“夺权”。这时的报刊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反复传达毛泽东关于“夺权”的指导方针,即主要是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

为了实现这种“大联合”和“三结合”,毛泽东要求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各造反派组织,各造反派组织要进行整顿,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一大”前后》,第一卷,第9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

要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潮等等。

其中,有3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过的《红旗》杂志社论最为重要。一篇是1月31日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三期(2月3日出版——编者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另两篇分别为《必须正确地对待革命》和《论革命的“三结合”》。《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说: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代理人的决战。

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立即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响应。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对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堡垒,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一个一个地巩固。“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阵线被打

得七零八落。但是，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决不甘心的自己的灭亡。他们也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

毛主席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来，也是这样。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丢掉幻想，准备斗争。”^①

这篇社论总结了夺权斗争的5点“基本经验”。这5点“经验”包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大方向；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这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同时还要重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夺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也指出，对当权派，不作阶

^① 《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

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3月10日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五期(3月30日出版——编者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中说，毛泽东提出的，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为好”。

社论还说，革命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正确地领会这个方针，正确地执行这个方针”。

社论认为：“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①

社论说，半年多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充分地发动了群众，一大批新起的革命群众的代表人物涌现出来。广大革命群众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基础，同时也是“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基础。社论还说：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新起的革命群众的代表人物，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① 《论革命的“三结合”》，《红旗》杂志，1967年第五期。

他们是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新生力量,他们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

这一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在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必须充分发挥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作用,必须重视他们的意见,而绝不能把他们当做陪衬,因为他们是广大革命群众的代表。如果不承认或贬低他们的作用,那就是否定革命群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排斥他们,把他们当做陪衬,那就不可能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那就不可能是革命的“三结合”。

在一切大革命群众运动中,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必须看清本质和主流,看清革命的大方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缺点和错误,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看到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看到他们有许多长处,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对于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则应该满腔热情地、耐心地、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还应该看到,许多革命群众组织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出了自己组织中存在的错误倾向和纠正的方法。这是一种可贵的革命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同时,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

权,正是革命群众自己提出来的。^①

社论强调,对待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的态度问题,就是“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也是能不能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志。

社论要求全国人民必须时时刻刻记住毛泽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教导。任何组织和个人脱离了广大“革命群众”,那就一定不能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社论说,半年多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严峻地考验了干部队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揭露出来了。同时,这样的群众运动也证明了党内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那种对干部“一概排斥、一概打倒”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社论说,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的主张,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这种“余毒”在某些同志的头脑里没有肃清,因而也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犯过这种错误。

社论说,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事业单位,都有大批的革命干部。就是在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盘踞”的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也是这样。不过那里的革命干

^① 《论革命的“三结合”》,《红旗》杂志,1967年第五期。

部长期受到“压抑”罢了。

社论对革命干部参加“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的作用作了充分估计。社论说，他们应该而且可能在这个机构中起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当然，革命干部只有和群众相结合，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才能起到这种作用。

社论认为，犯有错误的干部，只要检讨错误，改正错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真正站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就应该按照“革命不分先后”的原则，团结他们，安排他们适当的工作，其中许多人还可以参加临时权力机构。

同时，社论又强调说，不能把坚持错误、不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不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的人，强加在群众头上，硬将他们拉到“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中来。否则，那就不是革命的“三结合”，那就根本谈不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那就会出现反复，甚至使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新上台。

社论还论述了人民解放军在“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社论说：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要积极支持广大的革命左派群众，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经验证明，在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中,有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参加,对于胜利完成夺权斗争的任务,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有了人民解放军干部参加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有了人民解放军的支援,地方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就更大了。阶级敌人最害怕人民解放军,最害怕有军队干部参加的革命的“三结合”。他们费尽心机制造流言蜚语,捏造事实,妄图挑拨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的关系,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对于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必须给以充分揭露和坚决的打击。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举世无双的非常革命化的无产阶级的军队。毛主席说,“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正因为这样,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都信赖人民解放军,都热烈拥护当地驻军的代表参加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①

^① 《论革命的“三结合”》,《红旗》杂志,1967年第五期。

社论认为,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态度,就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也是区别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社论指出,在某些地方,由于阶级斗争的情况错综复杂,当地部队的某些同志,也可能在支援工作中犯暂时的错误。当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真正的革命“左”派应该善意地采取适当的方式,向部队负责同志说明情况,提出意见,而绝不应该采取公开对抗的态度,更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否则,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为阶级敌人所利用。

社论说,人民解放军在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全体指战员要遵照毛泽东的教导,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虚心向革命群众学习,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善于同群众商量问题,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这样做,就能非常有力地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就能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同时部队本身也就能在斗争中得到新的锻炼和提高。社论还说:

“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这个权力机构,必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能是合二而一的、折中主义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有代表性,才能代表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革命干部。只有这样,它才能是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才能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实

行强有力的集中领导,才能对阶级敌人实行强有力的专政,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牛鬼蛇神的各种形式的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切不可糊涂起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当前,我们要特别记住毛主席的这个教导。^①

至于“三结合”的方针,《人民日报》早在3月2日发表的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取斗争胜利的保证》里就提出来了。后来,毛泽东又说,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3条:一条是具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

“红卫兵运动”对各级领导机关的冲击,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使原来积压下的旧矛盾和运动带来的新矛盾一起爆发了,局面更加错综复杂。

在北京和上海本地的红卫兵积极参与下,上海市以32个造反派组织的名义,于1967年1月份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32个组织中,有13个是红卫兵组织。上海1月“夺权”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全国性“夺权”运动进入了高潮。而

^① 《论革命的“三结合”》,《红旗》杂志,1967年第五期。

且,仅1月份就有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和国家科委宣布“夺权”成功。

夺权刺激了一些红卫兵头头的政治投机心理。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又开始串连,进而策划各种各样的“夺权”行动。这时的红卫兵主要是想夺上级领导部门和其他单位的权。一些红卫兵组织纷纷在各地设立联络站,干涉其他地区和单位的“夺权”斗争。这时,上海“夺权”的32个组织中,有5个是北京、西安等地红卫兵组织的驻沪联络站。

1月份,北京大学的孙蓬一率“红旗”战斗兵团到高教部、中宣部、华北局、团中央等几十个中央部门“夺权”,但很快被中共中央制止。

红卫兵在造反过程中,那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老子天下第一”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腐蚀了青年学生。个人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恶性膨胀,成为红卫兵组织的流行病。

“全面夺权”运动的展开,对红卫兵组织产生的影响也是极大的。

一是红卫兵组织为了扩大影响,向省市领导机关“夺权”,纷纷成立规模更大的跨学校的群众组织,即使是在本校内部,也更换名称,扩大组织,以便在“夺权”斗争中居于主导地位。

二是这些组织由于在“夺权”的具体问题上出现分歧,明显地分裂为两大派组织。红卫兵组织的分裂日益社会化。

在这种形势急剧恶化的局面下,毛泽东看出了学生“夺权”运动的局限性,对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深为忧虑。

毛泽东不希望运动在完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当运动进入“夺权”阶段后，毛泽东就想把红卫兵活动的舞台从社会拉回学校。

早在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下达文件，要求对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以加强红卫兵的组织纪律性。但是，“夺权”运动的开展使红卫兵自行其是的情况更加严重。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和外宾谈话中，批判了此时流行的“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毛泽东并且说，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靠得住靠不住，还要看。2月18日，毛泽东又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反动的”。

2月19日，北京卫戍区写了关于5所高校和两所中学军训试点的两份报告。毛泽东立即批发全国，指示大学、中学、小学高年级每年军训一次，党、政、军机关除老年外都要军训，每年20天。

2月26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毛泽东推荐的红卫兵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提出了“边战斗，边整风”的口号。

《人民日报》在刊登“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这张题为《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的大字报的同时，还刊登了上海《体育战报》评论员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

《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写道，《我们的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和《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这两篇文章，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夺权”斗争的过程中,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带有普遍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关系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两篇文章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范例”。

编者按中说:“大字报提出了一边战斗、一边整风的号召。他们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主张运用整风方法,自觉地从思想上解决问题,都讲得很好,很及时。这两篇文章,值得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注意,并结合自己单位的具体情况,认真地学习和研究。”^①

《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一文在开头就这样写道: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更深入,更广阔地向前发展。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实现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夺权斗争,把他们窃取的党权,政权,财权统统夺过来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的手中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革命的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

面临大好的新形势,我们回顾运动系文化大革

^① 《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人民日报》,1967年2月26日。

命,短短的八个月的时间里,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历了多大的惊涛骇浪啊!在阴风四起,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围攻谩骂,我们受过;威胁压制,我们领教过。因为写“总支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二十点”,多少张总支组织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向我们压过来;什么不要总支的领导是“不要党的领导”、“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啊,什么抢广播站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啊,什么开大门是“违抗中央指示”啊,什么捉鬼队的捉“鬼”啊!等等。反革命的气焰是何等的嚣张。当时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而我们却迎着风暴笑,迎着阻力上,毛主席的亲切教导,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力量,有毛主席支持我们,无论敌人怎么疯狂地镇压我们,我们照样顶天立地,我们照样大喊大叫。“‘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语。”^①

大字报说,那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大字报断章取义地引用毛泽东曾说过的“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为此,大字报说:

运动系的革命派走到一起来了!鲁迅兵团在运

^① 《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人民日报》,1967年2月26日。

运动系两条路线，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中成立了！他们一出现就表现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发扬了鲁迅的革命造反精神，不怕孤立，不怕威胁，不怕围攻，不怕造谣中伤，不怕明枪暗箭，不怕戴“反革命”帽子，不怕丢脑袋，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了拼死的斗争，使那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闻风丧胆，使那些糊涂的同志目瞪口呆。在运动系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搏斗，大决战中，鲁迅兵团成了运动系保卫和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急先锋，成了运动系革命造反的骨干力量。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鲁迅兵团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迅速成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胜利。最近以鲁迅兵团为代表的革命派又接管了运动系的大印，夺了总支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个伟大胜利。^①

这张大字报分析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历史已经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又提出了更高要求，又把新的问题推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面前。

大字报还引用了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

^① 《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人民日报》，1967年2月26日。

届二中全会上所讲的话说：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①

接着，大字报写出了“东方红”战斗队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是：“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突出思想革命”；“反对‘材料挂帅’打‘人民战争’”；“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反对关门主义，团结大多数”；“整顿思想，向‘私’字开刀”。

《人民日报》同一天转发了上海《体育战报》评论员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

其中说：“这是一张洋溢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大字报，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是一篇在斗争实践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文章,值得大家认真地学习。”“这张大字报之所以好,就是因为这些年轻的闯将,在节节胜利面前不仅没有自满,而且还能深刻地检查自己队伍里存在的问题,革自己的命。”^①

文章说,这些“小将”和“鲁迅兵团”的其他战士一起,“听毛主席的教导”,不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白色恐怖”,不怕“保皇派”的围攻、威胁,冒着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风险,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奋起造反”。

文章说,“鲁迅兵团”最早打开了内外串连的大门,最早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最早敲响了总支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丧钟”,为上海体育界的“文化大革命”建立了“功勋”。最近,他们又把总支的权夺过来。面对着“辉煌的成绩”,“丰硕”的战果,这些“革命小将”毫不满足,及时地喊出了“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一切从零开始”的口号,用毛泽东思想作“显微镜”,着手深入地检查批判自己队伍里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革自己的命。“这是多么可贵的彻底革命精神”。

紧接着,文章引用林彪的话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

文章说,在“文化革命”中,要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命,夺他们的权,把他们“斗倒、斗臭、斗

^① 《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人民日报》,1967年2月26日。

垮”；但同时，又要革我们自己头脑里资产阶级思想的命。

文章说，党内还有一些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对于自我革命兴趣不大，要求不强，甚至有的人还以老革命自居，自认为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不想作自我革命，也听不得一点批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文章认为，“东方红”小将的这张大字报之所以“好”，还因为他们不仅在胜利面前及时地“检查”了自己队伍里的问题，而且还能“勇敢”地把“门”打开，对问题作尖锐泼辣分析，写成大字报贴出来，公诸于世，让广大群众来监督、批判。这一点也是很可贵的。

文章说：“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有了问题能够作尖锐深刻的自我批评，并勇敢地把它亮出来，让广大群众来批判、监督，这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的主观世界改造会有很大的好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取得群众的信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①

文章认为，怕“家丑”外扬，怕“开门”把问题摆出来后会影响“革命派”的威信，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东方红”战斗队的实践证明：当他们贴出批评自己队伍的大字报后，不仅没有失去群众的信任，相反，大家更相信他们了。许多同志（包括过去对他们有些看法的人）都从心底里发出了要很好地向“小将们”学习的呼声，他们的威信更

^① 《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人民日报》，1967年2月26日。

高了。

文章认为，“革命队伍”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有决定意义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同时，各造反派一定要像“东方红”的“小将”一样，“敢”字当头，毫不留情地向自己头脑里和自己队伍里的“私”字猛烈开火，勇敢地革自己的命。

中共中央也明确地提出了“红卫兵组织要整风”的号召，要求红卫兵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纪律性，批判了红卫兵内部存在的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号召进行“大联合”。

1967年的《红旗》杂志第四期对“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和《体育战报》的评论员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作了短评。

短评中说，这两篇文章是两篇“很好”的文章，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一个“好范例”。他们“有的放矢”，把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本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值得全国各地的革命小将学习”的，同样也是“值得革命的老干部学习”的。

短评认为，这两篇文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的时候，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革命群众组织内部”出现的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些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他们“提得及时，切中要害”。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私”字，

就是个人主义,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

短评中说,“东方红小将”的大字报“说得何等好,何等深刻,这是值得所有的同志深深思索的”。对此,短评还带有强烈的号召意义。其中说:

他们还提出了解决内部问题的正确方法,这就是:一边战斗,一边整顿,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自觉的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整风,纠正在自己内部存在的错误思想。他们不是遮遮掩掩,而是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把自己的思想问题亮出来,并且真诚地欢迎群众的批评。在同志之间,在各个革命的战斗组织之间,不是互相指责、互相攻击,而是同志式的互相帮助。他们真正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这正是我们要大大提倡的。

我们相信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群众组织,一定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自己来解决这些思想问题,从“私”字中解放出来,锻炼得更加坚强,在政治上较快地成长起来。^①

短评说,“革命小将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及时地正

^① 《推荐两篇好文章》,《红旗》杂志,1967年第四期。

确地提出自己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事实,又一次证明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提出的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对立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正确性”。“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历史唯物论,这是历史“辩证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短评认为,在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的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短评说,在需要“夺权”的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以后,自己的地位起了变化,这就发生了在新的条件下自己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对待群众,必须坚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不能少数人包办代替,更不能压制群众。

短评认为,旧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在“左”派群众组织的内部出现一些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合乎规律的,不应该大惊小怪。问题是,对待革命群众,应该积极地不断地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引导,满腔热情地耐心地帮助他们,纠正错误思想,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这是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

短评说,如果不看“革命小将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而抓住他们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任意夸大,对他们进行攻击,那就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去了,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对立面”去了。

短评还鼓励那些“革命小将们”说，一定要“为无产阶级争气，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气”，说到做到，认真地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3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经验。毛泽东为此发出指示，即“三·七”指示。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

为了使学校的“文革”有章可循，回笼在社会上到处造反的红卫兵们，中共中央在2月29日和3月9日，分别发出了《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下乡下厂的和在外地串连的师生，一律返校参加劳动，进行整顿，参加短期军训，实现“大联合”，组成“三结合”的临时领导班子。中学“复课闹革命”，大学进行“斗、批、改”。

3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取消原订在春暖后再进行大串连的计划，停止全国大串连。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这些措施，力图控制学生造反力量的盲动性，在有所规范的情况下完成“夺权”的目标。

在中共中央三令五申之下，大批学生陆续回到了学校。大、中、小学普遍开展了军训，许多地方中学的运动受军训团控制。各校的红卫兵组织开始了以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大批判为主的“复课闹革命”。“中央文革小组”还把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芳草地中学等学校作为教育改革的试点单位，许多红卫兵组织还进行了“开门整风”。

但是，“夺权”引起的种种矛盾，使动乱局面更为加剧。红卫兵不可能从全国的动乱中摆脱出来。这种情况下，整风不可能取得积极的成效，只是流于走过场。“复课”也实际上无法认真实现，很快就被越打越大的派仗所中断。

在“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下，红卫兵各组织之间进行了兼并。造反名声响亮、人多势众的大组织融合了许多小组织。校际间的联合也在着手进行。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编者注）成立。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到会表示祝贺并讲了话。

3月20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规定》中要求：

“查抄地、富、反、坏、右或其他不法分子的财物，除日常生活必需品退给本人（如原物已遗失或损坏则不退赔）以外，一律上交”；“确属革命群众和劳动人民被错抄的财物，应全部退还本人”；“贪污、盗窃和私用查抄财物者，应自觉退出上交，否则严加处理。但被小集体用于文化大革命的少量消费物资或现款，经说明情况，可不予追究”；“地、富、反、坏、右或其他不法分子，不准借处理查抄财物的机会，喊冤叫屈，反攻倒算，违者必须严加惩办。”^①

^① 《中共中央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40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中共中央的基本精神是要求红卫兵们都要回到本单位有组织地从事活动。在这种大背景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之后,3月25日,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也成立了。

“红代会”的成立,应该看做是“红卫兵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是红卫兵按学校和教学班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开端。“红代会”最初是红卫兵造反派的联合组织,后来成为受党政领导的正规群众组织。

紧接着,各地“红代会”也相继成立。同时,工人、农民的造反派组织也相继成立了“工代会”、“农代会”。

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带来的新的利害关系,加之“文革”理论概念的含混,使红卫兵各派之间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各执一端。“大联合”的结果是,红卫兵各派别之间的争权夺利的矛盾更为集中与明确,实际上是联而不合。在派性斗争激烈的地方,“红代会”内部分成几派,有的地方干脆同时存在几个“红代会”。不久由于矛盾的激化,“红代会”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

北京的“红代会”维持到4月份就开始了大分裂。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其用意是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的造反派行动。

4月3日,江青在接见北京中学师生代表时讲,中学的“左”派组织不能解散。原来经过军训已安定下来,按班级实现大联合的中学生们的矛盾据此爆发,以是否拥护军训而分

裂为“四三派”和“四四派”。

随后,配合《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中共中央又公布了《军委十条》。4月6日,毛泽东批准了林彪起草的、与《军委八条》针锋相对的《军委十条》。

《军委八条》下达后,军队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突出,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党内上层、中央军委上层的抗争受到了指责,毛泽东指出从上至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现象。

4月1日,中共中央发了一个文件规定,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军委十条》。

1967年4月初,林彪与黄永胜谈话,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场。

林彪问张云生:“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云生回答说:“部队与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比较紧张。”

林彪问黄永胜:“你看应当怎么办?”

黄永胜回答说:“我看就是重申八条,贯彻八条。”

林彪说:“只靠八条是不解决问题了。现在需要有个新的东西,向全军发出一份新的命令,规定几条,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

于是林彪口授了10条,由张云生记录整理。

毛泽东于4月4日和4月6日对《军委十条》稿作了批示和修改。

毛泽东将《军委十条》稿审阅修改后,交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碰头会一致通过。

4月6日,中央军委以《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十条》——编者注)下达。《军委十条》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10个方面: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

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

事。^①

从表面上看,《军委十条》的中心意思是“正确对待群众”。实质上,《军委十条》是支持冲军队、反军队的造反派。它有正确的方面,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军委八条》的否定。

《军委十条》下达后,造反派受到“最大鼓舞、最大支持”,认为这证明解放军前一段“支左”的大方向错了,因而与不支持他们的部队更加对立,并且更加猛烈地冲击军队。

这种情况,可以借用戚本禹的话来说明。戚本禹于4月30日在中直礼堂谈“当前形势”时说,苗头有两个。一是“左”派重新冲击军队。《军委十条》下达后,如北京轰李钟奇,超过了刘少奇。《军委十条》下达后,“左”派对过去错误不认账,又来冲,重犯历史错误。二是无政府主义。造反派什么命令也不听。

《军委十条》下达后,对立的两派的争斗加剧。由辩论而武斗,由冷兵器而热兵器。除了核武器、飞机外,陆、海、空三军的武器大都上了武斗战场。

4月8日,在批判民族文化宫展览的问题上,北京“红代会”所属组织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导致武斗,使北京两大派斗争公开化。北京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分裂为“天派”和“地派”两大派。

^① 《中央军委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400—40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一些原来的造反组织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有的公开分裂了。如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分裂为“团派”和“四·一四”派;北京大学从以聂元梓为头的“新北大公社”中分裂出“井”、“红”、“飘”、“零”、“团”5个组织,随后组成了与“新北大公社”对立的“井冈山兵团”。各地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夺权”运动诱发的各种矛盾的激化,使“红卫兵运动”不可避免地陷入“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之中,走进了派仗泥沼。

红卫兵内部的派仗是和社会上造反派之间的派仗紧密地结合的。社会上派仗的兴起则是“文化大革命”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的必然结果。

在刚进入“夺权”运动后,军队奉命“支左”。在此过程中,军队与地方“激进派”发生了一系列流血事件后,被镇压的一派凄凄惨惨到北京告状,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北京著名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原来就与各地的激进造反派有密切联系。在他们受压以后,北京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声援,并派人到当地慰问支持遭到打击的组织。

为了扩大红卫兵的影响,林彪早在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筹办“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而且,“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各种途径扩大红卫兵的对外影响。从1966年10月起,《人民日报》就以“世界革命人民热烈赞扬中国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为题头,多次刊登日本、哥伦比亚、坦桑尼亚、老挝、尼泊尔等国青年的文章,赞扬中国红卫兵的造反运动。

1967年6月2日,“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在

北京展览馆开幕。展览会展示了红卫兵横扫“四旧”、揪斗领导干部、冲击领导机关、大串连的图表和实物。

为了让红卫兵参与外事活动,6月21日,以姚文元、谭厚兰等7人组成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应邀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对阿尔巴尼亚进行访问。红卫兵组织也进一步参与社会活动,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这样,红卫兵组织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时变得十分显耀,为动乱的升级起到了十分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军委十条》下达后,各地受压的一派恢复了组织。他们更认为自己的“大方向正确”,重新冲击军队,对整过他们的对立派进行更凶猛的反击。

1967年4月16日,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派时所说的“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使武汉已趋于稳定的局势急转直下。

红卫兵已深深陷入全国范围的派仗了。

从5月底开始,各造反派对立双方都不择手段地搞垮对方,不断挑起事端,相互嫁祸,制造流言,相互攻讦,对立程度不断升级,兵戎相见的武斗成为运动的主要形式了。

早在1966年底,张春桥等人一手制造了“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91人,在全国开创了利用武斗“夺权”的恶劣先例。

1967年5月,张春桥、姚文元又在济南支持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王效禹,以“冲击省革委”的罪名对进入省革委会大院的群众进行“围剿”和殴打。被包围的几千名群

众向外走时,人人手举稻草,倒戴帽子,低头弯腰通过一条人群走廊,边走边挨打,在这次事件中,有338人被拘捕关押。

与此同时,在四川,由工人和基层干部组成的“产业军”,喊出坚决反对“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李井泉”等口号。4月15日,“产业军”扬言要“血洗川大,头断四川,血洒西南”。5月11日,“产业军”把已经亮相支持激进派的时任西南局书记的曾希圣抓走。

从5月4日起,宜宾武斗不断。5月15日,宜宾进行大规模武斗,成都万人支援。重庆在进行大规模武斗时,动用了各种常规武器。参加武斗的造反派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大批工厂停产。

在河北省,数所中学于5月3日发生武斗。6月23日,河北省农大发生严重流血事件,死7人,伤250人。

5月4日,上海市青浦县发生了3次大武斗,卷入者700余人。

江城武汉在6月4日以后武斗不断。6月17日,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段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4日至6月30日,武汉市民在武斗过程中死108人,伤2774人。

浙江省“联总”造反派于6月6日冲进杭州丝绸印染厂砸机器,抓人,并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事实上,全国各城市都发生了武斗事件,可以说无一例外。

为了制止各地日益严重的武斗,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通令,即《六·六通令》。针对各地刮起的大规模打、砸、抢、抄、抓歪风,《通

令》提出了7点措施。这7点措施包括：

一、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向的私设公堂。

二、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抢夺，窃取和破坏。

三、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

四、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所有的财物。

五、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

六、由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上述各条的执行。自即日起，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都应该严加处理。

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

对于破坏、侵占和抢夺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个人财物的，都必须追回或按价赔偿。

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团体，分别情节轻重，在一定的范围内通报批判。

七、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成为执行本通令的模范，并协助卫戍部队和驻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①

中共中央还在6月24日发出《通知》要各地造反派作到不上街游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不抓人，不扣人；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不夺枪，不开枪等具体要求。

毛泽东也发出一条又一条指示，制止越来越激烈的武斗行为。但是，这一切未能遏制住事态的恶性发展。双方都指责对方是武斗的“祸首”。武斗规模越来越大。

到1967年的夏季，全国已经发展到了乱得不能再乱的地步。

这时，武汉地区也像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出现了“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两大派之间的武斗。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小组”却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指责他们变相地支持“工人总部”。

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了一道经康生批准的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40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①这份电报使武汉造反派更加大胆地杀向社会。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后，立即行动，并于7月初电告周恩来，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已选好，可以赴京汇报。

而此时的上海，武斗也正激烈。6月29日，上海新成立的造反派组织联司（即“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又称“上柴联司”——编者注）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联司总头目当场揭露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并大声呼吁：“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治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最后，“六·二九”事件终于爆发了，震动了整个上海滩。

这时的派报《工人造反报》以整版篇幅描述“六·二九”事件，虽然带有渲染夸张和报复的感情色彩，但应该说也基本上陈述了一些实际情况。

6月29日上午10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司”成员的陪同下，察看了地形，10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队出入，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训练；11时许，在“联司”头头的指挥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

^① 谢忱：《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回顾与思考》，上卷，第492—493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9月版。

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

中午12时左右，一批批“联司”成员，在指定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速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一场激烈的、残酷的血战开始。

一个“联司”头头当场被打倒在地。一个“东方红”队员头部被石头击中，血流如注。一个“东方红”队员舞着“警棍”打到“联司”群众的背后，被打者惨叫倒地。又一个“联司”的群众昏倒在地。

这次武斗致使双方损伤惨重。受伤人员达200多人，伤势较重的有50多人。

7月6日、7日、9日，毛泽东连续召开会议，并在会上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去武汉游泳，横渡长江。

7月10日，周恩来用电话告诉武汉军区，武汉群众组织代表不要来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因而，武汉地区代表赴京汇报也就被取消了。

7月13日晚，周恩来打电话给留驻重庆的谢富治，叫他迅速赴武汉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工作。王力正好和谢富治在一起。听到该消息后，王力连忙与关锋在电话里密谋一番后，坚持与谢富治等人以“中央代表团”名义赴武汉。

这时，周恩来考虑到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造反派又听“中央文革小组”的。于是，周恩来认为王力去或许更能作好造反派的工作，也就同意了王力的“请求”。但为了避免一些矛盾，周恩来也作了“中央代表团”暂不要公开露面、

不要作倾向性表态等具体规定。

7月14日凌晨两点半,周恩来和李作鹏等人乘飞机离开北京,飞往武汉,为毛泽东打前站。

当天中午,到四川解决两派群众组织争斗的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带着北航“红旗”的4个造反派代表,也以“中央代表”身份从重庆赶至武汉。

7月14日晚,毛泽东在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等人陪同下抵达武汉,下榻东湖宾馆。

周恩来为毛泽东打前站,一则是想看看武汉地区的形势到底是不是像“中央文革小组”所说的那样漆黑一团;二则想通过武汉军区作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以稳定武汉的局势,为毛泽东横渡长江提供良好的环境;三则想利用毛泽东巡视武汉的机会,将武汉问题妥善解决,以促进全国形势的逐步稳定。

然而,在抵达武汉的当天夜里,谢富治、王力就违反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由时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刘丰带着上街去看大字报了,并有意在湖北大学校门口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公开自己的身份。

7月15日,武汉造反派举行了盛大游行,称谢富治、王力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并表示欢迎他们解决武汉问题。

毛泽东抵达武汉后,两次召集随行赴汉的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和谢富治、王力等人开会,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武汉各地问题的汇报,着重商讨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

(造反派骨干之一——编者注)；“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作他们的工作；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毛泽东说，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连续几天召集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以及驻汉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会，听取陈再道等人的工作汇报。

在7月15日至18日的汇报会上，谢富治对陈再道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接着，谢富治又摊牌似地说，“你们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

陈再道等人与谢富治等人进行辩论，不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谢富治一伙蛮横地说。

“不理解也要执行？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面讲，要说出个道理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立即反驳道。

“你这是反对林副主席！”谢富治凶狠地对韩东山嚷道。

谢富治和王力公开身份后，周恩来只好让他们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

谢富治和王力趁机加紧四处活动。7月15日和16日晚，谢富治、王力到造反派的据点，登台接见造反派代表，并发表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慰问和支持他们。

7月17日晚，谢富治和王力跑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们”的名单。名单开

好后,谢富治把名单装了口袋,就一句话也不说了(7月27日,名单上的13人一起被捕——编者注)。王力也只是说些百般责难的话。王力板着脸对“百万雄师”头头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

“百万雄师”的头头立即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成这样的,回去就挨打。”

“你们管你们自己的,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王力蛮横地说。

“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百万雄师”的头头并没有被王力的“威严”吓住。

谢富治、王力这种公开支一派压一派的行径,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引起了武汉广大军民的极大反感。

随后,“百万雄师”立即有针对性地贴出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有的标语口号直接点出了王力的名字,要他下连当兵,到工农群众中去。

7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工作汇报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周恩来在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犯了错误的同时,也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

在会上,周恩来建议陈再道、钟汉华主动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等人这时怎么也接受不了这种“错误”。

周恩来说:“军区支左有错误,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

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①

会前,周恩来就告诉钟汉华说,毛泽东临动身时就讲到,要去武汉保陈再道。

1月18日晚,周恩来要回京解决湖南问题。临行前,周恩来特意带陈再道、钟汉华等人会见了毛泽东。

一见面,毛泽东就对陈再道问道:“你们怎么样啊?”

陈再道还是想不通地回答道:“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毛泽东见陈再道这么回答,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

接着,毛泽东又叮嘱道:“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做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

毛泽东的一番话,使陈再道等人心里踏实多了。陈再道及时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出面解决武汉问题。

与陈再道一起来会见毛泽东的王力却赌气似地说,“百万雄师”就是不听“中央文革小组”的。

毛泽东看了一眼王力,对陈再道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接着,毛泽东又要谢富治和王力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来访群众,作思想工作。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又说:“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

当陈再道等人起身告辞时,毛泽东亲自送他们到走廊上,并招呼服务员同他们握手,同时还风趣地对服务员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员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陈再道会心地笑了。

后来,毛泽东在留驻上海期间还对随行的杨成武说:“陈再道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

接着,毛泽东又要杨成武报告周恩来,要把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接到京西宾馆保护起来。

毛泽东保陈再道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林彪、江青等人则是要置陈再道于死地的。

和毛泽东会谈后,谢富治和王力等人到机场送走周恩来。他们并没有按毛泽东的指示行事。在周恩来走后,谢富治、王力更加为所欲为。他们不但不做工作,反而在群众组织中煽风点火。远在北京的叶群也打电话给刘丰等人,要他们“有事找王力,听王力的话”。

谢富治和王力刚从机场送行回来,就窜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他们佩戴着造反派的袖章,发表演说,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王力在会上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般坚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王力还对造反派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

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王力讲完话后，谢富治和刘丰等武汉空军负责人也出来“亮相”，并表示要和造反派站在一边。

刘丰受宠若惊，不久前还埋怨抓造反派抓得太少，这时却摇身一变，连连声称自己是“小学生”，希望造反派帮助自己。

谢富治、王力等人这天晚上的活动，成为“七·二〇”事件的导火索。

与此同时，上海柴油机厂“联司”与王洪文的“工总司”又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在武斗的前沿，“联司”的人在头头的指挥下，在制高点上居高临下地向东方红总部的战士狠命地掷瓦片、石子，用弹弓射铁球和螺丝帽。靠楼架梯子，不少人轮番爬上房顶作战，在楼下的，就用木板遮挡，一阵雨落似的石子扔过去，然后再向前逼近。

武斗进行中，一批石子打完了，有人用平板车不断运来，送上楼顶。打弹弓用的铁球和螺丝帽用完了，有人就一包一包地端上房顶；渴了，有人就用车子运来盐开水和汽水。

这次武斗的场面比前次激烈，人员受伤也比前次多，并且出现了死人现象。

7月19日，造反派出动许多广播车，用高音喇叭四处播放谢富治、王力等人在造反派总部的讲话录音以及王力所作的“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伟”是保守组织。

这些录音广播，激怒了武汉广大群众、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百万雄师”群众更是愤慨不已，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

标语顿时贴满了武汉街头，掀出王力的声浪愈益高涨。其中有一份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将王力揭露得淋漓尽致。大字报说：

王力窃居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市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①

谢富治、王力等人的倒行逆施，使武汉军民进行了一场抵制“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

武汉军区面对日益严重的事态，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由于造反派的作梗和王力等人的操纵，混乱局面与日俱增。

7月19日下午，武汉军区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

武汉军区领导为了尽快稳定局势，就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王力趾高气扬，俨然以训人的口吻对陈再道等人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

^① 晓地：《“文革”之谜》，第117页，朝华出版社1993年4月版。

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接着，王力就从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说起，口若悬河地说到1967年军队的“支左”。王力还说，武汉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的前身——编者注）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破坏工人运动的组织，而“工人总部”则是“造反有理”，点燃了武汉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王力还危言耸听地说，武汉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王力认为，武汉军区没有看到这点，因此发表了《二·一八声明》、《三·二一通告》，将“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就这样一直讲到晚上11点多钟，把武汉军区说得一无是处。

而在此时，“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们已经起来“造反”了。一部分“百万雄师”群众已经在汉口游行示威。

另有部分人乘数十辆卡车涌进武汉军区大院，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将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四点指示”究竟有何用心？王力又凭什么将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何要当“投降派”，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还有一部分“百万雄师”的成员携带棍棒、大刀、梭镖，乘军车占领了武汉市机场和铁路车站等军事要地，并得到了八二〇一部队装甲车的支持。

事发之后，武汉军区领导立即要求谢富治、王力出面接见

“百万雄师”代表，谁知王力只是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拒不接见群众。事态进一步扩大。

武汉在一夜之间到处刷满了“打倒谢富治和王力”的标语。而这天晚上，周恩来为了解决7月中下旬湖南长沙发生的武斗事件，再一次同湖南省负责人谈话，然后接见湖南代表，以解决长沙问题。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万余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大卡车和8辆消防车涌进武汉军区大院，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并当众宣布必须当面质问谢富治和王力“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4个问题，如不答复，有可能第二天全市罢工，“百万雄师”要在军区呆一个月。

上午7时许，陈再道刚进谢富治的房间，“百万雄师”的200多名群众就冲进了东湖宾馆。把守东湖宾馆的八二〇一部队正和他们是一派。于是，宾馆大门敞开。因此，这些群众没有受到阻挡就冲了进去，声称要找王力回答问题。王力吓得躲在隔壁房间不敢吱声。陈再道劝大家到外面去谈，结果谈得很融洽。谢富治也答应下午接见群众。

看到这种气氛，王力也壮着胆走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

然而，这时，以独立师和二十九师战士为主的数百名群众冲进了，叫喊着要抓王力，并误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王力趁乱跑进屋里，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胆怯，便坚持不去，北航“红旗”的几个人也大耍造反派的威风，辱骂群众，激起了在场群众更强烈的义愤。

在一片哄闹声中，王力被强行抓出，塞进汽车，一直被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四号楼。谢富治则靠“老干部”这张“王牌”躲过了这关。

与此同时，“百万雄师”调出两百多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武汉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独立师近千人也转入游行行列。独立师数百名军人全副武装，佩戴“百万雄师”袖章，并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行动。他们排成4路纵队，浩浩荡荡地在街上示威。

武汉广大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在校学生的游行队伍也一起涌上街头示威。游行示威者高呼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打倒王力”、“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欢迎周总理到武汉”等。

一时间，武汉三镇到处是一片反对谢富治、王力的声浪。

“百万雄师”并且于当天下午召开了上万人的大会，向王力示威。

7月20日下午，时任武汉军区副政委的叶明担心从群众手中劝放回来的王力再次被抓住，不好交差，就叫时任二十师政委的张昭剑将王力带走。

张昭剑为了达到自己的投机目的，竟隐瞒他所在的二十九师参加揪王力的事实，连哄带吓地让王力跟着他在二十九师师部的六号楼南侧的小洪山上躲藏起来。

在山上，王力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有组织”，陆、海、空三军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的。“武汉的

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武汉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王力的这番话，使张昭剑下定了投靠王力一伙的决心。张昭剑并且对外封锁有关王力的消息。当陈再道派人去二十九师找王力的时候，张昭剑只透露王力在安全地方，不讲具体情况。

正直勇敢的武汉人民以为，这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定能够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从而采取正确方针解决武汉问题。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样的做法，恰恰是林彪、江青等人所希望的。

已经返回北京的周恩来得知武汉的情况以后，立即安排毛泽东飞往上海，并且决定重返武汉，保护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

7月20日下午3点54分，周恩来乘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吴法宪造谣欺骗，说王家墩机场不能降落，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场，要劫持周恩来。

吴法宪同时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吴法宪把周恩来坐的飞机调到离武汉60公里的山坡机场降落。周恩来下飞机时，林彪和吴法宪指使别人以反“兵变”为名，紧急调动空降部队占领机场，机场一片刀光剑影。

周恩来根本不相信陈再道等人会搞“兵变”。他把秘书和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同志以及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留在山坡机场，仅带两名卫士，立即乘车赶往武汉。此时，毛泽东已离开武汉前往上海。知道毛泽东已安全离开武汉，周恩来提着

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7月21日中午,时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刘丰获悉王力在二十九师后,便找到张昭剑。

在大骂一通武汉军区后,刘丰就直截了当地对张昭剑说:“你张昭剑不要奴隶主义!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陈再道、钟汉华的?”

善于投机的张昭剑心领其意,立即回答说:“我听空军的。”然后,张昭剑将王力移交给刘丰。

7月22日凌晨3点多钟,李作鹏、刘丰护送王力到达山坡机场。王力乘飞机回到北京。

继7月20日之后,从7月21日至23日,武汉军民又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音喇叭反复播放为毛泽东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谱写的歌曲。

武汉大街上还出现了“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打倒戚本禹”、“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等大标语,矛头直指“中央文革小组”。

在此期间,各地人民群众也纷纷声援武汉军民的抗议活动。“百万雄师”收到湖北省20多个县、市的声援电,并得到了辽宁、四川、陕南等地群众组织的声援。7月21日,“百万雄师”在武汉举行游行时,黄石市派来30多辆卡车参加。

7月22日,四川省成都某红卫兵组织在致陈再道的信中说:“最敬爱的陈再道同志:我们坚决支持您老人家的伟大行动,希望您用您现在的权力。要知道他们像剥蒜一样,把革命的老干部清除。一不做,二不休,为革命先烈复仇,为成千上万被游街示众、被残酷斗争的革命老干部复仇,把这些不要历

史、不要文化、世界上空前的独裁分子从地球上消灭”。^①

这场震惊中外的事件的爆发，固然由“中央代表团”的谢富治、王力公开支一派压一派所引起，但主要是广大军民对把百万人参加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不满，对否定武汉军区对他们的支持不满。

应该说，“百万雄师”也有缺点和错误，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也有派性，但“百万雄师”是在实际上支持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他们认为，建国后，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成绩不能一笔抹杀。所以问题的实质仍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全盘否定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不满。这是人民的意愿。

“七·二〇”事件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抗争。

“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全国性的动乱发展到了最高潮。林彪和江青等人把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给全国以极大的影响。派性争端迅速升级，各派都力争把自己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对方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皇派”组织。

江青在7月22日会见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时，大肆鼓动武斗。江青对代表团说，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还没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江青说她记得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叫做“文攻武卫”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对的”。

^① 杨先材：《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卷，第99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与此同时，江青还蛊惑人心地对代表团说：“你们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

江青还公然宣称：“你们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我支持这一点。”

7月23日，上海《文汇报》发表题为《文攻武卫》的文章。文章公开宣传了“文攻武卫”这一口号。

7月24日，武汉军区党委常委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发出电报，并附上武汉军区公告。公告说，7月20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毛泽东派到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和王力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

公报还说，这一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陈再道等人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武汉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公告于两天后公开张贴，并发表在7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

7月25日，毛泽东就武汉“七·二〇”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复电说：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

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①

与此同时,林彪于7月24日转送给毛泽东《关于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毛泽东在审批这封信时加上这样一段:“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②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这封信。

然而,“文攻武卫”口号的提出,为热衷于武斗“夺权”的派性头头提供了“理论根据”,对武斗的发展起了火上浇油的恶劣作用,使“全面内战”迅速升级。

7月27日,河南郑州发生了“二七公社”血洗郑州烟厂的

① 毛泽东:《中央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80—3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② 毛泽东:《对〈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惨案。

7月29日,王洪文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召开了“工总司”头头会,作出了“拔掉上柴联司这颗钉子”的5项决定:设立临时指挥部;这次行动的代号为“888”;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张××、王××等人;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的各组分工;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站”。

关于临时指挥部,又具体分为“三线”:

第一线,指挥部设在华东物资局“工总司”联络站,由戴××负责。

第二线,指挥部设在“888”(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的代号——编者注),由王秀珍、陈阿大等负责。

第三线,指挥部设在上海警备区,由全××等负责。

关于攻击时间,定在8月5日之前。

王洪文还制定了一个《G号行动计划》,包括埋伏、袭击和围攻捉人。

8月份,南京、常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的武斗迅速升级。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驻沪陆、海、空三军指战员于8月2日举行隆重集会,热烈欢呼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热烈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决心把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斗倒、斗垮、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上新的胜利阶段。

这天,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共100万

人，参加了大会，全力支持驻沪三军的革命行动。正在上海的武汉及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也和上海驻军指战员一起参加了这次大会。驻沪三军指战员代表宣读了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电报。会后，驻沪三军指战员和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一起举行了示威游行。

8月4日，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洗劫了上海柴油机厂，对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联司”进行了血腥镇压。

8月4日凌晨，天还没有大亮，“工总司”的造反派就从水路由远而近，把上海柴油机厂包围得严严实实。顷刻，通往上海柴油机厂的军工路上挤满了各种车辆和队伍。“总指挥”王洪文亲自在这里坐镇。上海柴油机厂的平面图被摊开在地上，王洪文俨然将军一般，用铅笔在上面比划着。约十分钟后，王洪文及其下属来到上海柴油机厂门口，察看地形，商量进攻方法。

这时，摄影师们从直升飞机上把镜头对准王洪文，记录着“王司令”的“功绩”。

接着，“火线指挥部”命令“部队”到前沿集结待命。于是，一队队戴着安全帽或草绿色解放帽，手持木棍，有弹弓的“工总司”造反队员急步跑向指定地点。一辆辆满载“全副武装”造反队员的卡车迅速驶向预定地点。几辆宣传车在前面开路。

与此同时，狂热也笼罩着上海柴油机厂内。上海柴油机厂的钢铁大门后面，堆放着无数乱石、铁板、垒成的障碍物。

“大敌”当前，“联司”司令部进行了“战前动员”，立即武

装起来,准备坚决“反击”。同时,“联司”通过高音喇叭喊话,呼吁“厂内厂外工人和群众停止武斗”、“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等口号。

然而,王洪文却不管这一套,照样命令“开火”。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

“工总司”冶金系统的“先头部队”首先揭开了“血洗联司”的序幕,担任进攻主门的任务。

在战斗一开始,王洪文面对“联司”震耳震心的高音喇叭,怒不可遏。他要求手下的人先把“联司”门口的喇叭拆下来。一个叫黄金海的“敢死队员”头头,便率人向上海柴油机厂门口冲去,但被“联司”的弹弓打了回来。

王洪文见状气急败坏,下令切断柴油机厂的总电源。8月4日上午10时以后,联司的高音喇叭便不响了。

“工总司”先头部队冲不进重兵把守的大门口,便调来大吊车,撞开了大铁门。然而,由于厂门口防守严密,强攻不行。“工总司”先头部队便采取正门佯攻、左侧主攻的方法。

“敢死队员”用大木头和大型铲车撞破了门口左侧一段围墙,高喊着“怕死不是造反队”、“誓死砸烂臭联司”的口号,攻进厂区。

这是一场石头对石头、木棍对木棍、铁棍对铁棍、面对面的短兵相接的血战。

联司队员将砖头、石块、铁器等像冰雹一样从楼上扔下去。从楼上扔下的还有硝酸、黄磷、燃烧瓶、汽油及弹弓射下的螺丝帽。

一时间,在屋顶上的“联司”群众眼睛喷着火;屋顶下的

“工总司”队员损伤惨重，周围的房屋、电线也烧了起来，整个上海柴油机厂，火光冲天，烟雾腾腾。

王洪文只穿一条裤头，挥着手，仍站在那儿大声发布命令。

王洪文叫人运来了燃烧瓶和浓硫酸。顿时，被浓烈的硫酸液溅上的人，皮焦肉烂，呼天嚎地。

经过几个小时的强攻，“工总司”占领了食堂，断掉了“联司”的水和粮。他们又搭起云梯，以灭火器开路，向分布在几座厂房顶上的“联司”群众不停地进攻，口中还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王洪文又严令“敢死队员”在天黑之前结束战斗，并且下令调来17辆消防车，动用水压在一百磅以上的大炮水枪，从1000米以外的河滨接力打水，向守楼的“联司”成员凶猛地喷射。顿时，“联司”溃不成军，准备从水路逃跑。

然而，此时“联司”水上的退路已被王洪文的得力助手、上海滩有名的“战斗英雄”、“造反大将”陈阿大切断。陈阿大率领的“兵团”，从中华造船厂调来了3艘登陆艇、巡逻艇，将黄浦江封锁了。

“联司”成员个个成了“俘虏”。“联司”的“司令”杨仲池也未能幸免，被当场活捉。战斗于8月4日晚6点20分左右基本结束。

被“俘虏”的“联司”人员，一律先被给予“头上开花”、“面部挂彩”，并且被强令作举手投降姿态，嘴里反复叨念“联司必败”等口号。

被劫后的上海柴油机厂惨不忍睹。许多“联司”人员头

部流血，遍体鳞伤，横七竖八地昏死在路旁，像货物一样，一个个被扔上了卡车。聚集在上海柴油机厂工房前的职工家属们，有的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悲痛，泣不成声。有的甚至向那些现场指挥战斗的大小头头们跪下求情。他们得到的回答却是拳打脚踢和谩骂。

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绩”，王洪文在“八·四狂风”过后，又在上海进行“补课”。所谓“补课”，就是“补打”。凡是8月4日那天未进厂的“联司”人员，无论是头头还是成员，几乎无一遗漏地遭到审讯、毒打。王洪文在厂里私设的公堂、刑房达50多处，刑具有数十种之多。

“联司”与“工总司”的武斗，致使上海柴油机厂损伤严重。仅8月4日的“战斗”就导致上海柴油机厂全厂停工、停产两个月，减少产值500万元，利润降低175万元，物质损伤355万元，房屋设备损坏的修理费14.08万元。

这年9月，王洪文兼任了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主任”。这为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后来的爬升奠定了初步基础。

8月7日，身为公安部部长、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号召“把原来那一套政治、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把旧机器彻底打碎”，提出“砸烂公、检、法”的荒谬主张。

谢富治的这个讲话导致全国公安、检察、法院等国家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失去控制，“打、砸、抢、抄、抓”现象更为严重。

林彪、江青等人通过“砸烂公、检、法”，使许多公安干部

被逮捕入狱。结果造成整个公检法机构的瘫痪,最后只能对公检法机构实行军管。

同在8月7日,因武汉“七·二〇”事件受伤的王力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造反派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造反“夺权”运动情况的汇报。

当听到外交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真正被打倒,业务工作还是由原来的班子抓时,王力突然发出一连串提问:“你们1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总理不是讲过‘老、中、青’‘三结合’吗?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①

对于王力的提问,造反派代表回答说,有人批评外交部“夺权”过头,说业务大权是中央的。

王力听到这些话后,显得异常激动。王力说:

“这话不对!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嘛!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实权才有威风。现在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有人不赞成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

^① 金戈:《在外交部“夺权”前后》,《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230—2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命’都1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现这类怪现象，令人深思。”^①

当谈到陈毅的“问题”时，王力认为，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接受批判。王力煽动说，“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陈毅“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接受批判、接受检查，就是可以揪。”

王力并且说，批斗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能把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的那么严重。

最后，造反派还十分抱屈地提到，造反派在内部“整风”中检查了对周恩来问题上的“错误”，但有些同志感到“压抑”；“联络站”成立半年，“整风”就用了3个月，“检查”了好几次。

王力不以为然地对造反派说，整风应长“革命派”的志气，把毛病去掉，但不能磨掉锐气。“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的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

王力并且信誓旦旦地对造反派说：“你们有什么过火？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自然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②

以上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王八七”讲话的主要内容。

^①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第4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

^②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第4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

王力的这一番话,对于那些几个月来一直想夺外交部大权的造反派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在造反派们看来,王力不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而且是刚刚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中“光荣负伤”、“胜利凯旋”的一位“英雄”。这个时候,造反派的头脑里都存在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王力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中可以“代表中央”全权处理一切问题,那为什么不可以在外事口运动方面“代表中央”说话?

至于王力讲话中的许多观点与周恩来历来的讲话大相径庭,甚至露骨地“批驳”了周恩来的一些看法,造反派则认为,这就再次证明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对待造反派态度上的格格不入,证明外事口运动的“阻力”全都来自周恩来。

在王力等人的唆使下,造反派坚持要打倒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从此,百忙中的周恩来开始连续出席外事部门的“批陈”会议。

周恩来亲自到会的行动,不仅是履行过去的诺言,也是以“陪斗”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老战友陈毅,防止发生意外。由于外事口单位多,有时一周内要安排好几场批判会,周恩来实在抽不出身来。他就委托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的李富春代他出席会议,并派出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一同前往,以便随时了解、掌握情况。

在此之前,为了保护陈毅,周恩来一次次地同外事口造反派谈话,阻止他们召开批斗陈毅的大会。早在6月底,周恩来就向造反派宣布说,陈毅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造反派坚持要批判陈毅的错误,他也同意。对陈毅的问题,造反派可

以提意见,但中央对此还没有作结论,造反派不能强加于他。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

到7月中旬,整个局势更加混乱。外事口造反派趁周恩来离开北京去处理武汉问题的时候,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涌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好几个大喇叭日夜广播,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揪出,决不收兵。造反派还扎制了陈毅的模拟像,对其进行人格侮辱。

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影响远远不限于国内,在中国驻外使领馆和留学生中,也发生了重大影响,以致不断出现涉外事件。

例如,中国驻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东道国提出抗议。去某国援建的工程技术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立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与警方发生冲突。

从5月到8月,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同已经建立外交关系的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十几个国家发生纠纷,其中包括一些同中国长期友好的周边国家。

5月2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强烈抗议英国外交大臣对中国驻英代办的粗暴态度,宣布取消英驻华代办处向上海派驻人员的安排。

5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最强烈地抗议蒙古当局制造的反华暴行。

6月10日,中国外交部照会保加利亚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保加利亚领导人破坏中保交换留学生协议。

6月17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度政府策划袭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暴行,向印度当局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和最强烈的抗议。

6月28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缅甸驻华大使,强烈抗议缅甸政府纵容暴徒连续袭击中国使馆等暴行;7月1日,中国外交部又向缅甸驻华大使转交中国政府备忘录,严正拒绝缅甸政府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阻止中国人民抗议缅甸反华暴行的示威游行的无理要求,并再次要求缅甸政府立即撤除该国军队对中国大使馆和华侨居住区的包围。

7月1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肯尼亚驻华大使馆,抗议肯尼亚政府无理宣布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

7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抗议捷领导人破坏中捷文化合作协定。

8月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最紧急、最强烈地抗议印尼军警和暴徒又一次袭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暴行。

8月14日、20日,中国外交部先后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强烈抗议港英当局在一些边境地区制造挑衅事件,要求英国政府撤销对香港爱国报纸的停刊令。

对于国际关系方面,国家与国家之间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即使是长期友好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个别时候、个别事件上的摩擦。这是因为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政策法律乃至风俗习惯都不是一日所形成的,既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更有复杂的现实

因素。因此,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5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与国关系。

然而,这个本来由中国、印度、缅甸3国共同倡导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却在1967年夏季几乎被破坏殆尽,造成新中国外交史上最冷淡的一段时期。对此,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罗贵波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一九六七年一月,外交部成立了“革命造反联络站”,在部里搞“夺权”。周总理委派陈老总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党组成员和造反派头头开会,宣布:一、“联络站”所夺的是领导运动之权;二、外交业务之权不能夺,造反派对此只能实行“业务监督”。之后,外交部成立了大约十人左右的“业务监督小组”,每个业务司都有代表参加。在那段时间里,周总理对抓外交业务作了许多指示,其中有两项很明确,一是要坚守岗位,二是外交工作不能中断。这是他当着我们部党组成员和造反派的面一起讲的。“文化大革命”中外交工作一般地说没有中断,但是干扰很大,谈不上开展,甚至就是维持也很困难。周总理早有指示,驻外使领馆不许搞夺权、贴大字报等。开始还能控制住,后来就控制不住了。一些驻外使领馆也搞起“造反”、“夺权”,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喇叭成天广播,把使馆搞得一塌糊涂。这时候,我

们几个(即总理指定抓业务的我、韩念龙、曾涌泉和徐以新)的日子也不好过,造反派对我们批斗得更厉害了。我经常是在办公室里被抓去批斗,回来还要办公。有时实在不行了,我就打电话给总理,报告无法工作了。周总理就找来造反派,批评他们的做法。再不行,总理就把我们接到西花厅右边的平房里,呆上一天半天,等那股风过去了再回来。^①

在造反派的非难下,在外交部,疲于应付批判会的陈毅已无法正常工作。

在造反派对陈毅的批判会召开之前,周恩来还就会议的具体形式、方法等问题同造反派订下“约法三章”,即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造反派当面答应了。

然而,从第一次批判会开始,造反派就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导演了一出撕毁协议的恶作剧。

8月7日午后一点,周恩来冒着盛夏酷暑,驱车赶到外交部小礼堂,准备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小范围的“批判会”。

周恩来刚走到会场门口,卫士长成元功便上前报告说,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幅标语。已经踏上礼堂门前石阶的周恩来立刻止住了脚步,当面质问会议的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963—9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持人：“昨天说的好好的，已经达成‘协议’了嘛，你们还这样干！”

说罢，周恩来站在台阶上不动了，坚持要造反派撤下标语后才入场。

三伏天的北京，骄阳似火，即便是站在树荫下还觉得热气蒸人。然而，年近七旬的周恩来却抱臂站在烈日之下，等候造反派撤去“打倒”的标语，僵持了整整一个钟头之后，造反派自知理亏，才被迫摘掉了会场内的标语。

第二次开会时，周恩来因有外事活动不能到会，被“王八七”讲话冲昏头脑的造反派闻讯后，紧急调来几百人冲入会场，准备“揪”走陈毅。为了防止陈毅“溜走”，造反派还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

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周恩来派去参加会议的卫士长成元功将陈毅临时藏入一盥洗室内。此时在场的周恩来的秘书钱嘉东，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情况。

傍晚时分，经周恩来亲自布置，北京卫戍区两个连队的战士迅速赶到现场，与正在搜寻陈毅的造反派们对峙、周旋；而陈毅却在成元功等的保护下，从后门撤出，换上卫戍区的汽车，平安地返回中南海。

8月11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再次策动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陈毅。这次，周恩来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奉陪”到底了。

会前，周恩来亲自向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部署应急方案，将警卫部队安排在主席台上，以防不测；同时，周恩来执意坐在陈毅的身边，并再三叮嘱陈毅不可轻易离他外

出。根据前几次批判会的“经验”，周恩来还把几个造反派头头也都“拉上”主席台，以备出事时找人对案。

果然，就在大会发言时，突然从会场二楼悬下一幅“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几个彪形大汉还准备上台对陈毅动武。顿时，整个会场上一片哗然。这显然是事先策划好的。

此时，周恩来尚不清楚王力“八·七”讲话的具体内容，否则，他就不会对如此不守信用的造反派们一次次“违约”的行为感到震惊了。

见此情景，周恩来怒不可遏。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恩来用逼人的目光紧盯住主席台上那几个坐立不安的造反派头头，足有几分钟不说话。

随后，周恩来严肃地批评造反派“说话不算数”，责令造反派立即撤去这条大标语；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尔后，周恩来自己愤然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在一身正气的周恩来面前，人多势众的造反派却不敢动陈毅的一根毫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八九两个月，北京外语学院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先后组织过大大小小8次批判陈毅的大会。在周恩来的舍身保护下，陈毅虽几番遇“险”，却安然无恙。可周恩来却因过度紧张、劳累，引起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次吸氧。

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一度沉寂的“炮打周恩来”的标语、口号又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恩来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于8月16日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并悍然宣布夺取外交党委的大权。

接着,造反派又强行封闭了所有外交部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白天均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直至晚间8时才放出地下室,向造反派“汇报”。由此,中国的整个外交工作陷于混乱,一直由毛泽东、周恩来掌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

这时在外地的毛泽东,于外交部被“夺权”的当天,就得到有关报告。于是,毛泽东对一批正来访的外宾谈起这件事时轻松地说:“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那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呀?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到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

然而,夺取了外交大权的造反派已经在开始行使“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职权”了。经造反派的“批准”,短短几天内,已有几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签署的电报飞往各国的中国外交机构,其中,还公然写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强令中国驻外使馆“贯彻执行”。

8月22日,被极“左”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红卫兵,在抗议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而举行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活动中,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脑后,竟冲击、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这天晚上,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红卫兵突破卫戍区人员的防线,开始冲击英国驻华代办处围墙。

随即,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8月22日22

时40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10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国驻华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

造反派突入英国驻华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吞噬;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两辆汽车也都被烧毁。在混乱中,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多名外交人员从大火中撤出,少数人逃离代办处,并到附近使馆和公寓避难。经赶来救火的卫戍区消防人员奋力扑救,大火于零时熄灭。

据当天的新华社报道:“被英帝国主义疯狂迫害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的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10000多人,今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且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强烈的行动。”^①

7月23日,《人民日报》以《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为题,刊登了这则报道。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发生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等人的鼓动下,又一批红卫兵把苏联驻华大使馆包围起来。这时,情况十分紧急,什么人去劝都没有用。周恩来叫周家鼎去找红卫兵的“总指挥”,而他自己则亲自到东城圆恩寺一家电影院坐等。

“总指挥”终于被找到了,这位“总指挥”竟然是个16岁

^① 《中共党史导读》编写组:《中共党史导读》,下册,第170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5月版。

的女孩子，扎着羊角辫，满脸的稚气，透出一股聪明劲。她把随身带来的地图铺开，那是一张围攻以及如何撤退使馆的路线图。

这位“总指挥”在与周恩来侃侃而谈时说：“既然可以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

周恩来耐心地听完女孩子的意见后，便给她做思想工作。周恩来首先肯定女孩子所说要“反修防修”是对的，同时充分肯定苏联好的一面，指出用围攻苏联使馆这种办法不对，希望他们赶快撤退。

因周恩来在红卫兵中威信很高，说话算数，女孩子马上答应下令撤退，并且很快就有秩序地撤退了。这又一次说明，只要领导亲自耐心地做工作，大多数红卫兵也能听得进一些道理。

就这样，周恩来在国内局势几乎失去控制，党和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当机立断，下决心采取措施，重新控制局势，使之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中局势转换的枢纽，其历史贡献永不可没。

然而，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焚烧，是中国建国以后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涉外事件，不仅损害了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破坏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国际声誉和形象。在此之前，还发生了群众冲砸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3国驻华机构的行动。这“三砸一烧”，使中国的国际声誉受到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冰点”。

周恩来对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行径表示了极大气愤。

他决定以此事件为契机,抓出“操纵群众运动”和“破坏我们对外关系”的“中央文革小组”中那几个江青的“车、马、炮”——王力、关锋、戚本禹。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燃起的大火刚刚被扑灭两个多钟头,周恩来就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这些造反派头头们严肃宣布: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们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重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其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对于这些天外交工

作上的失误,还需要由中央来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会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有领导好……①

就在这次召见中,有些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打断周恩来的讲话,还有人抬出“王八七”讲话,极力为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和打掩护。这引起了周恩来对“王八七”讲话的注意。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散布着“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等论调,北京再度发生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的事件。外交方面的各种事件,不过是为了最终打倒“旧政府”所采取的步骤之一。所有这些行动的背后都有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周恩来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已经觉察出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中国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在外交工作中制造严重混乱,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的。周恩来抓住“事情充分暴露”的机会,果断地进行反击。一项经

① 金戈:《在外交部“夺权”前后》,《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238—2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周恩来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王力、关锋、戚本禹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

8月25日凌晨1点,刚刚开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周恩来,单独约见了刚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的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周恩来向杨成武谈到了对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看法。

周恩来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周恩来并且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而且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的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是指《红旗》杂志在1967年8月1日发表由关锋主持起草的社论,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臭”;社论并说“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接着,各地出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派性武斗激化等严重状况。

周恩来接着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谈完话后,周恩来把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毛泽东看。

当天上午,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直飞上海,向毛泽东转达周恩来的意见。

经过一天考虑,毛泽东下了决心。毛泽东对杨成武讲:“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

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①

而且,毛泽东还在周恩来报送的关于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伙同王力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有关材料上面批了5个大字:“大、大、大毒草!”

毛泽东还说:“王力的这些讲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

稍后,毛泽东对杨成武说,对王力、关锋两人实行隔离审查,对戚本禹则视其表现,再作处理。

当天中午,杨成武赶回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

周恩来表示,事不宜迟,必须马上开会。当天晚上,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主持召开中央小组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出席会议。

会上,周恩来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

随即,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杨成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指示。随后,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力、关锋在钓鱼台国宾馆(此时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编者注)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送入秦城监狱。之后,两人又被开除党籍。

这段时间,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一伙倡导“武装造反派”,指示部队“必要时可发枪自卫”,致使一部分不明真相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的解放军参与了派性斗争。

8月28日,康生策划调动宁夏青铜峡的军队采取支一派压一派的手法,引起武斗双方的武装冲突,造成极大的伤亡,当场打伤101人,致伤致残133人。康生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

9月初,暂时留在台上视其表现、再作处理的戚本禹写信给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他给毛泽东写信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

戚本禹还在信中总结了关锋、王力的错误表现在3个方面。这3个方面包括: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做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

戚本禹还进一步分析说,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戚本禹在信中还检讨说,他对关锋、王力等人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他有关”。至此,戚本禹表示自己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主席思想的小兵”。

同时,戚本禹反映了处理王力、关锋这件事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引起的剧烈震动。戚本禹说:“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她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

毛泽东在戚本禹的检讨信上批示说:“犯些错误有益,可

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①

后来,经中共中央批准,戚本禹于1968年1月被宣布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无疑,江青等人对在这件事上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周恩来更加怀恨在心。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这3名“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实行果断处置,对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来说,不啻晴天霹雳,成为“文化大革命”以后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所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对“文化大革命”以后不断升级的大混乱和大破坏,也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损害了中国同各友好国家间的关系,也损害了中国的整个对外工作。

对这段沉重的历史,4年之后的1971年8月,周恩来在同时任缅甸联邦主席的奈温将军的谈话中这样说道:

“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1967年的事情,这个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发生这个事件的原因,边界问题关系不是太大。……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为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当时

^① 毛泽东:《在戚本禹检讨信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们担心会发生像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护住了,没有发生像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7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也被我挡住了。”“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①

周恩来在谈话中特别提到中国同英国关系遭到更多、更大的破坏,是指同一时期在北京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重大涉外事件。

对此,周恩来在谈话中作了这样的叙述:

运动发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对群众的冲、烧行为)我们事先毫无所知。

^① 金戈:《在外交部“夺权”前后》,《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2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①

在林彪、江青、谢富治、王力等人的支持鼓动下,全国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白热化了。全国到处都在“揪军内一小撮”,冲击部队领导机关,抢夺军用物资和武器装备。

1967年七八月间,全国很多省份发生了派性群众抢夺解放军的枪、抢战备仓库、拦截军用物资等事件。而且,冲砸公检法机关、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急剧上升。许多地方的武斗还动用了机枪、火炮、坦克和装甲车。

在广西,武斗双方动用了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狂轰乱炸。

在广东,造反派一面“夺权”,一面挑起武斗,阳江血泪,海丰厮杀,此起彼伏。

在四川,造反派攻占兵工厂,抢夺枪枝弹药,高射炮平扫朝天门,坦克横冲直撞。巴蜀陷入一片“红色恐怖”的气氛中。

在青海,派别林立,武装游行,军队介入。

各地的红卫兵都积极地投入了当地武斗,成为各派组织

^① 金戈:《在外交部“夺权”前后》,《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2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的“劲旅”。有的青年学生还充当了武斗策划者、指挥者。许多红卫兵在武斗中被打死打伤。

在这种形势下，红卫兵再度表现出盲动的趋向。北京著名的红卫兵组织在自己的小报上登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等文章，宣称“夺权”斗争进入到夺枪杆子的第三阶段。北京“红代会”头子蒯大富等人提出了“第三次大串连”、“武装夺取政权”、“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等口号。

全国各大中城市大批人员外流各地。上海等地的红卫兵也纷纷出走各地。短短的时间内，仅清华、北大就走了一万多人。他们与各地的激进造反派联合，炮打“革委会”，冲击军队，介入武斗，使动乱越发激烈。

“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失控，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意识到局面的严重性，果断地采取了治乱措施，批准发布一系列的命令、布告、通令，制止武斗。

针对全国范围的武斗局势和混乱状态，9月1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指示，提出“坚决反对武斗，制止武斗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对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物资，以至抢夺援越物资的现象，周恩来作了严厉的批评。周恩来并且指出，“第三次大串连”，“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口号。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命令》指出，为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6月6日通令和8月25日《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特再次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物资，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

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以及所有开展四大的单位中，不管任何组织、任何人，更不准抢夺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

三、军队所有机关、部队、院校等单位，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将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

四、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①

《命令》中说，这项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以后，如有违反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

同时，中共中央解放了一批干部，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部门实现军管。这些措施对于制止混乱局势的进一步恶化，遏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40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制武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并不能根本改变“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所必然带来的内乱局面。

江青一伙迫于形势，不得不出来讲话“反对动武”。然而，他们又同时强调了“文攻武卫”。

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说：“我们也斗得挺厉害的，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要还击。”

江青说：“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是指那种精神。”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9月9日发出通知，号召学习江青9月5日讲话。于是，各地纷纷成立所谓“文攻武卫指挥部”、“文攻武卫战斗队”等组织。全国武斗进一步加剧，“全国内战”的混乱局面进一步形成。

本来，被江青一伙挑拨起来的不同派别的群众之间，并说不上什么“阶级对立”，但正像周恩来说的：“两派打架把对方叫做俘虏，把人民内部矛盾敌我化了。”

在此时，人们各自以“革命阶级的代表”自居，又相互指责对方是“反动阶级”。按照江青“文攻武卫”的逻辑来看，武斗当然是“派系斗争的合法形式”。

各种派系在武斗的时候，几乎都这样喊，他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他们的方针是“文攻武卫”，他们打的是“政治仗”，要“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压倒敌人，摧毁敌人”。但是，当“敌人”胆敢武装侵犯他们的时候，当他们“杀戮我们的革命战友”时，“我们必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予以迎头痛击”。

因此,这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始的武斗,包括使用枪弹的武斗,是打着“阶级斗争”的幌子,在“文攻武卫”的掩饰下,愈演愈烈,越斗越广。

9月5日,毛泽东在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时,宣布解放军在执行命令时有权自卫反击。

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再次联合发出通知指出:

“坚决制止抢夺国家和集体财产的事件发生”;
“对于已经发生的抢夺国家财物的事件,要严肃处理”;
“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革命群众组织,要对保护国家仓库、金库、物资、财产的安全负责”;
“对外出串连和从原地出走的群众,要动员他们回去就地闹革命”;
“因武斗而造成停产的单位,从停产时起到生产恢复之日止,一律停发工资。经查明以后,未参加武斗的人员,他们的工资以后再行补发”;
“发动广大群众起来保护国家财产,监督和检举坏人。”^①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40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9月16日和17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各校代表时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王力、关锋的倒台和毛泽东的告诫,使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行为稍有收敛,恶化的局面得到暂时的控制。同时,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南巡的消息和毛泽东对形势“非常好”的估计,对安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

毛泽东是要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情况下完成“文化大革命”。他要求“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联合要消灭派性斗争,毛泽东提出的方法是,办学习班,“斗私批修”,两派“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10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告》。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

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编者注)。毛泽东在这些地方视察时明确提出“要防止红卫兵小将犯错误,要实现革命大联合”。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在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普遍地举办学习班。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引

述了毛泽东关于“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指示。由此,在各级学校中两派严重对立以至于武斗的局面有所缓解,再度出现了“大联合”的热潮。

从1967年10月至1968年上半年,各种舆论工具围绕着“反对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实行革命大联合”这3个主题进行宣传。但是实际上,红卫兵组织之间严重的派性对立仍然存在。

这个期间,红卫兵组织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开始加速向党领导下的“正规”群众组织方向发展。首先是各地掀起成立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编者注)的高潮。

1967年11月17日至19日,上海市各大专院校召开红卫兵代表大会。这标志着上海各个高校的红卫兵实现了“按照系统、按照班级的革命大联合”。

会上,代表们讨论了红卫兵的建设问题,并且宣读了《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条例(试行草案)》。这次大会强调,红卫兵是朝气蓬勃的“革命青年组织”,要永远保持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要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紧张的战斗队伍”。

12月30日,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1968年1月24日,陕西省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2月26日,西安地区中等学校“红代会”成立;3月,合肥市“红代会”成立;3月28日,南宁市大中学校“红代会”成立。

除此之外,各地还进一步健全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常设组织,并把其列入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

196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石家庄市“红代会”把办事机构从一个地处闹市的大楼搬到了一所中学的平房里、工作人员由63人减少到17人的情况,并发表《不搞机关化,扎根群众中》的评论员文章,赞扬“红代会”“节约开支,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

这说明,这时的各级“红代会”,已经有了很多脱产人员;同时,说明“红代会”已经成为党政领导下的一个职能部门。

在“红卫兵运动”的开展中,还包含了一个特殊的成分,这就是“红小兵”。196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了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的一份材料。

这份材料反映,北京市香厂路小学从1967年11月开始,在全校二至六年级28个教学班中,以年级为单位,分别成立“红小兵连”(下设排、班——编者注),全校组成“红小兵团”。

这份材料认为:“少先队基本上是一个少年儿童的全民性组织,它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红小兵是少年儿童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它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①

此后,全国小学以“红小兵”取代少年先锋队达11年之久。很显然,“红小兵”的成立是受到了红卫兵组织的影响。

^① 丁惠永:《中国百年大写真》,第85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

此后,在各级团组织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各级“红代会”组织负责指导“红小兵”的工作。因此,可以把“红小兵”的产生看成是“红卫兵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毕竟是站在前台“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骨干。他们的倒台,使全国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地震,对红卫兵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王力、关锋、戚本禹插手的地区,对立的两派都指责他们是对方的后台。一些地方的派性分歧更深化了。

“文化大革命”风云的变幻莫测,诡谲不定,促使红卫兵中一些有理论素养的人开始寻求自己的答案。有些人公然独立地探求“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青年学生毕竟是有思想活力的阶层。他们写出了一批反映各派独立意识的文章。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反映激进造反派极“左”观点的文章,诸如上海的《一切为了九大》;广西的《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湖南的《中国向何处去——极左派公社宣言》等等。

这些出自于中学“红卫兵”手笔的文章,反映了他们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制度的思想,并且在造反派当中广为流传。这些文章把“三结合”当做“旧官僚复辟”,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思路,因而出笼不久就遭到批判。

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揪出,红卫兵、造反派被批评犯了错误,使对“文化大革命”怀疑和不满的情绪在一些红卫兵组织中滋长起来。

1968年2月,北京有的高校红卫兵组织就所谓“二月逆

流”问题,及打倒陈毅、余秋里等人的问题公开提出异议,认为此事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其中作祟。还有一些红卫兵组织认定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是反革命两面派,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同党。

3月间,七八个大学的红卫兵组织贴出一批“批倒谢富治”的大字报,掀起了一个“倒谢”的小高潮。江青把这些动向作为来自右的危险,进行了严厉的训斥。

3月24日,林彪、江青合伙制造了“杨、余、傅事件”,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打成“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后台”,在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翻案风”的浪潮。北京和各地的怀疑不满动向都被压下。

4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此后,红卫兵内部的派性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名义下又发展起来。

政治风云的反反复复,越发使群众对不断出现的新动向感到迷惘。他们对运动已失去了往日的主动性。他们的热情在冷却,他们的狂热在消失。

然而,红卫兵的行为目标混乱,忽“左”忽右;而红卫兵头头的权势欲和野心却在扩大。同时,“夺权”斗争的严酷,使派别组织的向心力更强,“以我为核心”已超出了“惟我独革”的宗派团体意味,成为对实际利益的争夺。

经过几个回合的拉锯战,派仗越打越大,积怨越打越深。对立双方已难说有什么是非可言,而是“凡是拥护的我就反对,凡是反对的我就拥护”的混战。联合变成了武力统一。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的斗争使越来越多的人厌倦、淡

漠，而游离于运动之外，成了逍遥派。

学校中“男焊(收音机)女织(织钩毛活)”、看小说、睡大觉的情况非常普遍。“红卫兵运动”不仅脱离了群众，也脱离了“文化大革命”的轨道。红卫兵忙于内战，“斗、批、改”的任务迟迟不能落实。甚至在工人已经联合起来、全国性“夺权”即将完成之际，一些学校还在激烈地武斗，对中共中央三令五申的禁止武斗的通告置若罔闻。

1968年三四月间，北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相继暴发了大规模武斗。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与对立派“四·一四”进行了“百日大武斗”。

清华大学的“团派”俗称“老团”，“四·一四”派俗称“老四”。

双方的酣战，使昔日美丽、宁静的清华园一时枪声四起，碉堡林立，钢丝网遍布，成了现代战场。“团派”和“四·一四”派的派仗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一直持续了3个多月，共打死10人，伤残者不计其数，造成了闻名全国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老团”的头目蒯大富非常激进。他极力主张对“一小撮走资派”和“黑帮分子”穷追猛打，大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势。而相对说来，“老四”在很多问题上要温和一些。清华大学校内发生的几起事件，使“老团”与“老四”之间剑拔弩张。昔日同坐一间教室的同桌，便翻脸不认人，只想互相厮杀，欲置对方于死地。

随着全国局势的日益混乱，武斗之风在全国不断蔓延，闻风而动的“老团”、“老四”急忙厉兵秣马，不打无准备之仗。

这时,除“老四”手中有少许枪枝外,双方基本上还是靠拳头和冷兵器来征服“敌人”。白天,交战双方趁“战火熄灭”之际,都假装蒙头睡大觉。其实,各自的“侦察兵”已在校园内四处“探宝”。凡存放钢材、石头、木棍等一切可充作武器的材料之处,都被“侦察兵”探得一清二楚。夜幕一降临,大批人马便开始运动。

武斗双方还抓紧时间储存战备物质。像面粉、炊具、煤炭之类,这在此时都是紧俏品。

双方头目认为,仅有柴米油盐还不行,要想置“敌人”于死地,还必须现代化的武装。清华大学是中国堂堂第一理工科大学,各种专业应有尽有,加上校内教学实习工厂设备齐全,在极少数“革命教师”的指点下,造点武器是非常容易的。于是,土枪土炮、燃烧弹,甚至连土坦克、装甲车都被造出来了。至于炸药和手榴弹,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学机械的精于造枪、造炮、造坦克,学化工的弄出点炸药也是易如反掌;而学土木工程的则赶紧在校园内察看地形,抢占有利据点,垒起自己的“杰作”,构造地堡和掩体。

“老团”、“老四”将武器、粮草备足,便赶忙着手成立武斗指挥班子,以便部署“战略战术”,发号施令。

双方开始大规模抢占建筑物,以作据点。“老团”占领了东区的七号楼、八号楼和西区的大礼堂、旧电机馆、力学馆等处。“老四”则抢占了主楼、东区浴室、五号楼,以及位于清华西区大礼堂附近的科学馆。

双方都占据了有利地形后,便采取措施积极备战。被子、衣物等都从寝室拿来;油盐酱醋、锅碗瓢盆乃至柴火、煤炭等

都被拖到固定地点；至于面粉、大米等每天必须的食物，则一袋袋从饭堂里拖来，堆在门窗口以躲枪子袭击。双方是在作持久战的准备了。

清华大学两派红卫兵，随着利用自办的小报进行唇枪舌剑温度的上升，武斗也开始蔓延。1968年4月，在蒯大富的煽动下，“团派”和“四·一四”派干了起来。

事情起因是蒯大富怀疑“老四”收买了自己队伍中的叛徒，遂命人绑架了两个“老四”的人，并将其毒打一顿，谁知两人“舌头”坚强不屈。于是，蒯大富编造了一份“供词”，让“老团”用来对“老四”进行宣传攻势，以证明“老四”都是一些“支持蒋介石的反动派”。

“老四”毫不示弱，以牙还牙。他们出于同样的目的，也绑架了“老团”的一名“大将”。火终于被点起来了。

交战之初，双方仅凭一付拳头，之后又立即用上棍棒、刀剑、长矛，渐渐地，又觉这样近距离的肉搏战也不过瘾，于是又换上弓箭和强大的投掷器。武器不够，双方便就地取材，自行车内胎稍经加工就是有力的发射器，包上一块石头射出去，对方立刻抱头鼠窜。

4月23日，双方为争一辆救护车，用大弹弓互射达3小时之久。4月29日，为抢夺两辆运送大米的汽车，双方又大打出手。5月2日，一方试图断水，另一方拼命反击，战事又起。

就这样，双方打来打去，互有死伤。每个狂热分子都红了眼，全然不顾后果，向对方发出最后通牒。双方之间的小范围冲突随即被突击队行为所代替，小规模游击战逐步升级成

正规战斗。

5月29日，蒯大富等人开会决定于次日凌晨3时攻打东区浴室楼的学生。

第二天凌晨3点整，蒯大富亲自跑到清华大学自备电厂，下令拉闸断电。随后，蒯大富又发出攻击信号，下令向东区浴室的10多名“四·一四”派人员发起攻坚。

盘踞在东区浴室的“老四”人员虽少，却顽强无比。他们见“老团”的突击队搭起云梯欲冲上浴室楼楼顶，立即将事先准备好的砖头、石块，像倾盆大雨一般砸过来，直揍得“老团”的“攻坚战士”嗷嗷嚎叫。

此招不灵，“老团”立即改用自制燃烧弹火攻。“老四”的一个小头目被烧伤。眼看溃不成军，危急时刻，他们的救兵到了。这些援兵手执长矛、棍棒，气势汹汹。“老团”战士见状，急调一辆自制坦克前来助战。这辆坦克横冲直撞，一名“老四”战士退却不及，当场被碾死。见“战友”牺牲了，“老四”可红了眼，刀枪并举，一名“老团”成员也不幸被长矛穿胸而“光荣牺牲”。

“老团”加紧了攻势，蒯大富手提盒子枪坐镇指挥。蒯大富见火攻不奏效，再加上烟薰，直把“老四”成员呛得直咳嗽，最终使“老四”全线崩溃，弃楼退守科学馆。

在这次武斗中，学生卞雨林、许恭生和工人段洪水死亡。

7月初，蒯大富再一次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封锁”科学馆。蒯大富并且下令：“有进出者，可以开枪，死了人总部负责。”

按照蒯大富等人的这个决定，7月4日凌晨，张行开枪打

死了学生朱育生。7月5日，“四·一四”派一个叫杨志军的成员刚从科学馆后门露头，立刻被“老团”的工事里射出的一颗子弹击中。杨志军当场毙命。其同伙见状，一阵惊吓后，连拖带抢，将杨志军的尸首弄回馆内。

随着封锁越来越严密，外面的给养根本无法进来，大米、蔬菜早已吃光，“老四”的战士饱尝了被困的滋味，每天不得不限制口粮，将仅剩的一点面粉，做成馒头，蘸着盐水吃。

终日被困于科学馆的近百名“老四”成员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动手挖地道。尽管孤军困守两个多月，大家几乎奄奄一息，但求生的欲望激起了他们最原始的潜能。近百名汉子轮流上阵，学老愚公精神，挖土不止。眼看大功告成，可是，“老四”挖地道的声音惊动了“老团”的人。“老团”立即组织人马，挖地三尺，将“老四”的地道拦腰截断。“老四”战士立即神速地溜回堡垒，险些被生擒。

“老团”在地道中塞满炸药。轰隆一声，“老四”近百号战士的血汗随着尘土和硝烟飘散在空中。

为了制止武斗，整顿学校的秩序，毛泽东指示北京工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7月27日，为了改变各大、中学校长期武斗、不搞联合的局面，由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总厂等数家厂矿的产业工人组成的一支5000多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人民解放军战士的配合下，浩浩荡荡开进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工宣队的进驻，使武斗正酣的清华园中的两派暂停了厮杀，调转枪口一齐对准他们，对赤手空拳入校的工宣队进行武

力对抗。

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骄横不可一世的蒯大富，根本没把工宣队放在眼里，仗着人多势众，不时瞅住战机对工宣队员进行扭打和撕扯。尤其是那些身体单薄的工宣队员，稍有不慎，便被“老团”揪出，乱打一通。

工宣队在红卫兵的凌厉攻势下溃不成军，只得悻悻地打电话到钓鱼台国宾馆，向“中央文革小组”讨教对策。

只两个多小时的功夫，工宣队在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暂时撤回”的答复后，便鸣金收兵，在“红卫兵小将们”的一片喝彩声中低着头离开清华。

然而，5个小时后，重新集结的上万名工人和解放军战士分7路，再次向清华大学挺进。工宣队员和解放军战士手捧“红宝书”，齐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向红卫兵封锁线进发。这一回，在强大的“攻击”面前，红卫兵真抵挡不住了。他们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很快，他们便溃散到大礼堂和旧电机馆这两个据点负隅顽抗。

工宣队和解放军战士进驻清华大学后，首先展开宣传攻势，令“老团”和“老四”立即响应工宣队的号召，放下武器。

在此之前，科学馆的屋顶已被蒯大富部署施放的燃烧弹炸塌。在工宣队的护卫下，“老四”的成员被带到安全地带。“老四”的“守军”，原先的整整百名战将，已有两名“光荣牺牲”。他们的尸体，在炎热的7月，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腐臭。剩下的一个个蓬头垢面、面黄肌瘦，头发一尺多长，犹如街上的叫花子一般。

与此同时，蒯大富率领“老团”仍在两个据点拼命顽抗。

更有胆子大者，躲在暗处向工宣队打冷枪，致使5名工宣人员不幸饮弹身亡。工宣队员和解放军战士继续向这两个据点冲击。他们头顶着被子或课桌，猫着腰，一批又一批地往里冲。乱石如雨，直砸得桌面砰砰响。

“老团”实在顶不住了。蒯大富3次令“长矛队”打头阵，企图冲开包围圈。

到傍晚时分，除了蒯大富等核心人物突围外，其他“老团”人员不得不打出白旗，与工宣队谈判。

但是，仅7月27日这一天，工宣队基本上解决了“清华百日大武斗”。王松林、张旭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5人被打死，伤约700人，失踪143人。

鉴于红卫兵已经失去控制，武斗不断，毛泽东对红卫兵大发脾气。7月28日凌晨3时至8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红卫兵的“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地质学院的王大宾。毛泽东严肃地批评道：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

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方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讨论讨论。^①

毛泽东的批评和警告，实际上是下达了制止武斗的命令。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有力地震慑了热衷于打派仗的骨干分子，缓和了学生中两大派的矛盾，保证了工宣队对学校的进驻和领导。

7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对教育部实行军管，并成立了军事管制小组。

8月4日，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给毛泽东呈送了一份北京市进一步宣传贯彻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的安排意见的报告。

毛泽东最新指示即毛泽东在7月28日接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讲话要点。

中央两个布告是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

^① 晓地：《“文革”之谜》，第95—96页，朝华出版社1993年4月版。

文革小组”7月3日的布告(即“七·三”布告)和7月24日的布告(即“七·二四”布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7月3日发布的布告中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朝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7月24日发布的布告中说,最近以来,在陕西省的一些地方,连续发

^① 《对“七·三”布告的批语(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生了一些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特再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①

周恩来对北京革委会、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报告指出,北京市和首都驻军要学习广西的经验,在宣传毛泽东“七·二八”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的工作中,军队既要造声势,造舆论,更重要的是要对学生、对群众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① 《对“七·二四”布告的批语(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修改后的报告指出,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参照广西等地的经验,中共中央对下一步的工作拟作新的安排。

这些安排包括:北京驻军、北京卫戍区已组织几万人至十万人的宣传队,深入到大学、工厂、街道、农村等处,发动群众,宣传、落实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宣传工作要点面结合,重点抓好大学和几个问题多、影响大的工厂、机关、招待所;抓好典型;发动三军采取适当形式大力支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共同组成领导小组,加强领导;这次群众运动要与准备国庆节的治安工作结合起来,持续保证首都安全和革命秩序。

毛泽东表示同意报告上的安排,并建议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郑维山参加领导小组。毛泽东还指示,领导小组要经常开会,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8月5日,毛泽东把外国朋友赠送的芒果转送给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代表个人对他们行动的支持。8月1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了首都工宣队,并于两天后接见了驻清华工宣队代表。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中说: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

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1/10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以及那些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的工人不要参加。进校前后,都要斗争学习和正确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七·三”“七·二四”布告,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在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对两派组织,先作调查研究,不要匆匆忙忙地轻易表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后,要善于发现和团结那里面的学生、教师、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共同工作,推动教育革命。^①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41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同一天,《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作了批示。文章“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其中说:“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①

《人民日报》于次日转载了这篇经过毛泽东审改的文章。

这时,中共中央决定派工宣队进驻学校,其基本原因来自于毛泽东对教育工作的“左”倾指导思想,就是要让工农兵管学校,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学校的状况;其直接原因则是,学校中特别是大、中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长期对立,不搞联合,甚至继续武斗,毛泽东的“斗、批、改”思想在学校中无法贯彻。

到8月29日为止,首都60多个工厂的3万多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了北京地区的全部大专院校。因而,这一阶段是“红卫兵运动”盛极而衰的时期。

从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毛泽东就采取果断措施制

^① 毛泽东:《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止失控的武斗事件,红卫兵被再度限令回校搞运动。但是,结合干部、军队“支左”、建立革命委员会、对各地和社会上的各派别的支持、各自的依靠力量的变化等问题和红卫兵头头的权力欲的膨胀,都使派性分歧无法调和。

在许多学校里,两派学生各自盘踞一方,武斗不断。这和全国逐渐平息的局势形成强烈对比,“红卫兵运动”走到了它的发动者所要求的反面。工宣队入校“领导一切”,宣告了红卫兵使命的完结。

到9月5日,全国最后两个省级革命委员会——新疆、西藏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欢呼声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从全局上转入“斗、批、改”阶段。

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即行恢复。学校逐步被管了起来。稍微正常一点的秩序的恢复,使红卫兵这类以造反为宗旨的组织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工宣队在驻进学校以后,拆除了武斗工事,收缴了各派武器,制止了武斗,使各校内战停止。因此,工宣队进校,虽然仍然执行“左”的一套政策,但它客观上制止了武斗,结束了学校长期无人管理的局面。这同时也表明毛泽东所支持的红卫兵从此走向下坡路。

在工宣队的主持下,各校都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两派组织“斗私批修”,按系别班级实现“大联合”,成立或调整了校级革命委员会。工宣队实际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工作组未能起到的作用。

红卫兵由造反的“天之骄子”转而成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

中共九大前后,各校在工宣队领导下,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教育革命等项工作。广大师生们“以《五·七指示》为纲”,搞开门办学,建立学农学工基地。一度在“文化大革命”中活跃非常的红卫兵头头受到了审查,许多“老造反”受到打击,只有少数人“结合”进了学校革委会。大部分学生已无心在校,只想“斗”、“批”、“走”,及早分配。

总之,毛泽东在全国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下作出了重要指示,各地采取了切实措施,终于使内乱夺权之风、打砸抢之风有了一定的遏止。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这无疑是全国人民之大幸。

对红卫兵影响最直接和关系最大的是学生毕业分配问题,它使红卫兵不得不从革命狂热的云端回到分配去向的现实土地上来。

早在1966年,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全国一片混乱。1967年,“一月风暴”横扫全国,各地造反派“夺权”逐步实现。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停止串连、“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是严重混乱的理论宣传,已经使红卫兵分不清是非界限。“革命到底”使他们滞留在社会上与各机关单位的造反派一起冲击各个部门,武斗连绵不断。

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大、中、小学复课。但各地给“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中说,绝大多数学校“大联合没实现”、“武斗不断发生”,许多学生不愿到校,还有一些学生要求退学。同时学校还积压六六届、六七届两届毕

业生。

10月22日,教育部关于复课的材料中,把毕业生问题当作亟待解决的问题。材料反映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当年的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稳定在学校进行所谓“教育革命”。

到1968年,中学滞留在学校里的有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共3届高初中学生,又称“老三届”,约1250多万人,大学也有数十万之众。

老生出不去,新生进不来,几年积累的三届毕业生很快就转化为城镇剩余劳动力,毕业生的分配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1968年3月19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总结了从1967年9月开始进行的1966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经验。报告中说,这些经验主要是:

一、在大专毕业生分配方向问题上,坚决贯彻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原则,把分配重点放在县以下的农村,使毕业生真正和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二、在毕业生思想教育问题上,组织各院校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

批修”为纲,带着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活学活用“老五篇”及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最新指示,并通过阶级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准备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三、在贯彻群众路线问题上,打破过去那种少数人冷冷清清坐在屋子里,大搞神秘化的分配办法,在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及毕业生分配、调配工作机密的原则下,将有关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方针、政策、调配计划、个人志愿以及调配名单等,如实交给毕业生群众,然后用各种方式听取群众意见。四、在毕业生分配权力机构问题上,在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同时,建立并充分发挥“三结合”的毕业生分配小组的作用,保证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顺利进行。^①

毛泽东于4月4日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学生的毕业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而且有大量中、小学都存在这个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当天转发了这个报告。

毛泽东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毕业生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学校对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大批学生离校,部分学生升级就读。

^① 《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语(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81—4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分配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的通知,对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去向做出安排。

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严重衰退,给这个社会带来深刻影响,也波及学生分配问题。

196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近10%;1968年在1967年下降的基础上再降4.2%,只相当于1966年的86.6%。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的形势,使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无法容纳如此庞大的劳动大军。

一代“文革”的弄潮儿,“革命造反”的先锋军,此时竟然弄到无法解决自身出路的地步。对于大专院校的学生,无论去军队农场,还是去工矿企业,都有固定工资。而更广大的高初中学生,只能去边疆和农村了,“四个面向”只剩两个了,即面向农村和边疆。

从1968年的七八月间起,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全党都要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12月22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毛泽东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上山下乡”是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同资产阶级“私”字彻底决裂的具体表现。

此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所谓“上

“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以“反修防修”为号召，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一场大规模运动。

在“反修防修”、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号召下，老三届的高初中学生相继离开城镇，上山下乡，奔赴农村、边疆，安家落户。大批毕业生离开学校，使已经解体的红卫兵组织也不复存在了。上山下乡运动把千百万青少年学生尚存的“反修防修”的政治热情转移到农村、边疆，并在那里接受教育和锻炼。

以后，中学中虽然还保留红卫兵组织，但已失去了造反的功能，而成为模范学生的组织。在团组织未恢复时，它一度取代了共青团。整团后，则成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惟独上海一直是取代中学的共青团的组织。

后来，在“批林批孔”和所谓的“批邓”运动当中，江青一伙再度鼓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但是毕竟造反动乱的时代过去了，学校中已经形不成有组织的造反力量。但是，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文化大革命”的象征。

这时，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红卫兵不能正式取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于1978年8月19日批转了共青团十大筹委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才正式取消了红卫兵。

别林斯基说过：“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但是，离开了一定的条件，悲剧只能是深渊，永远成不了“大学”。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

早在20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已经出现过。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事实上,这里已经把城镇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概括为“上山下乡”。以后,这一提法一直被沿用下来,成为城镇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一个习惯用语。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出现,是以中国的社会状况为背景的。早在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题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社论明确提出了动员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的理由。这篇社论说:

“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如果国家用分散经济力量的方法把每个人的职业都包下来,那么,工业的发展就要受到挫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①

^① 《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人民日报》,1955年8月11日。

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编者按语中也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作这个工作。

同时,毛泽东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7年4月8日,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人民日报》社论,更加明确地指出:“就全国来说,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①

由此可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与这时的中国人口众多、城镇就业困难和实现了合作化以后的农村需要大批更有文化的农民、广阔的边疆地区需要建设等历史条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一开始出现,就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中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结合起来,在农村、边疆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就业路子。它的范围主要是指部分未能升学、就业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和一些自愿从事

^① 《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

农村、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

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农村正在组织合作社,400万个合作社的建立确实需要大批的会计人员、技术人员、教师等。这些年轻人下到农村,对于发展农村、解决农村文盲过多、人才空白的一系列问题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解决了部分城镇就业的负担过重的问题。

从1955年起,共青团中央先后在京、津、沪等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到1957年底,城市下乡青年才7.9万多人。这表明,此时下乡的工作还是比较慎重的。

之后,在1958年,由于盲目扩大基建,大量增加职工,知识青年也不需要下乡了,这一工作暂时停顿了下来。其中,在这些下乡知识青年当中,有一些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的青年。他们在知识青年建设农村和边疆的事业中,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

到了20世纪6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其原因除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以外,还与中国这时在经济建设中日益突出的问题有关。

随着各种历史因素的变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中国国情的影响,由于中共中央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着的问题,认识上和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差和失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城镇青年就业困难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于是,对于扩大就业,支援边疆、农村的建设有着积极作

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逐步变成解决城镇部分青年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一个时期里,这一工作表现出了连续性、起伏性和一定的紧迫性。

这一时期,在一些地区由于安置政策不够落实,一些下乡青年的生活发生了困难,思想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波动,甚至出现了下乡青年受迫害的情况。不过,从总体上来讲,这一时期的政策还是比较稳妥的,大多数下乡知识青年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

作为劳动就业的一项措施,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中国国情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外,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给社会造成的严重的混乱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无数个“力”的作用下被扭曲了,演变成为一场运动。

到20世纪60年代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出路问题的一项应急措施。

透过这种已经变形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文化大革命”给全国造成的大动乱中,国民经济急剧恶化;几年积累的3届毕业生积压在学校“闹革命”,大量地转化为城镇剩余劳动力,终于在1968年爆发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学毕业生需要就业的严重问题。

这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混合在一起,其性质已超过了劳动就业的范畴,从而使得社会动荡更加严重,社会局面更加十分混乱,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而必须解决而又无法用正常方法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

毛泽东要想结束“文化大革命”,要变大乱为大治,解决这些青年学生的出路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于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此时盛行的政治运动的方式。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演变成为一场运动的直接原因,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互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宣传上还是以发展农村为一个目标和作为下乡的理由之一。但是事实上,这时农村的公社化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对于会计、出纳、小学教师的需求量已经基本上能自身解决,这些下乡知识青年真正到农村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已不超过20%。

知识青年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在田里干活。但是城里青年根本没有农业生产经验,因此这些知识青年不仅不能给农村增加劳动力方面的补充,相反却大大地增加了当地农民的劳动负担。

另外,多数知识青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所下的乡都不是农村最贫困和最落后的地区,而是到农村较发达的地区。有的则到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这些都表明,“文化大革命”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不是把发展农村作为主要的目标,而重在所谓的“再教育”。

由于在此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以“再教育”理论为指导,不切实际地要求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世界观。因而,在上山下乡地点的选择上,有些地方片面强调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有的地方在城市郊区举办了知识青年场队,发展多种经营,却被批评为“下乡不离城”、“下乡不务农”、“违反大方向”。有的地区把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到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很差的地方,吃菜、用煤都要从原动员城市运去。国家、单位、家长平均每年为一个知识青年花费上千元。由于负担沉重,最后不得不全部撤出,另选地区安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认为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毛泽东在考虑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别,认为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曾多次表示非常担心中国的第三、第四代会“变修”。1965年11月,毛泽东在谈到大学生一毕业就分配到机关,没有受过锻炼时说道:“就是这批人出修正主义。”

1967年,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讲道:“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

同年2月3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希尼斯·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

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贝基尔·巴卢库谈话。毛泽东讲道：“现在红卫兵帮助我们，但也有不可靠的”，“大学生中有很有一部分，我是怀疑的，特别是文科，不搞文化大革命，他们就要变修正主义分子了，搞修正主义了。”

毛泽东认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对学校里的教育不放心。他认为把知识青年放到农村去，接受群众的再教育，就可以洗掉身上的“灰尘”，成为新一代可靠的接班人。

同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可以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缩小城市与乡村的差别，而消灭三大差别是共产主义实现的重要特征。于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变成了中国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战略部署”。

在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后，各地区不区别具体情况，所有的城市都搞上山下乡，连城镇人口很少的西藏也不例外。同时，不管本人和家庭的情况如何，一律要下，搞所谓“一锅端”、“一片红”。

从1968年底开始的头两年中，下到农村和边疆的大中城市“老三届”毕业生有400多万人。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大批知识青年下到农村以后，产生了许多问题。许多青年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问题不断地反映到中共中央。

后来，到1973年，毛泽东根据福建李庆霖反映知识青年问题的来信，复信写道：“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情甚多，应当统筹解决。”

言辞间可见毛泽东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心境。根据毛泽东“统筹解决”的指示，中共中央于当年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要研究制定一个长远规划”的问题。

但是，“规划”没有实现，政策仍是混乱多变，以至于有些地区又制定出“牛年招工，马年下乡”和“先下乡，后招工”之类主观随意性很大的“土政策”。

1976年2月，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识青年问题的信上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给以解决”。可是，直到他逝世，这个问题也未能有效“解决”。

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指出，1968年到197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识青年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这就是对这种大轰大嗡、没有长远整体规划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总结。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本就十分困难的历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后果。

首先，“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加重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的历史性“人才深谷”。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少培养了100多万名大专毕业生和200万名以上的中专毕业生，致使在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出现了人才奇缺的问题，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人才深谷”。

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文化大革命”中

断了教育,并摧残知识和知识分子、破坏了许多教学和科研机构等作法;而另一方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加剧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教育中断。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地方的中学被停办,大部分学生得不到升学和就业的机会。有的地区因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了高中。一些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中一、二年级学生,也随毕业生到农村去安家落户。

据统计,从1968年至1978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共达1623万人。

多年后,尽管知识青年中的一部分又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大多数人只有相当于初中甚至还不到初中的文化程度,再加上“读书无用”、“读书吃亏”等思想的广泛流行,许多学生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这是长时间来中国教育质量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使中国人才整体上在一个时期内,不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严重不足,成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不易跨越的障碍。

这一切事实证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但没有像“文化大革命”中所宣传的那样,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且拉大了中国与正处在科学技术革命中的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增加了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其次,“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造成了国家在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加深了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1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了安置知识青年,支出了100多亿元的经费。国家用

于知识青年农场的投资达到 46 亿元,这些农场不仅未给国家经济增加收益,却亏损达 32 亿。有的农场乱砍滥伐,使生态失去平衡,造成严重的后果。

到了 1979 年,大批知识青年返城的时候,因为不少青年已经结婚生育,返城人数大大增加,形成了建国以后就业问题突出的一个高峰,给十年浩劫后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增加了压力。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损失,给大部分家长造成负担,成为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的一个因素。

对于大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各地农民是当做一个政治任务来接受的。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形成了知识青年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和争口粮的状况,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多数插队知识青年由于在生活上不能自给,要靠家庭补贴,一般每人每月至少要补助 5 元。这对于多子女下乡的家庭来说,负担尤其严重。许多知识青年家长在经济上和思想上有很大的负担。知识青年家长的不满情绪,以及以后在知识青年升学、返城等问题上出现的不正之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使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提前步入社会生活。上山下乡的实践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有益的锻炼,使他们开始体会到人生的甘苦,学到了一定的生产劳动技能。他们对于农村和农民有所了解,并且逐步感受到和继承了中华民族勤劳、纯朴的传统美德。

但是,这种收获对于正处在人生黄金时代的青年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下乡的知识青年由于丧失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使其成为在文化、学识上准备不足的一代人。这给知识青年在思想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带来许多不幸。

事实证明,脱离文化教育,离开文化素质的提高,孤立地谈论改造世界观,“接受再教育”,不仅不利于青年正确地实行思想观念的变革,在思想上、精神上、个性上健康地全面发展,反而易受各种落后的思想的影响。

知识青年在若干年后返回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困境中重新奋起,不断地拼搏,开拓。然而,这种一切需要重新开始的状况,也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过早地丧失了生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发生了“信仰危机”。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体现出政治运动的特点,对于这种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做政治运动来搞的做法应该给予否定。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做出的贡献是不应忽略和抹煞的。

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许多人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地艰苦创业。他们在新疆、黑龙江等边远和不发达地区,创办并建设着一些农场。如北大荒北京庄、江西共青垦殖场、湘潭红旗农场、株洲知青林场等。这不仅为国家创造了财富,而且为创办社队企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知识青年中还有一些人热心地为当地农民教学、行医,在一些边远落后的地区起到了文化传播和卫生普及的作用。上

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绝大多数人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农村、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奋斗的足迹,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苦涩的插曲,给中国社会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个运动与其他运动一起,使中国已经混乱不堪的局势更加雪上加霜。

早在1967年一二月间,全国已经由上到下导演而夺权并成立了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山西5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北京市于4月20日成立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其他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遥遥无期。

其他省市不是不想早点成立革委会,而是因为“大联合”、“三结合”问题没有解决而成立不了。名曰自下而上地对省、市、自治区领导机构的“夺权”,实际上乃是自上而下的“夺权”。这种自上而下的“夺权”很快就夭折了。因而,中共中央不得不对一些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实行军事管制,或指定以军队干部为主的若干人员组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实施领导。

3月15日,广东省被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主任为黄永胜。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的聂荣臻,为了扭转国防工业部门许多单位瘫痪和半瘫痪的局面,经请示周恩来后,向中共中央写出《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

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

聂荣臻在报告中说,据了解,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许多单位领导瘫痪,研究工作陷于停顿,三线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这种情况必须迅速予以改变。

聂荣臻还在报告中建议对这些单位实行军事接管,接管工作由国防科委组织进行。按照“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精神,迅速恢复科学和生产工作。

同时,聂荣臻在报告中分析说,接管后,将遇到“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强烈提出的改变现行领导体制的问题,建议一面恢复生产,一面着手将国防工业部门及中国科学院的有关国防科研机构,结合“批改”,通盘考虑,进行一次全面的适当的调整和改组。聂荣臻在报告中还提出了5条调整改组的原则。

3月18日,周恩来为此向毛泽东等写报告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经与有关同志商量,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3个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报告中还提出,对国防工业各部门的研究院、所和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拟同意聂荣臻的意见,交国防科委实行军管,并基本同意他所提的调整改组原则,待方案商定后再报批。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

生各部门正遵照毛泽东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也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对国防工业各部,商定后将分别报批。

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报告中所提建议表示同意。

3月18日,鉴于中共中央调查部三局因两派争斗致使业务工作停顿一事,周恩来立即派杨德中从中央警卫团中选派3个负责人去调查部三局,宣布对调查部三局实行军管。周恩来还建议对调查部也实行军管,并请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派3人至5人的军管代表小组。

同一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对调查部三局实行军管的通知。通知指出,军管代表小组的任务是保证该局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安全。

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决定》指出:

一、自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由沈阳军区派驻大庆地区的部队,组织大庆油田军事管制委员会,向油田所属各生产指挥部、各重点单位、各重要居民区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管。二、油田军管会受沈阳军区和石油工业部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接管油田的党政权力,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便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镇压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油田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三、油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毛泽东思

想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广大职工必须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勇挑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现在尚在外地串连的职工,要迅速回到生产岗位。四、要迅速健全和改组各级生产业务领导班子,积极恢复各级生产指挥系统的正常活动,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五、驻油田的外地师生和外单位职工,应立即回本校、本单位闹革命。六、大庆油田半工半读的学生,都要回原生产单位和本校复课闹革命。要遵照毛主席“五·七”指示,以学为主。七、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正确对待干部。对犯了错误的标兵、红旗手、劳动模范等,应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教育、团结他们。八、职工家属应努力搞好春耕生产,争取今年农业丰收。^①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中说:“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3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说:“安徽一月二十六日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应立即成立以钱钧(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①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稿的批语(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295—2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编者注)为首的军管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①

4月1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中说:“成立以滕海清、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5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说:“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

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对全国体育系统实行军管的《五·一二命令》。《命令》指出: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为了彻底揭开体育系统阶级斗争的盖子,把坏人揪出来,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要对全国体育系统实行军管。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机关、所属运动系(队),由所在地区、省军区接管;各航空俱乐部(包括飞机、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材)和滑翔机制造厂由各军区空军接管;各航海、潜水俱乐部(包括船只和航海器材)由海军各舰队接管;各无线电俱乐部(包括通讯设备、器材)由各军区通讯部门接管;各射击、摩托俱乐部由各大军区、省军区、军械部门分别接管。^①

同一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在《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中说:“中央决定对甘肃实行军事管制,以洗恒汉(时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编者注)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5月13日12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党委在给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并“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当中这样说:

兰州地区当前的文化革命形势仍然是大好的,一些左派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这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领导干部已表态支持“红三司”,因此“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我们认为,应以“红三司”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对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

^① 丁惠永:《中国百年大写真》,第86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

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委会。军区党委经过讨论,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红三司”,请速指示。^①

5月14日,毛泽东就甘肃问题又批示:“胡继宗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②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的洗恒汉、詹大南等20多位负责人和胡继宗等被召到北京,就甘肃问题进行座谈,并产生了《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

这个《纪要》指出,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以不实行军事管制,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了这个《纪要》。

出于反党乱军、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7月25日,林彪提出:“要战斗!要突击!要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治部被“砸烂”后,被实行军事管制。

① 毛泽东:《关于甘肃实行军管和成立省革委会问题的批语(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② 毛泽东:《关于甘肃实行军管和成立省革委会问题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中说:“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正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没有发生较大的动乱,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时,人民解放军才可能有效地对全国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机要、国际机场和重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以稳定混乱局势。

号召“夺权”后,毛泽东说,要于1967年2月、3月和4月看出眉目,1968年看出结果,或更长一点时间。所谓2月、3月、4月“看出眉目”,就是1967年2月、3月、4月建立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但是,到了1967年底,全国才成立了9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于8月12日成立,刘贤权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于11月1日成立,滕海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天津于12月6日成立革命委员会,解学恭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编者注),还有20个没有成立。

由于社会秩序的混乱,各省和各主要城市建立革委会经历的时间比预料的长得多,这是不足为奇的。由于老干部们不情愿与曾数次冲击过他们的这些“小字辈”在一个委员会工作,“红卫兵小将们”也瞧不起老一辈的革命者。毛泽东倡导的“老、中、青三结合”、“大联合”的革命委员会,在组建过程中困难重重,颇费周折。理论上应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组成的革委会,实际上主要由当地起领导作用的军队干部组成,而红卫兵和老干部在革委会中占的比例很小。

1967年12月26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汇报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关问题。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应予批准。毛泽东阅后表示同意。

1968年1月5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次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新华社新闻稿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这两篇稿子发表在1月7日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

从1月22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连续召开,讨论解决广东、河北、甘肃、河南、湖南、辽宁、吉林、江苏等省的问题。

1月24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并发表题为《春风已到玉门关》的社论。洗恒汉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辽阔中原唱凯歌》的社论。刘建勋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原河南省负责人文敏生、赵文甫被点名“打倒”。

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李雪峰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河北山河一片红》的社论。原河北负责人林铁被点名“打倒”。

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曾思玉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为此,《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长江万里起宏图》的社论。原湖北省负责人王任重被点名“打

倒”。

湖北省革委会成立后，湖北省军区临时党委在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关于目前我省各专、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报告》中说，全省8个专区已有6个建立了革命委员会，77个县、市已有49个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报告》中还谈了军区实现“大联合”、搞好“三结合”的几点体会：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运用上筹下联、上带下促、上下结合、互相促进的方法；军队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

周恩来于2月8日在为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转发的批语中指出，这个《报告》很好，希望研究这个报告中的几点体会，参照执行。

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黄永胜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了题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的社论。原广东省负责人陶铸、赵紫阳被点名“打倒”。

3月6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王淮湘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了题为《红日照长白山》的社论。吉林省原负责人赵林被点名“打倒”。

3月23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许世友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论。原江苏省负责人江渭清、陈光被点名“打倒”。

就在第二天，即3月24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南萍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题为《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的社论。原浙江省负责人江华

被点名“打倒”。

3月30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一天,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干、群代表共8人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汇报了湖南省关于革命委员会的筹备情况。会后,周恩来将会议讨论结果报告了毛泽东。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请示报告当中每讲到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处时,都分别点了杨成武(原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在当年3月份“杨、余、傅”事件之后被撤销一切职务——编者注)、张平化(原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编者注)等人的名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同意这个请示报告的批语当中,也点了张平化的名字。

周恩来在送审时,将中央批语稿上加上一个注释说:“中央文革碰头会和湖南省革筹小组代表均主张点张平化的名,可否,请主席决定。”“第五页还有两处,请主席决定。”毛泽东在审阅时,删去了这3处点的人名,并批示:“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①

^① 毛泽东:《在中央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委会的批示稿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4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请示报告。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黎原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湖南省负责人王延春被点名“打倒”。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

从4月份起,周恩来投入不少精力,一个省一个省地帮助他们制止武斗,推进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使一些经历了长时间“内战”苦难的地方社会秩序能相对稳定一些,并使一部分老干部重新站出来参加领导工作。

4月16日,宁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康健民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宁夏负责人杨静仁、马玉槐被点名“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社论。

4月18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李德生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安徽省负责人李葆华、黄岩被点名“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的社论。

5月1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李瑞山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陕西省负责人习仲勋、刘澜涛被点名“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专门为此发表了题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的社论。

5月10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陈锡联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辽宁省负责人马明方、顾作新被点名“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东北大地红烂漫》的社论。

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张国华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四川省负责人李井泉、廖志高被点名“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的社论。

8月13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谭甫仁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云南省负责人阎红彦、赵健民被点名“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了题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委会成立》的社论。

8月19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韩先楚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福建省负责人叶飞、范式人被点名“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社论。

8月26日,广西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韦国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广西省负责人贺希明、谢五岗被点名“打倒”,《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了题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的社论。

9月5日,西藏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同时宣告成立革命委员会。曾雍雅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原西藏自治区负责人周仁山、王其梅被点名“打倒”;龙书金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原新疆负责人武光、吕剑人被点名“打倒”。

至此,除台湾省以外的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实现了所谓的“全国一片红”。

9月7日,北京举行了庆祝大会。同一天,为了庆贺全国

(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社论说: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全国山河一片红”,“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我们一定要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攻,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隐藏在阴暗角落里从事捣乱和破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①

显而易见,这篇社论既对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盛况”予以高度赞扬,同时也提醒了“革命造反者”,在那“红”色的山河里还暗藏着一些“黑”色的渣滓,需要人们去“清除”,因此斗争还没有结束。

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武斗一直延续到1969年底至1970年初。这时驰名全国的保定地区大规模武斗持续时间更长。

^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人民日报》,1968年9月7日。

由林彪、江青等人挑起的武斗，把整个国家弄得一团混乱，对立派别之间视如仇敌。在武斗中献出生命的人被各自的派别追认为“烈士”，并在自办的小报上大加宣扬，而对立派却又称之为顽固不化的“反革命”。两派对立的急剧加深，给了林彪、江青等人以可乘之机，也为林彪、江青等人提供了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逐渐实现其篡夺党和国家更大权力的可乘之机。

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各部门各地方和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

对此，党史专家们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深入探索，他们认为：

“‘大联合’、‘三结合’作为夺权的基本方针，但未被贯彻执行，而且成为斗争的焦点。许多地方形成的互相对立的两个或几个大的造反派组织，有些虽然在政治倾向上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是总的都是在‘左’倾方针和极左思潮影响下活动。一些造反派组织各自选择几个领导干部作为‘三结合’的对象，力争由自己一派为核心来实行‘大联合’，来夺权、掌权。许多原来的领导干部被打倒后，不愿或不能站出来。有的刚刚被这一派造反派组织‘结合’，立刻又被那一派打倒。各派都从维护本派的利益出发，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通知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权’这个根本问题上，许多造反

派寸步不让,争夺激烈。在各个造反派组织之间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甚至酿成残酷的武斗。”“经过二十个月社会大动乱的几次反复,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才先后勉强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在人员构成上说是实行‘军、干、群’三结合,实际上大多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层次的集权,又必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左’的方针,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重大倒退。”^①

^①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36页、44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

第七章 岁月蒙尘

一大批冤假错案酿成(上)

“三家村反革命集团”成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桩冤案 邓拓、吴晗受害 惟一的幸存者 廖沫沙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震惊国内外 “新疆叛徒集团”冤案的来龙去脉 冀东冤案发生的前前后后 深挖“内人党”背后 所谓“伍豪事件”实际上是对准周恩来的 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 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等被打成“七·二〇”事件的“黑后台” “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内幕 公、检、法部门受到突然袭击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 陶铸冤案始末 彭德怀冤案经过

当成千上万善良的人们一再发自内心地“紧跟”、“拥护”中共中央决定的同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场历时10年之久的巨大灾难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悄悄地降落在他们头上；人们更不会知道，在这以后，他们在无数次大小批判会上按照“上面”的口径大加声讨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竟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的第一桩大冤案。

在1966年初江青等人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后，整个文艺界被宣称是“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至此，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株连到同吴晗一起写《三家村札记》的邓拓和廖沫沙，然后又株连到曾刊登过“三家村札记”的《北京日报》和《前线》。

3月底，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了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于是，《北京日报》和《前线》被迫对“三家村”进行批判。北京市委在极为困难的局面下，也被迫作了批判，但仍是努力将其限制在学术问题的范围内。江青一伙对此极为不满。

5月，“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便利用他们窃取的那部分权力，首先从几家重要报刊入手，发起了一场对所谓“‘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的批判。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调门之高，在建国后思想战线历次运动中都是罕见的。

5月8日，江青一伙化名“高炬”、“何明”，分别在《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上同时抛出两篇定调的文章，即“高炬”

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与“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

这两篇文章，对“三家村”穷追不舍，上纲上线，公然给《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定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基调。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是“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的最早的两张“大字报”。

在《解放军报》上显著地方刊载的、江青的“写作班子”署名为“高炬”的文章这样写道，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南星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

《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文中说，邓拓是他本人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所把持的《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是他们的“反党工具”。利用这些“反党工具”，邓拓等人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文章还说，一定要“抓住”它，“识破”它，“戳穿”它，剥掉它的“画皮”，让邓拓这“一小撮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接着，“高炬”的文章还提出，不仅《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要“铲除掉”，《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以及《长短录》中的“毒草”等等，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一一“铲除”，毫不例外。

与此同时，在《光明日报》显著位置上刊载关锋的署名为“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也与“高炬”的文章相

呼应。

《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中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暴露了。《前线》和《北京日报》才匆匆忙忙地扯起《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面旗子,发表一批材料。“何明”的文章中说,“所谓‘展开严肃的批判’是假的;收紧阵地,实行掩护,才是真的”。

“何明”的文章还鼓噪说,不能不问《前线》和《北京日报》,近几年来,他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他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

紧接着,江青、张春桥一伙的爪牙戚本禹、林杰之流蜂拥而上,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大打棍子,大扣帽子,发动全面“围剿”。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这篇文章以“空前系统、全面的文字”,将“三家村”判定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由此构筑成这一骇人听闻的文字狱。

之后,全国各报刊都奉命转载姚文元的这篇文章。这一场“围剿”,是江青一伙继《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精心制造的一场更大的文字狱。

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一文共分7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继“高炬”、“何明”之后,继续指责《前线》和《北京日报》4

月16日所作的自我检讨和批判。这一部分并称其刊登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是一个“大骗局”。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其他6个部分的标题分别是：“《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怎样开场的”；“一条黑线，几股妖风”；“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退兵时的策略”；“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姚文元在《评“三家村”》一文的开头，就耸人听闻地给邓拓、吴晗、廖沫沙3人的写作活动定了性质。姚文元在文中诬蔑《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

姚文元为了证明他的这一假设，经过精心策划，开列了一张“三家村”“怎样开场、怎样进攻、怎样退却的时间表”。姚文元这样说，“只要一看时间表，立刻可以得到异常深刻的印象”。

姚文元早在1965年11月份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

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①

对吴晗来讲,一个毫不出名的姚文元,竟敢不容分说地给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作如此耸人听闻的政治性结论,这不能不令祸从天降的吴晗隐隐感到事情“已不那么简单,这是有来头的。”而《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也正是1961年前后问世的。按姚文元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三家村”也肯定是“在劫难逃”了。

但是,人们只要把这个“时间表”同“三家村”的全部写作活动对照起来看一看,就会发现,这完全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诬陷。

1961年春节前,廖沫沙应《北京晚报》的约请,写了一篇迎新春,鼓干劲,搞好农业生产的杂文《“腊鼓催春”小记》。他在这篇杂文中引用古籍中“腊鼓催春”一词,鼓励农业战线的同志们鼓足干劲,搞好生产。这是一篇鼓舞干劲、文情并茂的杂文。

之后,在发表于1961年2月份的另一篇杂文《“史”和“戏”》中,廖沫沙就《海瑞罢官》的演出谈了自己对“史”和“戏”的关系的看法。廖沫沙认为,“史”和“戏”历来门户之

^①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

见很深,而吴晗“‘破门而出’了,历史学家却来写‘戏’。所以我说,这真是难能可贵。”吴晗在给廖沫沙的回信中,建议廖沫沙也能动笔写点戏。

这本来都是很正常的事。姚文元却无中生有地断定“三家村”“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真有点拼一拼的样子”。于是,姚文元凭空编织了所谓“摩拳擦掌、破门而出、要‘大干’一场”的罪状。

同年3月,《北京晚报》邀请时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定期给该报撰写知识性杂文。因为这时中国正面临着“大跃进”和天灾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时期,《北京晚报》的编辑邀请邓拓写一些杂文,主要是为了激励先进,策励后进。

随后,邓拓就应邀以“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开辟了《燕山夜话》的专栏,并先后发表了152篇短文,很受读者欢迎。

这些文章包括:鼓励、劝教青年的《生命的三分之一》、《说地气》、《行行出圣人》、《自学与家传》等篇,阐述学习精神、态度和方法的《从三到万》、《一把小钥匙》、《共通的门径》、《半部〈论语〉》等篇,强调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王道和霸道》、《“放下即实地”》、《主观和虚心》、《智谋是可靠的吗?》等篇,以及谈古论今的《三种诸葛亮》、《昭君无怨》、《三十六计》等篇。

邓拓有感于一些人沉迷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不珍惜大好光阴,便将《生命的三分之一》作为《燕山夜话》的首篇,鼓励人们应当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要让时间白白地浪

费掉。这也是邓拓从事《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写作的主要目的。这篇杂文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然而,姚文元说这是主将“登台”“上马”,想从腐蚀人们的“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直到把全部生命腐蚀掉,是为“和平演变”组织力量,以便“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同年9月,邓拓约请此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以及《前线》编辑部的几位同志商定:在《前线》杂志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3人轮流撰稿,署名“吴南星”(吴即吴晗;南即马南邨,亦即邓拓;繁星即廖沫沙——编者注),并规定每篇千字左右,题材不限,文责自负。就这样,“三家村”即告成立。

中共中央在《燕山夜话》问世不到一年之后,就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认真总结建国13年来党的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大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认真实行“三不主义”。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

式的专政。^①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一扫这时政治生活中的沉闷空气,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有了发扬。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许多报刊都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双百”方针,从内容到形式,有了较大的改进。很多报纸副刊的专栏办得生动活泼。

在这种比较生动活泼的政治空气的鼓舞下,邓拓继续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在《三家村札记》中写了18篇。吴晗、廖沫沙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陆陆续续地为《三家村札记》和其他报刊写了不少文章。后来,《燕山夜话》结集成书,前后共印行了30万册之多,受到读者的普遍好评。

后来,《北京晚报》的同志于1962年9月2日给邓拓送去一本《三十六计》的油印本,并要求邓拓讲一讲“中国古代兵家用计”的事。邓拓应约写了一篇《三十六计》。

然而,此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又重新抬头。邓拓在1962年《燕山夜话》第五集的“奉告读者”中以“把业余活动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和“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有意见”为由,中断了《燕山夜话》专栏的写作。邓拓的杂文没有继续写下去。因此,《三十六计》成了《燕山夜话》的最后一篇。

对此,姚文元则别有用心地说,这是因为1962年9月召

^①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第121—1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

开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牛鬼蛇神心惊胆战，受到极大的震动。‘三家村’见势不妙，开始了退兵”。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两百多篇文章，以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为主，也有些是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的揭露，对错误思想的批评。其中虽有个别文章不尽妥当，但绝大部分作品仍表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思想。

这些文章多数是就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有感而发的，或褒或贬，切中时弊；也有知识性小品，帮助读者增长知识，提高认识能力；还有些关于学习方法的短评以及历史考证、地方掌故。

《燕山夜话》中有 28 篇是读者出题目，作者写文章。这些题目，是中共中央的有关负责人出的。据有关的编辑追忆，在《燕山夜话》的文章陆续发表期间，每天都收到读者欢迎这个专栏的信件，也有个别读者对某篇文章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没有一封读者来信说是“大毒草”。

《三家村札记》专栏是 1964 年 7 月迫于形势而结束的。《三家村札记》专栏只发表了 60 多篇文章。其中除 5 篇由他人代笔外，其余都是邓拓、吴晗、廖沫沙 3 人所写。在写作特点上，《三家村札记》较多地采用了以古鉴今、深入浅出的方式，体现出杂文特有的辛辣风格。

1964 年，由于吴晗和廖沫沙分别主张批判地继承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称赞了昆曲《李慧娘》，因而二人都被扣上一顶政治性大帽子，遭到批判。在此形势下，《三家村札记》也被迫停刊。

江青、姚文元等人以《海瑞罢官》为导线,以“三家村”为突破口,重操秦桧的“莫须有”故伎,大兴文字狱,为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

在姚文元《评“三家村”》这篇洋洋洒洒两万字的“奇文”里,姚文元一股脑地给“三家村”扣上了大量的“罪名”。

“罪名”之一是,“三家村”执行的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姚文元在文章一开头就认定“三家村”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

所以,姚文元在文章中说,长期以来,邓拓、廖沫沙、吴晗把《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发表了“大量十分恶毒地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言论”,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三家村”所贯穿的“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是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

“罪名”之二是,“三家村”发表的各种言论是“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指挥的向党进攻”。姚文元在文中说,邓拓、吴晗、廖沫沙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

文章还借机说,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罪名”之三是，“三家村”活动的目的是“配合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以“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姚文元在对“三家村”大批一通的言论之后，竟得出这样的结论：“三家村”里的“黑幕”十分惊人，这“一小撮人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怀着多少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者如何无所不至地吹捧和支持”。他们盼望中国“变颜色”，“从红色中国变成黑色的中国”。这个“黑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巢穴”，“内藏毒蛇”，“必须彻底弄清它，捣毁它”。

“罪名”之四是，“三家村”在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搞“资本主义复辟”。

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还声称，“三家村”采取了“软刀子割头”和“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的手法，全面地使用了“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在‘学问’、‘知识’的幌子下”，“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力图使干部、青年蜕化变质，全面地、彻头彻尾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姚文元在文章中还说，他们的活动方式和想达到的结果，就是在最准确意义上推行“和平演变”。

姚文元在文章中说，对“三家村”的赞赏者和追随者，指使人和支持者，都要一一挖出，“彻底批判，通通打倒”。姚文元在文章中最后还气势汹汹地说，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革命”。面对着这样“艰巨的战斗任务”，

一定要“敢于革命”。

姚文元在文章中还说,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

姚文元为了把“三家村”杂文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精心地从《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两百多篇杂文中挑出24篇当“靶子”。对于其他的大量作品,姚文元或装聋作哑,或含糊其辞。

从姚文元对这20多篇所谓“毒箭”、“毒草”的“分析”中,人们可以找出姚文元构筑文字狱时所采取的阴险卑劣的手法。这些手法不外乎3种,即寻词摘字断章取义;索隐发微,牵强附会;混淆事物性质,无限上纲。

姚文元抛出的《评“三家村”》是林彪、陈伯达、江青、姚文元一伙篡党夺权全盘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同时,这也是他们在全国大规模地残害革命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开端。

有必要指出的是,同半年前姚文元的代表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时候比,《评“三家村”》抛出时,中国的政治气候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

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姚文元还不得不称呼对手为“吴晗同志”。并且,文章发表后,也展开了一场讨论,吴晗等人可以在报上发表申辩的文章。但在批判“三

家村”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尽管“何明”的文章最后还是表示,其观点如有错误之处,请《前线》和《北京日报》“批评、指正”,但这已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三家村”——这个为所谓“革命左派”所“揭露、批判、踏倒、摧毁的对象”,此时已完全被剥夺了任何申辩的权利。

自此,以“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契机,一个以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批判”、“围剿”吴晗和所谓“三家村”的运动,从中央推向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揪“三家村”、“四家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各省、市、自治区,各机关,都在抓“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时间,全国上下各种宣传机器一起开动,万炮对准“三家村”齐轰,成为10年“文革”期间所特有的“舆论一律”的开场。

“三家村”冤案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作为“三家村”的三位主人邓拓、吴晗、廖沫沙,是这场冤案的最早、最直接的受害者。

1966年5月16日,戚本禹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中诬陷邓拓“是一个叛徒”。同一天,北京市委派人通知邓拓在家停职反省,并停发给邓拓的各类文件。

对江青一伙这种肆意践踏党纪国法的卑劣行径,邓拓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坚定地对爱人丁一岚说,他的历史问题相信党组织会弄清楚的。他被捕以后没有干出对不起党的事,历史是可以查的。他要申辩。

5月17日深夜,邓拓伏案给北京市委领导彭真、刘仁写了一封长信,对姚文元等人的诬蔑和诽谤进行了不屈的抗争。邓拓在信中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他写的文章171篇,有问题的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他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对于一哄而起的批判“三家村”运动,邓拓还在信中这样表示,他完全懂得批判他的群众的心情。邓拓表示,对于所有批评他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本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他都心甘情愿。

对此,邓拓在信中写道:“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在给北京市委的领导写完信后,邓拓又挥笔给爱人和孩子们留下了他最后的文字:盼望他们永远作“党的好儿女”,作“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5月18日凌晨,著名社会科学家和著名新闻工作者、时任华北局候补书记、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满怀悲愤,以死殉节,悲壮辞世,终年54岁。他用无声的死,向那颠倒是非的年代发出最强烈的抗议。

在这场沾满血泪的文字狱中,吴晗不仅是最早的受害者,而且其结局也更为悲惨。对此,吴晗的小儿子吴彰后来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到处掀起批判‘三家村’狂潮的时候,姐姐在

北长街小学上五年级，我才在景山学校上一年级。转眼之间，周围的一切都变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在盈耳的声讨中，我们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不久，深夜里的猛烈砸门声就常常把人惊醒了，我老是吓得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外国友人送给爸爸的礼品当作‘四旧’砸烂了，电视机也不能幸免，就连爸爸珍存着的姐姐从三岁起画的图画，都在‘这是什么玩艺儿’的斥骂声里付之一炬。”^①

在此期间，吴彰对其父亲吴晗生前的悲惨遭遇记忆犹新。同时，吴彰自始至终都记得他父亲在世时所遭受的迫害。吴彰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没过多久，爸爸进了劳改队，在那儿被人打出内伤，口吐鲜血。他的身上总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从那以后，爸爸就开始经常大口吐血了，但他一直瞒着家人。”“一九六七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是全家一起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六八年三月的一个星期六，爸爸又该回家了，姐姐和我趴在窗台上，紧盯着公共汽车站，搜寻着爸爸的身影，天黑了，饭凉了，爸爸没有回来。”“紧接着，妈妈在四月份也被

^① 吴彰：《幸存者的回忆》，《吴晗和〈海瑞罢官〉》，第103页、103—10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

送入劳改队。”“妈妈身体弱不禁风，患有几种严重疾病”。“她在那儿熬过了一个潮湿的酷暑和一个阴冷的严冬。妈妈的双腿瘫痪了。”“三月十八日清晨，妈妈从昏迷中苏醒”，“没过多久，本来可以救活的妈妈就在医院这个最最人道的地方死去了。第二天，姐姐带我去太平间给妈妈更衣，看到妈妈双眼半睁，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妈妈是死不瞑目啊！”“这一年的十月十一日，来人接我们去看爸爸。”“他们对姐姐说：‘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姐姐透过哭声问：‘我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昨晚他提出过要见你们，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我们绝望地哭呀喊啊，连在场的医生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连死去的爸爸也没有看到一眼。我们只哭着拿回了爸爸的血迹斑斑的裤子和抽剩下的香烟，爸爸的遗骨至今还没有下落。”^①

吴彰还在《幸存者的回忆》一文中说，以后他们听说吴晗戴着手铐被人拥到医院看病。他满头的白发都被揪光了，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

与吴晗一起在“文革”中共过患难的廖沫沙后来在谈到吴晗一家的遭遇时说：“在我们当中，吴晗一家的遭遇是最惨的。四口被迫害死了三口。吴晗夫妇死后，女儿小彦才不过

^① 吴彰：《幸存者的回忆》，《吴晗和〈海瑞罢官〉》，第105页、106页、10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

十几岁。”^①

廖沫沙是“三家村”的3位主人中惟一活下来的人。从前面邓拓、吴晗及其家人的境遇已不难想像，廖沫沙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是怎样的艰难。在长期丧失自由的情况下，廖沫沙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然而，廖沫沙不仅顽强地活下来，并且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出席了1980年冬审判江青等人的公审大会。

“三家村”冤案祸殃全国。在邓拓、吴晗、廖沫沙3人惨遭厄运的同时，北京市及全国各地的大批干部和群众也蒙受株连，先后被打成“三家村黑帮分子”、“马前卒”、“小三家村”、“黑店伙计”等等。

林彪、江青等人以“三家村”为突破口，大搞“层层揪”、“层层抓”、“追后台”，上把矛头对准中共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老干部，下把罪名强加于一般干部、知识分子乃至普通群众。就连给《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写过稿，有过工作来往，甚至家里有一本《前线》杂志的，也不免要受审查、挨批斗。

更有甚者，某地一位喜欢《燕山夜话》的读者，托北京的亲戚代订了一份《北京晚报》，也被追查同“三家村”的“关系”，每天罚跪板凳，“交待”了3个月，“罪”还没有赎清。

有些地方报刊曾仿照《北京晚报》形式开辟杂文专栏。于是从山东到云南，从广东到黑龙江，到处揪“三家村”、“四

^① 子真：《廖沫沙同志忆吴晗》，《吴晗和〈海瑞罢官〉》，第33—3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

家店”，甚至远距北京数千里之遥、被古人称之“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外的敦煌，也难逃文网，被打成“三家村在敦煌的分店”。

林彪、江青等人制造的这场现代文字狱，所受株连之多，祸及范围之广，已无法用数字来统计。

颠倒了的历史必然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和人民群众的推动下颠倒过来。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学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①

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公布于世的震惊国内外的案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第 807 页、810 页，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8 月版。

件之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在五花八门的红卫兵小报上互相转载着这样的消息，1936年六七月间，刘少奇发出了“狱中共产党员可以履行反共自首手续”的“黑指示”。这个“黑指示”，通过林枫和徐冰、孔祥祯写成信件，由魏文伯介绍魏茂林送进草岚子监狱中。“叛徒们”在狱中看到刘少奇的“黑指示”以后，“正中下怀，欣喜若狂”，“分批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了”。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造反派们就是用诬蔑和谩骂的方式进行所谓“革命”的。

从1967年3月开始，在全国掀起所谓“抓叛徒”的恶风，就是起源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件”。

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是一批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干部。这些干部在1931年1月和2月顺直省委先后遭到的两次大破坏中被捕。

被捕后，这两批被捕人员经过斗争，又先后被改判，集中关押到设在北平市草岚子胡同，所以习惯上称之为“草岚子监狱”。

在狱中，这些被捕人员成立了秘密党支部，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十分秘密、谨慎而又不屈不挠的斗争。

为了让这些人员转变立场，国民党反动派想尽一切办法对他们进行“软化”工作。针对这种情况，狱中的中共党支部秘密地对党员们进行了保持革命气节的“红旗出狱”的教育，即坚持到革命胜利，红旗插遍全中国时再出狱，决不向敌人反省悔过。

从1931年到1936年,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共产党员熬过了整整5年的铁窗生涯。5年间,他们同敌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勇敢、机智的斗争,战胜了敌人的“反省”政策,通过绝食,取得了改善生活待遇的胜利;顶住了国民党宪兵三团的法西斯恐怖政策;戳穿了监狱当局诱骗他们履行反共手续的阴谋诡计,并在狱中长期秘密坚持看报读书,学习马列主义。事实证明,这批共产党员立场坚定,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1936年,华北地区抗日斗争形势蓬勃发展,在狱中的中共党支部领导大家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了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但监狱当局坚持要犯人履行手续,刊登《反共启事》后方可出狱。

随着华北抗日斗争形势的日益成熟,党在华北地区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的干部,来组织和领导华北地区的斗争。当时主持华北工作的刘少奇深切地感到:“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我们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提拔新干部在目前是重要的。”^①

刘少奇受命于危难之际,化名为“胡服”,于1936年3月从延安到达天津,先后任中共中央代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北方局的全面工作。

同年4月,在北方局的一次会议上,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提出,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这些党员干部大多是

^① 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刘少奇选集》,上卷,第6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久经考验、熟悉北方情况、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骨干，应设法让他们尽快出狱工作。北方局讨论通过后，刘少奇和柯庆施代表北方局迅速请示中共中央，提出让狱中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字，以尽快出狱为党工作。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把北方局的报告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

这是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一个特殊的措施。

对此，刘英后来回忆张闻天对她谈到这件事的处理经过时说：

那是1936年春天，少奇同志报告，说有一批干部（61人）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只要履行一个反共的普通手续就可以释放。当时华北抗日形势迅速展开，急需干部，而狱中同志要得到中央同意，看到领导同志签字的文件，才愿出狱。少奇同志请中央立即决定。事情来得很急（因为如果日本人侵占平津后就不能办了），又是如此重大，闻天当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①

这年6月，刘少奇将中共中央批准的要这批同志履行手

^① 刘英：《身处逆境的岁月——忆闻天》，《回忆张闻天》，第33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

续出狱的决定交由柯庆施去贯彻实施。经过党的积极工作和狱中同志曲折的思想斗争,这批坚定的干部终于分批履行手续后出狱。

按照当时监狱的规定,凡是在狱中坐监时间不到一年的,不能履行手续出狱。因此,狱中党支部对能够出狱的党员作了分批出狱的安排。从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依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党员分9批先后履行了有关手续,走出了监狱大门。

后来,根据孔祥祯1981年(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编者注)的回忆,当时由党组织营救出狱的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52人,而不是61人。

但是,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当时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的是53人。薄一波说:“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文革小组’及它那个顾问康生所炮制的‘六十一人案’,精心策划、别有用心地把悔过反省、在《反共启事》上签名、捺手印的几批人加了上去。”^①

从1931年到1936年,被关押在草岚子军人反省院的政治犯有四百多人。在共产党员中,有些被摧残死在狱中;陈原道、刘亚雄等人的家庭由于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有关系,被国民党所谓“大赦”出狱;孔祥祯、魏文伯等人通过家人亲友的营救,以保外就医之名出狱;杜振声、蒋晓梅等人在狱中叛变自

^①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第18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3月版。

首而获释。

其中,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真正经党组织营救救出狱的是53人。他们是:殷鉴(黄建纯)、邱少山、杜伯阳、赵炽昌(赵朴)、仙维勋(夏维勋)、夏富海、马玉堂、殷明道(殷光善)、董天知(董旭生)、张友清(王彦芹)、张曼萍(王若愚)、王振林、张玺(王常珍)、李力果(李烈飞)、吴云甫(李明)、安子文(徐子文)、刘聚魁、张振声(张正身)、杨献珍(杨仲仁)、周仲英(周斌)、刘子久(刘俊才)、贺致平(贺之敏)、马辉之(冯俊斋)、王其梅(王时杰)、王新波(王之喜)、刘锡五(刘锡武)、刘慎之(刘振邦)、刘文蔚(赵云生)、胡敬一(胡中田)、胡锡奎(胡锡昆)、侯振亚(侯正寅)、徐子荣(徐之荣)、赵明新(李明)、廖鲁言(廖广麟)、刘克让、韩钧(韩汉琴)、乔健双(高梦九)、周庠、王德(王伯庆)、王玉堂、王鹤峰(王德光)、冯乐进(冯明新)、刘尚之(刘崇善)、刘昭(刘光书)、刘有光(刘相臣)、刘澜涛(刘华甫)、宋则民(朱今)、李楚离(李即吾)、赵林(罗霖祥)、唐方雷(张建勋)、彭德(张鹏德)、傅雨田(王桐)、薄一波(张永璞)。

其中,括号内为被捕时使用的名字。

在这期间出狱的王墉、颜道黎、丁子珍、郝景波4人,虽然也被诬在“六十一人叛徒案”中,但他们的情况不同,不属于这个范围。

中央书记处为了使出狱的同志能尽快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于当年12月4日给刘少奇发出电报说:“出狱的同志请开始分批分期到西安。我们交通即日出发专接。”

在“六十一人叛徒案”所诬陷的人员中,有党的组织关

系,并且按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出狱的是57人。除高梦九出狱后下落不明,刘克让成了托派、扶平回家后投靠了国民党外,其余54人,都很快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被分配到急需的战斗岗位上。

在这54人中间,薄一波、杨献珍、周仲英、董天知、韩钧等被派去山西,作阎锡山的上层统战工作;张友清被派到太原任中共山西省工委书记;马辉之被分配到河北省委;李楚离担任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刘澜涛先去绥东,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安子文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这批干部分赴华北各地,重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加强了白区共产党的领导力量。

“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共中央对这批共产党员出狱的问题已经进行过多次审查,一直认为没有问题。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就是1945年的中共七大和1956年的中共八大召开前,这批党员中有一些人被选为大会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审查。

时任中共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的任弼时在作审查结论时说,这批同志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登《反共启事》一类的东西出狱,是北方局提出并经中共中央同意批准的,所以完全不影响他们的代表资格。

这样,薄一波等13人分别作为正式代表或候补代表,出席了中共七大。

在中共七大的会议期间,有些同志不大了解这13位同志当年出狱的经过,对他们当中有些人作中央委员候选人的资格提出过异议。

刘少奇就此事在他的办公室对李富春、彭真、康生、陈赓、薄一波等说：“这件事是中央让他们办的。”

对此，1967年1月20日，薄一波在《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斗争》的回忆文章中也说：

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到延安学习，并准备参加党的七大。毛主席找我谈话时，我将这一段监狱生活和出狱经过向毛主席作了简要汇报。当我汇报到监狱中对某些问题有很大争论时，主席说：“这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当我汇报我们是执行中央代表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登了《启事》之后出狱的，主席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后来，主席让我把这次出狱的人开个名单，我写好后送给了主席。主席在这个名单上写下了：“北方出狱干部，一九四五年一月薄一波写出，存。”^①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这批共产党员，大多数都健在。其中约二十人担负着中共中央部委和省、直辖市、自治区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职务。

其中，薄一波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领导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刘澜涛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安子文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周仲英和张玺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廖鲁言任

^① 薄一波：《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斗争》，《薄一波文选》，第340—341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国务院农业部部长；徐子荣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刘锡五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杨献珍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马辉之任交通部副部长；刘有光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李力果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子久任劳动人事部副部长；王鹤峰任东北局监察组长；赵林任吉林省委书记；吴云甫任山西省副省长；胡锡奎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德任中南局秘书长、广东省委书记；傅雨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侯振亚任福建省委书记；王其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西藏军区副政委。

其他人有的是大专院校的党委书记，有的是国营大企业的厂长、经理或作家、学者。

然而，“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将这桩历史上早有明确结论的往事重新提起，并重新定性为“向敌人自首叛变”，使一大批高级干部或知名学者被定为“叛徒”。

1966年8月初，康生指示“彭真专案组”对薄一波等人1936年出狱的历史问题进行审查。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康生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南开大学的一个红卫兵头头谈话时说，红卫兵要“紧跟统帅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历史。给他们定个“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不得翻身”。

红卫兵问康生：“我们如何去查呀？”

康生回答说：“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解放前的报纸、档案。”

红卫兵表示担心图书馆、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不让他们查。康生说：“我给你们写个条子，谁敢不让？”

于是，康生当即给这个红卫兵头头写了一个颇具“权威性”的便条：“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去查阅历史档案资料。望予支持。康生，8月18日。”

之后，根据康生的“指示”，拿到“便条”的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成立了“揪叛徒战斗队”，并立即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报纸，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并查阅机密档案，开始了“揪叛徒”的恶作剧。

这样，“首战杨献珍”、“三审张闻天”、“激战宋则民”、“怒斥徐冰”等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这些“革命小将”很快将他们的“战果”呈报给康生。

这年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泽东说，他长期怀疑刘少奇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他翻阅了1936年8月、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刊登的《反共启事》看来，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随信附上当时报纸的影印件，但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同意康生的观点。

不了解历史真相的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是怀着对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无限拥护和崇敬的心情”去完成这一个“光荣”的任务的。

11月1日深夜，这些红卫兵在高等教育部的一个木工房里，秘密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他们已经查明薄一波等61人是“叛徒集团”。

11月9日，他们又向“中央文革小组”呈交所谓“四项战

略部署”的请示。这些请示内容原本是康生的唆使，自然能很快得到康生等人的支持。这些涉世不深、年轻单纯的红卫兵，实际上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

11月12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号召“革命人民揪斗叛徒集团”。随即，这些红卫兵又组织了进驻北京、石家庄、太原、乌鲁木齐、西安、南京、郑州、广州、长春等市的许多“抓叛徒战斗队”。他们自称是“弹上膛”、“刀出鞘”一般地杀出全国各地。从此，“揪叛徒”的狂飙殃及全国。

11月23日，“揪叛徒战斗队”要在西安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他们认为是“叛徒”的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和书记处书记胡锡奎。

对此，西北局通过电话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立即草拟了一份给西北局的电报，并报送给毛泽东审阅。

周恩来在他代拟的中央给西北局的复电指出：“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①

同时，周恩来在电报稿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附信说：“刘澜涛等同志出狱事七大、八大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93—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知道此事’。”^①

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办”，批准了周恩来的电报稿和附信。这封电报第二天就发给了西北局。

周恩来刚发出给西北局的电报，又接到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关于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批斗的紧急电话。周恩来除在电话中明确回答外，又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东北局拍发了内容相同的电报，以便让东北局处理这一问题时有文件可依。与此同时，周恩来将这封电报署上自己的名字，抄发给揪斗赵林的红卫兵。

尽管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出的指示是经毛泽东批准的，但康生、江青等人却置若罔闻，继续用各种阴谋手段煽动蒙蔽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去揪斗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大肆宣扬薄一波等61人按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是刘少奇“背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策划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康生公然向红卫兵说：“薄一波等61人被捕出狱，自首叛党的问题十分严重。”

周恩来立即插话说：“薄一波等同志办理出狱手续，是中央同意的嘛。”

毛泽东也肯定地说：“是啊！我记得是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但是，康生这个从来不与毛泽东的意见一致的野心家、阴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谋家,这时竟然辩解说,当时在北平是刘少奇,中央是张闻天作总书记,是他们搞的。中央仅仅知道他们办了个简单手续,可他们写的东西十分严重。

1967年1月1日,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的戚本禹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的部分人员谈话时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

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卡博和巴卢库时说,有些人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中央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这件事现在已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由此看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此时或更早一些时间已经定论。

2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成员关锋与解放军代表讲话的时候说,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和工交等很多重要的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执行的是“资产阶级路线”。“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红卫兵小将”是有很大功劳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

3月16日,在康生、陈伯达、江青控制之下的“中央文革小组”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印发了“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将昔日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来的几十位同志诬陷为“叛徒”。

这个《材料》上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些“变节分子”中的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之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3月30日，《红旗》杂志第五期上发表了戚本禹的长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向全世界公布了刘少奇的“罪状”。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审阅后批准发表的。4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以“权威”的姿态公然宣称：“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文章并且以质问的口气向刘少奇提出了8个“为什么”。其中，第一个“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①

文章在末尾对这8个“为什么”作了结论性回答：“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

^① 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人民日报》，1967年4月1日。

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①

至此,康生、戚本禹等人重翻1936年薄一波等人出狱的历史旧账的真正目的终于达到。

后来,刘少奇被造反派审问时,造反派问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的声音虽然稍大了点,但还是比较平静地作了答复。

刘少奇说,1936年,他到北方局主持工作时,有人说,这些同志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前,工作很出色,被捕后在监狱里表现也很坚强,他们在狱中还成立了党支部,同国民党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并一直和地下党保持着联系。他们的刑期大多数已坐满,但要履行个手续才能被释放。刘少奇认为,要设法营救他们,如果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就不好办了,很有可能要把这批人给杀掉。九一八事变以后,在沈阳狱中的共产党员就是被全部杀害了。因此,他把这个情况写信报告了党中央,请中央决定。很快就得到中央的答复:同意这样办。

说到这里,刘少奇激动起来了。刘少奇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去拉他办公桌的抽屉,嘴里说着:“这个事我已向毛主席写了申诉。”

这时,王光美急忙去拉住刘少奇的胳膊,说:“你是写给毛主席的,在这里拿出来也没有用。”

刘少奇这才扭过身子,靠在抽屉那里。但是,刘少奇怒气未消地说:“这批人出狱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早有定论,几

^① 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人民日报》,1967年4月1日。

年来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现在说成是叛徒集团,简直岂有此理!”

刘少奇稳了稳情绪说,这批人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有的有城市工作经验,有的有白区工作经验,有的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在后来几十年的实践中也证明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绝大部分是党的骨干。王明路线时,白区的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许多好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61位同志让国民党反动派都杀了就舒服了?现在把他们说成是“叛徒集团”,将来,党的历史怎么写?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材料》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揪叛徒”的组织。“揪叛徒”的狂风恶浪铺天盖地。

对此,南开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在一份总结中对他们的行动和“战绩”作了记载。

其中说,他们派出了几十个“抓叛徒”的小分队,几百个专案调查组,调查人员出动了几万人次,行程约150万公里,其长度可绕地球37周半。从海南岛到黑龙江,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云贵高原到福建前线,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除台湾、西藏外,全国20多个省、几百个城市都留下了“八·一八”“战士的足迹”,共计调查了北京、太原、济南、武汉、开封、南京、杭州、保定、苏州等12个敌伪反省院的材料。

与“八·一八”对立的南开大学的另一个造反派组织“卫东”,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北京化工学院及西安交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等单位也不甘示弱,四处派兵。

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揪叛徒”活动“如火如荼”。仅据南

开大学的两派组织宣称,他们在“揪叛徒”中审讯关押的行政十二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就达 1200 余人。

“揪批斗叛徒”的狂飙,给全国的动乱火上加油,人民的灾难日益深重。这是一场残酷的大迫害。

在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的指使下,许多造反派组织对曾经在白区工作过的老干部违法审查、关押、监禁,无中生有地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残酷迫害。薄一波等的所谓“叛徒案”株连所及甚广,冤狱遍布全国。

其矛头所向恰恰是那些为了中国人翻身解放而浴血奋战了几十年的老一辈革命家。其中很多人在这场 10 年浩劫中含冤离开了人世。在前述 53 人中,因长期遭受精神和肉体折磨而逝世的共有 11 人。

这些人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部长、党组书记廖鲁言,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徐子荣,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原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锡五,原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其他的还有王新波、刘慎之、刘文蔚、胡敬一、侯振亚、赵明新。

1967 年 7 月 21 日,江青、康生制造了一个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同年 8 月,康生又制造了一个诬陷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名单。在这些名单中,仅四届政协常委会委员 159 人中被分别诬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就有 74 人。他们还诬陷各省、市、自治区的大

批领导干部，先后制造了大量冤案。

张闻天，上海市南汇县人。早年在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后去美国留学。

1925年，张闻天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苏州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之后张闻天到苏联学习，兼作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1930年回国后，张闻天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的需要，张闻天于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张闻天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杂志编辑，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41年到1942年，张闻天在陕北、晋西北等地进行深入的农村调查。

解放战争时期，张闻天任牡丹江地区东北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因与彭德怀一起受到错误的批判而离开了外交岗位，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张闻天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被南开大学红卫兵3次凶狠揪斗后，张闻天曾两次给康

生写信,希望查阅党的有关档案,把61人出狱问题澄清。康生拒不理睬。

后来,在1968年4月的一天,康生派人到张闻天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怒气冲冲地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人出狱的案件,“被你搅浑了”。这个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干的”。康生还质问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他批准的?同时,康生还威胁张闻天“应该替自己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张闻天,从中听出了弦外之音。回家后,张闻天对妻子刘英说:“我可能会被捕。”

果然不出所料,5月16日下午,北京卫戍区派来一个排的武装,把他们分别监押了起来。

张闻天在“不许说毛主席知道此事”和维护中共中央威信的重大压力下,在写给红卫兵索要的材料中说,刘少奇1936年春去北方局不久,就给他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刘少奇在信中说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很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来的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一批人,只要履行一个简单的手续,犯人即可出狱。

张闻天还说,这封信他以后给什么人看了,已经记不清楚了。他轻率地以他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报告上签了字。

张闻天就是这样被迫一个人承担了中共中央的责任。

1969年10月,张闻天被从北京送到广东省肇庆看管,1975年又被送到江苏省无锡市。他在受迫害打击中仍然努

力钻研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写了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因病情恶化,得不到及时治疗抢救,张闻天于1976年7月1日含冤逝世。

1967年,薄一波、刘澜涛在给中共中央写的材料中,都写了他们1936年出狱的事毛泽东知道。专案组的人看过以后对薄一波说:“你讲这个问题一定要避开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你不讲对党有利,讲了对党不利。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考虑。”

专案组人员还对刘澜涛说:“不要写1936年你们履行反共自首手续出狱的事中央同志知道,把这一段勾掉重写。”

薄一波、刘澜涛断然拒绝了专案组的这一要求。

康生等人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始终没有能够弄到刘少奇背着中共中央策划61人“自首叛变”出狱的真凭实据。于是,他们便无中生有地诬陷刘少奇指使安子文“销毁了罪证材料”。

从1967年9月到1968年9月,专案组人员按照康生的意图,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写报告说,早在1949年北京刚解放,刘少奇就秘密指示安子文,要把他们这伙“叛徒”的“敌伪档案”搞到手。

专案组还在报告中说,北京解放不久,刘少奇“怕”暴露他1936年策划“叛党一伙”的“罪证”,就指示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秘密布置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同案叛徒”冯基平,利用职权将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叛党罪证”搜集起来,交安子文亲自保管。安子文又分别通知“这伙叛徒”,到他家中偷看自己“叛党的口供”。1955年,刘少奇又“秘密指

示”安子文，“秘密销毁”了“档案”。

康生为了给专案组的报告寻找“证据”，又指使安子文专案组，强迫安子文限期写出他“销毁”有关“敌伪档案”的“罪证材料”。

康生还将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和副局长刘拥揪到中央组织部，要他们交待安子文如何“指使”他们搜集有关 61 人出狱的“敌伪材料”、他们搜集到以后又交给了谁、安子文又怎样把这些档案“彻底销毁”等问题。

冯基平被专案组扣上手铐，揪斗了半个多月，始终坚持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有关 61 人的“敌伪档案”，安子文也从来没有向他索要过任何材料。

这样，北京市公安局不得不对此进行极其认真的查证。1967 年 9 月 29 日，北京市公安局在向安子文专案组呈交的报告中明确写道，解放初期，北京市公安局在草岚子监狱没有接到任何“敌伪档案”，伪特别刑事庭也没有 1937 年以前的档案。

康生等人制造“无中生有”的诡计没有得逞。

安子文专案组随即又到狱中围攻杨献珍，逼迫杨献珍揭发刘少奇、安子文“销毁敌伪档案的罪行”。

杨献珍一生所走过的路程，有相当长的阶段是坎坷的。杨献珍曾两次被敌人逮捕，第一次经社会各界营救无罪释放；第二次被捕，被判处死刑，经过翻供斗争，改判有期徒刑，抗战前夕，经党营救出狱，参加抗日斗争。

1959 年，康生借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模式，把杨献珍批判“五风”的言论诬蔑为“反党”、反“三面红

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打击,把他的中央高级党校校长职务降为党校副校长。1964年,康生又抓住杨献珍用中国古语“合二而一”表达的对立统一规律,定性为“修正主义”,企图在政治上将杨献珍一棍子打死。

康生等人一系列的阴谋诬陷之后,1965年又罗织了杨献珍的10条“错误”,写成《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并决定“撤销杨献珍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在这场政治大冤案中,一大批无辜的干部受到株连。仅中央党校就有154人受到批判遭到迫害。这些人除极个别态度较好的以外,都决定调离中央党校,到“四清”运动中改造。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工作队撤回,这些被康生说成是“杨家党”的人都不准离校,重整旧案,继续被批斗。

杨献珍在精神上受到了污辱,身体上受到了摧残。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康生加扣上“叛徒”、“里通外国”的“罪名”。

康生一伙在提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后,责令“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在康生等人的一再唆使下,红卫兵、造反派穷追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他们的支持下,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揪斗该校党委书记高仰云后,又到北京来联络造反派,揪斗杨献珍,企图从这里打开缺口。

但是不管这些红卫兵怎样轮番进攻逼供,杨献珍始终实事求是地说明事情真相。杨献珍坚定地对围攻他的人说:

“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这批同志绝不是叛徒。”

蓄意制造这起冤案的康生一伙对历史的真相是不屑一顾的。他们的既定方针是不但要整倒这批老干部,而且要借此加重刘少奇的“罪名”。

就在“揪叛徒”的高潮中,中央高级党校的造反派于1967年5月中旬又把杨献珍揪到中央党校批斗。

杨献珍再次失去了自由,被关押在一座小楼里,频繁地忍受着非法的审讯、批斗,身心进一步遭受摧残。

在这期间,加在杨献珍头上的政治帽子,除了原有的以外,又加上了吓人的一顶:“里通外国”。

20世纪50年代,杨献珍在主持中央高级党校工作期间,曾根据中央的指示,聘请几批苏联专家来校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程。

当时,中共中央为了帮助应聘来华的苏联专家们了解中国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责成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将某些中共中央文件资料译成俄文,发给他们。在中央高级党校工作的苏联专家,也得到过这些文件资料。就是这样一件十分简单明白的事,却被歪曲成杨献珍向苏联专家“提供情报”、“里通外国”。

对此,杨献珍断然加以否认。

在中央高级党校被关押期间,杨献珍除了根据中央专案组的指定写自己的交代材料外,还要按照许多外单位派来的调查人员的要求,为其他受审挨整的同志写证明材料。

在来人中间,有许多人强迫杨献珍按照他们的意图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材料。但是,杨献珍不管面对什么人,写什么

人的材料,都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如实反映情况,决不胡编乱造去迎合造反派的需要,也绝不陷入调查人编织、诱供的陷阱。

在这种关系到他人的政治生活和历史荣辱的大事上,杨献珍的态度是非常慎重,非常明朗的。他始终坚持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本色。

例如,有人多次找杨献珍,要他证明王若飞是“大叛徒”,是“写了悔过书叛变出狱的”。杨献珍非常气愤、非常坚决地驳斥了他们的诬陷不实之词。他斩钉截铁地说:“王若飞不是叛徒。”

杨献珍说,营救王若飞出狱是当时北方局交给以薄一波为首的到山西作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们的任务。薄一波直接向阎锡山交涉,阎锡山同意无条件释放。薄一波要杨献珍去山西陆军监狱探视王若飞,与他取得联系,给他送去了党的文件,传达了党的指示。虽然阎锡山提出要经过训导院,但也是无条件释放。王若飞在被释放前曾从监狱转到训导院,杨献珍还去看过他。

杨献珍说,王若飞出狱的时候,是他去接的,出来后和杨献珍等人同住一个四合院。王若飞出狱时绝对没有履行任何手续。打入训导院作地下工作的党员时逸之,当时任训育主任,他也可以证明王若飞是被无条件释放出狱的。

杨献珍还为孔祥祯、魏文伯写了旁证材料,证明他们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来,都是因病保释的,因病取保出狱的申请书,就是杨献珍替他们写的。申请书不涉及政治问题,没有答应什么条件,也没有履行任何手续。

国家财政部也派人来调查原副部长戎子的问题,要杨献珍证明戎子和“不是”中共党员,是“混进党内来的”;还说戎子和的一个秘密党员关系联络人胡熙庵“不承认”戎子和是党员。

对此,杨献珍却坚决地说,戎子和虽然曾被阎锡山委任为太行五专署专员,但他在太原时就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根据山西省委的决定,在胡熙庵去任汾城县长时,戎子和的党组织关系就已转到杨献珍手上,省委委托杨献珍作戎子和与省委的联系人。杨献珍证明说,“戎子和不是党员,是混入党内来的”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一次,安子文专案组人员又来逼迫杨献珍证明刘少奇、安子文“销毁”了有关“敌伪档案”。专案组人员向杨献珍诱供说,安子文曾亲自打电话给杨献珍,要杨献珍到他家去看“敌伪档案”中有关他自己的口供材料。杨献珍看了一个下午没有看完,安子文答应让杨献珍带回家里去看。

杨献珍一眼看穿了专案组的破绽和险恶用心,轻蔑地摇摇头说:“绝无此事。”因为杨献珍清楚地记得,自己1931年被捕后,敌人审讯他的时间总共不过五分钟,绝不会有那么多的口供材料。

专案组没能从杨献珍身上榨出“油水”,转而又去监狱诱劝安子文说,有件事等着安子文,只要安子文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国宾馆和中央首长谈话,而且汽车就在门口。

安子文问:“这位中央首长是否就是康生?”

专案组人员说:“是的。”

安子文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过刘少奇是叛徒，也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任何材料。”

1968年1月，专案组负责人又来诱劝安子文说，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头功已经有人立了。安子文若能补充证明这一点，立个二功也会有很大好处的。安子文“难道不想和老婆孩子见面吗？”

安子文说：“我不仅想同家人见面团聚，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有什么法子呢？”

这位专案组负责人掰着指头历数刘少奇4次“叛变”的经过，企图让安子文写出证明。但安子文听后轻蔑地说：“你既然都知道，那就自己写吧。”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这位负责人根据上级指示又到监狱对安子文说：“九大快要开幕了，你只要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绝不会亏待你。中央组织部长嘛，你是当不成了。中央委员还是可以当的。”

安子文如同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愤怒地答道：“我不知道！今后不用再问了！”

当专案组用手铐脚镣相威胁时，安子文从容地说：“手铐脚镣对我不起作用。不戴，我是这样讲；你们给我戴上，我还是这样讲。”

随后，安子文被正式投入秦城监狱，刑讯逼供，无休无止。据监狱提审记载，从1968年到1970年9月，安子文共被提审了324次。

1967年元旦，康生指使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组织“东方

红”的头头、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王大宾带着几十个“揪叛徒战斗队”队员直奔广州，将因病在那里疗养的薄一波押回北京。

红卫兵冲进屋里时，薄一波手中正拿着一些中央的绝密文件。这些文件既不能交给王大宾，又不能丢失。薄一波急中生智，忙冲着隔壁小院的董必武大声呼救：“董老！董老！”

年过八旬的董必武拄着拐杖赶来时，薄一波已被红卫兵按倒在地。董必武不顾红卫兵的阻拦，走到薄一波身边，接过了那些中央文件，禁不住老泪纵横。

同年2月9日，康生指使王大宾等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薄一波大会。他们给薄一波的脖子上挂着沉重的“三反分子”的大铁牌，强迫患有脊椎肥大症的薄一波低头认罪。

薄一波不等主持人宣布他的“罪名”，就昂然走向麦克风大声说：“同志们，我要讲话。我不是叛徒，是共产党员！”

王大宾冲过去一把抓住薄一波的头发，把他拽开，对着麦克风狂喊：“他胡说！他是从国民党的狗洞里爬出来的。”

薄一波又昂首争辩说：“离开国民党监狱的那个步骤，是遵照党中央指示进行的，毛主席都知道。”

这无畏的抗争引起了会场的一片混乱，批斗会无法继续进行，只开了3分钟便散会了。

会后不久，薄一波被转押到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座监狱中，无休止的批斗和残酷折磨从此开始。

这年夏天，薄一波、彭真和刘仁被押到北京长辛店二七车辆厂批斗。批斗过程中，薄一波的脊椎被打伤，直不起腰来，

疼痛难忍。于是，薄一波要求治伤。但看守人员却讥讽地说：“你们这号人还想治病？死不了就算你走了大运！”

薄一波专案组每天都要把批斗审讯的情况写一份《动态情况反映》，然后上报给康生和有关部门。1967年夏季的《动态情况反映》，记载了薄一波本人在看过的报纸上写下的自己被揪斗的情况（当时薄一波几乎每天都在报纸上作记录——编者注）。

8月7日上午，造反派准备在林业部开批判会，批判薄一波在林业上犯的“滔天大罪”。批斗的造反派说，要给薄一波一点颜色看看。每当薄一波说“记不得了”时，造反派便一阵对质呼打，紧接着又是一阵呼打。

8月7日下午，造反派在卢沟桥与长辛店之间的一个地方开会。薄一波等2点出发，3点到达，5点半开会。在开会之前，造反派即召来多人对薄一波进行武斗，来势凶猛。

造反派说：“你是干什么的？！他妈的！大叛徒！刘少奇是你爸爸！”

薄一波看着这些造反派有些无理取闹，先还答了几句，说他不是叛徒，以后就不说了。

造反派说：“好！咱们会场见！要不是毛主席说不准武斗，妈的！打死你！”

开会了，揪出的还有彭真、贾庭三。薄一波是被3个人押着的。其中一个造反派说：“给他点厉害看看，坐飞机！”

于是，两个造反派反绑着薄一波的手。后面一个人专门踢打，揪发压头。每班押他的是3个人，大约一班10分钟，共换了6班。每隔两分钟折腾一次。反扭两臂坐“喷气式”时，

造反派硬要薄一波把两腿伸直,把臂压下去,但又必须仰起头,立正。这些人轮番地揪住薄一波的头发踢打。

散会后,造反派又从台上跟打到车上。这天的揪斗,不仅使薄一波头晕眼花,更痛苦的是手腕胳膊痛得抬不起来了。薄一波受到这些踢打侮辱,开始还认为是针对自己的误会,受些折磨,也没有什么。但是,薄一波从这天看,认为党的政策似乎在变,是用这种方法把人整倒整垮。

8月23日,薄一波又被揪斗两次,上午是专案小组,下午是八机部的“斗薄大会”,“声讨”薄一波在农机战线上的“罪行”。薄一波在这4个月差不多每天都出去挨斗。截至这一天已96次了。这一周创造了一周斗争8次的记录。

8月31日下午,造反派在乒乓球场召开“揪斗彭、薄、廖、马大会”。这个月大会批斗26次,创造了月记录。

为了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薄一波忍受着无休止的批斗和审讯给他带来的折磨,用24天的时间写出了第一份长达2.8万字的材料,详细地叙述了几十个共产党员在草岚子监狱里坚持斗争的事迹,叙述了他们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出狱的经过,也叙述了他1943年在延安窑洞中向毛泽东汇报这个问题的情景。

薄一波在文章中明确地写道,他不是“叛徒”。他们这几十个同志都不是“叛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肯定了他们对党的忠诚。出狱后他向毛泽东报告过。

康生等人看到揪斗薄一波毫无进展时,立即派了3名穿军装的人,带了20多个打手,把薄一波揪到审讯桌前,严厉地宣布道:第一,他们出狱是执行了刘少奇的“黑指示”。已经

查明,刘少奇是“大叛徒”,他们执行了刘少奇的“黑指示”,当然也是“叛徒”;第二,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是怎样“勾结”的?薄一波个人为他们“卖过什么力”?要老实交待;第三,他们从国民党“狗洞”爬出来的时候,曾经感谢过监狱长对他们的“教诲”。

对康生等人进行的无中生有的诬陷,薄一波异常愤慨地驳斥说:“这完全是诬陷捏造!我坚决抗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长期在中央做负责工作,执行他们的指示,怎么说是勾结?!”

薄一波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了专案组的要求,所以遭到审讯人员和红卫兵的多次毒打。

后来,专案组在1967年9月11日写给康生的报告中说,自1967年1月以后,工交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先后对所谓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批斗100余次。专案组也重点审讯审查了其历史上被捕的问题。截至1967年9月为止,薄一波仍“负隅顽抗”,态度“极为恶劣”,“拒不认罪”,经常在会上公开反驳、顶撞。

然而,张闻天、安子文、杨献珍、薄一波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正义抗争,没有能够阻止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定性。

对此,康生曾在一次大会上欣喜若狂地说,揪出“刘少奇叛徒集团”,就击中了中国的“赫鲁晓夫黑司令部”的要害,“从政治上判了他们的死刑”,“为从根本上摧毁刘、邓反动路线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尽管康生等人用尽了一切手段,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失败

了,逃脱不了历史和人民的清算。后来,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对这一案件作出了公正的历史性的评价。

《报告》实事求是地指出,薄一波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按了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是刘少奇个人的意思,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

《报告》中说,1936年,张闻天是中央的总书记。对于张闻天的批复,应该看做是代表中央的。《报告》指出,许多同志说明,毛泽东曾向他们表示中共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

《报告》中说,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同志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在被坏人利用的年代,造反派“抓叛徒”的浪潮不仅限于鼓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而是把手伸向全国,搞乱全国,以达到一些人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早在1967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下达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文件后,毛泽东作了有关批示。江青别有用心地称,“这是小将的大功劳”,鼓励红卫兵“深挖、穷追、猛打”。从此,全国各单位都刮起了“深挖叛徒”之风。

4月14日,康生给聂元梓写信,要聂元梓组织力量,系统调查彭真、刘仁问题。聂元梓根据康生的意思,制造了诬陷

1966年被撤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和与彭真一起被撤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的材料。康生根据这些材料把彭真打成“大叛徒”，逮捕入狱。

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揭露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包庇的叛徒集团”，挖出了一些“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分子”，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通知》中说，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各地也存在着一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地进行“抓叛徒”这项工作，中央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包括5个方面：

（一）对一个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二）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其他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起干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表现，区别对待。

（三）要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

严格区别开来。

(四)各群众组织不要借“抓叛徒”的名义,进行宗派斗争,互相攻击,转移斗争大方向。

(五)有些群众组织,混入个别的叛徒、特务,应当清查,但别的群众组织,不得借此来打击这些群众组织。^①

这个规定指出了“抓叛徒”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一些过火行为有所遏制。

中共中央发出“抓叛徒”的《通知》后,“抓叛徒”运动开始在全国进入了高潮。

8月9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刊登《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的文章。文章说“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刘少奇“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指示狱中的人“自首叛变”的。而这些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盗用党中央的名义”作出的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这批“叛徒”出狱后,又是刘少奇“欺骗毛主席、党中央”,“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起来”。

两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这样,“抓叛徒”之风开始席卷全国,难以遏阻。

并不了解过去年代革命斗争复杂性的红卫兵们,用他们纯真的“革命观念”去核查材料,挑出了大量“历史问题”。康

^① 《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40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生、江青等人借机又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案”、“东北叛徒集团案”、“南方局叛徒集团案”等重大冤案。

康生等人捕风捉影，诬陷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的一百余名中国共产党干部“投敌叛变”，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冤案。

早在1942年9月，盛世才炮制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将中国共产党派往新疆协助工作的陈潭秋、毛泽民等190名干部全部拘禁，于1943年春关进监狱。这些干部绝大多数表现很好。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秘密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编者注）。

陈潭秋（1896—1943）原名澄，字云先，湖北黄冈人。1920年秋，陈潭秋与董必武等发起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陈潭秋于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1923年2月参加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秋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1926年10月任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长，1927年1月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5月被选为中共五届中央候补委员。

1928年以后，陈潭秋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3年8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粮食部长。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陈潭秋留任中央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陈潭秋于1935年8月到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9年5月回国以后化名徐杰，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42年秋，陈潭秋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于迪化被秘

密杀害。

毛泽民(1896—1943)字润莲,湖南湘潭人。毛泽民于192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3月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消费合作社经理,1925年4月到广州参加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8年到天津担任中共中央“交通”,兼管顺直省委的财务。

1931年7月,毛泽民到瑞金,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1932年3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在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时任总供给部副部长,1936年初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1938年化名周彬,到新疆作统战工作,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代理厅长、民政厅厅长。毛泽民于1942年9月被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迪化。

林基路(1916—1943)原名为梁,广东台山人。林基路于1933年初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3月,林基路到新疆作统战工作,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于1939年1月调任阿克苏教育局长,6月任库车县长;1942年1月调任南疆乌什县长,9月被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27日,林基路在迪化被秘密杀害。

1946年,张治中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时,在他的帮助下,经中共中央营救,除公开叛变的10多人外,马明方等131人无条件集体释放,并于同年6月回到延安。

在康生、江青等人1967年掀起所谓“揪叛徒”之风后,这批从新疆回延安的同志,除已故、下落不明的以外,共90人陆

续在各地遭到揪斗,并于同年11月几乎全部立案审查。康生诬陷他们“投敌叛变”,唆使专案人员大搞刑讯逼供,使马明方等92名同志重陷冤狱达8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马明方等26人被迫害致死。

1967年12月,陈伯达在唐山召开的党组织会议上说,冀东地区的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

由于陈伯达的肆意煽动,当年在冀东工作过的一大批中共党员、干部和群众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残酷斗争。2.26万多名老党员、老干部遭到打击迫害,其中2955人被迫害致死。冀东冤案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1968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在送审的关于“深挖叛徒”的工作情况报告上说,全省各级革委会充分依靠和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积极开展了“深挖叛徒”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初步发现,“叛徒特务”的线索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有的在中央干校、北京公安部门,有的则“混入”了军事机关。

对此报告,毛泽东批示康生与“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商讨后转发全国各地。

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时,作出关于“深挖叛徒”工作的批示。

批示的主要内容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同伙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

(尚昆)、安(子文)、萧(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①

此外,批示中要求各地“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

这个批示传达后,全国随即形成了一个由群众组织“清查干部历史”的运动。

2月初,康生同江青等人在听取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核心组汇报时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一定要揪”。“开始揪得宽点,不要怕”。

“内人党”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各族人民的统一战线组织。1925年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努力达到内蒙古的行政区域自治、消灭封建制度、废除蒙古地区现行虐政等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并在张家口设立了领导机关和党校,组织了人民革命军。

1927年,掌握领导权的白云梯、郭道甫等叛变革命,内蒙古的人民革命运动遭到残酷镇压,革命者被迫转入地下活动,领导机关也迁往乌兰巴托。1933年,在乌兰巴托的机关和代表被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取消,该党也不复存在。

在康生、江青等的授意和支持下,内蒙古地区迅速掀起所

^① 丁惠永:《中国百年大写真》,第85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

谓挖“内人党”、揪“坏人”的浪潮。

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在电台广播,张贴布告,勒令“内人党”党员限期到各级革委会登记,否则,一律按敌我矛盾处理。此时,许多曾参加过该组织的人几乎都登记了。但是,康生等人仍不满意。他们把深挖“内人党”作为内蒙古地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内容和重点。有些地方的整个党组织都被说成“内人党”。

这个运动完全是捕风捉影、随意捏造罪名,大搞逼供信。

一年以后,当所谓深挖“内人党”运动已深入到基层,严重后果已十分明显的时候,康生仍然要求继续挖下去。

康生在1968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说,一定要把“内人党”“从组织上搞垮,政治上搞臭”。康生还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于是,部队中也开始挖“内人党”。结果越搞越凶。

这个运动使一大批干部、群众惨遭迫害,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对内蒙古人民危害深重。这是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一手制造的一个重大冤案。

在这个重大冤案中,在一年多的时间内,1.6万多人被迫害致死,因此案而受到牵连的人达34.6万多人。

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冤案必将得到彻底平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正确路线领导下,这些冤案终于得以平反,真理以其不可战胜的力量最后战胜了邪恶。

所谓“伍豪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

炮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拿来诬陷和攻击周恩来的一桩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罕见的反革命阴谋事件。

1932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用周恩来的一个别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以及国内其他地方的一些报纸上,刊登了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通过这则启事,达到诬蔑周恩来和瓦解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的目的。

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3次“围剿”,都在红军的反“围剿”中遭到惨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抗日,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企图集中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他们积极准备第四次“围剿”,同时阴谋一举消灭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

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搜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周恩来。周恩来这一时期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中共中央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的这一工作对国民党反动派威胁很大。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伪造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政治背景。

原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于1931年4月5日在汉口被捕叛变,因而使国民党反动派有了一举破坏中共中央的可能。这时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党员钱壮飞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

周恩来得知此消息后,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立即采取转

移中共中央机关、改变负责人住处、改变党的工作方法等紧急措施,使局势转危为安。

同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叛变,周恩来又采取了果断措施稳定局势。这样,周恩来一再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叛徒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阴谋。国民党反动派知道粉碎他们阴谋的真正组织者是周恩来,对周恩来恨之入骨,便于9月1日下令“悬赏通缉”周恩来等,继而又于11月底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用金钱收买叛徒告密。但这些阴谋均告无效。

于是,国民党反动派于1932年2月刊登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其目的是想在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中国共产党涣散解体。

根据国民党中统特务黄凯1953年供认,当时,他接替杨登瀛,出任中统驻上海特派员。这一《启事》是他伙同当时的中统总部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启事》由张冲执笔,由他派人送往上海各报刊载。

1932年2月15日,黄凯先派人将《启事》送给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申报》,作为广告刊登,铺保是与当时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上海市商会理事王延松有密切关系的某钱庄,并盖有该钱庄的印鉴,手续完备无缺。

当时的《申报》广告部律师黄品堂认为脱离共产党的有243人,却只有一人具名,其中必有问题,决定暂不刊登。

黄凯又派人将《启事》送到当时经济困难的《时报早晨号外》刊出。

1932年2月16日,上海的《时报》上登载的一段启事这

样写道: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掣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下之中国共产党!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①

2月17日,《时报早晨号外》又刊出了这一《启事》。

在国民党反动派刊登这个伪造的《启事》两个多月前,周恩来就已经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周恩来于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经福建永定进入苏区,12月15日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

这时,苏区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跨有18个县,纵横数百里,人口有240多万。中央红军早在这年9月就粉碎了国民

^① 张静如:《关于伍豪启事》,《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一辑,第1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党第三次“围剿”，共歼敌3万多人。12月14日，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赵博生、董振堂领导下，举行了宁都起义，更增加了红军的力量。

周恩来来到苏区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1932年1月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研究了苏区的肃反工作，通过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提出肃反一定要防止扩大化和简单化。

2月3日，周恩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一文。2月7日，周恩来出席在瑞金召开的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两天后，周恩来又在《实话》报第一期上发表题为《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与党的目前紧急任务》的文章。2月19日，周恩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

由此可见，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启事》在上海各报刊出时，周恩来已不在上海。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迅速地采取了各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造谣诬蔑。

《申报》在上海的影响最大，中国共产党和申报馆有一定的关系。2月18日，党组织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党组织为周恩来代写的《伍豪启事》，以否定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启事》。

但是，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看后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启事》。同一天，上海《新闻报》刊登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2月19日,国民党设在上海的新闻检查处派人到申报馆质问为何不刊登这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散发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传单。这一传单由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

这份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2月20日、21日,《申报》被迫也刊登了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启事》。因此,党组织又派人于当日上午到申报馆询问,已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何不登《伍豪启事》?申报馆广告处律师回答说,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启事》。

几经交涉后,当时的申报馆广告部主任王尧钦与经理马荫良,找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商量。史量才、陶行知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对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启事》给予答复。

2月22日,上海《申报》发表了这样一则《启事》:“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①

这是当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

^① 张静如:《关于伍豪事件》,《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一辑,第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

正如陈云后来在1972年6月13日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小组会上指出的那样：“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欺骗。”^①

在这次小组会上，陈云还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②

这条《启事》也是发人深思的。按照一般情况，报馆不同意登广告，答复本人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公开答复。从时间上看，这个《启事》和伪造的《启事》差一天刊出，这条《启事》在这里的作用有两个：其一使人得知有两个“伍豪”，因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已在《申报》登出，而又说“伍豪”有个《启事》未能刊出，可见后个“伍豪”与前个“伍豪”不是一个人；其二使人明白，后一个“伍豪”的启事是对着《时报》已登出的“伍豪”《启事》来的。

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中共临时中央所代写的另一则《伍豪启事》。当时，中共临

^① 迟爱萍：《伟人之初：陈云》，第10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下卷，第170—1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时中央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在党内澄清敌伪《伍豪启事》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叛徒顾顺章,提高全党的认识。这个《启事》的全文是这样的:

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国民党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事实,这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劳苦大众所共见,把东三省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把中俄合办的中东路双手奉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使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得以利用东三省与中东路以进攻苏联的是国民党政府,在上海事变中,在英勇的十九路军士兵背后,同帝国主义做买卖的也是国民党政府!所以不打倒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不创造数万万中国工农群众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正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本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①

① 张静如:《关于伍豪事件》,《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一辑,第1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这一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中共临时中央评论文章，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卑鄙可耻手段，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评论文章指出了国民党的挑拨对于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关系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强调了周恩来与中共其他党员一样都是值得信赖的。

中共临时中央在《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一文中这样写道：

“国民党反革命派，在与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运动斗争中，不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理论上，都受到可怜的悲惨的失败之后，却企图以造谣中伤伪造文件来破坏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欺骗蒙蔽和愚弄劳苦群众！”“党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引起敌人极大的惊慌。敌人的胡叫‘中国共产党总崩溃’的可怜的呼号，被党和苏维埃运动的迅速生长击得粉碎。破产了的濒于死亡的反革命派，虽用尽一切白色恐怖手段，与天下最无耻的挑拨，都不曾丝毫损害党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与劳苦群众对党的坚固热烈的信仰。逼得这些破产的反革命派不能不在纸头上凭空捏造事实，来安慰自己，欺骗群众。正如蒋介石在三次围剿中受了红军铁拳的猛击之后，不能不在报纸上大发捷报以安慰自己，欺骗群众。”“伍豪同志将与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都一致地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共产国际及中共领导之下，以坚决英勇的打倒

国民党的国内战争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来回
答敌人的诬蔑与造谣。”^①

接着,中共临时中央及时地采取了更加明确有力的重要
措施。

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诬蔑
的丑恶嘴脸,公开地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中共临时中央以
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律师代登《启事》,进
行公开辟谣。

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中国律师是难以承办这件事
的。中共临时中央通过一定关系,找到了法国大律师巴和。
巴和在当时的法租界大马路(现金陵东路)四十一号开有律
师事务所。

巴和为人正直,有正义感,是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在上海
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又是《申报》聘请的常年法律顾问。中
共临时中央认为,请他出面,《申报》一定刊登。

3月4日,《申报》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出了《巴和律师代
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说: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
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
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

^① 王光远:《浦江魂——白色恐怖下的周恩来》,第217页、218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7月版。

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做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①

这个《启事》，在措词上非常巧妙。它明确向全社会宣告，用“伍豪”名字的“周少山”，与那个登脱党《启事》的“伍豪”毫不相干。这样，一下就把那个假《启事》打回去了。既澄清了事实真相，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又合乎国民党的法律，使敌人抓不到把柄。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合法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叛徒顾顺章的回击是成功的。它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提高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本质的认识，使他们的卑鄙目的无以得逞。

对于中共临时中央的同志所作的一切，远在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并不知情。

1932年2月，当这一消息传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

^① 张静如：《关于伍豪启事》，《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一辑，第1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这个由毛泽东亲自署名的布告中说：

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而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报馆对于伍豪等的更正启事（照他们的章程纳广告费的），竟完全拒绝登载。这些报馆显然是利用反革命的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帝国主义工部局的庇护，而积极实行这种危害革命反对工农兵士群众，并且间接帮助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民众革命的行为。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最高革命法庭根据这个理由，宣布时事新报时报申报以及一切登载所谓“伍豪等”的启事而又拒绝登载更正启事的报馆总经理的死刑！^①

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决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据国民党特务黄凯

^① 毛泽东：《对北京大学一学生反映“伍豪启事”来信的批语（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63—4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于1953年6月供称,伪造《启事》“丝毫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国民党反动派演出的伪造《启事》这一丑剧,最后不得不以毫无结果告终。

由此可见,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反动派炮制出来用以造谣、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本人的。这件事情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伪造《启事》者黄凯也曾经有过亲笔招供。就连国民党的有关学者也承认这个《启事》是伪造的。

李昂于1941年在《红色舞台》一书中说,顾顺章捏造了“伍豪”的名字,在上海的《申报》上登了一个“××等×百×十人脱离中国共产党启事”,这里的数目字作者说他已记不清楚了,只得代之×符号。

李昂在书中说,这个《启事》的内容是说伍豪等因目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估计错误”,因而“自动脱党”云云。在全中国报纸中广告最多的《申报》,刊载了这样一条小小的《启事》,在社会上并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中级以上的干部都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党名”,正和后来的秦邦宪的博古、陈绍禹的王明、张闻天的洛甫一样。“周恩来脱党了”,这个消息像从吴淞口外吹进来的飓风一样,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内吹动了好几天。渐渐的,中国共产党内证明了这个《启事》是伪造的。

李昂说,必须指出,顾顺章的这一个办法并不能打击到中国共产党,对于周恩来也丝毫无损。

然而,“伍豪事件”发生30多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等人妄图再次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对周恩来进

行人身攻击,置他于死地,以扫除他们篡党夺权不可逾越的障碍。

1967年初,以天津南开大学为主的红卫兵组织的“抓叛徒战斗队”,抓出了薄一波、安子文等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后,江青、康生等人欣喜若狂,把他们召到北京,并在全国开始大抓“叛徒”。

红卫兵们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红卫兵于5月13日将载有这一伪造《启事》的报纸抄件报送给江青。

江青收到这份报纸抄件后,如获至宝,不作任何调查研究,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5月17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3人写了一封信,把伪造的《启事》抄件送给他们3人。江青还在信中阴险地说,红卫兵“查到了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

康生对这件事本来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因为当时他本人就在上海,而且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康生还不只一次地讲过此事。康生并于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两次在有关“伍豪启事”的材料上批示说,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早已经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件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

但是在江青等人妄图借端生事时,康生却缄口不言。在接到江青的信后,康生没有作任何的表态。

这封信实际上是逼周恩来做出交待的通牒。然而,面对

这个挑衅，周恩来迅速、果断地予以反驳。

在接到江青的信后，周恩来当即查阅了上海的旧报，并亲自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写了一份《大事记》，连同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启事》、顾顺章的《紧要启事》、王世德的《紧要声明》等一并送交毛泽东。同时，周恩来还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周恩来在信中说：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古问题，并同内蒙古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日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否认，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绝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月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月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做定夺。^①

毛泽东对周恩来送来的信和材料进行了认真阅读,认为这件事情早已经清楚,没有必要再掀起波澜。

于是,毛泽东批示将周恩来的信和有关材料送给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阅存。毛泽东并且要求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大家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以便让后人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

周恩来在给毛泽东写信的当天,还在给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②

1967年5月29日,毛泽东又针对正在掀起的“炮打周恩

^① 王光远:《浦江魂——白色恐怖下的周恩来》,第221—2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7月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9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来”的浪潮，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第二天，周恩来将毛泽东批件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阅”。

直到这时，对所谓“伍豪事件”真相本来就十分清楚的康生才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这场闹剧终于被迫悄悄收场。

但是，江青等人仍然不肯就此罢休，继续派人搜集有关材料。

同年10月，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对吴法宪等亲信说，他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有一个口袋是周恩来的。江青并叫吴法宪继续搜集。

在“中央文革小组”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抓叛徒》简报中，也把“伍豪启事”列为专案之一。上海档案馆的造反派头头刘和德于1968年5月把搜集到的诬蔑周恩来的材料密封起来，并交给了吴法宪。

深知江青等人居心叵测的周恩来，对江青等人的阴险用心也有所察觉。因此，除对此作了严正声明外，周恩来又在1967年10月和12月，先后将载有伪造“伍豪启事”的报纸和他1967年5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以及毛泽东的批示拍照存档。

1967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六四〇六信箱一名学生又为“伍豪事件”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1968年1月10日,周恩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通知她自己已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周恩来在信中说:“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①

1968年5月8日,毛泽东又在一次讲话中说:“像许世友这样60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

据1971年9月20日谢富治家属记载,谢富治在死之前说:“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相。”^②

1972年2月18日,康生口授了一个记录,出面证实:“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同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汇报会上讲了讲这个问题。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问题被列入了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议程。

参加了这次会议的陈云,在6月13日的发言中证实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②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伍豪事件”的原委。同一天,陈云还写了书面发言说:“我现在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6月23日,周恩来在会上专门报告了这个问题,再次说明这是国民党一种造谣诬陷。

整理讲话录音时,邓颖超亲自拟定了题目《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同志1972年6月23日晚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报告》,地点写的是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周恩来在作报告时说,这个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提出来的。当时已向毛泽东报告了,并且毛泽东有过批示。后来因为没有机会,没有向更多的同志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一次开会,开始毛泽东就嘱咐他,要他讲一讲,给300多位同志讲一讲,录音下来,将来成为党的档案,保存起来。因为这个诬蔑的性质,它是直接用的笔名“伍豪”,必须要说清楚。

会议根据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将周恩来的讲话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材料,都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同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避免以后有人利用它制造事端。

但是,会后,周恩来的讲话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却被搁置下来未办。而且王洪文于当年7月间叫人继续从上海档案馆寻找“伍豪的材料”。上海档案馆“查到一份伍豪等人的启事”,于7月17日报王洪文。王洪文批道:“此件先存敬标同志处,再等一个时期处理,可能中央有指示。”

1972年冬,上海有人证明1932年2月为驳斥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伍豪等启事”而设法刊登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的情况。启事内容说“报载事实不符,谣传不足凭信”。然而,这一材料被张春桥、徐景贤看后扣压了,没有报告中共中央。这些都说明江青一伙的陷害之心始终不死。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因病情加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要来了1972年6月23日报告的讲话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亲笔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和报告日期,并写上了当时签字的时间和环境是“1975年9月20日,于进入手术室之前”。这说明周恩来对此事十分关切。

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又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了,这件事竟成了他生前未了的遗愿。

周恩来一生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党性纯洁,立场坚定,不能容忍敌人的诬蔑对他的玷污,不能容忍这种诬蔑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不良的影响。为了保护党的荣誉和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周恩来为澄清所谓的“伍豪等启事”做了多次努力。经过他的努力,毛泽东的说明和陈云等的证明,事情已经完全清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党史工作者对“伍豪事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确凿的证据,使这一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七·二〇”事件。这是林彪、江青等人掀起“揪军内一小撮”阴谋活动的高潮。

在“七·二〇”事件爆发的当天上午,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密信。林彪写好后,又将信转交江青过目,江青也随即在信上签了名。

随后,林彪命其亲信、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从北京坐专机飞往武汉,亲自将信交给毛泽东。邱会作临行时,江青叮嘱道:“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此信用专人、专机运送,是因为据说林彪获悉“陈再道要搞兵变”,“很担心主席的安全”,所以要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

当天下午2点10分,邱会作一下飞机,就要求见毛泽东。下午五点多钟,毛泽东才在东湖宾馆接见了邱会作。毛泽东边看信边笑,将信将疑,没有下定离开武汉的决心。

毛泽东问邱会作:“你对当前的形势怎么看?”

邱会作回答说:“武汉的天已不是主席的天了!”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又问:“林彪了解这里的情况吗?”

邱会作回答说:“他很了解,很关心主席的安全。”

毛泽东对林彪的关心似乎很感兴趣,问:“他怎么关心?”

邱会作认真地说,二十五军的3个步兵师正从九江、开封过来,另外,十五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孝感机场,正运动到黄陂,离这里40里。李作鹏让东海舰队的3艘炮舰,从长江口开进来,预计当晚可以到达汉口口岸。

听着邱会作的汇报,毛泽东扔掉手里的烟头,意味深长地

说：“林彪真的有一手！”

接着，毛泽东又转过身问旁边的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呢？”

杨成武答道：“林彪已调一人进京了。”

毛泽东并不相信所谓“陈再道搞政变”的流言。他还针对街上的大游行评说道：“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

周恩来惊悉武汉出事后，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当机立断，连夜安排毛泽东飞往上海，然后自己带了两架飞机，亲自飞临武汉。

直至晚上8点多钟，在众人的劝说下，毛泽东才决定前往上海，杨成武等人随行。

林彪胁迫毛泽东离开武汉之后，却又反咬一口，将罪名扣在陈再道等人头上，以此来打击武汉军民。

周恩来于7月22日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开会，希望尽快稳定武汉局势和武汉军区的领导班子。但是，李作鹏和刘丰等人有意作梗。

同一天，李作鹏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汉单位发电报，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受李作鹏操纵的东海舰队还发表了《严正声明》，杀气腾腾地提出：“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刘丰还在电话里对张昭剑说，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再道、钟汉华的问题，“七·二〇”事件是林彪派邱会作来处理的，武汉军区“有鬼”，张昭剑随即宣布二十九师脱离武汉军区，并扬言要把军区领导“统统打倒”。

7月22日下午,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林彪、江青组织数十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他们。本来,周恩来坐的飞机比谢富治和王力坐的飞机晚起飞半个小时,但林彪、江青为了扩大声势,让周恩来坐的飞机提前降落,逼周恩来参加他们搞的欢迎仪式。

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听取谢富治的汇报。

谢富治汇报后,林彪作出决定,把“七·二〇”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林彪还决定处理“七·二〇”事件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调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进京;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林彪的这个决定,把周恩来处理“七·二〇”事件的打算全部推翻了。

7月23日凌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三遍播放谢富治和王力“胜利回京”的消息。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也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迅速“搞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编者注)来声讨‘七·二〇’事件”。

一时间,“江城上妖风呼啸,扬子江面黑浪滔滔”的传单小报,飘至全国各地。

7月24日凌晨3点多钟,陈再道、钟汉华一行飞抵北京。他们刚住进北京复兴门外的京西宾馆,就遭到数以万计的北京文艺口造反派成员的围攻。造反派将京西宾馆围个水泄不通,高呼“打倒陈再道”、“向陈再道讨还血债”、“不揪出陈再道决不收兵”等口号。

周恩来在得知“中央文革小组”怂恿的造反派包围、冲击京西宾馆和欲揪斗陈再道等人的消息后,令傅崇碧等立即赶往现场。周恩来对傅崇碧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钟汉华同志。”

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很是纳闷,陈再道等人刚到北京,是谁这么快就走漏了风声。

警卫战士在门口挽起胳膊,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均无济于事。造反派已拥到楼前,情况十分紧急。

傅崇碧急忙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很快作了3条指示:冲京西宾馆是错误的;必须马上退回去;他本人可以接见他们。

傅崇碧等人重返京西宾馆,用广播反复播念周恩来的指示,并找造反派头头做工作。但是,这些措施仍不奏效。

傅崇碧急中生智,当即命令卫戍一师副师长:“把冲进楼里的人赶出去!把陈再道等人锁进电梯里,切断电梯电源,出了问题,拿你是问!”这时,造反派已冲进楼里搜人了。

傅崇碧猛然想到,要解围,必须请和这些造反派组织的关系密切的戚本禹、谢富治不可。傅崇碧又请示周恩来出面。

周恩来派秘书将谢富治、戚本禹等人“请”出来后,严肃地说:“现在,造反派冲进了京西宾馆,我写了意见,叫卫戍区的同志去做工作,他们根本不听。好了,这事情我不管了!人要是被揪走了,你们向主席交待!”

谢富治、戚本禹见周恩来发了火,连忙答应去京西宾馆做造反派的工作。他们一去,造反派便很快“撤走”了。

周恩来事后问傅崇碧:“陈再道同志现在在哪里?”

傅崇碧回答说:“锁在电梯里,电梯断了电。”

周恩来苦笑着对傅崇碧说：“你这个办法好。”

在文艺口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不久，三军造反派在林彪、叶群的指使下又立即包围了京西宾馆。他们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

叶群则亲自布置将“打倒陈再道、钟汉华”和“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标语贴满北京街头。叶群还邀请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去京西宾馆“看热闹”，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数十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转悠，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7月26日上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到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在京负责人。

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时任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编者注）、蔡炳臣（时任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政委——编者注）、巴方挺（时任武汉市人武部政委——编者注）5人受审似地站在第一排。

会上，谢富治首先发言。他煞有介事地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接着，吴法宪发言。吴法宪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人民解放军的“败

类”。

吴法宪还说,蒋介石办不到的事,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周恩来实在听不下去这些胡言乱语,就有意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

然而,吴法宪说得更卖力了。他说,徐向前早在2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吴法宪为了攻击徐向前,便说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听到这里,徐向前气愤地说:“这个话我讲过,但是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说完,徐向前就写了个条子给周恩来,然后愤然离开会场,以示抗议。

站在第一排的陈再道据理申辩。他大声地说:“有人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陈再道的话还没有说完,吴法宪就领着刘丰等人冲过来,扒掉陈再道等5人的领章帽徽,对他们进行了一顿拳打脚踢。

对此,周恩来严肃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而江青当场表扬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派的精神”。

会议从中午开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接着开。

低头弯腰站了六七个小时的陈再道实在熬不住了,便对康生喊道:“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60岁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陈再道意在让他们坐下来开会。可是话还没有说完,康生就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

席叫你是同志就不是反革命了。”

接着，康生又危言耸听地说：“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经康生这么一说，陈再道他们“比反革命还要反革命”了。

就这样，讨论会变成了斗争会。

第二天，陈再道和钟汉华就被撤销了职务，“倒陈”有功的刘丰当上了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由于一些造反派无中生有地说徐向前是“七·二〇”事件的“黑后台”，是陈再道的“黑后台”。于是，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声和大幅标语。

在首都所谓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挺的同时，大街上游行的人不断呼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许多正直的革命者，反对打倒徐向前。

此时，叶群则公开出面，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

于是，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指使的造反派数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造反派们翻墙进入院内，窜入卧室和办公室，把整个楼内翻腾得乱七八糟，又强行拿走了徐向前亲自保存文件的五屉铁皮柜。徐向前本人的书信、照片等物也被肆意抄走。造反派们还在徐向前住处的墙壁上、走道的地板上、台历上、茶几上，到处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

标语。

徐向前的秘书,立即将上述情况报告了总理值班室。周恩来指示:“(一)所有进到徐向前同志家的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徐向前同志家的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北京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①

周恩来的这三条指示,使徐向前的家属和工作人员从危难中得到解脱,被抄走的文件、资料和信件,才陆续被找了回来。

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无情的折磨,使徐向前的身体越来越难以支持。徐向前的子女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暗暗为他的健康担心。

徐向前身经数百战,什么苦头都吃过。红军过草地时,徐向前来回走了三次。严重的路线斗争,徐向前也经历过。徐向前认为,所有的惊涛骇浪都不可能使他低头。他依然冷静、安详地面对着眼前的处境。

在这样的环境下,徐向前仍然教育子女,并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担心,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我看天塌不了!”

这时,惟一使徐向前为难的是,要检查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检查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以后所犯的所谓“方向路线错误”。怎么检查,徐向前觉得这实在说不清楚。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中央文革小组”认为，武汉军民反了王力、谢富治，就必须对其进行“反击”，而把“百万雄师”打成“反革命组织”，打倒陈再道等人，远不能息心头之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求“取得更大的成果”。

随即，“中央文革小组”把持的《红旗》杂志于8月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社论。《社论》提出了一个蛊惑人心的概念——“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掀起了“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浊浪。

各地红卫兵小报纷起响应，各地造反派的斗争矛头也直指当地驻军领导人。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夺军权”风潮。

“揪出××地区的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标语迅速出现在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成都、沈阳等地。

各地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抢劫枪枝弹药、挑动武斗的恶浪出现了高涨。

在“声讨七·二〇事件”、“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冲击下，全军许多领导干部被打成“陈再道式的人物”，戴上了“军队一小撮走资派”的帽子，被批斗、监禁、迫害，甚至连公社人武干部、大队民兵干部、也被打成“陈再道式的小人物”。

武汉军区的独立师被打成“叛军”。林彪还亲自下达命令，取消了这个部队的番号、代号，并将其撤离武汉进行整训改编，在东湖宾馆担任多年警卫任务的部队，也被武装押送到劳改农场。

紧接着,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等人被打成“七·二〇”事件的“黑后台”,惨遭迫害。

徐海东,湖北黄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徐海东参加过北伐战争及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徐海东历任黄陂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兼党代表,补充第六师师长,鄂东警卫二团团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第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副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代书记,红十五军团军团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与程子华等一道率部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徐海东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徐海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5年,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江青一伙迫害,于1970年3月25日含恨去世。

彭绍辉,1906年出生,湖南湘潭人。1928年,彭绍辉参加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五军大队长、团长、师参谋长、兴国模范师师长、少共国际师师长、红六军团参谋长,并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彭绍辉曾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教导团团长,三五八旅旅长,晋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第七分校校长。彭绍辉还参加了开辟和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彭绍辉曾任吕梁军区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七军军长。建国后,彭绍辉历任

第一野战军参谋长、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委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战术研究部部长、中央军委委员，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55年，彭绍辉被授予上将军衔。1978年4月25日，彭绍辉逝世于北京。

很明显，林彪就是想通过“揪军内一小撮”活动，将反对他的力量全部打下去，为自己攀上权力顶峰扫清道路。事实胜于雄辩，更胜于狡辩，面对血淋淋的事实，毛泽东拍案怒道，“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大毒草”。

接着，毛泽东又在林彪送审的文件上划掉多处“军内一小撮”字样后退回林彪，并且批示“不用”。知道这个消息后，林彪、江青等极为恐慌。

叶群立即叫其儿子林立果写信给江青，谎称“红小兵”文章中原本没提“揪军内一小撮”，是后来别人加进去的。叶群还将毛泽东退回来的文件悄悄地锁进了保险柜。

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更是出尔反尔，串通一气，将责任完全推给不久后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

由于毛泽东及时觉察，林彪、江青等企图通过“揪军内一小撮”活动打倒一大批军队老干部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由于林彪等人危言耸听地说陈再道“要搞兵变”，并利用手中的大权对武汉军民进行“反击”，诬称陈再道是“七·二〇”事件的“罪魁祸首”，将“百万雄师”诬称为“百匪”，将武汉军区独立师打成“叛军”予以解散，许多无辜的群众被称为“百匪家属”、“叛军家属”，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还有的被打死、打伤，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黑浪，到处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造成了极其严

重的后果。

据湖北省委统计,湖北省在“七·二〇”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军民多达 18.4 万余人,仅武汉市就被打伤打残 6.6 万余人,被打死 600 余人。

后来在“批林批孔”期间,江青在广州见到钟汉华时,竟假惺惺地说:“我对不起你,我也是‘上了林彪的当’。他是副主席,他上天安门,我也跟着上了天安门。”

江青还说,林彪是想一箭双雕,通过“七·二〇”事件,既打倒陈再道,又谋害毛泽东。江青还假惺惺地要钟汉华转告陈再道,向他“道歉”。江青认为用这些话就可将自己的罪行一笔勾销。

林彪、江青等人借“七·二〇”事件大作文章,以达到他们“揪军内一小撮”的罪恶目的。这样,他们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扫清了道路。然而,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极力阻止下,林彪、江青的阴谋必然归于失败。

与此同时,林彪于 7 月 25 日提出“要战斗! 要突击! 要砸烂总政阎王殿”,并且给当时所有的总政领导扣上“阎王”的帽子。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和几十名部长以上的干部都遭到诬陷、迫害,长期被关押、审查,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机关干部及其直属单位的干部被赶出了总政治部,从而制造了“总政阎王殿”这一冤案。

8 月 7 日,身为公安部部长、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出要“砸烂公、检、法”的荒谬主张。由此导致全国公安、检察、法院等国家机关遭受到严重冲击,使社会秩序失去控制,

“打、砸、抢、抄、抓”的现象更为严重。

林彪、江青等人通过“砸烂公、检、法”，大肆诬陷、迫害公检法部门的广大干部。在公安部，仅谢富治伙同康生制造的所谓“以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一案，即有250名干部、工人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走资派”，47人被捕。除谢富治本人和一名兼职副部长外，其他副部长都被逮捕、关押，甚至被迫害致死。

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各级公、检、法机关的干部、民警，受打击迫害的多达3.44万多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有1100多人，打伤致残的3600多人。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10人，无一幸免，处级以上干部有一半被打成各种“敌人”。

在此期间，林彪、江青等人见周恩来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开始把手伸向周恩来。

1967年七八月间，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北京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和大字报。这些传单和大字报的标题是《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责问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还我战友》、《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

当时，广大群众看了十分气愤，纷纷揭发“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革命罪行。“五·一六红卫兵团”是北京一些青年学生6月17日建立的人数很少的小组织。他们受极“左”思潮影响，发表反对周恩来的言论。

毛泽东为了抑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打击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于1967年9月决定

批判和打击“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会议,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坚决取缔“五·一六红卫兵团”这个反革命组织。

实际上,从8月下旬起,“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就已被冲垮,大部分成员被抓。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时大讲反“五·一六红卫兵团”的问题。

姚文元在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提出了揪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问题。

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提出:

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图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①

毛泽东在审阅此文时指出,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

^①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人民日报》,1967年9月8日。

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判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但在全中国范围内掀起反“五·一六”运动,又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出现了极其混乱的情况。林彪、江青等人本来是罪魁祸首,这时却以此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两派互揪对方的所谓“五·一六”分子,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遭到打击。

到1968年,为清查“五·一六”分子,中共中央又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在清查中,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指责对方为“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情况混乱不清,最后不了了之。

1969年5月3日,毛泽东在谈到“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问题时说:“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其他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①

1970年2月,毛泽东再次谈到清查“五·一六”问题时说:“反革命‘516’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②

^① 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② 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通知》。《通知》中说,各地要继续抓紧开展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有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

《通知》也提出,要防止扩大化的倾向,但同时强调,反革命秘密组织绝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因而,《通知》鼓励人们去抓更多更顽固的“反革命”。

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界限,全国各地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逼供信,“五·一六”的问题越搞越大,越搞越搞不清。

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建立了“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专案联合小组共13人。吴德担任专案联合小组组长,李震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中、迟群、王连龙、李稻、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建民为组员。

“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成立后,为统筹清查“五·一六”案件作了大量的工作。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扰和破坏,这一工作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是陶铸赠给妻子曾志的七律诗的最后两句。这两句诗也反映了陶铸的伟大品格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态度。

陶铸,又名陶际华,号剑寒,化名陶磊。1908年1月16

日出生于湖南祁阳县石洞源榔树村。陶铸早年当过店员，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陶铸参加南昌起义，在叶挺部队任连长，后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工作，参加了广州起义。

1928年春，陶铸回到湖南，担任中共祁阳县军事委员，曾在唐生智部从事兵运工作。1929年秋起，陶铸担任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

陶铸还曾经组织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建立闽西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1933年，陶铸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同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且判无期徒刑。在狱中，陶铸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陶铸经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往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陶铸于1938年冬赴鄂中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参与开辟鄂中游击区。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1940年，陶铸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

1945年，陶铸又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南进，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地区。先后任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兼辽西、辽北军区政委，组建地方部队，领导土地改革，参加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947年8月，陶铸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辽沈战役后担任沈阳市委书记。平津战役中，陶铸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身份进入北平，与傅作义部代表谈判。

北平和平解放后,陶铸又负责整编傅作义部,领导南下工作团的工作,1949年3月担任第四野战军(5月兼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陶铸担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秋调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领导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斗争。1951年后,陶铸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陶铸于1955年担任广东省省长兼广东省委书记,1956年9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1957年起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曾兼暨南大学校长、华南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1960年起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

1965年1月,中共中央调陶铸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1966年6月,在广州工作了整15年、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经邓小平推荐,离广州赴北京工作。时值“文化大革命”动乱伊始,陶铸受命于危难之际,就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取代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

在同年8月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安排,陶铸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后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由于陶铸长期搞地方工作,对中共中央内部的情况很不了解;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也仅仅为一般的工作关系;再加

之陶铸性情直率,敢于“放炮”,因而江青曾对陶铸寄予希望,认为陶铸将是她拉拢的重要人物。陶铸被江青视为日后可用来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选。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又先后主持召开了几次中央政治局的生活会。会议的内容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江青曾在会前私下找到陶铸,要他在会上“打头阵”,“炮轰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以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而婉辞加以拒绝。在这几次生活会上,陶铸从头至尾都没有发言,不肯给“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一伙当“炮弹”,甚至连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谢富治所作的发言,陶铸都没准印在会议简报上。

陶铸坚持原则,刚直不阿,坚决抵制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因而遭到林彪、江青等人的忌恨。林彪、江青等人认为,陶铸成为他们篡党夺权道路上的又一大障碍。

这年10月,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了无情的批判,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也向全党全国公布。

10月25日,知道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内情的中央组织部300多名干部群众,要求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坚持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陶铸立即阻止了这一活动。

陶铸说,中央组织部组织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刘少奇的大字报,这种作法他不赞成。

11月2日,陶铸在中央组织部讲话时又重申,他不赞成

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陶铸说，“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刘少奇被“中央文革小组”紧追不舍、处境极为艰险的情况下，陶铸说出这样的话，可想而知会有怎样的后果。

11月27日，在江青的授意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给江青写信指责陶铸。关锋在信中说陶铸“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关锋并在信中建议中央“密切监视，加以观察”。江青将信转送了毛泽东。

如果说陶铸在对待所谓“刘、邓路线”的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小组”已陷入很深危机的话，那么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又使他们加大了分歧。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眼中宠儿造反派，陶铸很是看不惯。为此，江青不时与陶铸发生矛盾。其中，争吵最为厉害的一次，是关于吴传启的事。

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传启在学部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但陶铸对此没有任何表示。

之后，在“中央文革小组”一次会议上，江青居高临下地劈头质问刚进屋的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传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陶铸解释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

江青却傲慢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你不也是国民党吧？”

陶铸听江青这么说，非常气愤，当即反唇相讥，一时说得

江青恼羞成怒。江青竟命令似地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

忍无可忍的陶铸，声色俱厉地拍案而起：“你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

仅此一句，江青便大哭大闹起来，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陶铸与江青的尖锐对立，使“中央文革小组”决意除掉陶铸。

12月4日，在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借机突然袭击陶铸。王力等人攻击陶铸用“生产镇压革命”。

之后，在12月24日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江青又质问陶铸：“为什么不许批斗余秋里、谷牧（时任主管生产的国务院负责人——编者注）？谁作梗？”

陶铸答道：“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定，是我不让斗。”

江青、张春桥闻言一起狂叫：“党内最大保皇派就是你陶铸！”

陶铸却凛然地回答：“咎由自取，我对我所作的一切负责。”

1966年底，《工业十条（草案）》通过和下达执行。但是，林彪、江青等人并未就此罢休。这场斗争的结尾是他们用阴谋手段打倒陶铸。

12月下旬，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有关会议上对陶铸继续进行围攻打击，说陶铸是“以生产压革命”的“罪魁祸首”。

12月26日，陈伯达让《人民日报》在《迎接工矿企业文化

大革命的高潮》的社论中写道：“在工矿企业内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经过严重斗争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口口声声也讲抓生产，其实，他们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抓生产是假的，压革命是真的。”^①

无意打倒陶铸的毛泽东，为了保陶铸，亲自找陶铸谈话，提醒他要注意，不要去惹江青。无法借助“最高指示”打倒陶铸的“中央文革小组”就煽动造反派打倒陶铸。

1967年1月4日，陈伯达、江青、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南局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为打倒陶铸定下了调子。

陈伯达在接见中宣布说，陶铸到中央后，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陶铸是“有关系的”。

陈伯达还说，陶铸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但为“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没跟他们商量过。陶铸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江青、康生一伙又诬陷陶铸是“叛徒”、“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人物”。陈伯达等人还煽动群众“整陶铸的材料”。

陶铸这时正在人民大会堂与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张恺帆谈话，但对此他竟毫无所知。

这一“爆炸性”新闻，当晚传遍北京街头巷尾，到处赫然

^① 《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6日。

印着醒目的新口号：“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数千名红卫兵、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陶铸”。几乎同时，北京的造反派的一封封急电发往全国，各大城市也连夜刷出了同样的“打倒陶铸”的大标语。而直到深夜12点多回到家的陶铸才被夫人告知了这一消息。

由此，“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烧遍全国。“揪出陶铸”、“打倒陶铸”的大字标语到处出现。随后，“批陶铸联络站”便成立了。

当天，周恩来在毛泽东处开会时，毛泽东就江青状告陶铸“镇压群众”一事问周恩来。周恩来如实汇报了陶铸1966年12月30日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经过。周恩来说陶铸“不是镇压群众”。

1967年1月5日凌晨，造反派们聚集在中南海，要求“揪斗陶铸”。

周恩来获悉后，立即和陶铸谈话，嘱咐陶铸这几天在家休息，不要出去。尔后，周恩来两次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揪陶铸”的造反派谈话，劝他们回去。

周恩来说：“天气这么冷，你们不走，我也没法睡觉。你们的大喇叭不要再喊了，连毛主席都没法睡觉了！”“关于陶铸的问题，我必须向主席请示，并且要经过党中央讨论。”^①

之后，江青、陈伯达又于1月7日去新华社发表讲话，捅出所谓“照片事件”。陈伯达恶意诬蔑说，从陶铸到中央宣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9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在他接管以后,搞了好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相对”的一些照片,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人物,跟毛泽东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

之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更是对此妄恣篡改,一下子群情哗然,“打倒陶铸”的呼声甚嚣尘上。

在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极力煽动下,造反派们准备召开批判陶铸的大会。

两天后,当得知造反派们准备召开批判陶铸的大会时,周恩来立即中断了与南京学生的谈话,匆匆赶去接见了“批陶铸联络站”代表。周恩来再次阐明了自己对陶铸问题的态度。

周恩来对造反派代表说:“陶铸同志不能马上见你们,因为他还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同志的大会不合适,现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有关陶铸同志的材料,你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把它整理好,上交中央。”^①

事态的发展急剧恶化,使得原本保陶铸的毛泽东也不得不表态了。1月8日,毛泽东在批评了陈伯达、江青的同时,也默认了“打倒陶铸”的事实。从此,这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宣部部长等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在经过任何合法程序的情况下“靠边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9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站”，直到受尽了种种迫害之后，于1969年10月30日含冤去世。

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内部健康力量在斗争中付出的重大代价之一。

陶铸从1967年1月4日以后，就开始失去人身自由，被监禁在中南海原杨尚昆住过的屋子里。1月下旬，陶铸又失去了阅读中共中央文件的权力，并被派驻了4个警卫。到3月，陶铸被进一步迫害。电话被拆掉了，电灯线也改为36伏的低压，“以防止陶铸自杀”。

9月8日，姚文元又抛出了《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将陶铸彻底“揪”出来。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

姚文元在文章中写道，放在面前的这两本书：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简称《理想》——编者注）和196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简称《思想》——编者注），就是展开“大批判”的“反面教材”。它们是刘少奇“黑《修养》”的“姊妹篇”，活龙活现地刻画出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

姚文元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当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面目”被全党揭穿之后，陶铸就成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

姚文元在文章中诬蔑说，陶铸“伙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

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之流”，“疯狂地反对和歪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招降纳叛”，“勾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发指示“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姚文元还污蔑陶铸的两本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姚文元在文章中污蔑说：

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方向。他极端仇恨社会主义，他日夜向往着资本主义。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但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不被揭露，他不得不包上一点革命的外衣来伪装自己。此人极不老实。两面三刀，夸夸其谈，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转弯抹角，是他的惯常的表演。但是，只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这种伪装就立刻会拆穿，原形就会毕现。这两本书，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吗？^①

^①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人民日报》，1967年9月8日。

姚文元污蔑陶铸是一个“野心家”和“阴谋家”，“千方百计地用各种阴谋手法扩大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手中的权力”，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

姚文元并将陶铸的《太阳的光辉》一文中“太阳本身有黑点”单独抽出大作文章，诬蔑说：“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

姚文元在文章中诬蔑说陶铸的感情是“对无产阶级咬牙切齿的仇恨，对资产阶级无微不至的爱护”。

在《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中，姚文元说陶铸的文采是“装腔作势”的文风，“歪七歪八念都念不通”的文字。文章还说，陶铸的“暴露黑暗”论，将同他“黑暗的灵魂一起，被革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姚文元还诬蔑陶铸的两本书不但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也是扩大他们“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权力”的一种手段。姚文元说陶铸要用这些作品作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的舆论准备”。

文章说，陶铸从地方到中央之后，“手伸得那样长，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狂热在几个月中暴露得那样突出，不择手段地招降纳叛，收买已被革命人民揭露的坏人，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击革命派，以致任何两面派的手法也掩盖不住这种反革命野心。从这个反面教员中，我们不是可以找到识别赫鲁晓夫式人物的一个重要教训吗？”^①

^①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人民日报》，1967年9月8日。

姚文元污蔑陶铸是一个“卑劣的实用主义者”，说陶铸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为了“推销”修正主义，为了“攻击和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忽而显出极右，忽而装作极左”，以“腐蚀、迷惑和欺骗”那些不坚定的中间群众，以“保护”自己不被揭露。

姚文元还说，陶铸在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成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忠实执行者”。陶铸“竭力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竭力保护那些“牛鬼蛇神”。可是，当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摇身一变”，立刻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面貌”出现。

姚文元污蔑陶铸与“五·一六”组织有直接关系，其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党集团”，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姚文元说：

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他们越是要掩盖已经暴露的部分，貌似特别“过火”或“公平”，便越是更充分

地暴露自己野心家面貌,如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明明是贼,偏要装圣贤,明明是极右的公开宣布同资产阶级“心连心”,偏要忽而跳到极“左”的“怀疑一切”。然而矛头却始终对着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就把他野心家的面貌揭露得一清二楚了。^①

最后,姚文元给陶铸作了“定论”。姚文元在文章中写道,陶铸完全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是“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和宣传者”,是一个“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

遭到巨大精神打击的陶铸,仍威武不屈,顽强斗争。陶铸对这一切泰然处之,以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抗争,立言明志: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陶铸非常相信自己的“性质似已定,还将心肝掏,装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这4句话。

江青一伙趁毛泽东离京巡察之机,再次向陶铸伸出了毒手。1968年8月,万人“批斗刘、邓、陶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一群彪形大汉闯进房内,二话不说,将陶铸押往批斗会场。不肯低头屈服的陶铸,在会上被残忍地一阵拳打脚踢。批斗大会持续了整整3个小时。从此,陶铸更加虚弱不堪了。

1968年国庆前后,陶铸出现头晕、眼花、呕吐等症状,却

^①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人民日报》,1967年9月8日。

无人过问病情。直拖到1969年元旦,陶铸的病情加重,医生给点胃药、去痛片之类了事。

3月中旬,一位医生检查后发现不对,陶铸便被送进了三〇二传染病院。入院后,医生才发现陶铸患了胆囊癌,需立即动手术。这样,陶铸又被从三〇二转到三〇一医院。可是,陶铸所住的病房,木条早已将窗户钉死,报纸糊上了玻璃,4个警卫轮流在门口监视。

10月18日夜里,陶铸又被送到合肥西郊的某部医院。

这时,陶铸差不多已是濒于死亡的人,又经过飞机上的长途颠簸,身体更加虚弱。疲劳、剧痛、伤别、忧愤,千情万绪一齐袭向他的重病之身。尽管如此,陶铸还是那么镇定、坚强,不惊慌、不惧怕、不悲观、不失望。

陶铸心里明白,监禁的地点换了,但斗争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林彪、江青等人绝不会因此放松和停止对他的迫害。

因此,重病缠身、带“罪”而行的陶铸,仍然不失共产党人的战斗风貌,举止从容自若。他慢慢地走着,不用别人搀扶,迎着扑面的萧瑟秋风,步履虽然艰难,而精神依然乐观,走进早已为他准备好的“秘密病房”里。

从这天晚上起,陶铸连真名真姓也不能使用了。病历上写着“王河”的化名,那是押送他的人给他起的名字。住院期间,别人都是用这个名字叫他。

此时,陶铸住的是一间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病房,一间经过精心安排的“秘密病房”。

这里一共有3间房,其中一间朝阳,两间朝北,中间有条走廊。做病房用的是一间,另两间分别做医护办公室和看守

战士的宿舍。起初，陶铸的病房被安排的是那间朝南、阳光充足、对病人有利的房子。但这种安排使“上面”很不高兴，偏偏要把病房改在北边。

这个改动，不仅在这位政工人员心里投下了一层阴影，对所有监护人员来说，也是一次“活的教育”。他们强烈地感到，以后应该怎样对待这位“病人”，才符合所谓的“逃跑”、“自杀”、“行凶破坏”，防止病人“被抢走”、“被打死”。

在陶铸到达前，专案人员就已命令将“病房”精心改装如下，一张病床的床腿被截去了一段，显得特别矮；电灯吊得几乎贴到天花板上；重新单独装了变压器，电压很低；北边墙的窗子外面钉上了几道木杠，窗口挡死了；窗子上蒙挂着厚实的窗帘，不能让别人从外面看见里面的人；病房门口走廊的一头被堵死，一直堵到顶上楼板，不留一条缝；走廊外只有一道门进出，平常是封闭的，不轻易开，非监护人员一律不准进入。

陶铸进入“秘密病房”后，病房门口每天24小时都有两个战士看守着，严密监视病人的活动，进行“特级护理”。按照规定，看守人员不能随便与病人交谈，但要认真地记病人的“动态日记”。

早在陶铸入“院”之前，在专案人员的组织下，就成立了监护小组，由一名组长、两名副组长负责。

这时，陶铸在合肥住院的事，除省里个别主要负责人和有关部门极个别负责人外，知情人就限制在这个监护小组的范围里了。专案人员要监护小组“终身保密”，并威胁说：“你们的名字都装在中央档案里，谁泄密谁负一切责任！”专案人员并在监护小组负责人会议上宣布说：“对他管理一定要严

格!”

到合肥那天夜里,专案人员又一次召集监护人员警告说:“现在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凶恶的敌人”。对他的监护,“只要不出问题,就是完成任务!”这就是说,给陶铸治病是假的,控制他才是真的。他们为了对陶铸“坚持斗争,讲究斗争策略”,又保证不出问题,具体规定有 10 条之多。

囚犯还有放风的时候,但陶铸是不能出来放风的。“病房”里不见一丝太阳光,大白天小屋里也是一片灰暗。真可谓不是囚犯,却不如囚犯。

“铁屋如灰”。陶铸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就是在这间见不到阳光的小屋里度过的。

到合肥后,陶铸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掐断了。专案组对他规定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通讯,不准会客等等。在这段时间,陶铸活动的天地就是“病房”。开始,陶铸还能在病房里走动,有时一走就是 20 分钟;实在累了,他就躺下来歇歇,擦擦汗水。

有一次,陶铸吃了一点面条,自觉得精神还好,就下床踱步。踱着踱着,陶铸索性把拐杖甩到一边,不用任何支撑走起来。小小的“病房”,成了陶铸作体育运动的场所。

陶铸以极大的毅力坚持着踱步,锻炼身体。

陶铸认为,他要为党为革命活下去。在这里,陶铸连张一张嘴,说一句话,都要受到注意和反击,都会被诊为是“放毒”。专案人员曾多次向监护人员交待,要警惕他“挑衅、攻击和放毒”,要防备他“套话”,遇到这些情况“要作坚决斗争”。

有一次，陶铸无意中和一个年轻的战士攀谈了两句，并且随口称了一声“小同志”，不料，竟遭到“小同志”的厉声斥责，“谁跟你是同志！你‘反对党’、‘反对毛主席’，你是‘反革命’。”

凌厉的言词，像冰刀霜剑一样直逼陶铸的心头。他难过极了。陶铸难过的，不是他个人受了诬陷，遭到迫害。他难过的是，可爱的战士和人民，以至千千万万善良的心灵，竟被林彪、江青等人蹂躏成这般模样，实在是太叫人痛心了。

陶铸在这间病房里住了那么多天，关于治疗情况，专案人员也有“指示”，即“根据病情和这里的条件治疗用药”。这句话记在监护小组一位负责人的本子上。

由于病情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到10月下旬，陶铸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陶铸已经完全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解大便。

监护小组给“上面”说，再不做病情检查，进行抢救治疗，不病死也会很快饿死。“上面”这才勉强同意给陶铸做一次检查，同时也下来一道“指示”：“与病人接触的人不能再扩大范围，特别要注意保密。”

10月23日深夜，万籁俱寂，医院里的人都睡了。监护人员给陶铸带上口罩，用担架把他从“秘密病房”抬到放射科进行胸透。

检查结果证明，陶铸的病情已非常严重，肠子粘连，已经发展成为完全性肠梗阻。后来又经过请示，一直拖到1月15日，时间过了23天，监护小组才得到据称为“中央”的批准，决定给陶铸施行手术。

手术仍在深夜进行。被送上手术台时,陶铸的神志还是清楚的。他不放心地再三问手术医生:“我到底是什么病?”“溃疡病眼发黄吗?”

陶铸不相信自己是溃疡病。溃疡病人眼睛是不会发黄的。但监护人员却说他是“胃溃疡”。

无影灯下,陶铸的腹腔被打开了,主刀医生惊呆了,淋巴结广泛转移,癌组织满腹部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已经根本无法进行。

折腾了半夜,陶铸的腹腔被打开后又被缝合起来,连完全性肠梗阻治疗问题也没有能解决。但是极度衰弱的陶铸同志挨了这一刀后,由于失血过多,又没有得到相应的积极治疗,这更加速了他病情的恶化。

手术后,陶铸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手术中,有一件事不能不单独一提。不知是由于真的“这里的条件”限制,像监护人员所说的那样,“血库里没有血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次手术后,没有能给陶铸输血,只是按一般情况输输液而已。

护士们亲眼看过陶铸每当疼痛发作时,坐起趴下,趴下坐起,一刻也不安宁。坐着时,他用拳头顶住腹部,腰勾着,强迫拳头对痛点产生巨大的压力,用来减轻痛苦。趴在床上,他的病痛似乎也未能有些许的减轻,常常用拳头顶着腹部,两条腿,一会儿伸,一会儿曲,辗转反侧。虽是冬天,病房里不生暖气,他却满身冷汗。不吃东西,不给营养补充,却要流汗,单这汗水也会耗尽他的心血和生命。

有一个晚上,只有一个护士值班。陶铸已经吃过止痛片,仍没有效果。这个护士心里也有些不忍。在陶铸一再要求下,这个护士没有报告,自作主张地给陶铸打了一针止痛针。

可是第二天,这事被上级知道了。护士受到警告:“以后不要给他打针了。打止痛针要请示‘中央’!”

1969年11月30日22时15分,伟大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受尽冤屈和侮辱的陶铸溘然长逝,告别了自己挚爱的祖国。

陶铸在他一息尚存时,还微弱、断续地说:“我不反毛主席,不是叛徒!”

陶铸逝世后,双眼圆睁,燃烧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仇恨火焰。

在陶铸逝世的当天夜里,监护小组立即打电话报告了“中央”。第二天,专案人员带着“六条意见”从北京飞到合肥,在他们的“监督”下对陶铸的遗体进行了“热处理”。

有人提出让陶铸的亲属来合肥料理丧事,遭到专案人员的断然拒绝。

陶铸的遗体用一床白布床单裹盖着。在他逝世后第二天深夜,陶铸的遗体被抬上救护车,迎着哀号的寒风,偷偷地被送到合肥火葬场去了。

火葬场上,一切早有了周密的安排。人们被告知说,死者叫“王河”,是“烈性传染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因为是这么一种病,火葬场除两名烧大炉的工人参加工作外,其余一概不参加这次火葬,但两个烧炉工不准接近遗体。跟来的几个监护人员戴着大口罩,穿着白衣服,忙着搬动遗体,谁也不说话。

他们以“医护”名义出现,造成一片“烈性传染病”的恐怖气氛。

火葬要有人签字。一个政工人员“奉命”在火化单签了“斯亮”两字。“斯亮”是陶铸心爱的女儿的名字。她此时远在西北农村,正因找不到父亲的下落而痛苦万分。可是在合肥,竟有人指使盗用“斯亮”的名字,来掩饰某种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

陶铸离开人间时,遗容没有修整;没有灵堂;没有党旗覆盖;没有鲜花和松枝;没有沉痛的哀乐回响;没有人向遗体默哀告别;没有人开追悼会、致悼词。连最简单的葬仪也没有。写着“王河”的劣质骨灰盒,被弃置在那无数普通的亡灵中间。

陶铸的生命之火虽然熄灭了,但是他的名字和他的事业一样,永远留在了人民的心中。

陶铸逝世两年后,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9年后,江青反革命集团被打倒。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终于为陶铸冤案彻底平反昭雪。

与陶铸冤案不同的是,彭德怀冤案时间更长,案情更复杂,涉及相关人员更多。

彭德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后,被撤销国防部部长职务。之后,彭德怀在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的清王朝旧庄园里住了6年。但是,赋闲种田的彭德怀并未被中共中央遗忘。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请彭德怀到中南海谈话。两人长谈了5个多小时,并共进午餐。彭德怀也于当天被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总指挥。

中共中央的决定,彭德怀向来是服从的。虽然受命于困难之时,但为了顾全大局,彭德怀只身赴川,担任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

彭德怀重新工作后,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1966年上半年,他跑了20多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走遍了从金沙江到贵阳之间的广大地区,视察了边远地区的工厂、矿山、水电站。这位军事统帅,想安下心来,在国家经济建设上钻进去。

1966年5月25日,彭德怀准备第四次出行,经重庆、遵义到贵州看六盘水煤炭基地。第一天刚到大足时,彭德怀突然接到三线建设委员会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返回成都。

5月27日,彭德怀从大足急返成都,被告知是听传达。传达内容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于5月16日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编者注)。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重新组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康生任顾问,陈伯达任组长,江青等任副组长,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彭德怀还得知,在这次会议上,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均以“反党”的罪名被撤销职务。

彭德怀也在三线建设委员会会议传达《通知》后接着进行的座谈会上,成了被批判的目标。座谈会变成了对彭德怀

的批判会。陪同彭德怀外出掌握情况的人,有的当场出来揭发说,“彭德怀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等。

彭德怀为此作了3次说明、检讨,但都不能过关。继而,彭德怀又被追问和彭真的关系,并要他交代“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

对这些提问,彭德怀回答说,庐山会议,“主席是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我说三年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

在回答组织“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时,彭德怀坚定地说:“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要保留。”

批判彭德怀的座谈会结束后,西南局书记处决定建委成立一个批判小组,写文章在内部通报彭德怀的种种“问题”。对此,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这些简报在各级干部会上传播,这就把我做调查的道路堵塞了。”

随后,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将“揭发”彭德怀的《情况简报》送到“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看过后,给顾问康生和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写信说,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揭穿他的丑恶面目”、“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希望中央“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6月1日,毛泽东欢呼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

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世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兴起,“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神州大地。

6月16日,“文化大革命”刚刚揭幕,戚本禹、关锋就写信给江青、康生、陈伯达3人,向主子“献技献策”,阴谋挑起对彭德怀的新的批判。戚本禹、关锋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行的。^①

^① 杨先材:《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卷,第93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彭德怀的存在,彭德怀的活动,彭德怀的品德,使江青等人如感芒刺在背,坐卧不安。因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彭德怀仍是一面耀眼的旗帜,真理的旗帜。用江青等人的话来说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因此,要进行他们的“争权斗争”,必须使用野蛮的法西斯手段,而且“事不宜迟”。这就是戚本禹、关锋建议的所谓“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行的”。

到8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岌岌可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也遭“炮轰”而自顾不暇,管不得彭德怀了,只是向他封锁了一切中央文件,也回避彭德怀的电话和约见。

彭德怀不顾建委给他的“你就不要出去了”的告诫,天天上街去看大字报。在一次被红卫兵认出来后,彭德怀就开始戴上一个大白口罩出去。

9月1日,西南局书记处通知彭德怀立即离开成都,出去躲一躲。彭德怀对着话筒大喊:“我为什么要离开成都?共产党员哪有怕群众的道理?”“怕红卫兵找我算账?!算新账没有,算旧账不怕,算一百次也不怕!”

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现象早就深恶痛绝的彭德怀,密切注意着“文化大革命”,也寄希望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关于中国存在“国变色”、“党变修”的巨大危险的论断,在彭德怀心中引起了共鸣。彭德怀对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心毫不怀疑。

红卫兵刚兴起时,经常有红卫兵闯进彭德怀住的永兴巷七号的院子里来。开始时,红卫兵是请他讲革命历史、红军长

征的路线、怎样打仗、生活怎样艰苦等等，彭德怀都热情作答。后来，有些红卫兵开始对彭德怀提出责难。对此，彭德怀总是耐心解释。他很喜欢和青年交谈，帮助他们了解革命。

然而，“红卫兵运动”不久就朝着和彭德怀的期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并摧毁一切，也包括他自己。

为了打倒彭德怀，林彪挖空心思，甚至在姓名上作文章。林彪说：“你们知道彭德怀的原名是什么？叫彭得华。他从小就有野心，想得中华。”

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在江青的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康生马上附和，王力、关锋一哄而起。

戚本禹因为有后台撑腰，就亲自给这时北京名噪一时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韩爱晶打电话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你们可以到四川把海瑞（即彭德怀——编者注）揪回北京。”

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冬天，区区一个戚本禹的一句话，就可以随意剥夺闻名于世的一位军事家和政治家的人身自由。

对此，戚本禹后来在押期间写的笔供也承认。戚本禹在1979年底的笔供中写道：“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去四川串连的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康生也是这个主张。”

1966年12月，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组织“东方红”战斗队到成都“揪彭”。他们向彭德怀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你对庐山会议持什么态度？”“对红卫兵有什么看法？”“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

彭德怀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红卫兵听了彭德怀的回答后,对彭德怀产生了好感,说:“你很直爽,我们回去了。”

红卫兵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揪”彭德怀拿不定主意,于是派了两个人回京“请示”。

戚本禹听了汇报后,对“东方红”的头目很不满意。戚本禹说:“你们立场动摇,受了彭德怀的欺骗。”戚本禹并要“东方红”赶快再派人去成都“揪”彭德怀。

12月23日凌晨5时,数十名经过再次“思想武装”的“东方红”红卫兵,按事先侦察好的路线冲进成都永兴巷七号院,直扑彭德怀住室。顿时,他们怔住了,室内无人,彭德怀不知去向。

原来,彭德怀在两小时前被北京另一个“响当当”的造反组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揪”走了。

这一天凌晨3点,北航“红旗”八九个红卫兵翻越铁门进入永兴巷七号,把住在东屋的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叫起来,硬推着他向彭德怀屋子走去。彭德怀闻声开门,并问出了什么事。

为首的红卫兵说:“奉中央文革之命,让你跟我们到北京走一趟。”

彭德怀痛快地回答说:“行,什么时候走?”

红卫兵说:“现在就走。”

北航“红旗”的红卫兵也是奉戚本禹之命,紧急到成都“揪彭”的。戚本禹怕“东方红”右倾动摇,来了个双管齐下、互不通气的计谋。总之,一定要把彭德怀“揪回”北京。

“东方红”不甘失败,乘“红旗”不备,将被“红旗”拘押在

成都地质学院的彭德怀劫走。“东方红”还派人抄走了彭德怀住处的全部文件资料。

为此，“红旗”和“东方红”争吵起来。最后，双方议定，对彭德怀实行共管，要求三线建设委员会用飞机送他们押彭德怀去北京。

戚本禹在得知“揪彭”成功的消息后，十分得意，并马上派出一个记者组去成都，准备召开百万人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大会”。戚本禹还确定在沿途组织若干次斗争大会。

随后，戚本禹报告江青说，彭德怀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两天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学生已经作好了斗争的准备。

周恩来接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紧急电话后，心知“揪彭”一幕是江青策划的，非常气愤，又阻止不了，只得指示几点：不得开批斗会；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起护送彭德怀到北京；只许坐火车，沿途不许任何截留，不得对彭德怀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途中确保安全；到京后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接走彭德怀，并负责安排彭德怀的学习和住宿。

周恩来还不放心，又让秘书将这几点指示直接用电话通知成都军区和“东方红”的“揪彭兵团”，并特意说，他“亲自关心这件事”。

12月25日晚，被红卫兵控制了3天、已经十分疲惫的彭德怀，由一伙红卫兵推搡着，在成都军区的一名干部和几名战士的护卫下上了第三十四次火车的一节专挂车厢。满身灰尘、爬满了“大串连者”的列车吃力地驶出成都北站。

从北京跟随彭德怀到四川的秘书綦魁英和警卫参谋景希

珍,这时也和红卫兵一起挤坐在车厢过道中。

红卫兵一路看守和提问彭德怀。彭德怀有问必答。

景希珍劝彭德怀说:“你少说几句吧,你就是吃的这个亏呀!”

彭德怀摇摇头说:“我现在一无所有,只有一张嘴了,不抓紧时间说,恐怕机会不多了。”在彭德怀的心头,对红卫兵的热情中,隐隐升起了矛盾和困惑。

12月27日16时25分,第三十四次列车进入北京站。北京卫戍区奉周恩来的命令派一连兵力到车站接彭德怀。但红卫兵拒绝交人。

红卫兵的头头说要“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并当即在车站打电话报告戚本禹。这时,“中央文革小组”正在开会,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报告戚本禹。

机敏的周恩来已走过去,接过话筒说:“这事我来办。”

周恩来在电话中对红卫兵头头说:“中央决定把彭德怀送往卫戍区。”

然而,戚本禹却指使红卫兵悍然抗命,强迫司机将列车退出卫戍区把守的北京站,停在一个岔口上,然后把彭德怀劫至北京地质学院。

为此,周恩来直接质问了戚本禹,却又不得不折中处理,把彭德怀交卫戍区,地质“东方红”和北航“红旗”可参加管理。

彭德怀由两个战士搀扶着登上卫戍区的汽车,綦魁英和景希珍被留在车下。这两个在彭德怀身边工作了十几年的秘书和警卫参谋,望着疲惫不堪的彭德怀,禁不住痛哭起来。

随后,彭德怀被带到北京西郊五棵松卫戍区的一处营房里。这里是卫戍区的一个“监护点”。一些被打倒的“当权派”陆续被关押在这里,叫做“监护”。在极度疯狂地掀起“红卫兵运动”的岁月里,这确实既可以“监管”也可以受到保护,以免遭受造反派的过度摧残。

安置彭德怀的是一间建筑队丢弃的简易工房。屋内有一桌、一椅、一床、一炉。彭德怀被安置好后,便拿出日记本,记下了几天来的经历。在日记的最后,彭德怀写道:“为什么揪我来京,一点也不了解。”

第二天,彭德怀发现是解放军战士在持枪看守着他,不许他出屋。他明白自己已真正失去了自由。

彭德怀问看守的战士说:“把我弄到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是算旧账?”

彭德怀为成都住屋内有許多绝密文件被红卫兵抄走而着急;他要求看报纸,但是没有人答复他。

住在彭德怀隔壁的红卫兵整天找他谈话。谈了几天,彭德怀问:“你们想干什么呀?”

1967年元旦,红卫兵忽然气势汹汹地骂了彭德怀一通,说彭德怀想“翻案”,声言要“敲打死你,揍死你”。

红卫兵对彭德怀说:“对你这样的人(指彭)就得武斗。”

这些红卫兵在彭德怀屋里夺烟斗,翻书包,辱骂彭德怀“老混蛋”。

彭德怀本着毛泽东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教导,始终心平气和。当晚,彭德怀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天的感受。

彭德怀在日记中说,这天是1967年元旦,他的生活情况

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来北京待审。时间已过7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他1959年以来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写完日记,彭德怀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白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彭德怀将信仔细叠好,放到眼镜盒里,随后悄悄的要哨兵替他转交上去。

彭德怀的信由“监护点”层层上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了这封信。

这是彭德怀一生中最后一次上书毛泽东。

彭德怀在信中写道:“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①

彭德怀的信发出去后,彭德怀在囚窗里翘首盼望毛泽东的答复,就此一等就是8年,直到他的生命结束,仍不见回音。

这年元旦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一篇题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晚上,彭德怀刚要休息,红卫兵进屋叫他写对姚文元这篇文章的看法。

对此,彭德怀说:“我不写,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不发表(看法)也是我的自由。”

^① 杨先材:《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卷,第93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你到底写不写？”红卫兵厉声问道。

彭德怀叹了一口气。他知道，此时，只有姚文元诽谤他人的“自由”，而许多人已丧失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

于是，彭德怀提笔给素不相识的姚文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读了1月3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他对其中一段表示态度，即“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如果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实事求是一些，他就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在信中，彭德怀叙述了在庐山会议上自己给毛泽东写的那封信的经过和信的主要内容。

彭德怀的这封信于1月6日被送到彭德怀专案组，成为彭德怀的新“罪行”。

随后，彭德怀按照红卫兵的要求写了4份材料，即《挖思想根》、《建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

材料送到“中央文革小组”后，康生在材料上批道：“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的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林总、总理阅。”

毛泽东阅后批道：“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红卫兵又对彭德怀提出高岗、饶漱石和“军事俱乐部”等问题。

红卫兵对彭德怀说：“你就是高饶反党集团的干将！”红

卫兵并且勒令彭德怀“把他们那个军事俱乐部写出来”。

彭德怀瞪眼回答说：“没有什么俱乐部。”

红卫兵说：“非写不可！”

彭德怀终于忍耐不住了。他用力拍着桌子，大吼起来：“杀掉头也没有！”

正受着疾病折磨的彭德怀，由于心情焦灼，房屋阴暗潮湿，又没有衣服可换，在朝鲜战场矿洞里患过的神经性皮炎又复发了，双腿长满湿润和糜烂的斑块，并向上身扩散。直到2月中旬，彭德怀的腿、臀、背长满红疮，奇痛奇痒，不能弯腰，不能躺卧。这时，彭德怀才向监护点的人提出能否治疗一下。

此时，彭德怀身上仍然穿着从成都来北京时的那一套内衣裤，已沾满了脓血。袜子早破了，棉裤露着棉花。

在这个监护点内，除彭德怀外，其他被监护的人都收到家人送来的衣物、食品。每当监护干部问彭德怀要不要告诉家属送些换洗衣服来，彭德怀总是说：“算了吧，算了。”他料想妻子浦安修处境不会好，又怕连累侄儿侄女。想来想去，最后，彭德怀才给侄女彭梅魁写了一封信。

当初，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时，彭梅魁曾对伯伯说，不管在哪儿，她都要来看他的。

彭梅魁说到做到了。彭德怀到了大三线。过春节时，彭梅魁到成都看望彭德怀，给彭德怀洗衣服，缝缝补补。

临走时，彭德怀问彭梅魁关于他1962年给中共中央的那份8万字长信的抄本保存情况。彭梅魁瞒着彭德怀说：“烧了。”

彭德怀用眼睛打量着彭梅魁说：“这样好，这样好。”

以后,彭梅魁常写信向彭德怀问好。1966年12月,彭德怀又把写给毛泽东的信抄了一份寄给彭梅魁,让她保存。此后,彭梅魁就再没有收到彭德怀的信。

1967年2月底的一个晚上,监护点的两个参谋按彭德怀告诉的地址来到彭梅魁家里,交给他一封信。彭德怀在信中告诉彭梅魁,他已“被抓来北京”。到京两月,红卫兵对他所追问者,还是庐山会议情形,此事无再谈必要,仍如既往,服从中央决定。其他一切愿受“革命群众”审查。彭德怀在信中说,“今冬皮肤炎(痧疹)变为疮疤,痛痒异常,近警卫部队负责人派医生专治,已见成效。”

彭德怀在信中说,他在成都被抓时很急,未带应用东西,仅穿着黑棉布衣服,已经破烂不堪,春暖后无法换洗。如景希珍在成都,请他找两条短裤、上黑下蓝那套布制服、袜子、布鞋,还要寄一点钱。

彭梅魁收到信后非常激动,也为伯父彭德怀有了下落而放心。

3月6日,彭德怀和其他“犯人”被转移到距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干部队驻地“监护”。在这里,大门口有守卫,“案犯”门口各有一个哨兵。彭德怀室内还设有一个哨兵。彭德怀的一言一行都被记录在案。

到了罗道庄,监护人员对彭德怀的看管更严了。对此,彭德怀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是在这里坐监狱。”

冬日将尽,彭德怀还穿着那身破棉袄裤,无衣可换。他向哨兵要来一根针,一点线,自己补破袄。

3月19日,一个参谋将彭梅魁送的衣物和水果送给彭德怀,并要彭德怀签收据。这东西是经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转来的。

4月1日,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被抓的经过和此时的情况。因为这时的报纸不点名地说他到西南搞“翻案”活动。因此,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的末尾作了郑重声明,说明他到西南各工矿企业是为了收集材料,作些研究,增加自己的知识和提供领导参考。这封信仍然没得到回音。

4月20日,彭德怀又提笔给周恩来写信,称呼“总理”。彭德怀在信中谈到四川石棉厂矿渣堆积在南岸,流失不少。彭德怀曾将此事报告给西南局领导,此矿渣加工成钙镁磷肥,成本低,肥效高。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篇讲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

戚本禹在文章中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为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翻案,“企图煽动别人起来同他们一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

此前,报纸上已多次不指名地骂彭德怀“反党、反社会主义、闹翻案”等,但对他用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一词。戚本禹此文在报纸上第一次指着“彭德怀”的名字来攻击他。

彭德怀坐在桌旁,先是看到文章中点了一串名字。再看下去,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彭德怀在那一段话下也划了重重的一道,喘了一口粗气,把报纸扔向一边,躺到床上唱起

“国际歌”来。

7月，“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国开始“全面夺权”，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人民日报》号召“革命派”痛打“落水狗”。

江青十分“关注”彭德怀。江青几次不阴不阳地提到：“彭德怀在卫戍区养得胖胖的，过去还没有公开批判一下呢！”“要把他批倒批臭呵！”

戚本禹连忙告诉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头头韩爱晶：“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把彭德怀拉出来斗”。红卫兵提出没有“炮弹”，戚本禹马上叫专案组给红卫兵提供材料。

先在6月21日，“重新调整”后的专案组在戒备森严的八里庄审讯室里第一次提审彭德怀，要彭德怀交代是怎样“里通外国”和组织“反党集团”的。彭德怀表示无可奉告。

以后许多天，彭德怀根据专案组的命令写自传。彭德怀刚开始不愿意写，专案组说：“这是组织的决定。”

彭德怀说：“既然是组织让写，我服从。”

彭德怀面对一个无情的事实，专案组“代表”至高无上的党，“代表”他一贯服膺的组织。

7月12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人，下达了折磨彭德怀的信号。

戚本禹说，要彭德怀“交代反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7月18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恶狠狠地训话，“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并污蔑彭德怀是“军阀”。

戚本禹恶毒地说,不要看彭德怀“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上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彭德怀“没有死”,江青等人就绝不甘心。他们非要把彭德怀“打翻在地”,才善罢甘休。

7月19日,韩爱晶有恃无恐,在北航开会揪斗彭德怀;年近七旬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7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下午5时50分,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人架回囚室,并被勒令起身,连夜写“认罪书”。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晚得知彭德怀被斗的情况,打电话问韩爱晶为什么不执行周恩来的“五不”指示。早在预审会前,北京卫戍区曾派专人去北航向韩爱晶等人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街,不准武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

韩爱晶听后,立即打电话报告“中央文革小组”。

戚本禹回答:“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提限制过多。”

第二天,彭德怀伤重不能起床,被送到二六七医院检查。病历上记载,“胸部正位像 X 线所见: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右肺下叶部分不张。”

在批斗现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批斗的第二天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了一个报告说,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7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卫戍区方面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韩爱晶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周恩来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是“最新指示”。

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

一份《关于彭德怀1967年7月19日至22日监护情况》的记录中说的十分详细。

自7月19日参加斗争会后，彭德怀的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彭德怀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批斗的当晚没有吃饭，不能吐痰，让彭德怀写材料时，彭德怀说：“我现在不能写。”

监护的人说：“不写不行。”

彭德怀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

到7月22日，彭德怀的精神稍好一些，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地出长气。但是，彭德怀不久又躺在床上，一夜未睡好。

7月20日，彭德怀曾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我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

经过医生检查，彭德怀的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傅崇碧向周恩来报告了彭德怀的伤势，并附上胸片图。周恩来看后，批评卫戍区有关人员没有尽到责任，并指示，马上给彭德怀治病，将结果报告他；以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

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然而，在彭德怀遭毒打的第二天，武汉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七·二〇”事件。紧接着，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使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报纸大造舆论，掀起“批彭”高潮。

从7月26日开始，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的“造反组织”对重伤中的彭德怀连续“揪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

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的一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萧向荣、王尚荣、廖汉生、李志民等被拉去“陪斗”。

在批斗会上，彭德怀不甘受辱，强直着头，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选来按低他的头，反提他的胳膊。长时间的伤痛、愤怒，使彭德怀在被“游斗”中几度昏迷。

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也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里陷入灾难之中。尽管浦安修原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早已经“落选”，被派去担任师大附中办公室主任，仍属“当权派”之列。而最关紧要的，她是彭德怀的妻子，这使她成了“造反派”的大目标。

早在1966年7月，浦安修的家被抄。浦安修进了“专政队”，白天劳动，夜晚住在没有完工的一间浴室里，潮湿的水泥地面上铺着一床薄褥子。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红卫兵押到校内

教学楼前。在这里，浦安修看到人群中一辆三轮车上押着一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浦安修。四目相视，两人都痛苦地低下头。

当晚7点半，由北京师范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主持召开“批判斗争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彭德怀和彭贼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万人大会在一片口号声中开始。彭德怀和浦安修被拉上会台。

浦安修被两条粗臂反提着胳膊，两只大掌猛按着头，作成“喷气式”；耳里灌进了一连串彭德怀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她如何与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浦安修当场昏迷过去。

对此，浦安修后来在回忆文章《赤子之心——怀念彭德怀同志》一文中这样写道：

1967年8月11日，一群彪形大汉把我架到北京师大操场的台上与德怀“陪斗”。从1965年他到“三线”我们话别后，两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此时此刻，却在这里相逢。“喷气式”使得我的头抬不起来，眼前一片昏暗，只是在那些粗大的胳膊也需要松歇的片刻，我才能看到他。他那曾经被湖南军阀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头，他那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以万金重赏购买而买不去的头，他那在枪林弹雨中千百次冲杀而仍然挺昂着的头，如今竟被以所谓“革命的名义”按到了地面。这是怎样的历史悲剧呵！我想起吴家花园中他那刚毅的面容，紧锁的眉

头,深邃的目光,此刻,他心中又在想什么呢?我不能再想下去了。在十年内战的战场上,在太行山上,在西北战场上,在朝鲜战场上,他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与美帝国主义斗。他没有死在战场上,却被害死在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的囚室里!这是多么令人不解的历史颠倒呵!①

随后,浦安修被传去勒令交代彭德怀的“罪行”。一向温和文静的浦安修,这时顽强地闭口不答。

1967年10月出版的红卫兵《大批判通讯》上,登载了这时对浦安修审讯记录。这份记录按语中这样说,时至今日,“浦妖婆”拒不揭发“彭贼”,企图“顽抗到底”,还千方百计地为“彭贼”“涂脂抹粉”。

因为拒不交代彭德怀的“罪行”,浦安修受到“武斗”。造反派还递给她最后通牒:“再不交代,砸烂你的狗头!”

8月31日晨7点,浦安修来到北京西郊颐和园的昆明湖边,服安眠药自杀。浦安修被路人抬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抢救时,大夫是从她身上一枚校徽上才弄明白她的身份。当天半夜,浦安修才清醒过来。

一天后,专案组头头下令将浦安修从医院押回学校管制。

这时,北京师范大学浦安修专案组的头头,正在胜利的兴奋中仔细研究如何贯彻戚本禹关于对浦安修的“问题要抓紧

① 浦安修:《赤子之心——怀念彭德怀同志》,《中国人的脊梁——彭德怀》,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

搞”的“指示”。

在北师大批斗会以后，彭德怀因精神受到重大刺激，右半身麻木。但两天后，彭德怀又站立起来了。

8月15日晚，彭德怀在囚室内听到部队在院子里集合。随后，窗外传来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的播音。从1959年8月在庐山上产生了这个决定他的命运、也影响着整个中国命运的《决议》以来，这是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个文件（摘要）。

彭德怀听到播音，先是一怔，随即把椅子向门口移动了一下，仔细听下去。他有时点点头，有时发出笑声。哨兵走到他身旁，可能是为了了解他的“反应”。

彭德怀说：“这叫我怎么活喽。”

8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决议》（摘要）和一篇题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的社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题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的社论。《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社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报一刊是传达“最高司令部”声音的。很快，全国又一次掀起了“批彭”高潮。

彭德怀再度在北京被连续“批斗”。军内外各大单位争先恐后地来押走彭德怀。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这时不管是哪个单位的报告，只要有批斗彭德怀的报告，他就批示“可以安排”。

北京军区、第二炮兵司令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海军司令部、北京卫戍区、通信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司

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中央直属机关等大单位 12 次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公审”彭德怀。

此时,在批斗过程中,69 岁的彭德怀被两个大汉拖着跑步上台。在烈日之下,在拳脚之中,在对一串串谁也不识真相的“罪行罪状”的声嘶力竭的揭发批判声中,彭德怀顽强地挺着腰杆,屹立于天地之间。残酷的“批斗”一直进行到 1967 年底。

彭德怀专案组于 1967 年 11 月划归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掌管。彭德怀专案组是第二办公室所辖专案中最大的一摊,管辖被认为是彭德怀“黑线”的 17 个对象,即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李锐、张闻天、王平、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刘震、钟期光、饶正锡、洪学智、邓华、万毅、吴自立、浦安修。大摊称大组,下设有彭德怀专案小组和黄克诚专案小组,专审彭德怀、黄克诚两人。

黄克诚也是先被关在五棵松,后又被转到罗道庄。在五棵松,黄克诚从他的高度近视眼镜片后发现彭德怀。此后,黄克诚常常反抗“监管”,故意大吵大骂。彭德怀听出了是老战友黄克诚的声音,知道黄克诚也被关在这里。

在批斗的高潮中,黄克诚常和彭德怀被押在同一串车上游行示众,被“揪”在同一个台上批斗。彭德怀、黄克诚经常在目光中交换心声,共同承受这一时代的疯狂。

“大批斗”的暴虐终于过去了。从 1968 年起,一场更为残酷的隐秘的斗争——审讯开始进行。中央专案领导小组的要求是对所押“案犯”在春节前定案,提出要“只争朝夕”,“歼

灭战一定要打下来”。

从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专案组已8次审讯彭德怀的入党问题。其企图是证明“彭德怀是假党员”，以达到对彭德怀的历史“一否全否”的目的。

在审讯过程中，一份历史文件偏偏证明彭德怀是1928年入党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专案组初战失利。从1968年新年开始，专案组又突击审讯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问题。

彭德怀对专案组的审讯提出抗议说：“对我的审查，用党内同志式的谈问题可以。审讯式的，拒绝谈问题。”

主审人回答说：“对你就是这样，你要老实认罪。”对专案组来说，彭德怀是“敌人”，并非“同志”。

彭德怀从1952年抗美援朝期间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曾5次去苏联谈判或访问。这在专案组的方案中都当作“里通外国”罪行来审查。其中，1955年和1959年的两次访问被列为重点。

彭德怀于1955年5月24日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让翻译费德林向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转达他的意见，他要和彭德怀谈话，主要是谈军事问题。因机密性大，赫鲁晓夫建议苏方只由大将安东诺夫、中方只由大使刘晓参加，指定由费德林任翻译。费德林要刘晓向彭德怀解释。彭德怀听后说，应尊重苏方意见。会谈后，彭德怀将会谈内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审讯人员从彭德怀谈的情况中得不出“里通外国”的结论，便说：“我们看你是与赫鲁晓夫共同搞阴谋。”

彭德怀回答说：“由你们定，我无法说，你们说搞阴谋就

搞阴谋,你们是客观的吗?”

1968年1月10日、11日、12日,彭德怀正患感冒,不断咳嗽,却被连续审讯了3天,被审讯了6次。

接着,专案组又于1月15日、16日、17日3天,连审6次。面临审讯者追逼不已,彭德怀大声回答:“我不能满足你们的主观需要!”

审讯人大骂:“你攻击!放毒!反攻倒算!抗拒审查!对审查怀恨在心!”

彭德怀忍无可忍,腾地跳起来,拍桌子大吼:“你们的目的达不到!”

从1月19日起,专案组经过一番策划,采用车轮战突击审讯彭德怀。每日从晚上7点左右,审讯到第二天凌晨3点。一堆人围着彭德怀,你一喝,我一喊,轮班无休止地追逼,一句话,反复问,直至彭德怀极度疲劳,精神恍惚,“要什么给什么”。这样一来,专案组天天向上报告“战绩”。

这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催促专案组的人要“想尽各种办法把进度搞快点”、“要抓紧时间突”,“大会斗、小会突、专案审”。

1月24日,在专案组汇报“战绩”后,李作鹏又“指示”专案组:“专案工作最大、最难办的是彭德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解决问题时要人多一点,人多说得过他,人多压得住他。”“九大以前定案”。

1月26日,专案组从下午6时到第二天凌晨3时,连续审讯彭德怀长达9个小时。《哨兵日记》记载彭德怀从审讯处被送回囚室的情况是:“东倒西歪,前仆后仰,精神处于昏

迷状”。

春节后，彭德怀被审讯的次数更多，时间更长。2月5日，审讯人从下午2点30分到2月6日凌晨1点钟，轮流休息，吃饭，而彭德怀却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休息，连续被折磨11个小时。

专案组“车轮战”的审讯，不是为了弄清问题，而是逼取彭德怀的口供以便“定罪”。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党组织”的面目出现的。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曾经要求中共中央审查他。“文化大革命”开始，彭德怀衷心欢迎审查。他相信审查会洗清他的冤屈，澄清事实的真相。然而，残酷的事实使彭德怀认识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因而，在被审讯时，彭德怀对专案人员捶桌怒吼：“我就是顽固，顽固到底！”“你们把我枪毙了吧！我什么都不怕！”

专案组对彭德怀说：“你这样做没有好下场！”

彭德怀笑道：“好啊！看你们有什么下场！”

接着，专案组又逼彭德怀承认1959年在阿尔巴尼亚参加霍查举行的宴会前，和赫鲁晓夫在小休息室“密谈”“勾结苏修”。对此，彭德怀反复说明，当时各国贵宾都在场，他和赫鲁晓夫只是礼仪性的见面，交谈数语，根本不可能“密谈”什么。

但专案组人员根本不听彭德怀的解释，坚持要彭德怀写“认罪”书。彭德怀把为这一问题被迫写的“认罪”书抄在日记上。彭德怀在日记的后面写上了这样一段话：“为此事费了半个月时间，有时搞到半夜。于是，我把平日里所想的和所

说的,说成是同赫鲁晓夫谈了。现在我知道了,一定要说成是‘同苏修勾结反对毛主席,现在我懂得了这一条’。”

彭德怀在日记中写道,他过去的理解是,审查是要弄清真相,实事求是,作出合乎事实的真理结论。入党宣誓时他就说过,为了革命利益,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彭德怀认为“是时候了”,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和提高“毛主席的威信”,他应当坚决这样做。

在彭德怀看来,为了革命,为了党的利益,是应当按专案组的要求“认罪”以“巩固毛主席的威信”,还是“抗拒审查”以坚持实事求是,这是极难选择的。他在极度痛苦与极度矛盾中做出极度痛苦和极度矛盾的选择。

这年3月,林彪的亲信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接管了专案组,对彭德怀继续审讯。

黄永胜指使专案组派了5个人从5月7日下午开始到5月8日凌晨1时,攻彭德怀的“核心问题”。审讯室内,彭德怀忍无可忍。他怒吼着、痛骂着。

回到囚室,彭德怀拿出一张纸条,写下这样的话:“为了革命的利益,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入党誓词的最后一句,现在是时候了。”

8月25日,彭德怀和其他“案犯”由罗道庄被转移至什坊院继续监禁。

9月18日,在江青直接控制下的专案组经过10个月的审讯,终于制造出了一个遗臭万年的《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问题的审查报告》,并定稿上报。

这个《报告》中说,1959年彭德怀在地拉那直接“勾结”

赫鲁晓夫，是“有预谋的”。彭德怀在同赫鲁晓夫的谈话中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露骨地向“赫修”表示了他的“反党野心”。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也“大肆攻击”，支持彭德怀“取而代之”。

报告中说，彭德怀“供认他到国外反对毛主席”是为了制造“国际舆论”，取得“赫修集团的支持”，以达到“篡党篡国”，夺“毛主席的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彭德怀从被揪以后，忍受着红卫兵的批斗，哨兵的监视，专案组的审讯，同时也期待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他期待中共九大使党的一切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他相信毛泽东有驾驭历史的能力。冲动的热浪过后，定会有冷静的总结与处理。

然而，中共九大开了24天后结束了。彭德怀深深失望。在哨兵的登记本上还记着，彭德怀在看到中共九大的公报后，常常彻夜不能入睡，有时叹气、流泪、摇头，有时“呆坐发愣”，“突自笑起来”。

1970年7月2日，江青催促专案组对“主要案犯”定案。7月21日，彭德怀专案组上报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并据此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与此同时，已被迫害辞世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其妻子王光美，由专案组建议“判处死刑”。对此，毛泽东批示，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犯人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

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7月28日,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到各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还不甘心,又向上请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上报材料时对案犯提不提处理意见。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不提,1969年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时提的,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长期关押”等意见还提不提。

8月14日,黄永胜对彭德怀专案组所提的问题这样答复,原来讲送材料不提处理意见,现在看还是可以提处理意见,判刑意见也可以提。黄永胜还说,提了以后再写一段“以上意见仅供参考”。根据对所谓“王光美案件”的“批示”,究竟如何判刑,请中共中央讨论审定。

于是,彭德怀专案组于9月17日再次上报了对彭德怀“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意见。

11月2日,彭德怀专案组第三次上报对彭德怀的处理意见,最后专案组又加了一句话:“未处理前,继续关押。”黄永胜“批示”“同意”,然后上报中共中央。

江青在催促定案的同时,还指示专案组:“我现在还有点时间,希望七、八、九月3个月把主要案犯的材料弄出来,向中央报材料。”“每个案犯都要摘一个传记,要详细的。”

彭德怀专案组根据江青的“指示”,一面起草对彭德怀的审查报告,一面出提纲要彭德怀写自传。

彭德怀答复专案组说:“在3年多受审过程中,已经写了两次简历材料,这是第三次了,我真不愿意再写了,因为它毫

无用处，也毫无意义。”

专案组的人说：“不写不行，从8岁写起。”“不准放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党的政策吹嘘自己。”

彭德怀又开始写第三次简历材料。彭德怀把这种“交代”变成他为革命、为真理的“最后一次搏斗”。

继1962年写《八万言书》之后，彭德怀再一次仔细回顾生平，将一世风云、毕生追求尽情倾注于笔下。从童年的苦难到青年的探索；从平江起义的怒潮到开创红军根据地的鏖战；从万里长征的奇迹到敌后抗日的烽火；从大西北的解放到抗美援朝的胜利；从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到庐山上的罢官。70年的岁月像一幕接一幕的历史长剧在他心中重演。他一天天伏案写、伏案抄。

那些日夜监视他的人，对他那悲壮跌宕的思想旋律进行揣测。有的在记录中说，他“好像在搞回忆似的”；有的记录说，“案犯情绪反常”；有的又记载说，这是“狡猾顽固，不老实”。

彭德怀的第三次简历为人们留下一份10万言关于他一生的记录。彭德怀在这一份以及过去所写的几份“交代材料”中，对他一生所作的叙述和他对有关重大历史是非的坦率陈词，以及他对那些强加于他的种种歪曲真相的“批判”的愤怒驳斥，被当作“拒不认罪”的证据，收藏在“彭德怀专案”的档案里。

什坊院的“案犯”各自进行具有个性特点的“反抗”。彭德怀写得最多。他写出的历史事实是他对专案组颠倒黑白的最大抗争。黄克诚则拒绝写交代，拒绝回答专案人员的审问。

专案人员为黄克诚专门准备过一次“打态度”的会，审讯室里挂着大黄纸写的《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主审人对挺着瘦瘦的身子、坐在被审位置上的黄克诚喝道：“念墙上的毛主席语录！”

黄克诚拖着长声回答：“我——知——道！”

“知道也要念！”主审人呵斥道。

黄克诚回答说：“看不见！”

主审人问道：“你戴眼镜干什么的？”几个审讯人一齐站了起来。

黄克诚仍不理睬。主审人上前一把将黄克诚的眼镜抓下来摔在地上，一条眼镜腿摔断了。主审人并骂黄克诚说：“你是反革命分子，不老实决没有好下场！”

黄克诚愤怒地喊起来：“谁说我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这时，“案犯”放风去厕所都要分开，以免互相见面。囚室与囚室之间严密隔离。一天，彭德怀从附近囚室传来一阵抗议声和剧烈咳嗽声中辨出了黄克诚，便千方百计利用一次去厕所的机会和黄克诚挨身而过，向黄克诚低声问“好”。

监视渐渐地变成虐待。“案犯”上厕所、喝水、站起、坐下，都要“报告”，哨兵（实际成了看守——编者注）又故意拖延不理，彭德怀小便急，去厕所常常被看守用“等一等”3个字拖延。这使彭德怀不堪忍受，有时气得拍桌捶墙。于是，哨兵便记录说彭德怀“大发雷霆，发出虎叫狼嚎般的声音”。

随后，监护点又规定“案犯”睡觉时必须面对室外的灯

光,不许翻身向里。彭德怀痛恨抗议,倦极翻身,哨兵就连连播门叫喊,根本不许他睡觉。

1971年8月的一篇《哨兵日记》中写道:“犯想睡觉,可哨兵就不让睡着。只要犯一闭眼,哨兵就拍打柱子,犯只得睁开眼睛看着外边。”

9月13日零点30分,彭德怀忍受着失眠的痛苦,猛叹一声,翻身朝里。哨兵在外敲门,不准彭德怀脸朝里睡觉,彭德怀回了一句:“我不得死!”彭德怀伸伸腰,索性挠腿睁眼,盯着电灯出神,蓦然又唱起来:“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正是在此刻,“副统帅”林彪在山海关爬上一架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外逃叛国。

林彪叛逃丧命后,林彪的心腹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经黄永胜同意的将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的罪恶方案终于未能执行。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极力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打击残害老干部的作法,力所能及地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对不能解放的,则设法改善他们的处境。

11月初,周恩来提出要检查北京监狱的待遇问题。按周恩来的指示,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领导人检查了什坊院监护点的待遇情况,之后又向周恩来作了书面报告。

在周恩来看来,北京卫戍区各关押点的条件差,而且比较分散。经过挑选,周恩来决定将全部监护对象集中到德外监狱和政法干校两处。

政法干校被选为什坊院“案犯”的新监护地。原政法干

校位于复兴门外木樨地运河畔。校内东北角有一座拐形两层小红楼,外有院墙,房屋宽敞明亮。

11月17日,彭德怀专案组为毛岸英的问题提审彭德怀。据哨兵记载,彭德怀回来时神智模糊,走错了地方。

哨兵叫住他,领他回到屋里。彭德怀倒床时昏迷,“扑通一下,头朝下磕在床板上”。哨兵扶起他,他两眼含泪说:“我认不清你是谁了。”

11月21日下午,专案组又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问道:“是审查委员会的吗?来审个啥,再审也是顽固,越审越顽固!”

一进审讯室,没几句话,彭德怀就顶起来。彭德怀气得敲桌打椅,叫喊声震撼了整个楼房:“什么反党集团!我是反错误路线!”“我又没跑,我又没有自杀,是什么反革命?!”

专案组审不下去了,只得放彭德怀回去。据哨兵记载,“他气哼哼,上不来气”,毕竟是70岁开外的人了。

彭德怀走到黄克诚房门前,故意停了一下。他已从隔墙的咳嗽声辨出来那就是黄克诚。他们竟住到紧邻来了。咫尺如山,无法见面,彭德怀和黄克诚就常常故意弄出些声响来传递友情。

对此,哨兵后来回忆说,一天,彭德怀问:“我的战友情况怎样?你给我问好。”“他的一举一动,说话咳嗽我都听得出来。”

黄克诚也早从隔墙的各种声音中知道,彭德怀就在隔壁。

彭德怀进到屋内,还在大声抗议:“骗子!骗子!”彭德怀把满腔悲愤之气传向隔室的“案犯”。

1971年12月30日夜晩，彭德怀看着表，送走旧岁，迎来新年。时针指向12时整时，他自言自语：“又一年！”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1年底以前的4年半，专案组对彭德怀的残酷审讯达200多次，直到他的健康完全崩溃。

1972年新年过后，彭德怀突然沉默了，不说不笑，也不骂人。他脸色青黄，每日大便四五次，便前总重复着一句话：“肚子不好，要快！”

1月5日夜，彭德怀、黄克诚等24名“案犯”被秘密押转到原政法干校。彭德怀被监禁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按房间顺序编号为“五号”。他就被呼为“五号”。其实，彭德怀一直是这个监护点的头号“案犯”。

到政法干校后第四天，彭德怀又被“传讯”。专案组向他宣布林彪反党事件。长期与世隔离的彭德怀，对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谋杀毛泽东难以相信。他很长时间心神不定，烦躁不安。

彭德怀到政法干校后，伙食明显改善了，哨兵对他的态度也和藹多了。 he可以和哨兵——年轻的战士谈谈话了。但是，对他的审讯仍然继续着过去的一套。

在一次提审中，专案组说1950年11月在朝鲜前线牺牲的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不是”美国飞机炸死的，而是彭德怀“有意害死的”。这个诬陷给彭德怀精神造成很大的刺激，致使他既气愤又伤心，连续失眠，甚至发生了幻视幻听。

3月16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各大医院抽调医生为“案犯”作全面身体检查。

彭德怀拒绝检查，并说：“我不检查，我现在也不工作，是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什么病!”说着说着,彭德怀就激动起来。

第二天,医生来到“五号”屋,只说服彭德怀抽了血,验血结果正常。实际上,致命的癌细胞已在吞噬着他的生命。

不久,彭德怀的右手指开始剧痛,并长了一个小疙瘩。他还经常便秘,失眠加重,每日凌晨一两点就醒来,睁眼到天明。之后,他常常便血,曾昏倒两次。

1972年底,彭梅魁鼓起勇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打听彭德怀的下落。

信落到专案组手里,专案组上报说,彭德怀“经党的多年教育至今仍不认罪”,“暂不准探亲”。专案组只允许彭梅魁寄送食物及日用物品,仍由北京卫戍区转交。以后彭梅魁就继续给彭德怀送东西。

1973年4月10日16时,彭德怀一次便血800毫升至1000毫升,经驻点医生检查,发现有一外痔,做了止血处理。专案组想到周恩来关于案犯有病可住院治疗的指示,报了彭德怀的病情,建议送医院检查。

当天晚上,彭德怀又便血。监护点联系送阜外医院,但医院拒收。监护点又联系北京卫戍区一师医院,又拒收。

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彭德怀才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即三〇一医院——编者注)第九诊室就诊。经内外科会诊,彭德怀患的是直肠癌,而且已属晚期。

4月17日,彭德怀经确诊患晚期直肠癌。当晚,专案组在关于彭德怀的病情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才提出:“鉴于彭德怀病情严重,准其侄女彭梅魁等家属探视。”

报告中附三〇一医院对彭德怀病情的诊断书。诊断书中说,便血原因可以相当肯定为此癌瘤破溃所致,癌瘤位于直肠左后壁,离肛门缘约6至7厘米。癌约五厘米,中心部有一溃疡,癌瘤较大,已属晚期。

4月18日上午,监护点要彭德怀去三〇一医院住院。彭德怀说:“我只需要把政治问题搞清楚,给我治政治病,不要住院。请示审委不要住院了。”

当天下午,彭德怀3次便血,病势严重。监护点不得不紧急送彭德怀去医院。

第二天,彭德怀躺在三〇一医院十四病室的第五病床上。这是一间单人病房,雪白的墙壁,雪白的床铺,只是窗户从底到顶用报纸糊着,昏暗、郁闷。病房门里门外都站着哨兵。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彭德怀应“保外就医”,但并未被遵循。

4月21日早晨,护士来扫除,打开一扇窗户,病房顿时明亮起来,彭德怀便要求医院将窗户上的纸去掉。但是医生叫他跟警卫战士说。

听到这话,彭德怀勃然大怒,拍桌子说:“我不是‘145’(为在医院保密,对彭德怀不用名,而用十四病室五床的编号,一如对犯人一般——编者注),是庐山那个彭德怀!住院了,你们还不放心!?!我不住这个月婆房(指像产妇房不透风不透光——编者注)!我回去住监狱!”

哨兵说,以后有什么事给专案组说。彭德怀气得把桌子拍得更响。彭德怀明白,他仍然是囚徒,住进了新的囚室。

4月22日,医院通知彭德怀说,按病情需要做手术。彭德怀提出要上面派人来与他谈话,与侄女彭梅魁见面的事。

4月23日下午,彭梅魁在两个专案组人员的带领下来到彭德怀的病房。彭梅魁见到病床上分离7年、过了6年囚犯生活、终于被摧残病倒的伯伯,一阵心酸,张着嘴,怎么也喊不出来。彭德怀伸出颤抖的手,紧紧握住彭梅魁的手。

因专案组的人在旁边,彭梅魁不能多问多说。一会儿,在专案人员的催促下,彭梅魁向彭德怀挥泪告别。

彭德怀说:“走吧,以后不要来看我,免得妨碍工作。”

得知彭德怀患直肠癌已到晚期,周恩来十分着急。他指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自强带着他的批示到三〇一医院了解彭德怀的病情,并查问:“为什么便血一年多没有发现?在一年多的时间中看过多少次病?哪个医生看的?”周恩来还问彭德怀同不同意做手术。

4月24日,三〇一医院开术前会,决定4月26日给彭德怀做手术。当天晚上,彭德怀拒绝做手术。

第二天,专案组的人匆匆去找彭梅魁,让她去动员彭德怀做手术。彭梅魁进了病房,只见彭德怀坐在病床上,紧闭双唇,凝视着墙壁。

彭梅魁悲唤一声:“伯伯?”

彭德怀先是不做声,慢慢扫视了一下周围才说:“我不做手术。”

彭梅魁刚要劝说,彭德怀转头对专案组的人大声说:“手术前我要求去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明天手术,我今天去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讲清楚。”

彭德怀越说越激动,从床上下来穿鞋就要向门口走去。

医生劝道:“不要生气,咱们慢慢再商量一下吧!”

彭德怀把手一摆说：“我就走，现在就走。”“问题搞清楚了再手术！”“背了一身黑锅，莫须有的罪名，死了也不甘心！”

彭德怀提出要见医院领导。不久，三〇一医院副院长和副政委一起来了。

彭德怀郑重地说，第一，推迟手术，他有一个材料要写，关于三线建设与战略防御方针问题。趁手术前头脑清醒写出来。第二，当天晚上打电话联系，“让主席、总理接见”。

医院领导人答应替彭德怀反映要求，坚持手术还是得做，然后和专案人员一起故意退场，留下彭梅魁一个人。

等众人走后，彭梅魁搀扶彭德怀坐在沙发上。

彭德怀问当医生的侄女：“梅魁，我这病只能手术吗？”

“对，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了。”彭梅魁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能去见毛主席吗？你现在就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一点坏处也没有，你还是做了吧。”

彭德怀静下来，听彭梅魁继续说下去。

彭梅魁说：“伯伯，你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解决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

彭德怀沉默了一会儿，看着彭梅魁说：“那我就做手术吧。”

4月26日7点15分，手术开始。手术由三〇一医院的外科主任陆维善大夫主刀。很快，切片检查确诊为恶性肿瘤。大夫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根除，并做结肠造瘘。下午1点14分，手术完毕。

彭德怀在病床上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凄怆的一声：“我成了一个残废人！”

由于手术后虚弱,心绪恶劣,大夫的努力未能阻止彭德怀身上癌细胞的迅速扩散。

手术后,专案组说彭德怀“常常放毒”,不让彭梅魁正常探视。彭德怀为了抵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就躺在病床上看书。

从1973年初搬到政法干校,“案犯”被允许委托监护点代购食物和书籍、用具。在被囚的25人中,彭德怀买食物最少,买的书籍最多。彭德怀说,只要有新书就给他买。彭德怀读《马恩选集》,读《史记》,读完了《史记》,又要读《隋书》、《唐书》,想把《二十四史》都买来读。

有时读书也不能平复彭德怀心头的愤怒。一次,彭德怀买来题为《我们正在前进》的小册子。书中又指名道姓骂彭德怀。彭德怀看着看着,把书一搁,愤愤说:“不讲真理!不调查乱写。”

彭德怀做手术半年后,伤口仍然红肿。10月24日,医院又给彭德怀拍片检查,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肺部。

11月19日,彭德怀开始化学治疗。

化疗一个多月,致使反应日益严重,呕吐出汗,大便从稀到水,彭德怀坐立不安,心绪缭乱。医生决定停止给彭德怀输液。

彭德怀说:“输吧,可以吸取经验教训。”

1974年元旦,彭德怀躺在病床上。没有人来看他,他自言自语地说,“又过去了一年”。

新年的《人民日报》送到彭德怀手中。彭德怀阅读着,得知元旦献辞又是“大批判”,又点了他彭德怀的名。彭德怀把

报纸一扔,气得胸脯一起一伏。

由于癌细胞迅速扩散到全身,彭德怀进行了第二次化疗。半身瘫痪的彭德怀,此时生活已不能自理了。

专案组允许彭德怀的侄儿侄女在星期天来探视。后来,彭梅魁、彭正祥、彭康白和彭钢在《泪水沾湿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当他们去看望彭德怀时,彭德怀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没有坐起来。

彭德怀躺在床上悲怆地喊道:“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

在病情严重期间,彭德怀嘱咐侄儿侄女们说,他死后,把他的骨灰埋在地下,上面种上果树,骨灰可作肥料。

在医生的要求下,彭德怀的病房窗户上糊的报纸被撕下来一半。彭德怀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阳台晒太阳,进出还要回避和其他病人见面。这年2月,彭德怀的右手指又开始剧痛,接着刀口疼,右肩疼,剧烈的疼痛折磨得彭德怀大汗淋漓,在床上翻腾。

到6月份,彭德怀已被剧痛折磨得消瘦不堪,神志昏迷。据哨兵记载,他一遍遍说着“晚上不得天亮,白天不得天黑”这句话。

剧烈的疼痛使彭德怀不再有任何拘束。他在病床上使尽全身的气力发出吼声:“我没有里通外国!”“把我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看,究竟是不是攻击?”

8月,彭德怀病势垂危。叶剑英得知彭德怀的情况后,指示人去医院看他,问他“有什么话要说”。

9月2日上午,专案组两个人进入彭德怀病室。彭德怀躺在病床上,艰难地、断断续续地向来人说出他的临终遗言:

“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周总理,我们相处三十多年,他是我们党内最能掌握和运用毛主席思想策略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胜利。”“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点上我是清白的。”“我们的国防建设,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备,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这是我最担心的,只要我们有计划,有准备,敌人的物质力量是可以战胜的。”“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做结论。”^①

这两位专案组的人向叶剑英报告了彭德怀的病情:左侧肢体偏瘫,右下肢浮肿,小便失禁,舌头发硬,说话不清。

彭德怀持续高烧,停止进食,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一次,彭德怀清醒过来,他要哨兵给他泡一壶湖南茶水,给他买一点西北的白兰瓜。他用力喝下了半壶家乡的茶水;西北的白兰瓜,他最后没能吃上。

9月16日以后,彭德怀失去了痛觉,进入深度昏迷状态。就是这样,彭德怀还与病魔搏斗了两个多月。

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在无情的癌痛中离开了人世。

^① 门吉寿:《临终遗言》,《中国人的脊梁——彭德怀》,第435页、435—436页、436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

彭德怀逝世后，专案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报告中还说，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专案组的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时任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在这个报告上“批示”“照报告上所提办法办”。

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由三〇一医院送北京火葬场火化，申请表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女，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〇〇一二六九〇。”

专案组的人带着上面贴了一张纸条、写着“王川，男”3个字的骨灰盒和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到成都，指名要见四川省委、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的3名主要负责人，说明骨灰由来，交代要绝对保密，放在一般公墓即可。

专案组人员还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地方，以免查找时弄错。

经手寄存的人在填表时想，这份骨灰非同寻常，当代名人中并无王川其人，想必是个化名。于是经手人就在填表时临时改填了一下，将王川的年龄改为32岁，籍贯改成四川省成都市。寄存经手人认为这样做更不引人注目一些。

于是，彭德怀的骨灰盒被托名为“王川”，存放在成都市东郊火葬场二七三号骨灰架上。

在动乱的年代，冤狱遍及全国。但是，假的总是假的；欺

骗,虽可得逞于一时,但决不会长久。历史的潮流,最终还是会冲击一切污泥秽物,将事物的真实面目揭示于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在郑重审查后作出结论,为共和国元帅彭德怀蒙受的不白之冤平反,为彭德怀同志恢复名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人民以正确交待。

第八章 岁月蒙尘

一大批冤假错案酿成(下)

全国各地出现了批斗“右倾翻案风”迹象 林彪、江青策划“杨、余、傅事件” 杨成武所犯的5条“错误” 杨成武被批斗的经过 傅崇碧离开北京,被调沈阳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以上干部大会 “杨、余、傅事件”包含的政治背景 “大树特树”成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 杨成武搞过江青的“黑材料” 余立金有点“迂腐” 傅崇碧被称为“不识抬举” “派性”又成了“好东西” 所谓“‘杨、余、傅’的‘黑后台’是‘二月逆流’的人” 艺术家严凤英被迫害致死真相 “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幕后 “乒乓三杰”被打击迫害致死背后 共和国元帅贺龙冤案始末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平反的决定》

在毛泽东指出造反派犯了错误、要克服派性以及王力、关锋、戚本禹被隔离以后，全国各地对造反派的不满进一步发展。1967年10月以后，全国出现了批斗所谓“右倾翻案风”的迹象。

1967年11月10日，上海市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的全体人员，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了《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组织领导的请示报告》。

为了说明问题，《请示报告》讲了一段历史。《请示报告》中说，1960年建立了上海市委保密委员会，由原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任主任，原市委秘书长李家齐任副主任，在原市委领导下，统一领导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保密工作。

《请示报告》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保密工作置于“政法指挥部”领导下提出意见，认为把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保密工作放在专政机关是不合适的，建议“在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保密组”。

这本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请示报告》，而且言之有理。不料，张春桥看后大发雷霆，并在《请示报告》上写了几条批注。《请示报告》的编号为“(67)密办第207号”。对此，张春桥在《请示报告》上批道：“文件编号，看起来是一个小事，有的人却死抱住旧市委不放，用旧编号继承旧传统”。

《请示报告》指出，不少重要单位的保密工作，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这种情况长此下去，对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极为不利。对此，张春桥批注说，这就是说，市革命委员会不如

陈丕显、曹荻秋、黄赤波,甚至比他们犯了更大的错误,“极为不利”,还是由“保密委员会”的黄赤波、李家齐“负责抓”。

在《请示报告》最后,张春桥写了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个错误的文件”,请文件的作者们想一想,在上海究竟发生过一场“争权斗争”没有?他们头脑中究竟是承认“陈、曹即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代理人”的权,还是承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解决了这个问题,再建立保密机构的事。

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戚本禹都于11月26日作了批示,同意张春桥的蛮不讲理的意见。

12月27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就此事发出文件,强调指出要“进一步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

1967年底至1968年初,上海一些群众组织发表了怀疑和批判江青、张春桥的言论。1968年2月,在中共中央宣布将戚本禹隔离审查后不久,外交部的91名司局长联名贴出大字报,要求揭露并批判煽动打倒陈毅的极“左”人物。

1967年和1968年初,天津市若干受过错误批判斗争的文艺界人士举行聚会,准备成立一个组织,演出节目。因为这些同志是所谓“黑线人物”,所以他们的活动被视为“逆流”。

1968年2月21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接见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代表,并且讲了话。他们指责天津市文艺界出现了“黑会”,要演出“黑戏”。他们还说,“黑会”带有“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夺权”的性质,反映了社会上“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潮”;这是“刘、邓在文艺战线的一小撮代理人妄图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事件”。

2月底,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在评选学习毛泽东著作积

极分子的标准中加了一条“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常委的正确领导”的补充条件。

国防科工委系统的群众组织的一个派对此表示反对。

这件事聂荣臻还不知道，却很快反映到毛泽东和林彪那里去了，被斥为“多中心”论。

聂荣臻被诬为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这件事就更具有所谓“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性质。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这个提法。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于4月4日取消了这一条。

3月11日晚，北京大专学校代表和中学“红代会”代表汇报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汇报会上，北京石油学院群众组织“大庆公社”批评该校另一群众组织“北京公社”。“大庆公社”说“北京公社”在1967年“反副总理”、“反余秋里，炮打周总理”、“炮打副总理，反总理”。

江青等人听了“大庆公社”的这番话后，勃然大怒。姚文元说：“你再重复一遍”，“再说一遍。”

江青反问“大庆公社”的代表们，在“二月逆流”里“炮打谭震林”对不对，谭震林该不该打。

江青说，你们成了“一贯正确”了，对余秋里不是“一批二保”，而是“一贯地保”，倒成了正确了。你们是拥护“二月逆流”，就是那一派，是“反我们的、炮轰我们的”。你们实际上“是炮轰我们的，轰吧，胆小鬼才怕呢！”

江青越说越气，一拍桌子说，“二月逆流”是什么东西，就是要推翻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说,“二月逆流”就是要“推翻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二月逆流”的本质就在这里。

吴法宪、叶群也相继表示“拥护江青同志的发言”。

3月15日晚,在接见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领导成员时,江青说,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她就不相信四川没有“翻案风”。北京学生替“二月逆流”翻案,他们就“轰了他一炮”。

3月18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在致谢富治的信中说:“你和戚本禹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和他是亲密的,不是一般关系。你为什么对他那样奉若神明,百般吹捧,言听计从,步步紧跟?”

3月20日,吴德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会议上说:“街上有反对谢富治同志的大字报。”

第二天,吴德在革委会会议上又说,有人利用市革委会、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矛头指向革委会,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卫戍区,并把矛头指向“我们的主任谢富治同志”,“说什么揪出变色龙谢富治,横扫小爬虫”,“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向断头台”。

同年3月,北大聂元梓等人“炮打谢富治”。谢富治于3月25日在北大广播台讲话时说:“新北大的新北大公社给我个人的批评好得很。”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所谓“右倾翻案活动”,并且一时成“风”。

在北京,清华大学有些人认为被打倒的蒋南翔、刘冰等是

革命领导干部,认为“一月夺权是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大翻个儿”。清华大学的一些人还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沿着危险的道路滑得够远的了”。

“工总司”的头头叶昌明4月13日在上海“工总司”紧急会议上传达王少庸在上海市革委会紧急会议上的讲话时说:“前一个时期,北京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大叛徒。”

在四川,许多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刘结挺、张西挺,在成都街头贴出了“杀头坐牢何所惧,打倒刘、张志不移”的大标语。

在江西,程世清于4月9日在机械、煤炭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上说,江西也有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的现象,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的现象。九江、上饶、景德镇、萍乡、宜春及其他地方,公开号召“为牛鬼蛇神翻案”。

在内蒙古,滕海清于4月13日在庆祝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发表一周年大会上说,内蒙古地区为乌兰夫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同时,内蒙古人民普遍反映“乌兰夫是好同志,给蒙古人民办了好多好事,死了也不忘记乌兰夫的好处,忘了就是忘本”。

在河南,刘建勋在这年3月召开的郑州地区工代会上说,有些人在搞秘密串连,开“黑会”,造“谣言”,放“暗箭”,千奇百怪的“为什么”满天飞,大造“反革命”舆论,“叫嚷什么‘二月黑风不黑’”,把河南的“一派大好形势诬蔑为‘比二月黑风

还要黑’，甚至扬言‘中央对河南问题要重新表态’，‘把颠倒了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要解放河南’，‘要彻底翻身’”。

洛阳街头上出现“打倒谢富治”的标语。对此，刘建勋说，他们以反派性为名，“抹煞”路线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而安阳还出现了“中国两个司令部的性质还不一定”、“特别重要的是恢复中国近十几年的历史”这样的言论，甚至高挂刘少奇的画像。

以上这些情况，使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十分惊慌。在3月18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会议上，江青对代表团说，1967年冬天以后，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

3月21日，在“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赴京汇报团和中共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江苏班全体学员的会议上，江青又说，从1967年冬天，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击溃了形“左”实右、击溃了“钻进我们心脏里的彭、罗、陆、杨留下的一批爪牙”，“右倾保守主义”就冒头了，1968年就“大肆活动”了，表现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

康生在会上说，眼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北京有，南京也可能有。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有的替“二月逆流”的“头子”之一谭震林翻案。

正当全国出现所谓“右倾翻案风”时，毛泽东作出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判断。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①

早在3月18日“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会议上和3月21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江苏班全体学员的会议上，康生就对毛泽东的这个新判断作了“传达”。康生在会上还说：“这一点，是毛主席亲自告诉我们的。”

3月25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说，“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谢富治表示，他很晚才知道毛泽东的这个精神。他一直在搞“反派性”，派性“已经很危险”。

在江青、康生等人在各种场合宣称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的同时，林彪也正急于排除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企图将军权进一步直接控制在自己手里。

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彪、江青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首先策划“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此时分别担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空军政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他们对“左”倾错误和江青、林彪等人的阴谋诡计有所抵制，为江青、林彪所嫉恨。

1968年3月中旬，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聚在一起，分析了所谓阶级斗争形势的“新特点、新动向”。

经过分析，林彪、江青等人认为，身居要职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已成为他们夺权的“重要障碍”了，再加上这些人

^①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的一段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并不“听话”。于是,林彪、江青等人联合制造了“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样一起突发事件。

事情的借口是,1968年3月5日夜,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杨成武等布置查找鲁迅手稿的任务。杨成武经多方查询后,证实“遗失”的手稿就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驻地。

3月8日,协助查找手稿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带人驱车前往钓鱼台向江青报告此事,反被恼羞成怒的江青诬称傅崇碧等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杨成武觉得不平,当面顶撞了江青,并拒绝批评傅崇碧等。

对此,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就在这时,在场的周恩来劝住他,要他务必走一趟,去“批评批评”卫戍区的同志。杨成武从周恩来“用力握着的手上,领会到他的暗示”,便主持了卫戍区师以上干部的“批评会”。

但是,周恩来尽了很大努力仍没能阻止这个事件的发生。

这时,林彪、江青等人设想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所谓“五个回合”。

这“五个回合”指的是:第一个大回合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第二个回合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第三个回合击退“二月逆流”;第四个回合击退“刘、邓、陶的爪牙王(力)、关(锋)、戚(本禹)”;第五个回合是揭露“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反革命阴谋,把他们打倒”。

按照林彪、江青等人的设想,打完第五个回合,便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等人一般都是采用诬陷、突袭等手段去打倒“敌人”的，而他们逮捕“杨、余、傅”，取得所谓“第五个回合的胜利”，则更富有诡秘色彩。

3月22日凌晨，林彪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汇报了所谓“杨成武的问题”。林彪将杨成武的“错误”归纳为以下5条：

杨成武的第一条“错误”是，杨成武对林彪“搞突然袭击”。林彪还说，“杨成武拉拢叶群整吴法宪”，并“勾结余立金夺吴法宪的权”。

杨成武的第二条“错误”是，杨成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在批判罗瑞卿时，杨成武“掉了眼泪”，说“可惜”。开会时，杨成武又“反对开除罗瑞卿的党籍”。

杨成武的第三条“错误”是，杨成武搞“宗派主义”，搞晋察冀的“华北山头主义”。他写的所谓“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实际上是要“大树特树他自己的绝对权威”。

杨成武的第四条“错误”是，杨成武“勾结傅崇碧利用北京学生两大派的矛盾，挑拨谢富治和聂元梓的关系，分裂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企图搞垮谢富治，篡夺北京市革委会的领导权”。

杨成武的第五条“错误”是，杨成武在总参谋部“整了林彪办公室秘书郭连楷的老婆”，“影响了林办的工作”。

汇报会还未结束，毛泽东因疲累退席。周恩来主持碰头会。会议讨论并作出了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处理办法。其内容如下：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①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联合发布命令称：“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所任职务，任命黄永胜（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编者注）为总参谋长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3月23日凌晨，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以通知余立金开会为由，将余立金骗出家后，给他戴上手铐。

对此，余立金不解地怒问吴法宪：“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是空军的政委！凭什么铐我？你们这是要搞政变！”

吴法宪“嘿嘿”地干笑了两声，说：“什么？你还是空军的政委？告诉你，你被撤职了。你是个大叛徒、大特务！从现在起，交代你的反党反社会的罪行！”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67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这时，杨成武正患病在家休息。杨成武的父亲刚去世两天，因病，杨成武连殡葬都未去参加。夜里，杨成武又吃了一些安眠药，刚入睡不久，林彪就派他的两个秘书以探病为由，先查清杨成武是否在家，后又执意要见杨成武本人。

杨成武的秘书劝阻无效，只好领来人走进杨成武的卧室。见到杨成武后，林彪的两个秘书随便说了几句话就起身告辞了。

3月23日凌晨2时许，驻杨成武家附近的卫戍部队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不许开灯，不许喧哗，稀里糊涂地被匆忙拉到了景山。

紧接着，几辆小轿车开进了杨成武的住地，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冲进楼里抓人。杨成武的家人像犯人一样被赶进楼下客厅。

与此同时，李作鹏、邱会作带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大汉闯进杨成武的卧室。早已被吵醒的杨成武，这时正披着睡衣，怒气冲冲地注视着他们。

邱会作假惺惺地对杨成武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

“你少来这一套！”已识破骗局的杨成武气呼呼地对邱会作说：“你们没有党性。没有党性也该有人性嘛！邱会作，你也要有良心呀！”

邱会作被杨成武的这几句话震慑了。后来，邱会作在受审时交待说，“杨成武的这句话打动了他的心”。邱会作说他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以后每当想起杨成武的那句话，他总感到心惊肉跳。

杨成武在被几个人押着走下楼梯时，发现家人、秘书和警

卫员都被关在客厅。杨成武走过去要看妻子、母亲和孩子。

警卫团的一个副团长企图阻拦他,却被杨成武推在一边。

稍稍稳定一下情绪的杨成武,对家人、秘书和警卫员说:
“你们不用害怕,我不是反革命,要相信毛主席、共产党,事情会搞清楚的,我走了!”

杨成武被押至人民大会堂后,由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30多人参加的批斗杨成武会议。

会上,杨成武被扣上了“命令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为‘二月逆流’翻案”等罪名。随后,杨成武被一架军用飞机押往武汉。

同一天晚上,林彪一伙又将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调离北京。

当天晚上,傅崇碧正在北京市革委会大楼第六层会议室里参加讨论一篇号召各派群众组织进行联合的社论。

会议讨论期间,时任公安部部长、北京卫戍区政委的谢富治打电话说,林彪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马上就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卫戍区团以上干部,谢富治要傅崇碧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傅崇碧接到电话后,迅速驰往人民大会堂。

傅崇碧在人民大会堂等了一段时间,正感到纳闷时,看见周恩来从北京厅走了出来。傅崇碧快步向前。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说:“到里面谈。”

接着,周恩来领着傅崇碧朝一间小会议室走去。接近门口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傅崇碧说:“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你都要冷静、冷静,不要激动!”

傅崇碧意识到,周恩来的话已经暗示将有严重的情况发

生。傅崇碧跟着周恩来走进房间时,发现林彪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已坐在里面。

过了一会儿,林彪板着面孔对傅崇碧说:“现在向你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你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主要负责北京卫戍区,接替你的工作。”

面对这突然的“调令”,傅崇碧还未反应过来,林彪等人就宣布完命令,随后就走出了会议室。室内只留下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周恩来和谢富治走了进来,要求同傅崇碧一道用餐。傅崇碧一点食欲也没有,随便吃了几口后便不再吃了。

周恩来见状,紧紧地注视着傅崇碧说:“崇碧同志,飞机已准备好了,是不是走?”

心事重重的傅崇碧愤然说道:“我想不通!哪有这样调动工作的?”

周恩来既没有劝导傅崇碧,也没有批评他,只是问:“你是不是要回去拿什么东西?”

“不回去了!”傅崇碧回答道。

傅崇碧不愿给家里写条子,后来在周恩来再三规劝下,还是匆匆写了两句话:“现在我不能回来了,已调沈阳工作。到那里以后,如果有机会,再给你们写信。”

接着,周恩来将傅崇碧带至大厅门口,紧握着傅崇碧的手,叮嘱道:“现在你身体不好,首先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住考验,革命工作有的是。”之后,周恩来还委托人照顾好傅崇

碧的生活。

当天夜里,傅崇碧被几个军人拥上车,直奔北京西郊机场。然后,傅崇碧被押送去了沈阳。

后来,傅崇碧在回忆周恩来与他告别时的情景时说:“1968年3月22日夜,林彪、江青一伙一手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假案。我遭受政治迫害离开北京的那天,总理的处境虽然十分困难,仍然与我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吃了饭,分别时,总理紧握着我的手说:‘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住考验,以后有的是工作做!’他还嘱咐有关的领导同志照顾好我的生活。”^①

3月24日凌晨2时,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军以上干部大会。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军事院校以及其他单位的团以上干部1万余人参加会议。毛泽东亲自到会接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了会议。林彪在会上作了所谓“极其重要的指示”。

开会前,林彪一伙对座次作了精心安排。中共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全坐在主席台上。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李先念、叶剑英等所谓搞“二月逆流”的人,都被安排在台下就坐。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首先在会上发言。

林彪说有件事要向大家宣布一下。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钓鱼台,冲进“中央文革小组”的地点去抓人。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

^① 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人。

在讲话中，林彪除了宣布3月22日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对其作了歪曲事实、强词夺理的解释外，还影射攻击“二月逆流”。

林彪打着官腔，越讲越起劲，最后又公开宣布撤销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

把“杨、余、傅事件”在党内斗争中公开化，并且在万人大会上公开这样宣讲，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在这时因为这种怪论是出于“副统帅”之口，还是被奉为“金科玉律”，无人敢提出半点不同意见。

林彪在讲话中，借口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谓“对中央文革是不忠诚的”，公开地吹捧江青。一时间，口号声此起彼伏，演出了一场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互相吹捧的闹剧。

接着，江青在讲话中无中生有地制造了杨成武三次批示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弥天大谎，对杨成武、傅崇碧进行大肆诬蔑。

陈伯达、康生等也登台唱和。陈伯达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五次伟大胜利”。

康生接着说，“完全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的、既严肃又宽大的英明决定”，“应当说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树立了特殊的功绩”。

康生还说：“我想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

康生话中带刺，聂荣臻便首当其冲了。

在林彪讲话时，康生还大声插话说“傅崇碧的后台是叶剑英。”

林彪、江青一伙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就是要挖出原晋察冀军区的“黑后台”，冲击军队中的老师们。

在会议的最后，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与会者。全场顿时一片沸腾，长时间鼓掌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并齐声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第五次伟大胜利”就这样“告捷”了。3位高级将领就这样被突然打倒了。

3月29日，张春桥在上海人民广场大会上讲到此事时说：“在这一个伟大的斗争中间，江青同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亲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对于危及“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出现，当然不会漠然置之。显然，毛泽东同意抓一个“典型”整一下。不如此不足以反击“妖风”。“抓典型”也是老办法。1959年，党内党外对“三面红旗”议论纷纷的时候，就抓了彭德怀这个“典型”，以反击所谓“右倾”。

虽然“杨、余、傅事件”的发生包含了重大的政治背景，但林彪、江青等人此时之所以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3人格格外“垂青”，其中还包含了许多个人恩怨。按林彪等人的看法，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3人是“自食其果”。

1965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所谓解决罗瑞卿问题

的会议之后，决定由杨成武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文化大革命”动乱伊始，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杨成武和很多人一样，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逐步深入，杨成武慢慢地发现了许多不正常的事情，尤其看不惯林彪、江青等人的胡作非为。后来，杨成武开始遇事暗中掣肘。

在王力、关锋、戚本禹到处煽风点火、煽动造反派引起大规模的乱中夺权时，杨成武奉周恩来的密令亲赴上海，将情况如实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随即发出了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命令。

对此，林彪、江青等人表面上故作镇定，并“义愤填膺”地批判了“王、关、戚”，内心却十分恐慌。

毛泽东在1967年7月至9月巡视华北、中南和华东3大区时，杨成武随行。在随同毛泽东视察期间，杨成武听到过一些毛泽东对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不满。

针对林彪“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题词。毛泽东对杨成武等在场的人说：“谁封我的四个官啊？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永远不死的人吗？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是要吃亏的。”杨成武记下了毛泽东的话。

在毛泽东巡视期间，林彪一伙正在加紧围攻老师们。毛泽东却对这些老师作了很高的评价。

毛泽东当面对杨成武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呢？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陈毅是个好同

志。”“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聂荣臻是个厚道人。”“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再搞了，那是张国焘的事情。”“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

对毛泽东的这些话，杨成武当时都作了记录。

杨成武回想起毛泽东离京时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说过“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这使杨成武更加感觉到，毛泽东和林彪、江青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同。

杨成武返京之后，将毛泽东在外地的谈话记录向周恩来作了传达汇报。几位老师也都听到了传达。

但是，当叶群多次追问毛泽东对林彪如何评价时，杨成武一直回避，没有回答。

另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后不久，林彪就要杨成武对几位老师停发文件，但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只扣下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重要的文件仍照送不停。后来林彪也发觉了这件事。

解放军总参谋部一次在京西宾馆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杨成武、叶群等人都参加了。当大家高呼“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时，杨成武只淡淡地呼了声“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在场的叶群听到杨成武竟然少了关键的“永远”二字，便迅速快步靠近杨成武，气呼呼地说：“杨代总长，你不喊永远健康没关系，但林彪的内脏都很健康。”说完，叶群转身就走了。

1968年3月初，林彪办公室打电话给杨成武，以林彪有要事相商为由，要杨成武晚上去一趟毛家湾林彪的住宅。

杨成武于当天晚上准时到达林彪的住地。

在会客厅里，林彪看了一眼叶群，对杨成武说，有人写信，说叶群是假党员，还参加过国民党。对这个问题，他曾派人作过调查，很多材料已证明叶群的历史是清楚的，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真的。但写证明材料的人职位不够高。林彪说，叶群是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人，杨成武是总参负责人，又是军委常委，能不能给叶群写一个证明？

林彪说话的语气与其说是“商榷”，还不如说是“摊牌”。面对林彪的傲慢，杨成武深思了一会儿，平静地说，他过去根本不认识叶群。抗战以前，叶群在白区，他在苏区，在陕北。直到1960年，他才认识叶群，叫他写叶群的入党证明，恐怕不太合适吧。杨成武还表示，谁讲叶群有什么问题，谁证明叶群没有什么问题，他都没看过，因而，他不能写证明。

林彪听完杨成武的话后，脸色突变，半晌没说出话来。林彪注视着眼前的这位“老下级”，心想连这点“小忙”都不肯帮，也确实“太不听话”了。

面对屋里的紧张气氛，杨成武知趣地问道：“林总还有什么批示吗？”

林彪冷冷地下了逐客令：“没有了。”

杨成武走出林彪住宅，心头不禁掠过一丝凉意，仿佛看见有一双黑手正从他背后伸去。

为了给杨成武“定罪”，林彪、江青等人拿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刊登的题为《大树特树伟大统

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文章,给杨成武扣了个“杨成武要大树特树他自己的权威”的罪名。

早在1967年秋,毛泽东在巡视时,决定让杨成武随他同行,并让杨成武担任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联络员。

在毛泽东等人离开北京之后,林彪借口杨成武随毛泽东外出,管不了军委的事,背着毛泽东,指定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中央军委4人小组,又叫“军委办事组”,并指定吴法宪任组长。

军委办事组成立后,给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下达写作任务,要他们写出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批判文章。

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也接受了这个任务,并组织撰写了一篇歌颂毛泽东、谈领袖权威的文章。

时任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的李天佑、王新亭,在文章草拟后,先后召开会议,讨论并修改了3次,才定稿打印。

文章定稿后,由代总长办公室秘书送到此时正陪毛泽东在上海的杨成武,交杨成武审阅。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文章标题开始也没有“大树特树”。

在杨成武看来,布置各单位写文章的事,他不清楚,文章又不是他要写的。既然文章中谈到领袖权威的问题,这不是个小事。杨成武认为这篇文章有必要送给毛泽东看一看。

于是,杨成武在文章标题的空白处写道:“主席: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间一阅,并给指示。”

杨成武将文章送给毛泽东后,没有再去追问,因为杨成武

认为这并不是要急于处理的事。

三四天后,在毛泽东身边作保健工作的护士长吴旭君,急匆匆地将一卷纸送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

杨成武接过一看,是毛泽东将文章退回来了,上面并有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这时,吴旭君悄悄地对杨成武说,“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净是吹我的’。”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文章被送回北京,交给陈伯达和姚文元“酌处”。

杨成武陪毛泽东于9月23日从南方回到北京。没过几天,陈伯达给杨成武打来电话,说总参写的那篇文章,他已看过,也修改过了。陈伯达还表示,文章应该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

对此,杨成武明确回答说:“不行,文章不是我写的,我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呢?”

陈伯达说:“用领导同志署名发表文章,比用‘无产阶级革命派’有力量得多。”

对于陈伯达说的这个“理由”,杨成武不敢苟同。于是,杨成武推托说:“你是理论权威,又修改过这篇文章,用你的名义发表不是更有力量吗?”

陈伯达只好改口说:“那就再研究研究吧。”

事情就这样放下了。而这时,文章的标题已改成《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了。但是,文章的题目究竟是怎样改的,为什么这么改,杨成武并不清楚。

因为杨成武坚决不同意在文章中署他的名,陈伯达便将

这件事转告林彪。

不多久,叶群给杨成武打了电话。叶群先寒暄了一阵,然后说:“‘101’(叶群对林彪的习惯称呼——编者注)让我给你打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件事报告林彪,而林彪又马上叫叶群打来电话。还没等杨成武张口,叶群又说,总参写的那篇文章。陈伯达给“101”打来电话,说稿子他看了并作了修改,“现在送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叶群并告诉杨成武说,这是“101”的意见。

叶群说得很肯定,让人感到没有商量的余地。杨成武觉得这件事很让他为难。在杨成武看来,陈伯达虽然是中共中央常委,但毕竟不直接管军队的事,对陈伯达的意见,他可以借故推辞。然而,陈伯达已经将林彪抬出来,再不执行就很难办了。于是,杨成武换了一个方式推辞。杨成武向叶群强调自己对政治理论方面不在行,要叶群报告林彪不要用他的名义。

稍顷,叶群又打电话对杨成武说:“请示了‘101’,‘101’说就这么定了,以你的名义发表。你是代总长,身分合适。”

杨成武问叶群:“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对杨成武提出的问题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101’讲了,党组织有权以一个党员名义发表文章。”叶群又说,“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没有问题。“101”在“八九”讲话中讲了,1967年7月《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提了,8月2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用的标题就是“大树特树”,10月1日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也论述过。

听叶群这么一讲,杨成武感到很难推辞了。但他还是表示,文章不是他写的,他也没有时间仔细研究,而用他的名义发表,这总不大合适。

叶群又劝说道:“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很多”。接着,叶群引用林彪的话,俨然一个大学问家,旁征博引。叶群说,在延安时,1944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是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但用谭政的名字发表;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用江华的名义发表;还有,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讲话,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总之,叶群的结论就是组织上有权用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

杨成武还想继续说明,但还没有等杨成武把话说完,叶群就以命令似的口气说:“定了。‘101’讲,就这样定了。”然后,叶群把电话挂了。

在杨成武看来,中国共产党党章明文规定,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林彪是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毛主席的接班人”。对于林彪决定的事,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军人,又是林彪的“老部下”,尽管觉得不太妥当,也只能服从、只好照办了。

然而,杨成武觉得发表这样大块的理论文章,自己实在没有把握。于是,杨成武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同志和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的负责人,召开会议,研究这个问题。

会议是在三座门召开的。杨成武等起草小组的同志到齐后,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文章不是我写的。我本来不同意用我的名义发表,但林副主席一定要以我的名义发表。你们

都是一些秀才,一定要好好把关。文章里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不能搞错了。引文一定要搞准确。”

在讨论会上,起草小组的同志对文章又一次仔细推敲,对引文又作了认真的核对后,将文章送给了陈伯达、姚文元。这篇文章被陈伯达、姚文元再一次审定,然后直接送新华社、人民日报社。

同年11月3日,《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这篇文章就这样发表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此后,各报刊、广播中也大量出现了“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

其实,毛泽东并不赞成这种提法。文章见报后第三天,即11月5日,毛泽东找康生和杨成武在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首次提到这篇文章。

毛泽东说:“成武,用你的名字发表的大树特树的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从标题看,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

接着,毛泽东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文章虽然不是杨成武写的,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文章毕竟是署了他的名,杨成武觉得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竟然连标题有错误都没有觉察出来,心里顿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惭愧。

随后,康生和杨成武将毛泽东的指示在中共中央的小型碰头会上作了传达。

杨成武在中央碰头会上就此作了自我批评。杨成武说:

“文章虽说不是我写的,但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甚至连标题就有错误也没有发现。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主要负责人,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而我对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了解太少,应该作自我批评。”

陈伯达在散会时,连连拱手向杨成武表示歉意,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给你做错了一件事。”

由于毛泽东的指示没有向下传达,“大树特树”的提法在全国报刊和各省市的文件报告中很是流行,而且呈现着一种有增无减的趋势。

12月中旬,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准备在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就铁路通车到达韶山和毛泽东塑像落成两件事,搞一个盛大庆典。为此,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于12月13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报告》文字不长,却多次提到“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报告》说,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在韶山建造毛泽东塑像和修建通往韶山的铁路这两项工程即将竣工。广大群众要求在当年12月26日,即毛泽东寿辰这天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

《报告》还说,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特请示3个问题。

《报告》请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请“毛主席为‘韶山车站’(或‘韶山站’)题字”,“请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为毛主席塑像落成题词,并请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派人来韶山参加庆

祝活动”。

《报告》请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大会名称,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经讨论后对大会的名称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大会称为“毛主席塑像落成及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大会”。另一种意见是大会名称为“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大会”,会上举行塑像落成及通车典礼。《报告》说,为了尊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不祝寿”的教导,认为第一种意见为好。

《报告》请示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准备当年12月26日在韶山举行约5万人的庆祝大会,同时在长沙、株洲、湘潭等车站组织庆祝活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准备除组织省报和有关宣传部门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外,并希望新影能派人摄制新闻纪录片。

毛泽东看了湖南的这个《报告》后,认为这和他视察大江南北时讲的“不要宣传个人,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否则将来要犯大错误,吃大亏”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

12月1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请示《报告》上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再次提出批评,并作了6点批示: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

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①

毛泽东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问题看得非常重要。他将这一批示写给“林(彪)、周(恩来)、中央及文革诸同志”,并提出“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又一次就“大树特树”的文章,当面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和姚文元。

毛泽东说:“书越读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吗?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标题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你(指陈伯达——编者注)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我才不相信你们这些写文章的人呢!”

毛泽东的严肃批评,使陈伯达坐在那里动都不敢动,连头也不敢抬。

^① 毛泽东:《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等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12月21日下午6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天天读”会上,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第四次对“大树特树”文章的有关指示。

毛泽东指示说,不怪湖南嘛,湖南是个引子,也不是杨成武的问题。特别不是杨成武的事。这也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党学习问题。

毛泽东还指示说,要学习嘛,全党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说,他看了30本书。“不要专吃清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于12月21日发出通知,转发了毛泽东对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报告》的批示和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请示报告》,要求各省市“认真学习,坚决照办”。

杨成武看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和毛泽东的文字批示后,更加感到那篇文章错误的严重性。因此,杨成武向周恩来建议,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避免再提这类错误口号,犯同样的错误,是否可以将住在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召集起来开个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对文章的批评和对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请示报告》的批示,以刹住这股风。

周恩来同意了杨成武的建议。

12月22日晚10时半,杨成武赶到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集在京的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以及《解放军报》的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

杨成武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毛泽东对“大

树特树”问题的几次批示的全部内容。杨成武还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从此以后，中共中央各大报刊再也没有使用“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了，全国高级干部开始学习毛泽东提倡的30本书了。尽管如此，杨成武仍对此事深感内疚。

多年以后，杨成武在谈起“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时，认为自己做了一件蠢事。杨成武说，当时就他的水平而言，是写不出如此的大块理论文章来的。文章引经据典，点名批判，上纲上线。尽管当时是奉命行事，后来在向党中央、毛泽东写的书面检讨中，专门就这个问题做了检查。然而，后来回顾起来，心里仍感到内疚，因为那时自己没有顶住，做了一件蠢事，教训是深刻的。

但是，在毛泽东批评以前，大多数人根本没想到“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会有错误。这时除了报刊、广播经常使用外，就提法本身来看，杨成武并没有认识到不对，只是想到这类提法和“永远忠于”、“无限热爱”差不多，是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敬感情。

陈伯达、姚文元包括林彪在内，当初批发“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时，对毛泽东后来的批评是始料不及的。但是，在毛泽东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批评后，特别是在“打倒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林彪、陈伯达、姚文元等人歪曲事实，隐瞒真相，把一切罪过全部转嫁到了杨成武一个人头上。

在人民大会堂1968年3月24日晚上召开的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林彪、陈伯达等人在就“杨、余、傅事件”讲话时，将这篇文章列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

陈伯达说,这篇文章他“根本没看”,搁在他的床底下,压了一个多月。“这样的文章,居然能发表?”

陈伯达还诬陷说,这篇文章其实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权威”,在军事单位中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领导”。

在讲话时,康生更是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康生不屑一顾地说,“大树特树”,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杨成武似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所知。

江青信口开河说:“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不用多看,看个标题就是错误的嘛!”江青还说杨成武“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想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

林彪颠倒是非地说,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杨成武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第二版上,他还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还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

林彪又一次重演了他善于摆弄的“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的故伎,无中生有地给杨成武加上一系列“罪名”。

林彪在会上宣布杨成武的“罪状”时说,表面上看,杨成武是“拥护”江青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江青不满的,江青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就搞江青。

林彪这句话才讲了一半。江青就像触了电似的,立即打断林彪的讲话,对着话筒大声说:“还要早呢,在去年春天就搞了!”

林彪顿时思路被打乱,不知说什么好,于是顺着江青的话,随意编造说:“噢,早在去年春天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

实际上成立了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

早在1967年4月12日深夜，江青召集杨成武、陈虹（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编者注）、王育民、王成恩（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科长——编者注）、朱铁铮等开会。叶群、戚本禹也参加了会议。

陈虹、王育民、王成恩、朱铁铮4个人根据通知在京西宾馆坐等了约半小时，江青、叶群、戚本禹来了，杨成武随即也到了。

江青一进门，就按照手里拿着的一个小纸条上早已写好的名字，挨个地叫着，陈虹、王育民、王成恩、朱铁铮。叫到谁，谁就按军人的礼节回答“到”，并站了起来。

江青点过名，确认该来的人都来了，就摆出一副领导的架势，威严地对他们4人说：“现在我宣布，由陈虹为组长，王育民任副组长，派你们去上海收集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

江青还说，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最近，“中央文革小组”收到一个名叫王徵民的写来的信，揭发有人通敌，给台湾发电报。这些电报底稿都在上海。种种迹象表明，底稿有被转移的危险。江青对陈虹等人说，底稿放在什么地方，他们不知道，要靠陈虹等人去寻找。

江青让陈虹等人到上海找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帮助查找，并交待陈虹等人，在工作中发现什么情况，随时向上报告，任务完成后立即回京。

接着，江青指示戚本禹将去上海取材料的介绍信交给陈虹等人。戚本禹将信当面交给陈虹等人，并说：“你们拿上这

个,上海会帮忙的。如果遇到王徵民就把他一起弄来。”这时,江青将张春桥写给他的秘书何秀文的便条递给组长陈虹。

任务布置完,江青对杨成武说:“杨代总长,具体的事,你负责抓一抓。”

叶群马上插了一句:“从现在起,你们不要回家,也不要给家里打电话了。”

陈虹等人说:“出差连牙刷、牙膏以及简单的洗漱用具都没有带。”

叶群命令似地说:“这些东西,你们到上海买新的吧!”

说完,叶群和江青起身走了。杨成武送他们到门口,回来又对陈虹交代说:“你们到上海后,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发现什么情况,随时用电话和我联系,不便时可以用保密机打。”

接受了这突然、神秘的任务后,陈虹、王育民、王成恩、朱铁铮立即出发。

4人于4月13日凌晨2点坐飞机飞赴上海。

陈虹一行到达上海后,在上海空四军政治部组织处一个处长的安排下,见到了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何秀文看完介绍信,明白了来者的意图后说:“这要把警备区的副政委李彬山请来,因为政法系统由他管。”

李彬山是一位老红军,办事认真负责。听完陈虹等人介绍到上海的任务后,李彬山说,上海市公安局的档案大部分存在警备区的一个弹药仓库里,可立即陪同来人去仓库与负责保管材料的同志联系。

陪同陈虹等4人到达弹药库存的军火库后,李彬山向公

安局负责管理材料的朱品涛介绍了4人。然后,陈虹等人又说明了来意。

这时,朱品涛说:“这里存放有好几百箱材料,你们要的档案,需逐个箱子查找。现在监守看管的就我一个人,其他的同志都不在。”然而,朱品涛很负责地一个箱子一个箱子地打开,帮陈虹等人查找所需要的材料。

第三天,小组人员正在查找材料的时候,朱品涛扶着一个箱子对组长陈虹说,这是市公安局领导交管的材料,说是“通天”的,放在这里不安全,请带回北京去。

陈虹说:“这件事现在决定不了,要请示领导”。

4月16日中午,陈虹找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用他的保密机给北京的杨成武打了电话,报告了上述情况。杨成武答复说,要报告江青后才能决定是否带回。杨成武还要求何秀文在回北京前,再给他打一个电话。

当天晚上,陈虹又给杨成武打电话,报告任务已经完成,准备夜航返京。杨成武说:“关于那一箱‘通天’材料问题,下午已报告了周恩来、江青,他们说,管它什么通天不通天的。把材料先拿回来再说。江青还特别交代,‘一个字也不能丢’。”

小组人员在接到杨成武传达周恩来、江青的指示后,随即去公安局,办理了手续,将这一箱材料带回北京。

4月17日,小组人员早晨到北京后,材料原封未动地存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组织部办公室。4月20日,小组人员向江青写了请示如何处理的报告。

6月下旬,杨成武办公室秘书张忠庆给陈虹打电话说:

“首长要你和王育民来一下。”

这时,杨成武在总参谋部翠微路五所南楼办公。组织部的办公室设在京西宾馆十二楼。陈虹和王育民按时到了翠微路五所南楼办公室。

杨成武对陈虹和王育民说:“找你们来,谈一件事,那一箱‘通天’材料,江青叫你们看一下,别人不得插手,不许扩散。看后提出一个报告。”

陈虹、王育民二人领命后,回到办公室,找了一间房子,关起门来,将箱子搬来,打开一看,原来是1954年一个人写的由上海寄往杭州交际处给江青的匿名信,经公安部立案,由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侦察破案的材料。

所谓一箱,并非像江青后来夸大说的“一大箱黑材料”,而是一个一尺四寸的小箱子,共计23个卷宗,有的卷宗比较厚,有的只有几页纸。这些卷宗,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可分为匿名信、笔迹照片、侦情简报、侦查对象调查材料和江青的卷宗5类。

匿名信,信的原件究竟有多少页不知道,因为没有存放在里边,但有信的第一页和信封的两幅放大照片。

从照片上看,信封左下印有“华东文委”字样,证明是华东文委机关的办公用品。信的第一页内容,主要是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已写下材料送中央组织部等等,似有恐吓性质。至于江青是何时“堕落的”,有什么事实,第一页没有写。

为了破案,这时从文艺界、公安系统、党政部门收集800多人的笔迹,其中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和高级干部,经公安局技

术部门逐个进行了鉴定。

从卷宗中可以看出,案子自1954年发生立案侦查后,工作进展情况,发现的线索,均及时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以及陈丕显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北京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报告。侦察工作中形成的文书材料有五六个卷宗。从侦情简报上看,案子从1954年至1962年,已侦察了8年,尚未有明确的结果。

卷宗,对侦查对象的调查材料写得非常清楚。凡是笔迹鉴定中发现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有作案条件的人,都被列为侦查对象,进而重点侦查。从卷宗中可以看出,公安人员曾找到一些对象,怀疑是作案人,进行调查,但搞了一段时间,证明所侦查的对象不准确,即予以否定。在卷宗中,这样的人有好几个,如江青过去的女佣人秦桂珍,她对江青的历史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她就被列为侦查对象;当时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也曾因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而立案侦查过一段时间。

侦查时间最长、吃苦也最多的,要数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奇的妻子曾菲。

因为经公安部门鉴定,曾菲的笔迹与匿名信笔迹很相似。侦查曾菲的原因之二是侦破小组展开调查后,了解到曾菲对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的生活处境深表同情。此时,贺子珍住在上海她哥哥处,曾菲有时去看望她。特别是1952年毛泽东到上海后,没有与女儿李敏见面,曾菲也觉得不尽合适。而赖少奇又在上海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提了一个议案,建议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等。

侦破小组得知这些情况后,认定曾菲有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因而,侦破小组就确定对她长期进行侦查,甚至把对敌侦查的那一套手段也用上了。

后来,赖少奇调安徽省委宣传部工作,曾菲也随之去合肥大学宣传部任职。但是,上海市公安局对曾菲的侦察并没有放松,仍像在上海时一样坚持进行着,由此而形成的曾菲的材料相当多,有五六个卷宗。

在这23个卷宗中,关于江青的卷宗仅有一个。侦破小组为了破案,曾搜集江青的必要的历史资料,卷宗上写着“若干历史材料”6个字。

所谓历史材料,仅文字和照片两种。文字共3篇。一篇是江青(即当年的蓝萍)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写给她当时的丈夫唐纳的公开信。这封信是从当时的报纸上抄下来的。另外两篇均为剪报,一篇是江青到延安进了鲁迅艺术学院和毛泽东结了婚,上海一种小报发的一篇报道;还有一篇是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江青带着孩子到重庆看病后的新闻报道及怀抱孩子的新闻图片。

照片共两帧。一帧是江青扮演电影《王老五》里王老五的妻子的剧照,另一帧是结婚集体照,即唐纳、赵丹和顾而已3对,中间坐着主婚者——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

陈虹和王育民审阅了全部材料之后,对这个案子是否已破,详情搞不清楚。于是,陈虹和王育民写了一个建议,由公安部组织专人负责处理。

江青看了报告以后大为不满。随后,江青跑到林彪那里去闹,说保存这些材料就是整她。林彪听了后对江青说,这事

好办,让他们重新向中央写一个报告,将材料销毁。林彪的指示,随后传给杨成武去落实。

过了一个多星期,杨成武又找陈虹和王育民到他的办公室去。杨成武对陈虹、王育民二人说:“报告送上去,江青看了。她说案子已破了,作案人林伯渠的妻子朱明也自杀身亡,材料保存没有必要了。她要你们重新写一份建议中央指定专人集体销毁材料的报告。”

说完,杨成武还特意用征询的口气问道:“你们看怎样?”

陈虹和王育民说:“既然案子已经破了,材料保存也没有用了;而且毛主席早就说过,党内不搞侦查,收集那么多党内同志的笔迹,传出去也不利于团结,毁了也好。只是这个报告怎么写呢?”

杨成武想了想说:“报告的内容,就根据我传达江青的意见,你们作的记录,在文字上作些整理即可。”

7月7日,陈虹和王育民署名写的报告被上报中共中央。林彪看过报告,批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关锋4人负责集体销毁。林彪并将批件转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阅后,除了同意林彪的批示外,另加批“连同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材料和吴、傅送来的一包材料一并销毁。”

毛泽东看后,虽然没有在报告上面留下他的笔迹,却说:“烧它干什么,这是历史。”

这个报告和批示传下来后,正值谢富治去昆明调查云南省“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没有在京。7月13日起,杨成武和汪东兴均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8月关锋又被抓了起来。因此,这个销毁材料的事就被搁了下来。

9月23日,杨成武随毛泽东由南方回到北京。谢富治告诉杨成武说,江青几次大发脾气,说是杨成武“整了她的黑材料”,要“放长线钓大鱼”。

杨成武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将实情向周恩来报告并请示如何处理。周恩来明确指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3人监销。

王育民将材料送到中南海勤政殿汪东兴那里,并对材料进行了核实。然后,谢富治动手点火,王育民负责向火里一卷卷扔。

材料烧完后,3人都在报告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时间是1967年9月27日下午。这个报告和批示的原件存在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处。

由此可见,这个小组当初去上海取档案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给的任务,是江青自己布置的。到上海在工作中碰上了那箱“通天”材料,小组成员只是按照江青“发现什么情况,随时向上报告”的指示,及时向北京请示。杨成武得知后马上报告了周恩来和江青,是周恩来、江青要拿回材料的。江青还特别交代“一个字也不能丢”。

江青并不认为取回这一箱材料就是杨成武和专案组的同志整了她的“黑材料”,立了她的“黑专案”。但后来她却无视事实,反咬一口。

同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省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说:“有人过去整过我的材料,这一次才发现。”

江青还蛊惑人心地说,有一个专案组在上海,去拿材料时说,其中“有一箱材料是我的。我说拿来嘛,拿来以后我也没

有过问”。

到1968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江青1967年9月5日的这篇讲话时,江青又说,“你们看,一大箱黑材料,谁晓得是些什么东西”。绝口不提对这一箱所谓“通天”材料处理的前前后后完全是根据她的“指示”处理的这一事实,反而无中生有,说别人整她的“黑材料”。

江青除诬称整她的“黑材料”之外,还指责杨成武等人提审杨帆是搞“黑调查”,搞她的“黑专案”。

杨成武于1967年11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召集中央专案“二办”各专案组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散会时,杨成武受江青之命,交待陈虹等人去提审杨帆,搞清他1938年向中共中央发电报的事。杨成武并对陈虹说:“你们审后,把口供记录带回来给我看看”。杨成武布置任务时,吴法宪也在场。

关于杨帆1938年向中央发电报的事是怎么回事,要弄清什么问题,陈虹认为这些都布置得不清楚,便向杨成武提了一些问题。杨成武说,他也不知道,是江青给了这个任务,他只负责办理就是了。

杨帆,原名石蕴华,字炎,1911年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广山镇。杨帆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曾祖父是一位久负盛名的画家,祖父是当地一个行善积德的医生,父亲石立则是一个诗人,而且写得一手好字。

到杨帆高中时,因家道中落,他便只身到上海投奔叔父石英。依靠石英的资助,杨帆于1932年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理学院。在大学期间,杨帆积极参加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受地下党派遣,杨帆到南京戏剧学院

任总务主任。

1937年抗战前夜,杨帆到上海以殷杨为笔名,担任《译报》编辑;同时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任该会艺术组组长,分管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等群众团体。在此期间,杨帆写过不少诗文和戏剧评论文章,编过许多小戏,曾受到周恩来的赞赏。

1938年,上海沦陷后,杨帆辗转到达皖南,在新四军军部任政委项英的秘书。不久,杨帆奉命调军法处任科长、处长,与公安、政法结下了不解之缘,长期做情报联络工作。上海解放后,杨帆是上海第一任公安局长。1954年底,杨帆被捕,在经过长达10年的预审后,杨帆于1965年以“内奸、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陈虹、王育民、王成恩在接受了杨成武的命令后,于第二天去秦城监狱提审杨帆。

做过相当一段时间公安、政法工作的杨帆,对于审讯这一套是内行,有丰富的经验。他思想敏锐,回答问题很注意分寸。

听了陈虹等提的问题后,杨帆定了定神,然后回答说:“我根本没有向中央发过电报,也根本没有条件自己发电报。不知你们问的是哪一年的事。”

王育民说:“不管哪一年,凡是发电报的事,你都可以交代。”王育民故意把问话的范围拉得大些,因为他们对这件事的经过并不清楚,心里没有底。

杨帆说:“如果你们问的是指1938年的事,那么我1954年被关起来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就来问过我了。”

陈虹等人就要求杨帆把1938年向中共中央发报的事交代清楚。

杨帆说,1938年他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文化队任指导员。有一天走在路上遇到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项英。项英跳下马来边走边问他有关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情况。因他到皖南前在上海电影评论协会任书记。江青的前夫唐纳在他们影协办的一个杂志任编辑,写电影评论方面的文章。

杨帆接着说,江青当时叫蓝萍,在协会下边一个“无名剧社”当演员,曾经被捕过,脱过党。杨帆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如实地向项英作了回答。

接着,杨帆说:“如果有电报的话,那一定是项英用我的名字发的。因我本人根本不具备直接向中央发电报的条件。”

杨帆非常细心,交代问题没有提江青的名字,陈虹按杨帆的讲述作了记录。这份审讯记录抄清经杨帆看后,签了自己的名字,并加盖了指印。

随后,陈虹等人将记录先报送杨成武。杨成武看后批给吴法宪,转送了江青。

1968年1月19日晚上,在怀仁堂休息室,江青在找陈虹等人汇报工作时,说:“你们送来杨帆的口供记录,我看后很高兴,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他过去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都是署名殷杨,反对我和毛主席结婚。你们再去提审。”

但是,陈虹等人觉得审来审去都是同一个内容,而且杨帆已经交代清楚了,就再也没有去审杨帆。

但是,“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江青却又把她指使杨成武等人搞所谓“通天”材料,审杨帆这些事拿出来给杨成武等人扣上搞江青的“黑材料”,立她的“黑专案”的罪名。

具体负责办理这两件事的陈虹等人也因此而受到株连。

4月12日,陈虹离开了专案组,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

同年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二办”专案组给陈虹打电话,说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吴法宪通知让他立即去京西宾馆。

离开“二办”专案组两个多月的陈虹走进京西宾馆六楼会议室时,邱会作、王育民和接替陈虹在“二办”工作的时任北京军区炮兵师政委的齐路安,都在那里坐着。不多时,吴法宪从另一个会议室走进来,坐下就是胡乱批评一通,说他们提审杨帆压根儿就不应该“作文记录”。

随后,吴法宪指着陈虹说:“现在你们把这个口供整理成材料,放在那里,一旦被人看了,扩散出去,这个后果你要负责!”吴法宪并宣布立即将杨帆的口供材料烧毁。

随后,由邱会作点火,焚烧了杨帆这份口供记录。

专案组的所有材料,都有编号、登记,随便缺少一份,事后移交时,无法交代。因此,王育民当即用一张白纸,写了“饶案××号口供记录”,经军委办事组决定销毁。监销人邱会作,执行人王育民、齐路安,见证人陈虹,下边是年月日。这份简单的字据,吴法宪是代表中央军委办事组来宣布决定的,不属于监督者,没有在上面签字,其他人都签了自己的名字。

以后,所谓整江青的“黑材料”,立她的“黑专案”,就成为陈虹等人的重大“罪状”,在群众中广泛传播。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抓人,总是先定性,然后编造材

料,罗织罪名,逼你承认。1968年初,江青亲自出马,编造谎言,对参加搞过“通天”材料和提审过杨帆的陈虹等人进行诬陷和迫害。

潘汉年在狱中曾写了一份“认罪书”,专案组人员将其报给江青。江青看后签了字。同年2月,潘汉年又写了“认罪书”之二。江青看后,就在这份“认罪书”的标题旁边写上:“为什么不将认罪书之一送给我看?”

江青并且多次叫嚷说:“饶案是我亲自抓的,但是现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据此,江青给专案组工作人员扣上了对她“封锁”的罪名。

4月20日,在中央专案二办全体人员大会上,江青又当众大声问道:“陈虹来了没有?”

下面有人说,他已经回原单位了。江青说:“回去了也跑不了,我已叫人对他进行审查了!”

不久,陈虹就被扣上“不是好人”的罪名。

同年12月14日,江青等人以“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罪恶活动”为借口,宣布将陈虹逮捕,送进监牢,一蹲就是6年零5个月之久。

江青等人诬害陈虹不仅“整了江青的黑材料”,而且被杨成武派去广州“搞阴谋”,“要把黄永胜打倒”。

陈虹还被诬陷为“关锋插手广州,也是由陈虹去搞的”。江青一伙妄图把陈虹等人打成“王、关、戚”一伙。然而,谎言总是要被真理驳倒的。由于陈虹对关锋从来不认识,也没有单独和他说过一句话,这种谎言不攻自破。

1970年1月24日,江青对负责审查杨成武的专案人员

说：“我同杨成武斗了几次，杨成武与戚本禹勾结起来搞黑材料。杨成武假借搞饶漱石的专案，立了我的专案。”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不好再攻击杨成武“反对林副主席”了，便腔调一变，又诬陷杨成武“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

同时，江青借机制造谣言，说黄永胜包庇了“坏人”陈虹，并将这莫须有的罪名搞成材料，在总参散发，供大家批判。

1972年1月2日，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集体接见中央专案一办、二办、三办全体人员。江青利用这一时机，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二办饶漱石这个专案是她负责的，而杨成武却对她“封锁”，还给她“立了一个专案”，杨成武并且让陈虹、王育民、朱铁铮3个人整她的材料。

接着，江青说，“能有什么材料？只不过是她过去的一封公开信。”杨成武这么干，她才下决心找这封公开信，还是张春桥帮她找到的。

江青说，这封公开信，很能说明她的问题。第一，说明她是坚决抗日的；第二，说明她是抵制国民党特务的。江青并对周恩来说，杨成武等人还提审杨帆，搞“黑调查”。

听了江青这一席话，周恩来当即严厉地问道：“王育民来了没有？是怎么回事？”

王育民站起来据实回答说：“审杨帆还是在杨成武管‘二办’那个时期，是吴法宪参加布置的。”

江青又问王育民：“杨成武是怎么布置你们整我黑材料的？”

王育民在周恩来面前，只能如实地将杨成武传达江青的

“批示”审问杨帆在1938年向中共中央发电报的具体情况作了汇报。

江青一听王育民揭她的底，立即矢口否认。此后，江青狠整了王育民，撤销了他“二办”总支委员、支部书记和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令他交代问题，回空军劳动改造。江青还指示空军长期不给王育民分配工作，最后硬是让他转业。

后来，到了1974年，国内政治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央领导班子重新作了调整，不少被审查的老同志已得到解脱。这时，毛泽东对林彪过去所揭发的那些人的问题，已有新的看法。毛泽东多次口头指示和文字批示：“杨、余、傅案的性质应重新考虑。”毛泽东并说他“可能偏听偏信了”，明确表示“搞错了，要翻案，要平反”。

但是，江青对杨成武的问题仍然揪住不放。1974年2月7日，中共中央在讨论专案组整理的《杨成武问题的报告》时，江青借故将杨成武的事继续拖着。

江青说，报告的第二页对她个人意见不计较，但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写报告“欺骗中央”，不写不妥。对此，周恩来认为杨成武没有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有“路线错误”，杨成武自己可以写出材料。

不久，专案组将整理杨成武的材料上报中央政治局讨论。

1974年5月23日，杨成武终于恢复了自由。

像杨成武等人一样，余立金被打倒后，林彪一伙给他找了许多“罪证”。余立金被打倒之前，正担任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等职。

在新四军皖南事变突围时,余立金曾被俘过。余立金被打倒后,林彪及其死党成员就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但是,从1968年3月一直搜集到9月,林彪一伙还未找到一点像样的证据。

后来,林彪一伙抓了原国民党某师的一个军需处处长。此人当时正在江西的一个农场劳改。林彪一伙连哄带逼,从这个处长手里获得了余立金的“叛徒”证明材料。根据这个“材料”,林彪一伙给余立金戴上了“大叛徒”的帽子。

然而,皖南事变爆发时,这位处长实际上根本不在皖南,他在四川抓壮丁。

余立金实际上是一个直言不讳、讲原则、守本分的人。而在林彪一伙看来,余立金确实本分得有些“倔强”,有点“迂腐”。

毛泽东于1967年秋巡视大江南北时,经杨成武建议,周恩来同意,余立金也前往随行。

1967年八一节前夕,余立金自沪飞抵北京,向周恩来报告有关毛泽东的行止情况。

在余立金回京的当天晚上,身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3次“邀请”余立金去传达毛泽东巡视期间的“最新最高指示”。但是,余立金严守“回京后只向总理报告有关情况,没有传达任务”的纪律,对吴法宪的“邀请”均予以直言拒绝。

吴法宪在第三次“邀请”时,竟抬出林彪这张“王牌”相要挟。“不开窍”的余立金只是淡淡地说:“上面规定了,不向任何人汇报”,仍然回绝了吴法宪的“邀请”。

就这样,余立金后来又被扣上了一条“反对林副主席,有

意封锁林副主席”的“罪状”。

余立金曾经是红二方面军的干部，而红二方面军是贺龙指挥的，因而，余立金对贺龙的为人是比较了解的。而且，余立金在担任空军政委期间，曾听到毛泽东说过“要保护贺龙”的话。因而在审查贺龙时，余立金一向持有异议。

同时，余立金又不同意关于林彪的“光辉榜样”的提法。这样，余立金就触犯了林彪等人。

1968年3月中旬，空军机关有人写匿名信给杨成武，控告空军党委办公室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的丑恶罪行。

在杨成武看来，林彪、叶群同空军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的儿子林立果又恰好在空军党委办公室。于是，杨成武将这封匿名信转送给林彪。杨成武认为林彪会对其进行严肃的处理。

然而，事实并非像杨成武想像的那样。叶群看完信以后，将信转交给空军司令部。最后，这封匿名信又回到了信上所控告的几个人手中。

周宇驰等人见信以后火冒三丈，通过查笔迹确定该信是余立金的秘书所写。于是，周宇驰等人经过密谋之后，先由空军党委办公室的王飞出面，诬陷余立金的秘书与杨成武的大女儿“乱搞男女关系”。王飞要求吴法宪立即逮捕余立金的秘书。

吴法宪没有同意。他对周宇驰等人说：“余立金是空军政委，逮捕他的秘书，不通过他行吗？你们强迫我签字，不是要夺我的权吗？”

周宇驰立即将吴法宪的话通过林立果转告给叶群。

叶群于当天下午在电话里将吴法宪痛骂了一顿。叶群说：“你说我们夺了你的权，夺你的什么权？我要把林立果、林豆豆（叶群的女儿——编者注）从你们空军撤回来。你不识好歹，我的儿女在空军都是为了保你，保你的权，你反说我们要夺你的权。”

叶群还说：“告诉你，夺你权的不是我们，是杨成武和余立金，是他们‘勾结起来，要夺你的权！你可要提高警惕’。”

吴法宪时时感到，只要余立金在空军，他这个空军司令员的宝座就难以坐稳。而此时，有了林彪和叶群等人撑腰，吴法宪立时胆量倍增。于是，吴法宪立即遵叶群的旨意，将余立金的秘书“隔离审查”。

余立金和杨成武知道此事后极为恼火。对余立金来说，自己的秘书被抓，自己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这其中必有什么名堂。对杨成武来说，自己的女儿还没有谈恋爱，就遭别人诬陷，以后怎么做人？

这时正身患疾病的杨成武，一面打电话催吴法宪立即放人，一面派夫人赵志珍同余立金一道去毛家湾林彪住处反映情况。

当赵志珍和余立金到了毛家湾林彪的住处后，叶群“热情”地接待了他俩，并装模作样地听完了他俩的汇报。最后，叶群煞有介事地说：“好吧，我再派人调查调查，查清楚之后再向林副主席报告。”

杨成武要求吴法宪放人，吴法宪拒不允可。杨成武转而向林彪提出，要求和吴法宪单独谈谈。林彪假装同意杨成武的要求，随即又对吴法宪面授机宜，指使吴法宪同他老婆一道

去找杨成武谈话,谈话时,一定要做到“坚持原则”,“不低头、不让步、不认错”,并说“余立金是个叛徒”。

这样一来,杨成武与吴法宪的谈话自然是毫无结果。

这场风波,使余立金被扣上了一条与杨成武“勾结起来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的“罪状”。这样,余立金也就“在劫难逃”了。

而傅崇碧的“罪名”,更是林彪、江青等人设置的害人圈套。“文化大革命”中,身居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要职的傅崇碧,深受各方注目。林彪、江青等人为了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对傅崇碧更是极尽拉拢之能事。

有一次,傅崇碧突然生病,住在三〇一医院治疗。叶群亲自带着女儿林豆豆前往看望,并叮嘱傅崇碧“身体要紧,缺什么药找我好了。”

病愈出院后,傅崇碧在人民大会堂遇见林彪。林彪也很“关切”地对傅崇碧说:“你现在第一位的工作是休息,先把身体搞好。”

有段时间,叶群为了拉拢傅崇碧,接二连三地打电话给傅崇碧,邀请傅崇碧带上夫人、孩子一块去毛家湾林彪住宅看电影。傅崇碧借故婉言谢绝了。

没过几天,叶群又别出心裁,打电话给傅崇碧,要同他交换“毛主席像章”,可傅崇碧仍以“像章不多”为由予以婉拒。

傅崇碧没有想到的是,叶群竟亲自将一包纪念章送上门来。

还有一次,叶群对林彪后院小楼房子上的一小块煤小题大作,竟四处报警“你们还要不要副统帅的安全?”

傅崇碧和汪东兴去毛家湾检查了半个多小时,发现并无不安全因素。叶群“热情地”邀请他俩吃完饭再走。傅崇碧又以“有事”为由抢先离开。

傅崇碧对红极一时的林彪一伙的纠缠采取了能躲则躲、能拖则拖的无奈办法,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明智的上策。但是,在林彪、叶群等人看来,傅崇碧也确实太“不识抬举”了。他们认为,对这种身居要位而又不能为自己效力的人,拉不过来,那就只好将他“打下去了”,以免误了自己的“大事”。

与此同时,当林彪、江青一伙要将老干部统统打倒之际,“不识时务”的傅崇碧却坚决执行周恩来的指示,为保护一大批老干部费尽了心思,与林彪、江青一伙周旋。这更加深了傅崇碧与林彪一伙之间的矛盾。

武汉“七·二〇”事件的“首要人物”陈再道在受到林彪一伙指使的造反派冲击时,是傅崇碧急中生智,将陈再道锁进断了电源的电梯里而免遭揪斗。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为了保证徐向前的安全,傅崇碧奉周恩来之命,亲自将徐向前送到招待会上。散会后,傅崇碧又增派警卫,用3辆警卫车跟随徐向前,并绕道将他送回家。

之后,傅崇碧又奉周恩来之命,调动3辆汽车和数十名精干的警卫战士,将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30多位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部长一级的老干部转移到较为安全的东高地卫戍区某部的营区内,并叮嘱要严格保密。

傅崇碧刚刚安顿好这件事,就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的电

话通知，立即到钓鱼台国宾馆开会。

以后的连续几天，江青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声色俱厉地围攻傅崇碧。江青在会上气势汹汹地问：“傅崇碧，你这个死硬的保皇派，你把这些人藏到哪里去了？你保那些老反革命，绝没有好下场！”

陈伯达威胁傅崇碧说：“傅崇碧，不要以为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我们早知道了。你说，是谁让你把他们转移的？是谁？”

康生也声嘶力竭地咆哮道：“傅崇碧，你听见没有，你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你必须说出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而对江青等人的围攻，周恩来默不作声。他坦然地坐在沙发上，用严肃的眼光注视着傅崇碧。

傅崇碧知道周恩来的苦衷，本打算只顾喝茶抽烟，以沉默相对抗。后来被逼急了，傅崇碧就简单地回答说：“上面。”但是傅崇碧并没说出上面是谁。

第一天，江青等人没有问出什么结果。第二天开会，江青一伙又继续对傅崇碧进行围攻。

但是，会议刚开始不久，毛泽东办公室来电话说，毛泽东要找傅崇碧了解一下北京的近况。

傅崇碧在向毛泽东汇报有关情况时，趁机向毛泽东汇报了他转移老干部的事情。

毛泽东十分赞同地说：“周恩来安排得好！你们卫戍区做得好！”

傅崇碧说：“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往死里整！”

“你们做得对!”毛泽东又重复道。

傅崇碧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心里踏实多了。

后来在遭到江青一伙紧紧追问时,傅崇碧理直气壮地说:“主席叫弄的!我讲上面,你们非要我说,你们问主席去吧!”

“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战将”被傅崇碧的这句话给惊住了。

事后,傅崇碧把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听后也会心地笑了。

后来,上海的造反派分两次将江青 20 世纪 30 年代的材料寄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这无疑又给傅崇碧出了一大难题。

这些材料中有江青当演员时的“玉照”,有江青给蒋介石五十大寿的义演剧照,还有江青和某些演员的风流韵事的传闻。

早在 1966 年 10 月,对任何问题都极其敏感的江青,围绕自己的“材料”问题,就来了个“上海秘密抄家”,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几位“好友”郑君里等人威慑了一番。

傅崇碧面对这次再现的江青材料,感到很为难。在请求周恩来后,傅崇碧只好将这些材料封起来交给江青本人处理。

江青于几天后在钓鱼台她的寓所里召见了谢富治、傅崇碧和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

当着这些人的面,江青凶狠地说:“现在有人要整我老娘的材料,我不怕!老娘可不是好惹的,谁敢惹我,我就干谁!我正告你们,哪个整老娘的材料,我就抓哪个!”

虽然这些材料最后都被封存、销毁了,但是江青总觉得傅

崇碧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无形间也就更增添了对傅崇碧的猜疑。从此，江青一伙对傅崇碧更加恨之入骨。

后来，傅崇碧被打倒后，果然被妄加上了一条“搞江青同志过去的黑材料”的“罪状”。

由于傅崇碧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识抬举”，每每与林彪、江青一伙相抵触，江青等人遂有意制造事端来杀杀傅崇碧的“威风”。

1968年3月初，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群众组织请求鲁迅夫人许广平写信给中共中央，称原藏鲁迅博物馆的部分鲁迅书信手稿不见了，并提到戚本禹曾经从文化部取走过这部分手稿。

3月5日晚，江青要傅崇碧过问此事。

经周恩来批准，傅崇碧、杨成武等人亲赴秦城监狱，提审了戚本禹，证实了许广平的说法。江青确实于1967年六七月间派戚本禹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韩书信从文化部取走了藏有鲁迅手稿的4个樟木箱子。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开具了收条。

傅崇碧等人返回北京后迅速向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人作了汇报。此时，傅崇碧、杨成武等人不好道明是江青让戚本禹取的手稿，只是说韩书信知道此事。

韩书信是成都部队的一位教导员，这时恰巧回四川休假去了。江青随即要傅崇碧打电话给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让他将韩书信找回来。

成都军区不敢怠慢，立即于3月7日晚用专机将韩书信送回北京，并让他住在北京卫戍区招待所里。傅崇碧带着周

树青等人赶往招待所，一见到韩书信就问：“鲁迅的手稿现在在哪里？”

本来很紧张的韩书信见是问这事，也就很坦然地答道：“手稿是江青派我和戚本禹到文化部取走的，取来后交给了何先伦。放在什么地方，我确实不知道。”

傅崇碧等人又按韩书信的指点找到了何先伦。何先伦告诉他们，手稿已交“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的保密员卜信荣保管。

傅崇碧等人经多方查询后，证实鲁迅的手稿存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保密室里，而江青等人居然“不知道”。这期间必有蹊跷。但是，傅崇碧还是决定要再次向江青汇报调查情况。

3月8日，为了向江青汇报调查情况，在事先和“中央文革”办事组负责人联系之后，傅崇碧带着周树青等3人分乘两辆车驶往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

车到钓鱼台门前停下，先由传达室代为联系。得到允许后，傅崇碧等才缓缓将车开了进去。

傅崇碧等人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楼前下车后恰遇姚文元。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

谁料江青一进门，就怒不可遏地吼道：“傅崇碧，谁要你进来的？你带这么多人到这里来想干什么？身为卫戍司令未经允许就冲，你想造反吗？”

“不，我们是经过允许才进来的，我们是来向你汇报情况。”傅崇碧及时申辩道，并随即详细汇报了查找鲁迅书信手稿的经过，并出示了签字收条，指出鲁迅手稿存放的具体地

点。

当听到鲁迅手稿和管理手稿的人都在“中央文革小组”时，江青故作惊讶地说：“什么？这不可能！”

周树青立即从皮包里找出写有收管手稿人签名的条子交给江青，说：“这是事实。”

江青见收据上清晰地写着“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员卜信荣的名字时，转过身子，叫姚文元把卜信荣找来。

卜信荣进屋后，当着江青的面证实鲁迅手稿确实存放在“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并特别强调了一句：“保管得好好的，共有4个箱子。”

江青便叫人上楼将箱子抬下来，说道：“当着你的面，把箱子撬开，看看到底是不是！”

箱子被打开后，里面果然全是要找的鲁迅书信手稿。

江青随手翻看了一会，突然脸色一变，猛地把箱盖一摔，赌气似地说：“不看了，当着你们的面将箱子封起来！”

接着，下不来台的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保密员骂道：“你是个大坏蛋，不是毛主席的兵，把他抓起来！”

卜信荣刚被抓走，江青又换了一幅面孔，满脸堆笑地对傅崇碧说：“你们辛苦了，做了一件好事！”江青并且特意留傅崇碧他们一块吃饭。

几天后，江青见到傅崇碧后，又甜言蜜语地不无歉意地说道：“那天的事你可不要放在心上，我对你的批评也是对你的关心，我们都是革命老同志嘛！”

随后，江青又无中生有地对傅崇碧说，鲁迅的手稿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要把被戚本禹盗走的毛泽东的手稿找回

来,江青要求傅崇碧必须完成这项任务。

大家都心照不宣,傅崇碧等人知道这很可能是江青要报复一下戚本禹。但是,毛泽东的手稿被盗,事关重大,傅崇碧等认为还是有查清的必要。

傅崇碧等人立即赶赴秦城监狱,再次提审了戚本禹。

傅崇碧单刀直入地说道:“戚本禹,你把毛主席的手稿弄到哪里去了?!”

“我借过毛主席讲话的清样,从没借过手稿。”戚本禹肯定地答道,“你可以去问汪东兴,借手稿和清样都是通过他。”怕来人不相信自己的话,戚本禹随即又补充道。

后经汪东兴证明,的确是清样而不是毛泽东手稿后,江青才不得不罢休。

为达到其不可告人的阴谋,江青等人将事情做到这个地步还不善罢甘休。3月7日,江青突然提出要看北京大学两个群众组织写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材料。

于是,3月8日晚,北京卫戍区“支左”办公室的某负责人,带着两个人前往北大索取材料。谁知北大有关人员答称,这些材料已经递送“中央首长”。江青却又说她没有见到。就在“支左”办的人再次在北大索取材料后返回途中,聂元梓却连夜向江青告急,妄称卫戍区某人“带领全副武装的几卡车人冲进北大”,造谣说“使用了公安手段”对北大“强行搜查”等等。

陈伯达、江青终于据此大作文章,在3月11日的干部会上诬称:“北京卫戍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傅崇碧进行大肆造谣中伤。这样,傅崇碧便被扣上了“上冲中央文

革、对下镇压北大学生”的罪名。

林彪、江青等人不仅宣布了傅崇碧的“严重错误”，撤职审查，还4次抄了傅崇碧的家，将其家属赶出北京。随后，卫戍区的另一位副司令员、副政委及傅崇碧的秘书被拘留逮捕、隔离反省和离职检查。

3月28日，陈伯达、姚文元煞有介事地追问傅崇碧“冲击钓鱼台的情况”和其皮包内是否藏有子弹和手枪。

这样，林彪、江青等人就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3人“打倒”了，扳倒了他们走向篡党夺权道路上的又一“障碍”。这就是所谓的“杨、余、傅事件”。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也远非就此了结。林彪、江青等人又把所谓的“杨、余、傅事件”与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活动无中生有地联系在一起，企图“打倒一大片”。

1968年3月24日以后，中共中央报刊和全国各地报刊连篇累牍地登载反“右倾”的文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4月10日发表的题为《芙蓉国里尽朝晖》的社论说：“要有力地批判右倾翻案的妖风”。

由于张春桥没有出席北京3月24日的万人干部大会，所以社会上又有人传说霍士廉揭发了张春桥是叛徒。加上其他原因，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和政宣组负责人、文汇报社负责人、文汇报社“星火燎原”头头朱锡琪串连一些人于4月12日“炮打张春桥”，“无产阶级司令部”又保护了张春桥。所以，中共中央报刊在4月12日以后提出了“反对右倾分裂主义”的主张。

4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发表的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中这样说:“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①

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中说,现时的情况下,要特别警惕和坚决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5月1日发表的题为《乘胜前进》的社论中指出:“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

5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的社论中指出:“在当前,要坚定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要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出发,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要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决不准许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决不准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②

随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5月12日发表的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中这样指出:“要发扬无产阶级的坚决

① 《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1968年4月12日。

②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热烈欢呼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1968年5月3日。

彻底革命精神，抓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①

为了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写了一篇题为《划时代的文献》的文章。5月16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和组员姚文元将这篇文章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审阅《划时代的文献》时，亲自加上：“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妖风”。

在“杨、余、傅事件”被制造出来以前，196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转发的《文汇报》1月12日的题为《论派性的反动性》社论。

“杨、余、傅事件”被制造出来以后，提法有了很大的变化。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的社论中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我们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

^① 《东北大地红烂漫——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1968年5月12日。

派性,以及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即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表现。^①

这样,“派性”又成为“好东西”了。4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一期评论员文章,即《对派性进行阶级分析》。文章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作了所谓“理论论证”。

1968年5月7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说:“反掉无产阶级派性不行吗?过去讲错了,毛主席给我们纠正啦!”

此后,派性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名义下又猖獗起来。在天下大乱局势逐渐缓解和社会秩序有所恢复的过程中,一股逆向的巨浪又被卷了起来,从而更加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泛滥。

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由反派性转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

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组织的“反右倾、反复辟、反翻案、反分裂、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师大会”上,蒯大富煽动说:目前,从上到下,从北京到全国,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在四川,有人公开跳出来反对“红十条”,他们“胡说什么‘红十条’已经过时”,“打倒刘张”,“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廖死党翻案”,“疯狂地炮打中央”,

^①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1968年4月20日。

“甚至叫嚷‘宁要李井泉,不要刘张’的反动口号”。

蒯大富说,在上海,反动组织“共向东”被打下去以后,仍然不死心,到处活动,代表“右倾反动势力”,“为陈、曹鸣冤叫屈”,“叫嚷‘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反动谬论”,“妄图进行所谓‘二次革命’,否定伟大的‘一月风暴’。”

蒯大富还说,在河南,被摧垮的“十大总部”不服气,也叫嚷要恢复活动。在长沙,反革命大杂烩“省文联”以极“左”面目出现,“刮起一股强大的右倾翻案风”,说“湖南省革筹是‘反革命三凑合’”,把全国各省的革委会、革筹都说成是“改良主义的产物”,“死保湖南三条黑线!”

蒯大富说,在天津,由“小爬虫孙振、方纪之流”出面,由“变色龙王力、关锋、戚本禹”导演了一个“黑戏”,一个“黑会”,“为反革命右倾分子陈里宁翻案”,“死保三十年代周扬黑线”,“妄图卷土重来”。

蒯大富在会上说,在外交部,一帮“从右的立场出发,跌了一个大跟头又回到右的立场上”的司局长干部,借口“要批判打倒陈毅的口号”,“妄图”否定外事口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要请“陈毅同志回来主持部务”,“妄图”不经过批判统统可以官复原职。

蒯大富说,在高校界,在王关戚倒台之后,有一些“二月逆流派”的学生瞎胡闹,他们借口首都学习班“有缺点错误”,“大肆攻击,散布流言蜚语”,“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卫戍区、解放军、谢富治同志,妄图颠覆新生的首都红色政权”。

蒯大富还说,这次“为二月逆流翻案”,来势很凶,种种迹象表明,是有一个“黑后台”在操纵他们“炮打谢富治同志,为

二月逆流翻案”。纵观全国，“正如江青同志讲的那样：‘目前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

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或军管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反右倾”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动员讲话。

林彪、江青等人趁机煽动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追查“杨、余、傅的黑后台”的活动。斗争的矛头直指聂荣臻、叶剑英、陈毅等人。

在1968年3月24日的军队干部大会上，林彪就有意强调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并说杨成武是晋察冀的。言外之意，杨成武在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林彪是想借此影射晋察冀解放区领导聂荣臻等人。

康生也与林彪一唱一和。康生在讲话中说：“我相信杨成武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

就这样，许多被污蔑为“二月逆流”的成员转眼间又成了“杨、余、傅”的“黑后台”，再次遭到造反派的“炮轰”。

聂荣臻因心脏病复发身体刚刚恢复，在医生的劝阻下请了假，没有参加3月24日的大会。

第二天上午，叶剑英散步来到聂荣臻的住处。他把前一天晚上开会的经过向聂荣臻详细地说了一遍。

随后，叶剑英激动地说：“他们太不像话，不仅这样的大事我们事前不知道，而且在这次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们也要了花招。”

在这次会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等，虽然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却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座，一律坐在台下。

其余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却坐在台上。他们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

叶剑英认为,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向老同志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暗示群众,台下的这些中央政治局委员“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的对象。下一步要揪“黑后台”,他们这些人当然又是揪斗的对象。

叶剑英停了停,又轻松地笑了笑说:“揪就揪吧,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欲加之罪,难道还少吗?”

聂荣臻仔细听着叶剑英叙述的经过,陷入了沉思。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杨成武长期是他的老部下。最后,聂荣臻也坦然地说:“揪就揪吧,反正我不是什么黑后台。”

果然,没有多久,社会上便刮起了一股揪“杨、余、傅的黑后台”的邪风,矛头直接指向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人。叶剑英在西山的住地就遭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围攻。人群冲进院内,把大字报、大标语贴满院墙,还公然叫喊“揪出杨成武的黑后台”。

从4月1日起,聂荣臻也同样受到威胁。给聂荣臻的许多重要文电停发了。聂荣臻知道后,坦然地对秘书说,不管他们的,文件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还弄不清楚,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

与此同时,杨成武、傅崇碧被囚禁期间,专案人员一再要他们“老实交代”后台是谁,要他们对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反戈一击”。

杨成武在人民大会堂挨林彪、江青等人批斗时,康生就指着杨成武的鼻子说:“不管你交不交代,你的黑后台就是聂荣

臻、叶剑英、陈毅、谭震林!”

傅崇碧被关押在沈阳期间,专案人员一再要他“老实交代”后台是谁,并“许愿”只要他对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反戈一击,还可以出来工作”。

对此,傅崇碧气愤地说:“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是开国元勋!把我关在你们这里,攥在你们手心里,要杀就杀,我不在乎!叫我反戈一击,叫我诬陷别人,没门!”

社会上掀“黑后台”的邪风越刮越猛,在心情极度压抑的情况下度过了两个星期后,聂荣臻于4月7日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和历史同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况,要求同毛泽东面谈一次。

3天之后,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给聂荣臻,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让聂荣臻放心,信已经收到了,并让他安心养病,不要听信任何谣言。

不久,毛泽东当面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聂荣臻在得知林彪一伙要掀“黑后台”以后,感到问题很严重,便于4月6日和16日,先是在电话上,随后又到林彪的家里,当面质问叶群和林彪:“‘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黑后台是谁?”但是,聂荣臻得到的答复一直是含糊其辞的。

聂荣臻打电话问叶群:“你们说的黑后台到底指的是谁呀?”

“并没有点名嘛。”叶群淡淡地答道。

这时,社会上传出的“炮轰聂荣臻”轰得很厉害。聂荣臻

百思不得其解,就于4月16日去问林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谁知,林彪也像叶群所说一样,淡淡地回答道:“没有点名嘛。”

“不点名比点名还厉害。”听林彪这样回答,聂荣臻更加气愤地说,“我宁肯受明枪,也不愿受暗箭!”

聂荣臻还责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

林彪支吾其词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言下之意是他不“听话”了。

“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聂荣臻感到十分可笑,没想到这也成为打倒一个人的理由。

但是,林彪、江青等人仍一意孤行,操纵中央军委办事组停发了老师们的重要文件,并不让老师们过问中央军委的事情,使军队大权被“林、黄、吴、叶、李、邱”一手独揽。

林彪在关于“杨、余、傅事件”的讲话中,把“华北山头主义”作为打倒“杨、余、傅”的主要罪状。于是,北京军区成了批判“华北山头主义”的发源地,并先后3次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持续时间长达7年之久。

4月4日到14日,在林彪的指令下,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委扩大会。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人参加了大会。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人强令会议“揭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把山头主义批透”。

4月9日,在中央政治局接见华北某军、师以上干部时,黄永胜说:“反对刘某某,也就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林彪、江青则异口同声地说,这样做“很危险”,为“华北山头”罗织了新的罪状。

之后,北京军区被改组。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首当其冲遭到批斗。军区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打倒。仅军区司令部被点名批判的人就达119人之多。从参谋长到保密员,多在点名批判之列。二级部长被点名的占在职人数的60%以上。

至此,北京军区党委、机关和部队被分裂成为“华北山头”的和受“华北山头”排斥、迫害的两大阵营,株连了大批干部,造成人人自危、谈“山”色变的局面。

1971年1月3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更是说得活灵活现,恶毒诽谤北京军区有“山头主义”。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公然讲道,从聂荣臻开始,“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都出在华北,是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江青还说,华北是“坏人当道”。

江青在讲话中还诬蔑聂荣臻“从1937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江青的讲话再一次掀起了反对“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九·一三”事件以前,江青一伙也跟着林彪叫嚣“华北山头”“是反对林彪的”。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一伙又把北京军区与林彪挂上了钩,说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因此,江青等人借

“批林整风”运动，在北京军区多次开展了“捣华北山头主义窝子”运动。这样就把“山头”的性质升格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窝子”，形成了反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第三次高潮。

直到1979年，中共中央才为多年来所谓“华北山头主义”这一冤案平反。郑维山及其他遭受打击、迫害和株连的干部被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在林彪、江青等人制造“杨、余、傅事件”期间，许多文艺工作者也遭到了迫害。严凤英就是其中一个。因演出《天仙配》、《女驸马》而蜚声海内外的著名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被扣上13顶“大帽子”，受到批斗和侮辱，严凤英不堪凌辱、折磨，于1968年4月8日服药自杀。

严凤英吞服安眠药后，其丈夫王冠亚不敢擅自送医院抢救，按规定先请示造反派头头。造反派们闻讯大怒，拉出严凤英召开现场批斗会。直到严凤英因药物中毒而当场昏倒，才被许可送去医院。但是，严凤英为第一家医院拒收。第二家医院虽勉强收下，却因严凤英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头头迟迟不肯点头同意，而不敢施救。这就致使昏迷中的严凤英在没有得到任何治疗的情况下停止了呼吸。

与此同时，陈伯达一伙于4月制造了“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早在1959年，山东省公安厅根据上级指示，对江青的哥哥李干卿的政治历史问题进行调查，查明李干卿（充当过国民党警长，津浦铁路防奸小组队员等——编者注）是一个有历史罪恶的特务、反革命分子。

1968年4月，王效禹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专案组

并迅速报告“中央文革小组”。

4月25日,陈伯达说:“山东搞李干卿问题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挖出来。”

4月29日,吴法宪派人将时任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的李秉政等6人押送北京拘留审查,并抄了他们的家。他们对李秉政等人大搞法西斯式的审讯、迫害。此案株连了39名公安干部及其家属。

在辽宁,张志新案,是林彪、江青等人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奇冤大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判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刑事案件”、冤杀、错杀案件的典型代表。

张志新是原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迫害老干部等行径,深恶痛绝,并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8年,张志新就认为,林彪是在搞“左”倾机会主义;认为把林彪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作法十分不好;认为搞“三忠于”活动不是树立毛泽东的威信,而是树立了林彪的威信;怀疑江青有历史问题,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煽动派性,挑动武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有人搞名堂。

张志新要求全面地、历史地对待老干部的功过,反对“打倒一切”。她认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向党上书,提意见,是党的纪律所允许的,给彭德怀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是不能说服人的。导致的恶果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党员不敢向党说真心话。

张志新还认为,把什么都说成是阶级斗争,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张志新在批斗她的大会上大义凛然地说:“我是为党和祖国的前途担忧,忧国忧民,我不是现行反革命。”“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行! 不管未来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被打成一小撮,也要坚持自己的看法!”

1969年9月,江青等人在辽宁的爪牙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了张志新。

张志新被捕后,忍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摧残和折磨,怀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愤笔写下了近万言的“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恳切地向党和人民倾吐了自己的心声,表明了同林彪、江青斗争到底的决心。

张志新写道:“我之所以至今不认罪,因为我对路线斗争及其与之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疑问,起之有因,看法观点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本意。”

张志新认为自己没有错,没有和广大人民为敌,而是出自一个心愿,更不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作为对“司令部”某些成员有疑问,有意见,提出不同看法、异议,或思想上保留,组织上服从,不能视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张志新还写道:“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 想要革命吗? 你就应当是强者,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

张志新的“宣言”触怒了江青等人及其爪牙,他们非法判处了张志新“无期徒刑”。

张志新被判刑后,继续坚持斗争。在长期的精神、肉体被残酷迫害下,张志新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但却被诬蔑为“装疯卖傻”、“抗拒改造”,并视为“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继续

进行反革命活动”。

江青等人的爪牙在1975年2月26日的省委常委会上下令说：“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同年4月4日，张志新惨遭杀害。

张志新被杀害4年后，1979年3月26日，辽宁省委按照中央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有关指示和决定，全面审查了张志新的冤案，顺乎民心民意，终于作出了为“张志新案”平反昭雪的决定。

这一系列凭空捏造出来的各种案件，牵涉人员之多，波及范围之广，都是史无前例的，都是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阴谋所致。据统计，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有10402人，加上其他案件，共判处死刑23921人，冤杀错案情况十分严重。好在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系列案件最终得以平反昭雪。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共和国元帅贺龙遭受的不白之冤极为特别，其案情之复杂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林彪、江青等人对贺龙元帅进行的摧残和折磨也是罄竹难书的。

在1968年3月24日以后，“军委常委全体停止工作”，由黄永胜取代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对全国体育系统实行军管。在这个命令中，写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字样。“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先后被打击迫害致死。

从6月14日开始,贺龙由中央办公厅保护,改为由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作为审查对象实行“监护”。

早在1966年9月下旬,一辆黑色高级轿车从反帝路十七号贺龙的家中开出,于下午1点30分整,停靠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前。贺龙走下车,习惯地点上烟斗,信步跨上台阶,朝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林彪的临时住所走去。这是因为军委碰头会召开的前几天,林彪表示要约见贺龙。

建国以后,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贺龙,一直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贺龙以卓越的军事才干和惊人的体魄,不遗余力地把党交给他的任务作好,开拓拼搏,并用这种精神去感染全军的将士们。

1964年,贺龙曾与同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以及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一起,组织了著名的“大比武运动”。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亲自观看了汇报演习,并对这次大比武给予了充分肯定。

事实说明,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对林彪那种把政治工作说成可以“代替一切”的极端的理论,贺龙一直是存在着一些看法的。在贺龙看来,一支军队如果不讲究军事素质,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这是不言而喻的。因而性情耿直、眼里容不下半粒沙子的贺龙,无疑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

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处约见了贺龙。

几句简短、亲热的寒暄之后,毛泽东的目光再次停留在手中的那份材料上,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眉头也微微地皱了起来,似乎是在某种矛盾的心理中努力寻求平衡。

望着面前的这位当年南昌暴动的总指挥、红二方面军的领袖贺龙，毛泽东欲言又止，只是将手中的那几页材料递了过去。这是林彪办公室呈送毛泽东的几份吴法宪诬告贺龙的黑材料。

在这份材料当中，吴法宪指责贺龙插手“干扰”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在幕后“操纵”部分同志，把整个会议搞得“乌烟瘴气”。

其实，贺龙当时正在吃晚饭，西南军区的几个干部来拜访他。这些人是来京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代表，都是贺龙的老部下。

老部下前来拜访，免不了一阵寒暄，之后便是老婆、孩子、身体、上学之类的闲话。

在交谈中，贺龙信口问道：“你们的会开得怎么样？”

一个部下说：“这次开会和过去的不一样，领导对会议组织很不力，也不召集小组长研究研究。”

贺龙开导这位同自己一样耿直的老部下说：“你们小组长可以自己研究提出来嘛。”

为了不影响贺龙休息，他们同贺龙前后只谈了10分钟便起身告辞了。

心地坦荡的贺龙万万没有想到，身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竟就此毫无根据地告起了他的黑状。看来这里面似乎大有文章。贺龙对此向毛泽东作了详细解释，并表示愿意找吴法宪解释。

毛泽东同意了，并明确表示了对贺龙的信任，说要作贺龙的“保皇派”。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贺龙第一次应约来到林彪那里征求意见。

此时，林彪正在他挂满毛巾的卧室里不安地踱来踱去。自抗战期间被阎锡山部下的一个哨兵误伤之后，林彪的身体一直不好，一见冷水就感冒。自从1949年进城后，林彪一直在各地疗养。林彪还有个从不洗澡的怪癖。于是，各式各样的毛巾便成了他的卧室、起居室内特有的装饰。但就是这样一个个体弱多病的人物，在庐山会议上迅即代替了“犯了错误”的彭德怀。至此，林彪青云直上，直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为了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必须牢牢地握住军队。精通“政变经”的林彪自然懂得毛泽东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的重要。

因此，在吴法宪向林彪汇报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具体情况时，林彪劈头说道，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贺龙“插手”了。林彪说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林彪甚至还直接说，空军机动性强，是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要在空军“夺权”。

吴法宪是经过林彪一手提拔、对林彪已死心塌地跟随的空军司令员，对主子的意图自然心领神会。几天前，毛泽东给贺龙看的几份材料，是吴法宪在林彪这次召见之后，按照林彪的旨意一手炮制的。

中央军委碰头会就要召开了。林彪要借这个机会向贺龙“最后摊牌”。

两位元帅在铺着墨绿色地毯的会客室里见面了。

“贺老总,我对你没什么意见。”林彪假惺惺地寒暄着,进而马上把话锋一转,“你的问题可大可小。军委碰头会就要召开了,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林彪的语调显得意味深长,虽然脸上挂着一丝笑意,但是仍然让人感到一种阴森森的恐怖。

“军委碰头会我是要参加的,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你还不清楚?”贺龙的答复简单、明确,同样有些咄咄逼人。

贺龙和林彪的谈话显然并不投机。因此,他们的谈话陷入了僵局。两个元帅保持着距离,在沉默中对视着。林彪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起来,他有些后悔了。贺龙软硬不吃,本应是在他预料之中的,他仍感到有一种难以压抑的怒火在往上冒。

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这次会面也进一步坚定了林彪要把贺龙“搞下去”的图谋。

在迫害贺龙的阴谋中,林彪的老婆叶群自然成为最阴险、最凶狠的帮凶。1966年八九月间,林彪在毛家湾的住宅正在扩建。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便成了他的临时住所。为落实警卫工作,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便成了这里的常客。

经过和叶群的几次神秘的谈话以及一番激烈的斗争、权衡之后,这个自认为政治嗅觉相当“灵敏”的警卫处长宋治国就明确选择了跟从林彪的道路。在叶群的策划指使下,宋治国写了几本无中生有的所谓“揭发”贺龙问题的材料。

“揭发材料”所罗列的内容有的纯属捏造,有的则全是根据叶群的口授。当然,也有一些内容荒唐到了极点。有些内容甚至将贺龙常与警卫战士闲扯,有时外出不要警卫车,以及

罗瑞卿家里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贺龙夫妇与罗瑞卿的合影照,却不放毛泽东的照片等等,都说成是贺龙的“可疑之处”。

同时,林彪等人既要借刀杀人,又不想留下痕迹。叶群有意当着林彪办公室3位秘书的面,阴阳怪气地问宋治国写的材料是否都是“事实”。宋治国会意地回答说,“完全负责那是事实”,是“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向林彪进行反映的。

一切都在按叶群所策划的样子进行着。自然,宋治国的信誓旦旦与其说是给叶群听,不如说是做给林彪办公室的3位秘书听的。9月27日晚上,叶群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找到了当时在场的3位秘书,命令他们联名写一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材料,以证明宋治国写这些材料完全是出于本人的主动,绝非他人授意。

为了收集所谓“贺龙四处插手”的“黑材料”,在指使吴法宪出面诬告贺龙之后,林彪再次亲自出马,召见时任海军第一政治委员的李作鹏,向他密授机宜。于是,两封诬告贺龙反对“四好运动”、支持海军某些人“罢官夺权”的诬陷材料很快送到了林彪的手中。

当然,诬告贺龙的材料远不止这些。

对那些诬告贺龙的“黑材料”,林彪一一批呈给毛泽东。

据后来调查,仅在1966年9月下旬,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一次交给秘书保存的有关贺龙的“黑材料”就有一二十份之多。而这些材料上,都无一例外地有毛泽东和林彪圈阅的笔迹。

在林彪的直接插手下,贺龙的问题终于慢慢变大了。

康生,这个专门经营诬陷勾当的“奸臣”,也在贺龙背后捅了一刀,制造了一个在北京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的“二月兵变”事件。

1966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军区组建了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担负民兵训练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商借房子。但由于学校师生的反对,最后,卫戍区派出去借房子的人没有借到房子。

由于“极左症”的广泛传染,1966年7月,北大团委的一位干部贴出了一张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提出了北京卫戍区于二三月跑到北大、人大商借房子,怀疑是为搞“兵变”做准备。

这张本来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而令人不屑一顾的大字报,在这个特定的环境气候下,却在北大校园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并迅速被转抄到北京师范大学。

康生就凭着这张大字报,添油加醋地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兵变,他的计划之一是在北大、人大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

最后,康生竟连贺龙搞“兵变”的班底都罗列得一清二楚,说贺龙搞“兵变”的总参谋长是许光达,许光达是“贺龙的人”等等。

经过事后查证,康生认定贺龙搞“兵变”的“千真万确”的惟一证据,竟然只是一张捕风捉影的大字报而已。此时,谁敢想到一个“德高望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竟然说谎到如此程度呢?

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幕后活动,林彪的第一步棋终于达到了目的,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开始动摇了。毛泽东还点头同意,可以就贺龙问题“在小范围内打招呼”。

到此,在随后的中央军委碰头会的名单上,贺龙的名字被抹掉了。1966年10月,“打招呼”的范围已扩大到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军区的负责人。同时,在有关会议上,对贺龙的诬陷也逐渐升级。

凡是有林彪伸手触及的地方,自然就少不了江青一伙的魔影。

对林彪来说,江青是一个得力的同盟者。曾吵遍天下的江青,却从来没有跟林彪和叶群翻过脸。追根溯源,尽管江青心狠手毒、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的品行在老干部中人人皆知,但“文革”一开始,林彪便无耻地吹捧江青为“党内、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

1968年3月,林彪居然还使出了一个罕见的招数,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到了五级。这就是林彪一手将江青扶上政治舞台,扶上“文化大革命光辉旗手”的宝座的情况。

林彪在江青身上的政治投资确实是“一本万利”。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相互勾结,干尽伤天害理的事。在陷害贺龙的阴谋中,江青一伙积极地进行配合。

1966年秋冬以后,全国的政治气温急剧上升,几乎达到炽热化的程度。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将”在林彪和江青等阴谋分子的愚弄下,扔下书本,关掉车床,放下镰刀,怀着“誓死捍卫”的赤诚红心投入到这场“大革文化之命”的运动之

中。

喊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组成了一股不可低估的却又是被人利用的力量。这一力量不久即被操纵来打倒贺龙。

同年12月，江青跑到清华、北大等地，不顾中央对“贺龙问题只是在小范围内打招呼”的精神，在接见红卫兵头头时，赤裸裸地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

之后，江青又找到贺龙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儿子贺鹏飞，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到他了！”

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贺龙的家被抄了，大量的机密文件被抢走了，围攻的人挤满了庭院。“打倒贺龙”的大标语贴满了庭院，贴满了首都的大街小巷。

在“一月风暴”席卷之下，“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面进攻、全面夺权”的阶段。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强烈地震动着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1967年1月9日，经毛泽东批准，在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林彪的主持下，中央军委在京召开了碰头会。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贺龙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林彪、江青在会上竭尽其污蔑陷害之能事，对贺龙进行诬陷、诽谤。

林彪在碰头会上说：“全面内战现已打了一半，要打下去，取得全胜。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贺龙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他不是正派人。”

江青也在碰头会上说：“零敲碎打是不行的，要宣布彻底

革命,要选中打击目标。”

林彪肆无忌惮地诬陷说:“贺龙搞鬼名堂,巩固山头,扩大山头。搞鬼名堂是彭德怀、贺龙。一是兵痞,一是土匪,要做真龙天子。他的总路线同我们不同,他的灵魂深处是个大阴谋家。”

林彪又说:“不要看他搞政治,他同罗瑞卿、邓小平、彭德怀结合起来就不简单。贺、罗、彭是一帮的。”

江青插话说:“三结义现在直接跳出来了。”

林彪甚至不顾事实地说:“南昌暴动有了他成了拖累,不然仗可就打好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的爪牙们为了给其树碑立传,曾组织御用文人炮制一幅关于“南昌暴动”的油画,当时仅仅是见习排长的林彪俨然以起义总指挥的姿态出现在画面上。对此,只要稍有历史知识的人看后都不禁哑然失笑。

但是,在这个荒诞的年代里,竟无人敢直接指出其中的荒谬,直到后来林彪垮台,这幅“南昌暴动”图和“毛主席与林彪井冈山会师”的图画才被销毁。

1967年初,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一批批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小将”闯入“反帝路”贺龙的家中,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贺龙只好住进中央第六招待所“避难”。可是,造反派们的消息异常灵通,每到一地方,总是有人前来揪斗。

贺龙终于震怒了。贺龙自认一生光明磊落,从不怕别人搞鬼,所以执意要同前来“揪斗”的学生们见面,他要站出来揭穿那几个“捣鬼的人”的阴谋,他要让那些无知的娃娃们看到,他贺龙的血是红的还是黑的。

但在贺龙的夫人薛明和周恩来的劝阻下,贺龙终于还是把满腔的怒火强压了下去。令贺龙感到安慰的是,在这种艰难的非常时期,周恩来把贺龙接到自己家中安置下来,而后再将贺龙送到西山保护起来。

临行的前一天,周恩来正式找贺龙谈了一次话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分两派,连朱老总的箱子也被撬了。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自从1966年9月林彪与贺龙的“最后摊牌”之后,林彪一直挖空心思,企图将贺龙置于死地。但是,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要想把贺龙整倒,这绝非轻而易举。

“贺龙”两个字,解放前是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字。对此,毛泽东在建国后评价贺龙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

要想搞掉贺龙,必须在“历史上”大作文章。为此,林彪可谓煞费苦心。

1967年2月14日,武汉市二十中教师晏章炎(即原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南之子)炮制了一份“关于揭发贺龙在抗战前叛变的罪恶活动”的材料,诬告贺龙在1934年国民党对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后,向蒋介石乞降,并与伪南昌三十三营第二厅特工人员熊贡卿秘密接头。

对林彪一伙来说,这无异是整倒贺龙的“天赐良机”。

林彪当即批给江青转呈毛泽东。6月13日,林彪、叶群迫不及待地派空军办公室一位处长等前往南昌等地调查。

对于林彪和叶群的意图,调查人员自然心领神会。1967年7月12日,空军办公室这位处长以及其他人员在调查报告中,把1933年12月贺龙诱杀由蒋介石派出向他策反的反动

政客熊贡卿的事件,说成是“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上报中央。

秋天到了。贺龙常常长久地伫立在门前,向山角下眺望。一天傍晚,贺龙竟将几盏闪烁的路灯误认为是上山来接他的车灯。但是,周恩来派来接贺龙的车一直都没有来。

在贺龙被迫躲到西山的时候,林彪一伙继续进行着捕风捉影的捏造,如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贺龙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贺龙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以业务挂帅”;教育大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过一个窃听器等等。

9月7日,在中央召开的一次碰头会议上,叶群作了长篇发言,提出了许多诬告贺龙的耸人听闻的问题。所谓“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自然放在首位。叶群拿出一些“证据”材料,向与会者展示。叶群声称“贺龙问题十分严重”。所以,叶群要求对贺龙立案审查。康生、江青、谢富治、陈伯达等当即对叶群的提议表示积极赞同。

9月11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等人的筹划下,一份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行”的报告,从林彪办公室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两天之后,也就是在9月13日,毛泽东圈阅同意了。

林彪、江青等人的“苦心”没有白费。经过一系列秘密

的、公开的、非法的、合法的活动之后,在“名正言顺”的遮掩下,对贺龙的迫害大张旗鼓地进行了。

11月1日,在康生、叶群亲自主持下,贺龙专案组制定了《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专门强调了要把“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

康生操着沙哑的山东口音,靠在沙发上大发厥词。他诬陷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共产党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贺龙不但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过去他和共产党打过仗的,一直是斗争的。康生并诬陷说,湘鄂西肃反期间,贺龙“杀了许多共产党”,说是肃反扩大化,其实还是贺龙“有意杀共产党,向蒋介石投案,扫清投降的道路”。

康生还赞许专案组说“有成绩,历史问题搞了不少”。同时,康生还要求专案组在办案过程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的确,专案组在随后的不到一年时间内,遵照康生、江青等人的指使,给贺龙罗织了不少的“罪名”。

为查证贺龙历史上“投敌叛变”的材料,专案人员“不辞劳苦,奔赴全国有关省份”。

12月2日,几个手持“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介绍信的军人,急匆匆地走进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的办公室。他们是根据红卫兵从北京《晨报》上抄来的一条线索,专程来查证所谓“贺龙在1927年南昌起义后于8月5日向蒋介石致电乞降的反革命罪行”。没有进省革委班子的副省长欧百川等十几人被电传到了省公安厅“集中考虑问题”。

几天以后,在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北京来的人同欧百川的“谈话”正在进行。

“现在贺龙在北京搞‘二月兵变’，你要揭发他的罪行，证明是因为贺龙叛变革命，才南昌起义失败的。”北京来的人说。

“‘二月兵变’我不清楚，据我所知，贺龙历史上没有叛变。”欧百川回答道。

“你要老实交待，不要欺骗中央。”北京来的人说。

“我确实不知道。”欧百川说。

“贺龙参加南昌起义，是投机革命。你是当时贺龙手底下的副师长，要和他划清界限。”北京来的人说。

欧百川没有说话。

北京来的人说：“你要大胆揭发，听说你子女的工作还不错。不要给子女脸上抹黑。”这显然是在恐吓。

“我不敢欺骗中央，可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清楚。”欧百川慌乱地说。

“你这个老混蛋！不说今天就站在这儿，不许喝水，不许吃饭！”专案组的人大声恐吓道。

按照专案组的想法，如果能够获取所谓“八·五求降电”“属实”的口供，无疑会有力证实贺龙这个当年国民党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南昌暴动的总指挥，是怀着“投机革命”的动机参加起义的。为此，贵阳专案组专门拟订了“02号战斗方案”，并从地方军队抽调了十几个人充实力量，设立了保密室，安装了直通北京的专线保密电话，准备每天向“中央”汇报结果。

同时，四川成都也在积极行动。时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谷志标、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李文德以及秀山

县的“老秀才”唐再扬等多人受到贺龙专案组人员的审查。

1967年底,身为四川省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谷志标,在一个班全副武装的看护下,被秘密监禁两个多月,每天分3班轮流进行批斗审讯,让其交待段德昌被杀一事的经过。段德昌是红三军高级将领,他的被杀,是王明“左”倾路线指导下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与贺龙毫无关系。

专案组向贺龙本人调查这一问题时,贺龙向在场的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的天呀,你哪里知道当时的恐怖,我的枪都给没收了。”

那段历史简直不堪回首,但更让贺龙难以理解的是,这种曾经给中国共产党造成极大创伤的“左”的悲剧,竟然在几十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大地上再一次上演。这是一段更加不堪回首的历史。在所谓“揭发贺龙历史问题”的过程中,贺龙80多岁的堂叔贺勋臣也未能幸免。

1968年3月26日,贺龙患脑血栓失语症病倒了。送到医院后,遵照林彪、江青的“医疗为专案服务”方针,接诊医生竟诬蔑贺龙是“诈病”,对他进行百般刁难怠慢。

刚刚住了几天医院,专案组一伙人就要求尚未治愈的贺龙出院回西山,并借口有人要揪斗贺龙,将他们居室里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同时他们还强暴地把被褥、枕头也收走。

在很长一段时里,贺龙夫妇整日处于暗淡的灯光下,睡在光秃秃的硬床板上。贺龙夫妇的处境日益艰难,本来就不好的伙食最后干脆变得难以下咽了。两个饭盒中,一个是没盛满的饭,一个则时常是清水煮萝卜、白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贺龙常感饥饿,薛明就到被允许走动的山边去挖

野菜来给贺龙充饥。

事实上,就贺龙一案而言,自1967年9月13日贺龙专案组建立至1968年止,先后将许光达、薛明等人一度列为审查案犯和有关案犯,还将若干人列入备查名单,以至于全国各地因此而受株连的人有成千上万。

1968年5月18日,“贺龙专案组”经黄永胜、吴法宪批准,上报给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份《贺龙专案案情进展综合报告》。《报告》中说,贺龙专案组于1967年9月13日建立,已有办案人员24名,负责审查的案犯有18名,有关案犯5名,共23名。其中省、军级以上的19名(内有中央政治局委员2名,中央委员1名,候补中央委员1名——编者注)。

事实上,林彪、江青等人所要打倒的绝不是一个贺龙。在“文革”开始一段不长的时间里,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被罗织许多的“罪名”,戴上了“叛徒”、“内奸”、“特务”、“反毛主席”之类的大帽子。

1968年8月1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贺龙专案组在京的全体人员,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央领导人”、“贺龙专案组”组长康生的接见。

专案组的人员都是从各兵种抽调上来的“好同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都异常积极,调到贺龙专案组之后,经过一年来的“战斗洗礼”,已变得更加“成熟”。

按约定的时间过了一刻钟,会议室的门打开了,康生、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走进了会场。康生抬手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然后驱步上前,做出“十分亲热”的样子,同到会

者一一握手。

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造谣、诽谤的老手。

建国以后,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贺龙,以他那非凡的精力和惊人的体魄,在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同时,还兼任了国家体委主任。1955年,根据国家主席毛泽东开展国防体育的指示,经有关部门批准,北京成立了航海、航空、无线电、坦克等俱乐部,这些俱乐部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才。没有想到的是,康生竟然信口雌黄,以此作为诬陷贺龙的材料。

1968年4月22日,贺龙专案组一位副组长在他的工作日记中写道,康生曾说,体委是贺龙“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康生还说,贺龙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空军都有贺龙的“国防俱乐部”,有“无线电俱乐部”。

据原贺龙专案组的一位同志证实,关于什刹海的一个破炮,那本来是海军退役下来的,在国防体育项目中只能作为练习瞄准用,不论炮口对准哪里,都打不响。康生对此说得很玄乎,但是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9月18日中午,负责守卫的战士给贺龙送来了一封贺龙专案组以中央军委办公厅名义发给贺龙的亲启信。贺龙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要贺龙交待历史上“罪行”的书面提纲:“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洪湖,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有哪些人,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

在这个充斥近乎宗教狂热空气的年代里,专案组强迫贺

龙及其夫人薛明两位老人每天站在毛泽东像前“早请示”、“晚汇报”，“深刻反悟”。专案组还多次通过中央军委办公厅转来密封的“交待提纲”，强迫贺龙交待历史上和现行的“反党罪行”。

贺龙，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面对敌人的子弹眼睛都不曾眨一眨。而面对林彪、江青等人用最堂皇的“革命”词句装潢起来、盗用他所最为信赖的中国共产党的庄严名义射来的毒箭，贺龙感到前所未有的伤心。

贺龙曾写信给林彪、江青，说他们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如果有了证据，那也是假的。

的确，林彪、江青等人也深知，要彻底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彻底打倒贺龙”，只靠他们手中的几份信口雌黄的告状信和红卫兵从敌伪报纸上剪来的一些造谣材料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扩大所谓贺龙“反革命材料”的来源，在江青、林彪等人的直接操纵下，在北京地区乃至全国各地和军队内部，专案组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贺龙的一些老部下和同贺龙有“重大”关系的人分别被立案审查，作为“贺龙”专案的分案。在这些“隔离审查”中，为了获取专案组所需要的材料，他们非法进行了一系列逼供、诱供、套供，甚至不惜动用法西斯式的肉刑。

根据专案日记记载，时任装甲兵司令员的许光达在1967年8月至1969年，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一共被审讯416次。在许光达含冤逝世的前3天，他还被拖下病床“请罪”。一个出生入死、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将，竟然被“无产阶级

司令部的红色卫士”折磨成这个样子。许光达患癌症得不到及时治疗,终于在1969年惨死在医院的马桶上。

然而,林彪、江青及其爪牙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被说成是“斗争的需要”。

从1968年下半年起,贺龙的医疗由警卫一师某部的一位姓沈的医生负责。这位心地善良的医生十分关心贺龙,经常来探望,又不时帮忙买些必需的药品、日用品。

9月18日,第一批所谓贺龙的“历史问题”编出来了,这就是:“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1929年你是如何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的?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

面对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生性耿直的贺龙最初怒不可遏,狠狠地将这些所谓“罪状”往桌上掷去。冷静下来后,贺龙针对被诬蔑的“罪状”,就参加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及其他历史情况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详细回顾,同时让薛明记录下来进行反击。

面对残酷的迫害,虽然身处逆境,但是,贺龙的赤胆忠心并没有因此而磨灭。早在1967年春,贺龙被送到西山后不久,在薛明的帮助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回忆和思考,贺龙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的报告》,请周恩来阅毕后呈给毛泽东。在报告中,贺龙详细地回顾了当时的情况,总结了当年惨痛的历史教训。

凭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嗅觉,贺龙已经觉察到在一片“最最革命”的口号中,类似当年王明路

线极“左”的东西正在产生、泛滥。为避免血腥的历史悲剧再一次在中国的大地上上演，贺龙中肯地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当年肃反扩大化的历史教训。贺龙要以他的疾呼引起全党的警觉，用他赤诚的胸膛去阻挡那些阴冷角落里射来的毒箭。

1968年的冬天来到西山之后，贺龙与外界的一切均被切断了。虽然这时的贺龙名义上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谁都无法想到报纸和广播竟成为他此时唯一的消息来源。

广播中刚刚传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的消息。由于江青、林彪一伙的迫害，身为中共八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贺龙竟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力。从公布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名单中，贺龙还得知，许多中共八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及大部分候补中央委员，也没有出席会议。对此，贺龙进行了长时间的沉思。

贺龙曾天真地认为毛泽东看了他的申诉就会出来“保”他。可身陷囹圄的贺龙又哪里知道，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等人的“鬼话”，在1968年10月13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宣布对贺龙不“保”了。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薛明正在灯下为贺龙缝补棉衣，贺龙突然对她说：“要有思想准备哟，他们是完全有可能把我们分开的。”

薛明吃了一惊，问：“这怎么能行？分开了谁来照顾你？”

“你应该先照顾好自己啊！你在延安揭发了叶群那么多

问题,她能放过你吗?”贺龙已从事实中逐渐领悟到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已被某些人用做了个人恩怨了结、算历史旧账的工具。他已不再天真地以为这是正常的党内斗争。

对于贺龙明确提出的这一点,薛明是坚信不移的。

林彪等人欲将贺龙和薛明置于死地而后快,除了是为他们清除篡党夺权的“障碍”外,还有历史上的原因。“七七事变”后,薛明随平津学生到南京请愿,发现后来成为林彪老婆的叶群与国民党人物来往密切,叶群参加过CC派学生讲演比赛,并获得第一名。

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薛明找叶群谈话,叶群承认当时在南京讲演时曾宣称“只有蒋介石才是我们惟一的领袖”。然而,在薛明要她向组织交代上述问题时,叶群却大撒其泼,又哭又闹,导致交代不了了之。

贺龙自1950年发现有轻微糖尿病后,多年来,经药物、饮食治疗,病情一直较为稳定。由于1967年以后受政治上、人身上的迫害,贺龙的病情逐渐加重。

在受到不尽的物质和精神损伤期间,贺龙的生命自1968年就开始进入了倒计时。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贺龙专案组”负责人受时任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召见后,根据黄永胜的授意,亲自写了一份报告,提出收缴贺龙的自备药品,并要求专门选派一名“政治可靠”的医生或护士。

专案组的报告经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圈阅并报康生批准后,通过6道“政审”,从天津某医院挑选了一名“政治可靠”的护士来当“医生”(那位善良的沈医生于1969年1

月在专案组的命令下被撤换)。来京报到的当天,专案组的一位负责人便郑重其事地向这位“政治可靠”的“医生”强调:“要站稳立场,提高警惕,划清界线,有时就要收缴和控制贺龙的药品。”

就这样,贺龙夫妇从家中带来的治疗糖尿病、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的药品 37 种计 3000 多片被全部收缴,甚至检验尿糖的试剂也被全部拿走。

1969 年 1 月 15 日,专案组下达了毫无人道的密旨:“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有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此后,根据这个指示,这位“政治上可靠”的“医生”不仅不给贺龙以必要的照顾和治疗,而且还中断和减少过去贺龙服用的降压灵和 D860 等必备药品的用量,使贺龙失去了基本的药物保证。在逝世前的半年多时间里,身为一个糖尿病人,贺龙竟连一次血糖也没有查过。

与此同时,为加强对贺龙夫妇的监视,一天夜里,专案组突然派人要贺龙夫妇搬到山下去住。这样一来,无论上厕所还是在走廊里散步,都要经过那个“医生”的住处。

林彪一伙费尽心机,想尽了各种办法迫害折磨贺龙。

一段时间里,某些人借口怕有人发现贺龙住在西山,将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去,贺龙和薛明只好睡在没有卧具的床上,用手臂当枕头。夏季,专案组以水源困难为借口,曾断水 45 天,每天只给一小壶基本的饮用水,其他生活用水则全靠接雨水凑合。

一次,已是 71 岁的贺龙同薛明一起,为抬一大盆雨水而

将腰部扭伤,剧烈的疼痛使他整整 18 天靠在椅子上不能活动。

贺龙的衣服早已破旧不堪,全是补丁。他与薛明合用的一块毛巾中间已破了一个大洞,只剩下了 4 个边。这一切,贺龙都毫不在意。

对此,贺龙十分乐观地对薛明说:“过去长征时穿的衣服就是这样,现在又穿上了旧衣服,很好嘛!”

贺龙还常常对夫人薛明说:“我本来就是共产党最背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

一天中午,贺龙一边用力地嚼着那老得像甘蔗皮一样的豆角,一面兴致勃勃地向薛明讲起当年湘鄂西地区的艰苦斗争。

对糖尿病人来说,除以药物控制和治疗之外,饮食治疗也是防止各种严重并发症发生的保证。但在这里,贺龙夫妇的饮食经常是吃老得像甘蔗皮的豆角,或是清水煮白菜、糠萝卜,一个两格的圆形饭盒,一格里盛着菜,一格里盛着饭,有时还不给盛满。

每次吃饭,都是薛明犯愁的时候。对贺龙这种病人来说,副食就是他治病的药物。为了让贺龙多吃一点菜,薛明常常把筷子伸到饭盒里,蘸一点咸水放在嘴里吮吮。但这样又不能解决多大问题。谁能想到,叱咤风云、功勋卓著的贺龙元帅在最后的时光竟还会受到这样的折磨。

在从身体和物质上日益加紧折磨的同时,林彪、江青等人不忘从精神意志上不断打击贺龙。为阻止贺龙参加中共九大,林彪、江青一伙在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时认为,贺龙

的“脾气大，怕斗不过”，改为“背靠背”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1968年底，江青、叶群、康生、张春桥等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研究“中央文革小组”一办、二办专案审查对象的定案问题。周恩来也被迫参加了会议。

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兼贺龙专案组组长康生强打着精神，进行最后的总结式发言。

康生说，时间很多、问题很多、材料很多，要把主要问题、能定的或基本能定的问题定下来，能说明他们“这些王八蛋共产党员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天安门城楼不能上”。这个“德高望重”的“理论权威”一改昔日的斯文形象，言语中露出腾腾杀气。

但是，仅凭专案组已有的材料，还难以将他们所审查的对象置于死地。中共九大召开的日期快临近时，林彪、江青等人又有些乱了阵脚。在林彪、江青等人看来，如果让这些“老家伙”们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又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在给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专案工作“抹黑”。

“专案组同志的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我看就凭现有的材料，对贺龙定‘二变’（即历史上叛变，现行政变——笔者注）就没问题。”江青将刚刚看过的一份关于贺龙的调查报告扔到面前的茶几上，一边说着，一边用挑战似的目光注视着凝眉沉思的周恩来。

1969年4月1日至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肯定。此外，在所通过的新党章中，林彪被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

接班人”写进了党章。这是国际共运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

贺龙从报纸上得知,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些人是整老干部有功啊!”贺龙愤愤地敲打着这些人的名字说,“说不定我的专案正被他们把持着,这些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同时,贺龙清楚地感觉到,在林彪、江青等人的迫害下,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在中共九大开过后的几天里,在一个小小的日记本上,贺龙写满了“冤枉”二字。

1969年5月上旬,贺龙连续摔倒了7次,卧床不起,身体极度衰弱。到后来,连他心爱的烟斗也不愿拿起来了。

6月8日早上,贺龙连续3次呕吐,呼吸急促,全身无力。可“医生”却外出了,中午12点回来后,在听完薛明的病情讲述后,“医生”先请示专案组人员,直到下午3点才为贺龙打了“止吐针”,但仍未止住呕吐。

下午5点,贺龙血压降低,上腹剧烈疼痛。住地工作人员和“医生”这才决定向上级报告。新派医生4个小时后才姗姗而来,但他并不作血糖、尿糖检查,反将贺龙的尿样送到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企图给贺龙扣上“畏罪自杀”的帽子。在未作进一步诊断的时候,医生又给贺龙输了对糖尿病人不宜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

然而,在确诊贺龙为糖尿病酸中毒之后,他们仍使用了这种葡萄糖,直到贺龙病情急剧恶化,因有些人担心死于己手,专案组才在6月9日零点40分后打电话要求医院抢救。5

点半,专案人员和三〇一医院医生才来到西山,先是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到7点左右医院才回复“可以送来”。

这时,神志仍很清醒的贺龙对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贺龙并且坚定地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

但是,专案人员强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后,这对相濡以沫数十年的革命伴侣终于被迫分开了。

早在贺龙入院以前,林彪手下干将、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就已指令医院:“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就叫专案组派一般的医生就可以了。”

按邱会作的“指令”,医院负责人在接到贺龙病危的电话后,没有通知病房作抢救准备,更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场抢救,致使贺龙在8点55分入院,到10点25分才开始治疗。11点半,主治医生提出组织专家会诊抢救,可医院负责人竟将会诊放在两个小时后才进行,同时会诊中又不准任何专家接触病人,只允许“背靠背”地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和X光片讨论。

在这种待遇下,在会诊1个半小时后,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共和国元帅、曾经威震敌胆的一代开国元勋贺龙含恨逝世了。

然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并未因贺龙去世而停止对他的诽谤。1971年5日,专案组写出了《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将贺龙做出了“开除党籍、军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的处理意见。同时,他们又将矛头对准了贺龙的妻子薛明及其子女,施以迫害。

贺龙被迫害致死后不久,叶群便亲自打电话给林彪的死

党、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要他想办法把薛明送出北京,并补充说“越远越好”。

1969年11月中旬的一个星夜,3辆军用小轿车急速驶入北京丰台火车站,在一列即将发出的列车边停了下来,四男四女8个军人,将虚弱的薛明押上一节普通的车厢。

薛明被押送到贵州的一个空军农场。在这里,年过半百、身体虚弱的薛明被当成一个“重要犯人”来看管。专案组人员强迫她改名换姓,不准她给3个孩子写信,要求她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派了一个班的兵力看押。

薛明一切自由都被剥夺了。吃饭、走路、劳动、睡觉,甚至上厕所都有两个以上的人监视。在此期间,他们竟以准备打仗、练习行军为由,经常在半夜将年过半百的老人叫醒,要她打起背包,在狭小阴暗的房子里转来转去。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终于说话了。毛泽东说,他因为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一再催促为贺龙恢复名誉。正如贺龙在最后岁月中所说,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毛泽东说,“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但是,张春桥既不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

12月21日,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讲话,再次指示要为贺龙平反。毛泽东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

同。像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你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催问说：“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

在毛泽东的再三催促下，中共中央于9月29日发出了1974年的第二十五号文件。这个文件是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在概述了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之后，对所捏造的“罪状”予以否定。

一是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上是，1933年12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企图“收编”。贺龙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1934年3月17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

二是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

三是关于所谓贺龙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通知还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即“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但是，由于“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个平反是不彻底的，通知中仍留有“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是“病故”的不实事求是的错误提法。

贺龙逝世6周年的时候，即1975年6月9日，“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周恩来抱病出席了

这次仪式。

周恩来一下车即悲痛地边走边喊：“薛明！薛明呢？”

薛明赶紧出来迎接。周恩来握着薛明的手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说完，彼此泪如雨下，休息室外的人都能很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哭声。

周恩来凄然说：“我的日子恐怕也不多了。”

哀乐声起，周恩来起身走到贺龙的遗像前深深地一连鞠了7个躬，并且即席发表了讲话。周恩来这样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但是，这次由中共中央批准的骨灰安放仪式，不久即被江青诬蔑为“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是“用死人压活人”，并且又开始收集与贺龙一起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的材料，妄图把已经平反的问题再翻过来。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召开前不久，有关部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查证谋害贺龙的批示，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贺龙的死因作了查证。联合调查组经过一年多的工作，于1980年3月24日作了结案报告。

报告在列举了大量确凿证据之后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林彪、江青、康

生一伙“直接操纵和控制专案组”对贺龙“在精神上肆意摧残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使贺龙同志的糖尿病发展、恶化成酸中毒和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后,含冤而死。”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赞扬了贺龙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和高尚品德。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对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

“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在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①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第 816 页、817 页，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8 月版。

第九章 人民写史

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冤案始末

毛泽东对刘少奇等派工作组的事情不满意 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迫作检讨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的位次排列发生了变化 林彪跳出来整刘少奇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清华大学造反派向刘少奇“开炮” 刘少奇准备辞去国家主席 刘少奇陪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张春桥直接部署“打倒刘邓”的行动 在“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 刘少奇被错误批斗的经过 中共中央决定“审查”刘少奇的问题 “打倒刘少奇”的声音越来越高 刘少奇的精神和身体濒于崩溃 刘少奇被隔离审查前后 林彪、江青等人给刘少奇罗织的“罪名” 共和国主席的最后日子 刘少奇：历史是人民写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动和开展是与“打倒刘少奇”事件紧密相连的。

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林彪、江青等人的大肆批判,丧失了人身自由,并被残酷地批斗,最后被强加上“叛徒、工贼、内奸”3顶大帽子,开除出党,并于1969年11月12日因受尽非人的折磨,惨死在河南开封。

“打倒刘少奇”不仅仅是以党内斗争的形式,而且是用自下而上的“大鸣大放”的群众运动的形式出现的。同时,“打倒刘少奇”不只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方面,而是囊括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的一场运动。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初期,“打倒刘少奇”就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大批的干部都被打成“刘少奇修正主义黑线人物”和“反动学术权威”,还有成千上万的无辜群众被打成“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保皇派”。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大批判更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谬论流传,遗害无穷。这是一场值得人们去深思的历史劫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在这两个会议中间,便是“工作组事件”。因而,“文化

大革命”是经过了全面发动的。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为协助各地组织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使“文化大革命”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刘少奇、邓小平于6月初主持(当时毛泽东在外地,周恩来出国访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参照北京大学的作法,向北京市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6月3日,中共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力图控制混乱的局面。许多省市也学习北京的作法,相继向本地的学校派了工作组。

6月20日前后,由于学校之间的相互影响,社会上“赶”、“反”工作组的现象增多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也迅速显露并加深。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抢先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组的情况,给工作组加以种种“罪名”,使得毛泽东对工作组的作法感到很不满意。

7月23日以前,毛泽东虽然对派工作组不满意,但是没有提出撤回工作组。刘少奇等在7月23日下午也还继续表示,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

从7月24日开始,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天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并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可以由学生、教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

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毛泽东说,除了群众之外,没人能行,“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毛泽东还说,这已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

7月26日夜,江青、陈伯达等人再次来到北大鼓动群众反对工作组。陈伯达说:“我们建议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想搞好革命就要搬掉这个障碍物”。

为使“文化大革命”的战火烧得更旺,7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到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要求不明真相的群众“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由于毛泽东支持江青、“中央文革小组”的一系列活动,北京市委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最终撤销了工作组。

7月29日,“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会上,刘少奇被迫就派工作组问题作了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刘少奇迷茫地说,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想中共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和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

为了弄清“文化大革命”究竟应该怎样搞,也为了响应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亲自参加北京各学校的运动,以便取得感性知识的号召,经刘少奇和北京新市委研究确定,刘少奇于8月1日起在北京建工学院蹲点。

8月2日,刘少奇参加了建工学院师生辩论会。8月3日,他又听取了对立两派代表的意见。8月4日,刘少奇专门

向建工学院工作组了解一些运动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刘少奇只有过少量的插话或发言。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其中，会议代表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被特邀的首都高等院校部分代表（聂元梓在其中——编者注）。

在会上，刘少奇作了检查。刘少奇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要向毛泽东汇报一次。刘少奇指出，一段时间里，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他自己负。同时，许多同志也在会上谈了对工作组的认识，作了自我批评，检讨对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8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严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犯了“镇压”群众的路线错误。

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于8月7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

毛泽东的“大字报”从所谓立场角度上更严厉地批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并把工作组问题同1962年、1964年中央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联系起来，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内部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实际上否定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第一线领导。

只到这时，刘少奇才意识到自己是“犯了严重错误”。此后，会议转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10日，刘少奇、邓小平都在会议中作了检查。

刘少奇对这张大字报的反应是表示对大字报所下的结论持“保留意见”。刘少奇辩解说他制定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无意的,属于认识问题,他并没有在“背后活动”。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编者注)。与此同时,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作了长篇发言。

在发言人中,林彪煽动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部是毛泽东,毛泽东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中国共产党就要打败仗。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为扭转刘少奇所造成的“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局面,也就是为了通过《十六条》费了相当的周折。

这次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新闻媒介以中央领导的新排列加以报道,这很快就引起了党内外群众的种种猜测。同时,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也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了。社会上开始出现了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的大字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有的中央第一线领导集体已不复存在。刘少奇处于被批判的地位。

林彪这时也跳出来为整刘少奇推波助澜。10月1日,在庆祝国庆17周年的群众大会上,林彪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从而别有用心地暗示,只要刘少奇不倒台,不被批臭,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就要残酷无情地进行下去。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林彪在会上发言,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林彪的这一讲话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而且在会后被大量印发到群众之中。会上,另外一些人也指名道姓地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批判。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全体会议上作检查。刘少奇的检查包括3个方面内容,刘少奇首先讲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五十多天的情况,表示要负“主要责任”。其次,刘少奇讲了“历史上犯了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的情况,着重说了1962年和1964年的事情。再次,刘少奇针对实际情况,检讨了自己犯错误的原因是“不理解”运动,怕社会秩序混乱得不到控制,“错误估计”运动的形势,同时因为思想上还存在许多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最根本的是“还没有学好和掌握好”毛泽东思想。

刘少奇的检查基本上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径作的,违心地承担了许多并不应由他个人承担的责任。

事实上,毛泽东在会前早已看过刘少奇检查的初稿。9月14日,毛泽东在初稿上批示刘少奇的检查“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但是刘少奇的检查作为正式文件下发时,毛泽东的批语被删掉了。他的检查最终成了批判他“反动路线”的罪证。

毛泽东也在中央工作会上讲了话。关于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谈得比较有分寸。10月24日,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少奇、邓小平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少奇、邓小平革命。”“对刘少奇的功绩不能一笔抹杀。”

毛泽东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他处在第二线,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而且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

毛泽东在全体会上说,中央分一、二线,他也有“责任”。“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毛泽东还说,北京问题,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可见,毛泽东还是把刘少奇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还要求采取党内矛盾的解决方式。

会后,社会上的造反行动更为激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普遍受到冲击而逐渐陷于瘫痪。10月中下旬,北京红卫兵组织贴出“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之后,社会上红卫兵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举动不断发展。

10月29日,清华大学校园内出现了《刘少奇同志7月29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直接向刘少奇“开炮”。

随后,地质学院迫使工作组组长返回地质学院接受批判,给清华大学学生反对工作组的行动注入了兴奋剂。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清华大学又出了一批矛头对准刘少奇、王光美的批判性的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很快冲击到朱德、康克清、蔡畅等人身上。刘少奇对此忧心如焚,却又无可奈何。经过一段时

间痛苦的冥思苦想后,他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一厢情愿地以为这种方式能尽早结束运动,使广大干部免受冲击。

中央机关也发起了“批判刘、邓司令部”的运动。11月2日,中央组织部贴出很多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天安门前也高悬着“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

11月3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了红卫兵。报纸上刊载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等5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刘少奇、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显然大大降低了。不过,在这次接见活动中,毛泽东特意同刘少奇交谈了十多分钟。这给刘少奇带来了一定的宽慰。

11月25日,刘少奇陪同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12月11日,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名义给肯尼亚发出一份礼节性贺电,则是最后一次行使了他的国家元首的权力。此后,刘少奇实际上失去了人身自由,遭到无情的接二连三的批判斗争,同时对刘少奇的残酷的人身迫害也接踵而来。

12月18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审查王光美所谓“特务嫌疑问题”。江青等人开始公开宣传“打倒刘少奇”,竭尽所能,企图把刘少奇先在社会上搞臭。

“中央文革小组”已经不满足于对刘少奇口头上的指责或批判,他们准备呼风唤雨,造起泰山压顶般的声势,从政治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

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接见了蒯大富。张春桥对蒯大富说,从全国来讲,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要联合起来”,发扬

“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刘少奇、邓小平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当天晚上，蒯大富向“井冈山红卫兵”的头目传达了紧急命令，并对“打倒刘少奇”的行动作了具体部署。按照张春桥的指令，蒯大富接手掌握了清华园其他两个群众组织，并主持召开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鼓噪“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

12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园航空馆向他的总部头目详细讲了预备于12月23日把“打倒刘邓”的行动推向北京的计划。有人对此表示反对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来没人敢把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反对刘少奇我坚决不同意！”

这时，蒯大富闻听此言，大发其火。“腾”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拍着胸脯说：“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打倒刘邓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首长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亲自交给我们，这是首长对我们的信任，这是中央文革对我老蒯，也是对我们大家的极大信任！由首长亲自指点我们，不管前面如何，险风恶浪也敢闯，怕什么?! 我们应该玩命地紧跟。”

蒯大富不容到会人员的表决，强行通过了他的行动计划。惟一改变了一点的就是他仅把时间推迟到12月25日。

12月25日上午，500多人在蒯大富的率领下从清华大门冲出，一路摇旗呐喊，一直来到天安门，然后又兵分5路，每路由广播车嘶喊着开道，分别到西单、王府井、北京站、菜市口等处演讲，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散发传单，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人身攻击。

一时间,北京城里响起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口号。这次行动一直闹了一整天。

12月24日,戚本禹到北京矿业学院对师生们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戚本禹并且诽谤王光美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

1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北京部分大中学校师生座谈会。在会上,江青煽动说:“两条路线斗争的胜负还没有定,阶级斗争还相当激烈。刘少奇的检讨不像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

江青还教唆红卫兵说,对于刘少奇,“你们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回来,其他怎么做都行”。江青一伙还在会上污蔑说,纪录影片《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是“大毒草”,要红卫兵立即组织批判。

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在会上作了《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发言。

聂元梓说,刘少奇、邓小平从来也“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邓小平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的代表”,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

同时,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的谭厚兰在会上攻击了刘少奇的名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谭厚兰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充分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丑恶灵魂”。

12月30日,江青到清华大学,单独召见了刘少奇的女儿刘涛,策动刘涛起来从家庭成员角度揭发批判刘少奇。江青对刘涛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不打倒他,是因为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来。

1967年元旦,北京的天气格外寒冷。这天早晨6时,刘少奇家的大门被叫开了。中南海里的两个造反派强行闯入院内,在院墙上涂了很多大标语,并在院里地上用排笔写下了“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下场”和“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两行大字。

1967年1月3日傍晚,刘少奇和王光美被中南海造反派强行在走廊门口接受批斗达40分钟之久。一个造反派跳出来命令刘少奇背诵《毛主席语录》某一页的某一条。刘少奇背不出,但不慌不忙地说,叫他背词句他背不出,但可以让他说出毛泽东的哪篇文章,写的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写的,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文章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见。刘少奇说,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刘少奇还说,他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都可以解答。造反派们听后瞠目结舌,一哄而散。

1月4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将一卷铅印的刘少奇的讲话材料单独交给蒯大富,并极为恶毒地说:“回去要组织批判。”

造反派们在江青的一手策划下,上演了一幕“智擒王光美”的丑剧。

1月6日傍晚,王光美接到一个电话,说她女儿刘平平从学校回家时在路上被车轧断了腿,需要截肢,正在人民医院急诊室,截肢需要家长签字。

王光美反应敏捷,脑中突然闪现了一个不祥念头。她怀疑造反派在搞鬼,想借此将她骗出中南海。因为周恩来多次嘱咐她不要离开中南海。然而,爱女心切的刘少奇说:“马上到医院去!”

看到王光美有些踌躇不定,刘少奇说:“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为了我挨斗。”

当刘少奇、王光美匆忙赶到医院时,没有见到刘平平,却看到被当做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造反派始料不及的是刘少奇会出现,一时乱了阵脚。刘少奇的儿子喊道:“他们是为了抓你。”

王光美沉着冷静地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刘少奇带着儿女和工作人员回家了,而王光美却被揪到清华园批斗。

后来,周恩来挺身而出,指示保护王光美。王光美才于次日凌晨返回中南海家中。

1月7日,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江青诬陷刘少奇之子刘允若“里通外国”,刘允若因此被抓入监狱,一关就是数年。

1月12日,戚本禹根据江青的旨意,在钓鱼台召集中央办公厅一些人开会。戚本禹在会上煽动说,“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有些事中央不好说,你们群众干了,框框就打破了。”

当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先后冲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处,分别对他们进行围攻批斗。70多岁的刘少

奇受到低头弯腰的批斗体罚。

从1月份起,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揭发、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用大量的捕风捉影的“材料”,制造了种种罪名,公开进行各种各样的辱骂和人身攻击。他们还用漫画形式丑化刘少奇、邓小平等,罗列其所谓“罪行”。其中,最著名的是蒯大富组织搞的“百丑图”。大批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在图中,以小丑的形象与赫鲁晓夫等所谓“修正主义分子”排在一起。

2月1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的《井冈山报》,刊登了题为《刘少奇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的大篇文章,列举了刘少奇的所谓“十大罪状”。

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3次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当谈到刘少奇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是‘反马列主义’的。但九大还要选刘少奇当中央委员。”

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说:“现在不要挂牌子,戴高帽子。”这表明,毛泽东此时还是把刘少奇的问题按党内矛盾的性质处理,要求以党内路线斗争的方式加以解决。

但到1967年3月间,毛泽东的态度就有了明显的变化。3月,康生利用一份诬蔑刘少奇是“叛徒”的虚假材料,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声称他掌握确凿材料,完全可以证明刘少奇在历史上有“重大叛变嫌疑”问题,建议中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

康生搞的材料就是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对于61人的出狱的事,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直都很清楚。中共七

大时，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这 61 人中被选为代表和候补代表的 14 人均作了“本人不能负责”的结论，认为他们都符合代表资格。

对登《反共启事》手续的最高具体负责人确实是刘少奇。然而，刘少奇是在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后执行的。林彪、江青等人一心想把刘少奇置于死地，要尽可能多地罗织刘少奇的“罪名”。

在江青、康生等人的一手策划下，历史被歪曲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最终被定性了。

康生一伙借抓“叛徒”大作文章，是竭力想把刘少奇问题从党内问题搞成敌我问题。他们的诬告终于有了效果，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3月21日，毛泽东批准了康生的报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审查刘少奇 1925 年、1927 年、1929 年、1936 年的所谓“叛徒嫌疑”问题。

中共中央决定审查刘少奇后，刘少奇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对刘少奇的批判斗争随之升级。

三四月间，中央军委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本来这两个会议的主要议题为“三支两军”问题，而康生、陈伯达等人借机把会议变成了散布“打倒刘少奇”的种种谬论会议。陈伯达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攻击刘少奇。与之相呼应的是康生不分黑白地批判刘少奇的发展生产的主张，诬蔑其为“唯生产力论”。

毛泽东也在会上表了态，指责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还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一些具体的批评。毛泽东说，刘少奇这本书是“欺

人之谈”，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

会后，社会上随即出现了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浪潮，并将它蔑称为“黑《修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也发表了大量文章，如《〈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等。一时间，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批判起伏不绝。

紧接着，围绕着影片《清宫秘史》，刘少奇又不得不经受一次激烈的精神攻击。

1967年3月底，北京出版的一份红卫兵小报中报道说，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并且说刘少奇自诩为“红色买办”。刘少奇对这种无中生有的报道极为气愤。

3月28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去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对影片《清宫秘史》的观点。可这封信如黄鹤西去，杳无音讯。

而后来，《红旗》杂志第五期突然发表了由戚本禹撰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矛头直指刘少奇。戚本禹以“权威”的架势，第一次在中央报刊上点名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言“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给刘少奇等人戴上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帝国主义买办”、“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的大帽子。在文章的结尾，戚本禹还对刘少奇荒谬地提出了“八个为什么”的问题：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1962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

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①

刘少奇对戚本禹的这篇文章气愤异常。刘少奇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他从来没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也没有说过当“红色买办”。所以,文章所说的都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刘少奇还说,他不反革命,也不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他在中共七大上提出来的,他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刘少奇说,他曾在1966年8月的会议上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他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但是,刘少奇的申辩声很快被一浪高过一浪的对他的批判浪潮所淹没。

在戚本禹的文章的煽动下,4月1日以后,全国“打倒刘少奇”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批判旗帜》,号召全国人民、各机关部门开展这样的大批判。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明5月8日的文章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并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

① 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人民日报》,1967年4月1日。

批判运动。

这场从4月开始的“革命大批判”，从党报到红卫兵小报，从中央报刊到地方报刊，都从不同角度发表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从政治思想方面“深入揭发批判刘少奇及其反动路线”。

4月6日晚，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勒令刘少奇必须自己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改变作息时间（在此之前刘少奇上午睡觉，夜里工作——编者注）。造反派并且就戚本禹文章中的所谓“八大罪状”提出质问，要刘少奇如实交代。刘少奇据理力争。

当质问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时，刘少奇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激动地说，这个问题简直岂有此理。61人出狱之事，是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

刘少奇说，党内许多干部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白区工作经验，有城市工作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在长期斗争中通过成功与失败，靠鲜血总结出来的，不能全部否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总结过。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党和人民又都懂得建设新中国的干部是最宝贵的，不能把他们统统打倒。

4月7日，为了说明真相，刘少奇交出一篇对戚本禹文章提出的“八大罪状”的答辩。答辩分为8个问题。

针对“八大罪状”，刘少奇说明了一部分事实真相。在回

答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上,刘少奇说他也不清楚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错误路线”的文章。

刘少奇还指出,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他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为什么。这是刘少奇用他当时所能运用的方式,表示了他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反对。

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并抄了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贴出。几小时后,这张答辩的大字报就被撕得粉碎。

4月13日,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再次批斗刘少奇。当刘少奇用事实答辩时,他们就叫嚷“不准放毒”,根本不听刘少奇的辩解。

接二连三的残酷摧残,加上改变作息时间,限制安眠药的剂量,刘少奇的精神和身体濒于崩溃。4月8日晚饭以后,刘少奇面色铁青,浑身冷汗淋漓,然而大夫只给了他几片药就走开了。

随后,“文化大革命”进入“全民大批判”阶段,中共中央对群众组织要求批斗刘少奇、王光美的限制放松。经中央批准,4月10日,清华大学举行了30万人的批斗会,批斗王光美等人。

当刘少奇在4月9日中午得知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组织30万人批斗王光美时,心都碎了。

刘少奇情绪激昂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

怕群众？”^①

王光美急忙掩饰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应该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但是，刘少奇心里还是清楚的，责任该由谁负也是明确的。刘少奇气愤地说：

“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对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②

此时，刘少奇已做了最后的思想准备。刘少奇对家人说，

^①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缅怀刘少奇》，第4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版。

^②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缅怀刘少奇》，第4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版。

从去年8月开始,他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但是,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

刘少奇还坚定地表示:“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刘少奇嘱托家人,他死以后,骨灰要撒到大海里去。

江青等人觉得批斗王光美还不解恨,便趁毛泽东出巡大江南北之际,组织了一批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揪出刘少奇”。一时间,中南海的大墙外人声鼎沸,帐篷高挑,被围得水泄不通。

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首先发难。原因是刘少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建工学院蹲过点。此时,建工学院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怂恿下,组织了“八一战斗团”,并在中南海西门外设立“揪刘前线指挥部”。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还对“八一战斗团”说:“刘少奇到建院对‘八一团’是假支持,他企图在十一届全会上蒙混过关。”“八一战斗团”还勒令刘少奇写一个检查。

7月4日晚,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建工学院群众组织写一个检查。刘少奇此时已身心交瘁,难以执笔,只得由王光美代写。刘少奇审阅时,又加上一句“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这份检查于7月9日上交。

“检查”详细说明了刘少奇过问北京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的前后经过,以及“五十多天”里“犯错误”的经过。较之1966年10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这份检查更多地说明了一些事实情况。

然而,刘少奇所作的检查被极“左”思潮所支配的红卫兵们斥之为“反攻倒算、妄图翻案”,“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疯狂的反扑”。他们还说刘少奇“在‘检查’中公然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和毛主席的参谋部——中央文革小组”,检查是“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是“一支射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射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射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毒箭”。

北京红卫兵小报紧随其后,用大量篇幅论证刘少奇“是一个罪恶罄竹难书的老反革命”,“在忍受中求得重生”(这是毛泽东批判胡风的话——编者注),“我们必须加倍提高警惕,决不可中了他们假投降的诡计”。

“八一战斗团”进而扬言要把刘少奇从中南海里“揪出来”。他们向刘少奇发出了第二封勒令信。北京一些群众组织也纷纷赶到中南海,为“八一战斗团”助威。1967年7月17日,“八一战斗团”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7月22日零时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滚出中南海”,如果不听命令就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戚本禹特地于当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将第二天揪斗刘少奇的有关事宜作了具体布置。

第二天零时,“八一战斗团”部分成员聚集在中南海西门,宣布如果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他们就进行绝食斗争。他们还写了《绝食誓词》,说,“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猖狂的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不吃,觉可不睡,

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批臭，我们誓不罢休”。

群众性的极“左”思潮的狂热被煽动起来后，江青等人“趁热打铁”，进一步大作文章。7月初，江青、康生、陈伯达三人密谋策划：“要把刘少奇批得比托洛茨基还要臭。”7月14日，戚本禹煽动中南海机关一些人，强迫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趁机对刘少奇进行围斗。

同一天，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写信给汪东兴并转呈周恩来，提出要召开大会“批斗刘少奇”。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的戚本禹却把信送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并且请他们作决定。

7月17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擅自决定对邓小平、刘少奇、陶铸夫妇进行批斗。次日凌晨1点多钟，戚本禹召集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召开会议，进行动员和具体部署，准备再次批斗刘少奇，而且还要加大批斗力度。

在此期间，戚本禹还煽动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但规模小，火力不强”，“要紧急动员起来”，对“刘、邓、陶开展全面的面对面的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任务”。戚本禹又说，批斗时“要有杀劲”，“要杀气腾腾的，可以低头弯腰”，“要使他们威风扫地”。戚本禹并指使其爪牙马上成立“批斗刘、邓、陶战斗指挥部”。戚本禹还亲自指定了批斗方式、规模、日期。

当晚，中南海“造反派”300多人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中南海内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在整个批斗会上，刘少奇

遭到低头弯腰的人格污辱，而且被罚站两个多小时。批斗的同时，戚本禹还派人前往中南海抄了刘少奇的家，抄走刘少奇笔记本 61 本，王光美笔记本 127 本。

批斗结束后，刘少奇和他的家人就被隔离开了。刘少奇被押在前院，王光美被押在后院。子女们在中院，也都失去行动自由，不准到前院，更不准随便离家。造反派头子迟群仍以“中央”的口吻向警卫人员宣布，他们的任务不是保卫刘少奇，而是看管刘少奇。从这一天起，刘少奇的文件被停发。他整天只能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基本上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与此同时，邓小平、陶铸夫妇也遭批斗，家也被抄了。

毛泽东这时正在南方视察。他从上海得知中南海批斗刘少奇和“揪刘火线”的事情，当即要杨成武马上返京，要求“造反派”停止对刘少奇的批斗。就这样，“中央文革小组”被迫向“揪刘火线”的群众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动员群众撤回。8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了解除围困的决定。

8月5日，虽然“揪刘火线”撤回，但“中央文革小组”又搞“收兵之战”，在天安门广场组织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百万人大会。同时，中南海内组织批斗“刘、邓、陶”大会，批斗情况作实况广播。戚本禹在安排批斗时，对中南海内的造反派说：“不要文质彬彬，一定要有气氛，要是开不好，拍成电影，群众看了是不答应的”。

当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组织了一些群众，分成了 3 处地方，在各家院内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邓小平、卓琳、陶铸、曾志等。

这一天，天气异常酷热。几个彪形大汉架着刘少奇和王

光美走进会场，粗暴地扭手按头，强迫他们“卑躬屈膝”，坐“喷气式”，又脚踢拳打，揪刘少奇稀疏的头发，强迫他抬头照相。刘少奇的几个孩子也被军人押着陪斗。年仅6岁的潇潇从未见过如此残暴的场面，吓得号啕大哭。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斗争会上，刘少奇不断遭到辱骂和殴打。他的答辩不是被阵阵呐喊声所打断，就是被造反派用语录本劈头盖脸打来，无法继续下去。

造反派还把刘少奇、王光美押到会场一角，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脚下只剩袜子，双腿还一跛一跛的。

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后，按铃唤来机要秘书。他拿出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辞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①

秘书连夜就此写了汇报，给中共中央反映了刘少奇的抗议，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8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并就这篇文

^①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缅怀刘少奇》，第4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版。

章发表了社论。文章和社论说：“刘少奇与北京的畅观楼事件有关。”

刘少奇看到这篇文章及社论后，感到十分气愤。刘少奇为了自己的清白，立即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说明自己从未参与过这些事件。

刘少奇在信中还表示，欢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进行大批判。虽然这一报道有些事实有出入，这也是难免的。但他看到的却是“反党”、“篡党”、“反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等，对此他表示是肯定不能接受的。

刘少奇在信中严肃地表明，他所作的都是公开的。他没有在党内搞任何形式的组织派别，搞非组织活动，希望中共中央、毛泽东严加审查。刘少奇还表示，任何方面要他写出材料，他随时都可以写出。信中，刘少奇还申明，自己已失去自由，再次请求解除职务。但是，这封信也犹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8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红旗》第十三期为此发表了《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的社论，把刘少奇攻击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司令”，与彭德怀联合“共同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在全国各地胡乱游说，鼓动群众，以致“揪刘战场”越来越大，“批刘声调”越喊越高，“揪刘旗帜”越挂越高，大有把刘少奇“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阵式。

9月7日晚8时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轰出了一发

“重型炮弹”，全文广播了姚文元写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第二天，《人民日报》用3个版面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文章一刊登出来，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举行座谈会、声讨会、游行示威。“打倒刘、邓、陶”的声势越造越大。

自从斗争会后，刘少奇行走困难，腰没法直起来，右腿被打伤，行走时一瘸一拐地拖着。

为了不使孩子们看见他的惨状，刘少奇强忍着痛，直起腰，放开双手，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直往下淌。

王光美仍被关在后院，跟刘少奇一样，被折磨得惨不忍睹。王光美头被打破，还要干体力活。

9月13日上午，刘少奇的孩子们被通知立即收拾行李，离开中南海，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和批判。他们曾要求在假日回家看望父母，却被拒绝，原因是他们给刘少奇、王光美通风报信。不仅如此，甚至连他们想最后看一下父母的愿望也未得到满足。他们的这些最起码的人道都被拒绝了。

当天晚上，王光美正式被捕入狱。

这一切，刘少奇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依然佝偻着身子，手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受伤的腿，一步一步地蹭着，想看看自己的孩子们；又蹭到后院墙根，想听听王光美的动静。

然而，这些都是徒劳的，回答他的是死一般的寂静。刘少奇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他感到一丝不安。就在一夜之间，刘少奇的家里被突然筑起了一堵高墙。刘少奇再也不能到后院墙根去看他的亲人了。这等于把他心中的一丝希望也给堵死了。

接着，几个战士奉命搜查刘少奇的房间，要把他的皮带解

下来。刘少奇大声抗议,但无济于事,他被按倒在地,皮带被强行抽走。刘少奇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半句话来,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就这样,刘少奇成了连囚犯都不如的“囚犯”,连起码的人道主义保障都没有了。

不久之后,迟群代表“中央”给刘少奇的警卫战士训话:“你们×中队负责警卫的人里黑帮出得最多,刘少奇就在这里。你们中毒最深,要肃清流毒。你们的任务已经根本变了,不是警卫,而是看管刘少奇”,“要好好地看管,不能留情。不然,你们也是一样的下场”。

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被骂为“地道的保皇派”。他们的枪被下了,证件被没收了。看守刘少奇的战士加了双哨,层层监视,仿佛遍体鳞伤的刘少奇有着惊人的本领,或有天外来客的帮助,能越监逃走。两个警卫人员中谁若对刘少奇有一点“留情”,就立即被批斗、关押或遣送回老家。

当刘少奇知道王光美和他的孩子们已被赶出中南海,只剩下他一人后,他的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

更为严重的是,刘少奇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整夜睡不着觉,加上没有足够的安眠药。这种非人的折磨使刘少奇有些神志不清,常常因回首往事忘掉一切。

刘少奇的手臂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造反派扭打他的手臂后,旧伤复发,以致他的手臂移动艰难,穿衣服要一两个小时。

饭厅离宿舍虽然只有短短的30米距离,可这30米,对于受伤的刘少奇来说,需要50分钟,有时甚至长达两个小时。

他几乎是一直爬到那儿。看守的战士谁也不敢去扶刘少奇一下。后来,刘少奇终于走不动了,工作人员才把饭打来。

曾经有工作人员给刘少奇打饭被骂成是“保皇兵”,因此谁都不愿每餐去打饭,常常是打一次饭,就让刘少奇吃几顿,有时饭里还被人吐进唾沫。这些剩菜馊饭,对患有胃病的刘少奇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刘少奇的牙齿掉得只剩下7颗,嚼不动窝头,加上常吃变质的饭菜,致使时常腹泻。

刘少奇的身体被这种摧残人性的手段折磨得更加虚弱了。他经常生病,重病也得不到护士大夫的很好治疗。每次看病前,刘少奇照例都被批斗一次。大夫看病时还得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

有的大夫甚至用注射器狠狠乱捅,有的则用听诊器使劲敲打。刘少奇实在无法忍受了。有一次,刘少奇抗议说:“你们给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这伙人把刘少奇长期服用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D60停用了。

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使得刘少奇长时间神思恍惚,可那些负责监视看守的人不但对此视而不见,反而说:“此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要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196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刘少奇发高烧,大夫胡乱看了一下,稍加布置就走了。第二天,刘少奇的高烧转成肺炎,同时引起各种并发症。刘少奇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上面知道后,立即派医护人员前来抢救。

想置刘少奇于死地,但又抢救他,这就是林彪、江青等人

的歹毒之处。此时负责中央办公厅的头目对医护、工作人员说,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林彪、江青等人想把刘少奇慢慢折磨而死。

为了摧残刘少奇,江青一伙不但拒绝了医生提出的要求让刘少奇离开监护环境住院治疗的意见,甚至拒绝了摘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及口号,以免给病人以强烈刺激的意见。

此后,刘少奇整天躺在病床上,根本不能起床活动。没有人给他换衣,没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更没有人听他诉说内心的痛苦。不能下床活动,刘少奇的双下肢肌肉萎缩,身上长满了褥疮。处于这种任人摆布的状态,刘少奇仍受到严密监视。

看守人员说:“为了防止他行凶或自杀,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监护工作”,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绑在床上,不许有丝毫松动。

此时的刘少奇已经是家破人亡。他的长子刘允斌惨死一年多了;长女刘爱琴在牛棚里遭到毒打;次子刘允若在监狱里患了脊椎结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9岁的平平被捕入狱;17岁的源源刚从狱中获释又被遣送至雁北,那里环境相当恶劣,整天黄沙漫天;年岁小的亭亭和潇潇处处遭人白眼,受到歧视。而王光美则被关押在昏暗的牢房里,毛发脱落,咳血,并被林彪一伙判了死刑。

面对着林彪、江青等人上演的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疯狂迫害干部群众的丑剧,刘少奇忧心如焚。想到国家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想到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想到家庭的不幸,想到自己的遭遇,刘少奇感慨万千。一股悲愤的情感像长久压抑

在地壳中的岩浆,猛然喷发出来,他号啕大哭了两次。

长期的迫害使得刘少奇植物神经紊乱和脑供血不足,脑软化的症状恶性发展。不久,刘少奇就失去了自己吞咽的功能,只能靠鼻饲来维持如同游丝一般细弱的生命。

病痛的折磨使得他常常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或者痛苦地在空中划动双手不止,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医护人员看到这般情景,顺手给了刘少奇两个硬塑料瓶子握,让他稍微缓和一些。等到刘少奇死的时候,这两个塑料瓶子被捏成两个小“葫芦”。

林彪、江青等人在煽动群众掀起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刘少奇”的浪潮的同时,也加紧了给刘少奇罗织“罪名”的活动。

196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刘少奇实行审查以后,王光美专案组的人数就增加了,由原来的3个人增加到40多人。5月18日,王光美专案组从中央组织部调走了刘少奇的全部档案。

5月20日,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写了一封信,决定于当天在江青处开会,以研究刘少奇的专案问题。专案组并于当天正式确定了审查刘少奇的文件发放范围。这一范围只限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萧华、汪东兴、杨成武、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叶群,还有专案组的有关人员。

6月3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在林彪、江青等人“周

密”部署下正式成立。专案组的工作由谢富治、汪东兴主持，康生、陈伯达是顾问。在组内，江青虽然没有什么职务，但大小事情她都要过问。专案组实际上处于江青的直接控制之下。

6月5日，康生写信提出，刘少奇一案涉及有关的关押人员，有很大一部分审讯工作由于审讯人员的力量太弱因而难以开展。康生要求公安部尽快增调一些审讯人员。康生又于8月6日要求调30名日文翻译，查600余件日伪档案。

为了所谓的“审讯”工作，专案组还逮捕、关押、审讯了与刘少奇、王光美专案“有联系”的所谓“知情人”。这些“知情人”共有64人。在1967年5月至10月，由江青擅自决定逮捕关押的就有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原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干事——编者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的老师——编者注）、天津市居民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编者注）和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11人。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搜集陷害刘少奇的材料，以便给刘少奇罗织一系列“罪名”。江青一伙对专案组人员进行种种的威胁利诱，迫使专案组人员按着他们的意图编造材料。

林彪、江青等人首先对专案组成员灌输“专案对象就是敌人、对敌人要狠”的思想。

1967年8月4日，康生对专案人员说，要整倒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干部里有“叛徒”，有“三反分子”，有“特务”。长期以来，这些坏人没有被发现，他们是老干部中的“败类”，这次运动就是把这一小撮“揪出来，

挖出来”，这是很大的收获。

康生还对专案人员说，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些人“不是老革命”。他们是“一贯反对毛泽东和反对共产党的大叛徒、老反革命”。

同年10月，谢富治在对专案人员讲话时也说，凡列入专案进行审查的，都是“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分子”。专案组和这些“敌人”要进行“坚定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这样，专案组人员的思想就被框得死死的，从而使得他们不敢实事求是地弄清问题。

事实上，在康生、谢富治看来，“打倒刘少奇”是一件具有“伟大的意义”的事情。所以，康生、谢富治等人还命令专案组成员要按照江青的意图搞专案。康生在一次讲话中说，揪出刘少奇这个“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叛徒、特务集团”，就是清除了“党内最大的隐患”，这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召开九大都具有“伟大的意义”。

除此之外，谢富治还对专案人员说，刘少奇一案，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专案组一定要认真搞。这实际上已先给刘少奇定了性。

谢富治所说的“认真搞”，只不过是“认真”按江青的意图编造材料，罗织罪名。正如谢富治对专案组的一次指示中所说，专案人员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重大的情况要请示江青，工作要想到有利于“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后来，谢富治则直接在对“王光美专案组”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江青亲自抓的。

以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先报江青”。

林彪、江青等人对专案人员又吹捧又恐吓的办法，从思想上不断地给专案人员施加了压力。一方面，他们大吹特吹专案人员工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林彪、江青等人又对专案人员进行恐吓，动辄指责他们“右倾”。

1967年8月，江青在对8个专案组讲话时说，她觉得专案组主要是“思想不解放，右倾保守”。所以她要求专案组要“解放一下思想”。江青还特别强调说，刘少奇是一个“大内奸、大叛徒”，“红卫兵小将们整的材料比专案组整的还好”。江青还当场指着一个办公室的负责人说：“他就是保守”。

林彪、江青等人还向专案人员宣扬，“专案对象都是专政对象”，要“搞倒搞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些人要翻过来首先要搞专案组的人员，因为专案人员是在斗争前线。江青一伙就是以此煽动专案人员对专案对象的敌对情绪，使其更猖狂去“打倒刘少奇”等人。

林彪、江青等人还直接威吓专案人员。有一次，江青毫无根据地指责专案人员说：“有的专案很不力，是否还保护这些人，使这个问题搞不清楚？”

林彪、江青等人还经常对专案人员讲，办案的人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了“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搞“折衷主义、客观主义”。在搞专案工作中，专案人员如果稍有不慎，或是尊重事实或出现与江青意图相左的意见和言论，则马上受到打击。轻则训斥为“右倾”，重则送回原单位，给予处分，甚至立即被逮捕关押起来。在这种强大的高压下，专案人员精神非常紧张，生怕自己“右”了。

林彪、江青等人还教唆、怂恿专案人员搞逼供信。1967年2月,康生对专案人员说,搞大会批判,主要是“政治上打一下威风”,但是,真正解决问题的还要靠小范围的审讯。审讯方法应该“软硬兼施”。康生还说,审讯过程中有时搞点逼供信是难免的。

与此同时,江青也曾对专案人员说,她认为在审讯工作中难免不打人。气极了打两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江青还说,如果打人之后出什么问题,她一人担着。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对“王光美专案”组人员说,审讯要有狠心,下得了手,要集体审讯,一审几个钟头,非攻破不可。总之,为了制造诬害刘少奇的伪证,他们采取了各种卑劣手段。

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首先在政治上给专案对象定性上纲,使专案人员不敢越雷池一步;继而又在思想上威逼利诱,使专案人员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在审讯方式上教唆、怂恿专案人员不择手段;采用非人道的审讯方式,使所谓“专案工作”完全是为他们制造假证、伪证服务。

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指挥和一手策划下,专案组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刑讯逼供等令人气愤的卑鄙手段,拼凑虚构、牵强附会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一大批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后来多次的更正材料。

1968年9月,刘少奇专案组提出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给刘少奇罗列出一系列莫须有的“罪状”。

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罗织“罪名”是多方面的。其中,

有一个是专案组编造刘少奇曾经在长沙“被捕叛变”的材料。

刘少奇在历史上曾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其间，刘少奇曾两次被敌人逮捕过。这段历史，刘少奇从来没有向中共中央隐瞒过。每次填干部履历表，刘少奇都把这段经历清楚地写出来。

但江青、康生在《审查报告》中捏造说，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期间借口养病，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之后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当时的湖南军阀赵恒惕亲批“斩决”。刘少奇为了活命，接受了赵恒惕的“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随后，刘少奇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赐的《四书》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

这完全是江青、康生等人无视历史事实，主观捏造出来的“罪名”。“罪名”中所谓的根据是1952年被镇压的恶霸罪犯杨剑雄的一段笔供。

早在1967年初，刘少奇专案组的一个小组被派到长沙，目的是审查刘少奇1925年长沙被捕之事。这一小组动员了当地的力量，查找证明刘少奇被捕的材料。他们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翻阅了湖南省档案馆、省公安厅、中山图书馆等处所藏的党史资料、敌伪档案、旧报纸杂志，共1.9万多件。结果，专案组人员没有找到任何能证明刘少奇叛党的证据。

此外，他们还找了800多人调查，重点找了47人。然而，结果仍令他们大失所望，他们最终没有找到一件足以证明刘少奇叛变的材料。于是，他们就采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办法去拼凑编造材料。

关于“借口养病”、“私自潜逃”，是专案组把当时上海《申

报》登载的一条当局要传讯中华全国总工会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的消息与刘少奇回长沙的事联系起来，完全是凭想像得出来的。而同是当时的报纸，《上海总工会三月刊》、广东《工人之路》、长沙《大公报》、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均报道了刘少奇因病重回长沙养病的消息。然而，1968年9月17日，康生给江青的信中，竟称这个虚构之事他完全可以证明。

至于“被捕叛变”，同样是专案组依照想像推断出来的。专案组认定的根据有两条。这两条根据就是，军阀赵恒惕曾经发布过“四斩”布告，随后又杀了当时的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而刘少奇被赵恒惕逮捕后没被杀反被释，惟一合理的解释是刘少奇“投降叛变”了；而且，恶霸罪犯杨剑雄的笔供中提到赵恒惕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释放刘少奇之事。

其实，当时的具体情况是，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的“四斩”布告，是针对长沙传说外国人杀了中国人，引起群情激愤，赵恒惕怕造成更大的动乱而发布的。而黄静源则是被江西军阀所害。这些事和后来刘少奇的被捕与释放是完全不相干的。

所谓赵恒惕曾亲批将刘少奇“斩决”，仅来自当时任湖南省署文牒（即秘书——编者注）的黎泽泰的材料。这份1967年8月23日在逼供之下写的材料，也只是提到听杨剑雄所说。而杨剑雄的笔供中，都不曾提过这件事。这完全是死无对证的事情。

杨剑雄是刘少奇的小学同学，是当地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1952年逮捕归案。宁乡县人民政府于1953年1月将杨剑雄判处死刑，并报湖南省人民政府核准。杨剑雄自知难逃

法网,又知道政府有关方面的宽容政策,便称自己参加过1925年营救刘少奇出狱的活动。杨剑雄的供词中也证明了,刘少奇被释是刘少奇的亲友运动湖南上层人物所致。

对这一铁证,专案组却荒唐地把供词中赵恒惕送刘少奇“四书五经”,交保开释事情引申为“接受活命条件”、“投降”、“背叛”。而20世纪50年代初,宁乡县人民政府为慎重起见,曾在执行对杨剑雄的死刑前致函刘少奇核对此事。刘少奇复电说明,他的出狱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

然而,刘少奇的这个正常答复意见,在后来竟被专案组说成是“杀人灭口”,并将其写入《审查报告》。为了给刘少奇扣上这一“罪名”,专案组多次找原杨剑雄一案的审讯人员,“指点”他们写上了“隐瞒叛徒嘴脸”和“杀人灭口”的证词。

其实,就是在罗织“罪名”的过程中,专案人员也感到证据相当地苍白无力。所以,1967年,专案人员的报告中只是认为刘少奇“有叛变自首嫌疑”。经后来的某些人修改,到1968年10月的结论报告中,“有叛变自首嫌疑”则被改成百口莫辩的“叛变”字样。

关于编造1927年大革命进行的紧要关头,充当“内奸”,“破坏”工人运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支持专案组罗列了刘少奇的4条“罪名”,即“四·三”惨案发生后,为日寇保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并“为敌人出谋划策,调走武汉工会骨干,解散工人纠察队”;为掩盖“内奸面貌”,演出假被捕的苦肉计;武汉“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

以上这些所谓的“罪名”没有一件有说服力的物证,只有4个人证。4个人证中又只有一个是主要的,即当年曾和刘少奇一起搞过工人运动的丁觉群。整个材料的提出有的是诬陷,还有的是虚构。

所谓“为日寇保镖”,完全是专案组蓄意歪曲历史所为。其根据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武汉“四·三”惨案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工会联席会议和全省总工会曾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布告群众“遵守革命纪律,万勿骚动”,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不要打日本人。而专案组对同一时期的报纸上报道刘少奇等人领导武汉人民的英勇斗争的情况丝毫不予理睬。专案组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纪律性与骚乱滋事的无组织状态混淆在一起,黑白不分,严重颠倒是非,混淆了人民的视听。

至于刘少奇充当“内奸”之说,主要根据就是丁觉群1967年10月6日的一份“书面交待”,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证据。丁觉群在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党员,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1928年被捕后自行脱党。

1967年3月,了解到与刘少奇有联系的人后,专案组派人到武汉找到了曾与刘少奇共过事的丁觉群,收集刘少奇的有关“罪证”材料。专案组找到丁觉群后如获至宝,马上下令让他写揭发材料。3月至8月,丁觉群写了5份材料,另外还有3次谈话记录,共涉及5个问题,除了说刘少奇“不敢斗争”,“右倾投降主义”,没有别的情况。

8月以后,丁觉群被监护。此后,丁觉群每写一次报告就受一次逼问。后来,专案组又逼问丁觉群与刘少奇的关系,不

断给他施加压力。究竟是围绕着实事求是,还是按专案组意图违心编造,丁觉群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9月25日,丁觉群交出一份笔供,并附了一封给专案人员的信:“老杨: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交代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9月30日,丁觉群向专案组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说刘少奇和他究竟有何关系?有任何关系也应坦白,才能立功,岂能坐失时机。当时,丁觉群怎么也找不出这种关系,因为当时刘少奇根本没有组织什么“黑组织”。所以,丁觉群也不可能有刘少奇组织的“黑组织”材料。

随后,丁觉群在专案组胁迫下,编造了只有一名组长(刘少奇)一名组员(丁觉群自己)的“工人运动小组”以及假材料。但丁觉群马上就翻供了。

1967年10月18日至12月27日,丁觉群有4次翻案的申述,要求把他写的材料退给他。对此,专案组却置之不理。丁觉群在申述中特别提到过,“首长”已经向他“揭开盖子”了,明确地说有许多人揭发他“勾结”刘少奇,于1926年至1927年期间,曾接受“资产阶级贿赂”,充当“资本家走狗”、为“资本主义”服务。

同时,他们还鼓动丁觉群大胆揭发和“忠实坦白”当时的具体情况,“反戈一击”有功,且可“既往不咎,免除罪过”;否则交群众斗争,并交公安机关治罪,停止退休金以致缩短自己的有限生命而落个“遗臭万年”。

在专案组一伙人的轮番诱惑威胁下,丁觉群的思想斗争异常剧烈,思想起伏,彻夜无眠。但是,在翻供遭到专案组的

训斥以后,丁觉群屈从压力,于是便违心地按照专案组的“提示”来写材料。最后,丁觉群的供词几经修改,形成了一个“书面材料”,即“罪证”上的《刘少奇在汉口、庐山所犯罪行的交代》。

《审查报告》还提出,刘少奇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搞了一个“假逮捕”的“苦肉计”。事实完全可以证明,这也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大量证据证明,刘少奇在1927年没有被捕过。专案组认定刘少奇曾被捕过的所谓根据,是当年6月29日汉口法租界巡捕房给驻汉口总领事的报告信。这封报告信提到,头天晚上军队在总工会办事处逮捕了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项英等领导人。陈仲波、曾昭美、吴良福等都证明,当晚确实有军队到全国总工会和省总工会闹事,但是没有发生捕人的事。吴良福还证实,他第二天还见过刘少奇。

本来,动荡时期人心纷乱,各种消息真假不明,出现误传,本不足怪。专案组却抓住一个报道,认定刘少奇曾被逮捕,不理会上述当事人的确凿证明,反而另去寻找证实被捕的旁证。这本来就严重违背了专案工作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为了找到证明刘少奇被捕的旁证,专案组找到当时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首脑唐生智。唐生智先说想不起来有这件事。专案组就把法租界的那封信给唐生智看,唐生智根据这一提示写了证明材料。但唐生智的材料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也就没有列入“罪证”材料。假逮捕的“苦肉计”之说,惟一来源就是上述丁觉群那份《交代》。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根据。事实证明,刘少奇既然没有被捕过,那么,“苦肉计”的说

法当然就不攻自破了。

《审查报告》提出的所谓刘少奇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变勾当”的问题，仍然是以丁觉群在逼供下编造的那份“书面材料”为根据。而且，对罗章龙、聂荣臻写材料证明，中央知道刘少奇在庐山养病的事情这些真实的证据，专案组都被扣压下去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刘少奇的“勾结汪精卫进行叛变勾当”的罪名成立了。

至于《审查报告》提到的1927年的其他罪名，也是专案组歪曲历史事实编造的。如调动武汉工会干部一事，这是中共中央鉴于汪精卫反共面目日益明显，决定疏散在武汉干部的应变措施。李维汉、郭述申等人均可证明。湖北总工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调整了干部队伍。根据当时斗争的形势，这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审查报告》却将上述事件歪曲为刘少奇“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至于工人纠察队缴枪问题，这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屈从于武汉国民党的压力，作了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决定。刘少奇只不过是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专案组无视历史，把它演绎成为刘少奇的“特务、内奸活动”。

关于捏造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被捕叛变”的罪状，包括3方面的内容：刘少奇1929年8月22日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叛变”的问题；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问题；按“敌人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的问题。确凿的事实证据表明，这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无中生有，血口喷人。

以上所述的3个问题中，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奉天纱厂

被捕一事,是专案组确定突破的重点。他们在沈阳地区组织了四百多人的专案班子,动员了大量的人力查找资料。然而,在查过十五六个档案馆,查找了历史档案 245 万卷之后,他们没有找到一件足以证明刘少奇叛变的事实证据。

专案组为了达到陷害刘少奇的目的,找不到物证就四处地找人证。他们找了当时有关的敌伪人员、原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原奉天纱厂供职的人员等 100 多人,最后选定了 8 个人在逼供下写出供词。供词主要是孟用潜(时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与刘少奇同时被捕——编者注)和许多荃(时任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编者注)两人的交代。另外,还有 6 个“知情人”的材料。

1929 年 8 月 22 日,刘少奇与孟用潜去奉天纱厂找工人谈话,因厂内有叛徒密告刘少奇等在厂内酝酿罢工的情况,致使该厂地下党支部书记被拘留。刘少奇、孟用潜二人也在纱厂门口被厂卫队逮捕,送警察局关押。

刘少奇、孟用潜被捕后,没有暴露其真实政治身份。被关押半月后,刘少奇等人因案情不重,证据也不充分,即取保释放。这件事情,当时的满洲省委已经向中共中央报告过。所以说,这件事是有案可查的。

当时,满洲省委秘书长廖如愿、满洲团省委书记饶漱石和当时在满洲党、团省委工作的王鹤寿、杨一辰、何松亭等都给专案组写了证明材料,证明警察局对刘少奇、孟用潜是作为一般案件处理的,“外面送东西很方便,前往接见也不困难”,“所以当时省委态度镇静”。刘少奇、孟用潜两人所知道的党内组织都没受到破坏,并没有一个人受牵连被捕。

当时的警察局对刘少奇、孟用潜的判决是“不起诉处分，取保释放”。但是专案组一方面对这些确凿的证明材料不加理会，另一方面继续采取逼供手段逼取假证。

关于这件事中，孟用潜和刘少奇是同时被捕、同时释放的。因而，孟用潜是专案组逼取伪证的重点对象。专案组根据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人的授意，于1967年5月22日将孟用潜隔离审查，并要求他必须承认自己是“叛徒”。这是孟用潜难以接受的。所以，在最初的审讯中，孟用潜按照事实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孟用潜在1967年6月5日的“补充材料”中说，敌人对他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充分，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对刘少奇也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这使专案组恼怒万分。

6月22日，专案组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康生作出“批示”说“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

与此同时，为达到目的，江青在另一个呈阅件上“批示”说，当心孟用潜“蒙骗”审讯人员，他是在“演戏”。康生还“指示”说，专案组“斗不过”“审查对象”，要用小型批斗会的办法来制服他们。

于是，专案组对孟用潜进行小型批斗会式的审讯。孟用潜一到现场，十几个人摆开阵势，故意造成紧张气氛，专案人员按事先列好的提纲逐一提问。七嘴八舌，或是威胁恐吓，或是拍桌漫骂，多人施加压力，逼孟用潜交代。然而，这些对孟用潜来说都无济于事。

从7月5日至13日，专案组对孟用潜连续审问。白天

审,中午不休息,有时晚上也审。每次审问的情况,康生、谢富治都要过问。在百般威逼的情况下,孟用潜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马上就翻案了。

专案组向康生、谢富治汇报孟用潜的口供有反复时,康生、谢富治说:“要打消他的幻想,告诉他刘少奇彻底完了,他要是再不老实交待。要是再出尔反尔,没有好下场。”

孟用潜早在刘少奇问题定性前就开始写推翻自己的那个供词的申述材料,试图纠正原来在逼供情况下编造的“假交待”。但是,孟用潜前后共写了20份,均被专案组扣下,不予上报。此外,专案组还逼迫孟用潜当场毁掉4份。

对于专案组人员来讲,使刘少奇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叛变”的罪名成立的另一证人是曾任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的刘多荃。而刘多荃当时仅仅听说过沈阳发生了破获“共产党案”,而且只是作为新闻传听而已,确切事实并不清楚,就连何年发生的也记不清了。

专案组对他进行“路线教育”,威吓他“不要执迷不悟,如不老老实实写材料绝没好下场,这对你自己及家庭子女都有很大关系”。在专案组的威胁下,年老体弱的刘多荃只得按专案组的要求和启发写东西,反复地、没完没了地写、看,使其脑子搞得很混乱。

对此,刘多荃在1979年翻供时说,当时已70多岁,精神和身体已被搞得支持不了。虽然没有用刑,但精神上的折磨是难以忍受的。以致后来脑子里也分不清哪些是记忆中的东西,哪些是报纸上抄的,哪些是专案组“启发”、“诱导”的。

刘多荃还说,专案组人员逼急了,索性就按他们的意思

写,写一回不行就再写,直到最后他们同意。有些事是按他们的愿望写的,有些是推测,有些纯粹是联想。

比如,“罪状材料”中所谓听说张学良同被捕的人“达成政治交易”的事,纯属刘多荃在专案组野蛮逼供下的编造。就专案组的案卷记录来看,刘多荃所说的“破获共产党案子”,从被捕人数、被捕地点、关押时间到释放方式和过程等具体情节,同刘少奇被捕的情节无一相似之处。

即便如此,专案组还是从刘多荃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的材料中,摘录下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让刘多荃抄录写成几份“材料”,凑成刘少奇的“罪证”。据后来的调查,抄录的材料都是刘多荃根据专案组“提示”而编造的部分。

除了对刘多荃逼供以外,专案组还以当时在奉天纱厂、伪警察局、伪法院供职的人中寻找所谓“知情人”,套取伪供。原奉天纱厂的协理王广恩被专案组拘留,要求交代刘少奇被捕的问题。

从1967年7月25日到8月8日,专案组对王广恩连续审讯12次。王广恩没有编造,因此受到专案组十分恶毒的整治。

在审讯中,王广恩回答说,他们没有汇报那么具体,一些事他真不知道,而且也确实记不起来了。专案组就斥责他“包庇”刘少奇,与“无产阶级专案组”对抗。王广恩回答说,他绝对没有“包庇”刘少奇。王广恩并且问专案组人员是否搞刘少奇的“黑材料”。王广恩因此话挨了一顿整。

当专案组逼问刘少奇“叛变”的事情经过时,王广恩说,这个问题他交代不了,谈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情况,就是

砸死他,他也谈不出刘少奇被捕后有反毛泽东的事情来。于是,王广恩受到残酷的“批判”。9月,王广恩在拘留中病死。对此,专案组说,是王广恩“表现很顽固”,对刘少奇被捕后“叛变情况至死没予交代”。

专案组逼取了6个所谓“知情人”的笔供,作为刘少奇的“罪证”。这些证词都写得模模糊糊,模棱两可,除一份是“听说”的之外,其余5份,只说被捕者是黑脸、白脸、中等个、高个子或胖子、瘦子。其余没有具体的情节。然而,为了逼取这些“知情人”的伪证,专案组用了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卑劣手段,如经常对他们进行连续几天几夜的审讯,时而又以逮捕办法相威胁,时而又骗说,“刘少奇已经倒了,你承认了你就立功了”。

专案组甚至弄虚作假地骗取这些人签字。除已去世的外,这些人事后都写了翻供材料。同时,他们还揭发了专案组对他们逼供、诱供的情况。这完全可以证明当初给刘少奇扣上的大帽子纯粹是诬陷。

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还直接编造诬害材料。《审查报告》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从而导致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其目的是指明刘少奇1929年7月的“被捕叛变”导致了1930年4月的满洲省委大破坏。

据专案组掌握的材料,已足以证明当年的满洲省委大破坏完全是团省委的工作人员杜兰亭被捕叛变所为,与已经离开满洲去上海工作的刘少奇毫不相干。而且,满洲省委的同

志被捕后也没有任何人被杀。

专案组把材料上报,并没有后来在报告中出现的这段话。这实际上是江青等人修改时增加的。专案人员曾提出,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材料,而且这也不是事实。但最后,在江青等人的授意下,还是这样定稿。

以上仅仅是江青等人对刘少奇栽赃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对刘少奇栽赃陷害的其他情况还大有所在。

除《审查报告》定的“罪名”外,江青、康生等人还蓄谋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头子”、“特务”、“美国远东情报代表”。在这一有预谋的罪恶活动中,也涉及其他专案。许多干部、群众被迫害。

当时,日本开始侵略华北,北平危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出现高潮,中国共产党急需有工作经验的干部。而北方局的许多党员干部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里。为营救这批干部,由刘少奇任书记的北方局提出,采取灵活策略,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迅速出狱。中共中央讨论并批准了这一建议。

薄一波等61人服从组织决定,履行敌人的规定程序后出狱。中共中央马上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他们中许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斗争的骨干。“文化大革命”前,中共中央对61人出狱问题多次审查过,一直认为不存在什么问题。

然而,1966年8月,康生把这件历史上早有定论的事重新提出来,进行“调查”。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称这“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并鼓动红卫兵调查这件事。

1967年3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并

加以“批示”。由此，全国掀起了“抓叛徒”的浪潮。

康生等人是想通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搞出刘少奇不但有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还有一条“组织路线”，有一个“叛徒网”为其“反动政治路线”服务，“头子”就是刘少奇。康生还凭空捏造了刘少奇“指使”安子文等在解放后“秘密销毁”许多敌伪档案的情况。

抗战初期，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六十一叛徒集团案”刚立案审查时，即证明此事是经过中共中央讨论同意的。在写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求证均未得答复的情况下，张闻天毅然承担了中央本身应担负的责任。康生对此大为恼火，因为张闻天如果承担了这个责任，这颗针对刘少奇的“重磅炮弹”就没多大威力了。

于是，康生派人威胁张闻天说：“你张闻天为什么要说是你批准的，你如果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但是，张闻天坚决拒绝说假话，因此遭到残酷的迫害，被囚禁 325 天之久。

除此之外，康生还威胁利诱安子文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康生接连 3 次派人去威逼利诱，均遭安子文严词拒绝。因而，安子文也遭到严刑逼供的残酷迫害，关进监狱达 6 年之久。专案组还不允许薄一波、刘澜涛如实讲毛泽东知道 61 人出狱的事情。

原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英，是 1925 年入党的老同志，曾长期从事白区斗争。江青为了胁迫他证明刘少奇是“叛徒”，亲自策划并批准了对肺癌扩散、半身不遂的王世英

实行“监护”，并指示要“加紧突击审讯”。

面对专案组的逼供、诱供，刚直不阿的王世英愤怒地回答：“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让你们把我拖死算了”。直到最后逝世，王世英也没有按专案组的口径制造假材料。为此，江青大为不满，训斥专案组软弱无能。

一招不行，再来一招。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又寻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于是，江青等人就进行妄图把刘少奇打成“特务”的阴谋活动。

王光美曾经是辅仁大学原子物理研究生，英文很好，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1946年，叶剑英要北平地下党给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选调政治可靠、业务水平高的英文翻译。北平市委学生工作委员会经慎重挑选和认真审查，推荐了一批人。王光美便是其中之一。1947年2月，王光美随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撤回解放区。

为了把刘少奇打成“特务”，江青、康生无中生有地在这段历史上大作文章，毫无根据地诬称王光美是“受美国远东情报局派遣的特务”，并诬陷王光美为“美国特务”。江青、康生、谢富治不止一次地交代专案组，刘少奇、王光美是一案，“不可分割”。

此外，江青、康生等人还把这一专案与刘仁专案联系在一起，说刘仁和当时的北平市委城工部“包庇坏人，引进特务”，威胁说要把刘仁等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同志都打成“特务”。

1968年3月2日，康生在刘仁专案组的一份诬陷材料上“批示”：“刘仁专案的重点是彻底弄清有关王光美特务问

题”。康生一伙凭空捏造“大特务头子刘仁伙同美国战略情报局把王光美打入我军调部”的“罪名”，并以此为根据，把北平地下市委所属组织全部打成“特务集团”。除此之外，与王光美一起进入军调部工作的有关同志，如地下市委的副书记武光，学委的任彬、崔月犁都被逮捕逼供。令人发指的是，任彬等为此活活被整死。

接着，专案组逮捕了中国人民大学杨承祚教授夫妇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重一。张重一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根本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但与杨承祚夫妇熟悉。被捕前，杨承祚就患有糖尿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还处于病危期间。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江青也“指示”，要突击审讯，把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杨承祚死前搞出来。一定要抓紧，一定要加强。不管采用什么方式，一定把口供弄到手。

在残酷逼供、令人发怵的审问下，杨承祚因折磨过度而惨死。张重一被捕时已是肝癌晚期，随时有死亡危险。江青亲笔批准专案组对张重一进行突击审讯的报告。在被拘留的27天里，张重一受到突击审讯21次。一次接一次的刑讯逼供，使张重一最后惨死在床上。专案组把一个重病老人张重一在昏迷状态被逼问出来的混乱语言，以及另一个重危病人杨承祚被逼出来的“口供”作为证据，断定王光美是“美国特务”。

于是，王光美专案组根据杨承祚等人的“口供”，炮制了《王光美特务问题情况报告》。《报告》说，从调查和审讯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

务”。江青对“基本上断定”几个字表示很不满意，在指示上划了个大“×”，并批示：搞的不好，退王专案组。后来康生亲自修改报告，变成了“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是美特，而且是日特、国特”。

江青等人对王光美的诬陷，目的不仅仅限于批斗王光美，其主要目的是，由此制造出刘少奇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因为没有确凿的根据，这份材料最终没有报送中共中央。但《审查报告》仍把刘少奇同“美特”王光美的案子相结合，作为刘少奇的“罪状”之一。

《审查报告》中列举的刘少奇的7项“反革命罪行”，除上述61人案和王光美“美特”案外，其他5项“罪行”有4项是“勾结”敌人，有一项是“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问题。

“和平民主新阶段”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对国内形势发展的一种估计，并不是刘少奇的个人看法。“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出，表达了中共中央要求和平的良好愿望，对此已有了公允的评价。江青等人不是对历史的无知，而是蓄意的诬陷。

关于“勾结”敌人之说，事实可以证明，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或是曲解历史，颠倒是非，或是捕风捉影，逼供编造。

《报告》中编造刘少奇的“罪行”还有：1936年“勾结”蒋介石、陈立夫等。《报告》说刘少奇同蒋介石等人“密谋策划”，“企图消灭红军”，“颠覆红色政权”。

1936年初，日本侵华势头加剧，国共两党开始秘密接触。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按照中共中央部署，从北方局派人同南京国民党代表谈判联合抗日。对于谈判的过程和结果，

中共中央完全清楚。这次谈判是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声,可以说刘少奇非但无过,而且有功,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阴谋勾结”的说法,纯属诬良为盗。这件案子还牵扯了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林枫。1968年3月,中央党校专案组向康生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声称1936年刘少奇给林枫一张4万元汇票。但林枫说不清楚来源和用途(后查明为党的工作经费——编者注)。康生宣称“这是国民党给刘少奇的特务经费”,要“咬住林枫,突击审讯”。

康生把逼供来的假材料,报中央政治局,并批道:“刘少奇1936年到南京投降蒋介石,并由宋子文给刘少奇5万元活动经费。”林枫因此被投入监狱。

江青、康生等人还诬陷刘少奇“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

1941年,为更好地开展工作,陈毅派新四军军部工作人员冯少白,利用亲戚关系,进入敌占区,对日伪政权的上层分子开展统战工作,分化瓦解敌人。冯少白行前曾请示过刘少奇。1942年以后,冯少白再次去敌区工作时,刘少奇已离开新四军回延安。

《审查报告》把这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进行的工作,说成是“刘少奇派遣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这是蓄意篡改历史,颠倒是非,不但诬蔑刘少奇“勾结”日伪,而且还陷害所谓刘少奇通过孟用潜同司徒雷登“勾结”的问题。

1968年4月,专案组把孟用潜作为“相当大的美国特务”

进行审讯。其间，专案组逼孟用潜交代“刘少奇同美帝国主义勾结”的情况。专案组采用车轮战，一天审讯3次，恫吓孟用潜不老实交代就逮捕法办。屈于专案组的淫威，孟用潜为了能自保，就编造假话说，1946年，刘少奇曾先后两次派他到南京美国大使馆与司徒雷登谈话，要美国出兵100万干涉中国内政。

6月29日，孟用潜写了一份翻供材料，推翻前面的假口供，声明与司徒雷登的两次谈话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孟用潜提出两点足以推翻编造的根据：第一，他并不是“相当大的美国特务”。第二，他根本没有去南京，甚至不知道美国大使馆在哪儿。

但是，专案组还是对那个编造握住不放。他们逮捕了1946年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逼取旁证。刘晓并不了解孟用潜的具体活动。他们就接二连三的搞逼供，搞车轮战，晚上用强光照射，白天让刘晓无法安睡，同时还提供假情况“帮助”回忆。在刘晓血压很高、神智模糊的情况下，专案组逼迫刘晓按他们的要求写假材料。

1953年，香港某特务情报组织提供情报说：“王光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香港所属特务在大陆的重要情报来源”。经公安部立案审查，这一事件已于1956年9月1日查明，原情报是国民党特务一手策划的“反间计”。然而，专案组没有丝毫根据，就否定公安部早已销案的事实，按照原来的假情报给王光琦“定罪”，并进一步诬陷说王光琦是刘少奇派遣的，给刘少奇扣上“派王光琦去香港提供情报”的“罪名”。

《审查报告》还认定，刘少奇在全国解放后犯有“坚持资

本主义道路”等罪行。

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刘少奇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卓越贡献。长期的历史证明，党内根本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1968年2月，关于刘少奇专案的材料大体整理得差不多的时候，中央办公厅政治部要刘少奇就群众组织提出的问题写出自述材料。

2月12日，刘少奇按照中央办公厅的要求写好材料交上。刘少奇在材料中写明了自己在历史上被捕的情况，并一再重申并没有“叛变”过。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写的材料与专案组掌握的大量材料是一致的。2月16日，江青看了这个材料后“批示”说，刘少奇简直是在“胡扯八道，乱说一气”，江青要专案组继续罗织“罪名”。

刘少奇专案的罗织捏造最后完成后，专案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刘少奇的3本所谓“罪证”材料，并以江青等4人的名义将这些材料上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阅过了，没有按历史顺序排列。”

9月16日，江青在专案组上交的刘少奇“罪证”材料上“批示”：“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第二天，康生在给江青写的信中，称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康生并煞有介

事地断定,他觉得刘少奇这样早、这样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

9月29日,林彪看了江青的“批语”,马上批写“完全同意”。同时,林彪还写上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字样。后来,张春桥在11月上旬的一次讲话中说,这本《审查报告》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编者注)在北京召开。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

首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中央委员除去世、被打倒、受审查者外,到这次全会时已不足半数。中共中央只得递补10名候补中央委员补足半数。其次,党内一批卓有声望的老同志,被作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一贯右倾”的“老右”遭到围攻、批判并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再者,刘少奇专案组把歪曲、编造的材料提交全会,凡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全都隐匿不报。对此,没有一个人对专案组的做法提出异议。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附件《罪证》,并作出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这次全会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

在表决通过决议时,中央委员陈少敏不畏高压,没有举手。但个人的作用不能挽回大局,刘少奇被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被当做“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彻底打倒。

林彪、江青等人还鼓噪要“公审刘少奇”，“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林彪、江青等人的阴谋未能实现。全会公报号召“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11月2日，全国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版面刊登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中央、地方各广播电台多次播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内容。公报中说：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①

11月下旬，上述公报、《审查报告》和附件，以中共中央文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日。

件1968年第一五二号和一五五号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此后,全国开展了“以革命大批判引路”的“斗、批、改运动”,对刘少奇又开始了新的攻击。

“打倒刘少奇”,作为一场涉及面极广、内容极复杂的政治运动,并没有以刘少奇个人的倒台而告终。刘少奇作为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的政治象征,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势必要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且,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入,阻力越大,刘少奇的“罪孽”就越深重,“罪状”就越多。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时,广大干部、党员、群众反对普遍打倒一大批;反对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要求批判刘少奇“镇压群众运动”的“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反对“保皇派”。“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需要“三结合”,解放干部,恢复秩序,则要批判刘少奇“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需要“大联合”,则要批判刘少奇的“黑《修养》”;需要“抓叛徒”、“清理阶级队伍”,则要批判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打派仗、搞武斗,则要从两派群众组织中抓刘少奇的“黑手”、“后台”等。诸多举动,诸多“罪状”,简直是举不胜举。

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以后,刘少奇的政治“死刑”已成“铁案”。但对所谓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却仅仅是个开始。

在一年多群众性的所谓“革命大批判”的基础上,在“斗、批、改”的运动中,报刊上着重批判了刘少奇的所谓“历史罪行”、“黑六论”、“人性论”、“唯生产力论”等项。其中,“唯生

产力论”是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方面,批判延续的时间最长,同时“罪证”也最多。

早在红卫兵对刘少奇进行“大批判”时,社会上就大肆批判刘少奇搞“利润挂帅”、“奖金第一”,批判刘少奇对工人阶级搞“管、卡、压”、“物质刺激”、“生产第一”、“专家治厂”等等。到“斗、批、改”阶段,中央报刊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刘少奇“唯生产力论”的文章。

“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都充斥着所谓的“群众大批判”。而刘少奇则是受到批判时间最长、批判规模最大的批判对象。这些批判的实质是党内一部分人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来看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把所有事物都纳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框中,用“阶级斗争无所不在”的口号来大肆煽动群众,借群众之手为个人利益服务。

在此情况下,“文化大革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许多好的东西都当做“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影响极为恶劣。

“九·一三”事件以后,批判刘少奇就与批判林彪联系在一起了,尽管刘少奇在历史上的表现和林彪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虽然批判刘少奇不再是重点,但它作为一个错误前提始终和“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打倒刘少奇”运动,作为“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象征,一直存在着,直到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止。

196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71岁的生日。恰在这一天的清晨,刘少奇听到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把他“永远开除党”的决议,这使他痛不欲生。刘少奇浑身颤抖,他的血压急剧升高,发高烧至摄氏40度。

刘少奇知道,他的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而且还可能遭受更为沉重的打击,所以遂以沉默表示无言的抗议。他要用生命的余光来俯瞰这枯萎的秋天。以后,刘少奇连治病和日常用语都不说了,病情也随之急剧地恶化。

周恩来派来两个护士照顾刘少奇,可刘少奇的精神创伤已深入到内心深处,是用药物无法治愈的。

为了排除异己,篡夺党的最高权力,林彪把在北京的一些“大人物”遣散到外地。刘少奇是第一个被“转移”的人。

1969年10月17日,刘少奇病情突然加剧。他的喉咙里通着吸痰器。鼻子里插着鼻饲管,身上扎着输液管。医护人员认为,刘少奇随时都可能发生突然死亡。然而,就在这时候,一位“负责人”来到刘少奇房门口,通知刘少奇转移。

护士在一张报纸上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写了“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几个大字给刘少奇看。刘少奇转过脸去,坚决不看。护士又把这张报纸拿到另一边给刘少奇看,刘少奇再次扭过头去。

护士无奈,只好把刘少奇的卫士长老李喊来,老李在刘少奇的耳边轻声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刘少奇没有说话。

当天傍晚7点多钟,在专案人员的“监护”下,刘少奇光着身子,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缎子被卷裹着,并蒙上了一条白色的床单,抬上担架,由卫士长老李陪着上了飞机。

飞机在茫茫夜色中飞行了两个多小时之后,降落在开封机场。

刘少奇虚弱的身子静静地躺在担架上,双眼紧闭,呼吸微弱。几个执行“紧急任务”的医护人员爬上飞机后舱,拖着刘

少奇下了舷梯,上了救护车。救护车在漆黑的夜色中向开封市区驶去,很快开进了开封市原市委大院。刘少奇被抬进大院中的天井小院内。

这个戒备森严的院落,四面不临街,4座三层高的楼房坐落在其中,执行“紧急任务”的人员同刘少奇一样被软禁,不许自由走动,不准互相交谈,不准同妻子、丈夫、儿女有直接或间接的往来。

刘少奇躺在西楼一层南头的里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他解放后来过的开封城。那是1958年9月18日的下午,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借郑州会议的间隙,同王光美一道乘车到开封视察。

而此时,刘少奇再次来到开封。他上下飞机没穿衣服,着凉后肺炎复发了,高烧摄氏40度,并且伴有呕吐。11月5日,刘少奇再次发高烧,经抢救后,体温才降到摄氏37.2度。

3天后,专案组命令陪同刘少奇到开封的医护人员撤回北京,北京带来的药也不准留下。临行前,专案组人员跑到火葬场看了看,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专案组人员还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视,保留活证据。”

11月10日晚,刘少奇高烧不退,体温也随之升至摄氏39.7度。医生诊断后不能断定是否肺炎。然而,他们却按肺炎治疗,不让医院抢救。第二天深夜,刘少奇嘴唇发紫,双眼瞳孔对射消失,体温继续上升,达到摄氏40.1度。

11月12日凌晨1时许,刘少奇病情出现异常症状,吸氧后也不见改变。6时40分,医生发出病危通知。6时45分,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被穿上一套普通的“寿衣”，遗体搁置在西楼一层的廊檐下进行拍照。刘少奇的遗体上盖着一张白床单，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都变形了，下颌一片淤血。老李流着眼泪，为刘少奇剪去长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须，穿上衣服和鞋子。

11月13日午夜，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中，载着刘少奇遗体的灵车驶向开封市东效火葬场。灵车是一辆“六九”型吉普车代替的，因车身太短，容纳不了刘少奇的高大身躯，所以他的两只脚露在车厢外。

火葬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烈性传染病患者”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两个工人。小小火葬场有20多个军人戒严。

刘少奇遗体到达火葬场时，有人正在喷洒消毒剂。专案组人员在火化单上这样填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因。

此后，专案组人员冒用刘少奇儿子刘源的名字签了字。刘少奇在开封的遗物此时也被付之一炬。同样，刘少奇的骨灰寄存证上写着：骨灰编号：一二三；申请寄存人姓名：刘原；申请人住址：××××部队；与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刘卫黄；年龄：七十一；性别：男。

刘少奇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死后却成为“无业人员”，“烈性传染病患者”，就连名字也改了。这种结局对刘少奇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同时又是令人心酸的。然而，这却是铁一般的悲惨现实。

一颗伟大的巨星就这样陨落了，而且在十年内冤沉大海，

成为人民“批判”的对象。

不过,历史是人民写的。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和刘少奇的案子进行了公正评价。

一个伟大的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黑暗的旧中国;一批英明的领袖人物给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带来了昌盛的国运。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新中国发生的大动乱,致使共和国最大的冤案发生,使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惨遭厄运。

痛定思痛,人们对历史的思索是相当沉重的。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趁“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的机会,用无法无天的封建法西斯手段酿造了共和国的最大冤案,同时也把他们自己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对于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冤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

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①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第 809—810 页、810 页，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8 月版。



第十章 苍茫大地

中共九大召开的前前后后

疯狂的个人崇拜难以遏止 “忠字化运动”时髦一时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变调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权之争
毛泽东：“我不是天才” 毛泽东已被“神化”
周恩来积极筹备中共九大 中共九大预备会议
秘密进行的中共九大开幕式 毛泽东的开幕词被
掌声打断了6次 中共九大主席团成员被选出
林彪宣读中共九大政治报告 删繁就简的中共九
大通过的党章 自称得了“5个鸡蛋”的徐向前
林彪、江青集团的势力在扩大 毛泽东在中共九
大闭幕式上讲话 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新闻公
报》 不同寻常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 九
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

的

“文化大革命”的掀起，一个重要的舆论途径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狂热煽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进行狂热鼓吹的是林彪，其中有两次影响最大。即林彪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五·一八”讲话和8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后来经常说起的“五·一八”讲话，是林彪掀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第一次狂澜。

林彪在这次讲话中专讲政变问题，同时狂热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说：

“毛主席对辩证法运用自如，渗透一切，在每个问题上都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无产阶级哲学基础。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马克思活了64岁，恩格斯活了75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54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6年就去世了。”“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

之丰富,没有那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①

在讲话中,林彪还鼓吹说:“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②

同年8月13日,为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林彪在这次会上又作了长篇讲话。林彪在讲话时重复宣传“毛主席是世界的天才”的观点。

林彪还说:“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指示办事。”^③

林彪在讲话当中还提出了干部工作上的3条所谓“标准”,即“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①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45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45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③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50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罢官”；“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①

在讲话中，林彪说，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这样，林彪就把“左”倾方针和个人崇拜的原则，贯彻到了党的思想路线、思想建设和组织路线、组织建设方面来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确认了林彪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热鼓吹。在公报中离开了中共七大所作的科学表述，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重新作了评价。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②

《会议公报》中还说，林彪号召学习毛泽东著作“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形成的个人崇拜的狂热，使

①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第50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毛泽东“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①这样就使林彪、江青等人得以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派性分裂活动，肆意践踏党规党法，取消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党员的党性观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个人崇拜的发展，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领导原则和各项制度，导致中央政治局内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在对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的估计有不同意见时，不能得到充分的讨论，不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而是贯彻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意志。甚至许多重大问题的决定，不经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也不经过中共中央全会决定。

同年12月6日，林彪发表了由张春桥等代笔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这是继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之后，又一篇歌颂毛泽东的“天才”，公然散布历史唯心主义的所谓“代表作”。

《毛主席语录》是根据林彪的“指导”编辑的，并经康生审定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已大量发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主席语录》更是被视为“红宝书”，人手一册，随身携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第818—819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

带。

《〈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称，“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时，“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通称为“三十字方针”。这个“方针”表面看来坚持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实际上是提倡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它既把毛泽东著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起来，又把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人们接受了这个“方针”，也就受到了这个“方针”的毒害。

1967年“一月风暴”之后，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和毛泽东的默许下，全国掀起了一阵个人崇拜的形式主义浪潮，这时称之为“忠字化运动”。

“忠字化运动”主要表现在到处竖立毛泽东大型塑像；街头巷尾到处书写、张贴《毛主席语录》；各类日用品上或刻画毛泽东像，或书写《毛主席语录》；家庭制作“红太阳”，即由毛泽东画像或塑像和《毛主席语录》以及用各类装饰品制成的“旭日”、“海浪”、“光芒”等一组墙壁装饰，人人佩戴“毛主席像章”；“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背《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等等。

在混乱局面难以控制的情况下，毛泽东于1967年7月至9月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情

况,并发表有关谈话。

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在7月至9月期间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沿途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毛泽东提出“要斗私、批修”。

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泽东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泽东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针对大批干部被打倒,毛泽东还重申“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指示“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毛泽东的谈话,是力图在全局上肯定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正某些极“左”的错误做法。但由于根本指导思想的错误,加上林彪、江青一伙又从中破

坏,不可能有太大的实际效果。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在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普遍地举办学习班。

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章指出了这个理论的6个要点。其中包括:

“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①

社论说,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这篇文章由姚文元起草,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它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其特定的含义。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最重要方式。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论点的总概括。其基本错误,是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还存在着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因而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划分阶级,是按照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由此而来的在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为依据的。随着中国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决定性胜利,作为农村的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富农消灭了。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资产阶级虽然在一定时间内还拿定息,但已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所

^①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人民日报》,1967年11月6日。

有权,失去了剥削工人的手段和奴役工人的必要条件。这样,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也已不复存在。

在中国的剥削阶级消灭后,社会上还存在着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还有各种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分子。他们的继续存在并继续产生,是同国内历史上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影响相联系的,也是同国际上资产阶级的影响相联系的。但是,由于国内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这些分子已经失去以往那种从经济上、政治上密切联结、形成完整阶级的条件。他们的存在是分散的、不稳定的,数量和活动的范围都受到限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两个完整的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阶级斗争的残余形态,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可以运用政权和法律的力量,解决这些问题,没有理由要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中,更没有理由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社会上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自然会反映到党内,党内也会出现某些阴暗面。党员和党的干部,包括一些负责干部,也会出现蜕化变质的现象。

在夺取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不仅关系到党本身的命运,也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但是,党内的斗争,包括克服阴暗面的斗争,大多属于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对于少数蜕化变质分子和违法犯罪分子,可以依靠党的纪律

和国家法律进行斗争,严重的可以清除出党,可以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办,以保持党的组织的纯洁性。然而,这种斗争不能被引申为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全面的“夺权”斗争。

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似乎只有靠阶级斗争、靠不断进行政治革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对此,有关专家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错误的观点。巩固无产阶级已经掌握的政权,要靠多方面的工作,而不能仅仅靠阶级斗争。没有党和国家的正确的指导方针、政策,没有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没有经济、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都不可能巩固的政权。特别是经济建设问题,是决定政权巩固的基础。没有经济现代化,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国家就不能逐步繁荣富强,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就不能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不能充分显现出来,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就会动摇,国防力量就不可能强大。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反复地宣传,并且写入了中共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写入了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它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

到1968年9月,经过20个月的“夺权”斗争,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原党政主要负责人当中,已有60多人被中央文件或报刊定性为“敌我矛盾”,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安插在各地的“代理人”。原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190余名成员中,共有88人被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反

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至于由此而受到牵连的下属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更是难以数计。再加上持续不断的武斗造成的混乱,原定在1968年国庆节前召开的中共九大的计划迟迟不能实现。

有鉴于此,毛泽东只得提议,先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为召开中共九大的预备会议。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原有97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到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时,林伯渠、吴玉章、罗荣桓、陈赓、李克农、刘亚楼等10人已经去世。

另外,有52.7%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打倒、受审查、靠边站,有的身陷囹圄,有的关入牛棚。

所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实际到会的中央委员只有40人,不到原中央委员87人(不含去世的10人——编者注)的一半;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不足原98名候补中央委员的五分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召开中央全会,到会者不足半数,这还是第一次。

为了达到法定人数,在全会开幕式上,候补中央委员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李大章、吴德、刘子厚等10人,被增补为正式中央委员。但是,这一次却不是按惯例,依名次递补的。不过这样一来,正式中央委员凑足50人,毕竟超过了半数。

13年后,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党内有同志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实际上是“非法

的”。

对此,此时已经第三次出来工作的邓小平不同意这种看法。邓小平指出:“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同志有个说明,说十位中央委员去世,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上十位,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五十位,过半数了。这就是讲的合法性。”“如果现在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①

1968年10月13日,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进入会场,坐在主席台正中央。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同时,列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74人。

周恩来首先报告了出席会议人员的组成、编组和会议的开法,并宣布全会议程:“(一)九大准备工作。(二)修改党章。(三)国内外形势。(四)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②

接着,毛泽东就“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①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4页、30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雷鸣般的掌声一次次席卷会场,但毛泽东并不那么乐观。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这时的“大联合”十分勉强,实际上只是各派的“大凑合”,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也只是军管会的变种。天下倒是大乱了一阵,可“天下大治”尚未见到。从中央到地方,还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生产持续下降。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了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2%。毛泽东想,再这样下去,“抓革命、促生产”即将成为一句空话。

因而,毛泽东在讲话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

毛泽东接着说:“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

毛泽东晚年形成的思想和他那倔强的性格,使他无法在总体上承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甚至还将它视为自己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得意之作”。毛泽东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看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创举。

毛泽东还在这次开幕会上特别提到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邓小平。毛泽东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扫视着会场,看到有许多新面孔。他看了一眼四川来的负责人,又说,四川可打得厉害,十几万人打,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办学习班解决了很多问题,一定要总结经验。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①

停了一下，毛泽东忽然又加了一句：“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局势。”

接着，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是粘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毛泽东说，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但也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

毛泽东还巧妙地用“111”和“妖”的谐音，说：“军事院校办了111个，叫‘111’，其实确实有妖啊！”

最后，毛泽东三言两语，简短有力地结束了讲话。毛泽东说，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估计要得3年，到1969年夏季就差不多了。毛泽东还强调说，将“文化大革命”搞到底，就是要“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毛泽东的讲话再一次为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定了调子。

开幕式后，周恩来召集全会各组召集人的第一次会议，介绍全会印发的文件。周恩来在会上强调：“要注意保密，要自

^①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讲的两段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已记录,不许外传。年纪大的要在医药方面给以照顾。”^①

10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六小组会议上发言说:

我在这次运动中也没有经验,关键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讲了的,但有些人回去就是怕群众。不仅是部长,我还奉命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来,当时黄火青、欧阳钦、谭启龙、江华、张平化、韦国清、杨尚奎、刘俊秀、叶飞、江渭清、张体学等不少人,叫他们自己反省错误。我有事不能去,叫谭震林、李先念同志找他们谈。在中南海,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谷牧他们在一起开会,军队方面有徐向前、聂荣臻,有情绪。主席指示我保的最多,余秋里、谷牧、部长们十多位。余秋里被抓后,我去报告主席,主席交代我保他。^②

在全会的分组会上,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群起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围攻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云、邓子恢、王稼祥。

此时,有些老干部虽已“靠边站”,但仍“打而不倒、轰而未垮”,并且还受到许多革命群众的尊敬和支持。对此,林彪、江青等人便串通一气,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有意将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李富春、李先念等人编入各个小组,有计划地对他们分头进行围攻和批斗。

围攻所谓“一贯右倾”的老同志,实际上成了全会有一个“重要内容”。

康生、江青等人的围攻情况,每天都通过全会的《简报》被及时反映上去。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全会每天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

10月20日和26日,林彪在全会上讲话。林彪针对毛泽东在开幕会上的提问,迎合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

林彪翻动着讲话提纲,大谈德谟克里特、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以他特有的角度回顾了从古至今的4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林彪从4世纪到5世纪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谈到14、15世纪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萌芽,又谈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再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林彪一讲到“文化大革命”,就变得兴奋起来。林彪鼓吹说,只有中国“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思想大普及”,在7亿人口中根子扎得最深,而且在全世界人民中起了“极大的影响”。奴隶社会文化运动、资本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3次文化运动的规模是小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

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不仅是7亿人口的“大革命”，而且流传到几十亿人口，流传到全世界，都有“影响”。

在组织上解决“刘少奇的问题”，把“打倒刘少奇”的既成事实“合法化”，是这次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会上，康生、江青、谢富治等操纵中央专案组，用伪证写成《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被分发到了每个人手里，由代表们“讨论”。

刚直不阿又深知刘少奇为人的中央委员陈少敏，对于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那些诬陷置之不理。在小组会上，陈少敏以沉默抗争，因而遭到围攻。

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

当会议宣布“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之后，随着一声“表决”，一只只手陆陆续续举了起来。

惟独陈少敏坦然地把右手压在胸前，闭上双眼，全身伏在桌上，不看会场，不举手。陈少敏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反对“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捍卫党的原则，庄严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投了一张庄严神圣的反对票。这也是惟一的一张“不赞成票”。

会后，康生找到陈少敏，气势汹汹地质问道：“开除刘少奇的党籍，你为什么不举手？”

陈少敏理直气壮地顶了一句：“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的一句话顶得康生哑口无言，悻悻而去。

陈少敏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壮举，深得全党同志

的敬佩。

多年以后，在一次大会上，当人们痛心地谈及刘少奇冤案的时候，胡耀邦曾经十分钦佩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陈少敏也因此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后被遣往河南罗山“劳动改造”，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

10月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闭幕。闭幕式通过了《全会公报》。《全会公报》说：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于1968年10月13日在北京开幕，于10月31日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并就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出席了会议，作了重要的讲话。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出席了会议。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一致认为，我们的伟

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为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胜利的航向。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都是正确的。

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讲话,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①

《全会公报》还引用毛泽东在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全会公报》说,“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日。

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空前广泛、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经历了反复的阶级较量,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

《全会公报》认为,在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对此,《全会公报》说:“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①

《全会公报》中公布,全会批准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的《全会公报》还说:“全会指出: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斗争的中心,是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全会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日。

认为,对于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破坏活动,必须继续提高警惕。”^①

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1968年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针对这一问题,《全会公报》说: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在亿万人民中迅速地传播,深入人心,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斗争中自觉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全党全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执行毛主席每一项最新指示,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办好毛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日。

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使我们各项工作继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①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号召全国各族革命人民，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会公报》说，全国革命群众必须继续执行毛泽东提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原则，认真执行毛泽东关于进行革命“大批判”、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指示，使革命委员会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完善，更好地担负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为此，《全会公报》强调说：

我们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各个方面，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我们必须执行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日。

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指示,执行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把查明有据的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入党,首先是吸收产业工人中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关键问题。参加这项光荣任务的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我们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农业和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得更加出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伟大推动力。它正在促进并将继续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飞跃。

我们必须不断加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巩固国防,继续做好拥军爱民的工作。我们一

定要解放台湾。对于豺狼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如果敌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①

《全会公报》认为,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蓬勃勃的发展。美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日益陷于空前的孤立。但是中国决不孤立,占世界人口90%以上要革命的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毫无疑问,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必然要被革命人民彻底粉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都必将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彻底翻身”。

《全会公报》在谈到世界形势和反帝、反修问题时说: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政策,同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坚决支持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一切正义斗争。中国共产党认为,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日。

一切被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应当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彻底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以便更迅速地取得自己的胜利和解放。^①

《全会公报》最后说，这次全会，是在国内、国际“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这是一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会议，是一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全党“空前团结”的会议，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朝气蓬勃”的会议。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规定了中共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也就是毛泽东早在1967年10月27日写进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中的“五十字方针”。

这“五十字方针”的内容是：“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还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决定》说：“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印发全党，作为讨论的基础。”

随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进入了尾声。毛泽东在中共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日。

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了讲话。针对有人重提“二月逆流”和企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问题,毛泽东说:

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不大了解,经过十几天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全会上,由犯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都比较清楚了。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在这个世界上面,总是左、中、右,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如果不参加,我看是个缺点。陈毅同志,你就以那个右的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①

在闭幕会上,毛泽东还说:“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

毛泽东还讲了一些其他的原则。毛泽东认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做到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

^① 李剑:《中共历史转折关头——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下卷,第687—68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3月版。

对于学术权威,毛泽东提醒大家注意,不要作得太过分。毛泽东说:“冯友兰、翦伯赞可能还有某种用处。批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与刘(少奇)还有点区别,‘多中心’不对。”

不久后,张春桥于11月11日在上海写了题为《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张春桥在报告中提出,“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将此报告转发各地。结果,全国各地在传达中大多点名批判了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过后,全国各地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积极准备起来。

自从1967年11月毛泽东提出基层也要参与党章的修改以后,全国各地几千份修改党章的意见连续不断地被送往中共中央。

中共九大的另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是选举中共九大的代表。

这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全都没有“重建”,绝大多数党员还要恢复组织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九大代表不是也不可能是党员选举出来的。因为“迷信选举”在“文化大革命”中早就受到了批判。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选举,批判之声不绝。《红旗》杂志1968年第四期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社论这样说,“迷信选举,也是一种保守思想”。

这篇社论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①

这篇社论还说：“毛主席这个极端重要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的群众基础，深刻地批判了迷信选举的形式主义”。^②

这篇社论还公布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③为此，社论强调“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

根据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中的规定，中共九大代表以毛泽东 1967 年提出的“五十字方针”为指导思想。

然而，这个“五十字方针”在张春桥那里进一步具体化

① 毛泽东：《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 581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

② 《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红旗》杂志，1968 年第四期。

③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 436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

了。张春桥明确提出：“九大代表要以九次路线斗争中表现突出的老造反作为主体。”

九次“路线错误”分别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犯路线错误”；“李立三路线”；“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王明路线寿命最长”；“在长征路上，第一、第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按照“第九次路线斗争”的规定，“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路线”批判、战斗的造反派就应该是响当当的代表了。

可是，很多造反派却不是中共党员。此时，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由中央和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核心小组少数人酝酿“协商”产生。个别非党员也成了“代表”。还有些是临时突击入党的。

于是，各地出现了一些荒唐透顶、史无前例的事情。如有的人先确定为中共九大代表，然后“赶办”入党手续；有的是在进京参加会议的火车上“突击”入党的；有的代表参加过中共九大以后，入党志愿书却还未上交。

这就使林彪、江青等人得以利用大权乘机把他们帮派体系的许多追随者塞进代表行列，造成九大代表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中共九大的代表组成具有6个特点。

九大代表组成的特点之一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的打砸抢分子和“红卫兵运动”积极分子进入了代表

困。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和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蒯大富之流。

九大代表组成的特点之二是,军人在代表中的比重相当大。在中共九大代表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身穿军装。在九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中,军人代表达到45%。而1956年在中共八大中选出的中央委员中,军人比例只有19%。中共九大代表在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军队系统的有11人,将近占了一半。

九大代表组成的特点之三是,新的中央委员中,有19%是群众代表。这些群众代表通常都是老工人或老农民。

九大代表组成的特点之四是,中央委员中各省代表占三分之二以上。而在1956年,来自省级的中央委员只有38%,其他则来自中央党、政、军机关。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中有2名担任省级工作的官员(纪登奎和李雪峰——编者注)和3名地方上的军队领导人(陈锡联、许世友和李德生——编者注)。而“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央政治局只有3名成员可被划为省或大区的代表。这反映了当时权力的下放。

九大代表组成的特点之五是,是原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占第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19%。一大批功勋卓著的老领导,一大批未能进入革命委员会的省和大区的党的领导人,以及一些重要的经济专家,都未能进入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大多数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干部和高级将领都失去了他们在中央政治局内的地位,尽管他们仍保留了中共中央委员的资格。如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则被剥夺了代表资格,邓小平

被排挤出中共中央委员会。

九大代表组成的特点之六是，林彪集团和江青一伙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中占了很大比例，夺取了相当大的权力。在中央政治局 25 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林彪集团占了 5 名，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陈伯达；江青一伙占了 5 名即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江青。

九大代表的组成，在组织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建党原则。尽管里面有不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义之士，但由于林彪和江青的阴谋，他们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林彪和江青在中共九大代表组成问题上的安排，为他们进一步篡党夺权准备了条件。

中共九大召开前夕，为争夺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起草权，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陈伯达曾担任过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又是党内所谓的“大理论家”、“大手笔”。一系列党内重要文件都曾出自陈伯达的笔下。“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后来，陈伯达位居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

但是，陈伯达对江青刚愎自用、心狠手辣的品性是很了解的。陈伯达知道他领导不了副组长江青。后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实权一直被江青把握着。因而，在“中央文革小组”里，陈伯达颇不得意。尤其是在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打倒后，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里更显孤单。

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康生是江青的“军师”，而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亲信”。

陈伯达是一个素喜争权夺利的人。他有野心而无原则，

虽是笔杆子，却组织能力欠缺。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江青、姚文元3人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陈伯达认为，张春桥、姚文元已抢到了修改党章之权，因而想独立抓到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之权。对此，陈伯达后来在被打倒后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合作。起草人名，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动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告过。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稿子。^①

为了独立起草政治报告，陈伯达向中共中央请假一个月，在家里“埋头苦干，全力以赴”。

陈伯达起草的报告题目是《为把我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全文共分10个部分。

陈伯达先把报告第一部分和写作大纲送给毛泽东审阅。

^① 李健：《红船交响曲》，中卷，第1192—119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

毛泽东对此谈了一些意见。但陈伯达却未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这激怒了江青。江青指责说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江青、康生于是策划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一个斗争会。在会上，江青要陈伯达作检讨，并同康生二人“你唱我和”。

陈伯达刚说一句话，江青就打断他的话说：“陈伯达不做检讨不让他说了”。江青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并提出要摘陈伯达衣帽上的帽徽领章。

陈伯达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意思是说，他赞成打倒他的大字报上街。

陈伯达虽然遭到批斗，但不服气，继续独自写着他的那份政治报告，不愿跟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然而，中共九大预备会议上讨论的是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陈伯达的稿子却被冷落在一旁。

陈伯达在一次讨论会上，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提出了意见。张春桥因此和陈伯达吵了起来。

冲突的一次最集中的表现，是在中共九大预备期间。陈伯达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所拟的九大政治报告稿，也就是后来林彪在中共九大上念的这个稿子，提出了意见，即“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施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张春桥反驳说：“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世界上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是一些小国，如卢森堡、比利时等国；你举的现

在中国的例子，也是中小城市。”

毛泽东听了以后，进了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后，毛泽东说：“考虑在报告上添进陈伯达的意见。”

但是，这么一来，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异常激怒。

过了两天，中央又开了一个会，对陈伯达进行了从来没有的、言词极其激烈的斥责和批评。

在陈伯达被打倒后，江青等人接连不断地打击所谓“唯生产力论”，并反过来对陈伯达加封了一个所谓“伯恩施坦”的名义。

陈伯达至此还不罢休。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政治报告，总算将其写出来了。

接着，陈伯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将改好的政治报告派人送给毛泽东。

很快，陈伯达派人送去的那个牛皮纸口袋，从中南海退了回来。陈伯达发现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拆开，就这样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回去。毛泽东只在信袋上写了“退伯达同志”这几个字。

对此，十几年后，陈伯达还说：“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不过，在中共九大上，陈伯达仍被选入中央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号”椅子上。

但经过这一场争斗，陈伯达很快找到了新的政治伙伴。陈伯达开始与林彪勾结起来，但也很快因林彪事件而被打倒在地。

中共九大召开前，毛泽东在审阅由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时，看到党章的《总纲》中照抄了一段林彪的“名言”，那是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中的几句话：“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顿时皱起了眉头，圈去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

然而此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增长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毛泽东的著作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出版发行。在中共九大前的印刷高潮中，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将《毛主席语录》按人口数量印刷，几乎达到全国人手一册。毛泽东的画像、塑像、胸像无论是在尺寸，还是在数量上都急剧扩大。

1969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题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社论。社论中这样说：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广泛、深入地发动了群众，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最近我国又成功地爆炸了一颗氢弹，进行了一次新的热核试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又一丰硕成果”。“所有这一切伟大的胜利，都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都是亿万革命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为了实现1969年光荣和艰巨的任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统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为了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必须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①

社论中还号召说：“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

不仅社论这样说，普通工人和农民也这样说。就连上海国棉三十厂革命委员会主任、造反派头头王秀珍，也在《用实际行动迎接“九大”的召开》一文中说：

在一九六九年开始的时候，首先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主持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喜讯传来，我们厂的工人心情非常激动，大家欢欣鼓舞，日夜盼望全会的这一决定，充分地反映了我国工

①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人民日报》，1969年1月1日。

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它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件特大喜事。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已经在我们头脑中扎了根。我们厂的老工人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有了毛泽东思想，就心红、眼亮、骨头硬，革命有方向，天塌也不怕；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好比航海失去灯塔，必定要迷失航向。”我们要进一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全面落实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来迎接“九大”的胜利召开。^①

王秀珍在文章中谈到“清理阶级队伍”时说：“我们决心把这场清理阶级队伍的仗打到底，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政策交给群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②

在谈到开展革命“大批判”时，文章还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文章在谈到加强党的建设时说，迎接中共九大召开的时候，一定作一个自觉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共产

^① 王秀珍：《用实际行动迎接“九大”的召开》，《红旗》杂志，1969年第一期。

^② 王秀珍：《用实际行动迎接“九大”的召开》，《红旗》杂志，1969年第一期。

党员。“要进一步狠抓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猛促生产”。王秀珍还说：

“在一九六八年中，我们全厂革命职工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的教导，实行了精兵简政，使全厂的脱产人员减少了三分之二。”“一九六九年，随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必将出现一个新的生产高潮。”“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谆谆教导我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抵制任何糖衣炮弹的袭击，把工厂的领导大权永远掌握在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用实际行动做出更大的成绩，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献礼，向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献礼。”^①

与此同时，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工人洪华也在《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一文中谈到自己的体会。洪华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① 王秀珍：《用实际行动迎接“九大”的召开》，《红旗》杂志，1969年第一期。

“在迎接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在斗争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政策是我们向阶级敌人进攻的有力武器。只有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政策办事，才能真正做到准确而有力地打击反革命分子，才能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牢牢地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牵着阶级敌人的鼻子走，使敌人逃不出我们的手心。工人同志们说：‘执行不执行政策，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问题。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政策就是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我们新华印刷厂的工人，对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打心眼里感到亲切。要不是毛主席及时发动和领导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不得了啊！”^①

洪华在文章中说，全厂是一派“大好形势”，到处都呈现着“蓬蓬勃勃的革命景象”。全厂广大革命职工，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思想革命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洪华在文章中还说，“我们革命工人的一生，是永远忠于毛主席的一生，是永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忠不

^① 洪华：《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红旗》杂志，1969年第一期。

忠,看行动”。大家要带着“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学习“毛主席的一个教导”,批判刘少奇的一个“反动观点”,解决自己的一个思想上的问题,指导自己的一个行动。

文章中说,每当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发表,大家都闻风而动,“学习不漏人,宣传不过夜,紧跟不掉队,执行不走样”。

洪华在文章结尾时写道,新的一年到来了。这一年,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年”,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空前发展的跃进年”。

洪华在文章中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认真落实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们决心用更新更优异的成绩,报答毛主席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向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敬献厚礼。”^①

这时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郭风莲,也撰写文章《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光辉思想给我们无穷的力量》。在文章开头,郭风莲这样写道:

^① 洪华:《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红旗》杂志,1969年第一期。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新的一年到来了。我们大寨大队的贫下中农，满怀无比崇敬的心情，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大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永远保持这面旗帜的鲜红颜色，是我们大寨贫下中农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光荣任务。我们不断地与阶级敌人斗，与天斗，与地斗，在斗争中锤炼了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心。^①

郭风莲在文章中说：“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寨贫下中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使我们深深懂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就是光明，就是胜利，就会保证人不变修，党不变质，国不变色，就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一直走向共产主义。”^②

郭风莲在文章中还说，大寨贫下中农，为了“保卫毛主席树立的这面红旗”，在与阶级敌人斗的同时，战天斗地，与各种自然灾害进行了较量。“自然灾害压不垮我们，我们战得老天低了头，斗得土地变了样”。“是什么力量使我们天不

① 郭风莲：《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光辉思想给我们无穷的力量》，《红旗》杂志，1969年第一期。

② 郭风莲：《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光辉思想给我们无穷的力量》，《红旗》杂志，1969年第一期。

怕,地不怕,能够在自然的大风大浪中胜利前进呢?”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大寨大队在短短的5年内战胜了3次毁灭性的灾害,就是毛泽东思想“无穷威力的最光辉的证明”。

1963年,大寨遭受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房倒、窑塌、地冲、山流,大寨的党支部成员都感到压力很大。在全大队开展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之后,人们懂得了“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道理,提高了战胜灾害的勇气。在一年多时间后,受灾的土地被全部恢复了;3年多时间后,房子全部被修起了。

由此,郭风莲在文章中进行总结说:“从这次抗灾斗争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这办法好,那办法好,自力更生的办法最好;这力量大,那力量大,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力量最大。”^①

郭风莲在文章中说,1966年,是大旱的一年,半年没有下雨,干土层有半尺左右。地里没有墒,下不了种。大寨党支部组织社员反复学习毛泽东“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越学劲越大,越学志越坚。“我们响亮地提出了‘不靠天不靠地,战天斗地靠自己’的口号”,与旱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抗旱取得了胜利。正当庄稼生长的时候,一场暴雨袭来,200多亩庄稼又被冲毁。大寨人民日夜苦干,扶苗栽苗,又战胜了洪灾。

^① 郭风莲:《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光辉思想给我们无穷的力量》,《红旗》杂志,1969年第一期。

为此,大寨的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山高没有我们斗志高,灾大没有我们决心大,只要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多大的灾害也不怕。”^①

在谈到大寨遭遇到第三次毁灭性灾害时,郭风莲在文章中写道:

“一九六八年,大寨先遭到了旱灾,接着是一场特大的雹灾。”“但是雹灾再大,也打不倒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大寨的贫下中农信心百倍地说:‘我们年年有灾,年年抗灾,抗一个胜一个,今年的灾一定能够战胜!’”“经过顽强的抗灾斗争,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大灾之年,大寨又夺得了大丰收。同时,灾害逼迫我们进行了移栽谷苗的大面积试验,使我们改进了耕作制度,扩大了小麦的播种面积。大寨新农村的建设也取得了新的成绩,林牧副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大寨的贫下中农激动地说:‘不是天收,也不是地收,是毛泽东思想带来的大丰收。’”“我们大寨贫下中农,有了毛泽东思想,力量用不尽,办法用不完,没明没夜的干活不觉累,再大的困难不叫苦。”“毛主席教导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大寨贫下中农,以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勇气概,把河沟变成良

^① 郭风莲:《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光辉思想给我们无穷的力量》,《红旗》杂志,1969年第一期。

田,把旱地变成水浇地”。^①

郭风莲在文章中写道,大寨大队正是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先于一切、大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树立一心为公劳动、为革命种田的思想,才有了改天换地、战胜一切困难的无穷力量。大寨用毛泽东思想培养起一代新型的农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就是这样天不怕,地不怕,死不怕,“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

郭风莲在文章最后说,大寨大队的人民群众牢记毛泽东“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更严格地要求自己,虚心地向别人学习。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各项任务”,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继续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斗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从以上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这时人们似乎一切困难都是毛泽东赐予的力量战胜的。毛泽东已被“神化”,而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了。

1969年4月1日,也就是中共九大开幕当天,上海《文汇报》头版在《总结经验奋勇前进满怀豪情迎接九大》的通栏标

^① 郭风莲:《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光辉思想给我们无穷的力量》,《红旗》杂志,1969年第一期。

题下,头条刊登了《毛主席宝书宝像在本市大量印刷出版》一文。这似乎更能说明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程度。文章中说:

从1966年开始到1968年底,3年中共印了《毛泽东选集》普及本二千四百七十万部,相当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16年总印数的十点五倍;三十二开精装《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六十二万册,相当于过去16年总印数的三点七倍。毛主席宝像三亿七千六百万张,为过去十六年总印数的二点七倍。此外,过去十六年中从未印制过的《毛主席语录》,3年中共印了一千九百八十五万册(其中袖珍本六百三十九万册);袖珍精装《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印了一百七十八万册;毛主席摄影像印了七亿五千五百万张;毛主席语录片(张贴语录)印了八千九百三十万张。同时还印了大量的毛主席著作单篇本、汇编本、选读本以及《毛主席诗词》和各种外文版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仅在1968年1年中就印刷了一千九百万册。^①

人们认为,毛泽东的书和像印得越多就表示越“革命”。仅仅一个上海市,印刷数量就如此之多,可以称得上是“空前

^① 《总结经验奋勇前进满怀豪情迎接九大——毛主席宝书宝像在本市大量出版》,《文汇报》,1969年4月1日。

绝后”。这篇文章叙述了为印刷毛泽东著作，工人们热情、昂扬的“革命”态度。文章说：

现在，上海各印刷厂都承担了印制毛主席著作的光荣任务，广大革命职工对此无不欢欣鼓舞，“心怀‘忠’印红宝书，保证张张质量好。”工人们把传播毛泽东思想看成是“时代赋予的最崇高、最光荣的任务”，是“最大的政治，革命的第一需要”。他们站在机器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积极地投入到印制毛主席的宝书、宝像的战斗中去。他们的誓言是：“觉可以少睡，饭可以不吃。毛主席的宝书、宝像不能少印。”印制《毛主席去安源》画像时，广大印刷工人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夜以继日地连续战斗，美术印刷厂有两个被照顾上半天班的老工人，互相劝说对方回去休息，结果谁也不肯离开，于是一起留下来日夜奋战。广大革命印刷工人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在四十八小时完成了《毛主席去安源》一百九十一万对开张的光荣任务，创上海胶印速度最高纪录。红旗印刷厂的工人，为了多印毛主席的画像，自动放弃厂休，坚持早上班，晚下班，去年提前六十三天完成了全年计划。群众印刷厂充分发动群众，把印制毛主席著作的装版时间由二十四小时缩短到十小时，机台班产量从七千印张增加到一万印张，今年头七天就完成了十八万册《毛泽东选集》普及本的光荣任务，实现了“开门红”。印刷出版战线上的

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教导,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组织了几家印刷厂共同印制毛主席画像,又组织了十余家街道工厂参加装订毛主席著作,这对加速印制毛主席著作、画像起了很大的作用。^①

被个人崇拜之火烧得几乎疯狂的人们,不光将毛泽东的著作和毛泽东的画像印出来,更是花了大量精力去发行。

“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仅上海一地,毛泽东著作、画像发行量比过去 17 年来增加了 11 倍。发行部门的人员,积极增设发行网点,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并经常组织人力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去流动服务,主动送书和送像上门。

有一次,一艘货轮已启航,要几个月才能回来,书店的同志就坐汽艇追上去,为他们及时供应毛泽东著作,轮船上的同志深受感动。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人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毛泽东那种自发的真诚的热情逐渐走向一种仪式和形式。

在各地,家庭里常常建有毛泽东思想的“忠字台”,全家人围坐在台边“献忠心”。学校的孩子们不再以“早上好”为见面语,而代之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来开始一天的活动。

^① 《总结经验奋勇前进满怀豪情迎接九大——毛主席宝书宝像在本市大量出版》,《文汇报》,1969年4月1日。

人们判定对毛泽东“是否忠诚”的标准,从看实际行动转向背诵多少《毛主席语录》以及家里挂的是多大的毛泽东像。

对此,一位外国评论家这样说,1966年,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鼓动了人们去破除迷信。而在1968年,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迷信。

这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现象。这个现象到中共九大召开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达到了一个最高潮。

根据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周恩来于1968年12月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参加九大作代表的名单和预拟名单。其中原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准备提作九大代表的名单包括朱德、董必武、蔡畅、邓颖超、滕代远、邓子恢、李富春、李先念、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王震、曾山、胡耀邦、赛福鼎、范文澜等39人。

陈云、张鼎丞、方毅、杨勇、谭启龙5人在中共九大召开前被剥夺出席全会的资格。周恩来在预拟名单中写道,这5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需经讨论提出,并请示主席、林副主席批准才能拟作代表”。

随着中共九大的临近,周恩来不断努力,尽可能增加九大代表中老干部的名额。1969年1月12日,周恩来分别起草中共中央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电报,提出应说服两地的干部群众,将王恩茂(新疆)和陈康(云南)补选为九大代表。

起草好电报后,周恩来把电稿送毛泽东阅,并注明,王恩

茂和陈康二人如不当代表，“恐对全局不利”。

3月7日，周恩来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商定的意见，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关于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来京开会商量九大代表名单和九大准备工作的电话通知和名单，并送毛泽东、林彪审阅。

同一天，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谈到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时，对陈伯达没有按期交出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全稿表示不满。毛泽东说，索性把起草小组取消，改由“总理负责”，九大政治报告归“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大家共同商议。

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讨论了由陈伯达起草的部分九大政治报告稿和九大准备工作会议的时间和议程。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就会议情况给毛泽东作了报告：“九大书面报告稿，伯达同志昨夜已交出四分之三草稿，还有两个半问题（国际、毛泽东思想和团结起来），请伯达同志三天内将它写完，然后大家来议。”^①

从3月9日至27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对中共九大进行具体的筹备工作。这个会也叫“九大的预备会议”。

3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九大准备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宣布了准备工作会议的分组名单和任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4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中共九大准备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部分省、市、自治区提出的调换某些九大代表方案,批准各地区、各单位提出的九大代表名单,以确定九大开会的日期、主席团人数、名单和议程等。

在筹备中共九大期间,周恩来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心情也更加烦躁。3月12日,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了一张条子,叮嘱他:“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因昨日蒲老(即时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的浦辅周——编者注)告我,望你应戒着急和激动,以免影响心脏波动。”^①

3月16日,中共九大准备工作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共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毛泽东的这3句话成为中共九大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说,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毛泽东表示,关的人太多了,统统把他们放了算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不了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当然不是一个不关。

毛泽东还说:“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报告上不要讲‘二月逆流’,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

在外来威胁的强压下,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内部团结。因而,毛泽东决定部分调整“文化大革命”的政策,给一些知识分子和老干部落实政策。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

^① 邓颖超:《邓颖超致周恩来》,《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第1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是由于毛泽东已经觉察到前段时间“文化大革命”过火过乱；另一方面，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也加剧了党内有关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估计。

3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九大准备工作会议上强调：“文化大革命快三年了，我们对于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这点做得总还是差。更重要的就是解放一批干部。毛主席说落实政策，就是对走资派也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个个都是死不悔改的，你总要给他改正的机会嘛。”^①

当得知外交部所报中共九大代表候选人中没有耿飏时，经过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周恩来表示，一定要向中共中央建议，让耿飏出席中共九大。

3月25日，周恩来就中共九大主席团是否需要设常委问题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是否也需要一两名老同志参加主席团常委。毛泽东指示，主席团不设常委，设正副主席及秘书长各一人。

3月27日，中共九大准备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交待，中共九大召开前要做3件事，即酝酿各组参加主席团的人员名单、讨论党章、讨论政治报告。周恩来并强调要注意保密，会议结束前不要泄露会议内容。

3月29日，周恩来就中共九大准备工作的情况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在信中说，张春桥、姚文元已将九大政治报告改出；九大中央委员名单草案已提出，中央委员115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候补中央委员 95 人，共 210 人。请大家考虑，然后考虑具体人选或范围。

毛泽东在看完周恩来的信后批字：“照办。中委人数恐须略为扩大一些。”^①

在中共九大开幕前一天，即 3 月 31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让徐海东参加中共九大主席团。

周恩来在信中写道：“今晚与主席团预选成员和军队主要负责同志协商徐海东同志为九大代表。如取得大家同意，拟同时提议徐也参加主席团，然后由各组召集人回到各组征求全体代表同意。徐海东同志既已当代表，就以参加主席团为好，我和军委办事组各同志商量都同意。请示主席批准。”^②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③

当晚，在酝酿中共九大主席团名单的会议上讲话时，周恩来又就徐海东做九大代表和进入九大主席团一事作出说明，

① 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九大准备工作情况报告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 22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

② 周恩来：《建议徐海东参加九大主席团》，《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53 页，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1 月版。

③ 毛泽东：《在徐海东参加中共九大主席团问题报告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 19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

并介绍了徐海东的历史功绩。会议一致通过了徐海东为九大代表并参加主席团。

第二天,周恩来又立即致信毛泽东、林彪说:“九大开幕式上主席台的人,遵照主席批示,拟定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十二位同志,也可考虑后三位同志不上开幕式主席台。”^①

周恩来还在信中拟出主席团前排执行主席的名单和座位方案。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均在其中。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了。这次大会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之下召开的。

大会在京西宾馆大礼堂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512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坐于大会主席台上。

毛泽东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讲了话。当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声。顿时,“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如山呼海啸。

接着,毛泽东简要地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历次党内斗争情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9—2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况,希望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毛泽东说: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恩来同志、伯承同志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呀,什

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①

在短短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回顾了从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到八大的历史，并着重强调了在延安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

接着，大会选举出了主席团。实际上，大会不过是念了一遍主席团成员名单。因为代表从3月27日起就开始酝酿这个名单。

主席团成员共176名，使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分成4个档次排列姓名。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名单的第一档，写着“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名单的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23—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第二档排列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 12 人；名单的第三档写着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10 人；只有第四档是以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的。

这个史无前例的排位方式，说明这次大会对排名顺序的重视，颇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意味。

新华社于 4 月 3 日专门就主席团名单排列做出更正通知。通知说，4 月 1 日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主席团名单”中，金祖敏、周丽琴应为周丽琴、金祖敏。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社会对排名顺序的重视程度。

在大会选举出主席团后，推举会议主席时，毛泽东突然提议推举林彪当主席。林彪慌乱地喊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再次对与会代表建议，由林彪当主席而他本人当副主席。但不等代表们反应过来，林彪就抢过话题喊道：“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于是，全场立刻手臂林立。这样，毛泽东也就同意当大会主席，并提议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也立即获得大会一致通过。

接着，大会宣布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团秘书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汪东兴、温玉成为大会秘书处成员。

与中国共产党前几次代表大会相比，这次代表中，工农代表比例增加，但没有“知识分子”代表。

中共九大第一次全体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即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

接着，按照大会议程，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宣读政治报告。

林彪阴沉地戴着那副粉红色的塑料边框的老花镜，一字一句地念着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毛泽东最后审定的政治报告。

这个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在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

政治报告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时，断章取义地摘引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几条论述，用来证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政治报告还引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往后越尖锐的论断为“文化大革命”辩护。事实证明，这样的论断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

政治报告还以很大篇幅歪曲叙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如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路线斗争史”，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历史依据。

政治报告共分为8个部分，其主要内容是：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政治报告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6段语录和毛泽东的9段语录，对这些

语录作了断章取义的发挥之后,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而毛泽东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政治报告简短地回顾了解放以后的意识形态斗争,而以主要的篇幅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评功摆好,对老一代革命家进行肆意攻击和污蔑。

具体而言,政治报告认为,江青操纵的“京剧革命”“取得了重要的战果”,“一批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出现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终于在舞台上站起来了”。

除此之外,政治报告把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抵制,诬蔑为“猖狂反扑”、“逆流”;对上海的“一月风暴”则吹捧为“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1967年1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然而,对各造反派团体之间的争权夺利的血腥武斗,报告却含糊糊糊,顾左右而言他,用“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遮掩过去,还强词夺理地为极其混乱的局面辩护说,“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广大群众”。

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问题，政治报告提出，这是以后的任务，同时要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具体地说，报告就是要求建立所谓“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政治报告并要求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都必须完成这些任务。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政治报告主要介绍了各项要落实的政策，同时要求“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政治报告不顾1967年、1968年连续两年生产大幅度下降，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实际，盲目乐观地说全国“出现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广大劳动人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市场繁荣，物价稳定”。

与此同时，对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报告强调“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政治报告不切实际地、片面地夸大“革命”、“斗争”的作用，从原则上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关于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政治报告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语录，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

在当前落实政策过程中,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做好斗、批、改各个阶段的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①

实际上,政治报告只是空喊反“左”与反右,而林彪的行动表明,空唱高调本身就是一种“左”。

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政治报告继续强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②

政治报告还引用了林彪的“名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政治报告还进一步提出“把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努力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实际上是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攫取更多的权力大造舆论。

关于中国和外国关系,政治报告中讲到的虽然有一些正确的内容,但更多的是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对理论的错误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引申。

比如,政治报告里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爆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政治经济的危机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帝国主义国家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判断都为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是不正确的。

政治报告的最后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一部分是结束语,除了一些空洞的议论和口号外,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当然,这也和此时的“浮夸风”盛行是密不可分的。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无视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客观规律,把认真搞好“批、斗、改”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重复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旧调。这个政治报告在仅有的一点篇幅里谈到“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然而这一段的中心却又是强调政治。

政治报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抓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这种“左”倾错误指导方针下确定的任务,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客观实际,违背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总的来说,这个政治报告,系统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

论、方针、政策与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大理论原则和党的历史进行了歪曲、篡改,对中国的实际国情作了别有用心
的歪曲概括,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歪曲,把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
发展得更加猖獗,从而把“左”的严重错误更推到了新的高
度,也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在政治报告中,林彪连篇累牍地引用了《毛主席语录》。
在谈到将来的任务时,林彪强调并高度赞扬了军队的作用,而
而且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话说,“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国家
的主要成分是军队”。

对于中苏两国不久前发生的“珍宝岛事件”,林彪在报告
中措词强硬地说: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变本加厉地破坏边界现状,一再挑起边界事端,枪杀我手无寸铁的渔民、农民,侵犯我国主权。最近,他们更连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实行自卫还击,给了侵略者应有的打击,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神圣的领土。为了摆脱他们的狼狈处境,三月二十一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国领导人通电话。三月二十二日,我国政府立即用备忘录答复他们,说明“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三月二十九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然坚持其顽固的侵略者的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对此,

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答复。^①

据林彪的秘书回忆,林彪在中共九大上念这个政治报告以前,对报告稿一次也没有看过。

早在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从毛泽东处开会回去,把秘书张云生、李春生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林彪给两位秘书布置工作时说,毛泽东让他作政治报告,报告不用事先准备稿子,叫他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用摘录稿。林彪提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小组”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他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提议,最后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3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政治报告。

接着,林彪慢吞吞地对秘书说:“但是,你们都知道,我向来很不习惯念别人写成的稿子,而只愿意口头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我口头讲话用的‘条子’。”

林彪交待两个秘书,将这个“拉条子”的任务交由他们帮忙搞。他这次作口头报告,还是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的那6个题目。

随后,叶群又分别从空军、沈阳军区以及军委办公厅调来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几个“笔杆子”，一起为林彪准备口头讲话。

林彪于2月下旬把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3人召到毛家湾，商量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起草的有关事宜。

对此，张云生后来回忆说，似乎商谈有关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是顺利的。张云生听到张春桥、姚文元都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然而，结果却不顺利。叶群一天夜深从钓鱼台回来后，急忙召集所有为林彪起草口头讲话的工作人员开会。

叶群说：“你们给首长在九大讲话‘拉条子’，现在可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我刚从钓鱼台开会回来。我们讨论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一部分初稿，争论非常激烈。有人说陈伯达的稿子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我没表态。但陈伯达写的东西都挨批了，你们搞的东西还能有把握吗？我不亲自抓，你们也可能放黄枪；首长也跟着你们放黄枪，那个责任谁来负？现在你们说说，你们分工‘拉’的那些‘条子’究竟写了些什么，我来把把关。”

秘书们连忙向叶群汇报。叶群一边听，一边插话。

不一会儿，叶群宣布说：“今天就说到这儿。你们抓紧点，在3天之内交卷！”

还没到第三天，叶群就吹风说，陈伯达迟迟未写出报告稿，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3人起草，张春桥、姚文元负责执笔。

在此期间，康生给毛家湾打电话，向林彪极力推荐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康生说，他近期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他认为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作为接班人向

九大作的政治报告,其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短暂的时间内,张春桥和姚文元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康生并且表示,这个初稿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稿子的批示,也很快传到了毛家湾。

毛泽东批示的大意是,此稿大体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有些内容还要改写。毛泽东对于如何修改也作了具体批示。

林彪办公室于几天后又收到张春桥、姚文元的第二次修改稿,毛泽东这一次对第二次修改稿又作了较大的修改。

林彪只是让秘书讲讲毛泽东修改的地方,而没有看张春桥、姚文元的全稿。

毛泽东第三次修改稿子时,改动量仍较大,在文字结构上也作了很大的调整。毛泽东把原来的4个部分改成8个部分,还逐个加上了小标题。毛泽东还大段大段地加写了一些内容,删掉了一些为江青等张目的文字。

然而,在会上准备宣读政治报告的林彪,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像个局外人。

3月底,周恩来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研究,最后将讨论通过的九大政治报告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还是一字没看,一字未改,就大笔一挥:“呈主席审批”。

林彪原来布置的“拉条子”,打算在会上另作一篇口头报告,到了后来也决定不讲了。

因此,在九大的开幕式上,宣读政治报告的林彪就只能用

缺乏热情的声音，平静又时而停顿地照本宣科。

对于4月1日中共九大开幕式上的会议情况，《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中这样写道：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二人。其中，有我们党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大量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党员中的先进分子。来自工矿企业的产业工人党员代表，来自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党员代表，来自各条战线的女共产党员代表，数量之多，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所从来没有过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人民解放军的党员代表中，有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也有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中立了功的新战士。红卫兵中的党员代表是头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这些代表，都是根据党的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决定，经过各级党组织进行了充分的民主协商，并且广泛地听取了广大群众的意见，一致推选出来的。他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充分体现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形成的空前的团结。它标志着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必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产

生深远的影响。^①

按照中共九大公布的议程,从4月2日起,代表们分组讨论林彪宣读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修改草案)》。

从4月2日起至14日,大会进行分组讨论,主要讨论林彪宣读的政治报告和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

毛泽东于4月11日召集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的召集人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就纠“左”问题作了指示。

在会上,毛泽东说,眼前的主动脉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的问题。一个时期总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右时就可能出“左”,在反“左”时就可能出右,党的历史上发生的几次“左”右倾路线错误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党的历史上最危险的3次是“右——‘左’——右”,最危险的3个人物是“陈独秀、王明、刘少奇”。

毛泽东还在会上提出,要把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等选进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接着说,工作,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群众谅解就好了,就要解放。杨勇要放。有的犯错误的,是跟着错误倾向走的,例如谭启龙、朱德、陈云“不是年年反我,也有不反的时

^①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红旗》杂志,1969年第五期。

候”。

4月14日下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九大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由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5人将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所以他们在会上分别讲了话。

毛泽东在讲话时说,3月2日,3月15日,苏联两次侵略珍宝岛,这次仗是没有打过仗的孙玉国指挥的。“看来没有打过仗,也可以打仗嘛”。

毛泽东接着又说:“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指挥车,打了9小时,敌人3次冲锋,都被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

陈伯达虽然在起草政治报告的权力之争中败下阵来,但那毕竟是密室里的阴谋,没有多少局外的人知道。此刻,在1000多名党代表面前,他依然神气十足,摆着党的“大笔杆子”、“大理论家”的派头,极力颂扬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开拓了前人没有探讨过的各个领域,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陈伯达还这样说,中共九大是“从来没有一个会议像我们这个大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震动。世界共产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为我们而欢欣鼓舞,帝、修、反、蒋匪却为之胆战心惊”。

一向在公开场合深沉寡言的康生,这一次也一反常态。他名义上是介绍新党章的起草和修改经过,实际上却用大量篇幅宣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康生说,“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康生甚至还不顾廉耻地胡吹“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也是关系着“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庄重的场合对另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此吹捧,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罕见的。

其他被安排发言的代表还有:代表军队的黄永胜、代表工人造反派的王洪文、代表农民的陈永贵、代表珍宝岛前线官兵的新增补的九大代表孙玉国、代表妇女界的尉凤英、代表革命干部的纪登奎。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上亮相。

王洪文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念着发言稿,在毛泽东的头脑里留下了印象。

陈永贵是此时名震全国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孙玉国则因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不久的中苏珍宝岛之战中立功而成为解放军的代表。工人代表,照理应当由大庆油田的标兵、全国劳模王进喜来担任,才能与陈永贵“旗鼓相当”。而且王进喜也是中共九大主席团成员。然而,造反派司令取代了全国劳模。

他们的发言一致表示同意林彪宣读的政治报告,同意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其中,孙玉国的发言最为引人注目。这时,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国内“抗苏反修”情绪激

昂。与会代表听了孙玉国介绍的前线官兵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事迹后，个个情绪非常激动。

毛泽东亲自站起来热烈鼓掌，并与孙玉国握手，还发表了即席讲话，强调要发扬 20 世纪 50 年代拼搏的革命精神，准备和“苏修”打仗。

最后，大会进行了表决，一致通过了林彪所宣读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新章程，并决定将这两个文件委托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作文字上的校正以后发表。

这个党章，与中共七大、八大通过的党章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新党章删繁就简，只有 12 条。

这次中国共产党章程同样也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包含许多“左”的错误观点。如继续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左”倾论断，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新党章起草小组还把“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总纲。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党章上都是没有过的。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中这样写道：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

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①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严重地束缚了党的思想发展。

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对作为党的行动指南的毛泽东思想作了不正确的表述。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这样写道:“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就抹煞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即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联系),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了主观臆断的夸大。

九大党章还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成熟,完全归功于毛泽东个人。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党的其他卓越领

^① 《中国共产党章程》,《红旗》杂志,1969年第五期。

导人的重大作用被完全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变成了领袖的历史。

中共八大党章规定的“重要问题应由集体决定”的条款在新党章草案中被删去了。中共八大党章规定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宣称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新党章把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完全归到了毛泽东一个人的名下。其中说：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①

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与十几年后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产生了一些矛盾。

中共八大的党章力图使党的民主集中制落到实处，在民主和集中之间寻找一种平衡。1956年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一

^① 《中国共产党章程》，《红旗》杂志，1969年第五期。

次,由它选举中央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行使其职权。中共八大的党章规定:

“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每年至少两次。”“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①

中共八大党章还规定,下级党的组织应定期向中央报告,并要经常请示需要决策的问题。这个党章打算使政策的最终制定建立在一个规模较大的集体上,集体领导是这个党章遵循的原则。

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同时,新党章把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要求中央政治局每半年召开一次中央全会的规定也取消了。

新党章大捧林彪,并把他“接班人”的地位写了进去。其中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

^① 《中国共产党章程》,《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第330页、330—3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

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①

早在1968年10月2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就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江青说，林彪“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在党章上写他”。

康生也力主此议。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就这样，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所谓“秀才”们的一片赞成声当中，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指定某某人为“接班人”并载入党章，这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另一方面，把“接班人”写进党章，这本身就与中共九大自己通过的党章相抵触。中共九大党章第九条规定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产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而中共九大尚未闭幕，“接

^① 《中国共产党章程》，《红旗》杂志，1969年第五期。

班人”已被写进了党章。

列宁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组成的一个集体。他们是经过实践的考验,最有威望、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他们受到广大党员的信任,被选举出来担任最重要的职务,并对全党的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党的领袖既不能保证终身任职,也不能由一个人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而中共九大党章却在《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并且规定“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种作法,是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根本不相容的。两年后,林彪叛逃,正是历史对这种错误的无情嘲弄。

邓小平后来在一次答外国记者问时,指出了毛泽东的这种不正确的做法。邓小平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①

新党章也没有规定要重建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书记处等机构,而代之以“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中共九大党章还取消了有关党员的权利的规定。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违背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组织原则,将党员权利一节全部删掉,只规定了党员必须完成的5项义务和对违纪

^①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党员的处分办法,取消了中共八大党章所规定的党员享有保留意见、批评、申诉直至控诉等权利的条文。

中共九大党章规定广大党员只有义务,包括接受处分的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使党员无法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同时又使少数人成为享有各种权利而不尽任何义务的特殊党员。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就是这种特殊党员。

党章把广大党员在党内应享有的权利取消,必然使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遭受严重损害。党章中还作了另外一些错误的决议。如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使得一些造反起家的帮派分子得以“突击入党”,混入党内。还有像党员的义务用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5项条件取而代之,显得过于空泛,难以约束党员的行为等等。

总而言之,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其内容性质是错误的。在领导党的工作和建设中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对林彪宣读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的讨论情况,中共九大主席团秘书处于4月14日发出的《新闻公报》中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以后,四月二日起,全体代表进行了分组讨论。

全体代表认真地讨论和学习了毛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表示热烈拥护,坚决照办。代表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回顾了党的历史。一九二一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几个小组、几十个党员;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

下,今天,我们党发展成为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代表们说,这就是历史对我们党四十八年的英勇奋斗获得伟大胜利所作的结论,也是历史对陈独秀、王明等曾经对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彻底破产所作的结论。只有懂得党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的伟大,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才能懂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代表们一致激动地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家充满信心地说:在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后,我们党空前地团结起来了。我们这次大会,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开得很顺利,很团结,很好,它一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一个夺取全国更大胜利的誓师大会。^①

中共九大主席团秘书处在4月14日发出的《新闻公报》中说,全体代表认真地逐段、逐句地反复地讨论了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代表们一致认为,这个报告是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刻地阐明了毛泽东关于“在

^①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红旗》杂志,1969年第五期。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分析了中国的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后的战斗任务，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

《新闻公报》中说，在讨论会上，来自各个战斗岗位的代表说，“林彪同志的报告，把我们想要说的，都概括进去了，我们越读越高兴，越读越亲切”。代表们还对报告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补充和修改意见。

《新闻公报》还说，全体代表认真地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后认为，这个修改草案，是全党、全国革命群众共同起草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表现”。代表们认为，这个党章草案，重新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大会的发言和讲话，《新闻公报》中说：

在四月十四日的全体会议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林彪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同志发了言。发言的同志一致表示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拥护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拥护中国共产党章程

草案。他们发言过程中，全场不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大会在通过了林彪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后，决定将这两个文件委托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作文字上的校正以后发表。^①

《新闻公报》还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以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各族亿万革命群众，举行了盛大游行和集会，欢庆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所没有过的。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正在兴起。”^②

《新闻公报》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以后，收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兄弟组织，许多友好国家、外国进步组织、友好团体和人士发来的贺电、贺信共 1977 件。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他们的祝贺和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

最后，《新闻公报》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自四月十五日起，进入第三个议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代表并将继续分组讨论，结合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

^①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红旗》杂志，1969 年第五期。

^②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红旗》杂志，1969 年第五期。

实际情况,进一步落实大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①

除了通过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以外,中共九大的另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由于人事安排关系着以后由谁来掌握中国的命运,因而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事实上,这也可以说,人事安排是每次党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议程。

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选举必须能够充分表现选举人的意志。党的组织和选举人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应当经过选举人的讨论。”“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并且必须切实保障选举人有批评、不选和调换每一个候选人的权利。”^②

然而,这些规定在中共九大的章程中只是用这样一句话作了概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

同时,新党章把协商放在选举之前,并取消了“无记名投票”的规定,从而为少数阴谋家和阴谋集团玩弄权术、操纵选举开了方便之门。正是由于这些规章制度的变化,党的组织制度再一次受到严重危害,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4月15日,中共九大主席团秘书处发出了关于第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办法。其具体办法就是,总人

①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红旗》杂志,1969年第五期。

② 《中国共产党章程》,《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第3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

数(中央委员加候补中央委员)不超过250人;各类人员的比例为:毛泽东、林彪为当然候选人;“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12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和军委办事组的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为一致通过的候选人;原八届中央委员(97人)和候补中央委员(73人)提名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的,限为53人等等。

最后这一条规定,人为地剥夺了绝大多数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合法权利,使他们不能享有被选举权。这个办法本身的产生过程就不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过程。

各小组在酝酿候选人过程中,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斗争。特别是军队方面和工农群众方面的候选人。

张春桥、姚文元等极力为上海的一些造反派头头捧场,使得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金祖敏都成了候选人。其中,金祖敏个人品质很坏,却被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称赞为“路线觉悟高”、“造反早”、“立场坚定”、“斗争勇敢”、“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等等,硬是被拉进了候选人之列。

而纺织工人出身的劳动模范郝建秀在中国共产党的培育下成长起来,又受过高等教育,有文化、有才能、有影响,本来山东代表团提名她为候选人,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但康生等却以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好”为由,坚决反对。最后,郝建秀没能列入候选人名单。还有极个别代表已经是得到大会主席团同意的候选人了,后又因特殊原因没能选入。

利益的分歧,使得林彪、江青在为自己的帮派分子争权夺利的同时,对老一辈革命家费尽心机,甚至不惜搞阴谋诡计,

试图把他们排斥于中央领导机构之外。在小组会上,他们就组织爪牙们猛轰被他们诬为“二月逆流”的老师们。对于他们的这些行径,毛泽东也有所察觉。

4月11日,在大组召集人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指出,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问题。毛泽东的批评,使林彪、江青等人不得不同意一批老干部列入候选人名单。但同时,他们在幕后作了卑劣的布置。

浙江省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20世纪50年代的劳动模范王金友就感到非常困惑。他出席过全国、省、地区、县的很多会议,参加过不少的选举,还从来没遇到这样的事:选举之前竟有人安排一部分人只能投某某的票,另一部分人又只能投另外一人的票,并提供了一份名单,其中多是他熟悉的敬重的老革命家。

王金友不知道某些人有意这样安排,为的是让好些老干部既能当选(不敢违抗毛泽东的指示——编者注),又只能得刚过半数的票,好让这些当选者面子上无光。虽然王金友在投票时并没有服从“安排”,还是按自己的意愿投了票,但像他这样的代表当时确实太少,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些老革命家中,徐向前得票尤低,只有808票,他自己称得了“五个鸡蛋”。

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即闭幕会议。会议投票选举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在主席台前排,毛泽东坐在中间,一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

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另一边依次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阵营可谓泾渭分明。

这次全体会议由林彪主持。

在闭幕式上，代表们排着长队走过大厅前方的投票箱，进行了一次无记名投票的选举。

毛泽东也亲自投了一票。紧跟在他后面的是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在这次选举中，当选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原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占19%。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里，只有20%的委员有过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经历，许多功勋卓著、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被排斥在外。确切地说，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选进新中央委员会的只有53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宋任穷等人连出席会议的资格也被剥夺。

相反地，林彪、江青帮派体系中的相当一批骨干和亲信，还有各地造反派的头头，都大量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这就使得新的中央委员会并不年轻。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平均年龄是61岁，而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平均年龄是59岁。

新的中央委员会还吸收了大批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城市干部的数额从接近60%的比例下降到31%。

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里，军人占一半之多，但人民解放军的实际代表只占三分之一，有些代表是受其他权力机构委派的，比如革命委员会。近半数的部队干部以前是林彪的部下。

中共九大的人事安排,进一步增强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尤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正是以此为基础,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得到公认,也进一步刺激了林彪的野心,为他以后的“抢班夺权”做了铺垫。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相比,人数多了二分之一,委员人数的增多,实际上是这时暗中较量的几方相互平衡的结果。

选举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闭幕。4月24日下午,持续了近一个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落下了帷幕。

中共九大主席团秘书处在4月24日发出的《新闻公报》中写道:

在今天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投票选举的过程,充满了极其热烈的革命气氛。当大会宣布当选名单,读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代表们长时间地热烈欢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团结的胜利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①

^①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红旗》杂志,1969年第五期。

《新闻公报》说,中共九大会议在4月15日进入第三项议程后,代表们认真地、负责地进行了工作。

根据大会主席团的有关规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先由各代表团自由提名,主席团汇集各代表团的意见,提出候选人名单草案,再交给各代表团,经过充分协商,产生出候选人名单。然后,大会进行一次无记名投票的预选。经过这样几次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充分地民主协商”,基本商定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由主席团提到大会进行无记名投票的正式选举。

《新闻公报》中说,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过程,充分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

中共九大座位的排列顺序表明,林彪、江青等人在中共九大上已攫取了党的大部分领导权,一大批声名赫赫的老一辈革命家被“年轻新秀”甩在了后面。虽然大会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会并不是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但毫无疑问的是,林彪和江青都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谈到大会的意义和未来展望时,《新闻公报》中这样写道:

大会代表高兴地说:这次大会,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严肃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基本经验,确定了党在国内和国际活动中的任务和

政策,今天又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圆满地实现了毛主席“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号召。这次大会,必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大会结束之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九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大会认为,应当进一步在全国开展一个伟大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大会期间所作的多次极其重要的讲话,认真学习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学习四十八年以来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通过学习,明确形势、任务和政策,进一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余毒,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是实现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夺取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①

中共九大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上层建筑包括教育、文艺、新闻、卫生等各个文化领域中的革命

^①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红旗》杂志,1969年第五期。

“进行到底”，完成林彪宣读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斗、批、改”的各项任务。

《新闻公报》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全党要有步骤地、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要具体分析各地的情况，注意到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订出必要的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完成“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

《新闻公报》说，大会号召全党、全军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教导，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巩固工农联盟，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共同对敌”。

大会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动向”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为此，《新闻公报》强调，要同“妄图复辟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同“违反毛主席政策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各种表现作斗争。

《新闻公报》中还说，大会要求全党同志和各级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群众路线，坚持毛泽东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用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去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要善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恰当地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

《新闻公报》认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强调不仅要看到它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

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必须充分地看到和抓紧主流方面,同时逐一解决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各级领导同志要了解全局、抓好典型、总结经验、掌握动向,把工作做细,克服一般化。各级领导同志们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警惕资产阶级腐蚀、分裂我们党和革命队伍”。

大会向各条战线的人们表示敬意,向各友好的外国政党和朋友表示敬意。《新闻公报》中说: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向在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和三支两军工作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向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爱国同胞,向在美蒋反动派压榨下的台湾同胞,向长期以来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作了好事的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人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大会号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实际行动,促进革命和生产的新高潮,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创立新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向英雄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

弟党和兄弟组织,向正在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五大洲的革命人民,向坚持把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底的英雄越南人民,致以热烈的战斗的敬礼。大会庄严宣布: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永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我们一定要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团结在一起,彻底粉碎美苏勾结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阴谋,把反对帝、修、反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①

《新闻公报》中还说:“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我们清醒地看到: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种种困难和曲折,国内外反动派还要作垂死的挣扎。但是,这些都阻挡不住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进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无敌于天下。”^②

多年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共九大作出了明确的结论:中共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

^①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红旗》杂志,1969年第五期。

^②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红旗》杂志,1969年第五期。

误的。

1969年4月25日,上海市革委会发出了《关于认真学习九大文献的通知》。

《通知》中说,必须首先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抓紧落实1969年4月1日、4月14日和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新闻公报》被视为会议的重要文献。这也是中共九大与其他各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同的一个重要特色。

中共九大是在对外严格保密的特殊情况之下召开的。全党基层组织和全国人民此时对中共九大的了解都是通过这3个《新闻公报》。

从4月26日起,全国各地上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的彩色文献纪录影片。

对此,新华社消息说,在全国人民热烈欢庆党的九大胜利闭幕的大喜日子里,传来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彩色文献纪录影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已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功。

新华社消息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这部影片纪录了毛泽东亲自主持九大开幕的情景。大会会场的主席台上,高悬着毛泽东的画像。进入大会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

新华社消息强调,特别激动人心的是,“人们将在观看影片的时候,亲耳听到毛主席的伟大声音”。

新华社消息中还说,影片纪录了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的热烈场面。人们观看影片的时候,可以听到林彪向人们发出的“战斗号召”。消息说,林彪宣读报告的过程中,会场上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

4月30日,上海《文汇报》登载了题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和伟大声音将使上海军民沉浸在最大幸福之中》的文章,详细描绘了纪录片在上海上映的情况。文章说:

28日晚上,本市工农兵观众2000余人在东方红电影院举行大会,热烈欢呼《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彩色文献纪录片在本市隆重公映。大会洋溢着极其热烈的气氛。当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工宣队、军宣队同志和全体革命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把影片送到影院时,全场工农兵观众尽情高呼:“团结的胜利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世界上什么最幸福,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最幸福;世界上什么最欢乐,听到毛主席的伟大声音最最欢乐。嘉定县外冈公社葛隆大队的贫下中农从银幕上看到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精力非常非常充沛时,止不住千遍欢呼,万遍歌唱,千句万句并一句,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们激动地

说：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旧社会把我们贫下中农当棵草，毛主席把我们当个宝。他们决心把无限热爱毛主席的忠心化为实际行动，争取粮棉生产新丰收。解放军指战员在看影片时，亲耳听到毛主席的伟大声音：“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一颗颗红心，跳出了胸膛，飞向天安门，飞向中南海。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革命战士永远紧紧围绕在您的身旁，保卫您，保卫您的伟大思想，保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①

文章还说，曾经光荣地接受毛泽东视察过的东海舰队某舰指战员，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从影片中又一次看到了毛泽东，听到了毛泽东的伟大声音，群情振奋，心潮澎湃。他们说，16年前，毛泽东“那扭转乾坤的巨手，在我舰题写了永放光芒的建设人民海军的英明方针：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文章中说：“回顾峥嵘岁月，展望锦绣前程，战士们无比激动地说：党的48年的战斗历程，哪一程不是毛主席指引，哪一个胜利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结晶。他们坚决表示，一定

^①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和伟大声音将使上海军民沉浸在最大幸福之中》，《文汇报》，1969年4月30日。

要为毛主席，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站好岗，放好哨，打好仗。”^①

文章说，上海国棉三十厂、国棉三十三厂、上海重型机器厂、上海电机厂、华丰钢铁厂、上海拖拉机厂以及很多部队、学校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在看影片时，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银幕，“静听着毛主席的伟大声音和林副主席的战斗号召”。“一个个镜头照心坎，一幅幅画面暖胸怀”，他们坚决表示，“化巨大鼓舞为无穷无尽的力量，全面实现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针对有关方面看新闻记录片的反映和形势，文章中说：“国棉三十厂的同志们坚决表示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掀起一个伟大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活动，掀起一个‘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创造出出色的成绩，向毛主席献忠心。同济大学的红卫兵小将，向伟大的红司令毛主席宣誓：我们决心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完成斗、批、改任务，将教育革命进行到底。”^②

这些都作为这个动乱时代的见证，保留了那些迷乱状态下特有的语言行动。但这毕竟是一段历史。是历史，人们就必须正视。只有正视历史，人们才可能不重蹈历史的覆辙。

4月27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预备会议召开。会议以无

^①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和伟大声音将使上海军民沉浸在最大幸福之中》，《文汇报》，1969年4月30日。

^②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和伟大声音将使上海军民沉浸在最大幸福之中》，《文汇报》，1969年4月30日。

记名投票方式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会后，周恩来将投票结果分别报告给毛泽东、林彪。

随后，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于4月28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除5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还有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是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在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的心腹之人就占了5名，包括他的老婆叶群及他的“四大金刚”。“中央文革小组”也有5位大员进入中央政治局，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此后，中共中央下达的文件，均已不见昔日并列的“中央文革小组”，虽然中共中央并未下达撤销该机构的文件通知。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占了12人，超过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半数，使他们在中央领导机构中掌握了更大的权力。

这次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对于江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她终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达到了她一生权力的顶峰。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还有一位“夫人”也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叶群。

林彪夫妇多年来“紧跟”的结果，在中共九大上得到了体

现。林彪成了载入党章的主席的“接班人”，叶群从“林办”主任一跃而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据林彪秘书后来回忆说，毛泽东为酝酿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曾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3人组成的工作班子。

毛泽东于4月27日下午召集这个班子开会，最后商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在这个班子中，康生、黄永胜自然竭力为江青、叶群说话。周恩来很难改变这样一个局面。最后，江青、叶群都榜上有名。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议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会议通过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副主席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这个名单于5月27日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对外公布。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再次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并提出“要准备打仗”的问题。毛泽东说：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

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①

早在1968年底，毛泽东亲自抓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1969年春，毛泽东找几位元帅谈话，派他们到工厂去蹲点，作点调查。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说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

^① 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5—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望他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

毛泽东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中国这个基础不稳固。毛泽东还说,据他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毛泽东说,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

毛泽东说,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作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检讨,那么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

由此,毛泽东说,这就说明革命没有过错。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都要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

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

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①

在讲话中,毛泽东强调“要准备打仗”。毛泽东说,无论哪一年,都要“准备打仗”。“不管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

接着,毛泽东强调要从物质上和精神上两方面准备。毛泽东说,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

^① 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①

在谈到如何打仗的问题时,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说:“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②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还就团结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说: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

^① 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② 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跟王效禹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还不是合作了嘛。^①

毛泽东说，过去讲过，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具体的内容，就是干什么事，什么是具体的胜利，怎么样团结。

^① 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8—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毛泽东在讲话时表示,他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毛泽东还关心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公平和公道问题,并要求大家谨慎小心。毛泽东说:

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啰。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①

^① 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毛泽东在讲话时说,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中国共产党在重建。现在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在讲话快结束时,毛泽东对这次大会的“成功”和保密措施进行了评价。毛泽东说: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出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知道了。^①

中共九大之后,各地都在宣传和贯彻会议精神。为了宣扬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河北省石家庄

^① 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工人马福全在题为《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战士》的文章中写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两个极其重要的文件，现在已经发表了！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特大喜事。我们厂的广大工人，听到这个喜讯，心情万分激动，千遍万遍地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堂不上课的阶级斗争课，使我们受到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深刻的教育。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一次严峻考验。”^①

^① 马福全：《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战士》，《红旗》杂志，1969年第五期。

马福全说,世界上的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是要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权,包括各个工厂、学校、公社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马福全认为,作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战士”,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用好权,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自觉地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此外,经常不断地进行开门整风,实现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是掌好权、用好权的一个重要关键。

马福全说,厂革委会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多次进行整风。革委会成员都经常参加劳动,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努力实现自己的思想革命化。文章说:

毛主席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毛主席亲自为我们党制定的伟大建党纲领。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化为自己的灵魂,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党员和革命群众向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先锋队组织,把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锻炼成为向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进战士,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永远革命,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厂的广大党员和工人,决心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周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进一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夺取更大的胜利。^①

整个中共九大召开的过程,自始至终都是在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议的整个基调仍是“大赞大颂大批”。赞颂的对象首先是毛泽东。很多代表说:“能够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坐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是我们的最大幸福。”^②

有记者询问代表们在大会上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对此,不少代表表示,只有两条要求:一是“多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多听“毛主席的伟大声音”;二是“敬请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大家合影。

在中共九大上,代表们还“大颂”林彪和他宣读的政治报告,“称颂”林彪宣读的政治报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文献”,“划时代的伟大报告”,“向共产主义前进的伟大纲领”等。代表们还“赞颂”了江青和“样板戏”。

^① 马福全:《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战士》,《红旗》杂志,1969年第五期。

^② 谢忱:《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回顾与思考》,上卷,第542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9月版。

“大批”的对象，首先是刘少奇和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其次是一批参加过所谓“二月逆流”和“一贯右倾”的老同志，他们在大会和小组会上又一次受到错误的批判。

在 20 多天的会议过程中，人们始终看不到认真讨论研究问题的现象，更听不到任何不同的意见，只有震耳欲聋的“万岁”声和“打倒”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完全失去了它应有的党的领导层了解基层，基层将意见送达领导层的作用。

同时，中共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并加强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中共中央的地位。林彪宣读的政治报告，极力吹捧“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还对国际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夸大了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影响到 1969 年的全国备战浪潮。这就给国家经济造成了沉重不堪的负担。

中共九大选举的结果，使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进入了党中央领导机构，造成了严重的组织不纯，也使中国社会动荡加剧成为不可避免。

另外，中共九大的党章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一违反组织原则和事物常态的作法，使得林彪这位野心家更加有恃无恐，为他们祸国窃权、危害人民创造了基本条件，最后终于导致了叛国出逃的事件发生。

对于中共九大的历史地位，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写道：“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

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①

总体上看,中共九大的突出特点是自始至终为“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毛泽东的一个简短的开幕词,竟被高呼“万岁”的口号声打断数十次。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它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

毛泽东曾经多次预计,“文化大革命”能在一两年、两三年内有一个好的结束。但局势的发展,即使对他这样的领袖人物来说,也感到难以驾驭,多次的预计都流于落空。中共九大的召开,也没有像他所预计的那样,使这场“文化大革命”以胜利的姿态趋向结束,恰恰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加深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

历史和人民都在呼唤冷静和反思,中国共产党无疑是要顺应历史潮流和倾听人民呼声的。乌云必将散去,这一天必将到来。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第81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

主要参考书目

《毛泽东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第二、三、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毛泽东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刘少奇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周恩来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

《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邓小平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叶剑英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

社1996年3月版。

《叶剑英诗词选集》，叶剑英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

《薄一波文选(1937—199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十二册、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董边、谭德山、曾自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英)克莱尔·霍林沃思著，高湘泽、尹赵、刘辰诞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

《刘少奇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刘少奇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

主要参考书目

《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黄峥主编，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版。

《缅怀刘少奇》，《缅怀刘少奇》编辑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8 月版。

《走近刘少奇》，张文和、李义凡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9 月版。

《我为刘少奇当秘书》，刘振德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 11 月版。

《刘少奇在白区》，陈绍畴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 1 月版。

《共和国最大冤案》，图们、孔弟著，法律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

《周恩来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2 月版。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

《浦江魂——白色恐怖下的周恩来》，王光远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 7 月版。

《风雨四十年》，童小鹏著，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1 月版。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安建设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版。

《我们的周总理》，《我们的周总理》编辑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 1 月版。

《朱德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

献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

《董必武年谱》，《董必武年谱》编纂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版。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毛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6 月版。

《伟人之初：陈云》，迟爱萍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版。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6 月版。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 4 月版。

《彭德怀自述》，彭德怀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版。

《中国人的脊梁——彭德怀》，王焰、蒋宝华主编，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9 月版。

《贺龙传》，《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

《回忆贺龙》，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革命史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1 月版。

《陈毅传》，《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版。

《徐向前传》，《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 3 月版。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

《谭震林传》，《谭震林传》编纂委员会著，浙江人民出版

主要参考书目

社1992年12月版。

《叶剑英传》，《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月版。

《萦思录：怀念叶剑英》，《萦思录》编辑小组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萧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2月版。

《聂荣臻回忆录》，聂荣臻著，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一大”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组编，新华出版社1982年6月版。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

《中国共产党大典》，罗正楷主编，红旗出版社1996年6月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回顾与思考》，谢忱编著，上、下卷，新华出版社1999年9月版。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薄一波著，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3月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王瑞璞、孙启泰主编，第三卷（1966—1976），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中国百年大写真》，丁惠永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年6月版。

《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周明主编，第五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4月版。

《红船交响曲》，李健编著，中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

《“文革”之谜》，晓地主编，朝华出版社1993年4月版。

《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杨先材主编，中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中共党史导读》，《中共党史导读》编写组编，上、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5月版。

《吴晗和〈海瑞罢官〉》，人民出版社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

《中共历史转折关头——关键会议亲历实录》，李剑主编，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3月版。

《中国共产党若干历史问题写真》，韩泰华主编，下卷，中国言实出版社1998年6月版。

《人民大会堂纪实》，石纲编，上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版。

《共和国轶事——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邱石编，第一卷(上、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版。

《共和国轶事——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邱石编，第二卷(上、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2月版。

《共和国轶事——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邱石编，第三卷(上、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2月版。

《共和国轶事——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邱石

主要参考书目

编,第四卷(上),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版。

《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伍仁编,第二卷,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版。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肖冬连等著,下卷,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版。

《1967年的78天——“二月逆流”纪实》,所国心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4月版。

《中国百年风云:旋涡》,谢远学主编,东方出版社2001年1月版。

《风乍起》,张志忠著,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1月版。

《“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 第8部 上 1966-1976 苍天飓风

作者=谢远学主编

页数=1021

SS号=11352447

DX号=

出版日期=2003.07

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风暴骤起	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
第二章	狂澜不羁	大规模内乱开始全面掀起
第三章	横槊浪头	对全面内乱制止的努力
第四章	一月风暴	上海造反派大肆夺权
第五章	拍案而起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
第六章	风靡雨急	武斗夺权升级和稳定形势推动
第七章	岁月蒙尘	一大批冤假错案酿成（上）
第八章	岁月蒙尘	一大批冤假错案酿成（下）
第九章	人民写史	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冤案始末
第十章	苍茫大地	中共九大召开的前前后后
主要参考书目		